目　录

随感录 ……1
公同管理……1
两个和会都无用……1
致胡适信 ……3
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 ……4
——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 ……8
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11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17
——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
随感录……20
立宪政治与政党 ……20
六月三日的北京 ……20
吃饭问题 ……20
研究室与监狱 ……21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22
北京市民宣言 ……25
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 ……27

实行民治的基础 ……………………………………………………28
《新青年》宣言 ……………………………………………………40
随感录……………………………………………………………43
法律与言论自由 ………………………………………………43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44
调和论与旧道德 ………………………………………………45
告北京劳动界 ……………………………………………………49
自杀论……………………………………………………………53
——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
随感录……………………………………………………………69
《浙江新潮》——《少年》 ……………………………………………69
对于国民大会底感想……………………………………………70
随感录……………………………………………………………73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 ………………………………………73
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 ……………………………………75
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77
基督教与中国人 …………………………………………………84
新教育之精神 ……………………………………………………94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
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100
——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106
致周启明信………………………………………………………118
教育缺点 …………………………………………………………119
——在江苏省教育会上的演讲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23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130
——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讲演
致李大钊、胡适等……132
训卢永祥的秘书……134
劳动者底觉悟……135
——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138
我的意见……138
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145
附原信（节录）……146
答章积和（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147
《水浒》新叙……148
两个工人的疑问……149
致程演生……151
真的工人团体……152
致周启明信……153
谈政治……154
对于时局的我见……165
随感录……167
虚无主义……167
上海社会……168
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168
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170
再答知耻（劳动问题）……171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172
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174
无理的要求……175
致周启明信……176
随感录……177
学说与装饰品……177
国庆纪念底价值……178
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183
《伙友》发刊词……184
敬告广州青年……186
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188
《儒林外史》新叙……190
随感录……192
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192
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193
答柯庆施(劳动专政)……199
《共产党》月刊短言……200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202
在欢迎(送)蔡孑民出国宴会上致词……204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206
致罗素先生底信……206
复东荪先生底信……207
附：东荪先生致独秀底信……215
随感录……217
劳工神圣与罢工……217

主义与努力……217
革命与作乱……218
民主党与共产党……219
提高与普及……220
无意识的举动……221
致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222
致胡适之、高一涵……223
附：(一)胡适的信……223
附：(二)胡适的信……224
欢迎新军人……228
新教育是什么？……230
社会主义批评……241
——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教育与社会……257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讲
在工业学校演说词……261
——工学生与劳动运动
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265
——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会演讲
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267
——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
理发工会成立会演说辞……271
致周豫才、周启明信……274
致胡适之……275
讨论广州社会实际问题……276

影画戏院问题……276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277
辟谣……279
——告政学会诸人
《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281
随感录……283
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283
告劳动……285
随感录……287
卑之无甚高论……287
革命与制度……288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289
答张崧年(中国改造)……291
讨论无政府主义……292
答区声白的信……292
再答区声白书……297
三答区声白书……300
答何谦生(同善社)……314
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315
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317
陈独秀启事……322
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323
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324
工人与军人……325
名实……326

《西游记》新叙 ……327
“宁波水手”……328
平民教育 ……329
基督教与基督教会 ……330
广东工人与上海工人的比较……333
——在上海纺织工会浦东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
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334
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纪念 ……335
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 ……336
——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演讲
再致周作人先生信 ……340
宗教问题…… ……342
——在交大的讲演
马克思学说……349
告做劳动运动的人 …… ……361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364
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366
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 ……368
答黄凌霜(无产阶级专政)……371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373
《独秀文存》自序 ……379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 …… ……380
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386
造国论 ……388
国民党是什么 ……391

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393
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395
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396
革命与反革命……402
反动政局与各党派……406
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410
评蔡校长宣言……414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416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418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422
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428
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430
统一的国民运动……435
致胡适……436
怎么打倒军阀……437
沈鸿英叛乱与政学会……442
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444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446
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453
社会之历史的进化……454
——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460
——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481
杨森果为统一而战吗?……483

吴佩孚与康有为……485
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486
国民党与交通安福……488
吴佩孚爪牙阎锡山第二——杨森……489
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491
孙曹果然携手了?……493
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494
国会议员宣布张阁罪状与曹吴态度……495
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军阀……498
呜呼!外国政府下之商埠同盟!……500
中国土匪也来了!……501
儿戏之北京政府……503
临城事件与长沙事件……505
告上海纳税华人会……506
中国农民问题……508
寸铁……516
国民运动……516
国学……516
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517
仇孝论讨父会……518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519
北京政变与学生……522
北京政变与军人……524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526
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528

欢迎《民治》周刊 ……530
呜呼！北京学生联合会！ ……531
答李子芬(乡村共产主义运动) ……532
粤局与革命运动 ……533
章炳麟与民国 ……534
黎元洪南来 ……535
曹锟贿选与中国前途 ……537
贿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 ……538
研究系与中国政治 ……540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541
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 ……543
苏俄六周 ……544
《科学与人生观》序 ……547
陈炯明与政局 ……555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557
寸铁 ……569
亡中国者留学生也 ……569
皇帝与学术 ……569
辜鸿铭太新了 ……570
基督徒望基督徒成佛 ……570
孔圣人又要走运了 ……570
农村立国主义原来如此！ ……571
议员与娼妓 ……571
是猪仔呢还是无政府党人？ ……571
答适之 ……572

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577
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579
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580
宪法与自治学院……582
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584
广东战争之意义……586
祝上海丝纱女工协会成功……587
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588
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591
寸铁……602
精神生活东方文化……602
国学……604
粪场上的农村立国……604
圣人也得崇拜商品……605
列宁之死……606
北洋军阀三种新借款……608
电报电话借款之秘密……610
新疆省之煤油矿……612
卷烟特税问题……614
寸铁……616
岑春煊派员投北……616
圣道一门的王芝祥夫妇……617
外币祸……617
兵吗还是匪？……617
呜呼宪法运动！……618

商界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声 ……619
意械事件 ……622
国民党之模范的改造 ……623
告合作社同志们 ……625
寸铁 ……630
新闻记者与土匪军阀 ……630
联省自治的下场 ……631
陈炯明赵恒惕到底为什么反对孙中山? ……631
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 ……632
工党政府下之英国工人罢工运动 ……634
寸铁 ……635
统一 ……635
慎重与上当 ……635
恐吓我们的唯一法宝 ……636
无枪者连拍马也不灵! ……637
中国工人运动之转机 ……638
中俄会议之成败 ……639
飞律宾之独立运动 ……641
寸铁 ……642
利用国民党 ……642
造谣中伤 ……642
武力统一的榜样 ……642
工界最近之惨剧 ……644
评中俄协定 ……646
寸铁 ……648

国故党与复辟党……648
老马与小犬……648
湖南废省宪运动……649
评中俄协定草案……651
上海租界三大问题……653
太戈尔与东方文化……656
导淮问题与政治……658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660
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663
丧权辱国之无线电密约……668
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669
上海租界工部局能在华界行使职权吗？……673
欢迎广州上海两学生会……675
工界厄运重重……677
汉口之党狱……679
世界的反动政象之转机……680
寸铁……682
黎元洪又缩头了……682
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682
可怜想吃天鹅肉的中国人！……683
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683
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683
卖阶级的工党政府……684
答张君劢及梁任公……685
杨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697

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问题……699
外人对于商标之无理要求……700
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701
寸铁……703
以伪乱真……703
诗人却不爱谈诗……703
太戈尔与金钱主义……704
大同主义与弱小民族……704
亚洲民族联合与亚洲平民联合……704
德国对华赔款问题……706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708
寸铁……713
国民革命与反革命的财阀……713
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714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716
智利领判权与中国主权……720
内国银行又供给军阀一百万元……722
法西斯党与中国……724
美国侵略中国之又一形式——三K党……726
孙宝琦去职与金佛郎案……728
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729
寸铁……731
沈恩孚梁启超眼中的平民……731
梁启超勿忘今日之言！……731
假革命党……732

收回教育权 ……733
上海防盗问题……735
寸铁 ……738
假革命党与反革命党……738
精神生活与金钱 ……738
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 ……739
新银团与中国 ……740
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之又一证据……742
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 ……744
再论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 ……746
日本在华侵略之新计划 ……749
加哇的民族运动……751
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 ……754
美国人又以军火供给北洋军阀 ……757
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 ……759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 ……761
关税协定之外卖国政府又与外商协定纸烟税 ……763
江浙战争 ……765
寸铁 ……767
革命党怎好希望敌人优容！ ……767
国民党与中国革命……767
革命党和农民第一次见面……761
"亡党"……768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769
我们的回答……772

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783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786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790
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795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797
肃清内部……799
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801
国民党的政治态度……803
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805
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运命……807
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中国政局……810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812
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821
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823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825
列宁与中国……830
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834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837
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839
一封给章行严的信……841
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844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846
寸铁……848
　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848
　共产和普选果足以亡国么？……848

你们早已背叛了民党呵！……848
只要脸厚什么事都好干！……849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850
寸铁……853
崇信外国……853
陈炯明与辛亥革命俱乐部……853
悼孙中山先生！……854
寸铁……857
“反……救亡会”……857
护党呢还是叛党？……857
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858
统一与分立……861
寸铁……863
反段与降段……863
好个不使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劳工！……863
亡国的上海！……864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866
寸铁……873
卖国……873
过激主义与被压迫者……873
卖国贼与国民党右派……874
赤化与软化……874
“反唐”与国民革命……875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877
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881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884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887
广州战争之意义……889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892
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895
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898
寸铁……903
罢工与法律……903
孙宗昉三出风头……903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905
《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917
寸铁……924
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924
奉军在北京之治外法权……924
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926
寸铁……931
康有为与奉系军阀……931
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931
段执政的《甲寅》……932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932
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933
反奉运动与法统问题……940
寸铁……942
戴季陶之道不孤矣……942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943

又是一个共产军！……943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944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949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953
寸铁……957
中国军阀之左右派……957
工贼替安福派说话……957
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958
以赤化为仇敌的奉天商会……958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960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965
寸铁……976
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976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977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979
广州事变之研究……983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989
寸铁……994
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994
你们代表谁？……995
一个不行动的党……995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995
反赤 苛政……996
《独立报》对谁独立？……996
国民军与北方政局……997

国民党右派大会 ……………………………………………………1001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1008
寸铁 ……………………………………………………………………1013
唐生智也赤了吗? ……………………………………………………1013
讨赤大元帅…………………………………………………………1013
反赤的滋味…………………………………………………………1013
这是以党治国吗? …………………………………………………1014
最近政局之观察……………………………………………………1015
我们要认清敌与友 …………………………………………………1018
寸铁 ……………………………………………………………………1022
章炳麟与镇威孚威…………………………………………………1022
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1022
奉军胜利之教训 ……………………………………………………1023
南方形势与国民党 …………………………………………………1024
宪法与贿选…………………………………………………………1027
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 ………………………………………1030
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的态度 ………………………………1033
孙传芳最近的主张 …………………………………………………1035
寸铁 ……………………………………………………………………1041
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1041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1042
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 ……………………………………………1049
寸铁 ……………………………………………………………………1053
全中国人都过激了吗? ……………………………………………1053
到底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1053

亚细亚民族大会与谢米诺夫……1054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055
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1062
給蒋介石的一封信……1065
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1073
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1077
革命的上海……1081
寸铁……1085
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1085
刘芦隐与张君劢……1085
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1085
美术家再往何处逼？……1086
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1086
国家主义的政纲……1086
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1087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088
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1091
答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1094
附：原信……1098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106
寸铁……1112
丑哉和平运动！……1112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1113
我们现在怎样争斗？……1115
寸铁……1118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赞 ……1118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1118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 ……1119
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1119
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运不齐 ……1120
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 ……1121
寸铁 ……1124
讨赤特捐 ……1124
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些什么人？……1124
丁文江与爱国行动 ……1125
傅筱庵的和平运动 ……1125
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 ……1125
那里有中华民国？……1126
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1127
寸铁 ……1133
到底是谁没收人民财产？……1133
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1133
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1134
此路不通的国家主义 ……1134
国家主义者与研究系 ……1134
十月革命与东方 ……1135
寸铁 ……1139
研究系官运不亨通 ……1139
研究系是只白虎 ……1139
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 ……1139

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1140
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1140
革命与武力……1142
寸铁……1146
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1146
丁文江竟比军警还要反动……1146
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队及其五色旗……1147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1147
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1148
孙传芳败后之东南……1149
各国承认国民政府问题……1153
谁杀了谁？……1159
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1167
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进攻政策……1173
谁践踏了谁？……1177
——斥麦克唐纳尔
寸铁……1182
张宗昌的三不知……1182
放屁狗的《甲寅》……1182
优伶也赤化了吗？……1183
妙哉圣道会！……1183
革命与民众……1184
寸铁……1189
无耻的九省联合会……1189
稳健之孙文主义！……1190

“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1191
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1194
寸铁……1198
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1198
究竟是谁无祖国？……1198
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1199
怎见得我们不要国家？……1199
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1200
好高明的稳健派！……1200
北洋军阀“安”的成绩！……1201
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1202
张作霖宣言之解剖……1206
我们目前的奋斗……1209
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1212
寸铁……1217
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1217
党皇帝……1217
西山会议派打倒了吗？……1217
投机商人——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左右……1218
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1218
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1220
答符琇（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1224
答王纯礼（革命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党）……1225
寸铁……1226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1226

个人的军事独裁之榜样！……1226
我即党与朕即国家……1227
日本人诬蔑中国革命领袖一至于此！……1227
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1228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1233
——告两党同志书
寸铁……1235
谁敢再想做中国之爹亚士？……1235
英国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了吗？……1235
稳健派原来如此！……1236
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1237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240
——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1244
湖南政变与讨蒋……1252
在土地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258
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1260

随 感 录

公 同 管 理

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因为日本管理的地方，不但兵队警察要来，那卖淫的，卖药的，卖鸦片的，卖吗啡的，收买铜钱的，一齐都要来，都要把中国人踩在脚底下当狗打。打过了还要中国人和颜悦色的同他"亲善"，不然就加上你一个"排日"的罪名。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联合亚洲的黄人，持抗欧美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日本人在东三省和山东的情状，比从前俄人德人怎么样，这就是个明白的榜样。

两个和会都无用

上海的和会①，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

① 1919年2月20日，北方政府总代表朱启钤与南方广州军政府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开和平会议。唐提出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取消参战借款、解散参战军等条款，遭北方政府拒绝。3月2日，和议停顿。4月9日，和会续开，唐再提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督办处、善后借款南北政府共同分用、军政府法令有效等条款。5月13日，和会不了了之。

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第二十号　署名：只眼

致胡适信

适之吾兄：

国民外交协会发起国民大会，本打算今天在中央公园集合；警厅因为四号学生闹了事，便禁止集会；此时公园左近交通要道都密布军警，禁止行人走过；大会恐怕开不成气了！

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

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

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

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弟独秀白〔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午后四时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

——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

国民呵！爱国学生诸君呵！外交协会诸君呵！我们对日外交，差不多十有九分是失败的了！而且我们对日的外交失败，又何止一个"山东问题"！眼前已经是可悲可惨，日后亡国的可悲可惨，更加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无量数倍啊！

是什么没良心的畜生造成我们这样悲惨的境遇！

日本人因为自国的权利欺压我们，这是他们被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的，我们不必怨他。曹、陆、章等亲日派固然有相当的罪恶，但是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种种罪恶的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我们也不必专门怨他。

况且曹、陆、章等未必真有卖国的行为，他们如果卖国，政府怎肯让他们都站在重要的地位？

曾记得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革命党用炸弹打了薛大可所办的亚细亚报馆①，薛大可大叫冤屈。现在曹、陆、章等也受了同样的冤屈。

---

① 1915年9月10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创刊，"明白宣布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次日晚七时许，革命党人派杨玉桥向该报馆门口投掷炸弹，爆炸后，死伤数人，杨亦身殉。12月17日夜，该报编辑部再次被炸。

欺压我国的日本人，为了“山东问题”正在他们国里日比谷公园开国民大会，好几万人天天闹个不休，他们的政府不曾丝毫干涉，他们是何等高兴？我们被日本欺压的中国人，也为了“山东问题”，想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做政府的后盾，政府却拿武力来殴逐国民，不许集会，满街军警，断绝交通，好象对敌开战一般。日本人看了岂不活活笑死！

若说是恐怕破坏安宁秩序，尽可多派警察监视，也没有事前揣测就要剥夺人民集会自由权的道理。若说恐怕和前回学生一样闹出事来，前回学生集会，被害的只曹、章两人，公共的秩序安宁并没有丝毫扰乱。政府无故禁止国民集会，对于欺压中国的日本，亲善主义固然表示得十足，但是对于被日本欺压的本国的人民怎么样？

曹、陆、章等究竟有没有卖国的事实，姑且不论。但是他们的恶名已经遍传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自己不曾辩明，又不避嫌辞职。政府也不避嫌，仍旧把他们放在重要地位，我真百思不得其解。

汪大燮、林长民都曾经做过政府的阁员，现在也还居政府中有责任的地位，对于卖国党都发过有责任的言论。究竟谁是谁非，政府何以置之不理？

听说司法界因为学生聚众事件，正在搜查证据，预备提起公诉。试问政府官吏有了卖国的评判，检察官有没有搜查证据提起公诉的责任？司法官是否可以在司法独立的美名之下，因私交紊乱国法？

就说二十一条辱国的密约，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试问拿军

事协定① 和济顺、高徐的合同②，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的百姓，也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吗？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二千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什么勾当？此外还有许多铁路、矿山、电话、森林，都用贱价卖给日本，到底是何人主持，是何人经手？是不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

甘心把本国重大的权利、财产，向日本换军械军费来杀戮本国人，这是什么罪恶？造成这罪恶的到底是什么人？

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人心已死的中国，国民向来没有团结一致的爱国心，这是外国人顶看不起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中国顶可伤心的现象。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象这样办法，是要中国人心死尽，是要国民没丝毫爱国心，是要无论外国怎样欺压中国，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不然便要送交法庭，加上他一个干涉政治扰害公安的罪名。这样办法好极了！好极了！

---

① 1918年3月25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省交换共同防敌公文，中日军事协定正式成立。日本政府据此可出兵北满、外蒙，既占中国领土，又可进攻苏俄；并借款给段祺瑞政府，扶植皖系军阀。

② 1918年9月2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缔结济南至顺德、高密至徐州二铁路预备借款契约，契约规定：借日金二千万元，年息八厘，由二铁路现在及将来一切之财产并其收入为担保，无日银行之承诺，不得提供为他项担保。

禁止国民集会，拿办爱国的学生，逼走大学校长，总算对得起日本人了！听说亲日的军阀派还要解散大学封禁报馆哩！这也未免过于要好了！你们可晓得有许多富于爱国心的国民，现在虽没有象学生这样出头说话，看见你们这样行径，都在那里暗中落泪呵！

曹、陆不过是一种机械，章宗祥更不比曹、陆，他的罪恶，只是他的现职连累了他，此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积极卖国的大罪恶。国民呵！爱国学生诸君呵！外交协会诸君呵！你们若是当真把这根本大罪恶都加在曹、陆、章诸人身上，实在冤屈了他们呵！

1919年5月11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一号　署名：只眼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

(一)敬告协约国国民

阿!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但是拿破仑时代的世界大战争了后,仍是强权得势,所以造成第二次大战争。这次威廉时代的世界大战了后,仍是强权得势,恐怕又要造成第三次大战争。要想免第三次大战争的痛苦,非改造人类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这蔑弃公理的强权不可。什么"国际竞争",什么"对外发展",什么"强国主义",什么"强力即正义",都是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有因必有果,将来受这痛苦的,却不单是我们中国人,希望诸协约国国民都要有点觉悟,别做第二德意志。

(二)敬告中国国民

"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公理的思想。但是"民族自卫主义"(就是在国土以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若因民族自卫,

就是起了黑暗无人道的战争，我们都不反对。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象这种全体国民的存亡大问题，可怜只有一部分爱国的学生和政客出来热心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旁边不问，已经是放弃责任不成话说了。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是政客利用煽动，（全体国民那个不应该出来煽动？煽动国民爱国自卫，有什么错处？）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象这种下作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

（三）敬告日本国民

若说中国没有开发的利源很多，因为缺少资本和经验，工商业又不容易振兴，一方面日本因地小人多，有对外发展的必要。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大义说起来，日本人若真心实行中日亲善主义，不占据中国土地，不侵害中国主权，不垄断中国的交通机关和矿山，破坏中国民族生存的基础，至于相当的工商业的和平发展，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觉得有相互的利益。在日本民族发展上说起来，若定要实行军阀派的侵略野心，未必就能够将中国人斩尽杀绝，徒然弄得两民族感情日恶，一方面工商业上受绝大的

影响，一方面势力范围日渐扩张，旅居中国的日人日渐加多，虚荣上经济上虽有利益，而旅居中国的日人种种不法行为，不但大召中国人的恶感，并且影响于日本国民品行，不能不算是极大的损失。所以我要奉劝日本国民，若求日本民族在中国真实的稳健的发展，应当用和平的工商主义，不应当用强迫的侵略主义。若说商业发展要有政治的强力保护，那么此时基督教在中国，何以比从前各国用强力保护干涉的时代还要发达呢？若说日本倘不侵略，就难免让欧美人捷足先得，我看这种话头，正是逼迫中国人仇恨日本接近欧美的原因。

（四）敬告外交当局

我们国民是何等昏惰，政府是何等糊涂，外交失败也不好专责备那一方面。单说这山东问题，我们提出巴黎和会对德直接索回青岛或是各国暂时公管的希望，十有八九是一场春梦了。我们现在要提醒外交当局的，就是万不得已到了中日直接交涉地步，我们要抱定宗旨：若是日本肯把青岛和胶济路完全交还中国，并不要求他项权利，单是要求赔偿攻打青岛的兵费，我们还可以允许。若只是名义上的交还，除了承认他继承德国已得权利以外，不能再添上丝毫别的矿山铁道等经济上的利益。至于济顺、高徐两条铁路，是从山东问题又向北扩张到直隶问题、向南扩张到江苏问题，更是断断不能承认的。政府若是听从亲日卖国派的诡计，凭空断送重大权利，酿成直隶、山东、江苏三省的问题，这种卖国大罪，国民是万万不能再恕的了！

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　署名：只眼

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

（一）上海总商会的佳电

北京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均鉴：青岛问题激成全国公愤，皆由章使宗祥不胜其任。查章使于洪宪未成之后，不愿长农商，长司法，而独愿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欧战开端，日本以哀的美敦书致青岛德军云："尔曹不退出，当以兵车相见。若青岛为我所占，待欧战平定交还中国。"此言也，全球皆知，岂能更变？今欧战既停，章使应如何商承政府，询问日本作何手续交还。乃计不出此，电请我政府提交欧会公决。不料因有英日、法日、意日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又不奉命遽回本国。甫抵都门，忽有辞职之意。携眷到津，复潜住曹寓。其父其兄，久处京城，何以舍而寓曹？情甚诡秘，人之猜疑，实由自召。值此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具有愤懑不平之现象。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为此电请钧座，迅赐遣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中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请电知陆专使，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条约并无牵制，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际此人心浮

动，伏乞将办理情形晓示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总商会叩，佳。

（二）日人对于佳电的欢感

日本人见了上海总商会的佳电，正合他们的意旨，所以十分欢迎，十分感谢。十三日北京《顺天时报》有一篇论说，题目叫做《读沪总商会对山东问题佳电之感言》。内中说道：

值此舆论喧嚣，纷纷自扰，或者煽惑学生，胁迫治安，以为争夺势利之计。或者利用谋伤两国关系，以为鹬蚌渔父之计。吾人夙为东亚大局忧之。顷读上海商务总会对山东问题呈请大总统、国务院、外交农商两部之佳电，吾人实不能不有无限之感慨。盖全国商会之领袖，其镇静公正之态度，达观大局之见识，自有与一般嚣嚣者流不同者焉。

又说道：

该电又云："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电请迅赐遣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中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电知赌专使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种条约并无牵制，应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云云。此尤为正当议论，正当办法。何其处心平静，而谋策宏远耶！苟中国国民及政府当局，有此了解，有此用意，东亚两国之事，更无何等困难之问题矣。

上海总商会诸君看见日本人这样夸奖他们，不知道难受不

难受？惭愧不惭愧？后悔不后悔？

（三）上海商民反对总商会的函电

佳电发表后，上海商民大惊失措，痛恨总商会媚外辱国，群向商业公团联合会请求反对。亲向该公团询问办法的人很多，就中的商会会员实占多数。商业公团因此特开会议公决，除致函该商会诘责外，并为釜底抽薪的法子，电致北京声明否认佳电的主张。上海总商会久已众叛亲离，自有此次违犯众怒的佳电，尤足使旧日声名扫地以尽。兹将电函并录如下：

（一）商业公团致北京电　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钧鉴：上海总商会佳电，主张青岛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极端否认。并请转电巴黎专使。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五十六公团叩。

（二）公团致总商会函　敬启者：顷阅报登贵总商会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佳电，不胜骇讶。查青岛问题，我全国主张请求欧洲和议，由德国直接交回中国，并取消"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此万口一声，天下皆知者也。今读佳电，一则曰请遴派大使克日起程，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再则曰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等语。以上云云，是我全国人民所誓死坚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何以贵总会佳电违反民意，适为该国之愿。本会同人至愚，不解所谓，纷纷来函询问，应请高明详晰见复，以释群疑，是所切祷。此致上海总商会。

（三）赵锡恩致总商会函　总商会主任干事暨诸君大鉴：所贵乎商会者，以法定之机关，为商人之保障，谋利源之发展，助国

家之富强，事至繁，任至重也。今我中国大势亟矣，外侮纷乘，其目的在夺我商人之生活。内乱蜂起，其结果亦以我商人为牺牲。商人于此更宜如何竭智代谋，翼护同类。……乃我观于我上海之总商会，则有惭骇悚惧大惑不解者，如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在欧参预和议之成败，亦即关系我商业前途之存亡。失此不争，转瞬为高丽之续。我商人生计行见剥夺以尽。北京学生集合奋兴，共击误国之官。全国学生，闻风继起。商业团体联合会已于青岛问题、学生风潮有所建议，实力能及之举动，亦已沈毅进行。独我总商会徘徊瞻顾，若恐一经表示，即致开罪于强邻者。报纸喧传总商会重要分子，多欲顾全与日本人之私交，雅不愿其手掌中之商会，有违日本人之片面亲善主义。其言虽未可尽信，要之国人多数认我商会为麻木不仁之形式机关，益证以此次之态度，固已无可讳饰者也。鄙人亦商会一分子，诚欲湔雪此耻，敢求诸公振作精神，速图自白。今日报载我商会上政府电，主张派使赴日争回青岛，是不啻与虎谋皮。外人仍疑我商会暗助日本，贯彻其中日自决之主张，脱离欧洲和会公理之拘束。是虽勉发一电，仍未足餍人望。愚见以为我商会当此谴诟丛集之时，宜速召集全体大会，共同研究挽回主权稳保商业之策。或电恳我国驻欧议和代表，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如不得请，则拂袖径归，以示公理之不可屈伏。义愤所激，或能感动和会中人之良心，力持正谊，保全中国。或更分电欧美各国大商会，表示我国商人之意思、痛陈中日交涉之不平。欧美各国商人不乏爱慕公道之士，度能出一言以为声援。此外更须警告日本商会，晓以利害，使知两国人民恶感愈深，日本商人将不能立足于中国。彼等怵于生计之丧失，当必苦劝政府收拾野心，改变政

策。一面由我商会提倡相当御侮之法，以促野心家之返省。苟能同心戮力，持久不懈，而谓毫无效果可收者，吾不信也。惟事机万急，稍纵即逝。……鄙人本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切望于我商会者至重。……急不择言，诸希鉴察。

（四）沈卓吾致总商会函 顷见报纸载贵会对于青岛问题所发之佳电，言人所不忍言。此种独得之见解，究出谁人之主张？且佳电之责任，抑仅贵会会长负之耶？抑此外有无代为负责之人也？事关国家，不得不有以奉询，务祈明示为祷。

（四）提交和会与中日自决的利害

山东交涉问题，中国人主张在巴黎和平会议交涉，日本人原来希望不提交和会，由中日两国直接自决。这两种不同的办法，和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将来山东的利害关系极大。日本希望直接交涉有三种意思：（一）是青岛问题若不提出和会公决，由中日私自议决，这便造成中日两国在和会里不能列在国际平等地位，这便造成日本代表东亚诸国立在盟主地位，这便造成日本在亚洲的蒙罗主义。同一交还青岛，由和会议决与中日自决，关系两国的国际地位很大。所以十四日《顺天时报》明白说道："关于山东问题最可注意之点，即日本力争由日本将青岛交还中国者果为何故是也。日本所争者，非区区之青岛，非区区之山东，实为维持东洋唯一强国之体面。而所谓维持体面者，又非徒在虚荣，实为东洋百年之安宁计也。"（二）是由和会议决，精神上还是中德的交涉。由中日自决，精神上形式上都是中日交涉。青岛问题完全归到中日交涉，便根本上已经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

了。(三)是由中日直接交涉，日本便可以用兵力和贿赂对待中国政府，藉口交还名义上的青岛，又可以取得一大批德国权利以外的济顺、高徐铁路和许多矿山的权利。为日本利益打算，自然是中日直接交涉的好，所以曹汝霖也说日本必将青岛交还中国，倘不交还，他也出来反对。上海总商会这样糊涂的主张，(其实用不着他们主张，已经到了这不幸的地位了。)一定说他们暗助日本，或者有点冤枉。但是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知识，不明白世界潮流大势，随便妄谈国事，实在是万分危险呵！

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　署名：只眼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

——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目无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

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赳赳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 Tolstoi 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 Nietzsche、斯特勒 Stinor 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

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倘不能照这样征服他们，凭空想他们拿出良心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真算是望梅止渴了。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立宪政治与政党

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

六月三日的北京

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飏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吃　饭　问　题

常言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将他止住。”我看人要吃

饭，也无法将他止住。各国都有许多雄赳赳虎狼似的军警，要立什么密约便立什么密约，要侵占人家土地便侵占人家土地，要怎样横蛮不说理便怎样横蛮不说理。独有人民要饭吃，却无法将他止住。无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署名：只眼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摇动。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薄。要想把爱国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决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公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而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义和国民

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
>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署名：只眼

北京市民宣言[1]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2]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

---

① 《北京市民宣言》共一页，上半页为中文，下半页为英文。据高一涵回忆：由陈独秀起草，胡适译，由北京大学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印刷。六月十一日晚，陈独秀、邓初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宣言》，陈独秀被暗探跟踪，在散发《宣言》时被逮捕，九月十六日，获释。（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又见：《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辑）。

② 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三人均为皖系军阀的实权派。

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1919年6月9日

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①

久闻贵志发达，惜未细读。又闻"五四"运动，诸君出力独多，窃以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时期，但其觉悟之程度，却不一律，是可分为三步观之。其一，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此在一般国民，均具有此种觉悟，不独参与"五四运动"者为然，即反对斯举之官僚——甚至曹、章辈——虽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尔，然亦非绝对无此感悟。其二，则政治不良之觉悟。吾人日者屡闻各方面有请愿之举，多涉内政问题，可见国人已有此种觉悟，特以例前者，则觉悟之程度，及具此觉悟者之人数，殊形减少，盖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其三，则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有如杜威博士所云："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具此种觉悟者，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希望贵社以后对于国民觉悟之程度务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种觉悟者之人数增加，则尽美尽善矣。

1919年11月《国民》第2卷第1期　署名：陈独秀

① 原题为《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陈独秀讲话》。演说日期为1919年10月12日。

实行民治的基础

“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组织”

民治是什么？难道就是北京《民治日报》所说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　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　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　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的民治主义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

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实行民治，自然也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而且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政治虽是重要的工具，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说若要改良政治，别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别拿工具当目的，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们目的的工具；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在这两种工具当中，又是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的；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至于他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觉得还有点不彻底；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须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

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民治，自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政治的民治主义”这七个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还不大顺眼。但是我决不因此灰心短气，因为有三个缘故：一是中国创造共和的岁月，比起欧美来还是太浅，陈年老病那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国社会史上的现象，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这种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的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象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三是中国人工商业不进化和国家观念不发达，从坏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因此物质文明不进步，因此国民没有一致团结力；从好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却因此没有造成象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我们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

现在政象不佳，没有实行民治主义的缘故，也有好几层：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们从前把建设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

以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军全由军人主动，一般国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都以为政府万能，把全副精神用在宪法问题、国会问题、内阁问题、省制问题、全国的水利交通问题，至于民治的基础——人民的自治与联合——反无人来过问。五是少数提倡地方自治的人，虽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旧迷信大规模的省自治和县自治，其实这种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划分行政区域和地方长官权限的问题，仍旧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截然是两件事。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必须把上面说的二、三、四、五这几层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实事，少出风头，把大伟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运动家、大爱国者的架子收将起来，低下头在那小规模的极不威风的坚实的民治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上做工夫；不然，无论北洋军人执政也罢，西南军人执政也罢，交通系得势也罢，北方的安福部得势也罢，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学会）得势也罢，进步党的内阁也罢，国民党的内阁也罢，旧官僚的内阁也罢，我可以断定中国的民治，仍旧是北京《民治日报》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民治。

我不是说不要宪法，不要国会，不要好内阁，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国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对省自治、县自治。我以为这些事业，必须建筑在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充分发展；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筑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象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坏；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

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

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那一国都还没有实行；政治的民治主义，英美两国比较其余的国家，总算是发达的了。他们所以发达的由来，乃是经许多岁月，由许多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各种同业联合，合拢起来，才能够发挥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民治主义；好象一个生物体，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块整物，乃无数细胞组织、器官组织合拢起来，才能够成就全体的作用。他们的民治主义，不是由中央政府颁布一部宪法几条法令，就会马上涌现出来的，乃是他们全体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道："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说道："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找自由而来的，所以他们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

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

现在有许多人的心理，以为时局如此纷乱，政府那里顾得到地方自治的问题；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还未经正式国会详细规定出来，我们怎样着手？至于同业联合的组织法，政府国会都还未曾想到，更是无从组织。我想这种见解是大错而特错，是有两个根本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以为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够实现。我以为这种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就是能够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我们不要；我们所要的，是从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第二个错误，是以为法律能够产生事实，事实不能够产生法律。我的见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对，我以为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社会上先有一种已成的事实，政府承认他的"当然"就是法律，学者说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学说。一切法律和学说，大概都从已成的事实产生出来的。譬如英、美两国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们的人民创造出来这种事实，后来才由政府编成法典，学者演成学说；并不是先由政府颁布法典，学者创出学说，他们人民才去照办的。所以我觉得时局纷乱不纷乱，政府提倡不提倡，国会有没有议决法案，都和我们人民组织地方自治、同业联合不生关系。

我所说的同业联合，和那由店东组织的各业公所及欧洲古时同业协会(Guild) 不同，和欧洲此时由工人组织的职工联合(旧译工联Trade Union) 及其他各种劳动组合也不同；因为此时中国工商界，象那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工厂和各处铁路矿山的督办总办，都是阔老官，当然不能和职工们平起平坐；其余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纯粹资本作用和劳力没有发生显然的冲突以前，凡是亲身从事业务

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

关于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种种学说、制度，非常之多；至于详细的办法，一时更说不尽；我现在单只就中国社会状态的需要而且可以实行的，举出几条原则，免得失了直接的实际的精神，就会发生笼统、涣散、空洞、利用、盘踞、腐败种种不可救药的老毛病。

最小范围的组织

乡间的地方自治，从一村一镇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一乡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马路或是警察的分区，分做许多小自治区域，先从这小区域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城自治市自治。同业联合是要拿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做范围，譬如一个码头的水手、船户、搬运夫，一个矿山的矿夫，一条铁路的职工，一个城市的学校教职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木匠、瓦匠、车夫、轿夫、铁工、纺织工、漆工、裁缝、剃头匠、排印工人、邮差、脚夫等，各办各的同业联合；商业的店东管事和店员，在小城市里便归在一个联合，在大城市里，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业或马路分办各的同业联合；万万不可急于组织那笼统空洞的什么"工会"，广大无边的什么"上海商界联合会"，什么"全国工人联合会"。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

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

这种小组织的地方团体和同业团体，人数都必然不多，团体内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会直接议决事务，无须采用代表制度。若是一团体的事务，各个分子都有直接参与的权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以免得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在积极方面，可以养成多数人的组织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业上尽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观团体涣散。中国现在的地方自治办不好，就是因为大家让少数的绅董盘踞在那里作恶；同业联合没有好效果，就是因为现在各业公所的组织，只是店东管事独霸的机关，与多数的职工店员无涉。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就是因为小组织的人少，便于全体直接参与，一扫从前绅董、店东、工头少数人把持的积弊，又可以磨练多数人办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数的教育程度不够，还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上的话来回答："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对于政治有很大的责任，然后自然能养成一种政治人才；美国的浩雷斯曼说：'我们的主张不是说人生下来就配干预政治，不过总要叫他配干预才是。'这就是民治主义的教育。从前美国的选举也有财产、教育、男女的限制，现在才把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没听人说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见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的，不是生来

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为男女应该有同等权利的理论，姑且不提；单就事实上说，女子加入的坏处，我一时想不出；我却想出许多女子加入的好处，女子的和平、稳静、精细、有秩序、顾名誉、富于同情心等，可以使团体凝结的性质，都比男子好；他们第一美点，就是不利用团体去夤缘官做。

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

执行团体议决事务的董事，由团体全员投票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应当有教育、财产、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数宜多，任期宜短，不能连任；每半年改选三分之一，满期退任的次第，抽签预定。无论大会或是董事会，都只设临时主席，取合议制，不设会长总董。这都是防备少数人盘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

地方自治应该注重的是：教育（小学校及阅书报社），选举（国会、省县议会及城乡自治会），道路，公共卫生；乡村的地方，加上积谷、水利、害虫三件事。同业联合应该注重的是：教育（补习夜学，阅书报社，通俗讲演），储蓄，公共卫生，相互救济（疾病、老、死、失业等事），消费公社，职业介绍，公共娱乐，劳工待遇等事。上海工业界现在有许多同业的联合会发生，我们十分欢迎；但是我们也有十分担心的两个疑问：（一）是否仅仅为了外交的感触？还是另有团体本身生活上实际需要的觉悟？（二）是否店东管事们在那里包办？上海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颇和我主张的小

组织相同；但我们不能满意的地方，（一）到会的会员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体，并没有过半数。（二）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东管事，没有店员的分。（三）本身的组织和实际生活需要的问题，都没有谈起，请了许多事外的人来演说，发些救国裕商的空套议论，这是做什么！我盼望社会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为我所注重的实际生活需要讨价过低，说我主张不彻底；我相信照中国现社会的状况，只有这种小组织，注重这种实际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义坚实的基础，乃是政治经济彻底改造必经的门路。我盼望官场中神经过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马上就联想到破坏统一；不要提起同业联合，马上就联想到社会革命。我主张的这种小组织，实在平易可行，实在是共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实在说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什么社会革命；这种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们政权无涉，于你们官兴多碍，就是这种小组织的同业联合所注重的实际需要，也都是在现社会现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不但比不上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那样彻底，就是比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还要和平简陋得多。

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

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无论北洋军人、西南军人、老官僚、新官僚、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已未系、政学会，可以总批他“明抢暗夺误国殃民”八个大字；一定要说那个好那个歹，都是一偏之见，缺少阅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

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础上最后要留意的，就是别让三害鬼混进来，伸出他背上的那只肮脏黑手，把我们的一线光明遮住了。蝇营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惯会看风头，乘机窃取起来，更是眼明腿快，我们要格外严防，别让他利用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办什么政党什么劳动党，做他当总长的敲门砖；最好是各种小组织的事务所，都贴上"小心扒手"，好叫大众留神。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坚实的基础，也是故意摆出矮户低檐的景象，好叫这班阔人恐怕碰坏了纱帽翅，不来光顾才好。

这篇文章刚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见张东荪先生新做的《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见《解放与改造》的一卷五号）说得很透彻，可以补我这篇文章的遗漏，读者务必要参看。我所主张的小组织好叫人人有直接参与权，似乎是打破一切寡头制度（头目包办制度自然包含在内）的根本方法；这种思想倘然能够成为事实，成为习惯，不但现在经济方面的恶制度可以扫除，就是将来较大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大组织，自然也不会有寡头专制的事发生，真民治主义才会实现。我所主张的同业联合，也含着有"两元的社会组织"的性质。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联合会日刊》所说的尽同，而且我不愿意采用"两元"的名词；因为本来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

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话说来太长,而且不是本篇的论旨,改日再谈罢。

十一月二日夜。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新青年》宣言[①]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

① 本篇原题为《本志宣言》，发表时未署名，收入《独秀文存》时改为现标题。

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

觉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随 感 录

法律与言论自由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象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造成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象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不和他一样，他便要办他儿子忤逆不孝的罪；认真严办起来、岂不要断绝后代！

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论他，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

的法律。象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俄国Lenin一派的Bolsheviki的由来，乃是从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都城Stockholm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因为要不要和Bourgeoisie（工商社会）谋妥协的问题，党中分为两派，Lenin一班人不主张妥协的竟占了多数，因此叫做Bolsheviki，英文叫做Major group（多数派），乃是对于少数派（英文叫做Lesser group）Mensheviki的名称，并非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暂且不去论他，痛恨Bolsheviki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利权，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我们暂且也不去论他；那第一叫我们觉悟，叫我们注意的，有两件事：

（一）反对Bolsheviki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蒙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

（二）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主张和Bolsheviki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农政府——的德国的现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又在那里讨论扩充海军预算等。

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

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换一方面说，Bolshevikism的内容，和他们如果得志思想上有无变迁，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没有人能够断定；但是现在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阶级的、一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利权，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

调和论与旧道德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同一人数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用时代划分，同一民族中，各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也不能用时代划分，这等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

我们抱着改良社会志愿的人，固然可以据进化史上不幸的事实，叙述他悲悯他实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灾乐祸得意扬扬的主张他应该如此。譬如人类本能上，有侵略、独占、利己、忌妒、争杀、虚伪、欺诈等等恶德，也没有人能不承认是实在如此。然断乎没有人肯主张应该如此。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

再说到道德问题。这是人类进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却不限于西洋、东洋。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因为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象知识那样容易进步。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发达，乃是因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是人类普通的现象，各民族都是一样，却不限于

东洋、西洋。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不懂得旧道德的功效在那里；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旧的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什么，好处在那里？勤俭二字用在道德的行为上，自然是新旧道德都有的，不算旧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为上，象那刻薄成家的守财奴，勤俭都是他作恶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标准呢？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章行严先生说："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这种偏枯专制，没有人己平等的思想，也正是旧道德造成的。这种道德就是达到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

裂的生活，利己的社会；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公同生活的理想，还远的很，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不能满足。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们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岂不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署名：独秀

告北京劳动界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

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业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我想一班失势的帝王贵族，何妨把横竖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己也归到无产劳动阶级之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欧战以后，各国劳动界的问题都闹得天翻地覆，就是新旧帝王贵族，勾结盘踞的日本政府，也要添设"劳动事务局"和"社会

局”。社会局附属在内务部，办的是工场法、劳动保险、失业保险、最低工价、利益分配几件事务。劳动事务局是在农商部的劳动局之外，直隶内阁和各部平行的机关，办的是贫民救助、职业介绍、住屋改良、贱费医诊、孤儿贫儿养育、盲哑保护，儿童俱乐部、儿童图书馆、公共卫生、传染病预防、禁烟、禁酒、消费公社、公设市场等项事务。

现在我们中国的劳动问题怎么样？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例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的人（许多无地劳动、无力劳动、不肯劳动的贫民，还不在此内）。如此，我们现在要提出劳动问题、贫民救济问题来讨论，大概不是“无中生有”“无病而呻”罢？象日本社会局、劳动事务局打算办的各种事务，未见得不比“祀孔”、“文官考试”、“西北边防”、“封禁报馆”、“建立功德祠”更加要紧。因为多数人没有饭吃，是一件最要紧最危险的事啊！

据本月十七日北京《民治日报》的《北京的见闻录》上说：单是内右四区，就有赤贫的一八二八户，七七四九人。我从前做过一篇《贫民的哭声》，想替北京贫民诉点苦况，必是财产阶级的先生们都看不上眼，所以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前几天梅兰芳一班戏子，在新明大戏院唱戏为车夫休息所筹款，倒很令人佩服，不知道北京的士大夫对于这件事作何感想？

劳动界的痛苦自然很多，一时也说不尽。北京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一）是中交纸币，不吃他工价暗亏的直接痛

苦，也受他物价加高的间接痛苦。（二）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饮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三）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靠拖车餬口。

我现在所盼望劳动界的，并不是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消极的努力，就是不赌钱，不吃酒，不吸烟，不扎吗啡针，不去当兵，不要早婚配多养儿女。积极的努力，就是创设同业联合（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我做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学、储蓄机关，这几件事紧急，要提前先办。

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以外另行组织。成衣和理发匠本来都有团体，不过组织的方法要大大的改变。排字印刷制版的工人也有一两万，内中认识字的很多，应当容易组织。邮差都认识字，又和交通机关接近，组织起来更快，并可以帮助别的劳动团体的活动。北京虽然没有很大的制造厂，但是像东单牌楼一带的铜铁厂、制靴铺，骡马市大街的木工厂、“祥聚”、“福盛”、“德善”、“骏生”、“振纶”等织布厂，“丹凤”火柴、洋烛两公司，首善工艺厂，度量衡制造厂，彰仪门大街的工艺局，彰仪门内的“富兴”、“长顺”两个纸坊，据我所知道的这些地方，合拢起来，工人也不在少处，只是没有联合的组织，便拿不出你们办事的力量。商会是店东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各校学生的联合组织成绩很好，我盼望各种劳动团体和他们接近，请他们帮助，我也盼望他们恳恳切切的来做你们的朋友。你们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

生，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

我盼望官场和资本家，你们既然反对"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尽政府的职分，就应该注重民生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当做全国人的公共机关，不应该把政府当做专门保护少数人财产工商阶级利益的机关，不应该把多数人无产劳动阶级的痛苦不放在眼里。你们何妨趁夺利争权的余暇，把杀人的军费省下一点，把中交票抬高一点，或者也仿照日本政府"社会局"、"劳动事务局"的办法，对劳动界施点"仁政"。你们对于劳动问题，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催派代表到会，我看是用什么"临时抱佛脚"的法子对付！

我盼望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做人看待。法兰西从前的贵族，鄙薄那激烈的革命党人，送他们一个"无〔套〕裤汉"(Sane Cultte)① 的混号，现在他们这班无裤汉，内中恐怕有些人穿上军服礼服，自命为知识阶级的绅士了。我们的中华革命党，现在也有个人居然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挺起胸脯歪着嘴骂无产阶级的人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我看你们刚才穿上裤子没有几天，不必像煞有介事！

1919年12月1日《晨报》 署名：陈独秀

① 现译名无套裤汉。原是穿华贵短套裤的贵族和富人对穿粗长裤平民的蔑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成为革命者自豪的称号。

自　杀　论

——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君在三贝子花园投水自杀了。他自杀底原因，大概是厌世。

林君底同学罗志希君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说林君不是因病想免除痛苦而死，乃是万恶社会迫他自杀的；他并说出三个救济底方法：(一)美术的生活，(二)男女朋友交际的生活，(三)新的人生观。

北大教授蒋梦麟先生也做了一篇文章，他不把青年自杀的罪恶都加在社会身上，他说："社会本来不能自己改良，要我们个人去改良他。"他主张"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用大刀阔斧斩一条路，为后人造幸福"，"从地狱里造天堂"。他以为"自杀是自示其弱"，"自杀是一个大罪恶"。他以为自杀算是杀了社会上一个人，而且是杀了社会上一个有用的好人。

北京《晨报》上登了一首《读〈自杀论〉有感》的诗：

> 凡物皆有死。死了仍再生。死死生生何劳苦！不若永死了不复生。
>
> 我昔曾绝望。自杀，岂粗鲁?当我自杀时，万象皆空，情志自由，乐难数。

神魂即与体魄离，茫然如睡，无知无识，更何忤？

谁谓自杀是懦夫？懦夫岂能自杀，甘为虏？

利己利他两不亏。何罪，求死不自主？

今且追恨援救我的人，把我解了；死乃生之祖。

茫茫宇宙何时停？我怎能够永久死了不复生？我怎能够永久死了不复生？

有一个外国人，听见蒋梦麟先生谈学潮后青年底三种心理：(一)事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二)思想自由，(三)改变人生观。他便说：好危险！将来恐怕有许多青年要自杀。

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也要做一篇论青年自杀的文章，他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做出来，他的意思大概是：能自杀的人固然比偷生苟活的人好，但是再转一个念头，能用自杀的精神去改造世界，比消极的自杀更好。

杜威夫人说："我不自杀。若是我自杀，必须先用手枪打死两个该死的人。"

以上都是对于林君自杀底各种感想。我以为林君自杀，是青年自杀中底一件，青年自杀，是全般自杀中底一件，要评论林君自杀底问题，不得不从全般自杀问题说起。

自杀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学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那里还有别的现象，别的问题发生呢？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感想可以解答的。我现在从各种方面分别讨论如下：

一，自杀底趋势

二，自杀底时期

三，自杀底原因

四，自杀底批评

五，自杀底救济

（一）自杀底趋势　据社会学者说，自杀底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我以为是思想发达和经济压迫底程度）加增底趋势，因此各国自杀底人数多寡不同。从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一年，五年间平均计算，欧洲各国底人口一百万里，自杀底人数如下表：

丹麦	二五三
法兰西	二一八
瑞士	二一六
普鲁士	一九七
奥地利	一五九
比利时	一二二
瑞典	一一九
巴威利亚	一一八
英格兰	八〇
那威	六六
荷兰	五八
苏格兰	五六
意大利	五二
爱尔兰	二四

有一位意大利底社会学者也说自杀底事，多发生在智识阶级，曾统计意大利和法兰西百万人中，自杀的人职业如下：

法兰西

自由职业	五一〇
工业家	一五九

原料制造者	一一一
商人，运送业	九八
仆婢	八三
意大利	
科学家、文学家	六一四
军人	四〇四
教育家	三五五
行政官	三二四
商人	二七七
司法官	二一八
医生	二〇一
工业家	八〇
原料制造者	二五

（二）自杀底时期　欧洲自杀底时期，每年从一月起，渐渐增加；自七月起，渐渐减少。日本人底自杀期，每年七八月间最盛。

（三）自杀底原因　据统计学者底话：自杀事件，文明人比蛮族多，教育程度高的比程度低的人多，青年老年比少年人多，妇女比男子多，未婚的人比已婚的多，都会比乡村多，穷人比富人多。照统计学上自杀底人数看起来，可以发见自杀底三个原因：

（一）智识信仰发达——{文明人 / 有教育的人 / 青年老年人}

（二）情绪压迫——{妇女 / 未婚的人}

（三）经济压迫——{都会里的人 / 穷人}

这三个自杀底原因，详细地追本求原，社会压迫自然是这三个原因底总原因；但分别说起来，前两个是偏于主观的，后一个是偏于客观的。偏于主观的自杀，虽然受了社会压迫或暗示的影响，而自杀者的意志在主观上多少总与压迫的或暗示的意志相结合；偏于客观的自杀，大部分是因社会的压迫。

再就自杀事件底各种直接的原因，除精神病之外，可以类别如下：

(1)厌世及解脱 (2)烈女殉夫 (3)忠臣殉君及奴仆殉主人 (4)义士殉国家及朋友 (5)教徒殉教及志士殉主义	第一类，关于知识信仰。
(6)失恋 (7)羞惭 (8)忏悔 (9)名誉被污 (10)考试落第 (11)刑罚底痛苦 (12)虐待底痛苦 (13)疾病底痛苦 (14)愤恨	第二类，关于情绪压迫。
(15)饥寒所迫 (16)债务所迫	第三类，关于经济压迫。

第一类底男子殉忠，女子殉节，都是中国、日本重要的道德，最大的荣誉，印度还有寡妇自焚的事。象这类的自杀，完全是被社会上道德习惯压迫久了，成了一种盲目的信仰；因为社会上不但设立许多陷阱似的制度，象昭忠祠、烈士墓、旌表节烈、节孝牌

坊等奖励品，引诱一班男女自杀；而且拿天经地义的忠孝大义，做他们甘心自杀底暗示；这种压迫和暗示受久了，便变成一种良知，觉得殉忠殉节，真是最高的道德，不如此便问心不过。殉教、殉主义、厌世、求解脱，这几种自杀，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客观上社会直接的压迫，一方面也因为主观上受了一种新信仰新思潮的暗示，暗示也算一种间接的压迫。Wundt 把暗示(Suggestion)叫做"醒的催眠"(Watch-hypnose)，因为他也有催眠作用，受了暗示的人，便入了"意识逼窄"(Narrowing of consciousness)的状态，暗示底力量压迫着他的思路向一定的方向进行，他自己的意志完全失去效力。(略用Christensen底意思，见Politic and crowd-morality P. 12) Christensen分暗示为二大类：一是别人的暗示(Foreign suggestion)，一是自己的暗示(Auto-suggestion)；别人的暗示又分两种：一种是人身的暗示(Personality suggestion)，一种是社会的暗示(Social suggestion)。人当恐怖、猜疑、冥想、迷信底时候，多起自己暗示的作用，中国人怕鬼，就是这种作用。人身的暗示，最有力量的是两亲、业师、宗教家、医生、演说家、音乐家、演剧家、大思想家、社会改革运动者、大文豪、爱国者，不但同地同时，就是在远方古代，他们也都有暗示底力量；社会的暗示就是历史、传说、习惯、舆论、道德、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思想潮流，这几样暗示底力量强大而且久远。个人底行为或者不能说全没有意志自由底时候，但是造成他的意志以前，他的意志自由去选择信仰行为以后，都完全受环境暗示底支配，决没有自由底余地。自杀也是一种行为，所以不能说不是受环境底压迫和暗示。压迫和暗示紧紧地逼窄了他的意识，意识失了觉性，意志失了效力，好象鬼迷了一般，压迫在后面追赶，暗示在前

面指引，所以不知不觉地只看见自杀是唯一的道路，不容他看见第二条道路；而且暗示占领了他的知识界域，成了信仰，也不愿意走别的道路；所以平常人看做极悲惨，可恐怖的事，自杀的人看做平常，绝不回顾。这一类自杀的人所以多是文明有教育的青年，因为知识信仰发达的结果，比蛮族、无教育的人、少年容易接受这种暗示。

第二类底(6)(7)(8)(9)四种自杀，都是因为情绪上受了道德习惯和舆论的压迫；(10)(11)(12)(13)(14)五种自杀，都是因为情绪上受了社会制度的压迫。人是社交的动物，一旦受了压迫，社会上无立足之地，断绝社交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象这种人自然毫无生趣；但是他们倘不受厌世思想、解脱主义的暗示，恐怕还没有自杀底决心。因为自杀多兼两种原因：一是社会的压迫，一是思想的暗示；蛮族、无教育的人、少年，比较自杀的少，都是思想不发达，缺少第二种原因；倘若二种原因俱全，无论怎样勇于奋斗的人，一方面为社会底道德制度所驱逐、一方面为厌世思想所引诱，还有不自杀的道理吗？妇女的情绪易于感动，未婚的人情绪容易失调，所以自杀底人数比男子比已婚的人多。

第三类的自杀，纯粹是因为经济的压迫，受思想暗示底影响很小。都会里的人生活更艰难，所以自杀的比乡村多。物质文明越发达，富人兼并的力量越大，穷人所受经济压迫的痛苦越深，所以文明人自杀的比蛮族多。这是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不良底结果，不能说是文明本身底弊害。至于学说思想随着别的文明发达，而且传播加快，厌世主义的暗示，也随着效力加大，所以各国自杀底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加增底趋势，这只可以说是厌世主义的弊害，不能归罪文明本身。这种受了思想暗示的自杀，

应该归到第一类，和第三类的自杀关系很浅。因为受经济压迫而自杀的人，大半教育知识底程度很低，未必有学说、思想上的信仰；所以有许多困苦不堪老年残废的乞丐，还要贪生怕死，有为的青年却往往自杀，就是这个缘故了。少年人自杀的少，也因为他感觉痛苦和暗示的力量薄弱。有几种蛮族不但他们自己不自杀，并不相信人类真有自杀底事，正因为他们一方面思想不发达，一方面经济的压迫也不甚利害。

以上三类十六种自杀底原因，综合起来，不外两大总原因：

（一）社会的压迫（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

（二）思想的暗示（个人的，社会的两方面。）

（四）自杀底批评　古来对于自杀底批评，有反对非反对两派：

（甲）反对派

（一）佛教反对一切杀，自杀也包含在内，而且他们相信轮回，杀这世的肉身，无济于事。

（二）基督教极端反对自杀，以为犯了自杀罪的人不能够到天堂。罗马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主张就是受污的女子也不应该自杀。

（三）意大利神学者阿夫纳斯（Thomas Aquinas）说自杀有三样罪：一，是违背了好生恶死的自然性；二，是减少了社会底分子；三，是侵犯了上帝底生杀权。

（四）费希特（Fichte）说为人生存时有义务，自杀是想免除义务，所以不道德。

（五）叔本华（Schopenhauer）说自杀不是应该非难的行为，乃是糊涂的行为，因为自杀只能够灭绝肉体，不能够

灭绝本体(即意志)。他又以为自杀底真正目的,在求得精神底平安,否定意志是达此目的底唯一方法。否定意志是什么?就是无我主义。

(乙)非反对派

(一)希腊禁欲派(The Stoics)说自杀可以解脱一切痛苦。

(二)英国哲学家休谟说:"人类处置自己的生命,若算是侵犯上帝底权利,那么人要延长上帝用自然法限定的生命,岂非也不应该吗?"又说:"我若是没有力量为社会造福,或是为社会底累赘,或是因为我的生命妨碍别人为社会尽力,那么我若是自杀了,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三)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反对国家设立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和处罚自杀未成的等法律。

(四)福禄特尔(Voltaire)说:"若说自杀有害于社会,那么屠杀生命的战争,何以各国底法律都认可?"

我们对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两种趋势:一是古代宗教家大半反对自杀,一是后来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大半不反对自杀。希腊古代的风气,本和自由思想的近代相仿佛,所以有Stoic一派的主张,完全与基督教相反。自由思想的希腊人,事事与基督教相反,不止自杀一端。

(五)自杀底救济　讨论自杀底救济,第一个先决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救济底必要?

我们为什么要救济自杀?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各国政府所深恶痛绝的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说他们是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到是真有两个可以破灭社

会的危险思想，他们却不曾看见。这两个思想是什么呢？一个是独身主义（我以为不婚主义和独身主义是两样），一个就是自杀。

更进一步讨论，我们为什么要维持这社会不让他破灭呢？这种疑问是很难解答的疑问，是哲学上的疑问；厌世自杀的人，正是这种疑问达到他心境最深的处所，感得人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才发生一种彻底的觉悟，最后的决心；这种自杀是最高等的自杀，是哲学的自杀，是各种自杀底源泉、模范，各种自杀多少都受了他暗示底影响。这种对于人生根本上怀疑的自杀，决非单是改良社会制度减轻压迫所可救济；他心境深处底疑问倘没有圆满的解答，对他说什么生活好，什么生活不好，什么社会制度好，什么社会制度不好，对他说自杀道德不道德，犯罪不犯罪，于社会有害无害；对他说什么死得值不值，什么徒死不能收改良社会的效果，什么为人类造幸福应该奋斗到底，什么自杀是女性，是示弱，是懦夫。象这一类的话，都是隔靴搔痒，在他的眼里都没有一看的价值。只有能解答他心坎里面深处所藏人生哲学的疑问，才能够改变他的人生观，才能够做他不去自杀的暗示。

我以为这种疑问，是两种心理造成的，一是苟且心，一是偏见。苟且心出于宗教上"空观"底暗示，以为人生百年，终久是死，死后底社会更和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偏见出于哲学上"性恶"底暗示，以为人类生来性恶，救济、希望，终久是绝对的不可能，象这种黑暗万恶的社会，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

这两种心理都可以造成厌世自杀，懦弱的人就是不自杀，也要变成顺世堕落一派；顺世堕落原来就是厌世自杀的变相，都是极危险的人生观。这两种人生观，对于人生底价值都是根本地

怀疑，一切皆空，人生底意义是什么，价值在那里？黑暗万恶，人生底价值又在那里？人生既然无意义，无价值，活着徒受痛苦，不自杀便是无意识的苟活。

人生果然完全是空？人性果然完全是黑暗？人生果然无意义，无价值？

相信“空观”的人，未必都相信灵魂转生，（果然灵魂转生，不但现世界空而不空，并且死后底社会还和我关系不断。）就是我也不相信灵魂转生；但是“种性不灭”，“物质不灭”，我们是相信的；一切现象是转变不是断灭，一切空间时间都无实在性，都是这永续无间的转变现象上便于说明的一种假定，我们也可以相信的。我们个体的生命，乃是无空间时间区别的全体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和非我相，在这永续转变不断的大流中，本来是合成一片，永远同时存在，只有转变，未尝生死，永不断灭。如其说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说分别人我是空是幻，如其说一切皆空，不如说一切皆有；如其说“无我”，不如说“自我扩大”。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孙、民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各种历史都是全体生命大流底记录，我与非我一切有生命底现象、痕迹，都包含在这些记录里面。我们个体生命和全体生命底现象、痕迹，无论是善或恶，是光明或黑暗，总算是“有”不是“空”。

复次讨论人性问题，“性恶说”本是一种偏见，人性本有善恶两方面如下表：

善的方面：	恶的方面：
创造的冲动	占有的冲动
利他心	利己心

互助的本能	掠夺的本能
同情心(即恻隐心)	残忍心
爱慕心	嫉妒心
哀哭的本能	嗔忿的本能

在生物进化上看起来,人类也是一种动物,他本性上恶的方面,也和别的动物一样;不过恶的方面越减少,善的方面越发达,他的品格越进化到高等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虽是最高等动物,"下等动物的祖先"所遗传的恶性固然存在,他们所遗传的善性也未尝不存在;况且现在正在进化途中,恶性有减少底可能,善性有发展底倾向,何以见得绝对没有救济底希望呢?受厌世主义暗示的人,只看见人性上恶的方面,没有留心那善的方面,岂不是偏见吗?

"空观"是世俗囿于现世主义底一种反动,"性恶底悲观"是过于把人类看得高明底一种反动。反动不合真理底本来面目。我们现在要了解人生不完全是空,而且要了解这不空的人生不完全是恶,我们要了解人生有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了解得人生底意义与价值是什么,他心境最深处所怀的疑问,便自然有了解答,自然会抛弃那危险的人生观。

危险的人生观,厌世的自杀,乃是各种自杀底母亲,这种自杀底救济,也就是各种自杀底根本救济。因为自杀底原因虽各不相同,多少都受点厌世思想的暗示,这种暗示可以算是各种自杀底共性。解除了暗示,抛弃了危险的人生观,对于人生根本的怀疑有了解释,方才可以和他说什么改良生活状况,反抗社会压迫,由个人改造社会,奋斗到底一类的话。这种自杀有了救济,其余自杀底救济才有路可寻。

厌世观以外，其余的自杀：象上文所列的(2)(3)(4)(7)(8)(9)六种，都是为了社会道德习惯上积极的压迫；(5)(6)两种，都是为了宗风名教学说道德上消极的压迫；(10)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积极的压迫；(11)(12)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上消极的压迫；(13)(14)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积极的或消极的压迫。

社会成了固定性底时候，他的道德的组织和制度的组织，往往发挥一种极有势力的集合力，压迫、驱逐那和他组织不同的分子，那被他积极的(就是奖励)或消极的（就是禁止)压迫而没有集合力和他反抗的分子，往往出于自杀。这种被压迫、驱逐而自杀的分子倘然多了，决不是全社会中底好现象。救济底方法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压迫的社会要觉察自己的组织底缺点，要有度量容纳和自己组织不同的新生分子，要晓得这种分子将来也会有集合力，也会有一种新组织，取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分子倘然发见了社会底罪恶，不要消极的自杀，要有单人匹马奋勇直前的精神，要积极的造成新集合力和压迫的社会反抗。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反抗与结合，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社会进化所必经的现象；社会上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

经济压迫的自杀，自然也是社会制度不良的结果。世界上对于这种自杀底积极的救济，正闹得天翻地覆，现在不用多说了。我相信社会经济制度果然能够改变，生产机关、工具和生产物，都归到生产者自己手里，不被一班好吃懒做的人抢去，那时便真能达到孔子"均无贫"的理想。因为贫富是比较的现象，缺乏乃是对于不缺乏相形见绌的情况，分配果然平均，那里会有贫的现象？生产物果然按劳力分配平均，无论生活如何困难，那里

会有心怀不平愤而自杀的人呢？

据以上讨论，自杀底救济，仍用因果法则，照着自杀底总原因分为两事；

（一）解除思想的暗示（改造人生观）

（二）解除社会的压迫（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组织）

现代青年的自杀，大多数是(1)(6)两种原因；林君自杀自然是厌世不是失恋。这班现代的青年，心中充满了理想，这些理想无一样不和现社会底道德、信条、制度、习惯冲突，无一样不受社会的压迫；他们的知识又足以介绍他们和思想潮流中底危险的人生观结识，若是客观上受社会的压迫，他们还可以仗着信仰鼓起勇气和社会奋斗，不幸生在思潮剧变的时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权，主观上自然会受悲观怀疑思想的暗示，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转眼一看，四方八面都本来空虚、黑暗，本来没有奋斗、救济的价值，所以才自杀。象这种自杀，固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自杀；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不算是社会杀了他，算是思想杀了他呵！忠节大义的思想固然能够杀人，空观、悲观、怀疑的思想也能够杀人呵！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

近代思潮中有这种黑暗的杀人的部分吗？有的，有的，但是最近代最新的思潮不是这样。思潮底趋势如下表：

古代思潮：	近代思潮：	最近代思潮：
理想主义	唯实主义	新理想主义入新唯实主义
纯理性的	本能的	情感的
超自然的	自然的	以自然为基础的

天上的	地上的	人生的
神的	物的	人的
全善的	全恶的	恶中有善的
全美的	全丑的	丑中有美的
未来的	现世的	现世的未来
人性超越万物	人性与兽性同恶	人性比兽性进化
理想万能	科学万能	科学的理想万能
玄想	现实	现实扩大
无我	唯我	自我扩大
主观的想象	客观的实验	主观的经验
个人的非国家的	国家的	社会的非国家的

古代的思潮过去了，现在不去论他。所谓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底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底时候发生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时代，现在也还势力很大，在我们中国底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他的反动，他的救济，就是最近代的思潮，也就是最新的思潮；古代思潮教我们许多不可靠的希望，近代思潮教我们绝望，最近代思潮教我们几件可靠的希望；最近代思潮虽然是近代思潮底反动，表面上颇有复古的倾向，但他的精神、内容都和古代思潮截然不同，我们不要误会了。（参看《新青年》六卷六号中《文艺的进化》）

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罗素（Bertrand

Russell)底新唯实主义的哲学，和法国罗兰(Romain Rolland)底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和罗丹(Rodin)底新艺术。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中《精神独立宣言》)

这思想变动的时代，自然是很可乐观的时代，也是很危险的时代，很可恐怖的时代，杜威博士和蒋梦麟先生所虑的，想必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却不可因此气馁，这是思想变动底必经的阶级；况且最近代的最新的思潮，并不危险，并无恐怖性，岂可因噎废食？

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1]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底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1)我祷告我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2)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的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3)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姊妹们都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署名：独秀

---

① 《双十》，1919年10月10日创刊，后改名《浙江新潮》，共出刊四期。由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第一中学查猛济和甲种工业学校沈乃熙(沈端先、夏衍)等二十多位学生联合创办。《非孝》的作者是施存统，批评杭州四家报纸一文的作者是沈宰白(夏衍)。

对于国民大会底感想

国民大会，是我们人民对于本国政府及世界各国表示我们公共意见底一个顶好的方法，前回国民大会，因为政府里人胆子小疑心大没有开成，很觉可惜。昨天的国民大会居然开成了，而且到会底人很多，秩序很好，所以我个人对于昨天的大会有两个乐观：一是可以令政府放心，令政府觉悟，市民聚众开会只要官厅不来无理压制，未见得就一定要做出破坏秩序底事；从今以后政府可以安心让我们大家发布意见，免得无理压制反来激成事变。一是向来不大热心公益底安会长①，昨天也到会签字，担任抵制日货日币底完全责任，我们十分感谢他。

我有一个小小不满意底地方，就是学生所散传单，内有"日奴""日本小鬼"等字样，这实在不是正当的态度。

我对于今后国民大会应该做什么，也有二种意见：一是对内，一是对外。

对内我们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指导政府不是说空话，是叫他们要明白非遵照人民底公共意见办事不可，是叫他们不敢贪赃枉法卖国殃民。推倒一个政府若是再建一个政府，张王李赵无论谁来组织政府，都是"鲁卫之政"，

① 即北京商会会长安迪生。

指导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办法，若是不能指导政府，徒然推倒政府，不过升官图上改换了几个姓名，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添上一些无谓的扰乱罢了。大家如若不信，请看民国底政府比前清怎么样？现在的内阁比以前的内阁怎么样？

对外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抵制日货底方法。我并不是反对排货底运动，我觉得我们要有有组织的运动，而且应当乘此时机振兴工商业，才是根本办法，单是空口抵制日货，恐怕不但没有什么效果，而且我们自己白受经济上的损失。在日本方面看起来，我们抵制日货，并不是表示仇恨底意思，是要拿排货底手段，造成他们产业界底危机，促进他们抛弃侵略主义底觉悟。但是有一位日本底社会党人告诉我说："日本社会党很盼望中国抵制日货，但必须各重要的商埠都有持续六个月底精神，日本工商界才能够发生危机"。可见短期的排货手段，恐怕不能叫日本觉悟，我们的商界反大受损失。在中国方面看起来，纸、糖、布等许多日常必需品，十有八九都是日货，严格抵制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无论那一国人，爱国心鼓励底力量总没有经济压迫底力量大，况且中国人爱国心底力量更是薄弱得很，少数人乘着感情说大话，那里会有实际的效果？所以我以为排货底办法，若是乘着一时的热情，向一团散沙底群众，摇旗呐喊，决计没有用处，一定要将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研究，究竟拿什么组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我们圆满的目的。我以为一方面用消极的排货方法，涣散的十人团还不济事，是要急速设立各种的同业组织，相约绝对停购日货底奢侈品，尽量减少日货底必需品。代以国货或西洋货。一方面用积极的振兴工业方法，先从纸、布、糖这几项消费最多的著手。以前我们的排货政策屡次失败，都是没有

组织，和没有国货填补两个原因。今后仍然脱不了因果关系，我们应该有大大的觉悟！若是有组织的排货运动，不是散沙的排货运动，而且渐渐有国货填补，日子久了，必能够叫日本产业界发生危机，必能同日本底明白人联络起来，扫荡东方底侵略主义。若是没有组织的散沙运动，又没有国货填补，这种短期的偶发的排货运动，不过徒然叫本国商人受经济的损失罢了，那能够促起日本人底觉悟呢？

1919年12月11日《晨报》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

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底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有的人说：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国家是一个防止弱肉强食，调剂利害感情冲突，保护生命财产底最高社会。这都是日本教习讲义上底一片鬼话，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话，我们断乎不可听这种恶魔底诱惑。全人类底吃饭、穿衣、能哭、能笑、做买卖、交朋友，本来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

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底事。

这个名儿原来是近代——十九世纪后半期更甚——欧洲底军阀财阀造出来欺人自肥底骗术。这种骗术传到日本，日本用他骗了许多人（日本底平民和朝鲜人、中国人都包含在内），中国留学日本底人，现在又想从日本传到中国。其实大战以后，欧洲底明白人已经有了觉悟（参看本志前号中《精神独立宣言》），想把这流血的陈年账簿烧去不用了；就是日本也有几个想烧流血账簿底明白人，武者小路先生就是其中底一个；中国人原来没有用这种账簿底习惯，现在想创立一本新的从第一页写起，怎么这样蠢笨！

但是我们对于眼前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的日本，怎样处置他呢？我以为应该根据人道主义、爱公理主义，合全人类讲公理不讲强权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来扑灭那一切讲强权不讲公理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不要拿那一国来反对那一国；若是根据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来排斥日货，来要求朝鲜独立，未免带着几分人类分裂生活的彩色，还是思想不彻底。拿日人来排斥日货，在人类进化史上仍是黑暗的运动，不是光明的运动。我们学生界应当有深一层的觉悟，应当发展在爱国心以上底公共心。至于那连爱国心都没有底奸商奸官，根据个人的私利主义，贩卖日货，贩卖中国米出口给杀中国人底人吃，我不承认他们的见解和我一样。

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署名：独秀

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

前几天北京方面复辟派谣传很利害，许多朋友听了很气愤，我听了丝毫不以为异。我们现在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并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小孩子出来做元首和老头儿做元首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复辟，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昨天有一位日本大阪大正日日新闻记者和我谈话，他问我对于中国政治底见解，我告诉他……“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他当时大为诧异。我问他……“中国现政治底实质是帝政还是民治呢？”他笑道……“自然还是帝政。”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取消帝政底苦功。

我们的君主不天天在那里下圣谕叫我们安分守己的读书吗？叫我们兴办实业吗？他用的各省督、抚、司、道不都比光绪、宣统时代还要威风万倍吗？封禁报馆，监禁主笔，不比光绪皇帝、宣统皇帝还要利害吗？贪赃枉法的文武官吏遍满全国，皇帝左右连一个铁面御史都没有了，这是么世界中！

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去做了帝国官吏的，现在不用理他；还有一班未做官的老同志，自孙中山先生起，赶快回复到辛亥以前的生活。一面宣传民治主义普及人民，一面设法取消帝政。一切设想、运动，都要当做未曾宣布共和以前一样。

同盟会底三民主义，后来变成了一民主义，好像三脚儿去了两只脚，焉有不倒的道理？从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功夫简直没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没尽得足，匆匆忙忙挂上了共和招牌，十分冒昧可笑。譬如一个素不用功侥幸及第的学生，倘不赶紧补习功课，那里会有毕业的希望？

我们的中国革命党诸君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责任，不但辛亥年未曾完结，现在还未曾起首啊！我们不可以革命成功的伟人自命，我们应该以侥幸及第的学生自命。我们应该补习的功课有三门：

（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

（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

（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

什么召集国会，什么制定宪治，什么发展实业，都要建筑在这三门功课上面，基础才算巩固。现在大家迷信的国会和宪法，都是帝政时代的产物，他们骨髓里充满了帝政的腐败臭味，我们实在不满意，实在没有恢复底价值。

我们希望赶紧补习三门功课，补习好了，我们希望从新创造纯粹民治的国会、宪法。

1920年1月3日《星期评论》第三十一号　署名：陈独秀

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

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自然是觉得旧文化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中国底社会上有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必要，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我现在要敬告诸君的有三件事：

（一）出版物是新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全体；

（二）新文化运动只当向前的发展，不当向后的反动；

（三）不应该拿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做射利底器具。

出版物自然是新文化运动中很要紧的一件事。但此外要紧的还很多，不必大家都走一条路。我们富于模仿力，缺乏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有了王麻子底剪刀店，接着就有汪麻子、旺麻子出复。有了稻香村，接着就有稻香春、桂香村出现。现在大家都来办报，不肯向别的事业方面发展，也就是缺乏创造力底缘故。照我们现在的学问程度人才力量，一个地方只配办两三种报，多了便要人力分散，勉强杂凑起来，一个报也办不好。这是何苦来！就是办报，也应当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报，不必办许多性质相同的报。现在性质相同，读者方面相同的报已经不少了。我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果然有价值，尽可送到各报发表，各报没有不欢迎的。一定要自己独立办一个人云亦云的报，这是什么一种心理？我曾劝许多在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

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时〔的〕招牌吗？我实在不忍这样说，实在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新报出现，内容都大同小异（内中有几种牛鬼蛇神的报，又当别论）。看报的还是那一班人，实在人力财力都太不经济。所以我总希望大家拿这些人力财力，去办新文化运动中比出版物更进一步更要紧的事业。

死抱着祖宗牌位向后退走的顽固派，我们不去论他。就是那半新半旧的先生们，像那帮着警察厅大骂同学的人，又像那挂起留美学生的金字招牌办杂志，却仿照无聊的医生底办法，请出许多名人介绍，这班人既然可怜没有当顽固派的魄力，头脑中又抛不了祖宗牌〔牌〕位底偶像，我们也不去论他。我们深以为憾的，正是我们很推重的杂志，我们很希望的青年，也发出似是而非的议论；说什么“这种直觉的新学问家同古代的中国学者，有什么分别，恐怕还不及他们有人生与社会的经验呢”。试问大科学家底直觉哲学，是否毫无价值？试问中国现在是否有人算得是直觉的新学问家？试问古代的学者底人生与社会的经验，现在有什么价值？说什么“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① 世界新思潮，在学术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精神，在社会上是真自由真平等的互助主义同新式的社会组织，在文学上是写实主义同人道主义。试看他们的文字，有几篇真有科学的精神（发阐科学的更

---

① 本篇中的省略号都是原有的。

少），有几篇用科学方法澈底研究社会问题，又曾有几篇写实文学的大著作”。他列举的三种新思潮固然不错，可惜这三种新思潮虽然都受了科学的影响，却不是他没头崇拜的自然科学所能包办的呵！他用“趾高气扬的态度，夸大眇视的心胸”，骂倒一切新杂志，固然痛快，但独独推重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除了因为这两种杂志多讨论自然科学以外，不知道还有何种理由？他说：“我们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句话固然有理。但科学脑筋却不限于自然科学，不反背科学精神的文学艺术，也都是人类最高精神的表现。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只应当拿科学的方法研究别的学问，却不可拿自然科学说明别的学问。拿生物学说明社会学，就是一个失败的先例。现在中国底杂志无不幼稚，难道只有讨论自然科学的杂志特别进步吗？他说：“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竞言科学，而实不知科学。……其所以不知科学者，科学艰深，非一蹴可几。玄谈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难就易也。顷年以来，思想革新，诚甚盛矣。然试登高远瞩，国内书报，刊行者何限，亦尝有专言精确科学者乎。……美洲之科学北京之大学月刊数理杂志，其言论文章，稍近科学矣。然其销行之度，能如其他鼓吹谬论者乎。……方今之人，震于西学之势，痛诋中学。……而抑知性理之学，经数千年之蕴蓄，其中固有至贵者存乎。夫理学与科学，两事也。科学之效，在利用厚生，使吾辈有精严之宇宙观；理学之用，在存养省察，使吾辈有正确之人生观。故理学不患其旧。虽羲皇之言，苟其果善，亦皆可从。所谓‘推之万世而准’也。而科学则力求其新，非新则绌矣。……又说新者多拾人牙慧之余，似是而非之妄解，虚诞无实之谬谈耶！此其二大弊也。此二弊者深入人心，小之可害中一

人，大之可害遍族类"。这一段议论，恰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好像是一人手笔。前半段极为独尊西洋的科学(看他科学玄谈对举，又不满于近来的思想革新，又专门推重讨论自然科学的三个杂志，想必是专指自然科学)，别的关于思想艺术的学问，都一笔抹杀。这还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慑于西洋物质文明底极幼稚的观念。至于西洋各地学术文化底发达，简直未尝梦见。当真西洋文明只有科学吗？我们只应该输入他们的科学，不输入他们的别种学问艺术思想制度吗？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言语学等，不比科学更难几倍吗？都可一蹴而几吗？后半段忽然又把中国底性理学抬起来和西洋底科学并重，而且分作两事，实在令人莫明其妙。大约他还是抱着张之洞以来"科学是新的好，道德是旧的好。物质文明是西洋好，精神文明是中国好"的一种成见。中国底性理学，和西洋底哲学伦理学学类，难道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吗？西洋底近代哲〔学〕伦理学都受过科学的洗礼，所以可贵。中国底性理学怎么样？中国底性理学，果然只谈人生观，不曾涉及宇宙观吗？科学果然只可以教我们的宇宙观，不能教我们的人生观吗？非科学的性理学，怎能够教我们的人生观正确不至错误。理学只问善不善，不问旧不旧，这话固然不错，但在理论上科学又何尝不如此呢？照他这样分别科学和性理学底不同，是否有科学的根据？科学的精神重在怀疑、研究、分析、归纳、实证，这几层工夫。"推之万世而准"这句话，是一种妄想。是演译法最大的流弊，决不是科学家脑筋里应有的东西啊！我们现在一面要晓得自然科学只是各种学术底一种，不能够拿他来取消，代替别的学术；一方面要晓得别的学术(道德学、性理学也包含在内)，多少都要受科学精神的洗

礼，才有进步，才有价值。

像那德国式的畸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万能，造成一种唯物派底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的哲学，造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是。若是把这两种畸形思想合在一处，便可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底新注脚了。我以为珍重研究介绍新思潮的人，他若真是打破了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了一个科学脑筋，就应该指出那种思潮是新的，是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好的效果；那种思潮是旧的，是不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恶的效果。不可以笼统说凡属自然科学以外的新思潮，都是"玄谈"，都是"谬论"，都是"空谈"，都是"燎原之祸"，都是"拾人牙慧"（义皇之言，何尝不是人之牙慧），都是"似是而非之妄解"，都是"虚诞无实之谬谈"，都是"可害中一人"，都是"可害遍族类"。像这种笼统不举实例的谩骂武断，在官场文告中时常看见，学理的讨论果然是这样吗？科学家底态度果然是这样吗？自己说"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的了解觉悟，就不应当拿出来鼓吹青年"，"我们学理不曾真正研究，怎么能鼓吹他人评论他人呢？""还须虚心观察，不敢独断底人"，怎样竟出以非科学家的态度呢？谬论与空论不同。说他是谬论，必须要指出他所以然的谬处，才算是科学态度的批评。若拿出科学家的态度，实际批评那种新思潮是何以好，那种新书报，那篇文章，有那种谬论，他谬处在那里。像这种学理的讨论，正可以使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若是不问青红皂白，对于一切新思潮笼统加以"鼓吹谬论"的徽号，这简直是从根本上反对新文化运动，助守旧官僚张目，要造成向后的反动。若是明目张胆的守旧派说出这种话，

我们不以为奇。某杂志似乎也是一班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办的，竟然有向后反动的现象。像这种挂起"毋忘国耻"招牌卖日货的办法，我们断然不能容忍！

有一个人写信给在北京的朋友说：请你告诉秦先生，"我赞成新思潮，新文学，请他邀同全体教员学生打电报给山东督军，快快派我的差事"。上海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因为现在关于新思潮的报销路都很好，此地有许多做黑幕小说的做红男绿女香艳小说的朋友，都打算改做这种投机的事业了"。我得了这两个消息，不禁替新思潮捏了一把冷汗！我们所欢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国人闭门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的公同趋势。这是何等神圣事业！我们中国人腐败、堕落，精神上物质上都到了破产的运命。最后的希望，就是想随着全人类大改造的机会，来做鼓吹这大改造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或者是起死回生底一线生机。这种最后救济的新运动，不过才有一点萌芽。倘若仍然把他当作从前的维新、立宪、革命运动一样，当作一种做官发财的器具，这便是明明要把中国人和全人类同样做人的一线生机斩断了。做官发财的路道很多，何必做这样黑良心的事！鼓吹新思潮的报，自然没有人能够专利。容人悔过，也算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没有觉悟的人，仍然是拿投机射利的动机来办鼓吹新思潮的报，所以不得不替新思潮捏一把冷汗。我有一位山东朋友，他有一种偏见。他总说："上海社会中了'苏空头'的害，无论什么事发生，总有许多人乘热闹出风头，决不会有真实的新文化运动"。这位朋友虽然学问见识都好，却不曾到过上海一次。他的观察未必正确。我是住过上海好几年，却不敢像他那样一体轻视上海底朋友。但是我

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底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才不至为这位山东朋友所轻视！就以办报而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像现在这样的浅薄、粗疏、空泛，谬论还不彻底，小区区就是一个首先要自首悔罪的人，持论谬不谬，和精密的学理，原来是两件事。有时很精密的学理也许是谬论，有时学理虽不精密也许不是谬论。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像克罗马①底资本论，克波客拉②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但也许有人说他们是鼓吹谬论。某杂志骂倒一切书报，除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鼓吹〔谬〕论。又没有举点证据出来，固然是很糊涂。我恐怕他这样非科学的笼统论调，要生出向后反动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化辩驳几句。至于他主张“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好得多。)“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几句话，却真是我们的昏夜警钟呵！

1920年1月11、12日《大公报》(长沙)　署名：陈独秀

---

① 克罗马，即卡尔·马克思。

② 克波客拉，即克鲁泡特金。

基督教与中国人

（一）

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了四五百年，奉教的人虽然不全是因为信仰，因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生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向来不把他当做社会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看做一种邪教，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不去研究解决方法，所以只是消极的酿成政治上社会上许多纷扰问题，没有积极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现在若仍然轻视他，不把他当做我们生活上一种重大的问题，说他是邪教，终久是要被我们圣教淘汰的；那么，将来不但得不着他的利益，并且在社会问题上还要发生纷扰。因为既然有许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不是什么圣教所能包办的了，更不是竖起什么圣教底招牌所能消灭了。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

（二）

在欧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是欧洲底文化从那里来的？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不但耶稣如此，《旧约》上开宗明义就说：

> “有害你们生命流你们血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人与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讨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形像造的。”（《创世记》第九章之五、六）

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对者，都别忽略了这根本教义。

（三）

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种种原因：（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2）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底怨根。（3）因为中国人底尊圣、攘夷两种观念，古时排斥杨、墨，后来排斥佛、老，后来又排斥耶稣。（4）因为中国人底

官迷根性，看见《四书》上和孔孟往来的人都是些诸侯、大夫，看见《新约》上和耶稣往来的是一班渔夫、病人，没有一个阔老，所以觉得他无聊。(5)偏于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于尊圣的官激怒教徒。(6)正直的教士拥护教徒底人权，遭官场愤恨，人民忌妒；邪僻的教士袒庇恶徒，扩张教势，遭人民怨恨。(7)基督教义与中国人底祖宗牌位和偶像显然冲突。(8)白话文的《旧约》、《新约》没有《五经》、《四书》那样古雅。(9)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反以科学为神奇鬼怪，所以造出许多无根的谣言。(10)天主教神秘的态度，也是惹起谣言的引线。

上列十种原因当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盼望他们若真心信奉耶稣最后的遗言——《马太传》底末章最后二节所说——今后不要再错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从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但现在是觉悟到什么程度？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横蛮是孟轲、韩愈底态度，孔子不是那样。

（四）

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

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他们不同的地方，道义是当然的、知识的、理性的，情感是自然的、盲目的、超理性的。道义的行为，是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是偏于后天的知识；情感的行为，不问为什么只是情愿如此，是偏于先天的本能。道义的本源，自然也出于情感，逆人天性(即先天的本能)的道义，自然算不得是道义；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梁漱溟先生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指点出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的，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都是情感的事"。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但是他说："富于情感是东方人的精神。"又说："这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东西两文化分歧的大关键。"他这两层意思，我都不大明白。情感果都是美吗？欲望果都是恶吗？情感果能绝对离开欲望吗？只有把欲望专属物质的冲动，情感专属超物质的冲动，才可以将他两家分开。其实情感与欲望都兼有物质的、超物质的两种冲动，不能把他们分开，不能把他们两家比出个是非高下。欲望情感底物质的冲动，是低级冲动，是人类底普遍天性(即先天的本能，他自性没有善恶)，恐怕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欲望情感底超物质的冲动，是高级冲动，也是

人类底普遍天性，也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所以就是极不开化的蛮族也有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以为西洋东洋（殊于中国）两文化底分歧，不是因为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在同一超物质的欲望、情感中，一方面偏于伦理的道义，一方面偏于美的宗教的纯情感。东洋的文化自然以中国为主，阿利安人（Aryan）底美术、宗教，本是介在这两文化系间的一种文化，与其说他近于中国文化，不如说他近于西洋文化；至于希伯来（Hebrew）文化，更不消说的了。

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淫）彩色；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我们实在不敢以"富于情感"自夸。

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不说别的好现象，就是自杀的坏现象都不可多得，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至少总是一个重大的原因。现在要补救这个缺点，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离开情感的伦理道义，是形式的不是里面的；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段的不是贯串的，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是过客不是主人，是机器、柴炭，不是蒸汽与火。美与宗教的情感，纯洁而深入普遍我们生命源泉底里面。我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五）

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晓得情感底力量伟大，一方面也要晓得

他盲目的、超理性的危险；我们固然不可依靠知识，也不可抛弃知识。譬如走路，情感是我们自己的腿，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眼或是引路人的眼，不可说有了腿便不要眼。

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

不但那些古代不可靠得传说、附会，不必信仰；就是现代一切虚无琐碎的神学、形式的教仪，都没有耶稣底人格、情感那样重要。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现有一比神殿更大者在此。"(《马太传》十二之六)

又说：

"我不为祭祀而为怜悯。"(《马太传》十二之七)

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罪状，就是因为他说：

"我能破坏这神殿，并且三日内造成。"(《马太传》二十六之六十一)

我们应该崇拜的，不是犹太人眼里四十六年造成的神殿(《约翰传》二之二十)，是耶稣心里三日再造的，比神殿更大的本尊。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他曾说：

"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便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马太传》七之七)

（六）

耶稣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

（1）崇高的牺牲精神。他说：

“我是从天降下的活面包，吃这面包的人永生；为了人世底生命，我所贡献的面包就是我的肉。（《约翰传》六之五十一）

“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饮物。（《约翰传》 六之五十五）

“吃我肉饮我血的人，与我合一，我也与他合一。（《约翰传》六之五十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七）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随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八）

“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将来必失去生命，他为我失去生命，将来必得着生命”。（《马太传》十六之二十五）

耶稣在将要被难之前，知道他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人要卖他，他举起酒杯向他们道：

“请你们满饮此杯，因为这是我的血，为誓约为众人赦罪流的血。”（《马太传》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

（2）伟大的宽恕精神。他说：

“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

“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传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

“一人悔罪，天使大喜。(《路加传》十五之十)

“我告诉你，那妇人许多罪恶都赦免了，因此他爱也多；被赦免的少，爱也少了。(《路加传》七之四十七)

“神欢喜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欢喜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路加传》十五之七)

“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底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勿敌恶人：有人打你右边脸，你再把左边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给他。(《马太传》五之三十九、四十)

“我不是为无罪的人而来，乃为有罪的人而来。”(《马太传》九之十三)

(3) 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说：

“使瞎子能看，跛子能走，聋子能听，有癞病的人洁净，死的人复活，穷人得着福音。(《马太传》十一之五)

“尊敬你的父母，爱邻人如爱你自己。(《马太传》十九之十九)

“卖你所有的东西，送给穷人，如此你将得着天国底财宝。(《马太传》十九之二十一)

“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马太传》十九之二十四)

"第一尽全心全精神全意爱你的神，第二爱邻人如爱你自己，一切法律、预言者，都是遵这两大诫。(《马太传》二十二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你们须相爱，你们须相爱如同我爱你们。(《约翰传》十三之三十四)

"穷人少的布施，多过富人多的布施，因为富人布施的是他的有余，穷人布施的是他的不足，是尽其所有。"(《路加传》二十之三、四)

Pharisee人与学者讥诮耶稣和税吏及罪人同食，耶稣对他们说道：

"你们堂中，谁有一百只羊，若失去一只，他不离开这九十九只，去将那失去的寻得吗?寻得了，是要喜欢的把他背在肩上。他回到家里，他要邀集他的朋友，他的邻人，向他们说，恭喜我寻回来了我失去的羊。我告诉你们，神喜欢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喜欢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也是这样。"(《路加传》十五之一至七)

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七)

耶稣说："听到我的话而不实行的人，好比一个愚人，把房屋做在沙上。风吹，雨打，洪水来了，这屋是要倾覆的，这是很大的倾覆。"(《马太传》七之二十六、二十七)

现在全世界底基督教徒都是不是愚人？把传教当饭碗的人不用说了，各国都有许多自以为了不得的基督教信者，何以对于军阀、富人种种非基督教的行为，不但不反抗，还要助纣为虐？眼见"万国人祈祷的家做了盗贼的巢穴"，不去理会，死守着荒唐无稽的传说，当做无上教义；我看从根本上破坏基督教的，正是这班愚人，不是反对基督教的科学家。大倾覆底责任，不得不加在这班愚人身上！

中国底基督教状况怎么样？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

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现在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邻人如爱我们自己；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我们的敌人，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他大骂无产社会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他忘记了基督教是穷人底福音，耶稣是穷人底朋友。

1920年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新教育之精神[①]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

我并没有什么学问（先生[②]自称），不过蒙海内同胞推奖，年来奔走四方，唤醒民气，也不过稍尽一点国民责任而已，实在抱歉得很。

今日承诸君之请，来此讲演，仓促之间，我也没有充分的准备；但诸君现在是读书师范学校，为教育界之重要分子，将来出身办事，主要是教育界上，又如社会上的中坚人物，而教育为国家的命脉所依托，故诸君的责任，实在非轻。我今天演说之题目，也就是新教育之精神。我对于新教育一项，素少研究，而在座诸君，尽是研究教育的，想平日对于教育一项特有心得，以不知教育的人，而对研究教育之人讲教育，岂不班门弄斧吗？

我所谓新，非绝对除去一切经史诗书考据……之谓，更在知其所以新之之道耳。譬如研究经史，而能知其新之之法则，则昔日读圣经，考训诂，讲道学，仍然是新。若不然，那怕日日读ABCD，习数学，习理化，还不能够算得新，甚至比较旧的，还要差些

① 1920年2月7日，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首刊于2月9日《国民新报》，标题为《新教育的精神》，但内容较简略。

② 记录者对陈独秀的称呼。

呢！

今就以教育一方面讲，要怎样才算得新呢？我们中国的学校教书，是最腐败的，你看现在各省的学校，有些因经费都被外人拨扣，以致陷于无教育之地步，那是一不消说了！还有一些办得最热闹的，校舍固然好看，是"巍巍峨峨"的洋房，内面学生的教科如何？教员的教授法如何？以后学生的勤奋如何？一切都不管问；只顾外面好看——这是中国人的特性，非独办教育的如此，即凡百举动，亦莫不然。譬如架个茅厕一样，外面只用白灰粉粉饰，内面是屎是尿，臭不可闻，那都不管了。你看现在的学校，那一个不是如此，都是以空相尚，讲究形式。学校的大权，掌在教长及少数教职员的手中，学生的困苦，全然不顾。教职员程度有不好的，学生不能非论，如有违着的，就拿那些诽谤师长，侮辱职员的条例来压迫学生，把学生当作机械的、被动的。学生只能在书桌子上做自己的功课，于外面社会上的实况，一点都不知道。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出了学校，更不能在社会上立足，那还能望他改造社会吗？似这种学校，不过造出几个书呆子出来罢了！于国家没有一点益处，故今日要学新教育有几个要点。

1. 宜注意社会方面，

2. 当以学生为主体，

3. 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际为主。

第一，怎样要注重社会方面呢？因为社会是我们人类组成的，我们人原是社会的成分，假如我们没有社会，那么，我们以一人，能够供给自己的要求吗？倒可日常的用品，寝室的器具，断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又如外界的侵袭——洪水猛兽之类，又不是一人可以防御得住的，故必定聚而为社会，顺我们人类同

情协力之自然趋势。此自古各大学者，所承认的，是以我们人类，是决不不可与社会分离人。教育是教养人类，使有经社会生活的能力人，故第一要注意社会方面，譬如教授小学的地理，若开口就把〔讲〕巴黎、纽约如何繁荣，如何重要，他知道巴黎、纽约在那块儿呢？我的意思以为教地理应先从本讲堂讲起，然后教本校的校址，以及本城市、本县、本省，实地考察，庶几学得有益处。若讲到历史一项，小学的历史教授只好取消，何故？要晓得小学生，本无学问可讲，他的教育宗旨，原是启导他的智能和开发他的思想。你若对他讲什么唐虞三代，五霸七雄，他的耳未曾听过，目未曾见过，他知道是什么？如此教授，不惟更差，适是以惑其思想，乱其脑力，故不如不要为好。又如教授理科，更用不着书本子了，顶好将本地方所产生的动、植、矿物的活标本，实地考察，还得益较多。他如修身、农业、商业、图画等科，更好就社会的实在情况研究，使儿童能应用于社会上，得实在的效果。

第二，怎样要以学生做主体呢？从来我们中国的学校，都是把校长、教职员做主体，学生反放在客位，当作被动的和机械的。教员在讲堂上教授，只知把自己的学问和知识，装入学生的脑子内去，殊不知学生固有他的知识和学问，不得要拿先生的来装入进去；如先生的能够引导他们所能做的，启发他们所固有的，和学生自动的本能就是了。故现今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他说："在当时，是先生教学生，若在今日，更是学生教先生了。"实在不错，怎么说？在当时先生教学生，只晓得把书本子装入学生的脑子里去，那更不消说了。若在今日小学教育，学生正当少年时代，恰如春天的草木一样，正是萌芽时期，他的脑髓，优园美满，思想力、记忆力，一切都比先生强得多。年幼的儿童的心理，还足以

先生研究。若在教授时间，有些事情先生想不到的，而学生反而想得到，先生不能说明的，学生反能充分了解，并能提出许多疑问事情来，能启发先生的思想和脑力，这岂不是学生教先生吗？又如学生在校求学，于校中一切事情，知得明瞭。而现今学校的事情，专靠着校长和少数教职员掌办，开口就说他们是研究教育有经验的人，先前他也做过学生过来，办学校一定是好的。殊不知，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法则，没有一定的规矩，即我们中国的孔夫子，和西洋的亚底士多德，在当时，他的学说，是“质诸鬼神而无疑，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然至今日，又“时移事变”，那就不行了。要知教育的事业，是与世界一齐变化的，若说“往日是先生教学生”为正理，今日是学生教先生为不正。专只就古时的理论，而不考察今日的事实，那就不可以了。学校的事情，学生所知的比较多，怎么说呢？学生在校内求学，所谓亲莅其境了。对于学校的事件，要如何改良？如何配置？如何办法？何者有□于学校。对于学生有不便利处，更要废除。何者学校缺乏，对于学生有益，更要兴办，学生一一透底明白。故学校若以学生为主体，遵学生提议办去，没有办得不好的。若靠着几个教职员，我恐怕办去，只有退步，那还能够与时俱进吗？系看现今的学校，那一个不是以学生做客体，拿他当被动的机械的，学校的事情，学生不唯不能参与，反而动辄拿那些通则规例，来压迫学生，终日如此，教育又怎能与世界一齐进步呢？又何怪每一个学生，进了一个学校，至毕业后，若是压得背驼足软，了无生气呢？如此学校教育，只能造成一班奴隶性质的国民，只知道服从，那还能够自动吗？那还敢望他来出力为国家和改造社会呢？

第三，何以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质为重呢？我们中国人，是

最爱讲形式，不顾实际的，我听闻北京清华学校，建筑图书馆，费了三十几万，仅仅买了二万元银元的书，这又何苦要讲这种形式；若要不讲形式，多买些书，供众人的阅览，岂不好吗？现今各省的学校，无一不是讲究形式，如外面的校舍，学生的制服，都是讲形式的，至内面学生的科学，教员的授法，却一切都不管问，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自教育部起，至国民学校，都是讲究形式的。当真说起来，要打破形式教育，必先取消教育部人员起，因为他是最好讲形式的，取消了他们，然后注重实际的教育，庶几较易。

还有最奇怪的，就是一般的农业学校，外面挂了某某农业专门学校的招牌，学生和教员，坐在学校内讲农业，外面田间的事情，不独不能耕种，简直一点都不知道。这种学校，我倒不晓得办了有什么益处？此外，尚有好多的学校，常常逼迫学生进校的时候缴纳制服费，学生无论在校内校外，一年四季，都是要穿制服，这又何苦要讲这种形式？甚至学生家里贫寒的，连学膳费钱都没有，那有钱来缴制服费呢？并且学生在校，读书就读书，穿什么皮鞋，戴什么制服帽，若是穿便衣便帽，岂不是好么？再进一层讲，若留了些□费，把学生买书，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劝诸君，此后出钱办事，不必讲形式，多注意实效就好了。那么，学校经费多，就多开办几班，学校经费少，就少办几班。把学生的科学，认真教，提高学生的自身必须的本能，切莫压迫他。至外面的校舍，那更可以不问——茅屋亦可以做学校，不必一定要洋房，没有桌凳，坐在地上亦可以讲学，只要认真教授，形式尽可以不管他。

以上三个意见，更是新教育之精神，我望诸君此后在教育界

上办事，是最要注重的。第一，就是要注重社会方面，教学生，宜就社会上一般的事情，为儿童所时常知道的；或亲自看见的，那就自然易于了解，没有“莫明其妙”的弊处了。第二，学校当以学生为本位，教育以启发儿童的本能，引起儿童的兴味，不可压制他。第三，更宜实事求是，不可虚张形式，讲尽外观。今天时间太仓促，自知没有十分准备好，有负诸君之雅意，还望诸君原谅，原谅罢！

1920年7月31日《教育学术研究室杂志》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马亮记）

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

——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

（甲）改用底理由

（A）本体的价值

（1）时代精神的价值（德莫克拉西）

(a) 政治的德莫克拉西（民治主义）
(b) 经济的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
(c) 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
(d) 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
(e) 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
——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

（2）在文学工具上的价值

阮元① 一沈思翰藻（出文选萧序）。
章太炎一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Brooke② 一有思想、情感、体裁，艺术性、精巧 (Curious care)。

---

① 阮元（1764—1849），清学者。字伯先，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著《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② 博鲁克(Rupert Brooke 1887—1915)，英国诗人。1911—1913年，游览

(a) 文学底界说
- Bascon① —才智的、情感的、艺术的、永久的价值。
- Hunt ② —表现思想、想象、情感、趣味。
- Standard dict ③ —高尚健全普遍的思想，美的体裁，艺术的结构。
- 我的主张—(一)艺术的组织；(二)能充分表现真的意思及情；(三)在人类心理上有普遍性的美感。

(b) 文学底作用
- (一)达意
- (二)表情
- (三)叙事

情意本身—语言—白话—文言文

文言文—古文—古事

白话文—今文—今事

(c) 文学底派别
- (一)纯艺术派—超越人世问题，艺术的价值独立。
- (二)人生派—注重人生现实问题。
- (三)人生艺术派—艺术美的享乐与人生底解释。

(3) 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欧洲大陆、美国、加拿大、南海等地。1914年参加大战，翌年病逝在战舰上。其《书信集》和《诗集》于1918年出版问世。以1914年所写的一系列战时十四行诗而驰誉世界文坛。

① Bascon 为Bacon之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思想家，近代经验哲学的始祖。他的哲学论著和科学归纳方法对近代学术研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② 亨特(Leigh Hunt 1784—1859)，英国十九世纪诗人、散文家。他的著名长诗《葛密尼的故事》，借用意大利中世纪爱情悲剧的题材，来表现诗人所处的新时代的精神。长诗具有感情炽烈、色彩瑰丽、充满着音乐节奏美的语言艺术等特征，从而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开辟境界和风格。他的《自传》，被誉为对当时文坛的重大供献，他以熟不拘礼、随便交谈的亲昵文体，刻划出他所熟悉的人物形象和亲眼目睹的事件，特别是他跟诗人雪莱、济慈，史学家喀莱尔等的交往情况，坦率细致，娓娓动人。

③ dict 为dicta之误。Standard dicta规范化的准则。

(a) 文体创造

(b) 输入外国文学的精神
- (一)写实主义。
- (二)析理精密。
- (三)社会化(Socialization)。

(c) 世界的文学

(B) 应用的价值

(1) 在教育上的价值

(a) 儿童想象力底发展

古文—盲从古人的、他人的想象力。

白话文—直接能发现有的、自己的想象力。

(b) 科学教育底发达

(一)节省专门科学(医、矿、农、工)学生研究艰深文字的时间精力。

(二)用白话文叙述科学，较古文易于表现明瞭正确的观念。

(c) 学生抄写讲义底便利

(2) 在社会文化上的价值

(a) 国语方面
- (一)国语统一底基础
- (二)字数增加
- (三)语言程度增高

(b) 教育方面
- (一)读书报的人数增加
- (二)拼音文字底先驱
  - (一)单音语减少
  - (二)语意明瞭
  - (三)文法整齐
    - 代名词整齐
    - 疑问词整齐
    - 句法整齐

（三）通俗教育改进
- （一）小说
- （二）剧本
- （三）歌曲
  - （一）北方的大鼓说书。
  - （二）南方小曲滩苏、粤讴等。

（乙）解释疑惑

（1）不能行远：时间；空间

方言不能行远（京话是方言非国语）

国语能够行远（白话是国语非方言）

（2）破坏旧文化

增加新的文化

普及旧的文化

（3）没有文学的饰美

文学的饰美
- (a) 结构巧妙—白话、文言同
- (b) 意思充足明瞭
- (c) 声韵调协
- (d) 趣味动人

（b）（c）（d）—白话胜过文言

▲古文　名词、形容词色泽是脂粉，是表面的美。非真美，典故更是张冠李戴，不切事情。

▲白话文　"白描"是真美，是人人心中普遍的美，"百战不许持寸铁"是白话文底特性，所以文学的白话文比古文更难做，决不是"信口所说"、"信笔所之"。

（4）字句冗长

(a) 文学的经济，在意思以外的经济，不在意思以内的经济

(b) 由简而繁，是文言与白话共同的趋势，原因有四
- (一)事物增加
- (二)语言变化
- (三)印刷便利
- (四)社会现象日趋复杂

(5) 不典雅

(a) 典不典是时间问题，现代的事物到后代都是典。

(b) 雅不雅没有界说，没有标准。

宫殿冕旒等词(非平民的)未必雅，如近代四六文。

拉车卖酱的话(平民的)未必俗，如古诗《孔雀东南飞》及杜白诗等。

(6) 现在的白话诗文不好

(a) 作者底艺术不精
(b) 真的白话文学年月还浅
} 都和白话文体本身没有关系。

(7) 非纯粹的白话文

(a) 古语　不全然废弃，但以现代通行的为限。

(b) 新学术语　当然采用。

文章三类
- (一)普通应用文学术语不多用
- (二)说理文
- (三)文学的文
} 一般人了解学术语的程度，当随教育增高。

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关系，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

(8) 不能达高深学理

(a) 自然科学
(b) 社会科学
} 名词不易了解，古文与白话文同，但白话文的解说比文言容易了解，所以听讲比看书更加懂得清楚。

(c) 宗教艺术，重情感的更宜于白话文。

以上理论

(a) 陈大齐演讲的心理学。

(b) 胡适著的哲学史实验哲学。

(c) 杜威底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演讲录。

(d) 王星拱、任鸿隽底科学论文。

(e) 陈嘉蔼著的因明学。

(f) 基督教底旧约新约。

(g) 周作人关于文学的译著。

以上实例，都能达高深的学理，都比窥基底因明疏和严复译的书易于了解。

1920年2月12日《晨报》　署名：陈独秀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一)

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的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象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

（二）

马尔塞斯人口论的内容，简单总括起来，就是：(1)自然界一切生物(人类也包含在内)底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倾向。(2)这种不断的倾向底结果，生物常苦于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发生种种悲惨，人类社会底贫困罪恶不能绝迹也就为了这个缘故。(3)因此人类社会要想断绝这个祸根，凡是没有赡养家属资力的人，不得不遏制性欲，守独身主义，来防止人口过多的自然力。

后来新马尔塞斯派，对于前列的(2)(3)两项大加修正。这修正派的人，以为人类底贫困和罪恶，不仅是人口过多的结果；社会组织的缺陷，的确也是一种原因。他们又以为拿制欲和独身主义来限制人口，未免太酷，不如实行预防受胎的法子，因为预防受胎比制欲合乎自然，而且不损身体底健康。

后来无论赞成马尔塞斯底学说或是反对的人，对于修正派底意见，反对的却少得多了。但是他们对于马尔塞斯底(2)(3)两项意见，虽然加了多少修正，却于他的根本学说，还是不曾动摇。因为马尔塞斯主张底大前提，是在前列的(1)项，马尔塞斯得了永久不朽的大名，迷信他的学说当做万古不动的一大真理，也就在(1)项，因此人口论底研究，便不得不集中于(1)项了。

（三）

人口底增殖率，果然是照马尔塞斯底推算，每二十五年必定

增加一倍吗？

生物底生殖力，自然都很伟大，即以一切动物中生殖力最低的象而论，他一生百年间，平均生殖六子，这六子果然都能生存蕃殖，从最初的一对夫妇起，经过七百四五十年，应有一千九百万匹子孙；生殖力最高的微生物，有几种一昼夜可以生殖一万倍以上。若照马尔塞斯底主张，单就生物生殖力底理论，便可以推断生物在事实上计年增加底倍数。那么单是生殖力最低的象一项，也已经充满地球了。

生物底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人类也和他种生物一样，事实上蕃殖增加底倍数，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学式来武断推算的。人类底生殖力固然伟大，克鲁泡特金所谓超自然的破坏力(寒冷、大雪、暴风雨、旱灾、水灾等)，亦复伟大，战争的、瘟疫的破坏力更是不用说的了。据中国底历史，三千年间，人口增加不过二十倍；再加上调查不精密，国土古今广狭不同，合并异族的人口增加等原因，实际增加当然还没有二十倍；可见马尔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离事实太远了。在马氏他自己也知道在历史的事实上因有自然的限制，人口增加率不是这样快，所以他说："人口若无限制，是按几何的比例增加。"(《人口论》第一版十一、十四页)后来迷信马氏学说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记了上半句，因此比马尔塞斯更要武断一点。

在马氏著书之时，机器初兴，失业的人多，一时现出人口过剩的假象；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口来根本解决，已经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自从他死后一直到现今，欧洲大陆各国，不但没有人口过多的现象，而且都有人口不足的恐慌，这真是马氏警告、豫言当时所想不到的

了。如今大战后更是不用说的了，就在战前，即以法、德两国而论，如何使人口增加，不是两国几十年来政治家和学者苦心研究的问题吗？法国因为人口减少，Bertillon有三百年后降为三等国，五百年后种族灭亡的警告。"法国人口增加奖励协会"(Alliance nationale pour l'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francaise)曾提出奖励人口增加议案十二条。议会也屡次提出同样的议案。德国自从一九〇〇年以来，产儿力非常低减，因此国论沸腾，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书多至二百十六种。Julius wolf 教授等所组织的"德国人口政策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Bevolker-ungspolitik)，他们的政策：(1)产儿底限制；(2)产儿底障碍，如花柳病预防、女工保护、产妇保护等；(3)保护现生的小儿。此等现象，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警告、预言相反吗？

（四）

生物底增殖，果然和食物底增殖不能保平均的速度吗？文化进步的社会，果然不能按照人口增殖速度，扩张食物底范围，增加食物增殖底速度吗？

多数的生物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另一方面又是食物底供给者；倘这种生物自己吃别的生物而生存，同时别的生物又吃他而生存；因此可以说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同时也就是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例如猛类鱼吃普通鱼而生存，普通鱼吃小鱼及甲壳虫而生存，他们在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同时在他方面不又是食物底供给者吗？

即以最进步的人类而论，一方面吃别的生物而生存，一方面也算是别的生物底食物，象那最大的猛兽和最小的微菌，不都是吃人的生物吗？前一项现在或者可以说渐渐减少，后一项无论医术卫生如何进步，将来能否绝迹，还是一个疑问。

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在文化进步的社会，除了宗教上、私有财产上、非生活品的工业上等障碍，又加上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在时代的人想象得到的，何以能断定他只能照算术的比例增加呢？

人口增殖率当然不能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供给人类吃的生物，他们的生殖力，每二十五年却可以增加数十倍或数百倍。倘用科学来选择、培养和人力保护，不叫别的生物侵占，增殖底速度更要大大的无限增加。例如有许多我们现在不吃的生物，若是利用科学来选择、消毒，我们食物底范围便自然扩张了。我们现在所吃的生物，若是用科学来培养和人力来保护：象养鱼隔离法（产卵期内和他鱼隔离，防止卵为他鱼所吃），农业上蚕业上驱除害虫法、家畜防疫法、牧场防兽法，都严密实行起来，食物增殖底速度，自然没有不意外增加底道理。

私有财产废止的好处：(1)社会资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会资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滞；(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底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资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在这时候，自然可以实现“无旷土无游民”的理想，再加上农业化学天天进步，农产物增加底速度，自然非常伟大了。

姑且让一步说，这都是未来的空想，就以现在的经济制度，

现代的科学程度而论，自从马尔塞斯死后现在八十五年间，因为资本集中、机器广行、交通发达、殖民地开拓这四个缘故，欧美经济状况生了绝大的变化，和马尔塞斯时代迥不相同。一方面农产物输入多量，毫没有收获渐减底恐慌；一方面工业物却有收获渐增底效果，生产过剩底恐慌居然成了经济学上一个原则。因为有生产过剩的恐慌，所以他们寻找销场的希望比寻找殖民地的希望，更要热烈得万倍。他们用极强大的海陆军保护殖民地还不过是一种手段，扩充销场，拥护商业，才真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所以近代的国际战争，往往拿出极大的牺牲，所争得的并不是一块土地，不过是几项有利的通商条约。

再让一步说，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话固然不错，但无论分配如何不均，也必定在勉强维持社会生存以上，资本家才能够拿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象现在俄、奥两国产业界底情况，无论有如何大力的资本家，也不能够把维持国内底生存尚嫌不足的生产物，用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在一种生产过剩急找销场的国家，若是没有资本私有制度，平均分配起来，当然有维持生存以上的余裕了。因此就是这种非实际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可以证明社会上贫困的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尔塞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论，确有不验的地方，不验的时代。况且棉纱、米谷更是生活品中第一不可少的东西，决没有绝对不足还可以输出的道理，近代中国、日本、美国底人口都非常增加，而棉纱、米谷反是大宗的输出品，这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预料相反吗？

（五）

科学发达，生产技术也进步，人类食物底范围，自然有无限扩大底可能性；但是对于土地这一层，有一以为土地底丰腴力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对于这一定丰度的土地上所加劳动底生产力，也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这就叫做“收获递减法则”。这种法则都是马尔塞斯人口论底一个有力的帮助，因为这种法则若是真理，在人类食物范围扩大上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法则就是说：一块土地底收获分量，决不能随劳力分量比例增加。例如第一年十人耕种一块土地，有百分的收获；第二年加十人耕种，收获分量虽有增加，决不能照人数增加的比例增加一倍。照人数比起来，反有劳力递加收获递减的现象，如下表：

	一年度	二年度	三年度	四年度	五年度
劳动人数	10	20	30	40	50
收获总量	100	180	240	280	300
最后增加的劳力所收获		80	60	40	20

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的食物不全靠农产物；第二，我们要晓得化学发达可以人工增加不须耕种的食物；第三，我们要晓得将来农业化学发达，收获底增加还可以在人数增加的比例以上；第四，我们要晓得此时地球上未开垦的荒地还多得很，假定收获递减法则是真理，人口有加无减也是事实，这种真人满的恐慌，也不知道在多少年以后；若是把眼前的社会问题放下不理，预先忧虑那多少年以后的事；那么有人说地球将来也要毁坏的，我们应该怎样预防呢？

（六）

有人把经济思想分为二大系统：一是富底哲学，说明富底性质及原因；一是贫底哲学，说明贫底性质及原因。斯密亚丹属于前者，马尔塞斯属于后者。人类底贫困不单是食物一样，乃是衣、食、住、知识、娱乐一切等等不足者对于足者比较的现象。不但没有衣、食、住是贫困，吃素菜的比吃肉的是贫困，着布衣的比着绸缎的是贫困，住茅屋的比住大屋的是贫困，着短衣的比着长衣外套的是贫困，没有钟表用的比有钟表的是贫困，步行的比坐马车、汽车的是贫困，无钱结婚的比妻妾成群的是贫困，无力量读书的比学者是贫困。倘在均产社会里，权利均等，机会均等，没有足不足底比较，个人贫困底现象便不会发生了。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立刻成人"均无贫"的社会吗？到了均产社会时代，若公共觉得生活资料不足，那时才可以拿人口过剩算贫底一种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为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资料不足底一种原因。马尔塞斯说明贫底性质只注重食物一样，已经不大周到了；他说明贫底原因只注重人口过剩这一层，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贫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他这种贫底哲学，恐怕还不及斯密亚丹富底哲学稍有根据。

马氏生在盛唱均产人权的时代，不肯盲从时论，对于God-

win及Condorcet加以有系统的攻击，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有胆识。发明了贫底一种原因——即人口过剩，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会经济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过于偏重他发明的这一种原因，和别的发明家、持论家陷于同样的偏见。不但如此，假令人口过剩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也没有理由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们的这权利是从那里来的？又何至主张贫民没有生存权，又何至说没有得父母财产的人没有吃饭的权利，好比宴会里未请的宾客没有入座的权利一样呢？(《人口论》第二版五三一页)Place说马尔塞斯否决无事的穷人有吃饭的权利，却许无事的富人有这种权利。象马氏这种掩护资本家底偏见，不免要发生学者良心问题。

贫民多子，自然是社会上一种悲惨的现象，我们应该设法救济的；但是救济的方法，不能够象限制人口那样简单。第一要问贫民是怎么会贫的，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罪恶？第二要问贫民底子女何以没有公共教育底机关，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缺点？若丢开这两个问题，专门限制贫民人口，这种劫贫济富的办法，就不说什么生存权和人道主义，社会上必招两项实际的损失：(1)贫民底子孙中往往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倘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岂不是要受绝大的损失么？(2)富人底子弟多游惰，贫民底子弟多勤劳，倘专门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游惰的分子渐渐增加，勤劳的分子渐渐减少，岂不是可怕的么？

优种论虽有点和个人自由、人权平等冲突，比人口论似乎还好些。因为优种论所要淘汰的，在他的观察总是社会上恶劣分子，还没有贫富底分别。

（七）

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自豪，实在是梦话。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中国一百万人口左右的都市，不过上海、武汉（合武昌、汉口、汉阳而言）、广州、北京四处，拿人口和土地比例起来，是不是人口众多，还是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发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单是我们人口数目比别国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须我们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别国多，才真是人口众多。单是人口众多也不能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产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

但是中国人口问题，也不是马尔塞斯底学说可以解决的。中国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底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底现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过多，乃是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过多；生活资料不足，不是生活资料增加底可能性赶不上人口增加，是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照现在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现在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贫困的现象。若依马尔塞斯底主张专门限制下层阶级，不承认贫民有生存权；那么，中国式的上流阶级——即富贵游惰分子——渐渐增加，贫苦的劳动的生产分子渐渐减少，不知道将来要变成一种什么社会？

所以我主张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应该并行下列的几个方

法：

（1）发展生产事业　劳动方面，大都市底工厂里，每天工值两三角做十二点钟的工，大家还惟恐谋不到手；人口稠密的农村里，因为租地竞争，地主除收租外还有种种不法的需索，佃户终年辛苦还不能够饱暖；农家底帮工，每年工价不过十余元；这都是人口过多，工价过低到这样地步。但是我们中国不但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穷的发展；就是已经发达的农业，不但东北西北底边地，就是内地各省底荒地荒山也不知有多少，拿这一样就可消纳无穷的人口。

（2）发展交通事业　此事对于人口问题有两种效果：（一）增加能生产的人口；（二）利用有余以补不足，等于增加生活资料。

（3）发达科学　此时欧美各国底物质文明虽是进步，将来科学越发达，衣食住各种生活资料，还要随着无限的增加，至于我们科学还未萌芽的中国更是不用说的了。

（4）发达生产技术　无论农产工产品，技术越发进步，生活资料增加底速度越发增加。

（5）增加劳力底数量　土地劳力在生产要素上应该居首要地位，在我们"游惰神圣"的国里，不但劳动底人数过少，劳动底力量也不充分，一般劳动者做工底时虽多，大半等于西洋的怠工。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使劳力底数量充分增加。

（6）分配平均　现在军阀集中资本，人民已经是受不了；财阀倘再来集中一下，将来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生活余裕，那最大

多数最大痛苦的人，连一班拥护资本主义大骂社会主义的学者自己或是他的子孙，都要变成没有生活资料的贫民，都要被马尔塞斯取消他们的生存权了。在财产权私有社会里，似乎不可因为有许多穷人生活资料不足，便马上断定是人口过剩，便马上断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因为若将全社会合拢起来平均分配，不见得生活资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强盗太有余了，别人便当然不足呵。所以若要讨论社会上究竟是不是人口过剩，究竟生活资料足不足，候实行分配平均后再谈，似乎才能够得到真相。纵然大家说平均分配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那就请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这总是做得到的罢。这种分配底法子固然离平均还差得远，但是也可以救济人口问题一部分的危急。

（7）限制人口　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生活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

1920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致周启明信

启明先生：

二月廿九日来信收到了。《青年梦》也收到了，先生译的小说还未收到。重印《域外小说集》的事，群益很感谢你的好意。你开来的办法，芝寿兄托我转答如下：

一、照原议。

二、照原议。

三、版权既不让群益，报酬若干，群益底意思，决计请先生自定。

《新青年》七卷六号底出版期是五月一日，正逢Mayday 佳节，故决计做一本纪念号，请先生或译或述一篇托尔斯泰底泛劳动主义，如何？守常兄久未到京，不知是何缘故？

昨接新村支那支部底告白，不知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或有实际事业在北京左近，此事请你告诉我。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弟　独秀

〔1920年〕三月十一日

前回有一信寄玄同兄，不知收到否，请你见面时问他一声，我很盼望他的回信。又白。

1979年5月15日《历史研究》第五期

教育缺点

——在江苏省教育会上的演讲

今天所讲的，统合说起来，是教育上的缺点，也可说就是教育上的罪恶。并且这种缺点和罪恶，并不是腐败的学校所有的现象，却是在平日声誉很好的学校，都免不了的。真正腐败的学校，倒也赶不上这种缺点咧。我所说的教育上缺点和罪恶，一种是犯主观主义，一种是犯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是牵连一起。因为是主观的，所以有了形式的，因为有形式的，所以有主观的。这种弊病，在欧美各国亦不得免。在我国不但中等以上的学校，是这样，就是小学教育，也都是这样两种主义。先把主观主义的缺点说出来。教师只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时候，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意思灌输进去，这就是主观主义的现象。要知道好的教育，应该学生教先生，这句话说来很奇，怎样学生反而教起先生来呢?就是先生在教授时候，必定要拿学生做本位，细细考察这一班许多学生。因为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特性，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天才，用什么教材放进，便有什么反应发生，不是随便可以教授的，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经验来。做教育的，依据我国现在教育，所以没有进步，坏在主观主义。这种主义，和以前教授经史百家的旧教育，有

什么分别！不过拿经史百家的旧教材，改了史、地、理化等等新教材罢了。我们要知道新旧教育之不同，全在主观教育和客观教育上分别，不是在教材上的关系，是在活用教材方法的关系。我们所以反对旧教育，并不是说西洋来的教育都是好，中国的旧教育都是坏。不过在主观、客观的分别，旧教育的弊病，不问学生是否明瞭，用他主观的眼光，随便灌输学生。什么伦理科、历史科、地理科，所授教材，全凭讲演，不切实用，就像伦理重在实践，不是说空话便算了事，在理应该把这科取消。历史科，排列了许多不相干的古事，崇拜偶像的说话，教给学生记忆，有什么用处？地理科，在乎简单明瞭，并不是罗列许多无用的地名，硬要学生牢记，这样教法和以前的旧教育的，教学生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什么分别呢？不说旁的，就是北京很有名的某学校，教职员的思想，也算很新的了，不过他们所授的教科，糊涂的很，陈列的文字，学生大都不懂。这也是中了主观主义的害处。欧美各国无论那种学校，每礼拜至多不过二十多个钟头，分了许多科目，好使学生欢喜那种就学习那种，倒是事半功倍，很有效验。总之，无论什么学校的功课，倘使和学生个性适应的尽管教他，不是这样，尽管定了许多课程，教了许多材料，但是于学生实际上丝毫没有影响。那是何苦呢！吾觉得现在国内学校，往往不肯细细考察个性，随便教育，就是大学也免不了这种弊病咧。

讲到形式主义的流弊和罪恶，不在主观主义之下。很多的学校，只重外面好看，装璜华丽，气象焕然，就是茅厕的门面，都有种种装饰，某地方还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样子，校门总是做来很高，建筑必求新式，而于内容反一点不讲。实际上这样，教育到底有什么益处？推原其故，因为教育部平时只在形式上考求。所

以上行下效，弄得教育一点没有实际。最可笑的，称了工业学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不但使学生进了这种学校，如入五里雾中，一些没有领会，就是教的人自已也莫明其妙咧。我有一种感想，要使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教育部。你想他们住在京里，社会生活程度、人情风俗习惯，一点不懂，定了什么许多章程法令，硬要人家遵守。不依照他，他就要驳他不合部令，依照了他，事实上又是不能做到，这明明是叫人家进于虚伪的境界。照教育部的意思，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其实中国这样的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样可以统一呢！譬如做了一件衣服，说是不管那一个人的身体长短大小，都要照这件衣服的尺寸，那岂不是笑话吗？简直说一句话，教育部存在一天，中国的教育，一定办不好一天。还有考试一件事，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产物。这种弊病，很多很大。因为有了考试，就有什么毕业问题，文凭问题，引起了学生的虚荣心。教师学生平常多都不注意，临到考试时候，在这一二礼拜以内拚死用功，不但临场时夹带枪替，于道德上很有影响，并且废食忘眠，在身体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试完毕，把所有临时强记的完全忘掉了。有人说学生求学底目的，一种是要增加学问，一种是为社会进步、生活改良。象现在学生的求学，专为考试，这不过是为了毕业问题，希望早一天毕业，那文凭可早一天到手。所以种种罪恶，都从考试发生，道德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没有好处。

你看欧美的大学问家，尽有在学校里考试时候，屡次落第，到了后来，偏享盛名。日本教育大家某博士，在学生时代，每逢考试总是不利。后来他在大学校里当了教员，很反对考试。其实考试及格不足为荣，考试落第不足为辱。考试得利的不定是

磐磐大才，考试失利的不全是庸劣无能。有人主张考试的，说一朝废去了考试，那学生的学业，不能够看出他进步不进步。这句话实在是差误的。照他说没有了考试，不能知道学业的进步，那末以前私塾先生惯用扑责，警诫学生，现在废掉了扑责，难道学生就不及从前吗？总之，学生的学业，并不因考试提进的。并且做了教师，平日里不能知道自己学生品行学业的好歹，偏要凭着考试方才知道，这样漫不经心的教员，他平日的教育成绩也可想而知了。吾们要望学生道德上学业上进步，不在乎考试。另有好的方法，——譬如作文、英文等科，只要平常多方练习，自然能够进步。地理只要注重实地观察，化学注重在实验室里试验，那才可以得着好的效果。何必定要形式考试来贻误青年呢？所以我敢说，现在教育的流弊，不出这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自从杜威氏来吾国，到处演讲教育，他竭力攻击的就是这以上所说的两种主义。他说不但中国犯这种弊病，就是美国也未尝没有。日本更比中国不如，所以杜威到中国来最精要的讲演，却不在伦理学，也不在社会学，是在教育学。可惜我国人对于他所讲最精要的教育，不十分注意。现在我们教育界应该大家注意这点。因为这是教育上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所见教育上种种不好现象，归纳起来，不出这两个主义。

1920年3月30日、31日，4月1日《时报》　署名：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

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底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底《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底想象或愚人底妄想，想象、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尔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他；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底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底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

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欧美各国学校里、社会里、家庭里，充满了美术和音乐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会及个人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也不象我们中国人底生活这样干燥无味。有人反对妇女进庙烧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去烧香去逛新世界，总比打麻雀好。吴稚辉先生说："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我以为麻先生底势力比孔、关两位还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关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象信仰孔、关还多半是装饰门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们鬼混做一团。他们如此信仰这位麻先生虽然是邪气，我也不反对；因为他们去打麻雀，还比吸鸦片烟好一点。鸦片烟、麻雀牌何以有这般力量叫我们堕落到现时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空言劝止人不要吸烟、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面理由：因为我们中国人社会及家庭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一样没有，若不去吸烟打牌，资本家岂不要闲死，劳动者岂不要闷死？所以有人反对郑曼陀底时女画，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新年里店家打

十番锣鼓，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大舞台、天蟾舞台底皮簧戏曲，我以为也可以不必。表现人类最高心情底美术、音乐，到了郑曼陀底时女画、十番锣鼓、皮簧戏曲这步田地，我们固然应该为西洋人也要来倾向的东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并这几样也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连美术、音乐底种子都绝了，岂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孑民先生曾说道："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前几天我的朋友张申甫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说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谓之'精神'Spirit)的，将来恐怕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最高的情感的(罗丹说：'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识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现在中国没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真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没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都没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都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识，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创造不可。"

关于各种新文化运动中底误解及缺点，上面已略略说过；另外还有应该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说中国人没有组织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没有组织力。忌妒独占的私欲心，人类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国人特别好些；但是因为他们有维持团体的公共心牵制，所以才有点组织能力，不象中国人这样涣散。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学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三五年不涣散的团体。最近学生运动里也发生了无数的内讧，和南北

各派政争遥遥相映。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半聋半瞎的八十衰翁，还要拚着老命做官发财，买田置地，简直是替儿孙做牛马，个人主义决不是这样。那卖国贪赃的民贼，也不尽为自己的享乐，有许多竟是省吃俭用的守财奴。所以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象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

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①]

——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讲演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根据运动。[②]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原文如此。

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啊！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小而结果大，不是一种好现象。在青年的精神上说起来，必定要牺牲大而结果小，才是好现象。此时学生牺牲的精神，若不如去年，而希望的效果，却还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现象了。以上这两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诸君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的份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赖。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赖自己！

1920年4月22日《时报》　署名：陈独秀

致李大钊、胡适等

守常　适之　申甫　玄同

孟余　孟和　百年[①]尹默　诸兄公鉴：

慰慈[②]抚五[③]遏先　启明

《新青年》七卷六号[④]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

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公同讨论赐复：

（1）是否接续出版？

（2）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

（3）编辑人问题：

（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

（二）由在京一人担任；

（三）由弟在沪担任。

---

① 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长期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② 张慰慈，名祖训。江苏吴江人。美国依阿华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③ 王抚五，亦名王星拱。安徽人。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硕士，国立北京大学化学教授。

④ 指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

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弟独秀〔一九二〇年〕四月廿六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训卢永祥的秘书

卢永祥是个不识字的武人，他发出的电报，当然是他的秘书做的。当他的秘书，自然不应该有知识，我们何必责备他？但是"五一"纪念节的历史，去年的北京《晨报》，去年和今年的上海《星期评论》和前天工界传单，都说得很清楚，他虽然无知识却不是瞎子，为什么硬说五月一号是俄国劳动纪念日呢？难道世界上一切的事，凡是于你们不便的，都可以随便加上俄国二字好叫中外人都深恶痛绝吗？倘果然有此效力，我很希望把你们所喜欢的大洋钱上都加上俄国罗布几个字。

这次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本是工界各团体发起的，和学界毫不相干。象我们这样非劳动的读书人，只好厚着脸去做来宾，学生要有去的，一定也和我有同样的感想。卢永祥的漾电，硬把世界二字改为俄国二字已经是杜撰了，又硬说是学生开的，试问学生并不是劳动者，如何去开劳动纪念会？若说是学生利用劳动者，工界所发的传单、宣言，你们看见没有？和学生所要求的是不是一事？"学生等拟于五月一号开俄国劳动纪念会"这一句妙文，非善做截搭□① 的老手不辨，倘若译成西文，传到外国，真是一场笑话！

1920年4月29日《民国日报》　署名：陈独秀

① "截搭"后一字，模糊难辨。似该是"题"字。

劳动者底觉悟

——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象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象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做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終是仰仗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

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①]

我的意见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

---

① 一九二〇年春，上海厚生纱厂要在湖南招收五十名女工。规定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月工资八元，其它待遇亦差；应招女工并须由家长签署志愿书和有力量的铺保。为此事，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纷纷载文指出工时过长、工资太低，以及妇女的人格、卫生、医药等等问题。厚生纱厂总经理穆藕初对上述的责难，进行辩护，遭到朱执信等人的反驳。全文共有十六节，陈独秀的《我的意见》是最后一节。

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话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的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犯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底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利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底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

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三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稣的牺牲精神，莫学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

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很；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糊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又说："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产攒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借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底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

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于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

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底官利红利是从那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得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存在银行底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够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底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熙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象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

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样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间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中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诒，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的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

所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 Co-operative Society制度，或者可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这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来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一九二〇，五，一。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

知耻先生：

工人底教育和储蓄固然是要紧，但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做减时增资底必须条件。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做工时间呢？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所以工人所得工资就是能够衣食饱暖，就是衣服楚楚，而被抢的权利，仍然是绝大的损失，终久是要大声叫冤的；因何理由必须强迫工人贮蓄才能增加工资呢？浪费时间及金钱与否，是工人自己利害所关，不劳他人强迫；若资本家借口教育、储蓄问题来阻止减时加资，实在是笑话。尊论以为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这句话真是名言。但全社会底界说，不是资本家独占的意思才好，不是工人除外的意思才好。照先生和郭某底意见，欧、美、日本底工业界，都是破坏的气象，都是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工人都习于游惰；那末，此时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工人勤俭、安分，只有我们中国工业界出品增多而且不恶劣；好极了，欧、美、日本也有不及中国的一日！不但先生及郭某有这样见解，欧、美、日本底资本家，诚然应该叹美中国工人能安分做牛马，比欧、美、日本喜欢破坏的工人驯良得多；但是我以为中国工人还没有好到十分，若工作时

间每日加增到二十四小时，工资减到每年一个铜子，更足表示中国工人勤俭、安分的美德是世界古今第一；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独秀　一九二〇，五，一。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附原信（节录）

独秀先生：

……

增工资减工时之结果，不但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因工人习于游惰，不能如前之尽心工作也。故仆之愚见减少工作时间，必与施行强迫工人教育并行；如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即以此一小时供强迫工人教育之用；而增加工资，又必须与强迫工人贮蓄并行；如此庶不致浪费时间及金钱，而于工人方面可得实益。

再吾国工业今方萌芽，求工不得之人，到处皆是，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尤当着眼于工人本身之实在利益；若一味效法欧美鼓吹破坏，仆以为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日本之前车可鉴也。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知耻上言。

答章积和(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

积和先生：

工作时间不减少，工人教育自然是没办法；但是只减少时间若不增加工资，仍然是没有办法。因为上海工价虽比乡间高，而物价也高；工人所得工资只可勉强敷衍衣、食、住三件事，教育费无从谈起；别人尽义务不是常事，而且不能普及。

独秀　一九二〇，五，一。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水 浒》新 叙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

《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深远意义，为什么有许多人爱读他？

是了！是了！文学的特性重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

在这一点看来，我们就可以明白许多人爱读《水浒传》的缘故了。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中国戏剧的缺点，第一就是没有这种技术。

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爱读《水浒传》的人必因此加多。他们要求我做篇叙，我没甚多话说，惟有指出这书主要的理想和技术，请读者注意。

民国九年七月七日，陈独秀叙。

《水浒》亚东发行（1928年）

两个工人的疑问

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而且把粮食收下来和运到别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地下生长的许多有用的矿产,更非用人工去开采,不会自己出来的。砖瓦不用说是人工做成的,木料生在山上,不用人工砍伐搬运,他自己也不会跑到砖瓦一块,自然替我们凑成功一个房屋。我们穿的衣服,自从种棉、养蚕以至纺纱、缫丝、织成布匹,那一样离得了人工?总而言之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单靠天然的原料是不行的。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说什么"劳工神圣"。但是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工?我们为什么要劳动?是因为不做工、不劳动,便没有粮食吃,没有屋住,没有衣穿。种田的人虽然自己〔不〕做屋不织布做衣,他用劳力做来的粮食,可以供给做屋的人、做衣的人吃用,因此可以说是拿自己劳力做的粮食换来别人劳力做的房屋和衣服。做房屋做衣服的人虽不种田,他能拿自己的劳力做成的房屋和衣服去换粮食,这也是分所当然。若是我们

不做工不劳动，那便是自己一无所有，拿什么去换别人劳力做成的粮食房屋和衣服呢？这样的人要想有粮食吃有屋住有衣着，除了去做强盗、扒手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又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①第一册　署名：陈独秀

① 《劳动界》周刊由陈独秀、李汉俊发起，于1920年8月15日创刊，目前能见到的为二十四册。其"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民国日报》1920年8月17日，"《劳动界》出版告白"。）

致程演生[1]

演生兄：

方梦超[2]完全是一个流氓，且与小徐[3]有关系，改进会[4]为什么容留他！社会上坏人利用团体牟利的事很多，你们要小心！北京改进会若不驱逐方梦超，上海改进会便要宣告和北京改进会没有连带的关系，免跟着丧失名誉。

兄所选的白话文稿[5]，望速向适之取回；因为他打算将此稿卖给中华书局出版，真是出人意表之外。这件事一半是吾兄懒惰之过也。适之在京很受人攻击，想必也有自取之道。

弟独秀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1980年10月《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四辑

---

① 程演生(1888—1955)，亦称程衍生，安徽怀宁县人，北京大学教授。

② 方梦超，安徽枞阳人。在北京常参加旅京皖人同乡会的活动。

③ 小徐，即徐树铮，属皖系军阀。

④ 改进会的全称为皖事改进会，是安徽省进步知识分子的团体。陈独秀主持的皖事改进会，不仅在旅沪的皖人中比较活跃，而且和北大教授程演生、王星拱等为主要成员的北京皖事改进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⑤ 程演生受陈独秀的预约，选辑《白话文选》，计划交亚东图书馆出版。

真的工人团体

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

1920年8月22日《劳动界》第二册　署名：独秀

致周启明信

启明兄：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时已复一信，收到否？《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日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暂用他纸，稿纸候洛声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弟　独秀白

〔1920年〕八月二十二日

1979年5月15日《历史研究》第五期

谈政治

（一）

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

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到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

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72所引）。Christensen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P. 45、46、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

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

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

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

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

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

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 Liebknecht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 Wilhelm Liebknecht,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al Trading, P. 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

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

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① 署名：陈独秀

---

① 《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

对于时局的我见

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说：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生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现在安福倾覆后上海方面对于时局的舆论，颇不一致，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

（一）总想“不劳而获”，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这次打倒安福派，只是吴佩孚一军的力量，别人都坐观成败。若是事后说便宜话，或是提出过大的要求，这是一定没有效果的。我们想“获”，必须要“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耻。至于左袒安福和段的先生们，正应该闭门思过，若还厚起面皮，拿国民的名义来唱高调，只好请他到段国去做安福国民，中华民国实不能容这样没廉耻的人！

（二）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

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

（三）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我们虽然应该承认他的威权，但未可把他看成神圣；因为他不是永远的真理，也不是全国民总意的表现，他的存废是自然跟着一阶级一党派能够造成国家的权力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法律是强权底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得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四）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随感录

虚无主义

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可怜许多思想幼稚的青年，以为非到一切否定的虚无主义，不能算最高尚最彻底。我恐怕太高尚了要倒下来，太彻底了要漏下去呵！我以为信仰虚无主义的人，不出两种结果：一是性格高尚的人出于发狂，自杀；一是性格卑劣的人出于堕落。一切都否定了，不自杀还做什么？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我盼望笃行好学的青年，要觉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别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对于社会上一切黑暗、罪恶，只有改造、奋斗，单单否定他是无济于事；因为单是否定他，仍不能取消他实际的存在。

上 海 社 会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像上海这种龌龊社会，居然算是全中国舆论底中心，或者更有一班妄人说是文化底中心；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底中心，那末，中国底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因为此时的上海社会，充满了无知识利用奸诈欺骗的分子，无论什么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骗钱的东西，出来鬼混。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工会底利用手段更是可厌，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

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

"不劳而获"，自然是不好的观念；劳而不获，也不是正当办法；最好是用劳力去求那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例如：与其提倡废姓，不如提倡名号统一；与其提倡女子剪发，不如提倡女子放足及解放胸部底束缚；与其邀集朋友办杂志，不如邀集朋友设读

书会；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署名：独秀

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

哲民先生：

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①（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那里会有纯粹的自由！在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压迫之下，青年向何处去寻新生活和世外桃源？即于劳动问题，更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

先生说："劳工解放，农人解放，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是不少了。"何以我绝对未曾听见看见？这句话先生说得太轻率了。

独秀　一九二〇，九，一。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① 费哲民给陈独秀信谈到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和劳动问题。

再答知耻(劳动问题)

知耻先生：

仆未尝不深知道先生是一位很可敬爱的青年，是一位人格很高尚的人，惟其如此，看见先生和万恶的资本家接近久了，竟然和他同化，说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话来，所以我格外痛恨资本家的魔力，不但掠夺了无数工人底财产，而且弄坏了许多青年底思想！工人财产被掠夺的问题，和工人要求教育平等的问题，理论上本不相联属，先生硬要拿后者做前者的条件，正合一班妄人主张不识字的女子不能放足一样。我并不是看轻了工人教育，而且很希望有强迫工人教育制度出现，但不愿意拿这个做讨论别的问题的条件，失了别的问题的独立精神。

先生主张“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问题之先决问题”，我且问你：在现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之下，工银如此之少，时间如此之多，先生有何神通可以使一般工人得着平等的教育？如此看来，又应该拿什么做工人教育问题的先决问题呢？还请赐教。若只拿教育这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底障碍，这句话只应该出在资本家走狗的口里，不是有人格有良心的人应当说的。

独秀　一九二〇，九，一。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

因为外国劳动运动都闹得利害，我们跟着凑热闹吗？我以为决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劳动者，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不应该有劳动运动。我们不能说中国底劳动者境遇不苦恼，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人不应该提倡并帮助劳动运动。

因为要大大的来改革中国底政治和经济组织，才利用劳动运动吗？我以为也不是这样。日本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底贫民窟他也曾去调查过；但是他说："见了中国上海底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底贫民窟都算不得苦恼。"贺川先生所见的闸北和营盘口等处贫民窟里贫苦工人底生活状况，上海有钱有势的人自然不容易看得见。但是像各处马路旁边小铁匠店里底小徒弟，无冬无夏从天明到夜半都站在火炉边旁打铁，这是容易见着的。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里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这班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苦的劳动者。你们若是对于劳动运动袖手旁观，甚至于从中破坏，我奉劝你们以后便

不必把什么仁义道德或基督教挂在嘴上骗人了。因此我要说一句可怜的话：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

1920年9月5日《劳动界》第四册　署名：独秀

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

富人生活

开着电风扇打麻雀。

坐汽车四处兜风。

住着高楼大屋还嚷天气热。

吃荷兰水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

睡在纱帐里，床前放着一盘水，点着根蚊烟香。

肥鱼大肉嫌腻口，海参鱼翅又嫌腥。

穷人生活

昼夜在烈日里面火炉旁边做工。

拉车运货，走一步出一阵汗。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屋里，出气不得。

路上遇见自来水或施茶，不管脏不脏便骨嘟嘟地喝下。

睡在矮檐底下，或小客栈里，终应供蚊虫蚤虱大开宴会。

当了一件破棉袄，买来二升米，一家老小才吃得个半饱。

1920年9日5日《劳动界》第四册　署名：独秀

无理的要求

三新纱厂底工人因为上海百物昂贵已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罢工反抗这本是分所当然的事。然而厂主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不错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

1920年9月19日《劳动界》第六册　署名：独秀

致周启明信

启明兄：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弟　独秀

中秋后二日〔1920年9月28日〕

1979年5月15日《历史研究》第五期

随感录(学说与装饰品)

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譬如我们不懂适者生存底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输入达尔文进化论底需要；我们的文学、美术，都偏于幻想而至于无想了，所以有输入写实主义底需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这些学说底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这些学说在社会上有需要一日，我们便应该当作新学说鼓吹一日；比这些更新的学说若在社会上有了输入底需要，我们当然是欢迎他；比这些更旧的学说若是在社会上有存留底需要，我们不应该吐〔唾〕弃他。现在有许多人说，达尔文底学说，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底文艺，马格斯底社会主义，都是几十年前百年前底旧学说，都有比他们更新的，他们此时已经不流行不时髦了。这种论调完全把学说当作装饰品，学说重在需要，装饰品重在时新，这两样大不相同呵！

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署名：独秀

国庆纪念底价值

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

我们中华民国双十节是建设共和国底国庆纪念日，从元年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其间受反革命的帝制派底压迫几乎不成个纪念日底光景曾有好几次，最明目张胆地强行禁止开会纪念的，就是去年反革命的帝制派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今年反革命的帝制派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在这班反革命的帝制派仇视共和禁止国庆日底纪念，本是当然的事，我们不去论他；但是信仰共和、趋赴共和底人，也要确乎明白纪念这共和国庆日有什么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当分两层：一是共和底价值，一是中国共和底价值。

我们对于共和价值底批评，固然不象反革命的帝制派及无政府党人把共和看得一文不值，也不象一班空想的政论家迷信共和真能够造成多数幸福。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打倒封建主义不能说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封建主义倒了，资本主义代之而兴，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

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底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分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底青年自幼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底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但舆论每每随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共和国底舆论不是如此？共和国里表示民意底最具体的方法就是选举投票，以财产限制选举权底国里不必说了，就是施行普通选举底国里，也没有穷人可以当选底道理，花几十万元才得着议员，这是很平常的事。最穷的日本国，最近的议员运动费也必须十万元左右；相传有一位极有名望的人主张"理想的选举"，决计不出运动费，不过他的朋友亲戚代他用了酒席车马费七千元，到处传为美谈；试问这种美谈没有人帮助底穷人得的着吗？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

我们对于中国共和价值底批评，并不觉得他比别的国共和

格外无价值；对于他在中国将来并无希望，也和在别的国一样或者还要更甚一点。过去的纪念像黄花冈壮烈的牺牲，接着就是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点），以至于多数人得不着幸福，固属当然（上面曾说过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数幸福），即次少数人也没有像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数人所独占，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致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那有不流产底道理。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看起来，除追怀先烈以外，这国庆纪念日已没有可以令人狂信底价值了。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共

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的岁月底原因：一是西欧的代议制度来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们社会主义的思想刚与共和同时发生，当时都还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数幸福。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至于说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我便有七个疑问：

（一）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用政治革命手段，是否可以免得由甲派武人官僚手里底资本转到乙派武人官僚手里，是否可以使社会的资本归社会公有？

（二）中国士大夫底人格是否已与封建式的武人同化，他们的政治道德是否可以适用代议制不须人民直接行动，除了多数人的援助他们的力量是否能够打倒封建式的武人建设共和政治？

（三）共和政治是否能够造成多数幸福？

（四）抛弃多数的幸福是否能够使人心安定共和巩固？

（五）中国此时资本家生产制还未十分发达的时候，是否应该乘机创设社会的工业，是否应该提倡私人的工业酿成经济不平等之危机？

（六）中国除了劳动界有了阶级的觉悟，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绝对打破资本家生产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国由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

（七）单是政治革命，能否解决官、匪、政客、游民、兵过多底问题？

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但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说中国此时只须政治革命不须经济革命，我便要请他解答上面的七个疑问。

以上所讨论的共和底价值和中国共和底价值，似乎都是我们在国庆纪念日应有的觉悟。

一九二〇，十，一。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署名：独秀

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①]

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我听说有七八十个机器工人，发起这个上海机器工会，算得一个很好的事。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但我有一句，请诸位牢牢记着：我说这个工会，将来万一有办到不如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努力，要把他糟的处所改造，把坏的分子驱出，尽力负责去干，万万不要见得他糟了，大家就让他去糟，个个不管了。

1920年10月10日《劳动界》第九册

---

① 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1920年10月3日，陈独秀出席该工会发起会，并演说。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伙友》[1]发刊词

从广义说起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里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是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此时中国这三种劳动者底境遇无不苦恼，商店底劳动者知识比别的劳动者发达得多，而又无法改良他们的境遇，所感的苦恼更甚。现在要联合起来，各人说说苦恼底状况及原因，公同商量一个改良的方法才好。

因为商业竞争上的关系，把人类有用的精力用在许多无用的地方，这是资本家生产制各种弊害之一；因此"废商论"在新的经济思潮里得了很大的势力。但是现在商业底经验及技术到了废止个人的商业竞争时代，在社会的工业自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职务，不可轻忽的。所以商业伙友们要觉悟不但自己的境遇有新旧改革底必要，就是自己的经验及技术底用途也有新旧改革底必要。

简单说起来，本周刊发行底目的有二，就是：

---

① 1920年9月9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同工商友谊会代表开会，决定联合创办《伙友》(《本社特别启事》，《劳动界》第七册，1920年9月26日)。后来，因《伙友》宣传劳资合作，发行至第九册时，陈独秀等便同《伙友》脱离关系。原标题为《发刊词》。

（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

（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1920年10月10日《上海伙友》第一册　署名:陈独秀

敬告广州青年

在广州我有许多已经见面的和还未曾见面的好朋友，去年很有机会可以到广州，而竟没有去成，实是一件憾事！

我认识许多广东朋友，又有许多别省的朋友告诉我，广东人的性质和广东的社会状况，我归纳起来，得到两种极端不同的结论。一是好到无以复加，一是坏到无所不至。这两种结论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端矛盾，不能并存，然而我以为这两样都是事实。

在民族性质说起来，不能为大恶的必不能为大善。所以富于保守性的康有为是广东人，富于革命性的孙中山也是广东人，富于物质主义商买性质（广东人赌钱做官的乡绅是同将本求利的物质主义）的梁士贻是广东人，富于理想主义的刘师复也是广东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因此别人对于广东两种极端不同的批评，我以为都是事实。

现在压迫湖南底暴力去了，湖南青年底奋发一日千里，我料压迫广东人底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广东青年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

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

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

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

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1920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

一、星期日休息

二、每天只做八点钟工

三、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

我们中国底事样样都比不上外国，劳动者境遇也是这样，说来真是可耻又可怜！

外国劳动者星期日都有休息，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天只做八点钟工，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月都有工钱百元数十元，中国怎样？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中国怎样？外国对于女工、童工及老年工人，大概都有特别保护的法律，中国怎样？外国工厂里对于工人卫生及教育也都有一定的工厂法，中国怎样？外国国家或厂家对于劳动者底住所及饮食店多有很洁俭的设备，中国怎样？外国对于劳动者生产的、病的、老伤的、死的都有相当的抚恤，中国怎样？外国已经没有万恶的工头了，中国怎样？

外国工人们已经得着了这们许多好处，但他当初也和中国工人一样，后来结下了团体，经过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国家及厂家拚命要求才得着的，不是平平安安容易得着的。

外国工人们虽然得着了这们许多好处，但他们还不满意，还是叫苦连天，还在那里结大大的团体，还在那里做大大的劳动运动；这大大的运动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矿工要求占领及管理

矿山，意大利工人要求占领及管理工厂。我们少见多怪的中国人听了这些话，恐怕都要发出“人心不足”底叹声。

就是我也不敢希望我们中国底工人们马上就有外国的这样大大的运动，说句极没出息的话，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

倘然今后仍旧照现在一样，工人们连这三样好处也得不着，像这样吃苦耐劳而工钱又极低贱的地方，必然要招引许多被工人驱逐的外国资本家来办实业，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所以中国工人这样困苦，不见得单单是工人底不幸，不知道一班资本家见到这层没有？

1920年10月23日《劳动界》第十一册　署名：陈独秀

《儒林外史》新叙[①]

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而呻"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

《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

看了这部书的，试回头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形是怎么样？当时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么样？当时的平民又是怎么样？——那一件事不是历历如在目前？那一个人不是维妙维肖？

吴敬梓他在二百年前创造出这类的文学，已经可贵；而他的思想，更可令人佩服。

他在第二十六回和二十七回里写鲍廷玺的婚姻：他的母亲不管王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也不管鲍廷玺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小户人家，只是要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的好。"——错不错，一味信着金次福说的话，"要过来倒又可以发个大财"，到后来，把个鲍廷玺弄得颠颠倒倒。——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极不满意于父母代定婚姻制。

① 本叙写于1920年。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书记载，此文由汪原放起草；陈独秀改写，并应汪的要求，署陈独秀的名字。

四十八回里写王玉辉的女儿殉夫一事，他的女儿要死的时候，王玉辉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还拦阻你？"女儿死后，他的女人大哭，王玉辉反劝道："你这个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经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又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入祠那日，王玉辉转觉伤心。后来到苏州游虎丘的时候，看见一个船上有一个少年穿白妇人，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对于贞操问题，觉得是极不自然。

二十五回里倪老爹说："长兄！告诉不得你！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又看他在五十五回里写荆元的朋友于老者种许多田地过活，何等自由，何等适意！——这两处又很可以看得出吴敬梓把"工"比"读"看得重。

这三个问题，吴敬梓在二百年前便把他们认作问题，可见他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

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妨碍。我从前在《新青年》里说过有几句话，现在把他写在后面作一结束：

"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

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号，陈独秀。

《儒林外史》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

随 感 录

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

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良心的学者。这班学者脑子里充满了权门及富豪底肮脏东西，他们不以为耻辱，还要把那些肮脏东西列入学理之内，他们那曲学阿世底罪恶助成了权门富豪底罪恶都一件一件写在历史上，我们不曾忘记呵！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署名：独秀

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①

贤宗先生：

我前次文章发表之后，言论界未曾有赞同或反对的表示，我很为失望；现在接到先生底辩论，并且是很有价值的辩论，我非常快慰。我的意思还有一些和先生不同的地方，不得不写出来请先生指教。

在答复先生底辩论之前，我有几种信念必须明白发表出来：(一)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

① 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发表以后，郑贤宗投书《新青年》(刊于八卷三号)，发表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有两个理由：一、国家不是万古不易的，"要是再不废掉他，就要变成进化大道上的障碍物"；二、"无政府党主张大地众生应当互相亲爱，视地球上一切人类都是兄弟"，而自从有了国家之后，就把国家以外之人，"视同仇敌"，以致发生战争，相互残杀，血流成河。无政府党所反对的国家，主要是"未来的国家，不管他是什么形式，……一切都在反对之列"。"至于政治与法律，都是随国家而来的，……当然一并反对之。""无政府党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无论是善用或恶用强权，一律反对。
郑贤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认为革命以后，"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予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那里再有势力复辟？"

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二)世间有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说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固然不对,一定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在逻辑上也有毛病),终极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似乎不必作此无益的推敲;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有益事业只有说明现在社会里已有的毛病,建设最近的将来比较善良的社会;倘若迷信很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社会才算彻底,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以为不彻底不去努力,这种人只算是"候补改造者",可惜他来到这世界上太早了一点。我们若单单空想最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努力放弃了,那么世界终极是或者要毁坏的,个人终极也都要死亡的,我们未到终极期间底一切努力岂不是无意识么?(三)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笼统的否认他,他便会自然消灭的。譬如医治多年的疾病,纵然有药到病除底仙丹妙药,也要有这药才能够治病,断不是在理论上否认这病,这病便自然会好的。因为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这三条信念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所举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底两个最大的理由,在第一个理由,我那篇文章里面明明说:"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我实未曾说过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东西。无政府党既然承认"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而在现社会实际的共同生活底需要上,是否真实证明国家这种形式这个制度(不是国家主义)底时期已经过

去?在第二个理由，象那些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最甚的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拿国家主义做招牌争商场弄出来的，不全是国家本身底罪恶。象这种侵略的国家主义即帝国主义，我也是绝对厌恶的；至于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有时不免现出狭隘的情感，但他是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如言语、历史、宗教、利害等，）底基础上面，根深底固，他成立底基础不消灭，他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单是消灭了“国家”这个名义，在实质上人类但凡有组织，那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民族的冲突，就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仍然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想免除这种冲突，非先在事实上免除造成冲突底各项自然的障碍不可，各项障碍中以言语和利害关系最重要，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

政治与法律也和国家一样，是有人拿他作恶（一部分无政府党所主张的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也有人用这些事作恶），他本身并不一定就有罪恶。在无政府党以为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是根本解决，在我以为是因噎废食。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底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底方法来解决病底问题，未免有点笑话。在我那篇文章内，并没有说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是好的，只说过要有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要有强迫劳动的法律，要有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先生既然相信无政府主义，请你要将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底人民分别一下，不要说些笼统话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

先生一方面以为我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

些武断；一方面又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我实在有点不解。我对于国家政治法律，只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个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具，并不是把他们当做个主义来信仰；先生一定说他们于人类生活只是有害无利，难道先生所主张的无政府社会未实现以前之暗杀、暴动、炸弹、手枪，是于人类生活只有利而无害吗？

我那篇文章内是说旧党势力恢复推论到复辟，并非专门拿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来防备复辟。先生说："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这种理论说说很容易，先生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先生既然承认过渡时代应有一种临时办法，这便和我的意见相差不远；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

孟子人性皆善底话，只看见性底一面，已为常识所不能承认的了。主张人性皆恶底人，也可以说："独占之心，人皆有之；残杀之心，人皆有之；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嗔忿之心，人皆有之；自利之心，人皆有之；……"或者有人说这些都是习不是性，我第一要问，何以善的现象是性，恶的现象就不是性呢？第二要问，习惯是不是第二天性，佛教所谓无始以来的熏习是不是和性有同等的力量或者更强一些？让一步说，恶是习不是性，可以改正的；但长久期间造成的恶习惯恶心理，是不是短少期间可以洗刷净尽

的？在这恶习惯恶心理未曾洗刷净尽期间，自由放任主义是否行之有利无害？性善是无政府主义一个重要的基础，要请先生用科学的方法仔细研究一下。我所谓一时也决非很短的期间，大概要以疲劳回复了并且有了新的刺激普及人心为限度。我所谓强迫劳动底法律决不是永久的，这件事用不着先生死不赞成，我敢说不但现在及将来不会有永久的法律，就是过去的历史上也未曾有过永久的法律。

我以为关于人类基本生活劳动底规定，有二种方法：(一)由人类平均担负；(二)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时间可以较别的劳动时间减少。我所谓用法律强迫劳动，是不许有人不劳动，是不许大家都不肯从事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因为若没有法律强迫，在这机器完全代做和劳动的艺术化未成功以前，我敢说无一人或只极少的人情愿去做；并不是说用法律来规定"那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那一个人应该做不洁的劳动。"我不知道先生这种疑问是从何处想起？

我看人类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本能是不会衰减的；假定日后依教育底成绩，理性充分发展能够抑制本能，只望这个来解决男女问题，又不知在何时代。先生持论底通病是注目在远的将来，而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急待解决之问题放下不管。

恶的自由是应该束缚的，请问先生什么东西可以禁止罪恶发生？

事实是道理底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最后我要忠告先生的，就是先生所说："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这句话。先生能断定到了无政

府主义的社会便不须改革了吗？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劳永逸的改革！

独秀　一九二〇、十一、一。

《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答柯庆施（劳动专政）

庆施先生：

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

独秀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共产党》月刊短言[①]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

---

① 原标题为《短言》未署名。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集）

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

现在中国底劳动运动，无论官场如何禁止，无论没良心的学者如何否认，可是他已经发生了。将来的结果，我想总不至于象民国元二年的这么工党什么劳动党一样。

要问将来的结果，先看此时的宗旨。此时劳动运动应该抱一种什么宗旨呢？戴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上说过：

"我们如果要从事于劳动运动，就上海说，当然要把上海劳动者的实际问题拿来打算。倘若真是为劳动运动尽力，就应该暂时不要用甚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因为那种空空洞洞无头无脑的政治运动，就今天上海劳动者本身上讲，实在不感触甚么必要。现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离开了改良生活的问题，无论甚么事他们本身都不能享用的。政治的劳动运动至少都要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改善了多少，欲望增进了多少，他们自己感觉到'由劳动者管理工厂'、'由劳动者所有生产机关'的必要，了解了这些意思然后才能发生，着手运动也才有效果。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研究只管研究，宣传只管宣传，实际的运动上，就不能不暂时搁开，把全副精神放到劳动者团结和改良生活条件的问题上面去。"①

---

① 这段文字引自季陶写的《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文，载《星期评论》第四十八号，即《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并据此作了校对。

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指示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我觉得很恰当。此时劳动运动效果带了政治的臭味，不但劳动者不能够了解，而且恐怕政客利用。上海工会由于小政客发起的居多，所以开起会来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什么工界代表在什么国民大会策进会里笑话闹够了，劳动界诸君快快觉悟吧！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倘若夹杂着政治运动来出风头，那结果必然和民国元二年的工党劳动党一样。政客式的工会呀！我祷告你已成立的快快消灭，未成立的别要发生！

1920年11月21日《劳动界》第十五册　署名：陈独秀

在欢迎（送）蔡孑民出国宴会上致词[①]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

今日同人欢迎蔡校长，而社会上亦有一般人，批评蔡先生为极坏。同人对于此事，已经批评个人意见不确当。今颇有展转之余步。而社会之不进步，大学安能平均。是故北大之缺点，曾有好处，亦复过誉。然蔡先生自任校长后，有二事为同人等所亲见者。一则学说独立，盖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而独树大学改革之精神；二则思想自由，北大内有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是以毁誉不足计，而趋向之所宝贵者，则精神也。今后同人之所希望，即在一面弥补缺点，一面保存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二者是矣。蔡先生自任校务以来，并竭力扩充，而各方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此实为学务不发达之一大原因。今安福虽倒，思之犹有余痛焉。极盼蔡先生凭其素日奋斗之精神，继续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北京大学旅沪同学会，假座一品香，欢迎（送）校长蔡孑民及随同赴法筹办里昂中法大学事宜之北大教职员张申府、李光宇。参宾者有陈独秀及其夫人、马叙伦、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穆藕初等，以及各同学、各新闻记者，蔡孑民之弟亦由汉口来沪送行。宴会由陈独秀主持。

发展校务，以弥缺点焉。愿偕同人，举杯恭祝蔡先生一路平安。

陈独秀

1920年11月24日《时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①]

致罗素先生底信[②]

罗素先生：

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

---

① 1920年9月，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张东荪等陪同罗素赴湖南讲演，返沪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受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的反驳。一场论战就此爆发。陈独秀汇集双方的文章和他本人的文章共十三篇，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总标题，刊于《新青年》第八卷四号。现辑入其中第六、十三两篇。第十二篇作为附件。

② 原标题为《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这是一封迫使罗素表态的公开信。罗素一直未答复。

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复东荪先生底信[1]

东荪先生：

前次质问先生底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此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底这两要点没有回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

（2）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① 原标题为《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

(3) 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

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观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底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即以此时中国而论,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的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资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输入商品包含在内)打倒手工业底原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先生所谓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谓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谓少数就是掠夺阶级的资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闸北或营盘口贫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内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训。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

乏，非仅由资本家压榨，我便有两个质问：(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那里来的？当真他们的命运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底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上说的很清楚，兹录如下：

教不变的蠢才。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惟有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

变。五日报载松沪护军史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才。等着！我再教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后略）

以先生底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底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的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中，也说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杨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资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仍只有希望资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一般的贫困；而且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底意见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见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归到资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经过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象政

客、猎官利用权门不费事便可得现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创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门得现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应该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 Evolution 呢?(三)诸君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杨端六先生所谓"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先生也说"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以何法来开发中国底实业呢?

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伟大的欧美资本家，那能够不失败，将来那能够不降入劳动阶级。所以

我曾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前文所论三项，虽然不过是就先生底立论添点蛇足，却是我们重要的争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话也要请教于先生：

中国底贫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观的说话，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甚么协社主义、甚么基尔特社会主义①和甚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

---

① 基尔特（Guild），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张东荪为其宣扬资本主义的言论，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说他"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开发实业"止有协社为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见同期《新青年》载《东荪先生再答颂华兄》一文）

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先生既然觉得资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们推车撞壁，而不教他们曲突徙薪呢？

先生说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请问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吗？

先生既主张"惟有各地自决"，又主张"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则全国中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状况，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资本主义底主张相冲突吗？

先生预料十年内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赞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谓"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说？

先生一方面预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张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请问既是必然发生，宣传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们所赞成两方所争论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他，岂是颟顸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先生说："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又说："宜我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我以为先生若欲在理论上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专政，反对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还可说彼此各有一是非；至于显然的事实却不可以任意颠

倒，请问怎样才是真正之劳动者？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先生以为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过Bourgeois 的政治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才说得到社会主义，然这样完全听着自然的 Evolution 而不加以人力的Revolution，马上在中国成立的Bourgeois 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

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我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底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底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那一个是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

己努力，是不是可以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只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Dictator，做出现成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底问题？

通观先生底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附：东荪先生致独秀底信

独秀先生：得你的质问，具答如下：

我以为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或用资本主义，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来无条件地应用。

至于说不是抬轿的人即是坐轿的人，以现状论，抬轿的人不以为苦，而反以不得抬轿为忧，则其穷苦可知。今我们执抬轿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为迂了。而此种穷困实为一般物力缺乏的结果，换言之，即国民经济全般的不足，而非仅由资本家的榨压。所以我们的注眼处宜广及经济界全体。总之，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国，能实

行一种主义。我以为中国以后总不外乎地方自决。

二、勿论地方如何自决，而以中国民族的根性与时代的趋势，决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无强有力的政府，则劳农主义不能全部实行。

三、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也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若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之手段，其间是否有密切的关系，我尚未敢断言。

东荪上。

随 感 录

劳工神圣与罢工

常常听见人说：你们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一方面又提倡罢工或提倡减少工作时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象这种头脑不清的说话，一班头脑不清的人或者以为很有道理。但是要晓得我们所崇拜的劳工神圣，是说劳动者为社会做的工——即全社会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不是说劳动者拚命替资本家增加财产是神圣事业。为资本家做工是奴隶事业，为社会做工是神圣事业，头脑清楚的人应该懂得这个区别。我们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正因为现时生产制度下的奴隶事业玷辱了“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可见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和提倡劳工神圣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我盼望社会上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免得思想新的资本家又来假劳工神圣的名义欺骗劳动者，替他拚命做工。

主 义 与 努 力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譬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达到方向所在。

但现在有一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这话真是不错。

革命与作乱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是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

底目的是除旧布新，是要革去旧的换新的，是要从坏处向好处革，若用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

民主党与共产党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

请看哈尔滨俄旧党《光明报》记者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底谈话（见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哈尔滨特约通信），这班民主派欺骗世人的诡计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说："我们非社会党的主张，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决不赞成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又说："至于日本呢，我相信他能帮助我们。"又说："谢米诺夫却是真正的民主党，现在只有他一人

抵御共产党。"又说："不论是美国，是日本，他们取得中东路权之后，总没有我们俄国人好。"又说："中国取消俄使领，是不应当的。现在俄国人没有一个满意中国的审判厅的。"

由他这些说话，我们看出两件事：(一)原来反对共产党底真正民主党就是谢米诺夫这样贪鄙不法的人物；(二)原来民主党对中国底外交，和共产党放弃中东路权、放弃领事裁判权恰恰相反。

提高与普及

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适之先生对于大学生主张程度提高，理论上自然是正当，别人驳他的话，我看都不十分中肯。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感想：

(一) 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国多设大学，各大学中多收绝对不限资格的自由旁听生。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

(二) 专就北京大学学生而论，现在低的还没有，如何去提高？我觉得眼前不必急于提高，乃急于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底基础学。历来北大底毕业生有几个能自由译读西文参考书的，有几个基础的普通科学习得完备的？蔡孑民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

想，来高谈哲学文学，是何等危险！我劝适之先生别高谈什么提高不提高，赶快教朱谦之、易家钺一流学生多习点基础科学，多读点外国文，好进而研究有条理的哲学，好医医他们无条理的昏乱思想罢！

我这两种感想适之先生以为如何？

无意识的举动

倒军阀，我们是赞成的，但是倒一军阀成一军阀，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战争我们虽然不绝对的反对，但是无主义的地盘战争，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各省自治运动我们也很赞成，但是混合一班腐败官僚，安、政余孽，烂污政客，警察侦探，运动省自治，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广州人赶去一班政客官僚，我们固然很赞成，但是他们又迎去一班政客官僚，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各地学生排日货，我们固然不反对，但是去年天津学生今年河南学生强迫贩卖日货商人游街，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政局统一，我们也不反对，但是赞成现政府统一中国，实际上就是日本间接的统一中国，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

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署名：独秀

致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1]

守常　玄同　适之　孟和　一涵
慰慈　豫才　启明　抚五　诸君：

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

弟独秀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

① 原信无时间，信中说："弟日内须赴广州。"——陈独秀离沪赴粤为1920年12月16日晚；信中又说："四号报已出版"——《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出版日为1920年12月1日。据此两点，可知此信写于1920年12月上半月。陈独秀赴广州，是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聘请，任该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相当今省教育厅长。

致胡适之、高一涵[1]

适之、一涵兄：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弟独秀（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夜。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12月

附：（一）胡适的信

仲甫：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廿七夜始到。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　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　适。

附：（二）胡适的信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

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象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十一、廿二。

慰慈赞成此议。　适。

一涵赞成此议。　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　王抚之〔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弟兄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 玄同附注。

一九二一、一、廿六。

欢迎新军人

现在及近的将来或至于很远的将来，我们都没有理由主张绝对的废兵论，而现在的军人尤其是军官却十分为害于社会，这是毋容讳饰的。他们不但把持民政财政机关使政府行政无形搁浅，而且包庇鸦片烟与赌博使社会受无穷之害，这种现象不但使社会上一般人厌恶军人，就是明白的军人也都痛心疾首。救济的方法既不能够从根本上主张废兵，惟希望有一班新军人挺身出来团结同志，将一班为害社会的旧军人渐次淘汰干净。这可以叫做“军人自决”，也可以叫做“军人自治”。但是须有何种资格才算得是新军人，这是必须确定的，否则不但人人可以随便自称新军人，并且比较有良心而徘徊歧路的军人没有机会找出他的自新之路。新军人的资格并不在他的军事学胜过旧军人，他所以与旧军人根本上绝对不同的是在两大信条：

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外国人只一个“财产私有”已弄到社会不得安宁了，我们中国人自辛亥革命以来又加上一个“军人私有”，所以更闹得不成世界。只听说有段军有奉军有辫子军有唐继尧的兵有陆荣廷的兵，却没听说有中华民国的兵。他们倚仗有他们的私有军队，所以才敢于横冲直撞，硬把中华民国闹到这步田地。有觉悟的新军人诸君啊！你们无论职务大小都有一个堂堂的人格，你们不是一盏灯一

张椅一把刀一匹牛马，不要再做个人私有物了罢！

二是要做有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社会上何以说劳工神圣，是因为他有生产力。社会上何以厌恶军人，是因为他是单纯的消费者。旧式军人是帝王酋豪特别蓄养一部分人替他打江山争地盘的，所以有只消费而不生产的权利。新式军人是社会上人人应有抵御外侮之义务，所以除了在战争及训练期间，不应有不生产而消费的特权。军人若有了生产力，现在所极难解决的军费问题、裁兵问题、兵匪勾结问题、军人包庇烟赌问题便自然解决了。象中国古代“寓兵于农”的制度和现在俄国的劳农兵，都是军人而有生产力的好榜样。

以前的事都随着民国九年去了。我希望我广东的新军人随着新年思想一新，实行新军人两大信条，宣传新军人两大信条，好做全中华民国新军人的模范。我心中对于广东充满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

1921年1月1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新教育是什么？

这篇是本年一月二日我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底演说，当时朴生、载杨二君记得很清楚，兹就二君所记略加增改，在本志上发表，因为广州底报纸别处不大见得着。①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底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有人说：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其实这个分别不过是形式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或者又有人说：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其实这个分别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况且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底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

① 本文原载于1921年1月3日《广东群报》。4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转载时，陈独秀加了这一段文字。

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旧教育——科举⎫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教材种类的
新教育——学校⎭　　　　　——科　　学⎭不同

照上表看起来，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的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说明之先，我请各位想想到底什么是新教育，什么是旧教育？

新旧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许多意见，但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和诸君各个讨论，只好拿我的意见告诉各位。我以为：

旧教育——主观的⎧教育主义——个人的
　　　　　　　　⎩教授方法——教训的

新教育——客观的⎧教育主义——社会的
　　　　　　　　⎩教授方法——启发的

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各位对于这个意见，一定很怀疑，以为中国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迦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欧洲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

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其实，诸位细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迦、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定〔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迦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迦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迦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教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象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自焚殉夫为道德，象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又如一个城市里面公共卫生极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底效果上总是力量很小。

又如现在的广州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坐轿。

又如现代就是教育程度极低的人也知道奴隶制度不好，但是在蓄奴社会的古代希腊，个人伟大的亚里斯多德竟主张奴隶制度不可废。

象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底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1)可见之于家庭教师底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2)可见之于学校儿童底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3)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

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象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底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惠潮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第四个缺点就是旧的个人主义教育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承受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不脱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底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学生

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底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以下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底根本不同及其好歹：

现在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底界说，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现在在座各位不是教师就是师范生及热心教育的人，关于这点很望诸君注意！

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底病状病源才能开方，服药后底经过状况也是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象，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哩。哺养小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人底意思来哺养小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小儿底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底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之下学得许多实际的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小儿一样。

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

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底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之不同及好歹，大概我们可以明白的了。

但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也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底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底不同。

杜威先生曾说，中国底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底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象日本底教育制度已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

（一）伦理　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

何，完全是教训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人冷了才知道穿衣底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底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二）历史　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到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三）地理　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底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底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底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样〕？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四）理科　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广州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

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广州有二十多年没下雪，香港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象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儿；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着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五）图画手工　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底成绩品，装潢学校底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底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学者，所以不用教伦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底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底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的。因为手工图画底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喜欢画什么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象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底意思教他造成美术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谱的”

教育；一切"填谱的"教育都适以限制受教育者底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贼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

（六）唱歌　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底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底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新教育底两个特点：

（一）新教育底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

（二）新教育底效力大过旧教育。

1921年1月3日《广东群报》，4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转载　署名：陈独秀

社会主义批评

——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①

（一）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种做改革进化底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他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1月15日，演讲词（记录）全文于1921年1月19日在《广东群报》上连载完，又经陈独秀修改、补充，发表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上。

理想来改造现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因此可以说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现代生产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现代生产方法有二大缺点不得不急图改造的：(一)是资本私有。现在大工业时代和从前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是简单生产工具可以生产的了；资本既然是私有，结果有资本的人才有工具做工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二)是生产过剩。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关于生产品底种类额量，不受国家之统计调节，资本家乘时投资，争加产额，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

现代分配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纺纱厂，资本一百万元，一年赚了净利

一百万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钱八元，一年工价全额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总理以下各职员底薪水至多不过十万元，再就算上资本家底官利二分二十万元，共总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底财产了。这个纺纱厂底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品底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象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马上完全撤废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底私有财产。

总之：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二）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

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关于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资本主义底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底危机，然后才达到结论。

资本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一切生产底工具，无工具不能生产，犹之无本不能生利，所以叫做资本；

纸币是金钱底代表，金钱是资本底代表，都不是资本底本身。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已不一定劳动，利用自已占有的资本雇用别人劳动而生产而得利益。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加他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底历史很早，远在渔猎时代，倘若那时雇人渔猎，或借器具给人渔猎而分得利益，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相同；到了农业时代，雇人耕种或买奴隶耕种，这时资本主义更是显然了；近来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虽与古代相同，而程度之差算是天渊之别了。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之最大原因有二：（一）由于交换方法之进步　古代物物交换，资本不易积聚，由资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万担谷或十万张牛皮，便不易于转移堆积了；后来发明了以金钱代表实物，小小的一块银可以代表几担谷几十张牛皮，交换方法进了步，资本主义也跟着进步；后来又发明了以纸币代表金钱，薄薄的一小张纸可以代表一千元一万元，交换方法更进一步，资本主义也跟着更进一步；到了银行制度发达起来，交换方法充分便利，无论多大数目的资本转移，只要银行记一笔账出一张票子便得，这种便利的交换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担谷换多少张牛皮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近代资本底积聚和资本主义底发达，比起古代来也有天渊之别。（二）由于机器盛行　在手工业时代，有一把斧头一个墨斗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网便可以打鱼，有一架纺线车便可以纺纱，有一架织布机便可以织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印书，人人都很容易得着这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做一个独立生产者，所以在手工业时代，那雇人的资本阶级和被雇的劳动阶级是不大分明的；在这时代就是资本家自备工

其雇人做工，那掠夺剩余价值来增加他们私有财产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机，每日织布一丈，价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二角，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不过二角，一百架机用一百工人做工，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每日也不过二十元；若用蒸汽机，一百人做的工五个人就够了，资本家只付工价一元，其余九十五个人工价十九元都被资本家掠夺去了，这时一日的剩余价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这时工人与资本家所得乃一与三十九之比，推而至于五十人做工，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价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资本家一日掠夺的剩余价值乃有三万九千元之多。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忙替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聚起来的。机器积聚剩余价值既这样的迅速，交换方法又这样的便利，所以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迥非手工业时代所梦想得到的了。一方面资本主义随着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的兴旺起来；一方面因为机器工业底生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象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那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阶级底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

资本主义既这样强盛，压迫得劳动界无路可走，何以还说能讲社会主义呢？不然不然。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

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格斯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资本阶级的也就是剩余价值。一定有人说：资本家占了剩余价值，资本无限增加，机器无限增多，生产品无限产出，岂不是很好的现象吗？岂不深合生众食寡为急用舒的孔门经济学说吗？殊不知在共产社会里生众食寡为急用舒或者是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可就不然了。在资本制度之下生产品增多，剩余价值也随着增多，此种无限增加的剩余价值复变为资本，不能用为社会公共增加福利，乃为少数的资本家所私有，于是乃由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过剩，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Crisis)，所以说生众食寡为急用舒在资本制度之下不一定是好现象。上面的话或近于抽象了，再详细说一下：在理论上看起来，社会上最怕的是贫乏，生产品多多益善，生产过剩是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许多许多，本算是好现象；但这种生产过剩的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反变成了社会底危机，乃是因为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这就叫做供过于求，这便发生销路底困难，过剩的额越大，发生的困难也越大；例如社会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现在产出一千五百匹还不大紧要；若是产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产过剩额到了这步，社会上必然发生经济恐慌。因为资本制度之下的产业状况是极端自由的，是无政府的，无论何项产业资本家都可以自由联合自由投资增加生产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产品卖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资本家自由收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所得仅足糊口，生产较需要过剩了几倍，资本家虽然可以奢侈些，也断不能把同样的消费品陡然增加几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资本阶级底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

千五百匹，劳动界因购买力不增加，不能多销，那生产过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发生滞销、跌价、停工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必然的现象。这种必然的现象总括说起来，乃是资本制度之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事发生；因为资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是承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底购买力便无从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则社会上消费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费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要发生经济恐慌。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溃的危机如马格斯所指示，而马格斯身后数十年资本阶级何以不但未曾崩溃并且日见强盛呢？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马格斯学说失了效验。各国资本家拚命占据了剩余价值，拚命推广制造业，拚命寻求殖民地将所有的剩余生产送去销售了，才能够弥缝一时表面上没有十分现出危机来。所以近百年来，甲国与乙国战争，或是直接征服殖民地，消费了许多生命财产，结果所求得的不过是几条通商条约。因此资本主义便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不解之缘，因为镇压殖民地或与他资本国争夺商场都非有强大的海陆军不可。名为自卫，或是爱国，或是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骗人的话，其实都不外销纳剩余的生产品，好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好维持资本阶级底权利；试看前几年欧洲大战，美其名曰民治与强权底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利用各国打倒德国，为保全他的世界海运权及亚非两洲底商权罢了，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扩张在中国、朝鲜底商场，还美其名曰保全东亚和平是一样。

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大言是怎么失败的呢？正因为他不懂得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底根本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败底道理。当日巴黎和会席上的英、法当局，并不是良心特别比威尔逊坏些，乃因为他们的国家组织都立在资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国里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销纳，如何救济经济危机，如何维持他们资本阶级底地位呢？威尔逊总统不过说得好听点，如果他美国当真抛弃了军国主义，他美国在国外底殖民地和商场抛弃不抛弃？如果抛弃了，国内底剩余生产怎么样？所以威尔逊总统底主张不但在巴黎和会失败了，并且此时美国底海陆军备仍然是有加无已。日本鉴于美国底情势，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业底威权，也不能不竭力增税扩张海陆军备到现状一倍以上，日本当局非不知这税太重了，全国底工人农民小学教员下级军官底困苦和不平是可恐的危机，但是他们更知道没有充分的武力保护商业不能输出剩余生产乃是更大的危机，所以明知道扩张军备是毒药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扩张军备是陷阱也不得不从上面走过去。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相互竞争扩张军备是无限的，相互争得的殖民地或商场是有限的；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军备无限的扩张是资本阶级杀人适以自杀的利器；我相信当初资本阶级是拿殖民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了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我相信欧战底

结果，国际资本阶级底基础已经大大的动摇，我更相信将来再经过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底末日，即国际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的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底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到是各国资本制度底崩溃还未现实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这层事实上的困难，我们到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们确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努力打破这层困难底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

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

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

（三） 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既然有讲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他的派别分歧，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一、无政府主义

二、共产主义

三、国家社会主义

四、工团主义

五、行会社会主义

上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马格斯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张阶级战争，是出于马格斯；二、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他的缺点正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的病；劳动者本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何待你不要，你尽管不要，资本阶级他是要的，他是要拿国家及政权来压制劳动的；工团主义者以为国家

政治总会侵害工人底自由，试问呻吟于资本家政权之下的法国工团他们的自由在那里呢？

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战争底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底作用。行会社会主义者自以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他以为拿行会代表生产者底权利，以国家代表消费者底权利，这样公平的调和，可以免得剧烈的革命了。这种调和的理想是英国人的特性。其实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

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算有点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广东都有一小部分青年相信。但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为几派，我以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底绝对自由。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没有个体自由底冲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够绝对的，而且艺术必须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一切束缚，天才方可以发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动，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价值。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

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那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的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先就经济而言：现代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而且个人或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但无政府主义者必定说：我们可以自由联合，公议生产事业，断不至有这样过剩或不足的情形发生；那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没有一个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张各个的绝对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

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困难。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象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社会制度初变更的时候，应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肯劳动，要不要加以法律的干涉呢？监守公物而自盗，强力迫胁不悦己的妇女，这种人无论到何时代恐怕都有，应不应加以法律的制裁呢？所以我敢说：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五派中底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格斯，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底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维克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

同出于马格斯，而两派的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如下表：

共产主义底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
阶级战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第一、德国底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政党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二、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格斯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问俄国共产党：有产阶级的人也

是国民，何以单单主张无产者一阶级专政？俄国人答道：你们何以不主张全国民都加入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问道：一阶级专政岂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国人答道：你们所谓民主政治底内容是不是有产者一阶级专政呢？柯祖基著书大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说不合乎民主政治，说不是马格斯主义；其实马格斯在《哥塔纲领批判》中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底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说："（一）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二）颠覆有产阶级底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格斯底主张，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四、俄国底共产党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虽然同一不反对国家组织，〔但〕是他们不同之点有三：（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所以有人说马格斯当初所主张的俄国现在所实行的都算是国家社会主义，这话是不对的。《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

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说："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无产阶级在他们国里争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脱出一切国家的界限，替无产阶级全体指示共通的利害。"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底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格斯所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采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由以上四点看起来，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1921年1月《广东群报》，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署名：陈独秀

教育与社会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讲[①]

今日讲题为《教育与社会》。故向来我国社会与教育，是别而为二的，致结果多不良。余前在高师讲演《社会与教育》时，曾言其概略，兹再反复言之，以尽本题之意义。社会与教育分离，其弊之最大者莫如减少教育的效力。诚以人类精力，本应经济。若教育与社会分离，是即个人之教育，其效力甚微，其不经济实甚。盖社会支配个人，其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其力量小，理至明也。或者疑社会力量未必优于个人，每以孔、佛、耶之学说，能支配地球上一部份人之精神，至历数千年之久为喻，不知世界自有人类以来，中华之孔子，印度之释迦牟尼，欧洲之耶稣，其个人力量之大，似足以支配社会矣。然从实际上观察，其个人之力量，实由社会而产生。试推论之，世人徒知孔子支配人之学说为家族思想，亦即人伦之道。然亦知夫中国之为世界最大农业国，其人皆为土著之民乎。既为土著之民，则重迁徙，鲜往来，其种种风气，皆足以养成人之家庭思想。是孔子之学说，为社会所养成，世人不察，倒因为果，误矣。释迦牟尼亦然。其学说由印度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1月20日。

社会养成，非印度社会为释氏学说所制造。何以见之。印度地居热带，酷暑如焚，人人皆抱厌世悲观之思想，故造成释氏之学说。征之耶教，亦何莫不然。耶教重自由与进取，虽与孔教之家族思想不同，与释迦牟尼之厌世悲观主义亦异，然究其原因，亦以欧洲多岛，交通利便，人民轻于迁徙往来，故无家族观念。且其地属北温带，气候温和，故无厌世悲观思想。是其学说亦由四围环境养成，非由耶稣建此以改造欧洲人类者也。由斯而谈，此三大伟人之学说，非自成之，乃社会成之也。设使耶稣生于中国，亦必主张家族主义；孔子生于印度，亦必尚厌世悲观；释迦牟尼生于欧洲，亦必主张自由进取。要之，孔、佛、耶易地而生，其主张则互变也。从可知社会支配个人之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之力量小矣。此既证明，则教育若离社会而独立，则教育之力量自减，讵得不谓之减少教育之力量耶。

教育与社会分离，足以减少教育之效力，前已言之矣。然实际如何减少，可条析言之：

（一）教育的效力，普遍之力消失，只可及于部分或个人。

（二）学生训练的效力。社会与教育分离，则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故假使学校训练好，而社会不好，其得益仍寡。吾年来从教育经验上，观察此说，最足征信。予见小学生，往往在学校受训练时，极为活泼，极守秩序，极为奋发，极能合群，极不倚赖。惟一入家庭，则此种佳处，即觉销灭。或少壮大学生，在学校时，无不品行纯洁，志趣高超，为一有希望之青年。殆一入社会，则渐染渐深，愈久愈甚，终成为一无希望之恶人。此其证明也。

（三）学术上应用之效力。教育与社会分离，则学生在社

会，自有一种特别阶级。其所学何事，社会无从知之，故社会上不甚注重，不甚相信。此种弊病，在社会固应负一半之责任，而教育家亦应负一半之责任。何以言之？日本兴学之初，其社会亦不相信教育。复由教育家致全力医学、农学两种与社会密切关系之科学，使社会知其利益，其后遂得社会之相信。故欲求学术之应用，必须使教育与社会密接。至我国社会之不相信教育，固由社会与教育隔膜。然农业学生，其所学得之学问，反不如老农。工业学生亦然，一经实用，其成绩反不如一小匠。故欲求社会之相信教育，非教育家注意于上述事情而改良之不可。

鄙意以为以后办学，务使社会明了教育内容，深知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才，及深信教育在社会上之实益。欲做到此层工夫，办农业学校，宜在乡间，办工业学校，宜在省城。为教员者，又宜认真训练学生，作育人才。今社会上感觉旧学者不如新学者，则教育自然得社会之相用。又广州以丝业著名，应办蚕业学校。潮州富于水产，应办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应办农业学校。若在潮州办农校，在北江办蚕业学校，在广州办水产学校，则其所学非应所在地社会之要求，其学术之应用颇易自减，而教育力因以不大。前者言欲，用学术之应用效力大，而令社会了解内容，后者言欲学术应用力大，不可不适应社会之要求。推而言之，而我国各学校所授之经济学，若多用外国理论的，不及国内经济状况，盖此种教授，实属无裨实用也。又如动、植物学，其分配种数，虽甚清晰，而对于我国地方种类，多付阙如，亦有何大用之处。故学术与社会分离，是死学术，学术与社会合，方是活学术。教育与社会离合，于学术应用效力之关系有如此者。

（四）文化普及的效力。我国教育与社会分离，教育对于社会，亦取闭关主义，而广东尤甚。故学校门首，多有挂“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等牌，不准外人窥看，人以为内中有不可告人之处。不知凡学校图书馆等，宜令人人皆可入内参观，使人人皆得增进知识，社会得渐渐改善。故外国图书馆，通俗演讲，均取开放主义，无论何人均可入内观听。我国直采取此法，使教育与社会合。否则教一千学生只一千学生受益耳，讵能希望文化普及乎！以上种种不好之处，皆就教育与社会分离而言。今后希望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使教育效力宏博，则幸甚，幸甚！

1921年1月21—24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在工业学校演说词[1]

——工学生与劳动运动

今天来到贵校，没有什么话说，但在座诸君，多工业学生，我们就在工业上研究研究。现在所讲的——就是“工学生与劳动运动”，这是工学生所应当知道的。

现当来讲这个问题之先，要把劳力的地位说明一下。

在旧式经济学说生产原素是——

一、土地，

二、劳力，

三、资本。

在现世新经济学，对于这三种的观察，觉得不甚满意，何以呢？因为土地纯然一块土地，若不经劳力者开垦，是没有价值，必要加上劳力才能发生效用。例如乡间的土地，不是农人去种些稻、麦、甘蔗、番薯等等，便没有价值。又如乡间的地方，不及省城长堤的价值。所以土地因其所加的劳力不同，则其价值也不相同。那么，土地是附属于劳力之下，自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在资本也是一样，平常的人以为金钱即是资本。不知金钱只能代

---

① 演说时间为1921年1月22日下午。

表资本，像钞票代表金钱一样。所以金钱并不是资本的本身，不过是一个代表的东西。真正的资本是什么呢？就是土地、机器、房屋、原料、粮食五种。土地没有劳力是不成的，已说在上面，不用再说。机器是用铁做成的，铁又是从矿山中得来的，由生铁而熟铁，通通是经过一种劳力的。所以这两种都属于劳力的范围。至若房屋、原料、粮食三种，皆由劳力得来。房屋是泥水木匠做成的，原料和粮食也是劳农的生产，没有劳力，这三种是不行的。机器没有劳力，便不成机器。土地没有劳力，便不成土地。房屋、原料、粮食，没有劳力，便不成房屋、原料、粮食。我们可以说：资本没有劳力，也是没有独立的价值。照这样看来，劳力实在是生产的原素，土地和资本，断不能与劳力平行，要附属于劳力底下。那旧式经济学所说的，是不成问题。劳动既是占着生产上最重大的地位，我们就可以说下劳动运动了。古代经济学说，与现世新经济学说的不同之点，就是：古代把土地、劳力、资本，相提并重，专为大地主所支配；现在所注重劳动方面，因为土地非劳力不能成土地，资本非劳力不能成资本，大地主怎能够支配起来。所以现在说的资本，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乃是开天立地以来的劳动者产下的资本；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我们常说"劳动神圣"，就是因为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所以这样说。

现在也有人反对此说的，他以为今日的世界，不单是专从劳动家得来，还有所谓学者，如制作房屋的工程师。他说的原来不错，但对于劳力生产说，也不能破坏。因为工程师和技术家，不能逃出劳力范围之外，彼用脑力，也是一种劳力。我们解释劳力，不单就体力上说，大凡以体力脑力作工的，一概都是劳力的运

动，不单指以体力作工，才算是劳力的运动。既然是用脑力和体力都是出力，那么：现在的资本家，也许有用脑力的地方，难道也算他是劳动家不成？据我的意见，现在的资本家和劳动家，仍然是有分别的。

一是雇主　　资本家以自己的金钱，来买人家的劳力，谋自己的生活，就是雇主。

一是被雇者　　自己没有资本，卖劳力与资本家，就是被雇者。

所以现在的资本家和劳动家，不是劳力与不劳力的分别，乃是雇主与被雇者之分别。

上面已把劳动运动的理论说了一遍，现在要说工学生的地位了。工学生占什么地位呢？就是占脑力劳动者的生产事业。我也曾说过，工程师和技术家，皆用脑力，都是劳动者。据我的观察，将来社会制度必要改革。但改革至怎样程度为止？大概终须做到把土地、房屋、机器等等，都为劳动者所有，各人都能够独立生产，不为被雇者，去做独立生产的事业。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因为用体力劳动者，把体力卖给资本作工，是一个被雇者；工学生把脑力卖给资本家做工，也是一个被雇者。既然同是被雇于资本家，便是同在一个阶级。那么，工学生便应该和体力劳动者携手，不应该同资本家携手，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所以工学生要和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打破雇主与被雇者，不生分别，没有阶级，便可做成社会上种种改造的事业。

诸君都是工学生要知道自己所站的地位。觉悟脑力劳动者

和体力劳动者一样，要和体力劳动者携手共进？这是很希望的。

（陈先生这番发挥，妙言精义，连出不穷，好像天花乱坠一样，片片喷香，收拾者手腕不灵，也许有挂漏和错误的地方，还要求陈先生更正，和读者原谅。周其鉴、阮熙朝附识）

1921年1月28、29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周其鉴、阮熙朝笔述）

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

——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会演讲[①]

今天本来预定三点钟来的，因为有些小事情，所以稍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高深学说，贡献于诸君。今天各位所定的题目，范围广大，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完，现在将简略说说，这是很抱歉了。这题大约有两种观念：第一种是精神上的，第二种是物质上的。我以为精神上的人生，没有什么标准。人说善则善，人说恶则恶，人说苦则苦，人说乐则乐。譬如中国妇女的生活，有时明明是很痛苦的，因为旧道德支配着，也觉得自己是无上光荣，是无上快乐；还有好些快乐生活的人，有时也觉得是很痛苦的，所以在精神上讲来，很难辨别人生正当不正当啊。

如果就物质上说，较为有点标准，然而非两三句说话就可以说明，古来的解说也很多。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历史上的人生，到今还未曾发见。真正的中国的人生，自古都是很不正当的，不是这一个压迫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压迫这

---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1月23日。

一个。在封建制度的时代，有两种阶级：一是诸侯和地主，一是农奴。诸侯压迫农奴，农奴要受诸侯、地主的压迫。

如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进入资本制度的时代了。又发现两种阶级，代诸侯和地主阶级而起，是政府和资本家，从前的农奴，就是今日的劳动者。资本家能压逼劳动者，劳动者就要受资本家压逼。这种情形，不独中国如此，各国都是一样。又如中国的习惯，男子常是压迫女子的，这是甚么原故呢？难道女子就不是人？应该受男子压迫吗？中国的古训所谓女子有三从之义：在未婚的时候，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你们想还有甚么道理来压迫我们呢。以上所讲的，都是不正当的人生。男子受政府、资本家的压迫，女子们除了政府、资本家压迫之外，更要受男子压迫。然而女子阶级之中，还有些同类上的压迫。好象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还有做奴婢的人，被主妇压迫，也是十分惨痛的。兄弟到广东来，看见这样的现象，格外繁多。所以中国的人生，都是一层一层压迫人家和被人家压迫的。男子所受的压迫是政府、资本家，女子所受的压迫有政府，有资本家，有男子，还有他同类的妇女。故此我以为从前人生，完全是不正当啊。

我如今天论压迫他人，和受他人压迫，不是说男女问题，是说人类的问题。总之人类是不应压迫人家和受人家压迫的。如果说到压字，却是最不正当的。换一句说，正当的人，就是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我现在所说的，不晓得诸位以为对不对。

1921年1月24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

——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①

现在我所讲的题目，是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女子问题，近来研究的人很多，但都零零碎碎，没有系统。所以我今日提出来讲讲，想于没有系统之中，找出一个系统。

今日所谓伦理，大概有两种观念：一种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一种是牺牲弱者抵抗〔帮助〕强者。现在军国主义，都是牺牲弱者的一种，是牺牲弱者帮助强者；与此相反的，就是社会主义，这主义帮助弱者抵抗强者。社会主义中最要紧的是劳动问题，然而劳动与女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知妇女与劳工是社会中最没有能力的，劳工受资本家压迫，妇女受男子压迫。我们今日固要帮助劳工抵抗资本家压迫，尤要帮助妇女抵抗男子压迫。但今日我们专讨论的是女子问题，关于劳工问题，暂且不说。我虽单讲女子问题，然与劳工问题也有关系，因劳动不单是男子的事，女子也与劳动很有关系的。

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

---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1月29日。

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因社会制度，造成了社会的许多不平等的事情；因社会造成个人的不平等不独立，然后方有社会主义发生。讨论这点，妇女问题，自然是连带发生了。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

中国妇女，伦理上的信条，是三从主义。所谓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因在家从父，女子一切活动，都要受父亲的干涉，而做父亲的干涉女儿，差不多当女子是桌上一个瓶，摆在一块地方，什么用也没有；做父亲的，可以将女儿卖给人、送给人，并且他父亲要恭维人巴结人，可随便把伊送人做妻做妾；女子若不肯嫁给有钱有势的人，是不行的。现在中国女子婚姻问题当中，百人中能自由的不过一二人，其余的多是父母作主。父母也不是单为女子设想，不过为自己联络有权势的人，便送给他人做妻，拿女儿作他一己攀援富贵的敲门砖罢了。女子在家从父，可以谓之全然没有人格。至于出嫁从夫，男子叫女子做事，女子不能抵抗，若是抵抗，社会断不相容。做夫的不但可以命令女子，并且也可以卖，也可以送。我们知道的，有许多男子，因吃鸦片烟，把他妻卖去的，也有强迫他妻去卖淫的。有人告诉我，广东有一处地方——我不知是不是——可以将女子租给别人。在古代社会，这种事很多，我固然不信广东还有这种野蛮行为，但或者形式上没有，而精神上也许有的。

现在女子结婚，差不多都是父母贪图富贵；不但父母把自己底人格取消，而许多女子也把自己底人格取消了。广东情形，我知得不十分清楚；至于上海情形，很是可悲：有一个上海很著名的学校，多数学生没有独立的思想，伊们知识虽好，而思想仅得

一个；就是穿着要阔，要时髦。假使有一个不甚时髦，大家就看伊不起，而自己也觉得不象样。伊们最后的思想，就是要嫁一个留学生，回国之后，要做大官。但伊们的衣饰从那里来呢？伊们既不劳动，当然得不到；所以伊们的希望，只有望男子送来。这样的思想，自然把自己的人格丧失了。现在许多女子不想独立，只想穿阔衣服，也是把自己的人格同时丧失的。中国社会上的女子，无论从父从夫，都没有独立的人格；靠父养的，固没有人格，靠夫养的，也没有人格。所以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的问题。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压迫。

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

现在尚有另一问题，许多人可以说：不必社会主义，女子也可独立；不在社会主义之下，也可不受父母男子底压迫。这句话初看来，很有道理，但很错了。因离了父母家庭去谋独立生活，是不行的。何以见得呢？因女子离了家庭的奴隶生活，自然去谋独立生活，但社会是不许的。我们想想：女子离家庭而独立生活，去什么地方生活呢？在什么地方能谋生活呢？无论什么地方，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一部分雇人做事，一部分替人做事。女子若离了家庭，雇人做事呢，还是被雇于人。如果要雇人，直是笑话，不会有的。伊们既不能雇人，一定要受人雇，一定附于资本家，那么，就会变成资本家的奴隶了。从前女子是家庭底奴隶；而离了家庭，便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无论如何，都是奴隶，女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社会主义之下，不是这样。工人资本家没有分别，大家都要作工。所以必到社会主义时候，才能根本解决。女子在家庭，固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也有独立的人格。

我今天所讲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因为女子问题有许多零零碎碎，不能解决，非先提社会主义，无以概括。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经济问题；而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所讲的伦理，不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就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后者就是社会主义。女子与劳动者全是弱者，所以我们要帮助弱者抵抗强者。除了社会主义，更没有别的方法。我以为不论男女，都要研究社会主义，而女子比男子更要奋斗才好。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这不单是女子的事，而男子也是这样。所以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男女实行联合弱者以抗强者，就是我今日讲社会主义的意思。

1921年1月31日——2月1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1921年2月1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只眼。

理发工会成立会演说辞[1]

今日中国的工会，不过开始，成立的实在不多，若在外国，无论那种行业，都有工会。但是外国在数十年前，也是没有工会，和我中国现在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政府不许工人设立工会之故。在政府不独有不许工人设立工会的意思，而且制造一种不合道理的法律，去干涉工人立会；如有人违背这种法律，政府就要将工人拿进监狱去受罪。后来各国的工人，努力奋斗，始得将那种不合道理的法律取消。

我中国现在的法律，也是不许工人立会的。所以在广州有许多工人团体，如广三铁路职工养志团和工余群旅等，都是正正当当的工人团体，因为政府不许工人集会之故，所以不敢叫做工会而改作种种的名称。

这种不许工人集会的法律是什么？就是治安警察法。这种治安警察法，成自何时？制自何人？谅想到会诸君，也会知道的。这种治安警察法律，就是袁世凯所制定的。但有一件事，诸君知道不知道？现在广东政府，对于治安警察法，经已有明文取消了。那么，广州的工人，当然有集会的权利了。而且据我近日所知道的，广东政府，不独取消了治安警察法，而且制定一种工会法，叫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2月10日。

工人依照这种法律和他一定的手续，政府就会准许立案，自然得受法律保护。

这种工会法，不久就可以公布了。现在广东政府对于工人，有这样好意，但你们工人对于自己，应该怎样?请诸君想想!在外国的政府，不许工人集会，而外国的工人，能够自己努力奋斗，卒之战胜政府，将那不合道理的法律取消，得到集会的权利。今日广东的政府，既将有工会法，许工人集会，所以我们工人应该有较大的责任，假使尚不肯努力做去，未免自己看得太低，不知自爱了。

我到广州虽没有多久，但我知道工人的团体，表面上虽有许多；如职工养志团，机器工会，工余群旅等，都是工人的团体。但观察他的内容，实无组织之可言，不能叫做工会，而且连章程都没有，我今天见到贵会的章程，是我第一次在广州得见到工会的章程的，所以我对于贵会，发生两个感想：

(一)有详细完备的章程；

(二)到会者多是纯粹的工人。

除了以上两个感想以外，还有两点，希望诸君努力做去的：

(一)广州理发工人有四千多，而今天到会的，不过数百人，与全体工人相比，不过十分之一；所以我希望各位努力去联络同业，务要全体同业结合成一个大工会。

(二)现在贵会虽然有章程，但将来人数增多时候，有一点地方，应该修改的。因为现在贵会的章程第八项所有评议股与庶务股会计股文牍股纠察股交际股平列，是不对的。无论那种团体，评议部都应该独立，因为庶务等属于执行的，评议股是属于立法的。将来贵会修改章程时候，最好将庶务股会计股文牍股

纠察股交际股等合成一部，叫做执行部；评议股独立一部，与执行部对抗。所有什么事，都由评议部议决，交执行部执行，所有执行部职员，也由评议部选举。至评议部的组织，最好由各街各路选出：如西关有若干同业，应该选出若干评议员；东堤有若干同业，应该选出若干评议员；然后由全体评议员共同组织评议部，这样组织方好。

至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各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我很希望诸君将来肯匀出一点时间入劳动学校读书。

我对于贵会的希望很多，但因为时间不多，而且贵工会已经成立，将来见面的日子亦很多，我改天再谈罢。(1921.2.10.鸣谦笔记)

1921年2月13日《劳动与妇女》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

致周豫才、周启明信

豫才、启明二先生：

《新青年》风波[①]想必先生巴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如何，乞赐复。

弟　独秀

〔1921年〕二月十五日

1979年5月15日《历史研究》第五期

---

① 1921年2月初，《新青年》第八卷六号付排时，稿件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搜去，并罚洋五十元，不准在上海印刷。

致胡适之[①]

适之兄：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②]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

弟独秀白〔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原件存北京大学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胡适于1922年5月7日创刊《努力周报》。

讨论广州社会实际问题[①]

影画戏院问题

电影戏也是社会教育之一种，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提倡，一方面却要十分注意。我们中国人受了旧戏剧中怪力乱神等恶的感化已经不少，现时影戏怎么样？

影戏中最要不得的就是侦探片，有许多国里是严重禁止的，我们中国影戏场所演的大半是侦探片；看的人大半也喜欢看侦探片；实在不是好的现象。

侦探影画片最能养成人机诈作恶底心理，并且能教人以机诈作恶底方法，例如上海阎瑞生杀害妓女莲英底案中，完全是模仿影戏。

广州某影画戏院竟有秘……秘……秘……密……大秘密的广告登在报上；这影片或者非侦探片，但看他告白中"黑中秘"三字，已令人见了毛骨悚然！

听说某影画戏院底经理人还有点知识，奉劝他以后要多演点科学片及新剧片，不可再演侦探片了；侦探片的影戏是警厅应该禁止的呵！

1921年2月19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① 《讨论广州社会实际问题》，由七篇文章组成，现查到"引言"、(一)、(二)、(三)、(六)计五篇，我们选了第(六)篇。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

季陶先生曾说：此时不是劳动运动，是运动劳动运动。我们也可以说：此时不是妇女运动，是运动妇女运动。此时不但他们自己不肯运动，还有些劳动者以为运动劳动运动的人是多事，有些妇女们也以为运动妇女运动的人是多事。

照这样看来，我们还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做什么？

自来伦理思想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一是扶助弱者以抗强者。

前一派伦理，在心粗的人看起来，这种不合人道的思想算什么伦理。其实我们人类自古至今的历史，都是这种伦理思想造成的，我们现在所见所闻所行，一概是这派伦理的现象；人类将来的历史纵然有点变化，而人类对于其他动物的伦理观念，恐怕难得脱去损弱益强的老脾气。在将来的理想，无论我们如何不赞成这派伦理；但在过去及现在的事实，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

后一派伦理，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将来的理想。过去及现在的伦理、历史，都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的伦理、历史；其中最显明的，就是牺牲劳动者以助资本家，牺牲妇女以助男子。社会主义正因为扶助这两种弱者，抵抗这两种强者而发生的。

这两派对峙的伦理思想正在拚命的血战中，我们应该取那

一派呢？我以为应该取助弱抗强的社会主义。这有什么理由呢？我以为这理由乃建立在社会学学者所说的"同类意识"上面。

各种动物的"同类意识"发展不等，乃是我们人类进化到今日庞大的社会之一大原因。但是我们人类这种意识固然比其他动物发展，而仍然日在进化中，还未曾尽量发展呵。劳动者不是我们的同类吗？他们穿的什么，食的什么，住的什么，知道什么，无日无夜的委身那毫无乐趣的劳动，和没有知觉生命的机器有何分别？妇女不是我们的同类吗？本是人类底母亲，反变了人类的奴隶；不寄食于父，便寄食于夫；得意者也等于珠围翠绕的娼家，失意者便是日暮无归的乞丐；至于一般受虐待的养媳婢女，更过的是极人间悲惨生涯。

我们若要尽量发展我们人类可贵的"同类意识"，对于我们同类的弱者劳动与妇女，便应该发挥真挚的同情心去扶助他们。这就是我们应该采取助弱抗强的伦理之唯一理由，也就是我们所以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之唯一理由。

1921年2月20日《劳动与妇女》第二期　署名：陈独秀

辟　　谣

——告政学会诸人

前在报上见过章秋桐①君论“败律”那篇文章，后来又听说他出洋读书去了，我很赞成他这种态度，我并且很希望政学会诸人都取秋桐这种悔悟的态度，方不是精神上永远绝对的失败。

近来看见三月八日的上海《中华新报》（这报是政学会底机关报是人人都知道的）上，有一篇广州归客谈，前一半载了广东政界许多谣言，后一半说的是陈独秀“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说我“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同时民党暴徒如夏重民、吴铁城等又从而附和之，……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各校学生及看报的

① 章秋桐，即章士钊。

人应该知道，用不着我辩正的；夏、吴两君曾否附和过这种学说，学生家长是否有饬令子弟退学之事，都有事实可以证明，也用不着我辩正的。

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能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合乎社会需要的道德，提倡犹恐不及，如何言废？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大腹贾以外，没人肯主张罢！

《中华新报》有了这段荒诞的记载，同时温宗尧氏所支配的广肇公所也有同样论调的电报给政府当局，因此我不能不正告政学会诸人道：你们应该纳秋桐底忠告，采取磊落光明的态度；即或不能，也不应该因政治上之感情，迁怒于教育界，并且以稍有常识者所不信的谣言诬及教育界之个人，说是“禽兽学说”，说是“滔天祸水”，说是“广东之惨象”，这种政客作用真可谓异想天开；我奉劝你们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向精神上永远绝对失败的路上走。

我以为广州底言论界及学生界都有辟这种谣言的责任。

1921年3月18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

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

我们中国历来私人的历史家很少，留心记载当时历史材料的历史家更少；因此，我们要研究前代社会状况，读小说往往好过读历史；但是这种小说家兼任历史家的习惯，终是小说历史两方面发达底障碍。

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的好现象。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

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材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底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的《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一九二一年四月叙于广州看云楼。

《红楼梦》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我近几年来细细研究我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到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我的惭愧悲愤哀伤常常使我不肯附和一般新旧谬论。

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

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

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底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底大毒。

《民国日报——觉悟》上，太朴答存统的信中说："我相信中

央集权的政治组组与中国的国民性不能容，马氏主义是中央集权，故我不信其能实行。"又说："中国底国民性既不容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而中国底社会情形又向来是无政府已惯的，所以一旦要行起劳农政治，要组织强有力的中央机关，我真不知其可也！"又说："我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太朴先生这几句话诚然不错，但我以为若要迁就中国国民性和社会情形而不加以矫正，只有袁世凯、张勋一班人绝对赞成罢；因为袁、张都正是口口声声根据国民性和社会情形发挥他们的主张呵！

我发誓宁肯让全国人骂我攻击我压迫我，而不忍同胞永远保存这腐败涣散的国民性，永远堕落在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

1921年5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署名：独秀

告 劳 动

劳动诸君，你们的困苦你们自己都知道，不用我说了。你们的困苦也决不是枝枝节节可以解决的，现在要紧要奉告诸君的，就是各地方各行业之劳动都必须知道必须遵守的两条大义。

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粮食是诸君种的，衣服是诸君缝的，房屋是诸君盖的，矿山是诸君开的，一切车船机器无一不是诸君造的，全世界的东西都由诸君做成，全世界的权柄都应该归诸君执掌，现在诸君却为什么还这样困苦呢？诸君知道诸君的困苦是从那里得来的吗？不用说了，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都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了，诸君要做工糊口，而没有土地机器房屋等工具，所以不得不把力气卖给资本家做他的雇工。资本家给雇工的工钱仅够糊口度命，其余大部分利益都归到资本家的荷包，因此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诸君的困苦就是从这里来的。诸君想要免除困苦，非把资本家私有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改归劳动界大家公有不可。这件事却不是少数劳动者可以办得到的，并且不是一些主张不同方法不同各个自由奋斗的散漫团体可以办得到的。必须各行业各地方之劳动者都觉悟到：各行业的雇主资本家是一个阶级，各行业被雇的劳动是一个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害是永不相同的。资本家阶级组

织了政府国会，有了这些权力，所以才能够压制劳动，所以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劳动向来没有组织，不能团成一个阶级，所以显不出你们的威力，所以才永远是困苦的雇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各行业的劳动组织成一个阶级，决没有反抗组织强大的资本阶级的力量。没有反抗资本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工具夺归劳动界公有。生产工具不归劳动界公有，劳动的困苦决不能免除，这就叫作阶级的觉悟。

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自古到今，所有的国家政府国会，都是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组织的，与劳动平民没有关系，所以劳动平民的困苦，他们向来不闻不问。这也怪不得他们，只怪劳动自己没有阶级觉悟，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政府国会，来解决自己的困苦。减少工作时间自然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时间虽然减少，若是工作上加增了繁重，仍和不曾减少时间一样。加增工钱自然也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物价跟着工价涨了起来，仍和不曾加增工钱一样。所以这等枝枝节节的要求，决不是免除劳动困苦之根本方法。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决不能解决劳动界困苦，劳动界决不可依赖他们，所可依赖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劳动革命军。

1921年6月7日《共产党》第五号　署名：TS

随　感　录

卑之无甚高论

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

罗素离中国最后的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面说，“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不彻底，更要责备他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反背了。我独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他又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提倡少数人专政。我也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

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底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

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种事实决不是高论能够掩住使我们可以不承认的。

吴稚晖先生说："现在只好令列宁杀了我们，然后我们再杀列宁。"我想吴先生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不专为老腐败而发，也并为一般自命为觉悟的青年而发。

可怜我们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逼迫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

我希望不愿意民族的自杀之人，勿闭起眼睛妄发不认事实自欺欺人的高论！

革命与制度

社会底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倘革命后而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算是捣乱、争权利、土匪内乱，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若说制度总不是好东西，不如根本革了他的命；这种高论或者有人以为如此才算彻底，其实旧制度正可借这种高论苟延残喘；因为凡是一种制度，都有他所以成立的理由和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势力，非有一种新的制度经过人们努力建设，成了舆论，成了法律，在事实上有代替他的势力，他是不会见了高论，便自然消灭的；所以不切于实际需要的高论往往可以做旧制度底护身符，这种高论只算是低论罢了。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只可以改造变形,要说人类可以绝对不要政治,这话此时还没有证据。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政党只可以改造,要说政治可以绝对不要政党,这话此时也还没有证据。无论是有产阶级的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似乎都算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究竟多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

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有人说,在有产阶级的政治之下,由金力造成的政党,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是无法改造的,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

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而又不象欧美人做机械的奴隶。"又说:"中国政治改

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

罗素这两段话，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

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1921年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署名：独秀

答张崧年[1]（中国改造）

申府先生：

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吴先生此话正和你的见解相同。

你说："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我想正当的爱国心（我近来以为爱国心当分正当、不正当二种，正当的若朝鲜之抗日本，爱尔兰之抗英伦，不正当的若日本英伦之侵略政策）便是这样发生的。我因为说实话，惹了几个精神病患者大惊小怪，想不到你也看出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2]的程叙不可。其实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不是容易的事，我现在最可恶闭起眼睛说大话的人 罗素对中国人临别赠语，开口便说中国人欠诚实，真是一针见血的逆耳忠言！关于欧洲近状，请月赐一信，在本志发表。

独秀　一九二一，七，一。

《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

① 原标题为《答张崧年》（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张崧年即张申府。

② 张崧年给独秀信中，有一段话："我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叙应是：革命。开明专制（美其名曰劳农专政——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

讨论无政府主义①

答区声白的信②

声白先生：

在《群报》上看见你的来信，对于我的意见加以纠正，我很感谢。先生所见也有些和我不同的地方，兹条复如下：

(1) 照先生的意见"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我现在要设一个例请问先生依无政府主义应如何办法：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那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

① 区声白对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曾三次致函陈独秀，申述无政府主义观点。陈独秀也三次复函答辩（均刊于《广东群报》后汇集《新青年》九卷四号。这里仅收录陈独秀的三封答辩信。

② 原标题为《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

先生说"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种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若因为两派有重大的意见，并且由于两派的同意，退出一派，这种不幸的事，就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或他种团体也是有的，并不须到了无政府时代才有这种妙法；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产业界的好现象，偶一为之，已经不妙，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验上熟练上秩序上看起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我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完全不适用于经济方面。

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内意见不同的份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份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所以就是对于资本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

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2）我所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的道理，上面已经说过，因为联合无论大小，都要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维持得比较的长久一点；若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先生举出两个自由组织的例，一个是救火，一个是五四运动①，

① 《区声白致陈独秀书》："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证，中国有一种旧习惯，每逢一地方遇了火警，各地方的居民都很踊跃同往救援，无论在冬天雪夜，一闻告警，即争先恐后，跑到患灾的地方，救灾的时候，无论怎么危险，亦没有畏避的，患灾者对于他们，亦没有什么酬报，社会亦没有替他铸铜像，大总统又没有给他一个嘉禾章，又没有下过一道命令各地方居民如不联合救火的就杀无赦，法律又没有规定不救火的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如果是邻近的，尤可说是恐怕连累，但是很多在城中由极东跑到极西的。因一处地方的灾难，各地方的居民竟能以一最短促的时间，自由联合起来，可见联合与自由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又如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而联合数万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运动，更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法律没有规定，如不联合就要处无期徒刑，又没有军队来强制他，如不遵从就格杀勿论。不特是这样，能够以法律绳人，军队压人的北京政府，竟要屈服。于此更可证明法律之无用，军队之无能，而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

实在是妙想天开了。

先生要晓得救火是一桩偶然突发的事，他的目的极其简单；五四运动是一时的群众运动；若是拿这两个方法用在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来证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合，无政府主义真是破产了。人间社会是何等复杂，其间感情利害目的是何等纷歧，至于生产事业上时间的适应及分业的错综更是何等麻烦，拿一时突发的状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处置，我以为是常识所不许。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

再进一步讨论，即以救火说，七手八脚的各人自由行动是否比有组织的救火会更为有效？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由此可见先生所引的自由联合的例，纯然是用在偶然突发的事件和政治问题之群众运动，尚且不尽是自由联合；何况是重组织尚秩序关系复杂的经济方面、生产事业上，自由和联合更是不相容的了。

先生说，"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这几句话我十分赞成，我希望先生认清了这个观念，切勿贪图超越这个观念以上的空想。但先生要注意，先生主张对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扩充至少数人甚至扩充至多数人！在先生仅仅是不承认他个人的自由，在他是个人受了多数人的压服了；先生若说因为他不顾社会的福利，他便说，自古受人压服的

人都是被人说不顾社会福利呵！自古压服人的人都是说为了社会福利呵！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3）先生说："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这句话我也十分赞成；不但无政府的社会，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是由社会上有选举权的人多数意思，决定几条必要的法律，好维持社会上公共的安宁秩序。先生的法律观念，是临时的一种公众意见，这就叫做"自然法"。按自然法多由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法却是万分危险。过于铜板铁铸的法律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法律当然要修改，但不能拿这个做绝对废除法律的理由；至于先生所谓随时变更的公意，却实在不敢领教了。第一，我们实在没有这种预知的天才能够适合随时变更的公意而不违背；第二，随时变更的公意完全是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公意有时固然能为善，有时也能作恶；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挪萨，巴黎市民杀死桑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教徒，象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的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先生还说是康庄大道，还说是除了盲目的人断不至撞得头破额裂，我们实在不敢附和。

再答区声白书[①]

声白先生：

前天在《群报》上看见你的答复；现在再略陈鄙意如下：

1，先生不赞成个人绝对的自由，我很佩服你的见解比别的无政府党好得多（我在《广州晨报》上见过几篇文章，一面说他们是共产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他们曾反对过；一面却口口声声说："我们主张极端自由，不是多得少得"，"我们既赞成安那其，而要求绝对自由。"），但是先生所主张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之办法，我却有点怀疑：一、你说施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我请问照你的说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末，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这才真叫做走途无路了！二、你说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请问照这样告诉他，他仍然固执，那便怎么样呢？即以你对岭南学生而论，你总用过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效果如何呢？先生说："便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屏斥亦奚足惜。""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是自由的大敌。""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这些话我们都很以为然，因为若不共守信约屏斥一群之敌，便不能保这群底组织及利益。换一句话说，信约既定之后，我们便不能容忍不顾公共利益的少数人有"主张极端自由"、"要求绝对自由"之余地

① 原标题为《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

了。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尽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煽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面，至于成立法律底手续，几个人订定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2，天下事始而赞成继而反对始而愿意继而不愿意的情况很多，爱情的夫妇还有决裂离异的时候，何况别的事。先生说："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我便问你：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末，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3，在这一段，先生和我的意见不甚相差，便不必讨论了。但先生要注意的，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4，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先生自己想想矛盾不矛盾，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

细心看一下。

反乎自由的事三种：(甲)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象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这种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是不应该有的；(乙)为一群或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丙)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我们所讨论的是(乙)(丙)两种，我在女子师范演说的是(甲)种，先生如何并为一谈呢？自由平等虽是好名词，但不可当做万应丸到处乱用呵！譬如资本家之自由也是先生所不承认的了。

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的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5，法律底作用在消极的制止，我们未曾主张并且自古也少有订一条法律积极的要人做一件什么事。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这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底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如果都象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可见一方面主张人人同意及自由，一方面又说主张大团结大联合，直是自欺欺人！

6，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请问：驱逐他到什么地方？

7，契约是各团体一部分人的私约，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

约，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在社会学上，团体、群众、社会这三样大有分别，万万不可以混同。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法律的大作用只是保护社会公共的安宁利益及裁制侵犯他人法律上的自由。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借法律侵害善人，执法者不守法律，法律本身都不受过；凡是这等弊病，就是公约契约都不能免。因北京政府的法律之无价值，便可以推定现在及将来各国底法律都无价值吗？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便可以绝对废除吗？世界上凡不是万能的东西都应当绝对废除吗？无政府主义万能吗？科学万能吗？教育万能吗？世界上何物万能？

8，有群众便有群众心理，并不是古代或宗教时代特殊的现象。法人杀死柔勒及五四运动和宗教迷信有什么关系呢？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三答区声白书①

声白先生：

你在《民声》上答复我的话，越说越支离了，不能不再详明告

---

① 原标题为《陈独秀三答区声白书》。

诉你一次。

1，这段里面，有一句原文为“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群报》上脱了“普遍的”三字。我的意思是：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北京所办的教育即或假定是善良的，然要靠这一点星星之火，慢慢地达到你所说“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的状况，真是河清难俟了。

据你的话，可见善良教育未曾普遍以前，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很多很多，试问你如何处置他，这便未免是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大障碍了。如此看来，请你还是快去努力施行善良教育，且慢谈无政府主义。你说，“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的份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的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你这种说话和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底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我们也相信教育的功效好过法律，我们且相信教育是改良社会底最后最好的工具，但不能迷信教育万能更不能妄说教育的力量还未灭尽恶人以前即可以教育代替法律，因为若有许多许多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不肯去受善良教育，请问你又如何办?我想你们无政府党又要说我：“是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他所预防的弊病——不可

能的证据，完全是被现世的景象骇昏了所致。”这几句话正是你们无政府主义者致命的病根底病根所在。我只简单请问：你们所说进化的无政府社会，是用人力从这现世的万恶社会渐渐改造出来的，还是用符咒把现世的社会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崭新的无政府社会和现世的景象没有连续的关系呢？办教育不必倚靠政府，现时资本家私立学校都做得到，这并不待无政府党底指教。你所谓“人民的责任”，请问这人民若兼指资本阶级，他们的教育可会有真是善良的一日？这人民若单指无政府党社会党，善良的教育一时又何能普遍？

2，我问你在岭南的效果如何，不过希望你实地感觉“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不见得人人都肯听从，因此可以悟得有时不得不用势禁以济理喻之穷（能理喻自然更好），并不是劝你以武力强迫怒目相视对待岭南学生。岭南学生对于你诚恳的传播主义反对宗教等说话果有感情果然相信吗？这件事何、刘、陈诸君都知道，说谎话是最可耻的事啊！

3，自狭义的契约说起来，和法律底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前函已说过，你何以未看清楚？但自广义说起来，法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有人称法律是社会的契约（或称民约），前函所以说：“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可说：“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你所说的契约和法律底不同，更足证明法律底必要；因为若无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间契约底标准及监督，便必然会发生两个弊病；第一是没有监督无以制裁违背契约底责任者；第二是没有标准无以制裁侵害甲种人权利的乙种人底契约发生。救济这第二个弊病，正是近代发达的国家制定进化的统一的法律

之大功，这种法律进化的大功在我们人类进化历史的过程上是断然不应该蔑视的。古代各部落各地方有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信仰习惯，遂有种种不同的法律，因此遂发生种种冲突种种战争，后来因为国家进化法律进化，这种部落的法律地方的法律含有地方性的国家法律渐渐消灭，国内的冲突战争也跟随着渐渐减少；所以近来颇有人主张建设统一世界的大国家，订立更进化的更统一的有强制力的国际法律（现有的国际法因为非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没有强制力，所以无效），好渐渐消灭国界消灭国际战争；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理想是进化的，而且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想不到你们竟然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竟然以为全国统一的法律不好，竟然主张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难怪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是退化的学说，因为照他的主张实行起来，在经济上必然要回复到手工业时代，在政治上必然要回复到部落时代。即让一步，依你所说国家所订定违反各地方的习惯心理强制各地方一体遵守的统一法律不好，要依各地方的习惯心理自行订定自由契约才对；我们现在要研究的，第一是这种地方自行订定的契约底性质，第二是他的效能。第一关于性质方面的研究：(一)请问你既然力说法律和契约不同，为什么称国家订定的是法律，各地方自行订定的是契约？(二)你若说有制裁力使人必须遵守的才是法律，我们真不明白任人不必遵守的契约是一种什么东西？(三)若说国家统一的法律是不能尽合各地方的习惯心理的，我请问，各地方内各村落各团体各个人间底习惯心理是否都是一样？(四)若以是否经过同意分别法律和契约底不同；代议制是你们不赞成的，那末，个人间团体间的契约还容易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若地方的契约（其实就是地方的法

律)要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岂是容易的事?(五)即令可以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试问又如何经过定契约时还未曾出世之人的同意?(六)即说不避麻烦,凡在一个地方范围以内有一个新出世的人都要征求他的同意通过一次，那末对于还不会说话的儿童如何征求他的同意?(七)如果不经过他的同意,别的契约不用说,关于儿童直接身受的儿童规约，是否也和你所谓只有一方面创制权的法律相同?(八)若说契约底同意权应以相当的年龄为限,现象怪极了；因为你们主张对于未出世的人还不能剥夺他的同意权,试问为什么已出世的人反来要到相当年龄才有同意权,这种规定年龄的契约又是不是只有一方面的创制权呢?第二关于效能方面的研究:(一)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准许吸鸦片烟或赌博，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二)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拥戴出一个皇帝或选举出一个总统，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三)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有损于他地方他团体底利益或有害于他地方他团体，他地方他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照以上两层研究，在性质方面，你所说的地方的契约，实质上就是地方的法律,无论他是否好过你所谓全国死板板的法律,这是地方法和统一法良否比较的问题，不是根本上法律应否存在的问题,你拿他来否认法律,算是文不对题;在效能方面,正赖有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各地方契约底标准及监督，才可以维持各种契约底效能。你说立法权是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不在人民全体;请问瑞士及美国都有全民直接投票的创制权,是否立法权都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请问你

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得人民全体底同意？代议制度是永远不能废掉的，你何所证明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真是跟着一般浅见的人瞎说！不但没有可以容纳全世界人全国人全省人全城人开会的会场，就是全民投票也不是常常可以举行的事。全国交通开会议时，若全体人员到会，岂不因之交通断绝？又如你们若开全世界无政府党大会，果能全体党员列席吗？所以除了用代议制度没有办法。你有何种理由可以举出一个中国和日本底治安警察法，便全称肯定所有政府制定的法律都不是保护人民的？你说："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的人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你主张全体同意竟极端到这样可笑，我且问你：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一一得到未出世人的同意，是否不许无政府制度先他而存在？你倘没有充分的理由回答我，我便不能不可怜你脑筋坏了！

4，你说，现在之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当可绝迹。我说：这种人不绝迹如何能够到真正共产之世。我再正告你一次：共产之世仍旧是我们这万恶的私产之世渐渐改造出来的，并不是用符咒把这腐败的旧私产之世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新的共产之世与旧的私产之世没有连续的关系呵；你说：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了。我们不知道你所说对待资本家的手段是什么？用手枪炸弹对待他，未免小题大做了；用刑法制裁他，你们是反对刑法的；没收他的财产，那时已无私产了；剥夺他的选举权，你们是反对代议制度的；用诚恳的态度劝告他，他是不听的；拉他到学校去受善良教育，他

是不肯去的；送他去到远方，未免是以邻为壑，终是没有办法，只好任他为恶而已。你所说的乃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以叫做一个社会，这是团体不是社会，你是学哲学的人，难道团体与社会还分不清楚吗？一个社会里可以包含许多团体许多机关，社会和单一的有界限的家庭学校工厂学会党派等团体不同，也正和单一的有界限的监狱等机关不同，所以不能退出。若但是退出这个社会，跑到远方，远方那里也有社会；除非跑到空山无人的地方或是自杀，才算是退出了社会。

5，你只看见第二十七条①自由自治等合味的名词，你可曾注意到第三条加入底限制及课各团体底义务？又可曾注意到第四条所说"本总联合会由一个国民委员会支配之"？又可曾注意到第五条所说：管理委员会是由国民委员会指命的，各团体间底冲突是由管理委员会裁判的？又可曾注意到第九条所说"国民委员会实行各国民大会底决议干涉关于劳动者阶级的一切问题，决议一般性质的一切问题"？这是不是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正因为他仅仅只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而犹迷信各团体底自由自治，未能完全权力集中，所以不适于革命。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6，我原来知道你不是相信Stirner派个人无政府主义的，

---

① 指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会章》条文。

但你却是相信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种思想仍旧建筑在个人的自由权上面，系[像]这样一面赞成社会的联合一面又主张个人的自由之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Stirner反社会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有了社会的组织，个人的自由便要减削，社会的组织越庞大越复杂，个人自由减削的分量越多。我原来知道你也不是相信Toktoi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象这样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Toktoi无抵抗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于少数压服多数的事；例如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的人，在一个社会里无论是多数或是少数，当然要抵抗资本阶级，当然要压服了少数或多数顽强拥护政府及私有制度的资本阶级，然后无政府共产社会才能够现实的。假定我如果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宁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而不相信克鲁泡特金；因为斯悌纳否认社会的组织，在理论上才算得把个人自由底障碍根本除去了；托尔斯泰看穿了抵抗、强力、政府、国家、法律、军队，这些事是必然相因而至的东西，他又看穿了个人的自由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多过机械工业时代，大交通大工业越发达，法律的强制力之需要也跟着发达，个人的自由遂跟着减削，所以他极力反对工业交通等一切物质文明。这两人底学说思想是否向着人类历史进行的线路逆行，这是另一问题，可是他们的学说思想都是一贯的而不自相矛盾，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至于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的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

服少数；这种矛盾的学说，不但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并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你若真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劝你还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才对，因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只有求教于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及无抵抗主义；若离开了个人主义和无抵抗主义那强力、政治、法律等，一切抑制个人或团体自由的事便必然不免，所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我所以说你若是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便是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粉碎。

7，抵抗必须强力，只这一点已经使你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露出很大的破绽。你现在说抵抗和压服完全不同，并举朝鲜独立及夺回贼赃为例；请看朝鲜已经抵抗了日本几次，若不由抵抗达到压服日本的程度，日本如何肯让他独立？你若不能压服盗贼，那能夺回自己的东西？你既然不敢附和"以暴易〔暴〕的办法"，那末，将来推倒资本阶级以后，你们无政府党一定反对以资本阶级压服劳动的办法压服资本家了，难怪有人说无政府党是资本阶级底好朋友！

8，我在女师底演说是："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分明是指物质的生活上普遍事项而言，前函已分析说明这是属于反乎自由的(甲)类，是指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象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并且珍重告诉你，现在讨论的是(乙)(丙)两种，女师底演说是(甲)种，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你如何仍旧并为一谈？政治上革命者压服顽固党，教育上教育者压服受教育者，和物质的生活上人人不应受无理的压迫，试问有何冲突？在一群之

内，人人能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意见以就他人，那自然极好；我所问你的是：若在一群之内处于万万不宜分裂的境况，而少数的顽固党对于一个关系一群存亡的问题，坚不肯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私见以就他人，拉他去受善良教育，不但他不肯去，而且也来不及了，请问此时除了压服他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你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上若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不能成功？又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革命后没有多数的顽固派？俄国底十月革命是不是少数人的运动？现在他革命以后，在国民全体上看起来，是不是顽固派仍居多数？我们中国倘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你想能否成功呢？你是否反对以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呢？

9，你这一段话我大部分莫明其妙，所说的比方，我想多数读者也都莫明其妙。我并未曾说你说过惟资本家方能够联合，我只说："倘然能够这样（即指资本家的产业联合而自由而人人同意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我曾问你：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你既然理屈词穷，最好是一字不答；我真想不到你竟然说出："既以自由契约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这样可怜的含糊搪塞的话来，将我问的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人人同意及有无强制执行等话，一字未答；并且你自己硬说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你虽不敢再

行讨论，我还是要再行讨论；我还是要严重的问你：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有须得人人同意的自由及无强制执行的自由？倘能够这样自由，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你讴歌崇拜了；倘不能够这样自由，这种联合而不自由的自由联合，（近代资本主义之下，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投资、自由契约、自由联合，都是资本家底不法自由，资本家产业联合是自由的，联合起来办事的条规是不能自由的。）在你引来证明你"自由之与联合绝对没有冲突"的主张上，试问有何意义？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用去劳力的最大部分是替资本家做工，不但可以解辞职务，就是怠工罢工都是合理的；在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完全是替社会和自己做工，不但无正当理由不应该自由退出，并且怠工罢工都应该受相当的制裁；你们倘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你们倘以为这样不自由的办法比现在雇佣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深，你们还是去跪在资本主义脚下享受那奴隶的自由罢！

10，广州两个学生会现在已经联合起来没有，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如是：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一切交通机关，如果都象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分裂之后不同意再分裂，分之又分至于个人而后止，如此小团结小联合都不成，大团结大联合更怎能够成立呢？即令广州两个学生会已经联合拢来了，这因为他是学生会还不碍事，倘若是生产机关或交通机关，那分裂到再联合起来期间的紊乱损失，谅无人能够否认。我们并非有意反对人人同意自由联合的理想，乃因为这理想在许多事实上分明是不可能的，为大团结大联合的目的计，不得不承认有强制那不合理的不同意部分服从那合理的部分之必要。这种情实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邻国及陆荣廷之掠

夺广东远非一类，何得举以为喻？

11，社会和团体不同，不是单一的，不是有界限的，不是有门可闭的，抬出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还是不曾离开我们的社会；若说送到远方，把这种(常不尽责任而且常侵犯他人自由的)人送到远方底社会，岂不是以邻为壑吗？

12，个人与个人间的契约，尚可望拿道德名誉信用来维持，有许多人不顾名誉道德信用，还是有法律制裁的必要；至于各团体间及个人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这便复杂了，便非道德名誉信用所可维持的了。找第三者排解，这本是现在的社会中常有的事，正为有恃强欺弱的人不容排解，所以才有法律制裁的必要。照你说："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象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那末，你虽反对法律的制裁，却很赞成武力的制裁了；因为协约国若不用武力，如何能干涉德国？你说："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他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我对你这段话有三个疑问：(1)协约国果然未曾压服那一国吗？(2)协约国之上倘然有一个中央统治机关——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机关，国际的强弱吞噬纷争岂不可以减少一点吗？(3)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果然也和协约国一样吗？将来政治上的自由联合，你举协约国为榜样；将来经济上的自由联合，你引克鲁泡特金所举欧美资本家的共同企业为榜样；恐怕有人听了你这些说话，会以为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已经在欧美各国实现出来了。

13，可以利用群众心理的一二人，乃是置身群众之外，有自动的意识来利用群众之野心家；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中，个人的意识为群众心理所压迫，往往失了理性，被动的无意识的随

着群众走，所以不能利用群众；请问这有何矛盾？我们始终所讨论的，是法律可不可以绝对废除的问题，不是法律有没有万能的问题，这一层你要弄清楚。固定的事，自由契约的力量能维持，那自然无问题；现在的问题，乃是自由契约的力量不能维持时如何办？我对于绝对废除法律的疑问就在这一点。一时的事，或为法律条文未备的，或法律条文已与现社会生活状况不相应而一时未及修改的，也不是绝对没有就公众意见来解决的先例。但这种公众的意见，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以轻用，其理由有三：(一)是因为公众究竟是什么？有何标准范围？(二)是因为所谓公众的意见，是否野心家在那里利用群众心理？(三)是因为多数知识浅的人所发真〔表〕的公众意见，是否合乎其是非也是一个问题。拿这种惝恍迷离不负责任的公众意见偶然来补助法律，已经是非常的革命的现象了，倘拿他来代替有固定性的比较可信的法律，真是大错而特错。天下事虽是千变万化，法律也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定法律的人虽没有预想的天才，但他也不能禁止后人以相当的手续加以修改的。未经相当的手续修改以前，法律自然是应该死板板的不能更改，这种死板板的固定性正是法律的好处；倘毫无固定性，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所谓人民到底是些什么人多少人，如此野心家烂仔都可随时以人民的名义修改于自己不便的法律，无政府党主张以公众的意见代替法律之大缺点正在此处，你如何反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最完美的地方。

* * *

在以上讨论的范围以外，有二点不得不附告读者：

(一) 声白虽相信无政府主义，却也极力赞成阶级战争和革

命的行动；现在和我讨论的大半是远的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题，若劳农俄国现行制度，他也认为革命时代过渡时代之自然现象，并不加以非难。(二）声白底思想是信仰克鲁泡特金的，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什么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一概反对；他的行为算得是一个纯洁的青年，绝不象一班"下品的无政府党"，我很为中国无政府党可惜少有声白这样的人！

1921年8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答何谦生(同善社)

何先生：

我在北京时就听得同善社有许多妖邪举动，后来更知道长江一带信奉邪说的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是广东现在也不少了。主持其事的人无一不是有形无形的辫子朋友，信奉邪说的大都是政界军界极腐败不堪的分子，劳动界学生界信奉邪说的都极少或竟即于无。这种邪说较之灵学会野心更大，简直是白莲教、义和拳底后身，且含有复辟作用，只有用刑法来裁制，那里够得上加以学理的批评。

独秀一九二一，八，一。

《新青年》第九卷　第四号

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和森先生：

我前几天回到上海①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

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②，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

---

① 1921年8月17日，陈独秀电陈炯明辞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9月9日，教育委员会职员特开祖饯大会欢送。（1921年9月10日《广东群报》）陈独秀抵沪时间，约9月中旬。本文末的"八月一日"是该号《新青年》所标的出版时间。

②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给陈独秀信中说："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持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持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

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先生以为如何？此理说来甚长，我这不过是最简单的解释，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独秀　一九二一，八，一。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

“我们社会主义者，往往不甚觉察列强对于被掠夺的各地之苛酷，常一再加以压迫而不休，其实若谓‘非列强’的民族之独立，全靠列强间不和而保存，良非过言。华盛顿会议底危机，即列强间苟能妥协，则中国或将被列强分割而压迫，或不被分割而受列强共同的压迫。诚然中国代表亦将列席于华盛顿会议，但在巴黎和会，中国未尝无代表，其结果曾何益于中国？中国不签约曾何补于他土地底丧失？”

罗素先生对英国Labour Leader记者说的几句话，竟然唤不醒我们中国人底迷梦，实在可怜极了！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级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有两个唤不醒的迷梦：(一)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二)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倘列强不能妥协，冲突起来，限制军备案不能成立，太平洋诸问题不得解决，不但是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底不幸，简直是世界和平底不幸。

在这资本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那一个不是藉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除非列强他们自己抛弃殖民政策，毁坏他们自己的商业，他们如何能够主张正义人道来帮助弱

小民族，所以我们中国人第一个迷梦，可以说是“与虎谋皮”了。至于第二个梦，那太平洋会议底结果必和中国人梦中的说话恰正相反；因为列强间若是自起冲突，相互破坏个干净，这时候太平洋沿岸被他们压迫的弱小民族才有解放之一日；若是他们互相妥协了，则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如中国人、朝鲜人、西伯里亚人，不但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从前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运命。所以太平洋会议列强若是冲突而破裂，正是太平洋弱小民族底幸事，如何反说是不幸呢？中国人这种观察完全错误，我所以说那太平洋会议底结果必和中国人梦中的说话恰正相反。

若有人不相信我的说话，检查一下太平洋会议底来源及召集会议底最近动机，便明白这会议底性质了。

此次太平洋会议远的来源就是英日同盟，这英日同盟底作用，其初乃是英日合力排除俄国在华底势力；其后乃是英日合力排除德国在华底势力。在日俄战争以前，中国北方在俄国掌握之中，南方在英国势力之下，日本初兴想来中国得好处，必须北破俄或南破英，否则不能插足，在日本当日联俄破英图中国南部，或联英破俄图中国北部，本无成见，和英国商议盟约同时也有密使在俄谈判，只因英国外交手腕敏捷些，英日同盟成立，俄国便败于日本；倘当日俄日同盟成立，形势便和现状不同了。日俄战后，日本乃代替俄国底地位，和英国一北一南半分了中国。这时新兴的德国忽来插足山东，北日南英都同时戒严，英日都要巩固他们在华的势力，所以不得不续盟。现在俄德虽然没有力量损害英日在华的权利，然英国仍然依赖日本帮他压迫印度，日本也要依赖英国帮他抵制美国，所以第三次盟约本年虽要满期，

英日都还有续盟的必要；但是美国、坎拿大、澳洲都极力反对英日续盟，英国此时固然不愿意开罪美国，至于坎拿大和澳洲底反对更足制英国底死命，英国处在两难，因此只有希望在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解决之一法，所以太平洋会议有表面上虽由美国发起，内幕中实为英国主动之说，总之英日同盟确为太平洋会议一主要的原因。这种英日分赃的同盟，在几次盟约上不曾将他们压迫弱小民族的野心和盘托出：这同盟起源于英日合力排除俄德，垄断在华的权利，所以盟约第一条即珍重声明两缔约国之特别利益，即大不列颠国在中国之利益及日本在中国所有利益，这是不用说的了；其第二次盟约即将第一次盟约中维持韩国独立字样删除了，同时加入印度问题，开口即珍重声明该同盟以"保持两缔盟国在东亚及印度地域之领土权，并防护两缔盟国在该地域特殊利益等为目的"，第三条英国明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第四条日本明白承认英国在印度的权利；这种分赃的盟约是何等明目张胆！

以明目张胆的分赃同盟为主要原因底太平洋会议，于太平洋弱小民族是幸事还是不幸呢？

太平洋会议底最近动机，虽由美国上议院议员Borah及众议院议员Portes先后提议，然所以能够成立此会议底原因如下：

(a)英日续盟与否急待解决；

(b) 日美在中国在西伯利亚在前属德国底太平洋殖民地种种利害冲突；

(c)美日海军竞争甚剧，有酿成第二次大战的趋势，这是各资本主义国唯一的恐怖；

(d)美国急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门户开放""机

会均等”就是他的武器。

试看上列的原因，那一样是关于太平洋弱小民族底利益呢？

美总统所发华盛顿会议之通牒，不是明说为了军备限制问题和讨论远东问题吗？

他们所谓军备限制问题，乃是图列强间均衡的限制，免得列强间相互竞争扩充，酿成列强间自身的不幸；并不是相约平均废除军备即废除压迫掠夺弱小民族底武器。因为列强底军备或是依现状加以限制，即或照现状缩减一半，拿这军备来压迫掠夺弱小民族也十足够用。所以野心勃勃的列强间，能否实行限制军备，固然是个大大的疑问；即或能实行限制，也只是列强间自身的利益，和被压迫被掠夺的弱小民族毫无关系。

至于所谓讨论远东问题，乃是讨论列强间尤其是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免得列强间因利害冲突而决裂，而战争与弱小民族以自然解放的机会；并不是列强间都忽然发生慈悲心，愿意抛弃帝国主义经济的及政治的侵略，来讨论怎样解放帮助远东诸弱小民族啊！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我们揣测此次太平洋会议底结果不出三途：一是列强间利害不一致，尤其是限制军备问题互相猜疑，然又互相回避不肯决裂，至于无结果而散；一是列强间分赃不匀，势非武力不能解决，则此次会议即第二次大战底序幕，这是列强间底不幸，却是弱小民族大大的幸事；一是弱小民族大大的不幸，就是列强间在此次在会议席上或秘密谈判中，分赃均匀，互相妥协，英日同盟扩充为英日美同盟，或更扩充为英日美法（英国战后虽嫉妒法国，但

在中欧局势上又不能不利用法国防御俄德，因此法国虽与远东问题无关或者也要拉入。）四国同盟。可怜被压迫掠夺在此同盟势力之下的弱小民族，在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成功以前，决没有一日能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铁蹄和算盘蹂躏的。

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啊！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陈独秀启事[①]

鄙人在粤时，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说我主张(仇孝)、(讨父)、(公妻)，说我演说"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语，居然传诸报章，我此即撰《辟谣》一文，登载《民国日报》，辨正此事，不图仍有一二家报章，传载此种无稽之言，以致法租界会审公堂亦据此项谣言，对于鄙人有所怀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从前置之不理态度，此布。

1921年10月22日《民国日报》

---

① 本启事自1921年10月22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刊载三天。

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1]

张溥泉先生在广东某工会演说，大意是说工人运动应该以"诚实"为第一要义，这句话从表面上看起来很浅，里面的意味却很深长呵。广东底工人还算诚实，溥泉先生这句话对于上海底工会或者更是唯一的良药。

上海是中国工业中心，工人之多，比起英、美、德各国工业大都会来也不算弱，俄、法更不待言了。然而工人团体底内容和组织怎样，我实在不敢说而且不忍说轻薄话开罪于工界朋友。至于现在发起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却令我不能不竭诚欢迎。

鄙人欢迎此代表团之点有三：第一，欢迎他们定名上海各业工会，不假冒全国、全省等名义，不愧"诚实"二字。第二，欢迎他们限定各业工会，大概无业游民所组织的招牌工会不便加入了。第三，欢迎他们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这一点更足表明他们诚实不肯欺人的道德。鄙人因此脱帽高呼：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

1921年11月7日《民国日报》 署名：只眼

---

① 1921年8月中旬，中共设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积极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并试图与上海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五大招牌工会联合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因招牌工会拒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而未能实现联合。

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

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居然能够觉悟，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对于他们的章程发生异议的是劳动联合会等，老实说，这些团体和各业工会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照章他们不能加入，他们发生异议也是人情之常。我们最不解的是：(一)劳动联合会等说，代表团的名称及章程与组织之初衷及上海之现状不符；他们的初衷不知是什么？不知代表团章程与上海现状不符的在那一条？(二)协进会代表何以竟令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退出团体？上海真正的工人呵！你们第一次见排于商教联席会议，“不许加入”；第二次又见排于全国工界协进会，“请即退出”了；你们真正的工人还不赶快团结起来和冒充工人反对工人的奋斗吗？前次国是会议不许工人加入，有人以为不平；我以为因此促起劳动界阶级的觉悟，正是一桩幸事。这此机器工会等退出十团体联席会议，有人以为不幸；我以为因此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的工会之觉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这两桩幸事都是上海工人运动日趋进步的现象，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都有记载的价值 鄙人因此第二次脱帽高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万万岁！

1921年11月15日《民国日报》 署名：只眼

工人与军人

从前军界本有"点名发饷"的规矩，现在可就不行了；现在号称一军一师的，其实多的不过数千人，少的甚至于数十数百人也称军称师，他们这样虚张声势，不外多得军饷及把持位置两个目的，可是中国底军政正因此闹糟了。

令人失望的中国军人已经糟到不可救药了，令人很有希望的中国工人怎样呢？现在上海有许多工会也是虚张声势的挂起中华中国全国总工会、联合会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实他们底内容不但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内中还有一个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你说可笑不可笑。军人虚张声势可以多得军饷、把持位置，工会虚张声势做什么？乃因为这班办工会的人本来在社会上还够不上绅士的资格，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所以工会的名义越大越阔越好；而且花钱不多，便可得着全国工会会长的头衔，比从前捐监生捐蓝翎五品衔还便宜多了。可是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工人底名誉闹糟了。工人、军人都是国家重要分子，现在都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希望有好的军人、真的工人速速有以自救，勿使军队、工会为国人所厌弃，这才是国家底幸事呵！

1921年11月1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只眼

名 实

名实不符，也是中国社会紊乱不能进步的一个大原因。现在上海有正在分途组织的两个工团：一个称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是上海机器工会、上海电器工会、上海纺织工会、上海印刷工会、浦东烟草工会等组织的；一称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是中华劳动联合会、洗衣同业工会、中华工会、中华全国工界协会、中华印刷联合会等组织的。这两个团体底内容姑且不提，单就名义上讨论，我们对于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在逻辑上有三个疑问：(一)他们分子六分之四都挂起中华全国的招牌，在名称上上海这个区域范围底问题如何解释？(二)六个团体中只有五个工会，五个工会中有三个没有标明行业，在名称上"各业"二字作何解释？(三)既称总联合会，上海各业工团是否都包含在内？他们倘不能明白解答三个疑问，我希望他们应该修改名称，免得名实不符，日后打起电报来要惹那两教联席会议的赵先生冷笑咧。

1921年11月19日《民国日报》　署名：只眼

《西游记》新叙

"……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这就是《西游记》作者之旨。这种南北朝以来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我们是无所取的了。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西游记》，那描写人情本非作者之意，固不当和《水浒传》、《金瓶梅》及《红楼梦》相提并论，即述妖状怪，亦欠深刻。

我们所取於《西游记》的是什么？

元、明间国语文蔚然大起，《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都是这时代底代表著作，在研究这时代底语法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有同样的价值。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独秀叙于上海。

《西游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宁波水手”

这次香港海员罢工，所以引起我们十分注意，有两层重大的意义：（一）是劳动界阶级的觉悟。香港海员罢工，何以长辛店、武汉的铁路工人都起来援助，这是因为他们觉悟到无论是路工是海员，无论在广东在他省，都同属一个劳动阶级，都应该互相援助，这就叫做劳动界阶级的觉悟。（二）是劳动界民族的感情。劳动者只有阶级无国界民族界，这本是团结世界劳动者为一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对抗的意思，并非说劳动者对于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应该分别国界民族界。这次香港海员罢工事件，船东方面，英日等外国船居十分之八，所以劳动界阶级的觉悟之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斐律宾的水手究竟工价贵而且在中国沿岸语言不通，资本家终不能长久利用，所以这次香港海员最大的危机，只有一班无阶级觉悟无民族感情的宁波水手贪利被雇到香港代替那罢工的广东水手。宁波水手诸君呵！你们都是水手都是中国人，万万不可学桂阿茂贪小利去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呀！

从前为了四明公所事件，你们是何等齐心何等名誉，现在的香港海员罢工团体，若因为你们破坏了，那时“宁波水手”四字，便成了破坏团体的恶名词了。

1922年2月1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只眼

平 民 教 育

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所以连贵族的教育我也不反对，而况且在教育极幼稚的中国。话虽如此说，而我们希望教育界有由贵族的到平民的趋势。在工业未发达的社会里希望教育发达，自然是妄想；在社会主义未实现的社会里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自然也是妄想；但是在工业幼稚的资本制度之下能有少数的学校倾向平民主义，却也未尝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我对于教育的意见，第一是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象是原料不是制品；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因为资本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料，却是商品。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最盛的地方，教育也相当的发达起来了，但所有的男女教育是不是制造商品，却待大家扪心自思，我也不忍妄说，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

《独秀文存》卷一

基督教与基督教会

我们批评基督教，应该分基督教(即基督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会两面观察。

基督教教义自然不是短篇文章所可说得详尽，但是他教义中最简单最容易说明的缺点就是上帝全能与上帝全善说矛盾不能两立。依我们的日常所见的恶事和圣书中所称的恶魔和耶稣代人类所赎的罪恶，这万恶的世界是谁创造出来的？人类无罪，罪在创造者；由此可以看出上帝不是"非全善"便是"非全能"。我们终不能相信全善而又全能的上帝无端造出这样万恶的世界来。此外耶稣一生的历史象降生、奇迹、复活等事，都没有历史和科学的证据使我们真实相信，这也是教义上小小的缺点。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但是在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点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要造罪孽。

在现在人智发达的社会里，一切古代人智蒙昧社会所遗传的宗教教义底缺点自然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必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缺点特别攻击；至于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栗！

异教审判所(Inquisition)之暴烈的压迫人们思想自由，我们是忘不了的；在"信礼"Auto-da-fe美名之下所烧杀的男女，我

们是忘不了的；（托尔克马达做异教审判所所长时，仅西班牙被烧杀的异教徒有八千人，财产被收没的九万人，荷兰加耳五世时，被杀者五万人，前后遭教会之嫉恶而牺牲的人在一千万以上。）修道院利用"隐匿权"Droit de refuge为种种罪恶之巢窟，我们是忘不了的；西班牙官吏阿拉委大因信奉哥白尼学说收没财产禁锢修道院八年的事，我们是忘不了的；教皇仇视人身解剖学及教会指韦萨留斯（著有《人身构造论》，集人身解剖学之大成）为恶魔宣告死刑的事，我们是忘不了的。像此等压迫思想自由、压迫科学的事，细举起来，一大本书也载不了，这都是基督教教会过去的罪恶。

现在怎么样呢？大战杀人无数，各国的基督教教会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本国的胜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样的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导引。（德国宣教师在胶州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我给你圣经，你给我利权"这句话，真形容得他们惟妙惟肖；无数的宣教师都是不生产的游民，反要劝说生产劳动者服从资本家；无一国的教会不是日日向资本家摇尾乞怜，没有财产的新教教会更甚；我们眼见青年会在中国恭维权贵交欢财主猎人敛钱种种卑劣举动，如果真是基督教的信徒便当对他们痛哭；无论新旧教会都以势力金钱号召，所以中国的教徒最大多数是"吃教"的人；教会在中国所设学校无不重他们本国语言文字而轻科学，广东某教会学校还有以介绍女生来劝诱学生信教的，更有以婚姻的关系（而且是重婚）诱惑某教育家入教的，势力金钱之外，还要用美人计来弘教，是何等下流！

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

令人悲愤而且战慄，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言。

我始终总觉得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当分别观察，但是我的朋友戴季陶先生，他坚说基督教教会之外没有基督教，不知道教会中人对此两说作何感想？

1922年3月15日《先驱》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广东工人与上海工人的比较[①]

——在上海纺织工会浦东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

"……上海底工厂比广东多，工人也比广东多，工会却比广东少。广东已有七十多个工会，都是真正工人所组织的；上海只有四十多个工会，而且"招牌工会"占了三分之二。广东底工人，已有二十分之十二入了工会；上海底工人，入工会的还不到四十分之十。上海工人比广东多，为什么上海底工会反不及广东发达呢？这因为广东工人对于工会都很热心；上海工人对于工会都很冷淡。广东如：建筑工会、机器工会、道路工会等，都很有势力，新近有海员工会、印刷工会，团体很坚固。现在广东底工人教育也发达起来了，工人学校已有数十处之多。虽说两个地方的政治权力有保护劳工与压制劳工之分；但无论如何，工人们总要自己去做的呀！……"

1922年3月2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陈独秀（鼎元记录）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为三月十九日演说的一部分。文中删节号是原有的。

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象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日

1922年4月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纪念[①]

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的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趋使，居然胡胡涂涂，做到现在的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当日社中朝夕晤谈的好友，章谷士、曹复生，可怜如今都没有了！这二十年中，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惟彼此未曾做十分无人格的事，还可以对得起死友。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书此以志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纪念。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1983年版)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1922年是芜湖科学图书社创设二十周年，印行了一本精装的《廿周纪念册》。陈独秀、胡适、陶行知等都为这本纪念册撰写了文章。

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

——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演讲[1]

今天要贡献诸位的，不过把我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告诉大家。在座诸位都是学生，并且有许多女同学在里面，所以就把“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说说：

我国的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只有少数人可以受得到，一大部人简直得不到一些好处；就是国立的学校，也是如此。试想办学校的经费不是国民公共担任的吗？为什么要给少数人独占利益呢？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况且这种贵族教育，在从前看起来，确是没有什么希罕，到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行了；那是大家所知道的，所以引起一班人要高高唱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了，不但高唱，而且有一班人竟实施了。这种果然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不过据我个人想起来，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以下，一定办不出好的成绩来，他们底希望竟可以说是梦想 像江苏、直隶、广东、湖南几省，现在都已积极的试办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了；他们底计划，以为在六年或八年的期限里可以收效；

[1] 演讲时间为1922年4月12日。

可是筹备的经费，仅足供给教员的薪水和学校设备上的用途，却顾不到学生的伙食和杂费，那贫苦的人还是不能去受教育。况且这班劳动者，因为受经济压迫，每天不能不做十二或十四点钟的工作，试想他们还有什么时间去受教育呢?因此任你学校办的多，要是国民没有宽裕的经济，绝对收不到普及教育的效果。

所以要普及教育，先要设法减少劳动者工作的时间，使他们也有读书的机会；还要国家能担任各个人受义务教育的一切经费，——连伙食也在里面，——像现在待遇师范生的办法，才可以做得到。但是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这是不可能的事实，所以要普及教育，唯有盼望社会主义的实行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主张经济平均分配的，并且无论什么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事业，都握在国家手里，不许国民私有，那时国家自然有很大的力量，使个个人受教育了。照现在看起来，有钱的可以进学校，再有钱的可以进中等学校，再有钱的可以进大学，到外国去留学，做博士，受人家尊敬；没钱的呢?自然进不得学校，或者连饭也没有吃，看来好像都是愚蠢的人。所以现在国民的知识程度和学问的好坏，全看财产的多少为比例，可怜一班穷人中间，不知埋没了多少天才，这正是贫富的分别，不是智愚的分别呀。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行以后，一般人都受得到教育，那时才可以断定智愚的程度。这是在普及教育一方面讲，是切望社会主义的实行。

再次，要讲妇女问题。妇女的地位总较男子要差一些，这在西洋各国也是如此，不过在我国更差一些罢了。究竟妇女的地位为什么要比男子低呢?大概是因为知识浅薄，经济不独立二个原因。但是知识的浅薄，也因经济不独立的缘故，试看社会上的习

惯，总是只要儿子受教育，不大要女子受教育；即使要女子受教育，也必定较儿子少一些。儿子和女子不能受相当的教育，都因财产的承继权专属于儿子的缘故，所以儿子的教育费就像应得的，女子要想分沾一些，已是不正当的行为了；因此知识差，地位也差了。女子从初生，直到做人母亲，总没有握着财产权的时候，因为无论在法律、道德、伦理各方面讲，都是不允许的。所谓"三从"，在从父、从夫的时候，果然不要说起，就是夫死以后，财产权也要归儿子掌握，到法庭上控诉起来，也要用儿子的名字出面。因为伊们没有财产权的掌握，连带伊们的地位都降低了，这样讲来，要妇女得着和男子相等的地位，不能不使伊们有使用财产的自由权；要使伊们有使用财产的自由权，除了实行社会主义以外，没有旁的希望。因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国有的，也是平均分配的，到那时妇女自然也可以受平等教育，不受经济的约束，也不怕地位的降低了。照现在说起来，很有几个自觉的女子，知道经济不独立的缺点，要带累自己的人格，很想脱离家庭，或脱离丈夫而自立。这果然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总不是彻底的办法。因为女子脱离了家庭或丈夫以后，伊们哪里能经济独立，受教育呢？女子要经济独立，除非作工。但我们要知道，现在不是独立生产时代，像从前的人有斧就好作工，有锄就好种田的情形，是共同生产时代了；不是家庭工业，是工场工业了；不是手工工业，是机器工业了。那么，要去作工，逃不了要受资本家的压制。正是脱了家庭的奴隶，去做资本家的奴隶，合来有什么出入呢？所以说，要解决妇女问题，也要靠社会主义的实行。

今天讲的就是这二个问题，据我个人想来，都是和社会主义有很密切的关系，旁的没有什么可以贡献。请诸位把我所讲的

话，大家思考一下，究竟普及教育和妇女问题，除了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去解决以外，可有更好的方法？假使有的，那么再好没有了。请诸位抱着学者的态度，仔细思考一下，不要一味的盲从才好。

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陈独秀　（沈秉廉记录）

再致周作人先生信

启明先生：

接来示，使我们更不明白你们反对非基督教的行动是何种心事。反对非基督教的动因乃在宗教问题以外，真令人觉得奇异了。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末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因为好象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先生们现在果主张基督教、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思想都有不许人反对之自由吗？若是反对他，都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吗？都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吗？先生们反对我们非基督教的思想自由，算不算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算不算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呢？先生又说我们是多数强者压迫少数弱者，原来合乎真理与否，很难拿强弱多少数为标准，即以此为标准，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这笔账恐怕先生们还未清算。因此我现在仍然要劝告先生们——我平生最敬爱的朋友：快来帮助我们

少数弱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十一日

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宗教问题

——在交大的讲演[1]

我们研究无论甚么问题，终该有历史的观念，因为一个问题的发生，不是在短时间内的；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必定要把这个问题的起源、历史详细地考察一下，然后可望得到一个正确的观念和批评。

宗教问题，也该用历史观来研究；因为彼是很长的历史，很多的变迁。现在的宗教，就有彼全历史中的一时期，变迁中的一状态；而彼所以有现在的这样宗教，也是有很长的历史和许多变迁造成的。因此，我们要研究宗教问题，不得不先把彼底历史研究一下。

为什么发生宗教呢？这问题照理论上说，人类本有宗教性的，但这人类本性有无宗教性，不是重要的起源，而且也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该把社会学来解决这个问题。

古代人民大概是崇拜自然教的，一种是崇拜太阳的，一种是崇拜火的，一种是崇拜动物的，其余的还有许多，不过这三种崇拜是最重要的宗教，现在约略说一说：

---

① 讲演时间为1922年4月21日。本文发表时未经陈独秀过目。

为什么要拜太阳呢?古代人民看见了太阳,以为彼底光大极了,怎么彼一来,全世界都被彼照到,彼一去,全世界都因而黑暗呢?彼底力量大极了,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此,就生出一种可爱而又可怕的思潮,于是就发生要崇拜彼的心了。

为什么要拜火呢?古代人民并不是把火烧饭煮菜的,又不是点灯的,他们看见火光,心里生出许多快感,以为火真好看极了,最好的东西,便是火了;而且猛兽看见了火光就要逃避的,因此人们可以生存,不被猛兽所杀,他们又以为火光的力量是最大了。他们因火有(一)美观,(二)抵御猛兽,二种用途,于是就崇拜彼了。波斯教就是崇拜火的宗教,现在还存在着呢!

为什么要拜动物呢?古代人民没有防御猛兽横暴的法子,常常被猛兽所杀,所以他们承认猛兽底力量大的很,没有人可抵御的,实在非常可怕!他们又看见许多禽兽的羽毛非常美丽,非常可爱,因此,他们就生了崇拜心。

照以上三种看来,人们所以有崇拜心,不出二种原因:(一)可怕,(二)可爱罢了。

回回教是崇拜猪的,我们却是天天吃猪肉的。北方有崇拜狐狸的,天津有崇拜刺猬的,南方人却又有吃刺猬的,这不过各人的迷信而已!太阳有什么可怕?火、猛兽、猪、狐狸、刺猬……又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想来,真是可笑,但他们却天天去拜彼等咧!

后来人类进步了些,知道自然教都不可信的,没有什么可崇拜的,想要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超过人的灵性的东西,来支配人类的灵魂,于是那抽象的神就被他们想出了。基督教就因此发生了,上帝就因此也造出来了。虽则仍是一种迷信,但比较古代自然教已进化得多了。

小孩子读书是具体的，好像桌子、椅子、窗、屋、灯……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容易认识；那不能看见的，摸不着的抽象的国家、社会……等名字，他们就不容易认识，不容易懂得；等到年纪大了，学识高了，那就可以懂了。

人类也是这样，古代的人民，好像小孩子，他们崇拜具体的太阳、火、猛兽……等；后来渐渐进化了，就由崇拜具体的而变为抽象的神。古代宗教，是很简单的，不过为着可爱和可怕而已，而基督教却复杂得非常，并且插入许多伦理进去。

自然教崇拜太阳、火、猛兽……等，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件很可笑的事。他们为什么要拜太阳、火、猛兽呢？但是现在的人看基督教，好像基督教对于自然教一样的可笑。他们为什么要拜上帝呢？

基督教比自然教果然是好些，但是现在大家都反对了，好像资本制度为现在的人所反对，也许彼在古时是很有价值的制度呢！所以我们研究无论哪一个问题，哪一个思想学识，都该有历史进化的观念。

现在的所谓宗教，就是基督教；所谓基督教，也就是宗教。因为现在最有势力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其他好像孔教，是一种哲学，并不能说彼是一种教；佛教是一种只讲迷信的独身的宗教，势力非常的小；至于道教呢，也是不足道的。所以不说宗教也可以，说了宗教，非先研究基督教不可。因此，基督教就变了各种宗教的代表，而我们研究宗教问题，尤不得不特别注意于基督教。

博爱、牺牲，是至可宝贵的基督教义，自然个个人应守这个教义，并且谁也不能不承认的；不过博爱、牺牲，不是有了基督

教才能成立，他是能独立脱离了基督教而实行的。所以这二种美德，不能算是基督教独有，因为彼是变成人类伦理方面的一种了。

基督教可以使人有信仰心，不做恶事，果然，这是维系人心的一个法子；不过现在的人，知识高了，不能再信仰那虚空的上帝，因此这个信仰，现在不能屈服一般人心了。

现在一般人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呢？大概有二种原因：(一)是因为他的教义，完全和科学相反，所以要提倡科学，不得不反对基督教。(二)是因为他们底教会，资本主义彩色过于浓厚了。

博爱、牺牲，不能算彼底教义；彼底教义中，最紧要最有特彩的，便是“有罪”和“赎罪”。

他们以为一切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所以有反叛上帝的意思的，就是罪恶。但人类为什么要有罪呢？说，是不听上帝的命令，可是一切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为什么又要造有罪的人呢？上帝是慈善的何必使世界上有许多有罪的人，使世界不能一日平安呢？不是上帝大儿戏吗？既要使人类无罪，却造了许多有罪的人；既要使世界和平，却养育了许多乱世的原素，这又何苦呢！

人类有自治独立的精神，何必要上帝监视，要上帝保护！

基督教徒有了许多罪恶，便向上帝祈祷，受牧师洗礼；于是一切罪恶就消灭了，就可升入天堂了，这真危险极了！人们以为做了任何极大罪恶，一洗就可洗去，那又何乐而不做罪恶呢！于是人类的罪恶，就与日俱长，天天增加了。所以基督教的所谓“赎罪”，不过引诱别人入他圈套，而不知世界上被彼增加了许多罪恶呢！简截说来，上帝不但没仁慈给我们，却使我们增加罪恶，

那么，上帝于我们有什么利益处呢？没有了上帝，我们人类可少做些罪恶，那又何必要赎罪呢！

基督教还有许多不合科学的事，好像上帝是造人类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的……等，不过这不是最大的毛病。基督教不合科学，还能存在，而"有罪"和"赎罪"，却是大问题，足使基督教失去存在的价值。

我曾经把这二个问题问我底朋友，——他是一个信仰基督的学者，但他也不能回答我，只是说，"你要相信上帝，不要把他研究，上帝是有力量的。"叫别人不要研究而信他，怎可使人心服呢？

现在再说基督教会的罪恶罢。

凡是明白的基督教徒，他们自己也承认教会是很不好的，于社会上有罪恶的。

他们的罪恶，可分过去和现在。过去的罪恶，可算是旧教——天主教的罪恶；现在的罪恶，可算是新教——基督教的罪恶。

天主教对于异教徒，非常刻薄，他们为了人们反对他，烧杀了八千个西班牙人——托尔克马达做异教审判所所长时——荷兰加耳五世时，被杀者五万人；这种事情，常常在新旧教交替时代发生的，所以新旧教战争史，也是世界上一部可怕可惨的历史呀！就是法国大流血，一方虽为着政治运动，一方也是新旧教冲突的所致呢！但这种都是旧教会的罪恶。

基督教虽不及天主教的刻薄惨杀，可是他们底笼络手段，却是彼底特色。他们使愚夫愚妇，和没根基的青年，引入迷途，使他们永不知人生真义，而于昏昏沉沉中过了一生，这是何等大的

罪恶！

为什么天主教的罪恶是刻薄惨杀，基督教的罪恶是笼络呢？这也因为历史变迁的缘故。

天主教盛行的时候，是封建制度、专制制度盛行的时候；因此天主教也是非常专制，对于异教徒，采用惨杀手段。现在的基督教，是在资本制度之下，所以彼也资本化了。对于一般民众，只是用笼络手段，使人们同归资本化。

岂但是基督教受资本化，一切政界、学界、新闻界、美术界，都是资本化了。政界、学界、新闻界，是非常容易资本化的，而美术界却也资本化，好像很希奇，不过诸君想有一个美术家，他倘使有钱，那他就可以买了许多应用品，颜色呀、画笔呀、纸呀，……一切都齐备，而且不怕没有生活费，这样，他就能专心，就能成功他志愿了。但如果他是一个贫困者，那要买颜色，没钱，要买纸笔，又没有钱；这样，他怎能成为美术家？所以要做美术家，也要有资本呢！

这样看起来，基督教在资本制度之下，怎能不资本化呢？

资本家有钱，他们要左右言论，就开几个报馆，或是收买几个报馆，来鼓吹他们的资本主义。他们要有名的学者，替他宣传主义、保护，就拿出些钱来买几个学者。他们要人们不去反对他，就买许多牧师，替他传道。他们怕人们用武力来反对，就买了无数的军队，来保护他。于是报馆资本化了，只说资本家的好处，不说他的坏了；有名的学者资本化了，替他宣传了；牧师也资本化了，替他尽力了；军队也资本化了，尽力来保护他，……一切都资本化了。

所以基督教的资本化，不能算基督教本身的罪恶，只是社会

制度使彼这样的。各种执事，都在资本主义的上面旋转，他又怎能逃脱不入这个漩涡呢？

不过现在既然反对资本主义，那在资本主义底下旋转的东西，当然一律要反对，基督教又怎能逃脱〔这〕个反对之律呢？

他们又宣传肉体的痛苦为轻，灵魂升入天堂为要紧。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没甚关系，可是他们使劳动者天天为资本家做奴隶，不起来运动反对，大家和和平平过去，好使资本家安逸地得利，这层，从事劳动运动的人，哪能不竭力反对呢？劳动者又哪能心愿呢？

照历史进化观念来研究这个宗教问题，便可以说宗教在现时的世界，已没有成立的必要了。

1922年4月25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陈独秀　（高尔松、高尔柏笔记）

马克思学说[①]

（一）剩余价值

马克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的学说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斯密亚丹代表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一样，在这一点无论赞成马克思或是反对者都应该一致承认。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覆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斯密亚丹也曾说过："在土地未私有资本未集聚的最初状态，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全属劳动者自己所有。"（见《原富》一卷六六页。）又说："劳动者自己享有全部生产品的最初状态，土地私有资本集聚之后便不行了。"（见《原富》一卷六四页。）这两段明明说因为土地和资本私有底缘故，劳动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产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归了何人呢？照马克思底学说，这就叫做剩余价值，是归了资本家底荷包，资本家夺取了劳动者底剩余价值，做为他私有的资本，再生产再掠夺，以次递增，资本是这样集聚起来的，资本制度就是这样发达起来

① 本篇是在吴淞中国公学的演说辞。演说时间为1922年4月23日。

的。话虽这样简单，但是要真实明白剩余价值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实现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烦难的事，现在不得不略略说明一下。

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斯密亚丹以来的经济学者，对于凡物之价格都分为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两种。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我们千万不可弄错。劳动价值也分二种：(一)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这两种劳动价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马克思底意思是说：凡两件货物互换，这两件货物一定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换若干面粉，这两样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为劳动所作的结果；因此所费劳动相等的货物价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时做成的货物，价值比用六小时做成的货物高一倍，一个茶碗价值二角，一个茶壶价值一元，壶底价值比碗大四倍，是因为做壶所用的劳动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用劳力所制造的商品(就是货物)之价值，乃是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分量，就是劳动时间长短的意思。社会的劳动，是与个别劳动不同的意思；个别劳动有个别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异，所谓社会的劳动，是指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下，将这些个别的差异都作为平均程度，因此社会的劳动也叫做平均的劳动)。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

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底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马克思所谓制造一切商品所费的劳动分量，乃是兼"生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费的劳动）和"死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用原料、工具、建筑等以前所费的劳动）二种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马克思的价值及劳动价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说，以下再说剩余价值是什么。

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的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的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说详细一点，当分为剩余价值之成立及剩余价值之实现和分配二部分：

剩余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这个意思十分重要，我们也千万不可弄错。此话怎讲？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虽然要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际归到资本家底荷包，但是夺取底方法和剩余价值底本质，都不是指流通过程中一件一件生产品的卖价，乃是指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做"剩余劳动"的价值。"剩余劳动"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近代利用机器，制造业底规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产品比机器的生产品货色不好价钱又贵，因此手工业一天衰败似一天。于是由手工工业时代变了机器工业时代，由家庭工业时代变了工厂工业时代，由独立生产时代变了共同生产时代，这就叫作"产业革命"。自产业

革命以来，所有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矿山、房屋、机器、原料等）都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以外的人，除了将自身底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费用。资本家给他们多少生活费用（即工钱）呢？照马克思的价值公例，一切商品之价值常与制造此商品时所费的劳力相等，劳力（也是一种商品）之价值（即工钱）也常与培养这劳力所需的劳动（即制造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劳动）相等；那么，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的劳动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生活品的价值；然而资本家往往要劳动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所给工钱只值六小时的生活品，其余六小时，在实际上劳动者未曾得着工钱，是替资本家白做了，这白做的六小时就叫作“剩余劳动”；生产品之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者做出来的，而劳动者所得只一部分与六小时劳动价值相等的工钱，其余一部分由六小时剩余劳动而生的价值，就叫作“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和分配的呢？剩余价值虽然成立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必须到了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产出一定价值的货物，剩余价值的本质及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底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譬如一资本家费价值五成的劳动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这时剩余价值五成固然已经由剩余劳动五成在生产过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将棉纱卖给消费者，将价值十成的货物变成价格十成的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那时五成剩余价值才算实现了。这是因为生产者不能将货物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中间必须经过贩卖者之手，贩卖者须得一定资本及劳力之报酬，

于是生产者不得不在价值以下的价格卖出他的货物。譬如用价值五成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因为贩卖者之报酬，价值十成的棉纱至多只能卖得价格八成的货币，因此五成剩余价值中，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余二成是归了贩卖棉纱的资本家；制造棉纱的资本家若是向他资本家借过资本，便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他资本家的利息；纱厂底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地租。剩余价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种资本家分配所余才是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实际得着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

资本家底资本是夺取劳动者剩余价值变成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之价值变成的；工作时间越长，剩余劳动越加多；工钱越少，剩余劳动也越加多；出产能力越提高，剩余劳动也越加多。所以资本家想扩张剩余价值，天天在那里提高出产能力，天天在那里反对增加工钱反对减少工作时间，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又拿货币制造商品增加剩余价值，再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如此利上生利，这就叫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营业底规模一天大过一天，掠夺兼并底规模也一天大过一天，加上交通机关一天便利过一天，殖民地新市场一天扩大过一天，精巧的机器一天增多过一天，大银行大公司便一天发达过一天，从前的小工业都跟随着这些制度之发展，逐渐被大工业吸收了压倒了。这种吸收压倒底结果，便是把全社会的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叫作"资本集中"。在从前小工业时代，资本不集中，因此产业不能发达，所以资本集中使生产能力增加产业规模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好过以前的生产方法只在这一点。但是在财产

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会的财产大部分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便自然发生以下各项结果：（一）无财产的佣工渐渐增多；（二）生产能力增加而无产佣工的购买能力不能随之增加，因以造成"生产过剩"的结果，生产过剩又必然造成"市场缩小经济恐慌"和"工人失业"两种结果。合起这几项结果，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们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的团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

象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怎样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怎样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怎样造成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怎样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在马克思学说里叫作"经济的历史观察"，又叫作"唯物的历史观察"。

（二）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三种书里都曾说明过这项道理。综合上列三书中所说明的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

其一　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

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　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涵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 ，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

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马克思底好友恩格斯曾述说马克思的意见道："在历史各时代，必然有他的生产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这种特殊方法造出一种社会制度，那时代的政治和文明之历史，都建设在那个基础上面，依据那个基础说明。所以人类全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即是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和被压制阶级对抗的历史。这些阶级争斗的历史相连相续，构成社会进化之阶级，到了现在又达到一种新阶级，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即无产劳动者）要脱离掠夺压制阶级（即绅士、〔军〕阀、资本家）的权力，将自己解放出来；同时还要将一切掠夺压制和阶级差别、阶级争斗完全铲除，永远把社会全体解放出来。"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把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打成一片了。

（三）阶 级 争 斗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其中要义有二：

（一）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例如在古代有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这些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自来都是站在反对的地位，不断的明争暗斗。封建废了，又发生了近代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两个阶级新的对抗，新的争斗。

（二）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例如欧洲在封建时代的工业组织之下，生产事业是由同行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发见了印度、中国等市场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

的时候，便不能应付新市场需要底增加了，于是手工工场组织应运而生，各业行东遂被工场制造家所挤倒，接着市场日渐扩大，需要日渐增加，交通机关和交换方法都日渐发展。这时手工工场组织也不能应付了，于是又有蒸汽及大机器出来演成产业革命，从此手工工业又被大规模的近代产业所挤倒，近代的有产阶级便是这样成立的。近代产业建设了世界的市场，有了这些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都跟着发达，这些发达又转而促进产业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这样发达，有产阶级也跟着照样发达，资本越加多，产业越扩大，将中世纪留下的一切阶级都尽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产阶级乃是长期发达和生产及交换方法迭次革命底结果。由此可知做有产阶级基础的生产和交换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生产和交换方法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即农业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适合，这种制度便成了生产力底障碍物，便必然要崩坏，结局果然崩坏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竞争的制度代之而兴，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也就跟着出现，有产阶级底经济及政治权力也就跟着得到了。有产阶级得势以后，造成了极雄大惊人的生产力（象工业、农业、轮船、铁道、电报、运河等），惹起这般大规模生产及交换的社会，将人口、财产及生产机关都集中了，建设了许多都市，将乡村人口移到都市，使乡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数人民脱离了朴素的乡村生活，使野蛮和未开化国屈服于文明国，农业国屈服于工业国，东洋屈服于西洋。但是到了有产阶级底生产力发展到了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不适合的时候，社会制度就成了社会生产障碍物，有产阶级及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坏的。崩

坏底征兆就是商业上的恐慌，这种恐慌隔了一定期间便反复发生，一回凶过一回，常常震动有产阶级社会底全部。这恐慌发生底缘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是由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过于狭小，不能包容那过于发展的大生产力。有产阶级救济这种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开辟新市场，一面尽量剥削旧市场，这只能救济一时，终是朝着更广大更凶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有产阶级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还培养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这些人就是近代的劳动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跟着有产阶级照同一的比例发达起来的，近代产业发展的结果，一般小资产的小商人小工业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能为新生产方法所压倒，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为大规模的产业所压倒，都不断的降到无产阶级，可是一方面产业愈加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不但人数愈加增多，而且渐次集中结成大团体，因为生活不安，对于有产阶级渐次增长阶级抵抗底觉悟，发生争斗，始于罢工，终于革命。有产阶级存在根本底条件，是在资本成立及蓄积；资本底重要条件，是在工钱制度；工钱制度，全靠劳动相互竞争。但有产阶级既已促进了产业进步，便已经使劳动者从竞争的孤立变成协力的团结了；近代产业发达，使有产阶级的生产及占有之基础从根破坏；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马克思说明阶级争斗大略如此，我们实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观有矛盾的地方。

（四）劳 工 专 政

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得了政权，没有不拚命使社会屈从他们的分配方法，巩固他们已得的地位。”

“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政治上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自他们成为有产阶级后，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一手把持。”

“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

“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为支配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

“原来政权这样东西，不过是一个阶级压制一个阶级一种有组织的权力；劳动者和资本家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织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支配阶级的地位，不得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兰西内乱》里说：

“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

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达纲领批判》里说：

“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

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告做劳动运动的人

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不满足现状不盲从环境的人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在这个意义之下做劳动运动的人们，便有几件应该知道的事：

（一）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是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劳动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

（二）现在所谓做劳动运动的人，自然不必都是劳动者；因为在无论何国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总靠有许多劳动者以外的人热心从事运动劳动运动，然后劳动运动才能够发生、旺盛起来，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这种做劳动运动的人，始终总不可忘记了自己并不是劳动者，乃是帮助劳动者的人，更不可乌合一班非劳动者组织劳动团体，冒充劳动团体。

（三）做劳动运动的人断然不能不明白劳动组织底系统。劳动组织底系统有三：(1)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2）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乃是一地方底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的劳动者所组织，更进联合全国同业，组织全国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底联合会；(3) 地方的组

织，乃是联合一个地（市或县）底各种职业或产业工会而组织一个地方的劳动团体，进而联合各地方的团体组织一个省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省的团体组织一个全国的劳动团体。做劳动运动的人，帮助劳动组织的人，必须使劳动组织在这三种系统的轨道以内才好。这三个系统当中，第一个最适于阶级争斗，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倘勉强成立，不是无力量，便是无政见的冒牌团体；第二、三个都比较的容易实现，但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仅仅一个地方底职业或产业的工会及一个地方的联合会，都断然不可假冒全省或全国总工会名义，仅仅一个省的联合会，也不可假冒全国总工会名义；又，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不可是个人的联合。换句话说，一个市内许多职业的或产业的劳动团体之联合，不是劳动者个人之联合。这都是做劳动运动的人万万不可缺的常识，若使缺少这个常识的人从事劳动运动，算是盲人瞎马了。

（四）劳动界，对于政治应取的态度，做劳动运动的人也是应该研究的。劳动运动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这应该是注重实际运动的人所能了解的。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因为援助这种革命的党派成功了，劳动者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为了这几种重要的基础，即在封建式的现政府之下，对于普通选举及废止束缚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法律的运动，劳动者也不能不拚命去干；万万不可空唱高调，把实际的

劳动运动上重要基础忽视了。

（五）劳动者对于别的党派，应该取什么态度呢？对于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自然都应该反对；因为基督教拿灵魂升天骗劳动者好看轻肉体的痛苦，一生一世安心替资本家做牛马，顽固党都是没有表同情于劳动者的。劳动者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因为他们本来都讨厌劳动者，若是一旦低头来和劳动者接近，必定有所利用。对于非革命的社会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主张劳动者权利的，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无政府党）的宗旨虽然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方法实不宜于组织不宜于革命，劳动者也不宜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太过看重个人的或小团体的自由，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的。

（六）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休假，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关系都不能得着教育、卫生、集会底机会。

（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因为若在资本家企业失败时或劳动市场供过于求时罢工，必然失败，罢工失败，是劳动运动最大的打击。

以上七事，都是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的。

1922年5月1日《先驱》第七号　署名：陈独秀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但是今天只讲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精神，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理，在马克思纪念册上叙述了，诸君都可见到。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怎样叫实际研究的精神!说来很为繁杂。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怎么叫演绎法?就是以一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一个原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

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这便是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

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

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我望青年同志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我今天特讲马克思这两大精神，请诸君注意。

五月五日

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

在劳动运动进步的社会里，都曾有劳动党或类似劳动党的工人政党出来担负指导劳动运动的责任。此时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俄国的共产党，大部分是觉悟的工人组织的，在党义上，在事实上，都不愧为最能够替工人奋斗的工人政党。

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象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但是国民党目前重要工作乃是对于北方封建军阀之战争，实际参加劳动运动的人还是少数又少数。

在这样世界趋势及中国劳动运动极幼稚的现状之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本诸党义，对于劳动运动，比他党加倍的努力，自负的努力；同时又应该理解在目前中国劳动运动第一战线上，与他党真心做劳动运动者有同一的目的。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

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

共产党党员自身若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行为，或当劳动运动危急时畏缩不前，共产党便应该立刻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顾恤。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不然便是假共产党。

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

在我个人的信仰，我对于孔教、佛教（大日如来宗及念佛宗）、道教及其他一切鬼神教、阴阳五行教（即九流之阴阳家、是中国最古的宗教，而且还是现在最有力最流行的宗教）、拜物教之疾视，比疾视基督教还要加甚，所以我对于非宗教同盟并非根本反对，但是从社会上群众运动及生活内容上看起来，不无怀疑之点。

我们现在第一要问的，宗教、非宗教底界说是什么？若以信神不信神为界说，那便未免过于简单了；因为信神不过是宗教性之一端，不是宗教性之全体，拿这个做宗教、非宗教底界说，简直是太不逻辑。若是以一切迷信甚至于以一切信仰都是宗教（我们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信仰到极笃的时候，便多少有点宗教性），这个问题便又过于广泛；试问主张非宗教同盟诸人，是否都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一概取怀疑的态度而无诚笃的信仰？研究及分析这样复杂的问题，是大学校研究室之事，若拿他做群众运动的目标，实在要令人迷惑。群众运动的目标，还是非基督教同盟可以使群众得着一个明瞭正确的观念。

从社会进化之历史观看来，自然有人类理智性日渐发展宗教性尤其是宗教制度及宗教仪式日渐衰微的倾向；然在这进化

过程中，我们若不积极的发展理智性，单是消极的扫荡宗教性，是不是有使吾人生活内容趋于枯燥的缺点（基督教后面挟有国际资本帝国侵略主义的大隐患，又当别论）？这也是我们应该审慎讨论的。

我对于一切腐败的反动派随着时论攻击基督教，觉得很可笑，但是对于学生界非基督教运动，却十分赞同，其理由如下：

（一）因为基督教教义的缺点，如原始罪恶说与上帝全善全能说不相应。

（二）因为使徒之虚伪，当危急时彼得尚三次不认基督，可见复活前无一真信徒。

（三）因为诞生奇迹及复活均过于非科学。

（四）因为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仍然因袭中世纪的恶风以残忍态度仇视压迫异己。

（五）因为教师说教以利害胁人者多，以理性教人者少，绝对迫人信，绝对不许人疑。

（六）因为新旧教在中国都有强大的组织，都挟有国际资本帝国侵掠主义的后援，为中国之大隐患。

（七）因为教会尤其天主教会，仍然在农村袒护吃教的恶徒欺压良懦。

（八）因为青年会有结讬权贵富豪猎人敛钱种种卑劣行为。

（九）因为教会设种种计划想垄断中国教育权。

（十）因为教会学校对于非教会学生强迫读经祈祷及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以上十事迫我们不得不赞成非基督教的运动；但同时又不

得不警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诸君的是：教会学校办理虽不完善，而所以能得社会上一部分的同情，是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对于社会服务、接近社会及纪律的卫生的训练这两点，实在比较中国公私立学校的学生都好得多。中国公私立学校的学生对于社会服务很少注意，学生和社会隔离甚远，学校门口高悬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两块虎头牌，便是学校与社会隔离的一个明白表示；校内的卫生与师友间的礼貌，学生在校外的动作秩序，都充分表现没有受过纪律的卫生的训练。教员只知道教书，学生只知道读书，绝对不知道训练是教育上第一重要的部分，这是中国公私立学校最可悲观的缺点。所以我敢警告非基督教的学生，若没有猛勇的觉悟与改革，在优胜劣败的原则上，我恐怕不但不能战胜教会学校，还要让他的势力蔓延全中国教育界，此事宁不痛心！

1922年6月20日《先驱》第九号　署名：陈独秀

答黄凌霜[①]（无产阶级专政）

凌霜兄：

精研笃信安那其，在中国当推兄为第一人。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且极钦佩吾兄有自白思想变迁之决心与之勇气。本来国家这个制度，克鲁巴特金并没有主张即时就可以废去，马克思也没有主张永远不能废去，这道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得极明白透澈，所以法国无政府党读此书后加入共产党的很多很多。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道理吾兄一定是明白了，尚请向旧日真的安那其诸同志详细解释，以免误会才好。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

① 黄凌霜，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曾经组织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实社"，并出版《自由录》。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尊见以为如何？

独秀

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

人类社会因治生方法不断的进步，他们经济的及政治的组织遂随之不断的进步。在这不断的进步之过程中，保守者与改革者亦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两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断的争斗；每个争斗的结果，后者恒战胜前者，人类社会是依这样方式进步的。照前人依据历史的事实指示我们的：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即不断的争斗中，依治生方法之大变更扩大了他们的生活意识，他们利害相冲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两次最大的阶级争斗，第一次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第二次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所以人类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争斗，都有阶级争斗的意义含在里面。

今日，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方在猛烈的进行中，即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虽在最进步的国家若德意志若法兰西也还未曾完全终了。在产业幼稚的东方，除游牧的民族不计外，即稍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都十分幼稚，因此国家统治权仍旧完全掌握在封建阶级之手；最进步的日本，也不过是一个半封建式

---

① 这篇文章在1922年8月10日《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五号发表以后，陈独秀又将此文寄至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胡适即于9月3日予以发表。《努力周报》是当时鼓吹联省自治的主要刊物。

半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已战胜封建的欧美资产阶级，采用帝国主义，利用产业不发达的亚洲、非洲诸国做他们的殖民地或商场，并且公然的或阴谋的运用他们政治及经济势力，钳制殖民地及商场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都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这是非、亚两洲被压迫的民族之普遍的痛苦。

在这种世界政治的经济的状况之下的中国，他也是被压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经济是自然要受环境支配的。

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因为受了列强在中国所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本国军阀的扰乱，农民被物价腾贵驱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业渐为外国机器制造品所毁灭，新兴的工商业没有保护关税及运输便利，也不能够发展起来和外资竞争。

中国政治的状况，也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操诸外人之手，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二)是国内军阀的扰乱，帝制倒了，帝制遗下来的军阀却未曾倒，大小军阀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权、财权，使全国中法律无效，舆论无效，财政紊乱而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军阀互斗之故，战祸遍于全国，金融恐慌，运输停滞，工商业莫由发展；(三)是政党之萎弱，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征。孤军奋

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的历史，但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至其余的党派，都不过凑合数百个或数十个利害相同的官僚议员，依附军阀来谋一官半职，我们不敢妄说他们是有主义政策的政党。

以上所列中国经济的及政治的现状，凡是诚实不肯自欺欺人的人，都应该承认实是如此。

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潜势力，虽然是无限的伟大，但是他们阶级的形式及知识方在萌芽时代，所以他们所表现的，只是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可以说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时期还未成熟。资产阶级的政治争斗，已经由辛亥革命运动爱国运动及护法运动表示他们的意志了。所以第一段争斗，是中国人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劳苦群众也都应该加入，因为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

因此，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现状之下，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应该以下列诸项原则为最重要的标的：

（一）倾覆军阀及卖国党，尤其首先要惩创勾结卖国党或希图割据的军阀，以实现国内和平与本部统一。

（二）废止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

铁路借款收回管理权，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绝对的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四）定保护农民工人的各种法律。

用如何方法达到上列各项标的，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的民主政治的标的，固然不是在维持现状之下，利用敌人势力鼠窃狗偷可以达到，也不是小势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为一切国家都必然建设在权力之上，封建的国家建设在军阀权力之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人民权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殖民地的国家建设在母国权力之上，无权力则无国家无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这种自然法则之支配，又是我们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若是人民的权力不能代替军阀的权力，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民主政治是不会成功的。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关键，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主张干涉政治而不主张组织政党，更是发昏之发昏。要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权力来代替军阀权力，非有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党二个以上不可；因为有这么多的党员，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才可以实施刷新政治的各项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这件事若办不到，政党政治是不会成功的，民主主义是不会实现的，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军阀政治不倒，他们各霸一方

把持财政，法律无效，舆论无效，战乱蔓延，工商凋敝，教育废弛等现状，是要继续下去的；此等现状继续下去，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现在半殖民地状况更变到完全殖民地状况的。

我们知道民主主义的争斗仅是第一段争斗，不是人数最后的争斗；我们更知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下的政党政治是必然包涵许多腐败与罪恶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人类阶级争斗亦即社会进步的过程上看起来，在中国政治的及经济的现状上看起来，我们势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腐败更罪恶的军阀政治之民主的政党政治能够成功。

现在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那里。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说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我们本不反对，但是要晓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镇乡的自治，地方自治团体扩大到中国各省这样大的范围，已经不是简单的地方自治问题，乃是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问题了。

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们这种主张，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实上，无人敢说这样大的自治权马上就能够归到人民手里，不过联省

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而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增长乱源的政治主张，我希望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

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1922年8月10日《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五号　署名：陈独秀

《独秀文存》自序①

亚东主人将我近几年来所做的文章印行了。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剿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既有出版的价值，便应该出版，便不必说什么"徒灾梨枣"等客套话。

一九二二年八月，独秀自序于上海。

---

① 原标题为《自序》。《独秀文存》由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1922年11月初版，至1934年3月发行了十版，《文存》共三卷四册，汇录了陈独秀自1915年9月至1921年8月所撰写的论文、随感录及通讯。1927年初，又编有《独秀文存》二集，汇录自1921年9月以后发表的文章，因四一二政变发生，未能出版。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1]

我对于联省自治即联邦这个制度的本身，本来不反对；但是我以为任何国家若采用这个制度，最圆满的理由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经济状况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语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须建设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扩大之上，这种合乎民治主义的进步制度，决不是武人割据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恶的"督军政治"。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器，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因此中央财政枯竭，以内外债及中央政费无法应付之故，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大小军阀在省外省内互争雄长之故，战祸蔓延，教育停顿，金融恐慌，百业凋敝，继此以往，国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

我根据以上的理论与事实，我断然不敢承认联省自治，能够

---

① 1922年9月10日《努力周报》发表胡适写的《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反对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的观点。陈独秀发表这篇文章批评胡适。

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

中国本部人民的经济状况，都在由农业及手工业渐进到工厂工业时代，南北大致不甚相远；本部语言发音虽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语言构造则完全相同；宗教虽有佛、道、耶、回之分，而无分部聚居之事；至于说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已经扩大到联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谣外别无事实可以证明；在上列的事实基础上而提倡联省自治，简直可以说是无病而呻。

近来的联省自治论，非发生于人民的要求，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这个事实，我想无人能够否认。这种无病而呻的联省自治论，在这班军阀首领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说现时的联省论，隐然以事实上不能不承认已成的势力为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而且国内政论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的势力，遂轻假以自治之名，则希图割据的武人得了时论的援助，人奋其私，师旅团长都可以效督军总司令之所为，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一省之内又复造成无数小酋长的局面，更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诸君又将以他们"不能立时放弃自治"为理由，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他们已成的势力，来主张"联道自治""联县自治"吗？

联省制即联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们所不反对的，自治更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我们人民的政治能力，才发达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说已能勉强运用省自治制，此则为常识所不许；不能而强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据冒居其名，其结果，上不能

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因为人民真能运用自治制度的联邦，未必定有害于统一，而武人割据的联省自治却去统一太远了。

* * *

最近的《努力周报》上，有胡适之先生和陈达材先生两篇赞成联省自治的文章，我现在略写点不同的意见如下：

适之先生说："我们总不懂孙吴二氏怎样能抹杀省的一级，我们至今不解国中研究政治事实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决省的问题，而能收军权于国，何以能希望不先许省自治而能使县自治！"我请问适之先生：怎见得不赞成联省自治便是抹杀省的一级？不能收军权于国，如何能够解决省的问题（即以安徽为例，不能除张马等人军权，有何方法可以解决省内各问题）？据何理由县自治必须建设在省自治的基础上面？

适之先生说："试问国宪制定颁布之后，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权奉给中央了吗？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广东，就可以自行取消他们的自治制度了吗？那些正在经营自治的各省如云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时放弃自治了吗？"我今正告适之先生：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象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先生称许湖南、广东是已行自治的省，云南、四川是正在经营自治的省，原来时贤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诚惶诚恐这种进步的政治组织，关外胡帅也会采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恶将假汝名以行！

适之先生说："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我

要问：先生所谓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经营自治的省，都是军阀用兵力取得的，他们肯以军权换省自治吗？他们果真是为了省自治才拥兵割据吗？他们宁肯抛弃军权不肯抛弃省自治吗？先生这种公平交易的估价，恐怕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

适之先生既已称许明明是割据的军阀为已行自治或正在经营自治，为何又说："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

适之先生力说：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时局，胜于武力统一；我们知道前此上海和会，费了许多时间及金钱，各代表各政客闹了无穷的笑话，结果还是吴佩孚两次放了几天炮，才解决了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陈达材先生主张联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交通不便，(二)是因为人民组织能力薄弱。我以为交通不便不是个永久不变的现象；他以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现他们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云南省长，须听命于数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们的意志感情怎么能影响北京政府？我要问：适之先生所谓正在经营自治的云南省长唐继尧，已行自治的广东省长陈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现云南人和广东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组织能力薄弱，不能监督政治，诚如陈达材先生所云。正为如此，我们应该觉悟在人民没有运用省自治制这大能力的时期，断言不宜妄行采用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因为采用联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运用，此时省政府，下无人民监督，上又无中央制裁，则军阀割据暴吏横行的现象其何能免！

陈达材先生又以为在国民无政治能力状态之下，欲求政治进步，必先做到下列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权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领

碗支配权的分散，(三)是军人与政争之分离；这三个条件，与联邦制实完全适合。我要请问：照现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权力还要更分散到什么程度，陈达材先生才觉得痛快？此时中国政权是集中在一个中央政府吗？人民分途监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里？中央政府还有政治饭碗的支配权吗？各省在邻省在省内，因为地盘饭碗的自由竞争连年开枪放炮，象陕西、四川、湖南、云南、贵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权致启争端的厚赐，陈达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吗？中国政治饭碗总只有这样大，无论支配权如何分散，同是供不能应求，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开发实业，不是饭碗支配权的分合问题。此时中国政治的实质，已经是联邦而非单一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军人与政争分离了没有？

我常说，中国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不必再鼓吹无政府主义了；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用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我以为任何好名词好主义好制度，而不为社会实际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济社会的病痛；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用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必无其他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主张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断然不可怀苟且的心理，以为他是已成的势力，来承认他助长他。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从容制

宪的余地，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分配方为适当，自然是这时候宪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所以我对于这种政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敢我敬爱的朋友们垂泣而道之。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第一期　署名：独秀

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

东荪先生：

发展中国实业，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两个途径。先生前文是否主张资本主义的发达实业，姑且不论，惟除了国家社会主义（其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私人资本主义这条路，决不是合作主义能够使中国实业充分发展的。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之。不知先生对此方法有所怀疑否？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弟万分怀疑；因为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今后的进步，必然是两阶级平行进步，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弟亦以为必经过这个时代，但无很强大的力量，而且不久必生他种变化，先生以为如何？关于联省自治问题，吾辈反对联省并非主张废省。尊论谓“特所谓省者必非今日之省”，诚是诚是，苏、皖二省就是一个好例，何以主张联省者未议及此？老实说他们完全是苟且的心理，承认现状而已，乌乎可。算是武人

狠，我们无法推翻他，让他们自去做皇帝，我们何苦要上劝进表！

独秀

1922年9月1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造　国　论

以真正国民军　创造真正民国

我们中国此时在名义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比南洋马来群岛酋长割据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那里算得是一个独立的国！在经济方面：国家重要的权利大部分抵押给外国了，外国货充满了全国，全中国人都是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全国金融大权都直接或间接操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酋长分据了中央及地方，这班大小酋长之发号施令又惟公使团之意旨是从。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完全是这样，如何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殖民地状况之下，有何国会可言！有何法统可言！有何宪法可言！有何政治可言！所以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还在政治战争时代，什么恢复法统，什么速制宪法，什么地方分权，什么整理财政，什么澄清选举，对于时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对题，便是隔靴搔痒。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倘然决定了，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造国？

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

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在中国的产业状况看来，这种大群众决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商人说，在商言商不与闻政治，教育家主张不谈政治，至今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壮大的表征；在私产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因此，我们敢说，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各阶级大群众联合的国民军如果成立了，国民的革命如果成功了，压迫我们的内外恶势力如果解除了，民主的全国（指中国本部而言）统一政府如果实现了，这时候才有宪法才有政治之可言，这时候中华民国政治上的创造才算成功，而真正的中华民国还只创造了一半，其他一半，乃是中华民国经济上的创造；因为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

用什么方法来创造经济？我们的答案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

到私产自然消灭而后已。

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

政治的创造及经济的创造都能成功，那时国民军创造真正中华民国的工作才算完结。

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叙是：

第一步组织国民军；

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

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1922年9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二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是什么

凡研究一个党派的内容是什么，必须将他的党纲和党员分子分析一下，才能够明白。要明白中国国民党是什么，也须用这个方法。

从中国国民党的党纲说起来，他起源于同盟会；同盟会的誓约中，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这就是从同盟会，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所始终主张的三民主义。第一、二句是民族主义，第三句是民权主义，第四句是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党纲之骨干。我曾亲听过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大意是说：满洲皇室虽然推倒了，而中华民族备受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仍有提倡的必要；民权是指选举权、复决权、罢官权、创制权等直接民权；民生主义，于平均地权以外，更加上土地国有，机器国有，少者归国家教育，老者归国家赡养等主张，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民生主义最近的解释。

从中国国民党员分子说起来，知识者(旧时所谓士大夫，现在的职业是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吏、军人等)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居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

照以上两点分析研究的结果，再参看他十几年来革命的历

史，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

中国国民党何以成功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团体，此事决非偶然，因为有两个重大的原因：(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二)是国人思想进步落后，至今尚在封建时代，而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输入，思想界顿呈复杂的状况，中国国民党正是这种复杂状况具体的表现。我希望国民党党员和他党党员，赞成国民党和反对国民党或批评国民党的人，都不可忽视了这一点。

1922年9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二期　署名：只眼

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

自国际帝国主义者在华盛顿会议决定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有所谓退回青岛，英国帝国主义者有所谓退回威海卫之举。

退回青岛的结果如何？除日本帝国主义者估定那中国人民无力赎回的价格之外；青岛的矿业经营名为中日各投半资合办，实际将全落日人之手；青岛的管理，照日美帝国主义的爪牙王正廷所颁布的青岛市政条例看来，完全为国际共管！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顾问和机关报，不是天天吹华盛顿会议怎样有利于中国，便是说青岛从前在德日人手里怎样弄成了近代的模范都市，中国是否有承继这种伟业而不使之腐败，以辜负列强之盛意的程度……等等敲诈的鬼话，这些话的用意，就是要完成青岛的国际共管。

现在又看英国帝国主义所谓退回威海卫是怎样一回事呢？他要求将威海卫开放为他们的自由贸易港，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一说有五条)是：

(一)英国在威海卫原有军港不能废除，当作为夏季英人避暑之地。

(二)中国派警察保卫威海卫，其警士须素与英人有好感情及有经验者。

（三）中国如在威海卫境修筑铁路，须由英人首先投资。

此外，且申言英国不愿受不名誉的中国军警之保护，并说为防威海卫之“衰落”与“消灭”计，须任外人参预市政。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

1922年10月4日《向导》周报第四期　署名：独秀

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

九月廿七日《中华新报》载：据日人方面喧传，驻华英美两国公使，对于中东路之管理方法，业经议定五项如下：(一)根据一九二〇年之条约，尊重中国之管理权，劝告中国自动的整顿该路，以防日人之干涉；(二)对于沿线之土匪，希望中国组织特别警备队备之；(三)根据华盛顿会议之决议，要求关系各国共同援助；(四)废止海参威之管理委员会，缩小哈尔滨之该技术部之权限；(五)中俄会议对于中东铁路问题，不宜干涉。

国人试看英美帝国主义怎样“根据华会决议”掠夺中东路的，怎样蔑视中国的主权，他们竟说得出口，不准中俄会议“干涉”中东路；新卖国贼外交系对于他们主人的这项训令，一定奉命惟谨，不敢违背的。所以他们天天抬出外蒙问题以塞国人耳目。而把中东路问题抛在九霄云外。被蒙蔽的国人呵，你们须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中东路问题之重要十倍于蒙古咧！

1922年10月4日《向导》周报第四期　署名：只眼

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

本报对于山东问题，虽然发表过好几次意见，但是还有讨论之必要。这个举国注视的问题，虽已签约解决了，我相信我们的读者还会极端的注意。

山东问题的解决，官场中到极引为荣幸。有些官僚的报纸，如《京报》等，甚至赞美鲁案协定签字那天，是中国人民最堪庆贺的日子；并认定鲁案解决结果，是中国的胜利。在第一部协定签字换约那天（十二月一日），王正廷在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演说道：“……幸对于各问题，均已圆满解决，此诚两国邦交上一大幸事也”。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看见那些真正以人民利益为前题的民众——也是在本国领土内享受外国侵略家的践踏和凌辱的民众，有什么欣喜的表示。不但如此，还有不少的人们，明瞭这个协定对于中国全体人民的真正意义。山东公民鲁案后援会等曾发表一篇反对这协定的宣言，福建学生且因此宣告抵制日货。中国国民的态度既然如此，怪不得《顺天时报》和其他汉文的日本报纸很愤怒的说道：为什么中国还不快快感谢日本呢？日本天皇这样很慷慨的把山东交还中国，为什么中国人民还不向日本天皇致谢恩的祝词呢？

但是我们只要把鲁案协定略略分析一下，便能发现国民为什么不满意鲁案协定的原因。

鲁案协定之第一部，于十二月一日签字，细目共分九章二十八条，细目之附件共十项；内容包括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之交还，公产、矿山、盐业等等。现在我们不妨把这协定之第一部中的要点说说。日本承认于本年十二月十日正午将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一切行政权交还中国，但是中国政府须承认青岛日本裁判所民刑诉讼事件之裁判，并诉讼行为、不动产证明、公证拒绝、证书作成及私署证书确定日期之效力。中国政府并格外承认条约批准交换前日本官宪所许可出租之地，租期满后，以同一条件，准其续租三十年。中国政府更承认续租三十年期满后，仍得再续租；不过再续租之条件，须按照胶济商埠租地规则办理罢了。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却保留公产中最精美之房屋和地基共十九处。胶济铁路沿线公产，现被日本占领，本应即刻交还中国，却规定俟开埠地方决定时，另由两国政府协定。日本政府允将青岛、佐世保间海底电之一半，无偿交与中国，却于附件中规定青佐海底电线之青岛一端，也委托日本政府代办，一切机器、线料、房屋、接线等费用，却由中国政府供给；电报房的主任和技师由日本委派，他们的薪金及其他职员的薪金和额数，均须由中日双方协定。甚至交还中国之四方及沧口各电报局日文电报之收费多寡，亦须由中日主务官厅协定。中国政府并须交付日本政府一千六百万日金，作为收回公产和盐业之赔偿费。此项金额内日金二百万元，须于公产和盐业移交后一月以内支付现金。其余日金一千四百万元以国库券交付日本政府，年利六厘，免除一切税捐。此项国库券之偿还期限，定为十五年，但不论何时，经三个月前通知，须将本国库券之全部或一部偿清。日本所占领之山东各矿山，移交一个专为经营此项矿山所

组织之中日合资公司。日本政府既将一切矿山移交这个中日合资公司，这个公司须赔偿日本政府日金五百万元。

青岛——这块中国领土——从前不过被日本资本家强夺去了，现在不过经过一度交还中国的手续，但是拿鲁案协定细目第一部一看，便知日本资本家夺得的利润真不少呀。此后日本资本家每年因此又要榨取中国人民几百万元的"赔款"。八年来日本占领之山东矿产，现在事实上是依然还在日本掌握之中。因为个个稍微明瞭一点中日合办事业之历史的人们，都十分懂得中日合资公司除了有一张中日合办合同做假招牌以外，事实上简直是个日本公司。因为完成这个"公平"的合办事业，日本又获得五百万大洋。日本资本家和商民人等，在由此公司保护之下，当然视青岛为他们的极乐乡土，他们会尽量收买青岛商业繁盛区域之土地；等到这次鲁案协定成立以后，他们便变成有永远租借权的地主了，就是租期最短的，也不会短过三十年的期限了。不但日本领事馆永远占据八段大地皮和房屋，日本居留民团占得的土地也是不少，而且没有一个字提到租金和租期呢。那些让给日本人会、日本学校、日本医院的房屋和土地，将变成永远制造"中日亲善"事业的场所了。要是说到日本的神社、斋场、墓地占据土地之多，简直令人咋舌。还有七八千亩的贵重土地，作为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既得权，在条约上说是再谋清厘，事实上再不会是中国的领土了；日本政府和商人经营之广大农场，不过附件上载了一句可以补偿赎回。倘若你再仔细看了附件中的公产项，你又可以找出许多地皮和房屋的损失，而且规定那些什么公学堂、病院等，还要维持而扩充之呢。这样看来，名义上青岛虽说归还中国了，但是除了名义上归还以外，恐怕没有归还旁的

有价值的东西罢。不但没有归还什么东西，日本却为交还公产和盐业，又在中国人民身上榨去一千六百万的巨款。而那些公产和盐业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的，现在还是属于中国人民，不过八年前被日本军阀用武力抢在手里罢了。协定上还规定日本由青岛输入机器等货物，四年内（从本年二月四日起算）可免除进口税。中国却要在十五年内，每年供给日本一万万斤到三万五千万斤的青岛盐。就是象洗衣作这样的小企业，都被日本资本侵入去了，而且这次协定还规定中国政府要给青岛日本洗衣业一种保障，这便证明鲁案协定第一部的漂亮。这样一个协定与其说是交还山东的协定，不如说是一个第二次掠夺山东的协定罢。

现在我们再看看鲁案协定第二部罢，第二部是规定胶济铁路的移交事件，本月五日签字的。在这个协定第二部中间，或者我们还可以找出日本军阀的新阴谋。

按照协定第二部说来，日本将胶济路及其支线于民国十二年一月一日移交中国，中国以四千万国库券赔偿日本。此项国库券以胶济路财产及进款为担保，年利六厘，免除一切税捐。要是不细心去研究这部协定，好象这些就是全部的内容；但是真正的内容比上面所说的，实在差得太远。鲁案协定并没有规定日本参加管理胶济路的条文，也没一家中国报纸提及日本管理胶济路的问题，但是日本管理胶济路的根据早就安排好了。这是怎么呢？我们要是翻开华盛顿会议中之山东条约看看，便能找出山东条约第十九条如下：

"前条所云之国库券未还清前，中国政府须选派日本人一名为运输总管，又一名为总司计，与中国总司计会同襄办事务以国库券还清时为限。"这就是说这条中国的胶济路——这条额外花

上四千万元国库券向日本赎回的胶济路——的全部运输事宜，现在仍然落在日本资本家和日本军阀手里。那些日本资本家和军阀还是可以和从前一样利用这条铁路的运输权，供给中国督军的枪炮子弹之类，输送鸦片吗啡的毒药。据最近的消息，说是这铁路的机务、车务、工务、警务等处长，仍由前任之日本人充当，任期二年半（恐怕不止二年半罢?），各处副处长，才由中国政府指派呢。

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实，便是鲁案协定值得叙说，值得赞扬的地方。我们虽然只把鲁案协定，略加分析，已足够使我们得到一个很确当的结论。我们的结论便是：日本一方面形式上将青岛和胶济路交还中国，实践华盛顿会议上的允诺，博得国际上的美名，他方面用他的巧妙的外交手腕，利用中国委员不顾国家利益的行为，依然保留他在青岛和胶济路之主人翁的地位。多年争持之山东问题，现在日本是得了名利双收的结果了。日本虽然这样胜利，他的军阀的欲望象是还没有满足。他们还在青岛及其附近招集土匪与以赞助，其用意实欲于日本军队退出青岛以后，还能暗中操纵和管理青岛，如从前一样呢。也是企图以土匪骚扰为借口，推迟青岛行政权的交付呢。土匪如何在青岛一带骚扰，土匪最近的行动和土匪历来被日本利用着做扰乱事业等事实，我想读者都已十分明瞭，用不着再去多说。现在日本领事又怎样在青岛设警察所等等额外侵略行为，读者也自能明瞭，也用不着再说。我们还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受日本政府侮辱的事实。当王正廷在青岛举行接收青岛行政权的仪式的时候（本月十日正午），日本代表演说，简直没有把王正廷放在眼睛里，差不多没有一句话不是侮辱他（此事中国报纸竟没有详

细记载)。王正廷的好乖,又是一问题,但是至少从日本代表看来,他总算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代表,侮辱王正廷,是不是侮辱中国人民呢?

每当我们想象所谓山东交还问题和日本政府怎样对待中国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联想到日俄长春会议的经过和日本政府怎样对待俄国代表等情形。日俄长春会议虽然破裂了,但是俄国得到什么重要的结果呢?其结果便是在俄国领土之内,现在是没有一个日本兵了。这个结果,只是由于俄国劳农政府之坚忍和伶俐的政策达到的,并没有得到什么"友邦"的"善意援助"。俄国民众的志愿和需要,是有那些俄国代表真正能够代表的,而且俄国代表团真能代表一个完完整整的俄国。但是中国人现在那里有这样好的命运呢!中国委员团那能比得上俄国代表团呢!中国委员团不过代表一个由顽固官僚组成而供军阀使用的政府。所谓"弱国无外交"这句话,不过官僚们欺瞒小百姓的话;惟有没有一个真正人民的政府,才处处损失国权。这就是为什么王正廷等的委员会丝毫没有作用和分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政府无论和那一国办交涉,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利权断送给别人。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快快起来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组织一个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将侮辱中华民族,压迫中国民众,掠夺中国富源等事实,一概消灭。

1922年12月30日《向导》周报第十四期　署名:致中

革命与反革命

吾人对于指导人类行为一切名词之解释若无一定的概念，则行为者及批评此行为者均易于堕入迷途而不自觉。中国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往往堕入迷途，正以对于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名词无明瞭的概念故。

综计人类社会兵争之祸有四：(一)外患，这是种族间的侵略战争；(二)内乱，这是野心家抢夺政权的战争；(三)革命，这是社会组织进化的战争；(四)反革命，这是社会组织退化的战争。

遍一切现象界均日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动不息，人类社会也是现象界之一，在如流不息的渐变中，积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往往现出组织上的顿变，革命便是这种顿变之代名词。

革命既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反革命必以违反进化为条件，内乱乃以社会组织之进化或退化两无主义为条件。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必须明白了解这些观念，然后才不至堕入迷途。

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在这些最大而最显著的社会组织进化之中，又各有几多比较小的比较不甚显著的进化阶段；在每个

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

因此，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都应该明白了解革命与进化之关系，对于一个革命运动都应该以他的内容及起因或结果是否有进化的意义定功罪，不应该以他的行为者属何阶级何党派定是非。因为一个阶级一个党派的理想比较是静的，社会现象比较是动的，以静的阶级党派理想应付动的社会变化，便往往因前后对象不同，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是反革命的。动的社会进化日在新陈代谢之中，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障碍他进化的旧阶级党派，他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他更进化的阶级党派，他便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

封建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长制建设比较的统一政治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在这些阶级争斗亦即社会组织进化最显著的时代，固然明白显出他们革命的及反革命的性质；在这些时代之每个时代中，又复有几多小的进化阶段现出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斗；在一些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一个党派的理想，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

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建设统一的政制，建设统一文字，这是革命的，至于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赞成辛亥革命反对洪宪帝制讨伐张勋复辟时，本是革命的

人物，后来组织卖国机关（安福俱乐部）讨伐西南护法军，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于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后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动。赵恒惕在参与辛亥革命及讨伐洪宪时，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据湖南惨杀黄、庞时，便是反革命的军阀了。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①，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吴佩孚在奉袁世凯命讨伐护国军时，在奉段祺瑞命讨伐护法军时，本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他讨伐段祺瑞安福部、张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动；因为段祺瑞、张作霖、安福部、交通系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不但封建式的党派人物在这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同时现出革命的及反革命的两种行动，即民主派社会主义派也往往前后取革命反革命两种不同的态度。例如：法兰西的共和派，在十八世纪打倒帝政时是何等急进的革命先觉，在二十世纪因为要压迫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不惜与帝制派宗教徒妥协；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在帝政时代是何等革命的英雄，现在因为反对劳农政府不惜和一切反动派合作。

---

① 在1922年9月17日《努力周报》第20期，胡适发表题为《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一文中把陈炯明发动的对孙中山的武装叛乱称作“是一种革命”。

因此，我们对于革命与反革命可以决定两个概念：(一)革命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因为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武力暴动的手段；所以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凡是在社会组织进化上阶级争斗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业，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误认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组织进化)。(二)我们称许一个革命派攻击一个反革命派或自命为一个革命派，都不应该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

我们若是明白瞭解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进化阶段上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我们又可以看出益友社反对一个较开明的军阀取媚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之政策的错误。

1923年1月18日《向导》周报第十六期　署名：独秀

反动政局与各党派

中国政治上主观的需要是实现民主的统一的政制，不幸社会的基础日久建设在家庭农业手工业之自足的经济状况上面，以致客观的民主的统一运动犹未发达到全社会普遍的舍命的要求，以致军阀尚完全掌握着统治权，以致除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个党派不徘徊于军阀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因此我们敢说：中国政治改造之目前第一步，还说不上建设民主的统一政制；目前第一步的奋斗是要比较进步的党派即刻觉悟自身的价值与使命，相互捐除宿怨联合起来，打破最黑暗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及卖国官匪（新旧交通系、安福部等）互相勾结的反动的政局；这种反动的政局，是中国政治向民主统一的路上之唯一障碍物，此物不去，民主的统一政治永远不能开始工作，去此障碍即是民主的统一政治开始工作之第一步。

杨以德①杀伤唐山工人事件，最高问题贿买议员事件，破坏司法独立事件，这都是反动政局所必然演出的反动现象，固然是我们应该起来积极反抗的；但同时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万万不可以只看见这些反动现象之各个问题，而忘记了这些各个反动问题都是一个反动政局所必然演出的现象。因此我们固然应该向

---

① 杨以德，时任天津警务处长。

这些各个反动现象加以攻击，我们尤其应该向产生这些现象的反动政局加以根本的总攻击！

全国工友们！杨以德不过是有威权者的爪牙之一，他枪上所染的唐山工人血，是应该用我们全国工人血来洗去的。恶政治日日来压迫我们，我们应该即刻抛弃工人不干涉政治的谬论，大家站起来做打倒军阀官僚改良政治的急先锋，比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革命家还要加倍勇敢前进！

国民党诸君！保障民族、民权是国民党人唯一的使命，要奉行这个使命，第一要认清最违反这个使命的敌人是谁；第二要将奉行这个使命的基础建设在每个民众革命的行动上面，勿失去一个参加民众运动的机会，万不可单单建设在军事行动上面，造成新的军阀，站在被革命的地位！

好政府主义者！你们在政治的信用上，对于目前的反动政局固然不应该取消极的态度，即在个人的友谊上，依封建时代的道德也不应该袖手旁观！干！干！干！

青年学生诸君！"五四"的光荣由你们自己消失了，也可以由你们自己复兴起来啊！希望你们万勿只看见蔡校长辞职问题，和罗文干下狱的问题①，而不看见汉口的市民和工人同胞被英国帝国主义蹂躏的问题；更希望你们万勿把蔡校长辞职当作仅仅一个教育问题，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政治是一件整个的东西，各项行政作用是绝对不能够分离的，"司法独立"、"教育

① 1922年9月18日，吴景濂（众议院议长）等认为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迫使黎元洪下令逮捕了罗文干。其他阁员对此不满。吴佩孚电责黎元洪违法，曹锟则通电攻击罗。"罗案"反映了以曹锟为首的（天）津保（定）派同洛（阳）吴（佩孚）派之间的权利之争。

独立"不但不是革命的口号，并且是不可能的梦想，象这种消极的退缩的哀求，是万分不应该出诸青年之口！

工商业家诸君！你们要明白在这种贿买总统、破坏司法、摧残教育的反动政局之下，裁兵、制宪、理财的理想又何能够见诸事实呢？你们出来与闻政治是中国一个好现象，但游说哀求是必然无效的，望诸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益友社①诸君！你们党中很有许多有气节有骨格的革命分子，你们若真心要打倒军阀，我们焉有不敬仰之理。但不幸眼前的事实，你们却一面跪在一个最黑暗的军阀面前，一面来抵制一个较开明的军阀，这种反动的态度，是国民所断不能容忍的呵！

研究系左派诸君！你们过去在政治上虽然做了许多很大的错误，然终究不但不是军阀，并不是官僚；你们的态度虽过于温和，然终究还算有点政见的；凡是一个政党，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绝对不许取消极的态度，诸君若不决心抛弃政治生涯，便应该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

政学会诸君！你们目下开始与革命的国民党合作，是很能洗去以前的过失，应该受人赞美的；因为我们评判各党派的功罪，应当以目前行动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为标准，不应怀抱成见的。但希望你们对于目前反动的政局应该有积极的表示，仅仅消极的否认彭允彝为非政学会会员是不够的呵！

小孙派诸君！诸君由进步党的左派而加入革命的国民党，已经证明你们有了一很大的进步。诸君既已加入了国民党，国民

---

① 原系南方国会议员派系之一，其主要成员有吴景濂、褚辅成（众议院副院长）、王正廷（参议院副议长）。

党一天不抛弃革命事业，你们便应该和他一致行动。在现在这样反动情势之下，已经迫使退步的政学系前进一步；你们已经前进了一步的，便当更向前进而与革命的国民党密切的合作呀！

洛派军人诸君！你们在打倒安福部段祺瑞打倒张作霖交通系的行为上，不但是爱国者，并且是一种革命的行动，但同时你们谬误的方法和软弱的心理酿成了现在的反动政局，简直是你们的罪恶，你们若没有立功赎罪的决心，国民是不能宽恕你们的！

反动政象的恶空气几乎堵住了我们的呼吸，国会议员的行为完全丑化了人间社会在畜牲界以下，全社会各阶级人格在畜牲以上的各分子快快起来加入打破反动政局的联合战线呵！谁是爱国者便应该担任这联合战线上之第一个炮声！

1923年1月18日《向导》周报第十六期　署名：独秀

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

一，议员受贿案

二，国会违宪案

我们曾立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见地上攻击外交系之前内阁，无所谓个人的好感与恶感；现在对于罗文干卖国嫌疑，不欲作事实及法律以外之攻击或辩护，亦无所谓个人的好感与恶感，惟对于司法行政长官，以命令干涉审判及不依诉讼法之声请再议、拘押被告这两点，不得不警告资产阶级的和平派梦想在军阀势力下能实现“司法独立”和“保障人权”。至于一个教育总长结党营私，一个大学校长愤而辞职，我们除了感觉得是反动政局开始崩溃之征兆以外，更没有特别注意讨论的价值。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上，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讨论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刑法上的议员受贿案；一是约法上的国会违宪案。我们注意讨论这两件事，不是厌恶反动政局之心理的推测，乃根据下列两个事实：

（一）（某问）外间谓此次阁下包办最高问题确否？（高答）最高问题现在时机未至，更无所谓包办。（某问）此次二百元之津贴，非由尊处经手乎？所谓包办即指此也。（高答）此事从前系由刘君与政团接洽，余事前一无所闻。迨本月五号以后，某军需官来京借住敝宅，所有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致发生此种误会。

至曹巡阅使此举，系仿从前送冰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更无所谓津贴。（某问）外间传言阁下与张亚农之新民社独厚确否？（高答）余对各党向无歧视，亚农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经手银钱谢绝，几为亚农所恼，何厚之有？（节录一月十六日北京《京报》高凌蔚谈话。）

（二）昨日下午一时，北大学生约千人，自该校第一院出发赴象坊桥众议院，每人持旗帜一面，上书“驱逐教育败类彭允彝”、“拥护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等字样，列队而行，沿途发散传单。学生军维持秩序，队前有大旗一面，书“警告国会”四字。二时四十分，至众议院门前，时法专、医专学生已先至。三校学生相见，呼声雷动。各校正拟推举代表呈递请愿书，突有警察百余人……或用枪刀或用皮带，向人丛中突进，学生手无寸铁，皆披靡奔避。警察仍拚命追逐，致学生有倒卧地上不能行而受践踏者。当时情景，旁观者多战栗惊愕，目不忍视……而此时有类似车夫之流氓多人，亦应声呼喝，大打学生。警察将学生驱出象坊桥后，始行退回院前。事后调查，计受伤二百余人，受重伤者约五十余人，其伤脑及内脏者北大有八人。如夏应池当时重伤，至呕吐鲜血，黄日葵、呼霖雳皆头部受伤极重。现受重伤学生皆分别抬往瞿氏、德国、法国、首善、尚志诸医院。（节录一月二十日北京《晨报》。）

第一件议员受贿的事实，由《京报》登载出来到现在已过一星期，议员及内务总长高凌蔚两方面均无一字之声辩，其真假便不用讨论了。并不是点名发饷，为什么某军需官来京即将各党名册送至红罗厂？正在衰说所谓最高问题时，曹巡阅使忽然送议员炭敬，联络感情，究竟是何用意？在欧、美、日本诸立宪国，此种

事实若在新闻上披露出来，行贿者、受贿者均早已由检厅起诉拘押在监狱里了。化日光天之下，公然行贿受贿，内务总长公然向新闻记者直言不讳，真是目无国民，目无检厅！

第二件国会违宪的事实，也是百口莫辩的。凡是立宪国无论君主民主，人民在宪法上都有请愿的权利，中华民国的约法也有明文；现在学生是向护法的国会请愿，不是向皇帝京控，议长竟纵令警卫流氓殴伤学生多人，这明明是不承认人民在约法上有请愿的权利，这样若不算是违宪，什么是违宪？议员诸君试扪心自问，若以前安福国会在北京有此举动，诸君在广东高唱护法时，是否要通电严责非法国会违宪之罪？当真诸君即是约法之化身得任意或违或护吗？现在教职员学生似乎重视驱彭留蔡问题而轻视了国会违宪问题，一般社会以为此次风潮是国会殴打学生问题，而忘记了是国会剥夺人民请愿权利问题（今日学生请愿被打，将来农、工、商人请愿也可被打），都是大错而特错。原来宪法上请愿权之用意，是使含冤受苦的人民有路可走，是和缓革命之方法；我们向来不赞成这种叩头下跪式的请愿，正因为他是非革命的方法，是和缓革命的道路，现在既然由国会宣告"此路不通"，大家赶快另外寻一条可通的路去走罢！

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家及学者诸君！你们向来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你们向来是迷信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可是今天横在你们眼前的议员受贿、违宪两个问题，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不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问题，乃是一般人民权利被损害的问题，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不容许的问题，你们若不出来为此问题而奋斗，以后还有何资格有何脸面高谈什么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

司法界诸君！检察官对于这样明白受贿、违宪的事件若不提起公诉，不能说不是溺职，以后还有何资格有何脸面高谈什么司法独立！

1923年1月24日《向导》周报第十七期　署名：独秀

评蔡校长宣言

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恶浊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已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有奶便是娘"、"助纣为虐"、"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在衙署里面之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高明得万倍；但是我们以责备贤者之意，对于他这种"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认为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所以不得不竭诚把这两个观念的缺点忠告于蔡校长且以告国人：

（一）是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的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极的高尚洁已态度，因为社会上领袖人物若取消极的态度，不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并且往往引导群众心理渐渐离开苦战恶斗积极的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东洋民族之所以衰弱不振，正以消极的思想为最大病根，因此我常常痛恨中国的老、庄学说，及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为东洋民族唯一的仇敌；甘地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及非暴力的抵抗主义大失败之经过，消极的东洋民族之弱点已暴露无余，现在北京《晨报》竟称蔡校长为中国之甘地，竟称不合作主义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真是中国思想界一大厄运！我们当如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以保护群众的革命运

动之一线生机；而《晨报》记者反希望蔡氏之主张能如甘地风靡印度，真是岂有此理！

（二）蔡校长宣传不合作主义，明明不过是希望一般做装饰品做机械的学者官吏采取拆台政策，他这种政策，可以证明他眼中只看见一班无良心无能力的学者官吏，而不看见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只看见武力不看见民众，蔡校长打倒恶浊政治的运动，也只看见学者官吏而不看见民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辛亥之役，清帝政府虽倒，而革命并未成功，正以这个缺点为最大原因，蔡校长的宣言竟引据推倒清室为不合作主义成功之例，正是一个相反的证明。

我们敢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1923年1月24日《向导》周报第十七期　署名：独秀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

我们一方面天天骂军阀官僚包办政治败坏国家，一方面却又天天主张我们不干预政治，这种思想是何等矛盾！中国社会向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士人（教育界属之）说：我们只要专心办学求学，不必问政治；农民更在那里睡觉，连政治这个名词还不大知道；工人说：我们只求改良生活，我们不愿干预政治；商人也说不谈政治。好了，士、农、工、商都不问政治，有个国家又不能没有政治，如此政治只得让军阀官僚来包办了。因此，我们敢说：中国政治坏到现在这样地步，不是军阀官僚自己要包办政治的罪恶，乃是士、农、工、商都放弃责任而且忍心害理的主张不问政治，甘心让军阀官僚包办的罪恶。单就教育界的士说，政治不清明，财政紊乱，教育费无着，你们如何能办学、求学？于是你们妙想天开的说：教育独立，不问政治。我现在要问：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我又要问：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有何力量可以保证不被军阀拿中〔去〕？若无人圆满的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希望“教育独立，不问政治”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勿再出诸知识阶级的教育家及学生之口！现在有些人对于学生请愿被殴风潮又说：我们只主张教育独立、司法独立及驱彭，不干预政治。其实教员学生除

了教书读书以外，出来主张教育独立，主张司法独立，主张驱彭，也都是些政治运动了，还说不干预政治，真是掩耳盗铃。亚里斯多德说得好："人是政治的动物"，除非不是人，那能够不问政治！"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是中国人安心不做人的表示！

1923年1月31日《向导》周报第十八期　署名：独秀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

政治之根本的改造，只有“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八个大字为正确的有效的方法；然而来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改革家，总脱不了浪漫的倾向，激烈的往往走到暗杀或暴动（一时无组织的暴动）的路上去，和平的往往走到不合作（新村运动也归在这一类）的路上去，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绕来绕去，总不肯向正确的有效的革命轨道上走。这些浪漫的倾向，自然是社会改造运动中不幸波折，却是阶级根性上历史的遗传，非一时所能脱净的。从事暗杀或暴动的人，不能不算是激烈的革命分子；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老实说还是封建时代非组织的一时冲动的浪漫根性之活现。实行不合作主义的人，他那种愤时疾恶的热诚，比起一班同流合污之辈，自然值得受人赞赏；但是他那种消极的态度，老实说确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心理之模范的暴露。

这些把戏——暗杀、暴动、不合作，现今都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或隐或显的照例扮演出来了。

中国经济的变动及紧迫，已造成新势力民主革命的条件，而旧统治阶级——军阀官僚之黑暗昏聩腐败无能力，又日夜舍命向被革命的路上狂奔，无形的革命空气一天增涨似一天，至少也充满了沿江沿海沿铁路各城市。“山雨欲来风满楼”，只恐怕国内一班新势力之领袖及青年，仍为浪漫的理想所迷，而不知采用

正确的有效的方法(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因风造雨,致失时机,岂不可惜!

暗杀是第一谬误的方法,因为善与恶都是社会的关系、阶级的关系,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之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不但不是革命的行为,而且是革命之障碍;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暴动这个方法,比暗杀进步得多,但革命固然要采取暴动的手段,而暴动都〔却〕不尽是革命;我们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暴动,我们所反对的是有些人误解迷信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一时冲动的暴动就是革命。我们所尤其反对的是妄想利用军队或土匪或红胡子一时的暴动,达到革命之目的。这种浪漫的暴动,决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即使能得着一时的胜利,也决不能在实际上推倒旧统治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种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的暴动,好象水上浮萍毫无根据,而且没有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基础,往往有以暴易暴的危险,他自身决无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至多不过真象胡适之先生所说:"快意一时"、"恶因种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决没有使人可以充分满意的大改革"罢了。要达到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这种科学的暴动,决不是一时的冲动,乃建设在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上面,也只有在这

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无数的民众运动中，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得到无数的新教育新经验新人才，才能去掉许多恶因，才能产生许多有用的好人，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必须如此，才能使复杂的社会组织现出一度变更；这种暴动这种革命才是科学的，这些结果都不是浪漫的暴动所能够得到的。

我们反对不合作主义，不用说不是赞成与恶浊政府合作，乃是反对社会上领袖人物只知道拿消极的不与政府合作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退让的路上去，而不知道采用积极的与民众合作方法，来做积极的进攻的革命运动。这种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不但有引导民众离开积极革命的恶果，而且不合作主义的自身，是浪漫的，是和平退让的，在印度百余万甘地党徒尚且是行之无效，明白的破产了，结果只变成了革命的障碍物，变成了革命党人看做在英政府以上的仇敌；何况中国式的不合作主义，蔡校长一个孤家寡人的不合作主义①，简直无产可破，请看蔡校长所希望在衙署里面之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正在那里得意洋洋的代表总理大人说什么

---

① 1923年1月19日，蔡元培为财政总长罗文干遭非法逮捕，因此，蔡发表《不合作宣言》。宣言说："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濂、张伯烈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弹劾质问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为，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院乃竟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同时，递辞职呈文，谓："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等等。（见《北大日刊》）随即，蔡元培又刊登"不再到校办事"之《启事》，悄然出京，到天津小住，准备出国。

"彭蔡解除误会，或更至交欢"这一类的话，便是一个明证。以前蔡校长等所发表的政治主张(见二号《努力周报》)上说："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为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又说："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这种积极的精神，实在是治疗中国人恶劣的消极根性之圣药，想不到现在蔡校长又回到笼手消极的旧路上去了！我们现在要请问当日和蔡校长发表同一主张的十五个要做奋斗的好人们，是否也都跟着蔡校长笼起手来让恶人背着走？是否也要做当日自己所痛骂的"罪魁祸首的好人"？

我们明瞭正确的主张是：

科学的革命运动——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反对一切个人的浪漫的消极的行动；

创造武装的民众，不赞成个人的暗杀；

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训练有纪律的暴动，不是一时无组织浪漫的暴动；

积极的与民众合作，决不把消极的不合作当做一种主义，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

1923年1月31日《向导》周报第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世界经济状况已指示世界无产阶级在对于世界资产阶级共同作战之中，分出三种策略：(一)欧美资产阶级已于一世纪半以前完成了他们推倒封建阶级的使命，实现了他们阶级的政治，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经济条件也发达到急切推倒资产阶级而自己取得政权之可能与需要；(二)日本资产阶级只发达到脱离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羁绊而与本国之贵族军阀平分政权的程度，因此日本政治成了一种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之现象，目前日本的无产阶级仍有推进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战之需要，而且他们的势力已集中，已有与封建阶级作战之可能；(三)东方诸经济落后国如印度、中国等，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本国封建阶级的势力勾结支配之下，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壮大，即资产阶级亦尚未发达到势力集中，对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有自己阶级的争斗之觉悟与可能，因此他们每每有依赖贵族军阀或帝国主义者而生存的倾向；此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以外，仍应采取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

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战斗过程中，才能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

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

"政治问题"

A、统一与分治问题：武人依靠外力割据纷争的现状，为资产阶级势力及劳动运动得集中之大障碍，吾人应当反对军阀的分治主张，而赞成资产阶级的国民统一运动，并促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互相结合，而极力反对其互相分裂或反与军阀合作；然在国民统一运动未能集中时，若有由一地方人民奋起反对一地方军阀统治的自治运动及不压迫劳动运动不依赖帝国主义者之民主省政府，则吾人亦宜赞助之，以消灭一部分军阀势力及减少一部分帝国主义者之侵略。

B、对于国民党问题：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

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

C、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向一切帝国主义者加以攻击；同时亦可联合半民族运动的党派，向一派帝国主义者作战（例如资产阶级反对日本时）。

D、国会问题：现在国会已经过十年，无论民八民六均未能代表民意，吾人主张用普通选举法选举而不为军阀势力所支配的新国会，同时亦必须改组一新政府，而对于现有的国会及政府，亦仍要作劳工立法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之运动。

E、对俄外交：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俄交涉如通商、中东铁路、松花江航权、庚子赔款、蒙古等问题，吾人应主张即速与俄罗斯直接开始谈判，绝对不容第三国之干涉或参加。

F、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觉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客观的可能。

"劳动运动"

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已有地方的组织进到全国的组织之倾向，由经济的争斗进到政治争斗的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劳动运动，除普通运动（如减时加薪，劳动立法等）外，应利导此倾向依次进行下列具体的计划，以增加其实际的战斗力：

A、有系统的巡回政治宣传，此项宣传务使工人阶级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运动，进到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运动。

B、工厂委员会之运动：单是工会运动，工人的势力终于站在生产机关的外面，其运动之基础恒不巩固；惟有实现工厂委员会之制度，廓清工头、包工及一切居间人之障碍，才能使工人的势力达到生产机关以内。

C、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及矿工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三个有力的分子，海员已有全国的组织，铁路工人及矿工经数次大罢工，亦有全国的组织之可能。

D、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角同盟：在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劳动总联合中，尤其在工人组织幼稚的国里，若是没有几个大的有力工会为中坚，是不容易团结及持久的，所以在未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以前，必须努力先成此三个产业联合的三角同盟。

E、为巩固及强大劳动阶级之战斗力计，应该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应该极力指斥无政府工团派以"独立""自治"等名词使劳动阶级之组织及运动分裂的阴谋；因此，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二一〔三〕年五月一日）首先要提出"全国

劳动统一"的议案及议定关系全国劳动阶级利害的各种共同工作，并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筹划及指挥实施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上各项统一的策略，以防欧美资本进攻之余波或及于中国。

"农民问题"

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

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难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中国一般农民之痛苦如下诸端：

（一）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此事实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贫农仇恨外国势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给军阀不断的源泉。

（二）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一律受苦。

（三）兵乱灾荒农民大为迁徙，其迁徙所致的地方遂至佃农雇工均供过于求，因同业间竞争，地主及雇主所要求的条件日加苛酷。

（四）因以上三种之结果，农民食用不足，遂不得不受高利盘剥之痛苦，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甚。

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

（A）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此等大地主

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

（B）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

（C）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

（D）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租额，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

（E）开垦荒地。主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

（F）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挖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运输上亦有绝大之影响。

陈独秀

1923年1月[①]

《"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8月第1版。

---

① 原文未注明时间，此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

现在全世界的大患都是兵患，但欧、美、日本各国的兵患，不在兵之本身，而在帝国主义的政府拿兵来压迫殖民地，拿兵来互争殖民地。中国的兵患，乃在军阀拿兵来拥护他们私人的地位，增益他们私人的财产；而中国的兵何以甘心供军阀私人的利用和牺牲，乃因中国兵是由军阀雇佣的土匪及各种无业游民而成，军阀的威权乃建设在这班土匪游民之上。这班土匪游民专以当兵为职业，职业兵靠兵官吃饭，兵官靠大帅吃饭，大帅一旦失了地位，兵官及兵便失了饭碗，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兵患乃在兵之本身。救济中国兵患之根本方法，不专在裁兵，而在改用征兵制来代替现在的职业兵；因为征兵服役有一定的期限，退伍后有一定的职业，和官长大帅没有永久不可离开的经济关系；而且征兵区域有法定的限制，势不能任意的无限增加；所以在征兵制之下，无论如何野心家，至少也不能够造成中国土匪头的军阀。

议会制度虽在欧美各国已成末路，而他们当初发生及存在却有历史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他们的资产阶级都很发达，大部份的议会议员都有相当的职业，都隶属于政党，每个政党都能代表资产阶级一部的意见与利益，所以他们的议会制度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后援的。中国的议会则

不然。产业幼稚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尚未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阶级，因此至今不曾有一个代表阶级意见与利益的政党，所有的政团，无非是一班非阶级化的无业游民单纯为自己个人利害关系凑拢起来的。因此，中国的各阶级议会都没有阶级的后援，各级议会的议员都没有相当的职业，这种以议员为职业的议员，自不得不视职业为谋利的工具，这种浮萍无根的议会，自不得不仰权门的鼻息以图生存，他们助纣为虐固然可以横厉无前，若真为民权奋斗而抗权门，宣不能一朝存在，议员只能为恶不能为善，乃是必然无可逃免的事实。所以我敢说：全国各级议会的议员种种失德败行横暴堕落无人格的行为，并不是议员们本身的罪恶，乃是强效欧美的议会制度而不合中国社会状况的罪恶，循此不变，虽改选数十百次，也必然是后先一辙。救济之道，惟有用革命的手段废去现行各级议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改用由现存等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此种国民会议，不但代表其团体的意见与利益有一定之后援，能收监督政府之实效；而且每年改选一次，每次会期不过一二月，不妨碍议员固有的职业，谋生无后患，至少也不至象现在的职业议员长久群聚废业，为谋利求官而有奔走结纳煽动政潮的必要与经验。

1923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十九期　署名：独秀

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

蔡校长是我们最敬爱的人，但我们对于他消极的方法之宣传，认定在青年思想界，在革命的民众心理上，都有极大的恶影响，故不得不进以忠告。以前蔡校长只办教育不问政治的谬误主张，已经收了恶果，已经引导青年学生到了极沉寂的睡眠状态几于不可救药；他现在虽然觉悟到恶浊政治使他不能再忍受而希望政治清明，却已后悔迟了，而且仍然取"退的"消极态度，又来宣传第二个谬误主张，北京《晨报》记者指明他是不合作主义，并居然称许为"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我们认定蔡校长这第二个谬误主张，又要造成恶果，第一个恶果已经遗祸无穷，一时很不易改正过来，现在又要收第二个恶果，真是青年思想界之厄运重重，我们实在忍不住不出来反对；因为中国人婴退的懒惰的病根甚深，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正合他们的口胃，若是有人附和盲从起来，婴退懒惰不肯挺身奋斗的人们，正好借此鸣高，其实是拿不合作主义为安乐窝为避难所，以遮掩他们懒惰怯懦的羞辱。

北京《晨报》记者现在也承认："现时我国可否鼓吹'不合作主义'，的确是一个问题。"也承认："我们中国在军阀政蠹盘据的政状之下，非有一种更深刻的标语，更严厉的手段，恐怕不会得

群众底了解。"我们深深感谢《晨报》记者这种论调可以加宣传不合作主义者一个很大的打击。《晨报》记者又说："不合作主义是打破现状底一种方法，而恐其不是有效的方法。况且蔡元培宣言，仅仅说到正谊主张者，不要替政府帮忙一层，此外有无其他主张，及蔡自身辞职之后，有何活动，都无从知道，我们决不愿轻易替他鼓吹。"这些话都说得极其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恶浊政局是有历史的有组织的一件东西占住了空间，必须有一件东西能够积极的打倒他代替他来占住这空间，才是有效的方法；不合作主义的本身决没有这种性质，不但没有这种性质，而且是消火这种性质的利器，因有民众心理尤其是懒惰怯懦的民众心理，遇有人示以解决困难之比较的和平方法，他们的精神希望便集中到这个方法，痴心妄想以为他足以解决困难，非等到这个方法完全失败，便不会发生另寻方法的精神作用，更不会——而且以为不须——走到革命的路上去。因此，我们认定宣传不合作主义，在打倒恶浊政治方面看起来，是绝对无效的方法；在消灭民众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来，却是第一有效的方法。蔡校长若不愿与恶浊政府合作，辞职出京，别有所活动，则不合作只是别谋活动之过程中一个行为，决不能说是一个主义，但是他不独辞职宣言后无所活动，而且宣言中明明只是宣传某君"相率离京"、"相率辞职"、"不再替政府帮忙"等名言和他自己对于研究学问的兴趣，此外并没有别的主张，蔡校长痴心梦想用这种浪漫的消极方法来拆散恶浊政府的台，来求政治清明，已经是大错而特错了；《晨报》记者又从而盛称他"宣传不合作主义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更是错上加错。我们应该竭诚忠告《晨报》记者，个人立言错了是小事，因为要回护自己的错遂不顾社会的错

是大事；因为不忍社会的错遂不惜承认自己的错，这是最勇敢的行为呵！

《晨报》记者不承认"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有害的主张，不承认甘地主义在印度已经失败者，不承认甘地"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在第一点，可惜我们没有这种逻辑的头脑可以认识"不合作主义"不是消极的，至于他的害处，前文已详，现在不必再说。在第二点，这有事实的证明，本报另有纪述，也不必重及。在第三点，这是《晨报》记者根本的观察错误，我们不可不讨论一下：第一，《晨报》记者所列举的甘地八种主张，若说都不是消极的，便可以说人间行为无一不是积极的，而西文字典上也可以将Negative、Passive等字永远删去。第二，若说"不"字是他们的手段，决不是他们的目的，此话便差了；我们正是指斥他们所取的手段是消极的，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之可能，而且阻碍革命运动；至于说到目的，出家求仙学佛及山林隐逸的人，何尝没有积极的目的，蔡校长想拆散恶浊政局的台，又何尝不是积极的目的。第三，《晨报》记者举出甘地许多积极的行动，证明他不是消极的人物，这便更差了；正因为他积极的"树起'不合作主义'的旗帜之后，遍历全印，到处宣传，演说不足，继以文字，务使一般印人彻底的了解他的主义。"革命运动因此大受了釜底抽薪似的打击，甘地的奋斗，正是他的罪大恶极处；他若是愤而辞职之后，隐遁起来，独善其身，所遗下的恶影响还小得多。第四，《晨报》记者说："他（甘地）根本上对于现代欧洲文明，异常反对。他觉得机械工业而〔是〕演成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底最大原因。英政府想把这种机械工业制度移植到印度去，所以非极端反抗不可，民族观念还在其次。"如此说来，甘地运动决不是民族的革命运动，乃是

复古的反革命的运动，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性，把资本私有的罪恶和由他产生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些罪恶也是历史进化的必然性），都归到机械工业物质文明身上，简直和从前英国工人打毁机器是同样的见解。托尔斯泰、达哥儿、甘地都是这一流的昏蛋，他们妄想以为人类社会可以拿主观的空想来改造的，他们妄想以为手工工业可以和机械工业竞争的，他们妄想以为人类历史可以由人力开倒车的。吴稚晖先生说："印度比中国更无望，因为印度反科学反物质文明的民族性比中国更甚。"这乃是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二大病根之一（其一是消极的思想）。第五，《晨报》记者说："劳动阶级底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底表现，难道《向导》周报记者连罢工也不赞成吗？"我们的答复是，工人罢工，乃是被雇者在承认现制以内，对于雇主在一定的要求条件之下所采用的手段，部员罢工索薪，也是这一类，与所谓"不合作主义"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不合作主义应该是无条件的，这一类的运动，只是一部分的改良生活的有条件的经济要求，不是无条件的根本推翻的政治争斗。象工团主义派不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而妄想单用总罢工的手段推翻统治阶级，简直和蔡校长想拿总辞职来打破恶人政局是同样的谬误，我们当然也是不赞成的。此外还有几种罢工（如不适时机及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等），也是我们所不能赞成的。《晨报》记者以为我们对于工人罢工都应该盲目的一概赞成，这个思想未免过于简单了，过于浪漫了。

我们很敬爱的《晨报》记者！请你们去掉成见，去掉浪漫的思想，平心静气的就客观上精细研究一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是个不能实现的空想？是否有打破恶人政治的可能？恶人政治是

否必须积极的民众革命才能够打破？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有消灭民众革命心理的恶影响？倘弄清了这些问题，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同做思想界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1923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十九期　署名：独秀

统一的国民运动

军阀们的罪恶，国民都已经亲眼看清楚了，非打倒军阀不能救国救民，国民也渐渐觉悟了，但是如何打法才有效呢？

我们要知道：军阀的运命固然已去末日不远了，然自古道"困兽犹斗"，他们最后必死战，却也未可轻视；况且他们的知识力量固然不过是些土匪头，不能当真算个什么军阀，但是政权武器都在他们手里，比起我们组织很弱的人民来，还是矮人国的长子，若是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

所以要打倒军阀，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

现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工人屡次罢工，别人都袖手旁观；学生请愿被打，大家说是学潮；林超然非法被捕，只有新闻界出来抗议；商界虽号召裁兵运动，而眼见学界、工界与军阀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勋，安徽人民反抗马联甲，别省的人都是隔岸观火。这样散漫不集中的各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困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

1923年2月27日《向导》周报第二十期　署名：致中

致 胡 适

适之兄：

弟已于前月廿六号到广州，一切平安，勿念。秋白兄的书①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此间局面尚称巩固，决不似京、沪各报所传之恶。孙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特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实行此计耳。《努力》出版，望每期赐寄一份为叩。

弟实庵白〔一九二三年〕四月七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1979年版)

---

① 即《赤都心史》。

怎么打倒军阀

中国的统治阶级还是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他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下面的臣仆，是中国政府上面的太上政府；他们利用政权来卖国，来紊乱全国的财政军纪，做出在法律以外压迫人民的一切黑暗罪恶；他们断然置外交紧急、国库破产而不顾，一意索款增兵，藉口统一，屠戮异己。这些都是昭然的事实，人人知道，不用我们再说了。近来以外交内政上种种事实的教训，国民各方面救国的思想及方法都已渐渐集中到“打倒军阀”这一点，这也不用我们再来解释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打倒军阀，但是在决定这个问题之前，必须了解军阀存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运命。

第一我们要了解军阀们所以存在，决非偶然，他们有两个强大的基础：(一)是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后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的最高形式，他是依靠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荣华，所以自来各帝国主义者都不愿被他们压迫的民族能够自强，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采用的政策，总是扶助比较黑暗的旧势力扑灭国民运动的新势力，在中国极力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压迫民党，这是以往的明证；现在对于地方的军阀还是明扶暗助，日本在奉天供给军械，英国在广东援助陈炯明，上海的领事团极力结纳何丰林，连市民对于孙中山的欢迎会都禁止了，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周刊》都不许发行，这都是眼前的明证；所以帝国主

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若不因中国国民之反抗或国际形势之变迁而失坠，终是军阀最有力的后援。(二)是国内无业游民的后援。军阀的势力在兵多，兵从那里来，不用说不是依法征调而来，乃是一班无业游民，由军阀出钱招雇来的。这种兵匪不分的兵，原来本无职业，或是失了职业，现在以兵为终身职业，终身要靠大帅吃饭，自然不得不昧着良心服从大帅命令去杀人、放火、抢钱，无所不为，大帅拿出吃饭不饱饮酒不醉的小钱，雇用一些土匪兵，去抢政府人民成百万成千万的大钱，真是一本万利；可怜这班职业兵，打死一队，马上可以再招一队，解散一师，马上可以再招一师，这种非阶级化的游离无产者(即无业游民)，不是他们心里之恶特异于人，乃是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职业，使他们不得不供军阀牺牲，不得不为军阀作恶。中国此时无业游民群众日见增多，他们简直是供给军阀势力之无限的活动资金。

第二我们要了解军阀的运命固然已去末日不远，然而自古道困兽犹斗，最近曹、吴、冯、齐有在"北洋正统武力统一"口号之下大结合的趋势，他们这最后的决死战，却也未可轻视；况且他们的智识力量固然不过是些土匪头，算不得什么真的军阀，但是政权与武器都在他们手里，比起我们组织很弱的人民来，还是矮人国里的长子，若是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

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打倒军阀，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一) 必须做民族独立运动，排除外国势力，造成自主的国家，以根绝军阀之后援。有一班人以为只须做拥护民权打倒军阀的运动，不必牵扯到反对帝国主义，多树敌人。他们不知道中国在国际地位还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军阀自身究竟没什么

真实力量，他们的屡次战争背后都伏有列强间势力竞争的意义。所以我们固然要根本上反抗列强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侵略，而目前最急的是要抵死反抗他们以各种名义的外债直接或间接供给军阀。

（二）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在产业幼稚兵匪不分的中国，召来便是兵，散去便是匪，根本的救济固然只有开拓工业农业来吸收这些非阶级化的无业游民；然而目前救急，裁兵也算是缩小军阀势力救济财政破产之一法。但我们要知道：(1)只裁一部分兵，其结果反使军阀荷包增加一笔裁兵费，而他们压迫平民和兵争战乱的力量依然存在；(2)希望军阀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3)希望军阀行兵工政策，更是附虎以翼，这些方法都是不行的。我们主张(一)以平民的宣传力量使兵士倒戈而自散；(二)资本家合力兴办浚河、筑路等公司，以兵工政策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三)农村平民出资组织大规模的乡团，城市平民出资组织大规模的工团、商团，如此，不但可以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并且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

（三）必须做民主的统一运动，使同一国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治之下，才能根本改变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然而这种统一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统一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军阀们“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所可冒牌；民主的联邦固然不害于统一，然而军阀们所提倡的“联省自治”，却是破坏统一之变相的封建割据。赵恒惕、卢永祥都主张联省自治，到了人民真要实行省宪法都害怕起来；吴佩孚口口声声主张统一，实际上处处破坏中央政府财政军事的统一，而且见了工人联合统一的运动便害怕起来。这班军阀们，力量小的便想借口“联省自治”以图割据，力量大的便想藉

门"统一"以扩张自己的地盘，这种军阀割据的省自治，这种军阀兼并的统一，不但去自治与统一都有天渊之隔，而且同是纷争战乱的源泉。我们主张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和民主的省自治并行不悖。

（四）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现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工人屡次罢工，别人都袖手旁观；学生请愿被打，大家说是学潮；商界虽号召裁兵运动，而眼见学界、工界与军阀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勋，安徽人民反抗马联甲，别省人都是隔岸观火；这样散漫不集中的各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困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统一的国民运动之具体办法，最好是各省各团体集合在国民革命军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解决政治之统一的战略。

（五）必须做民主革命势力集中的运动，在国民运动中，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此时全国各党派倾向军阀官僚的分子，当然不必说了，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势力分散不能集中，只有使北洋军阀延长生命。

（六）必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全世界

的各种革命史，大部分是劳动阶级的热血所造成，眼前的中国事实更可证明。知识阶级诸君阿！最近政象已明白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愿投降于军阀，只有民主革命这一条路可走，别无中立徘徊之余地。你们切不可迷信宪法可以革军阀的命，白纸黑字的自由是骗人的废话，自古只有革命造成宪法，没有宪法造成革命；你们切勿想单靠你们决战的舆论和学生运动来打倒军阀，你们的舆论与运动倘不中途退却，固然也可以造成革命的空气，并且你们当中富于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的分子，自然在革命运动中恒站在指导地位，但是你们离了工人、贫农的劳动群众便没有当真革命的可能；这是因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之现实生活的要求及阶级的战斗力，都具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并非是些浪漫的革命分子可比。你们勿怕，我们现在并不是鼓吹劳农革命，即在国民运动中若忘记了劳动阶级是重要部分，这种国民运动也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所以知识阶级、工商阶级不但不应当怕劳动阶级的组织及运动，而且应当竭全力以赞助此等组织及运动：(1)保障工会之权利，(2)扩大工会之组织，(3)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如此方能运用此最有实力之社会阶级来反抗军阀。劳动阶级不但要求真民主主义最切，而且能为真民主主义奋斗的力量也最大。并且此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劳动阶级不但是重要部分，已经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了，试看铁路工人已经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便可明白。他们此次的血战，不只是为工人的自由与人格而战，乃是向军阀们黑暗势力为全国人民之人格与自由而战；凶手们北洋军阀的罪恶，不只是因为杀伤了几百个工人，并且是对全国人民之民权、自由与人格而宣战。

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一期　署名：独秀

沈鸿英叛乱与政学会

二月中李根源到上海，向孙中山游说什么孙、岑携手平分粤桂，孙中山未应从他这种分赃而且是买空卖空的妙计，他回到北京便翻转面孔，替曹吴向黎元洪催发闽粤令了。

沈军未变前数日，广州即袭传岑春煊、杨永泰催沈就职并为筹饷之函电；沈军败后，林正煊（省议员）以赴新街会议之嫌疑而逃，容伯挺（沈军谘议）以密探之罪而伏法，政学会在省港之秘密机关，已破未破者闻共有八十余所。

此次沈鸿英叛乱，固然是北洋军阀与南方冲突之开始，主要原因还是政学会与国民党第二次破裂之表现。

和平的研究系，他自前清直到现在，还能抱定他始终一贯的立宪主义，政学会的主义是什么？不过是“鼠窃狗偷做官发财”八个大字的党纲。他们纵彭允彝以大湖南主义入寇教育界，来讨反动的军阀之欢心；他们牺牲沈鸿英在广东做投机买卖；他们还想利用黎元洪做首领来组织政党，与吴佩孚妥协来压迫南方；他们以如此一来，在南北政治舞台上都能占得势力了。但是他们在南方的投机买卖，眼见得要失败，可怜牺牲了一个沈小军阀，政学会虽无所失亦无所得；他们在北方策略，到第二次奉直战后，无论谁胜谁败，不知道他们将来又用什么一种迎新送旧的面孔来处置他们的新首领黎元洪？这种蝇营狗苟的政客们，其败坏国事

的罪不在军阀之下！

1923年4月25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　署名：独秀

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

什么对等会议！不过是孙曹携手的变相名词，阴谋孙曹携手的人们，以为用这个名词稍稍冠冕一点便于公然宣传。什么孙曹携手！不过是劝孙降曹的变相名词，阴谋降曹的人们，以为用这个名词稍稍体面一点便于向孙劝说。孙中山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是为民主革命向北洋军阀奋斗而存在的，若与北洋派首领曹锟携手，试问携手去做什么？

这班政客们欲降曹便去降曹，为什么要拉孙同去，又为什么造出这种名词？这是因为他们有的想靠曹做总理，有的想靠曹做总长，又觉得单是自己降曹终属人微价低，不如用孙做一份见面的厚礼；并且他们都曾列名党籍，若单独降曹和孙分离，恐怕在舆论上站不住，将来要蹈陈炯明的覆辙，所以索性拉孙下水，以便遮羞而免后患，这就是他们造作名词淆惑听闻之苦心。

北洋首领曹锟，代表帝政余毒的旧势力，民党首领孙中山，代表民主革命的新势力，两者不能并存，民主革命的企图中，必不容北洋军阀有存在之余地，有了北洋派，便没有民国，此种顺逆是非之大义，炳若列星，我们希望民党贤者若汪精卫、胡汉民、徐谦三君，慎勿为降曹派诡词曲说所欺，致犯误国叛党之罪！

全民社一班人已经睡在粪坑里了，我们希望小孙派勿跟着他们倒下去！当年孙毓筠辈迷信袁家武力，故不惜抉破民党与北

洋军阀之大防，以苟图富贵，现在你们勿再迷信曹家武力罢！你们要知道：阴谋孙曹携手使孙自杀的人们，比公然联曹攻孙的政学会罪恶更大！

1923年4月25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　署名：独秀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基础的缘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复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

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他们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终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终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如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

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的占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

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

他们为做官扒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限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蟊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

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1923年4月25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二期　署名：陈独秀

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或者不尽然，“昏乱政府无外交”，那便是自然的结果了。国民不便直接办理外交，无论如何奔走呼号，只是做政府的外交后盾，北京政府历来卖国误国的行为姑且不说，即以此时昏乱的现状看来，对于西南的内交尚且弄得颠倒错乱，不成话说，如何能够对列强办外交呢？因此国民起来干涉内政比干涉外交还加倍重要紧急！可是中国国民并且是国民中自称觉悟的青年学生，竟有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倾向。我们敢说这种倾向是青年们回避革命的心理引导出来的；我们敢说这种非革命的外交运动，开会、游行、通电、排货等运动，因为是钦命的官许的，便一文不值！“五四”运动因外交而牵到内政，而牵到一切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运动，一时颇现出一点革命的空气，“五四”的真价值在此。随后空气销散之原因，是误于“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及“只读书求学不做社会运动”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的心理，归纳起来，就是“不革命”三个大字。

现在又来了！懦弱的青年啊！听凭你寻找任何不革命的道路（如道德救国，基督教救国，农村救国，人道互助，地方自治，不问内政，读书运动，宪法运动，不合作，合作而促其速倒等道路逃走），军阀官僚总非追着“革你的命”不可，你往何处逃！

1923年5月2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三期　署名：独秀

社会之历史的进化①

——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中国人对于社会的进化，常有三种错误的见解：(一)有人以为社会的进化是循环的；(二)有人以为社会是退后的；(三)更有人以为社会的进化是超越的。讵知社会的进化，非速亦非迟，乃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依照历史的阶级，自然地演进，必无循环、退后或超越之理。简单说来，社会的进化，其程序可分五个时代：

一、原人时代——这时人类的生活，非常简单，和现代最野蛮的人的生活略同。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摘生果充饥，所以当时人类与野兽无大差异，文化遂无从发生，无足陈述。

二、渔猎时代——原人以摘生果为活，到了生果食尽的时候，就不得不下水取鱼，入山寻兽，来维持生活，这才演进而为渔猎时代。从原人时代至此，可成一个段落了。

渔猎所用的器具，不外木棍、石头、鱼网三种物件；后来有人将石头安置木棍之上，用以杀野兽，于是有锤子的发明。这种发

① 为中共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于1923年3月26日来到广州，五、六月间，在广东高师讲演四次，并汇集成《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于1923年9月1日出版。本讲演是系列讲演的第一次。

明，可算为社会进化中的一个大纪元，不容我们忽视的。当时生活情形，仍甚简单，经济问题，未曾发生，因为那时人类都是日食其所得，并无余物的存留。

他们因怕野兽侵害，就结合数十人，共居一块地方，互相护卫，于是成了小小的社会。他们渔猎所得的鱼兽等，只够一日的食用，毫无积蓄；纵有余物，都是鱼兽的皮肉，也无法收藏，所以当时那种小社会，完全是共产的，没有私产的发生，这种社会，我们就叫作原始的共产社会。

这种社会，是由数十人自由联合而成，实行共同的生活，初无所谓组织；但是，后来因为其间发生利害的冲突，他的秩序渐变纷乱，同时就有些强勇的好汉出，恃强压众，独自称尊，众人因怕他的威力，也都屈服于他，于是他就居然作了众人的首领，而社会的安宁，赖以维持着。这个好汉，历史上即称为酋长，亦即为那些小社会中的君主。

这个时代，已经有宗教发生，即是拜日、火或猛兽的自然宗教，当时宗教的观念，大约是由恐怖和美感所构成。野蛮人看见太阳光线那般辉煌，脑中就发生一种美感，同时又起恐怖之情，故生崇拜的心趣；更因火，古代的火，野蛮人用作军火，防御猛兽，为火焰美观，就生审美的兴趣，为火性猛烈，便起恐怖的情绪，所以他们崇拜他；猛兽如金钱豹等，既有美丽的毛色，又具可怕的形状，野人见而崇拜他，同属此理。总之，这种自然的宗教，内容非常简单，他的对象，除上举三种自然界的物件外，并无其他如鬼神的对象。

三、游牧时代——发生于有历史之前，故难推算他发生的年岁，大概总在封建时代之先。这时人类的智识，比较渔猎时代的

人，稍有进步，能用种种方法，驾驭那些驯良的野兽——牛羊等——于是发生畜牧的事业。当时土地都是公有的，畜牧者就得随时选择一些多水草之地，作他们畜牧的场所；因此，他们就没有一定的寓所，逐水草之地而居住，故名之为游牧时代。

到了畜生蕃衍之时，各人就拥有大群的牛羊，一人用之不尽，则所余的牛羊，就变作一己的财产，于是由渔猎时代共产的社会，一变而为游牧时代私产的社会了。这许是社会进化途中的一大变迁例。

四、农业时代——自渔猎时代至游牧时代，人类都取鱼兽之肉，作唯一的食料。后来因人类数目增长，而鱼兽的供给渐减，于是人类为要维持生活，就不得不向植物界寻求食料。恰好有些地方产生谷类，一经野人找得，就试拿来做粮食，觉得很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舍渔猎游牧，相率栽种谷类，而农业就由此发生了。

到了这个时代，社会的组织，经济状况，道德观念，及宗教思想，都呈变化。又因栽种谷类，必须在一定的地方，不能随意迁移，于是发生了居住的问题；因居住既定，则男女的关系更为确切，夫妇的观念遂明，而从前男女杂婚的事，也都渐次消灭了。家庭制度，由此勃兴。各家所种的麦稻等，供食有余，就设法储藏起来，拥为一家财产。至此，私产制度，更加发达，而社会经济，同时发达。凡此种种变迁，都是依照生活的要求，而自然发生的。

当时的小社会，各有一个酋长，执统辖之权，后来因生活上发生变迁，小社会已经不能单独存立，就合几个小社会而成一个大社会，又由几个大社会而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国家；几个小酋长，推举一个大酋长，几个大酋长结合，就产生了一个君主，

所以君主制度，即发生于这个时代啦！

君主既出，那末宗教的思想，跟着也就变了。由前代的自然宗教，一变而为多神教了；除美感和恐怖之外，复生有神——不可思议者——的观念；即由具体的事物，进而为抽象的思想，这也算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时至今日，很多人厌恶宗教，但是，古代人类能发明宗教，已经算是一种大进化了。

当时道德观念，也更进步。夫妇名义确定，实行一夫一妻制。这时的不同现代的，没有什么劳动界，只有家庭劳动。家庭劳动，妻子为劳动者，家长即为资本家。各家都盼望多生儿女，以助耕种或开垦，更有农人出贱价多买女子做小老婆，以助农耕；但是又怕妻妾子女，不为己用，故创设宗法制，使丈夫对于妻妾，父亲对于子女，有无限的统驭权。这种道德，在现代要不得，但是在当时足以维持社会安宁和生活，是很需要的。亚理士多德赞成奴隶制，孔子主张宗法制，也不过为着这些制度适应当时社会的状况罢了。

综合上述的农业社会的状况，拿来和现代的中国比较起来，是大同小异的，差异之点也很少，从可知现代的中国，还只是演进到农业时代啊！

五、工业时代——到了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状况，又都变更，和农业时代大不相同；但是这些变迁之所以发生，也只是原于生活中自然的要求。工业社会首先发起于欧洲，因为欧洲的地方狭小又瘦瘠，不大适于农耕，所有出产物，不能满足欧人生活的要求，惟欧地滨海，很利于交通，故欧人就得向工业发展。但是欧洲的工业，又以发生于英国的为最早，因为英国是小小农国，地狭人多，生活的要求也更大，农业既不足以维

持，于是不得不向工业谋发展了。

工业必须要有大规模的组织，而后可以发达，是故工业一发达，则社会中各种事业，都受影响了。譬如工业上所需的原料，不下数十百种，本国必不能完全供给，所以要到外国去购办，于是交通和商业，直接受其影响而发生了。交通商业既兴，则外交的事务日多，而且外人势力，由外交而侵入国家内政，由此，农业时代闭关自守的风气，完全消灭了；而政治组织方面，也由专制政体，变为共和政体，工商界和外人交接既多，见识日广，经济也日见充足，他们为维持自己的权利计，就起来争政权，遂将贵族制度，完全打破，尝查工商界之所以要求政权，并非好出风头或好作官，实因政治和工商业，有密切的关系，工商界的受福蒙祸，全视政治的良否以为准绳，假如他们没有政权在握，任凭贵族和军阀的宰割，那末，他们的职业必蒙无穷的祸害，故为生活的要求所逼迫，他们才来争政权。所以平民政治并非一般平民所必须，乃是工商界的护身符咧！军阀所以还能存在于中国，实因国内没有强健的工商界和他对抗，若到工商业发达的时候，军阀必自归于灭亡了。

到此时代，宗教的观念也变更了，因为此时交通发达，集各处人士于一处，必须创一共同的信仰，而后可以相安，故由多神教，变为统一的一神教。

在这工业时代，工厂林立，所需人工甚多，非家庭劳动之力所能维持，势必雇工，而后工厂才能发达，于是劳动制度，由此发生。又因人人要到工厂去作工，以维生计，故家庭羁绊遂脱，至是则农业时代所遗的家庭制度，自行破除了，家庭制度既破，宗法的道德也随之消灭。由此看来，中国的家庭制度，非可勉强废除，

只须工业发达，则此制自破。所谓三纲五常的道理，是建设于宗法思想之上，颇适合于农业社会，以其能维持当时社会的生活和安宁；但是民主社会的道德，是建设于爱国、合群义务之上，用以维持大工业的发展，虽前代的宗法思想，不再适存于此时代了。

工业时代的社会，虽较前代为进步，但仍留存着农业时代的私产制度，这却算是一个大缺点。因此，我们可以测知工业时代，将来亦不免发生变迁。在工业时代，工厂最为发达，所制商品（商品和生产品不同，商品乃供销售，非供应用），必然日见增加，但当时社会上的资产，多为少数资本家所占有，于是社会一般平民，都降为无产阶级，那里还有钱购买这些商品呢？到这时，商品必至积滞，无从销售，于是工厂就要亏本，随至资本破裂了。即如一人食物而不消化，积之日久，必至肚破肠断咧！将来的变化，必须除掉私有的财产，而大工业仍须保存，藉他供给人类以生产品。

由此看来，自原人时代以至工业时代，都可发见社会进化的痕迹，伊都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而发生的，我们若要改造社会，必须先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然后才知所从事。末了，我们须知社会的进化，不是循环的或超越的，也更不是退后的，乃是依历史的阶段而进步，非速亦非迟，不过采用革命的手段而促其进化，或许能使他变快一些罢。

龙詹兴、李钰　合记

《陈独秀先生讲演录》（1923年9月1日）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

——在广东高师的讲演

一 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①]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与前几天讲的《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接续下来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讲起来很复杂，前一次因时间匆促，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之进化及崩溃，未能详细解释，今趁此机会，接续讲演下去。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来讲呢？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去相信他，乃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程序令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改造社会，并不是将原有的社会完全不要，白地里另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来给我们居住。我们改造社会，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仍然是在旧社会里造出一新社会来，所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便不得不先要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

① 本文原载1923年9月1日出版之《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为系列讲演的第二次。

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程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为什么由渔猎社会进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对于这些客观的境界，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不懂得客观的境界，但凭主观的要求，在不曾开步走的时候，尽可由你胡思乱想，若当真开步走，第一步便发生困难，第二步便绝对不能前进了。到了走不进的时候，便要走到很危险的路上去，更或者走途无路，索性走到向后转的路上去；所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注意客观的境界，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要想把中国现在不好的社会改造过来，一定不可忽视了客观的境界。不然，必至弄到主张社会革命简直和张勋复辟是同样的价值。张勋复辟也说现社会不好，非把他改造不可。这完全是他主观的要求，并不是客观的境界。所以离开客观的境界，单由主观的要求，只是不满足现社会来谋改造，在主观上，无异于张勋。在事实上，这种不懂得又不注意客观的进化之人，不满足现社会，而又走途无路，会竟至和张勋走到一条路上去。

现在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即资本制度的社会。前天讲的由渔猎社会进至农业社会的历程，现在把农业手工业社会进至机器工业社会，再由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社会进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略情形说一说：

我们须知道资本制度有很大的优点是资本集中。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推倒农业手工业社会，就是这个资本集中的作用。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他们的资本不能集中，因此社会亦不能进步。而资本制度把全社会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家庭的农业手工业

进而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并使社会物质的文明增加可惊的地步；这种资本制度之功劳，我们是应该承认的。

封建军阀的农业手工业社会，是过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是将来的社会。而现在则为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我们生在现社会制度之下，为什么去相信社会主义？这并不是我们发疯，也不是我们好奇；实在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叫我们不能不相信社会主义。资本家由农业品手工业品之商业资本初步的积累，逐渐集中资本，推倒了家庭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组织，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造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中国还小，在西欧及北美各国，其势力很大很大，真是厉害到不可一世的样子。资产阶级他们成功的要素有二：一是资本集中；一是财产私有。资本集中是发展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组织之进步的方法，然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的资本集中，资产阶级之成功在此，其崩溃之原因亦在此。一方面资本集中，一方面财产私有，其结果在生产上分配上都发生不可挽救的危机。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从事于分配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惟分配方法不好，生产方法也有二大缺点：（一）是生产组织之扩大，已自然日趋于社会化，而无量数生产群众，仍为少数私有生产工具者所统驭束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少社会的统计和调节，陷在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不受任何机关之管理依照社会之需要而生产，只为竞争私利，自由生产，盲目的增加商品，往往有超过需要之剩余生产，使社会

金融发生恐慌；所以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盲目的增加商品为"商品拜物教"。我们往往不高兴读马氏的资本论，就是因为他开宗明义便说起这不易了解的"商品拜物教"。但是我们若不懂得这个"商品拜物教"是什么，就不会懂得资本主义；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这是很紧要的，望诸君牢记牢记。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产出来的；而欲明资本主义，不可不明"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乃是因为增加他们出卖的"商品"而生产；只为出卖而生产，非为使用而生产，所以是"商品"不是"用品"。资本家盲目的增加他们的生产品——即"商品"，他们这样超理性的崇拜"商品"万能，好象非洲土人盲目的崇拜各种异物的宗教，所以马克思把他叫做"商品拜物教"。他们盲目的增加商品，以商品换货币，又以货币造商品，复以商品换货币；把商品货币轮流不已，他们的资本遂递增不已，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他们这样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方法，他们没有社会需要之统计的设计，一任供求之自然的消长；资本家在此自然消长之原则中，盲目的竞争商品之增加，迨至他们投机的竞争过烈的时候，往往受自然消长之原则所支配，发生经济的恐慌，这种恐慌不惟资本家自己要破产，即在一般卖劳力的工人也要受失业的痛苦。例如数年前南洋群岛因树胶的产额骤然增多几倍，树胶充斥，资本家因而破产的不知多少，种树胶的工人因之大受痛苦的也不知多少。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的缺点。

复次，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这个缺点是从财产私有产生出来的。资本制度时代社会的财富，比较农业手工业时代增加得多了。但以财产私有之故，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

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和消费力失其均衡。我们须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一切生产品，都是卖的“商品”，不是用的“用品”，所以生产与消费是互相为用的，有生产而无消费，则生产不但没有用，而且和吾人只增加饮食而不消化一样，结果必至胀死。譬如有一千匹布于此，只有五百人来买去五百匹，则其余之五百匹若消费者无力购买，则由必需品变为无用的废物了。而盲目的没理性的崇拜“商品”的资本家，不顾生产消费的均衡律，一味去生产，所以往往弄出剩余生产的恐慌。——我们须注意：资本制度下之剩余生产，乃伪的剩余生产，是由生产力超过消费力发生的，非生产力超过社会需要之真的剩余生产。——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解除这剩余生产之恐慌，不得不设法把这些无法出卖的商品运输至外国去，以期换得货币。于是发生殖民地——如非洲、印度……或半殖民地——如中国……的问题。他们在那些工业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不但可以销纳他们大规模的机器的剩余生产品，并且可以获得无限的贱价原料。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要保守及增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面须镇压土人之反抗，一面又要和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市场；在此争彼夺的当中，遂不得不维持强大的海陆军，才好保持商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继续的安全的销流。以武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行经济的侵略，更进而行政治的侵略，这就叫做“资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亦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侵略工业落后的弱小民族之别名。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之致命伤。一千九

百十四年的大战，明明白白是英、德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夺殖民地及远东商场的战争，这次战争已经是帝国主义致命伤发作的开始；此时英、法争夺远东的煤油矿，日、美争夺远东的商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杀机，这些杀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他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失业问题、劳动运动或民族问题，都是帝国主义的催命符。

现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资本阶级简直没有办法。他们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仍走旧路，在世界战争的血泊中，侵略弱小民族，以销纳他们的剩余生产，以维持他们的资产阶级之利益与威权；一是停止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放弃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威权，建设世界的和平。前一条路终究是走不通的，后一条路便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了。

社会主义的制度，简单说是：(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所以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制度的资本集中，并不反对。所反对者，就是财产私有。那么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立脚点——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和社会主义的立脚点——资本集中，财产公有两相对比起来，中间所差别的，不过是财产私有的私字和财产公有的公字罢了。所以社会主义的运动，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只在资本主义立脚点的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里头，把他们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什么字呢？就是把他们的私字换为公字。因为这一个字的更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便完全改变了。在财产公有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生产上，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病，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至陷于无政府状态，所有生产品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非

为资本家利润而生产，是为用而生产，非为卖而生产；在分配上，免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没有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销纳剩余生产的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之战争；如此世界的和平方可实现。

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想利用他来破坏资本主义来改造现社会，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历程，令我们不得不相信社会主义。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惟有答之曰：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旧的；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新的。除了这两条路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那条路不好走了。所以我们惟有去找社会主义那条路来走。换句话说是：我们因为客观的历史进化之历程明白指出我们的必由之路，就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的社会主义。统括说起来是：

（一）旧经济组织的自然变化，已指教我们：帝国主义的那条旧路是不能再向前走的了。

（二）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已指教我们：不能不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了。

（三）我们不要自己妄想现在没有比帝国主义更好的路可走，也不要妄想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四）我们固然要知道历史先生已经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但同时要知道历史先生仅仅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因为这条路上荆棘满地，障碍重重；我们努力开辟荆棘，扫除障碍，然后才可以通行。若是我们

不去努力创造，只坐候历史的自然进化，那历史先生对于这种懒惰专想吃现成饭的人们是不负责任的呵！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于广东高师（赖特才、侯昌龄笔记）

二　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①

我们从"社会之历史的进化"观察起来，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主观的要求；乃是事实的理性的——客观的境界。换句话说是：我们确有相信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实行的可能。但是从古以来，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很多；我们究竟相信何种社会主义，这是不可不研究的。现在我把社会主义的学说，至今尚存在的、有力量的，分为四派，并加以简单的说明和批评。

一、基尔德社会主义；

二、无政府主义；

三、工团主义；

四、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

基尔德社会主义发生于英国。他们的主张简单说来，便是经济和政治分开。

管理经济属之生产机关——生产者。

管理政治属之国家机关——消费者。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因为他们看见现在的国家机关

① 本文原载1923年9月1日出版之《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为系列讲演的第三次。

很有力量，如政权啦、军队啦、裁判权啦、警察啦……种种都是资本家的屏障。他们想，把这些东西拿到工人手里来，很难办到，不如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各管各的。入手的方法，是用蚕食手段，渐渐获得生产管理权，以达到工业自治的目的。其实这个主张是很错的。我们要知道，社会上生产的工人，固然同时也是消费者；而资产阶级多属不生产的消费者，他们拥有私产，又拥有国家机关——海陆军、警察、裁判权等为他们私有财产的保障。除了社会革命之外，我们不知道有何妙法，可以用蚕食的手段一步一步取消剩余劳动的掠夺，达到工业自治的地步？

以前基尔德社会主义只盛行于英国，现在欧洲大陆如德国、奥国等社会民主党，也渐渐倾向基尔德社会主义了。这党的势力在欧洲北部、中部、东部都曾发生很大的影响。他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右派，他和基尔德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民主党主张工人须取得政权，基尔德主义主张经济和政治分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同样主张取得政权，所不同的，就是方法不同。共产党主张用革命方法，取得工人独裁的政权，社会民主党主张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这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大不相同的地方。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知道无产阶级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是办不到的了；而又不赞成共产党之革命方法，于是索性倾向基尔德社会主义，爽爽快快把国家机关让给资产阶级专管了。

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虽很接近，却不相同。两者都是反对国家、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但工团主义赞成阶级战争，无政府主义则否。工团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打倒资产阶

级，打倒了以后，不再去建设政府。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政府、法律等，并不认识社会上有阶级的区别，只要指导他们走到善的方面便罢。所以他们始终不主张什么阶级战争。这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不同的地方，这两种主义，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关系。

无政府主义先前在俄国最盛行，工团主义在法国最盛行，他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于此，我们不可不考察为什么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一到了法国，便变为工团主义。这是因为从前俄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基尔德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自然都不容易发生，法国工业则比俄国发达得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感情的，没有大工业组织的国家，农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然会产生这班的空想的、感情的人物，如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他们都是贵族出身，怎么真实感觉得工团组织的必要？法国的工业比俄国发达，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然明明白白判若鸿沟，所以工团主义得以发生；无政府主义者一到法国，若不稍变宗旨改为工团主义，便一步也不能行动了，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再看日本在劳动运动未起以前，无政府主义也很发达。近年劳动运动，日趋日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改变为工团主义者，许多工团主义者改变为共产主义者，即此可以证明空想的无政府主义，在现代大工业发达的社会里，任何国家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大工业的社会，必须有大规模的复杂组织，只有大工业不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如南欧洲及中国），容得无政府主义者的游魂。

自然，工团主义比较无政府主义进了一步，但他们仍是糊涂。因为既要用革命手段，贯彻阶级战争的目的，自不得不采用

一切武器，国家组织乃是最大的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后，若是不把这最大的武器拿在自己阶级手里，利用这最大的武器，彻底破坏资产阶级之根底，那资产阶级随时都可以起反革命，重复用这最大的武器压迫无产阶级。所以工团主义者反对一切政治的争斗，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反对国家组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和无政府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

上述四种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有点比较的说明，讲到最有精密周到的办法，自然要算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我现在再把马克思派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则，说个大概：

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和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种种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我们对于改造社会，不可只看见我们自己主观上意志上改造的必要，必须由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的条件有何种改造的可能，要处处不离开唯物的历史观，不可陷于唯心派的思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

改造应有的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把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步骤略略说过，指示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并非主张同时一跳，就跳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从组织共产党一直到实现共产社会，其间须经过几多步骤，每个步骤之中，或者又须经过几多曲折的步骤，但每个步骤都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不可采用改良的方法，这是革命的马克思派之特色。以上三个原则，是马克思派共产主义最重要之点，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他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鹅特才、侯昌龄笔记）

三　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①

这次讲演的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与第一次的《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第二次的《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是串贯一气的。

在第二次讲演中，我曾把各种社会主义比较过，结果以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我现在再重复说几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马克思的根本原则，就在这

① 本文原载1923年9月1日出版之《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为系列讲演的第四次。

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然后才能明白他的主义，配谈他的主义。

这一点既然这样重要，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况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象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中国既然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不能离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瞭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瞭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

现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形怎样？自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后，把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破坏，重新组织。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都起来了，并且有劳工革命的趋势，似乎不久可以发生世界的革命。后来因为德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社会党，匈牙利的劳农政府，次第失败，于是世界的劳工运动连受极大的打击，那些资产阶级又复活起来取反攻的态度了。如英、德、美、法……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反攻也最厉害，他们的反攻兼有政治及经济两个原因。

政治原因：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因受俄罗斯革命的影响，遂起很大的恐慌。或明或暗帮助德、意、匈的反动派破坏工人阶级的新运动，又复乘德、意、匈各国的劳工运动失败的机会，竭力压抑他们本国的工人阶级，英、美、法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最为厉害。同时又联络起来去反对俄国的劳农政府，如俄国白党之扰

乱和波兰打破俄军，表面上虽说是内部的问题，或两国军事的问题，实实在在还是英、美、法各国在里头弄鬼——帮助波兰打破俄国的兵。他们见俄国的资产阶级被劳工打倒了，都未免兔死狐悲，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一致反抗苏俄，压抑工人阶级。

经济原因：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告终，欧洲诸国不但是政治弄得稀糟，而且经济的损失很大——几乎要到破产的地位了。如英国素来是一个有钱的国家，战前是世界的债权国。战后变为美国的债务者。法国则为英国的债务者。至于德、奥战败之国，更不用讲。只有美国成了世界的债权国家，得了许多利益。所以欧洲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想要恢复他们的经济力，于是就想出两个法子：

1．向国内掠夺本国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等。

2．向国外加力掠夺殖民地——列强在柔来、海牙、华盛顿开过几次会议，其目的都是一面设法和缓资产阶级的国家间自己竞争，一面设法共同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进攻，一方面从政治上扑灭劳工的革命，一方面从经济上掠夺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

在资产阶级进攻的当中，其步趋日紧一日，其政治的反动也随着一天厉害一天。在英国，从前路易乔治的内阁是代表工业资本的，那时颇主张与俄、德妥协，好销售他们的工业品，所以他对俄、德外交政策还和缓一点；其后白那劳内阁是代表商业银行资本家的，他的政策在注重向俄、德索债与赔偿，不甚措意于工业政策及俄、德通商，所以他对俄、德外交政策更加反动起来了。现

在鲍尔温内阁也是代表银行资本家的，和前内阁毫无变更。法国的反动，自克里蒙梭内阁、而白利安内阁、而普恩赉内阁，一个加甚似一个压制劳动阶级。

意大利反对工人阶级，比英、法两国更闹得凶，他不但对工人阶级紧紧的压迫、进攻，连民主政治都不要了。反动的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不独握了意大利的政权，而且成了国际运动；他们已在法、德做君主复辟的运动，美国也都有他们的组织，日本也有了他们的运动，中国上海也有他们的党员了。

法西斯蒂党颇效法共产党的方法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他也有严密的组织；共产党注重国际运动，他也注重国际运动；共产党对敌党取不妥协的勇敢态度，他也取不妥协的勇敢态度；所不同的是一个有阶级的基础，一个没有阶级的基础。

我们知道共产党的分子，一大部分完全是觉悟的工人，一小部分是无产阶级化的知识者；法西斯蒂党的分子，一部分也有工人——无觉悟的工人——一部分是腐败商人和军阀官僚的资产阶级联合一起的。这党的首领意大利的现内阁总理墨索里尼年纪还很轻，从前也是社会党里的中坚分子，曾经做社会党机关报的主笔，他对于社会主义本来持激烈的态度，到后来竟一变而立于反对的地位，竭力压迫工人，是世界反动分子的代表。

以上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形，以下再讲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是怎样？

中国的政治情形：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何以呢？你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因有北京政府的名义存在，还不算是完全殖民地。若

一旦撤销北京政府之承认，实行国际公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

现在的北京政府，直接受制于军阀阶级，间接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你看那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简直是中国的太上政府，政治上重大的举动，都得仰他的鼻息。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在外人和军阀压抑之下，不但无产阶级不能参与政治，就是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政权。每个总统内阁都必有军阀的后援，方能存在。中国的国会也是受军阀豢养的机关，不是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所以京汉工人被军阀大惨杀，国会不曾提出抗议，外人要取销棉花出口的禁令，国会不曾提出抗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国会固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总统、内阁、国会都建筑在军阀势力上面，而军阀又压倒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之下，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实在情形。

中国的经济情形：中国的经济状况，更不用说了——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现在举几桩重要的说说：

1. 关税　所谓协定关税管理权完全掉在外人掌握中，中国政府不能自由支配。以条约的限制，不得外人同意，不能更换税务司，不能增加税率，不能采用保护政策使中国的工业能与外货竞争；不但外货进口税甚低，而且纳过什么子口半税，便通行全国；中国货则遇卡抽厘，因此外货容易推销，而中国货反不能畅销于中国。所以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

2. 工商业　我们试跑到天津、上海、汉口看看，是何等伟大的商埠，可是这些大商埠，不是由中国自己的工业发达起来，乃

是由输入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业发达起来的。这种商业越发达，中国越穷困。试看永安、先施、大新等公司，细细考察里面陈卖的货，外国的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外货多进口一分，中国的手工业便多破灭一分，内地的中国人就愈见穷困一分。输进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人虽然能增加他们的商业资本，虽然可以运用他们的资本开发工业，然以协定关税的抑制，不能与外货竞争，贱价的原料又不能禁止出口，因此不敢投资工业。因此这种偏畸的商业发达，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国掠夺中国之结果，他的发达和中国人的穷困成为正比例。所以近年以来，各大商埠繁华的程度和内地穷困的程度相随增加，两方生活程度相差数世纪，因此商埠变成买办世界，内地变成兵匪世界，长此下去，没有不灭亡的道理。

3. 金融　中国的金融，也是操纵在外国人的手上。你看中国有几个银行，就是有些小小的银行，也都是受外国银行势力的支配，所以外国人随便可以操纵中国的金融。现在我们本国的纸币，移地就不能通用，而外国的则到处受人欢迎。其实外国银行中不少中国人的资本，中国人信服洋老爷，说他们可以保险，一班军阀官僚们所吸收老百姓们的脂膏，大半存在外国银行里，作他们的资本，他们便将中国人所有的资本，再借给中国政府及商家，坐得重利，这是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形式。

4. 交通　中国的铁路，虽然尚未遍设周密，但现在已有的几条，不是归外人管理，便抵押与外人。这是与国民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工商业若望发达，亦要铁路为之运输；主权在人，实可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要明白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就是铁路了。

5. 矿业 煤铁矿是军事、交通、工业最紧要的。现在大一点的都是操在英、日的掌中，如唐山之煤在英人手，汉冶萍之煤铁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本溪湖、抚顺（即千金寨）之煤俱在日人手里，安徽皖南铁矿亦为日本所有。

以上所说我们可以了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了。

现在下面把劳动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说一说。因为讲社会主义的人，总离不掉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劳动阶级的奋斗有两种：一是政治的奋斗，一是经济的奋斗。

凡是奋斗总有一定的对象，中国劳动阶级奋斗的对象是什么？

现在中国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劳动阶级自然要打倒资产阶级，即行社会革命。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象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再说劳动阶级经济奋斗的对象是什么？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说过差不多完全在外国资产阶级手里了。中国只有棉业为最大的新兴工业品，但十分之五归英、日所有，中国资本家仅占一半。其次中国烟草业，大的只南洋兄弟公司一家，还有外资的嫌疑；中国的矿业，如抚顺、本溪湖、唐山等俱在外人手里，前也说过了。中国的铁路，除潮汕很短很短的是本国商人办的外，其余多属军阀政府所管，或抵押与外人了。中国海员方面所争斗的对象如轮船公司，也完全是外人办的，中国只有一招商局，还是

官商合办的。所以中国的劳工运动，几乎无一次不是反对军阀阶级或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如唐山罢工是反对英人与杨以德，陇海罢工是反对洋管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反对曹锟、吴佩孚，香港海员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香港官商，上海日华纱厂罢工是反对日商。总计中国著名的罢工运动，不是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很少很少是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至于农业劳动者，多属自耕的小农，农民所受地主的痛苦，远不若外货侵入、官绅压迫及军阀扰乱的痛苦之甚，因此，有地之自耕农往往有剧烈的运动，而为无地的佃农所不及。

据世界情形看来，外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的缘故，因为他们要弥缝国内的破裂，不得不向外发展侵略。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劳工运动首先便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同时在国内的政治奋斗，也不得不反对军阀阶级，合这两种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国民运动。所以我们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们在中国开始工作，只有国民运动。

因为社会主义者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而奋斗的，劳动阶级既然应该做国民运动，社会主义者目前的工作，对于国民运动也自然是必取的步骤，这是客观事实的必要一条路。但是同时社会主义者应注意两点：第一点，于国民运动以外，同时须特别注意劳动的宣传及组织，尽量促进其革命的精神与阶级的意识，以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第二点，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

甚么叫做半国民运动？就是不彻底的国民运动。如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却与日本亲善，或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却与英、美亲善，或者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又如

靠吴佩孚的兵去打倒张作霖军阀，或靠张作霖的兵去打倒吴佩孚军阀；这种运动就叫做半国民运动。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是不然的，团结民众的势力，满具革命的精神，绝不与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这就叫做纯粹的国民运动。

现在中国的国民运动，差不多完全为半国民运动。试看中国商人也反对军阀，也做裁兵运动，但他们仍希望吴佩孚或是外国人来帮忙，这就不成了。中国学生颇知道反对一切军阀，但同时却请求外国公使团帮忙，这都是半国民运动。

大家试想，靠帝国主义的外国来做中国国民运动，靠军阀来打倒军阀，这岂不是笑话吗？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是纯粹的国民运动，绝对不要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军阀来帮忙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靠国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的力量！

有一些革命分子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这是很错误的。中国军阀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不反对拥傀儡的人们而反对傀儡，这傀儡是永世不会绝迹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

讲到这里，或者有人发生一种疑问：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做国民运动？国民运动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答案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不仅是民主主义对于军阀的革命，还是平民主义对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革命。能够推翻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只有两种势力：

1．资本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

2．殖民地的国民革命。

这两种革命的势力合拢起来，才可以打倒帝国资本主义。若是缺少一个，一时都不易成功。

以前已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国际帝国主义倒了，国际资本主义也自然倒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也自然解放了，在此时世界各国才有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可能。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

假使抛弃这个所应做所能做的工作不做，只是天天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义等名词写在纸上，挂在嘴上，一步不能开始进行实际上有效的工作，试问有什么用处？

1923年6月20日于广东高师，（丁愿、郭瘦真、李立成合记）

《六大以前》 署名：陈独秀

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

军队应该属于国家，湘军、滇军、粤军、桂军、奉军等名词，已经很表现地方主义的色彩，不成其为国家的军队了。等而下之，更有所谓龙济光之济字营，陆荣廷之荣字营，这明明白白是私人的军队，完全是部落酋长时代的把戏。陈炯明旧部之为陈家军，也是在事实上人人都知道的。陈炯明向来把持以陈家军为中心的粤军，垄断粤政，只知有广东，不知有中国，这种部落酋长思想，是国家主义之大敌，是国民运动之障碍，这是我们所以反对他的最重要之点，别的事还在其次。他现在反抗中山先生之阴谋，仍旧利用地方主义煽惑粤军；即使他这种阴谋能够达到目的，除了使全国进步分子厌弃他这种部落酋长人物之感想增加强度以外，恐怕别无所得。第一，正在南北酣战中，他不劝告粤军一致对北，却利用吴佩孚、齐燮元之势力金钱，来团结粤军，谋袭南军之后，此计果成，其结果必至引狼入室，明白大义的粤军，未必盲从他的阴谋诱惑，为他争权位报私仇，以贻乡土无穷之患。第二，即使中地方主义毒的粤军一时为其诡词所惑，而陈炯明之部落酋长思想，将由广东主义一缩而为惠州主义，再缩而为海陆丰主义，三缩而为陈家军主义，陈家军势力支配之粤军团结，怎能不凶终隙末！

我们希望粤军健者：以国家主义代替地方主义，以“团结革命军”口号代替“团结粤军”口号，无论何省军队、工人、农民、学生，凡是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都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合力打倒北洋派军阀，建设统一的真正民国，那才是粤军的真正光荣。若团结在北洋派雇用的陈家军旗帜之下，岂不要受两重奴辱！

1923年5月9日《向导》周报第二十四期　署名：独秀

杨森果为统一而战吗？

"国民的统一"，在内政上、外交上及国民经济上，都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不但在理论上为有害而无利，在事实上也是绝对的不可能；因为军阀阶级自己不能统一，加之兵队军需输送之困难，想用武力征服全国，真是做梦。

进一步观察，所谓北洋派统一中国，也是吴佩孚欺骗北方武人的话；他曾对我一个朋友说："什么统一！就是我吴佩孚统一"，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吴佩孚并未奉北京政府命令，竟私自助杨森打四川，袁祖铭图贵州，孙传芳到福建，陈炯明、沈鸿英扰广东，不过雇用一班新式的胡大海①、常遇春，为他打江山罢了。

再进一步观察，中国封建的势力，已被新发展之地方的经济势力逼得濒于灭亡，封建的道德纪纲因此已完全破坏，所以冯、段不能始终服事袁世凯，曹、张、靳云鹏不能始终服事段祺瑞，吴佩孚也自然不能始终服事曹锟，至于吴佩孚雇用的一班胡大海、常遇春等，更不过一时利用吴佩孚之金钱声势各遂其割据之私图，自始就没有服事吴佩孚的心理。假使王承斌得了东三省，杨森得了四川，袁祖铭得了贵州，孙传芳得了福建，陈炯明或是沈鸿英得了广东，都会马上变为吴佩孚的敌人，吴佩孚想雇用这班

① 胡大海，明初将领，从朱元璋起兵，曾任江南行省参知政事。

新式的胡大海、常遇春，来为他打江山，也真是做梦。

杨森！诚实说罢！你如其说"为中国统一而战"，不如说"为吴佩孚统一中国而战"。更诚实些，还不如说"为杨森统一四川而战"。最诚实无欺，应该说"为杨森割据四川而战"。

1923年5月9日《向导》周报第二十四期　署名：独秀

吴佩孚与康有为

康有为好似丑妓从良，又复见弃，老而不安于室，万分无奈，只得看重了众人共弃的吴秀才；吴秀才近因放纵无行，乡党自好之士，都不屑和他往来，也自然只得垂青于康氏了。他们这种天然的撮合，本来不足为奇。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一)康氏为吴秀才拜寿时，适与清帝代表同至；(二)康氏公然以中兴辅弼劝诱吴秀才；(三)康氏与吴秀才晤谈秘室，至于涕泪俱下。以如此情状推之，吴秀才扬言张作霖要复辟，还是恶言出于仇口，倒是吴秀才自己或者要做张勋第二！

1923年5月16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

我老说洋人血肉的价值比华人的血肉要贵些，大家不说我媚外，便说我疯癫；可是现在中国新闻记者大部分都以为洋人的血肉比华人的血肉重得多！

欧美、日本人杀伤华人侮辱华人事件，几乎无日无之，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英国人、日本人勾结萧耀南杀死四十多工人，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乐志华无辜被英、日包探打得血肉横飞，英官公然宣告凶手无罪，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可曾注意？现在山东土匪掳去二十几个洋人，①算得什么大事，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便大惊小怪，连篇累牍，说个不休，你们是什么一种心理！连年军阀杀人无算，这姑且不说，土匪掳人勒赎，南北各省是常见不鲜的事，从来不曾因此惩罚地方官，独偶然小小触犯了洋祖宗，连地方最高级的文武长官都要受处分，为什么独有洋祖宗这样圣神不可侵犯。北京政府如此懦弱昏瞶，真是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此次被掳的人，华人一百余，洋人不过二十余，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独注意被掳的洋祖宗，是不是主张土匪只可掳华人不

① 山东临城土匪劫车案。1923年5月6日晨2时50分，津浦路北上快车在山东临城沙沟间，为张敬尧旧部孙美瑶匪军毁轨抢劫，掳去车客二、三百人，其中有外人二十余名。

应该掳洋人？土匪掳人不分华洋，却毫无媚外的心理，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说此事是国耻，我敢说只有你们这样媚外真是国耻，比别的一切国耻都厉害，这班无耻下流媚外的新闻记者，实在比土匪还不如。一班洋商洋律师在中国欺吓敲诈，无恶不作，现在受点小小委曲，还算是很轻的报复，重的报复还在后来；他们在中国搜刮了堆积如山的金钱，使中国人穷而为匪，可怜无用的土匪们只知道分润这一点，还算是小小的光复，全部的光复还在后来。

我更要正告一班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一向立意要宰割中国，做他们永远的殖民地，因为他们非此不能生存，华盛顿会议不过稍稍抑制日本独占中国之野心，他们共同侵略中国之色彩更加浓厚；我们在最近的将来，若不能实现有力的国民革命，无论无耻下流媚外的人们如何长跪哀求，决无幸免之理。欧美、日本各国若借口区区土匪掳人问题来实行军事的自由行动，决不能使我们格外恐怖，因为欧美、日本在华海陆两方面军事的自由行动，已不自今日始，而且他们和平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使我们更加恐怖。

英国人想借土匪掳人问题遮掩乐志华冤案，日本人想借此遮掩旅大问题，他们这种卑劣手段，只能欺骗一班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决不能够欺骗良心上还知道华人的血肉和洋人的血肉有同等价值的人们！

1923年5月16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与交通安福

国民党唯一的使命，是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政治。辛亥革命，第一目的是扫荡清室的恶浊政治，为扫荡恶浊政治，不得不推倒清室统治权，这还是第二目的。清室倒后，北洋军阀袁、段等继承清室的统治权，辅以交通系、安福部等蠹国乱政的妖孽，政治之恶浊更甚于前清，所以是国民党不得不继续革命，以求政治之清明；也正因有此志此心，虽革命战祸再延长数年数十年，国人也应该谅解。

国民党欲以革命手段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必当重视全国革命分子，建设势力于倾向革命的民众之上，不得重视官僚分子，建设势力于蠹国乱政的官僚之上，如此明白无疑的逻辑，简直和二加三等于五是一样。

辛亥革命后，黄克强引用黄芝祥、沈秉坤等一类官僚，颇轻视革命党人，其结果如何？交通系、安福部一班妖孽，力助袁、段为虐，民国以来政乱财溃，正坏在这班人手里，这班人若能使政治清明，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便不必继续革命了，国民党若引用这班人，便是根本的自杀！真心忠爱国民党的人们，应该一面消极的洗刷蠹国乱政的官僚，一面积极的造成拥有全国大群众的革命党，才不至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1923年5月16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吴佩孚爪牙阎锡山第二——杨森

我们以前只知道杨森是国贼吴佩孚的爪牙，现在可在他对于四川父老宣言中，知道他并且是阎锡山第二。阎锡山第一的欺世用民政治，已令人衔恨刺骨，现在又有一个阎锡山第二！

杨森宣言中所说治川的方法，其中谬误之点，此时当然没有讨论的必要，而且总算他说出一点方法，但是这种欺世盗名的鬼话，我们对于陈炯明的为人已经得着经验了。

在他的宣言中，我们应该注意两点：(一)他说，“我们至少要做到象阎锡山之在山西。”他这样辛辛苦苦打回四川，辛辛苦苦做一篇皇皇大文想劝四川人归降他来统一四川，好让他仿行阎锡山的欺世用民政治，所以他公然说：“以后，我在前台唱戏，所望的，就是要你们在后台打锣鼓，合着我的板眼！”(二)是他说：“吴子玉将军决不贪占我们四川的土地，这次，一是吴将军本于素来的旨趣，想把四川弄好，好做别省的模范。”他又说，“而且能信仰吴将军是怎样热心为我们四川谋幸福了”！此时中国最反动的军阀吴佩孚如何纵兵惨杀工人，如何主张封禁全国工会，如何责骂蔡孑民使北京政府敢于蹂躏教育界，这些都不须说，我只回答杨森道：吴佩孚叫萧耀南督湖北，搜刮得湖北民穷财尽，这也是决不贪占湖北的土地，也是本于素来的旨趣，想把湖北弄好，好做别省的模范，也是为湖北谋幸福；吴佩孚助沈鸿英图广东，

派孙传芳到福建，想必都是同样的旨趣。可惜孙传芳、沈鸿英不像杨森这样会做文章为吴将军宣传，不然福建人、广东人都会感戴吴将军的德意；更可惜沈鸿英不会打战，不然他督理广东，又可使中国多一个模范省。

杨森若以四川民众的势力，打倒熊、但等武人政治，我们便应该赞成；但是他现在假借最反动的军阀势力，打回四川，有造成四川为第二湖北的危险，无论他如何大言欺世，无论我们如何原谅他，也只好说一声“卿本佳人，可惜从贼”！

1923年5月16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五期　署名：独秀

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

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的中国是常有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独有此次临城事件竟闹得全国震动，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乃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英、日、美三国，欲借此掩盖他们凌辱中国人的丑行并达到共管中国的贪欲，所以在他们的通信机关特别张大其词，可怜我们无知而又媚外的中国新闻界，竟不能窥破其中奸计，随着几家外国通信社的吠声盲目的附和，不知不觉的为他们利用了，外人竟能利用全中国的报纸做他们的宣传机关，岂不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

政府社会都专门注意几个被掳的外国人，中国人被掳的一二百，至今无人过问，这又是什么理由？

一切党派自然都应该起来反对并打倒恶贯满盈的北京政府，但打倒北京政府应该集合民众势力，堂堂正正的作政治奋斗，若是藉临城掳案来极力攻击北京政府，并想借此机会，利用洋大人的势力来推倒曹、吴，这是何等卑劣而且懦弱！我们固然要打倒军阀，我们断然不可借洋大人来打倒军阀，因为洋大人比军阀是我们更大的仇敌。

当吴佩孚大杀京汉工人的时候，张大总理大骂这班过激派应该杀，越多杀越好，此时临城案发生，这位张大哥吓得屁滚尿流，当日大骂工人的威风安在？

杨以德也曾禀承洋大人的意旨大杀唐山工人，现在又要为了救搭洋大人亲到匪巢作质，他这样"轻视工人，畏惧土匪，孝顺洋人"的态度，真是中国军阀官僚之代表。

有人说此次掳案是安福部破坏北京政府之阴谋，安福背后还有日本的教唆；此事如果属实，更可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造的幸福！

临城掳案固然是件小事，即此这件小事，便可以将帝国主义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阴谋与骄横完全暴露出来；同时也可以将中国军阀资产阶级（政党及上海商会）、知识阶级（新闻界）之懦弱与媚外的心理完全暴露出来。

1923年5月23日《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署名：独秀

孙曹果然携手了？

滇桂军占领韶关后，搜得曹锟致沈鸿英电云：

万急！南昌源潭电局速转韶州，探送沈督理冠南兄鉴，诚密，顷接吴巡阅使马电开，接洪湘臣来电，略谓现杨、熊、何之三部，向石龙袭击，林军向五华反攻，兴宁谢、徐、陈三部，反攻江门，胡部反攻高州，尹、李、赖、苏四部，分途作战，大浦、潮州、寻邬、准朔日前动作等语。又接祃电云，接港电报告，林指挥已下动员令进攻梅县等语。查林、洪各部，既经出发，乘此时机急进，合力进剿，敌氛不难廓清。驱孙定粤，在此一举。除电促林、洪一致进行外，特电奉达。务望激励贵部，奋勇进攻，以期一鼓荡平，早定粤局，是所盼切。曹锟寝。

不知主张孙、曹携手的人们见了此电作何感想？

1923年5月23日《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署名：独秀

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

日本人在宜昌杀死中国学生；美国人在上海三育大学因为学生有爱国的演说，要强迫解散全体学生，并且公然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又说："本会宗旨，断不容任何人有国家之观念。"（教会学堂学生听者！）

这两件事想必中国新闻界都知道，不是我们造谣言。新闻界诸爱国记者，关于临城事件，已十二分巴结为洋人宣传，诸君若还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请在为洋人宣传的余暇，也做几行批评，为孤愤无援的青年说几句公道话。

无耻下流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你们试问良心：你们为临城被掳的洋人说过多少话，何以对于洋人杀中国人辱中国人，竟一概哑口无言，难道你们都入教会学堂读过书，谨守教会之宗旨吗？

1923年5月23日《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署名：独秀

国会议员宣布张阁罪状与曹吴态度

议员温世霖宣布张阁罪状如下：各报馆均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民国成立，历任内阁违法失职之事，虽曰数见不鲜，然未有无法无天若此次张阁举动之甚者也。查总理张绍曾执政以来，任用私人，宄法乱政，授意秘书长吕均，借势招摇，更与财政总长刘恩源、农商总长李根源，朋比为奸，卖官鬻差，营私舞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除已经同人通电宣布其对于日本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之外交失败情形外，兹再举其紊法乱政之最著者为诸公陈之：（一）私印印花税票五百万元，纵使印刷局长薛大可偷运密售，朋分票价，是为监守自盗。（二）未经国务会议议决发额外流通券一百万元，密使彭解等私向裕华银行押款，是为诈欺取财。（三）擅改国务会议议决，将印花票案查办大员之庄蕴宽，改为赵椿年，又魏联芳本系简派劝办实业专员，无端变为特派字样，是为伪造文书。（四）违反国会决议，先抽签偿还外债内之日本部分债券四千万元，又私向美商运动，竟敢过户承认津浦北段德国部分之债票七千万元，再对于法国庚子赔款，擅自承认纸佛郎改为金法郎，损失国款七千余万元，以致各国援例要求，是为构成外患罪。（五）朋分中日实业公司之官股二百五十万元，偷将股票改填张绍曾、刘恩源、李根源、文群、

彭解等私人名义，是为侵占国有财产。凡此种种，证据确凿，无一不触犯刑章，至于贩卖烟土，私售芦盐，公然列诸阁议，无非祸国殃民。最近更向新银行团举债五万万，而以关余烟酒税为担保，秘密进行，以抵偿向无担保之外债，及回扣贴款，而以四万万七千万元，所余之三千万元，作为垫款，按六个月分期交付。此项借款，举中国所有财源抵押以尽，忍将中国财政交之各国共管。自新银团成立，其宣布之政策，即在掌握中国财政；今政府竟迎合新银团意旨，订此借债条约，倘成事实，则将来一切政费，非得银团许诺，丝毫不能动支；共管之局一成，亡国之祸立见，而所得之三千万元，外人于八个月内只将关余、烟酒税收入拨付政府，已无不足，按之实际，确系毫无所得，只以张阁贪此二千余万之回扣，遂将国家主权财权断送无余，稍有人心，宁忍出此。众议院日前开会，要求当局出席说明，张绍曾、刘恩源均避不出席，仅派财政次长张竞仁到会；经同人质问条件内容，坚不答复，近更向各国公使秘密谈判，热烈进行，若非揭破奸谋，先行防阻，沦胥之痛，即在目前，此尤我国人应急起一致反对者也。其他违法失职，书不胜书，报章所载，固已国人共见。总之张阁存在一日，则外交挽回无术，内政日见纷乱，非立予罢斥，国事愈不可为。现参议院已通过不信任案，而张阁抵死不去，并特设机关公然贿卖，抉廉耻之藩篱，破政治之常轨，瞻念前途，言之滋痛。诸公热诚爱国，义愤同深，尚冀同声申讨，去此恶魔。谨贡区区，贮候明教。

张绍曾贪劣无耻，人所共知，而国会议员贪劣无耻的程度，比张绍曾只有加无减，张之罪状出诸议员之口，已足令张绍曾齿冷，何况出诸保派嫡子温大烟灯之口，更显然是一种"伪作正言"

的作用，果然曹锟复电表示赞成。在他方面，吴佩孚却电京反对改组内阁，再推两院制宪，同时参议院提议先选总统，敦促黎元洪下野，再议制宪，吴佩孚又极力反对。这些消息，或者都是曹、吴翻脸之征兆。

1923年5月23日《向导》周报第二十六期　署名：独秀

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军阀

中国土匪头(军阀)不能约束小土匪,居然冒犯了洋大人,洋大人自然要赫然震怒,自然要责问土匪头的军阀——曹、吴,昏蛋的中国人民,切不可因为洋人所办报纸有非难曹、吴的论调,遂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者,也痛恨中国军阀不再予以援助了。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双管齐下,直弄得中国民穷财尽兵匪满地,又复扶助军阀,抑压革新进步的人民(如助袁、段、曹、吴攻打国民党,助北京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上海租界两次封闭全国学生总会,洋人勾结军阀大杀唐山矿夫、大杀汉口铁路工人之类),断绝中国维新自强的一切道路,所以临城案件,第一罪魁是帝国主义的列强,第二才是军阀曹、吴。洋商也鼓吹废督、裁兵、理财,这是一面笼络华商使其不依附军阀而依附列强,一面威吓军阀逼他们对待列强益加恭顺;外报因临城案痛责曹、吴,明明是借此威吓军阀,令他们伏地叩首绝对屈服于列强,不但不因此召人民之反感,而且因此博得一般昏蛋的中国人民之同情;列强们对待军阀,一面加以威吓,一面又加以抚摸,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大借款现仍在京进行,象这样恩威并用,军阀们焉有不绝对臣服之理!蠢如曹锟还知道列强的用意,故敢于临城掳案热闹声中,积极进行总统问题而毫无所顾忌。昏蛋的中国人民,若还不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勾结为患,若

还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现在痛恨中国军阀了，以后不援助曹、吴了，那真是昏蛋的程度还在曹锟之上。

1923年5月30日《向导》周报第二十七期　署名：独秀

呜呼！外国政府下之商埠同盟！

北京军阀官僚政府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中国之大患兵与匪，不单是我们素所深恶痛绝的，并且是我们应该出力处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以工商业侵略中国，使中国人贫而为兵为匪，又极力明扶暗助北洋军阀（现在还正在进行大借款），故意造成中国乱而益贫、贫而益乱的重复因果，这罪魁祸首是谁？不待说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我们反对军阀，同时又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正因为这个缘故，并非是感情的故意排外。

组织商埠同盟，并且同盟起来，自治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军阀政府，抵抗兵匪的侵略，这都是我们赞成的；但是我们却不忍心赞成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

上海《字林西报》载西人投函说：英、法、美均以用费太巨不愿以兵来华，鼓吹中国人组织商埠同盟，以武力防御兵匪，并且加压力于各省当局，这话都不错；但同时他说什么"不得不于外国政府赞助之下"，什么"以各商埠中外人士间之合作为根据"，什么"警士可用华人警官则用外人"，什么"利用外国兵舰保护江政"，这是什么用意？这是什么一种商埠同盟？这种在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不过是各国共管中国各商埠之变相名词，这样变相的和平共管，比用巨费派兵来共管的方法，更是巧妙！

1923年6月6日《向导》周报第二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中国土匪也来了！

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党，其反动的理想与行动，简直是土匪，他们近来在意大利的成功，并在德国、法国恢复帝制运动，不但是世界工人阶级之危机，并且是世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危机，日暮途穷的欧洲官僚资产阶级利用他来救济一时之急，真是引虎自卫，所以欧美、日本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都把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捏着一把汗。

中国已被土匪闹的不得了，不料上海《大陆报》记者又要介绍外国土匪到中国来，他说："上海现有一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代表，名为马郎柴纳（Signor Maranzana），倘华人商会向他访问，他必乐得以他们成功之方法及原则见告。"《大陆报》记者又说："中国现在遍地皆匪，匪有良好组织，为布尔雪维克主义所传染，向闻布党中人曾在彼等中传布主义，鼓吹推翻现在社会秩序已经数年；据临城劫案中被掳之苏罗门氏说，匪中有一人能操俄语（其实匪中还有多人能法语），其妻为俄人，彼曾服务于俄军中。"临城案件和安福部显然有多少关系的痕迹，若说抱共产主义的布尔雪维克在土匪中传布主义，希望土匪来推翻现在社会秩序，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丝毫不懂得布尔雪维克主义是什么！临城匪中也许有俄妻能操俄语曾服务俄军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俄国白党在西伯利亚及蒙古失败后，他们和与他们共事的

中国人，纷纷溜到内地活动的很多，他们活动之目的，我们应该知道，若以为凡是俄人及与俄人接近的别国人都是布尔雪维克，这种简单的头脑，实在未免可笑。《大陆报》记者一面诬蔑俄国布党和中国土匪联络，一面他自己却介绍意大利的土匪给中国商人，请问他是何居心？

1923年6月6日《向导》周报第二十八期　署名：独秀

儿戏之北京政府

北京目下之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黎元洪本来是个昏蛋而且奸险，他做总统本来没有法律的根据，不过一般下流政客，至少比黎元洪还要昏蛋十倍，为了要拥曹上台，忽然想起老黎非法，我们不知他们将来有何神通使老曹为合法总统？

黎、段本有不解之仇，今黎为曹锟、张绍曾逼走，李根源、彭允彝竟主张“即走亦当任段祺瑞为总理使捣乱”，政学系的特质于此暴露无余。

曹三有的是兵，尽可拿出惨杀京汉工人的态度去到北京，爱做什么做什么，为何要利用军警索饷及乞丐变相的公民团来逼走黎元洪？

黎元洪走便走了，为什么要挟一颗不值钱的印，曹党也偏要拦路抢印，简直是戏台上“抢帅印”的把戏。

所谓驱黎运动的国民大会，天安门布满了军警侦探，到会散驱黎传单的只三四个国民，与其说是国民大会，不如说是军警侦探大会。何人指使这三四个国民的国民大会，现有两说：一说是由交通部发出；一说是张绍曾从天津印刷寄京，托日均雇车夫着长衣散放；后说大半近实。

军阀官僚们见了人民集会散传单，便喊道这是过激派，该

杀！现在他们也采用过激派的方法了，究竟是谁该杀？

所以目下北京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1923年6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三十期　署名：独秀

临城事件与长沙事件[①]

临城事件不过是土匪掳去二十几个外国人，外国报纸中国报纸都责骂得不亦乐乎；长沙事件是外国水兵杀伤了四十多中国人，上海《字林西报》竟说：华报对于临城土匪劫车案，不知激厉民众，力促政府营救被掳人士，今对长沙事件，反有意大吹大擂的论述，殊非正当。果然洋大人是神圣不可侵犯吗？中国人生命等于猫狗吗？无耻媚外的中国新闻记者们，看了《字林西报》这种"正当"的议论，该有点觉悟了罢！

1923年6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三十期　署名：独秀

① 长沙市学生为抵制日货巡视终夜。1923年6月1日晨，日清公司武陵丸由汉抵长沙，学生巡视查货，日水兵抢杀华人。同日下午日商金陵船也由汉抵岸，日兵向华人复射排枪。2日，长沙罢市、罢工、罢课。

告上海纳税华人会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本年大会的会务报告列举四事如下：(一)界内行政司法两事，其权完全操诸外人之手，吾人在工部局方面，以无正式华董在内，不获享有发言之权利，以致所受种种不平等之待遇，在洋泾浜条约未经修改以前，进行十分困难。……吾人居住租界者，只有年终纳税之义务，而无发言之权利，虽自民国十年起，工部局有五华顾问之加入，然因非正式代表之故，春季纳捐人大会，各国均可参加，独摈我市民于纳捐人会议之外，世界不公道之事，更无有甚于此者。本年为乐志华被虹口捕房无辜虐待受伤一案，……公函五顾问，要求向工部局建议，为此后全市民保证安全之法……此案在交涉中，尚未得复，将来结果如何，断难预料。(二)会审公堂为华洋间相互诉讼而设，当日洋泾浜条约，权限范围，本有明白之规定，自辛亥光复，领团借口民国政府尚未得各国承认，攘为已有，迄今已历十二年矣。……完全华人诉讼，须听领团裁判，视租界若殖民地，种种违背约章，侵犯主权之处，不可枚举。(三)工部局比年来对于界内各业商店，时时发生加捐问题……首当其冲者为银楼，此外如米业、西式成衣业……小菜场及食物业现在又有加捐之举，从此以往，必至无业不加。(四)苏州河因关系全省水利，不在洋泾浜条约范围之内，而工部局竟任意填塞，不特视主权若无物，且为害

于全省水利者甚大。

即此上海一隅四件小事，已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中国人真正民族的觉悟，也渐渐表现出来了。

我们更要敬告上海纳捐华人会诸君：要收回主权及排除租界虐政，只有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可靠，和平请求或希望媚外的北京政府出来交涉，都是不济事的呵！

1923年6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三十期　署名：独秀

中国农民问题

（一）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到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二）

中国人口约六千余万户，而农民有四千万户以上，是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们应感其重要。此农民大群众，其经济生活程度虽非相差甚远，而经济地位则有几多

复杂之区别，兹将地主与农民略分为十等如下表：

(一)大　地　主—┐
(二)中　地　主—├—自己不耕作之地主
(三)小　地　主—┘
(四)自耕农民兼地主—┐
(五)自耕农民兼雇主—┴—中产阶级—┐
(六)自　耕　农　民—┐　　　　　　├—自耕农
(七)自耕农兼佃农—┴—小有产阶级—┘
(八)佃农兼雇主—┐
(九)佃　　　农—┴—半益农——半无产阶级
(十)雇　　　工——农业的无产阶级

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数是前清贵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军阀，他们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份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润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资本家多不肯投资经营农业。

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

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

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据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如下：

农户总数	43,935,478
自耕户数	23,381,200
佃农户数	11,307,432
自耕兼佃	9,246,843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相差极微。

自耕农民中有兼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余地租给别人耕种，一方面是自耕的农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种农民为数不多。自耕农民中有兼为雇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此种农民为数甚多。此二种农民，不独占有地土权，无向地主缴纳地租之义务，而且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掠夺他人之剩余劳动，其生产物不仅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并且，至少在丰年时可以获得盈余，变成初步积累的资本，是以此种农民应属之中产阶级。

纯粹自耕自地之农民，为数亦不少，其所种之地则甚少。其自耕兼佃农，则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此种农民为数不多。此二种农民，虽非半益农，得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而无掠夺他人劳动力之机会，虽丰年亦难有多量之盈余以为积累；只以完全占有地土所有权，生产工具及生产物所有权，应属之小有产阶级。

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纯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种农民人数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纯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权者，佃农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额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额或较少之金额辗转租给别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现时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除出资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给别人耕种。佃农们租地时，须向地主缴纳押租金（或名羁庄，退租时可以收回）每亩约一元左右；耕种时须自备生产工具（牛、农具、食粮

等）；所得生产物须缴纳一部分与地主，缴纳之方法，或预约一定之额租（或名铁租），无论收成丰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丰歉临时议租，缴纳之数量，至少须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佃农住屋多随地租得，退租时须退还地主。地主对于佃农甚尊严，大地主尤甚，有“东佃如父子”之谚。此等农民既不能掠夺他人，又为地主所掠夺，不能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尚可勉强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则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缴租课，不胜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时，各地佃农罢租讼案往往占各种讼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种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然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故应属之半无产阶级。

雇工是各种农民出一定工资雇用他们做工者，此种雇工分成人及童工两类，和长工及短工两种办法；长工以年计，每年工资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种或收获时短期间计算，工资略高；童工专事牧牛及零碎轻工作，每年工资不过数元；惟各种雇工的伙食均由雇主供给，且间有供给衣服者，长工多给以住所，短工则不然。此种雇工，倘不失业，其生活费反较佃农稳固；惟其不但无地权，而且没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生产物之权，纯粹是被雇者，各种农民中，只有他们是**无产阶级**。

以上七种农民中，后三种（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都是**无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数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人数当在九千万以上；因为自耕农民虽多过佃农一倍，而加上雇工，无地者人数纵不能与有地者相等，当亦不至相差甚远。

各种农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

小的倾向，据农商部之统计，农民耕地多寡别，民国六年七年比较如下表：

	十亩未满者	十亩以上者	三十亩以上者	五十亩以上者	百亩以上者
民　　六	17,805,125	13,248,474	10,122,214	5,348,314	2,835,464
民　　七	17,914,231	11,303,570	6,712,366	4,137,136	2,278,355

（三）

中国农民之痛苦计如下诸端：

（一）一般农民之痛苦

a. 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此为中国目前兵祸匪祸之一大原因。

b. 政治不良之结果，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也都是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二个原因，农民失业者之日渐增多，可以农商部各项统计证明之：

1.耕地减少亩数

民　　三	1,578,347,925
民　　七	1,314,472,190

2.被灾亩数

民　　三	653,475,445
民　　七	61,717,113

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最甚。

3.荒地增加亩数

民　　三	358,235,867
民　　七	848,935,748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龙江省，由民国三年一万六千六百余万亩，民国七年增至六万八千七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二是广西省，由民三四百余万亩，民七增至一千四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余万亩，增至一千七百余万亩，多属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万余亩，增至三百八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廿余万增至四百五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

4.农户减少数

民　　三	59,402,315
民　　七	43,935,478

据此表，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四年之间，全国农民减少了一千五百万户以上，其中失业之农民必有可惊之数！其中减少最巨者为湖南、陕西二省，此为战乱之影响；其次则为浙江、山西、

江苏等省，苏、浙为都市工业发达之结果，独山西省工业既未发达，又无战乱灾荒之影响，农户何以减小，岂是模范省缘故？

c．农民文化过低，又无组织之结果，地主绅董们，把持乡村政权，鱼肉贫农，两者时生冲突。

（二）自耕农之痛苦

官吏舞弊额外需索及预征钱粮使地税无形增加，荒歉时自耕农无力缴纳地税，极感痛苦，往往有聚众"抗粮"、"哄堂"之举，农民暴动几全属此数。

（三）佃农及雇工之痛苦

a．兵匪扰乱及水旱灾荒使农民大为移动，所移住地外来农民之增加超过需要时，同业间发生竞争，遂使地主、雇主们对于佃农、雇工所要求之条件日益苛刻。

b．因城市物价及生活费日益增高，地主们对于佃农之需索随之日益加紧。

c．以上述种种压迫之结果，农民因衣食不足及农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间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出于借贷，于是高利盘剥者或地主，乃乘机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贫农之血汗，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传　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

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

(二)组织及实际运动　组织有四种:

a.农会　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显明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各地旧有农会虽有法律的地位,而组织之分子多非农民,今应鼓吹真正农民改造之,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举之劣绅为对象;以"组织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组织谷价公议机关"等为实际运动。

b.乡自治公所　此亦系旧有的地方政治组织,南方各省尤正在进行,在此组织中应以组织乡团抵御兵匪,改良水利,要求"县长民选"为主要运动。

c.佃农协会　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权在若干亩以内,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权分给耕种该地之佃农)、"限租"(每年应纳地主之租额,由各农村佃农协会按收成丰歉自定之。)为佃农特有之运动。

d.雇农协会　以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为主要任务。

1923年7月1日《前锋》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

寸　铁

国民运动

我们为什么要做国民运动，不用说，第一是因为受不了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第二是因为受不了国内军阀的压迫，二重压迫逼得我们不得不做国民运动以自救。由此看来，既然是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中国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外国势力，因为国民运动第一目的正是要排除外国势力；既然是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军阀势力，因为国民运动第二目的正是要推翻军阀势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势力或利用一部分军阀势力来做国民运动，这种四不相的国民运动，其结果必然是“王婆照应武大郎”。

国　学

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不得已还只有承认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的话：“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

也。"

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更奇怪，他们好费力寻得点香水，出卖时还不肯舍去粪秽的商标，惹得想专利的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因有人假冒招牌，"瞿然大惊"，"夷考宵小之所为"，"终必申罪以致讨之"。这本是胡、曹诸君自寻烦恼！

曹聚仁先生说："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

中国国民经济基础，还停顿在家庭的农业、手工业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号称新派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张君迈、章秋桐、梁漱溟等，固然不像王敬轩、朱宗熹、辜鸿铭、林琴南等那样糊涂，然仍旧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张君迈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

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

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

仇孝论讨父会

湖南宁乡县县议员提议小学读经的议案：陈独秀倡无家庭无政府无宗教者，竟忍谓父子成于肉体之乐，无须亲爱。著有《仇孝论》，发起讨父会。甚矣邪说祸人，较兵犹酷。盖兵祸显然，不蹴自灾，人犹恐惧。独此灭人邪说，设心阴险。乖废古经，号倡新学，是无形之秦火，率天下之人陷入禽兽于不觉。此人禽关头，虽康有为游欧记陈焕章经世报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然发诸言语，以争人格，赖有遗贤。而施诸政治，以正人心，责在议会。以议会权操立法者也，设法惟何，反经而已。经正民兴，邪慝自息。

什么"三无主义"是一些所谓无政府党人的话，不知何以无端加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上？父子成于肉体之乐，乃一千多年前的人所说，不知何以恭维陈独秀说是他所发明？我知道陈独秀他未曾著过《仇孝论》，我更知道陈独秀他早已无父可讨，此人之子或有发起讨父会之资格。这些怪话我在各处尤其在广东听得很多，现在穷乡僻县居然传到，可见系朱宗熹这班圣人之徒现在还着实很多，可见中国社会思想还在何时代！

中国人读了二千多年经，人心也不曾正，邪慝也不曾息，可怜这班老先生还想拿读经来正人心息邪慝，真是做梦；希望议员先生们来正人心息邪慝，更是梦中之梦。

1923年7月1日《前锋》第一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

民国十二年之乱，如癸丑之战、洪宪之役、复辟之变、护法之战、安福之乱、直皖奉直两次战争，以至此次曹党之变，那一次不是帝政余孽之北洋军阀在那里作怪？即至三次小小的广东变乱，也都是北洋军阀在岑、陆、陈炯明、沈鸿英背后作祟。这都是因为辛亥革命不澈〔彻〕底，革命的国民党未得着政权，统治中国的仍是帝政余孽，北洋派——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之旧势力，才有这种怪现象。

国民党究竟怎样？我们用不着夸张，我们敢说：国民党两次在广东执政，为期尚短，虽无什么积极的建设，而消极的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这是我们所亲见的；至于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肩负巨任为国牺牲，这些事实，便是反对党也不能否认。

现在国家的大难又到了，国民党应该怎样做？直系军阀之拥兵乱政，固应为全国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恶昭著的段系、奉系军人与安福、政学等国蠹以及无耻的国会议员，他们虽然也都反对直系，却不是国民党所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只有用国民的力量来做国民革命运动以靖国难。

我们也知道此时国民的力量很弱，然却只有此很弱的力量

是国民党真的力量，是国民党永远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不但不是国民党的力量，而且实是国民党的敌人，无论他们此时对国民党说的如何好听，去年今日直系军人拥戴黎元洪又何尝说的不好听。国民党若不建设在国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设在敌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们能够拥戴中山先生做总统，其结果能比傀儡总统黎元洪高明几何！

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我们想想四派势力是什么东西，直系、奉系、皖系不用说都是罪孽深重的军阀，国人全知之；西南诸省象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刘显世又是些什么东西，那一个不是拥兵称雄的军阀，那一个能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这四派势力果然结合起来更是人民的厄运，希望他们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即或裁点空名的兵，他们残民的势力依然存在；希望他们行兵工政策，他们的势力更加巩固了。若是联合三派共讨直系，这种军阀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无意义的战争？

西南诸将不但无心听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其中有些还是国民党的敌人；皖系、奉系虽与直系敌对，而终有他们历史上的首领，我们何苦为他们做幌子！

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的战线，一是军阀的战线，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断不可站在和国民敌对的战线那边，那边战线也终不容他人混迹，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

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

1923年7月11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学生

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生们的确在国民运动中做过些实际的工作，例如全国学生非基督教运动，唐山学生援助矿工反抗外力与军阀，北京学生为军阀压迫教育界举行示威运动，为军阀惨杀京汉工人举行示威运动，为反抗军阀政治的元宵运动，武昌、沙市及长沙学生反抗日本的国民示威运动，这都是明显的事实。

现在学生社会对于北京政变的态度如何？北京学生联合会之不承认已辞职的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并反对武人为总统及现在之国会三个决议，都十分正当。同时他们所办的周刊上说："对于所谓五头（孙、段、张、黎与政学会）的协商，我们仅认其性质为反对直隶系的共同，不是反抗军阀的共同，更不是个革命的同盟"。这几句话将各派政客的行动批评得入骨而合逻辑。只可惜他们的主张中，是消极的而缺乏积极的。

在上海学生总会的意见：否认曹为总统及僭内阁，号召国民不纳税，反对军阀政客合组行政委员会，这些主张都很对；惟其电劝国会勿举曹锟为总统，又请上海总商会知照使团与僭阁绝交、知照税务司等勿以关余盐余交僭阁，那便错了。

无耻而又曾恶打学生的国会议员，学生总会为什么还承认他有选举总统之权？乞怜中国太上政府的只有军阀官僚，他们本来是和洋大人同恶相济，为什么学生的国民运动也要请洋大人

帮忙，惹得洋大人笑着说：以中国主人翁自命的骄傲学生到底也要来求教我们了！

同学们！积乱的中国，非国民自力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援救的啊！

国民革命，同时有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反抗强邻侵略两个意思，利用军阀打倒军阀，利用外人打倒军阀，都是可耻而无益的办法。你们应该在上海召集一个全国学生会的代表大会，并努力实现商界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实的基础力量。我们要站在这个基础力量上造成国民对于军阀的战争，万不可象各派政客们只知结合奉、段等反抗直系，造成军阀对于军阀的战争！

1923年7月11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军人

把有枪的军人都当做军阀，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民国十二年的历史，是大小军阀（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等）的乱国史，也就是一般军人（下级军官及兵士等）困苦牺牲的史。一般军人都是为少数军阀傀儡，供少数军阀的牺牲；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们个个成了富翁，何等逍遥快乐，可怜下级军官及兵士在营里被种种军律管束，变成了活死人，平时连正当的饷都领不齐；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们都拥有三妻四妾，阵亡的和未阵亡的下级军官、兵士，可怜他们的家小是如何困苦度日！

民国十二年中，伤亡的下级军官及兵士到有多少，究竟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伤？不用说是为少数军阀私人的利益与地位而战而死伤。在这十二年少数军阀驱遣多数军人到火线上，为军阀们私人利益与地位的战争中，老百姓所受的困苦损失，真是计算不清。军人无罪，罪在军阀。

现在曹大军阀正在抢总统做，他何所恃？他所恃不过有许多军人替他打江山。可怜的军人们！请看着曹家花园的奢侈，比你们的生活如何？你们何必千辛万苦拚着可贵的生命为曹锟个人争地位。你们也是国民一分子，你们也应该设法合拢起来，赞成全国商界、工界、学界所提倡的国民会议，你们也应该要求派出

代表在这国民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利益；但军人代表中如有受军阀指使，有左袒军阀的言行，国民会议应该取消其出席权。

1923年7月11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

曹锟之贼民乱国，全国皆欲起而诛之，虽平日最稳健和平不敢开罪北洋派的上海商人，现在也出来反对曹锟，曹之不容于国民，已可想见。在这反曹的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说素以革命党自负的国民党首领孙中山肯与曹锟携手，真所谓“出人意表之外”了。国民党能做这种违反民意的事，甘为国民公敌吗？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我们始终不信有此怪事。

国民党数年来重要的口号是“北伐”，北伐伐谁，不用说是伐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为什么讨伐陈炯明，始终是因为他通北，阻挠北伐；为什么讨伐沈鸿英，也因为他受曹、吴的命令来攻取广东；若孙中山可与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孙伯兰一派主张孙曹携手，固然十分荒谬，然他们是公开的，而且说话还冠冕一点；另有一班所谓“民党”的人，在暗幕中鼓吹孙、曹携手，和曹锟嫡裔温大烟灯南北相呼应，这是什么一种勾当！这是什么一种民党！

田桐君说得好：“孙、曹联合之说……温世霖在京亦极为努力。迨大兵入川，闽粤督理命令发表，……从此去十分之四五；及沈鸿英作乱，被破于韶，检得曹锟之电若干种，而孙、曹联合之

精神，从此又去十分之九矣；至北京政变时，孙伯兰犹劝曹氏撤退攻粤之师，而直方终不见听，联合之说已至山穷水尽矣”。

孙、曹携手说已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并且在反曹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仍鼓吹孙、曹携手，我们不暇责其人格如何，我们只责其何怨何仇于民党，而必欲其名誉扫地以尽也！

所有国民党的忠实党员，都有痛辟此邪说的责任。

1923年7月11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　署名：致中

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

将来管理中国的不外三种势力，第一，是英、美、日、法等列强势力；第二，是中山先生所分析的直、奉、皖、西南四派军阀势力；第三，是农、工、商、学生人民势力。

第一派势力，现在已经是利用军阀政府间接的管理着中国，做他们的半殖民地；自华盛顿会议英、美、日、法四国协定以来，时刻在那里寻找机会——如临城事件、北京政变等——来直接共管中国，做他们公共的殖民地，一旦他们的意见利害一致，至少也要在中国沿江沿海沿铁路的地方实现他们的计划。

第二派势力，中山先生细分为四派，其实只有一派，我们无理由把他们分家；直系军阀固然是罪恶昭著，政学会所号召的"反直系大联合"，也只是军阀政蠹的大联合。直系无论其挟宪法或武力窃取政权，或并挟二者统一中国，其蠹国乱政将更甚于今日。反直系之军阀政蠹们即能联合起来，无论其以任何形式——高等行政委员会、总裁制或元老院、最高级军官等——窃取政权管理中国，观往察来，其蠹国乱政，亦与直系是一丘之貉。这两派——直系及反直系——军阀政蠹无论那一派管理中国，都同样是列强的经理人，不但不能改变列强间接管理中国的局面，其蠹国乱政，必且引导列强直接管理中国的局面日近一日。

第三派势力，乃是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这派势力目前自

然还是混乱、散漫、软弱；但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

我们究竟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不用说是希望第三派势力，因为第一第二派都是制中国死命的势力。

负有历史上国民革命使命的党派，当然要建设在第三派势力之上，对于其余二派敌方势力，不应稍存妥协或利用的想头。凡社会上有声望的团体或个人，对第一派势力发言，都须万分谨慎，一是恐怕引导国民误走错路，一是恐怕列强据为“中国人希望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

1923年7月18日《向导》周报第三十三期　署名：独秀

欢迎《民治》周刊

经济落后的民族，一切小工商业家与小农其对于政治的需要与欲望，自然不发达.所以中国农民一向酣眠 商人说在商言商不望政治，教育界主张教育独立不问政治。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外力及军阀压迫到了民不聊生的时候，或者本地工商业发达已到须与外力冲突的程度，国民运动也会起来，此所以向来不问政治的中国人民，大都会的商人、学生近来也出来谈谈政治了。代表这种国民运动的是上海商人及北京上海的学生。浪漫的青年学生们，有时说几句激烈话，似乎比商人更急进些，实际上并不然，这是可以拿上海商联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言论行动比较证明的。

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出版的《民治》周刊，我们已见过两期，其发表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政治的观念上三个 优 点：（一）主张民治运动应由国民自干，不倚赖任何方面的军阀；（二）反对任何派别的国会议员，（三）不曾有求助外力的观念，不曾请求外国政府或公使团取销北京政府，予列强共管中国的口实，这一层商人的观念比学生的观念清楚得多。我们竭诚欢迎商人阶级起来做国民运动，我们更欢迎商联会的《民治》周刊富于国民运动的精神。最后，我们要忠告中国商人阶级：在国民运动中，勿忽视了劳动阶级是革命的急先锋，是你们有力的友军！

1923年8月1日《向导》周报第三十四期　署名：独秀

呜呼！北京学生联合会！

我们在前期本报上，曾不满意于上海学生总会乞怜于公使团的态度，以为北京学生的见解总要高明些，那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曾致函使〔团〕，请各国保留北京政府承认案，这种认敌为友非国民运动的态度，不但取笑于外人，其结果只落得外人与外人的经理员——所谓摄政内阁——勾结一气，饬警厅前行取缔，这是何苦来！

我们最痛心的是：北京、上海的学生及上海工人这种倚赖外力的谬误观念由何种引导而发生？

1923年8月1日《向导》周报第三十四期　署名：独秀

答李子芬（乡村共产主义运动）①

来函所谓"空想的文哲派，他们都是直接间接的御用学者，引导国民回避革命心理主要犯"，这句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当头棒喝，真是一针见血的话。先生所主张的乡村共产主义运动，鄙见以为未免浪漫一点，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须以工厂工人为主力军，小农的中国，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共产主义的运动如何能在自耕农居多的中国乡村成功群众的运动？此时乡村里只宜于国民运动，而且国民运动是中国目前所急需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国民运动能打倒军阀，开辟我们共产运动的途径。先生以为如何？

独秀

1923年8月1日《向导》周报第三十四期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粤局与革命运动

陈炯明已无闽南后顾之忧，潮梅军队有南下之可能，若同时洛吴续援沈鸿英①，国民党也会再失广州。反对者将或以此轻视国民党，即党人自身也将或以此沮丧，其实大谬不然。革命的空气若不充满了社会，若没有组织强大的革命党，革命的事业决不会利用他人可以侥幸成功的。现在的国民党为了广州这一块土地，为种种环境所拘囚，对内对外不得不降心妥协背着主义而行，日夜忙着为非革命的军队筹饷拉夫，那有片刻空闲在社会上制造革命的空气，那有片刻空闲来筹划党的组织，所以真的革命党人，对于广州之得失不但无所喜戚，或者还以失去广州为国民党真的革命运动之开始发展。

1923年8月29日《向导》周报第三十八期　署名：独秀

① 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大元帅的大本营成立。3月20日，直系政府任命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后又任李易标为广惠护军使，以谋抑制孙中山。4月中，沈通电请孙中山离粤。孙令各军讨沈。沈失势，退往南雄。

章炳麟与民国

贪儒章炳麟、刘光汉当初本只提倡排满，不知共和民国为何物，刘光汉拥袁称帝时，曾明白宣布此旨；章炳麟始终排斥中山先生。前只排满，今只排北，也和刘光汉同一见解。

民国元二年间，章炳麟贪袁氏金钱官(东三省筹边使)爵(勋二位)，遂公然反对孙、黄，宣言中国非袁世凯统治不可。他这种罪状，实与刘光汉、孙毓筠相等，而且在他们背叛民国民党之前。

此时中国是军阀与民治之争，军阀派与民治派南北均有，章炳麟主张南北对抗，于理论事实已都不相合；而且他所拥戴的黎元洪何尝不伙同北洋军阀压迫西南，他所左袒的陈炯明、赵恒惕何尝不和杨森、沈鸿英同样是曹、吴的爪牙！

即以南北对抗而论，为什么不赞助南方革命的民治派，而赞助投降北方的黎元洪(第一次投降于袁，第二次投降于曹、吴)，赞助南方诸将中明白的勾结曹、吴之陈炯明、赵恒惕。这岂不是利令智昏！

社会制裁有时比国家法律还重要，象章炳麟这样贪昏叛国的小人，他自己还象煞有介事的高谈国事，固然是不知羞恶，而社会上不但不加以制裁，反以民国元老相待，似此是非紊乱，确是军阀官僚们敢于肆行无忌之一大原因。

1923年9月8日《向导》周报第三十九期　署名：独秀

黎元洪南来

黎元洪居武昌起义之名，倘好自为之，本来可以弄假成真，做一个历史的人物；怎奈他一通款于萨镇冰，再通款于袁世凯，三通款于吴佩孚，他政治上的节操，早不与共和民国有什么关系。即退一步言之，倘他能始终坚持以不署名解散国会令而去职，以不署名扰乱闽粤令而去职；更好是以坚持废督裁兵等重大政治问题而去职，国人对他还能表示同情；怎奈他两次去职，都硬是被动的丢掉了饭碗，并不是什么因为政治上不妥协而去的，倘敌人不硬要赶他滚蛋，他任何样妥协都办得到，但求不丢饭碗。即再退一步言之，黎元洪此次南来，倘诚恳的痛悔前非，以个人的资格，到民间去，做颠覆一切军阀官僚的平民革命运动，国人还可以原谅他；怎奈他一到上海，和中外新闻记者谈话，开口便是什么"本人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今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故不得不转而至沪。"又说"曹、吴等果能一反前行，……余亦极愿与彼等合议，不愿复有反直派名词。"原来他是为做总统而南来，原来他还在和曹、吴吊膀子，这种人是何等可恶而又可怜！

章行严君见上海舆论不满黎元洪，发愤的说："窃以为天下群为黄陂之故而反曹。"这句话只是代表政学会诸人的心理，不

但不能代表全国商民、工人、学生的心理，并不能代表军阀间反曹的心理。为黄陂之故而反曹的人，除了政治上投机的政学会诸人外，只有买空卖空的唐少川、章炳麟等几个人；章炳麟等又还是唐少川之傀儡。吴大翁做总理梦在北方弄鬼，唐少翁做总理梦在南方弄鬼，这两位新旧官僚的“大”、“少”，拥曹拥黎之行事不同，其心迹卑劣都是一样。

此时中国之大难，是帝国主义的英、美和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同时而又勾结为患，真能救济中国大难的，除了全国商民、工人、农民、学生及其他职业团体之合作，实行平民大革命，没有别的方法。章行严君所谓同事，所谓合作，是指被革命的军阀官僚政客们反曹运动之合作；我们所谓合作，是指革命的平民扫荡一切军阀官僚政客运动之合作。反曹的军阀官僚政客间，为什么由合作而不合作，为什么有所不满，为什么不能了然其所不满者何在，又为什么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我们实在不暇为行严君解释这种烦闷；只得把我们了然平民所以不满于一切军阀官僚政客不能与之合作的缘故，明白告诉行严君。

行严君！死守着前五年的头脑观察现在的事，便往往未免所见不广呵！

1923年9月16日《向导》周报第四十期　署名：独秀

曹锟贿选与中国前途

曹锟贿选的事实渐将实现了！拥戴雌伏在直系裤下监印的黎元洪来反抗曹锟，这丑计已是失败；欢迎助曹为恶的国会议员南下来反抗曹锟，这丑计也是失败了；结合直系爪牙陈炯明、赵恒惕、唐继尧来反抗曹锟，这妙计不但现已失败，而且将来还要出丑。曹锟贿选的事实渐将实现了！

曹贼贿选若真成事实，其结果是英、美、曹、吴外交系主奴结托的北京政府，将以正式政府名义断送国权大借外债，以供其征服异己武力统一之用。其统一不成，战祸固遍全国（曹、吴不去而妄想和平，江、浙绅商真是做梦），统一即成，反动黑暗的政局必更甚于今日，这是我们观往察来，可以断定的。

或者有人说：中国左右是军阀政治，曹锟做总统不做总统没什么分别。其实不然。曹锟若做总统，其意又是使英、美的金力曹、吴的兵力结合起来，人民所受的桎梏将格外加紧。

国民若欲打破此种桎梏而得自由，必须于曹锟贿选未实现以前，各阶级同时起来做一严重的表示；尤宜组织一个全国职业代表的国民会议，来努力驱除国贼，建设真正的人民政府，别的方法都是不中用的呵！

1923年9月30日《向导》周报第四十二期　署名：独秀

贿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

一般国民渐知干涉政治，渐知声讨军阀的罪恶，实在是好现象，虽空言也算是进步。

但是只知道军阀的罪恶，而忘了在军阀背后作恶之帝国主义的列强，实在是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了！

袁世凯若没有善后大借款，他能横行吗？安福部若不是勾结寺内内阁大借日债，他能做出如许罪恶吗？曹锟所以得志，岂不全靠外交团外交系和直系之大结合吗？临城案件之要求已公然以使团觐见为交换条件而承认了；直系诸将公然主张由外交系组阁，最要的理由是借外债；外交系不顾全国唾骂而悍然帮忙曹锟，其目的并不在做官而在经手大借款。直系政权倘真巩固，必然要假手外交系第四次断送国脉，（庚子赔款是第一次，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是第二次，安福参战借款是第三次，曹锟要做第四次了。）大借美债，以供他武力统一及收买政客之用。直系固然明明知道非借得一笔巨额外债，便无法削平异己；恰好美国也正须在中国输入余资，获得利权；岂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受内外二重压迫的国民，应该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首当扫除一切误会，以承认苏俄为

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现在的苏俄是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中心。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首当抑制一切感情，以扶助及扩大国民党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国民党是在过去现在历史上反抗北洋军阀比较有力的团体。国民联合的运动中，非有一个有力的大党做大本营不可。

这两件事实在是国民目前所能取的态度，不但是所应取的态度。

1923年10月17日《向导》周报第四十三期　署名：独秀

研究系与中国政治

一国政治的进步，全靠有一班洁白而强硬的政治家提携每个时期的反对派，反抗每个时期的统治者。中国研究系诸人未尝不富有知识，只可惜他们政治生活的态度始终与此相反，他们始终结托每个时期的统治者，压迫每个时期的反对派。他们的良心未尝赞成清室、袁世凯、段祺瑞与曹锟，而他们的政治生活，却明明是拥清、拥袁、拥段、拥曹，其结果每次都使政局益趋反动紊乱。他们的知识战胜不过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一念，遂至屡次蒙了政治上的耻辱而不自觉。他们忏悔一次又一次，若不毅然决然抛弃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旧观念，亦终于忏悔而已。

或者有人问我们研究系拥曹的证据在那里?我们的答案是：(一)请检查该系议员出席贿选的有多少人；(二)请看上海《申报》上张君劢劝人承认宪法的文章；(三)请看上海《时事新报》关于国民讨贼军的社评。

尤其是《时事新报》这篇社评，盛称直系两次战功八省地盘，承认马上得天下这句话并不十分错，大骂讨贼戡乱的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崇拜胜利者的势力之心理，由这几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若他们终不改易此心理，却也算得中国政治进步一障碍，我们盼望研究系诸人勿看轻自己！

1923年10月17日《向导》周报第四十三期　署名：独秀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死的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除了少数知识阶级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饭穿衣生儿子的行尸走肉。现在这班行尸走肉，比较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更要沉睡过去，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这班青年学生愈为一班行尸走肉所厌恶，他们的责任愈加重大呵！

行尸走肉的老废物不用说了，现代的青年们，一部分教会学生被教会教育汩没了性灵与爱国心，简直没有希望了，一般官僚的子弟，把学校和科举同样看待，也算是一些活的死人；又有一班将要醒觉的青年，却被老庄哲学或什么东方文化引到睡眠状态去了；更可怜的是一种半醒觉的男女青年，妄以个人的零碎奋斗可以解决他生活和恋爱问题之困难，此路不通，便由烦闷而自杀或堕落的亦往往有之。真正醒觉挺身出来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

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的，这是何等危险！

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他的特性：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摇动；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

德国、俄国的青年在革命运动中，都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社

会更有特殊状况，幼稚的各社会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他责任的轻重，与欧、美、日本的学生迥然不同。

中国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做，第一要明白他责任重大，而不可自弃，这是因为国民中只有学生比较是醒觉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

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两点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和欧美的学生界不同的地方。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第一期　署名：实庵

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

贫学的中国，翻译外国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于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若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便没有译成外国文的可能了。

由此观察，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谷儿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欢迎他的艺术吗？无论如何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了技术上的价值；即令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欢迎他著作的内容即思想吗？象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儿？

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1923年10月27日《中国青年》第二期　署名：实庵

苏俄六周

苏维埃俄罗斯在此开国六年中，因为政治组织与人不同，遂引起世人无穷的疑谤；这些疑谤虽然已经由事实解释了许多，而尚在疑谤中的亦复不少，今再略述事实，以解世人之疑。

疑谤中第一可笑的是说俄罗斯过激党实行公妻，妇女国有，连南高师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在徐州演说时，也公然如此闭眼乱骂，实在可笑极了。其实果然公了，还何妻之有，妇女非财产，如何能归国有，过激党中不少女党员，如何能承认其自身为财产，所以这等无稽之谈，除了毫无常识的人断不会再相信了。

其次就是说俄国革命杀人无算；其实俄国革命不说政治犯了，就在战争中杀人也不多，他们在革命中所死的人不比中国辛亥革命多，比起法国大革命来，真是天渊之隔。

再其次就说俄国仍是专制政治；其实苏俄在国家的组织上，或为省或为自治区或为联邦，一任民族之自由；在政治的组织上，各级苏维埃皆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上级苏维埃代表，全俄苏维埃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人民委员会之委员。现在世界上能这样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国？

又有人说苏俄拥六十万红军，号召第三国际，是有侵略全世界的野心。现在不谈俄国党人的理想，且说事实，若说是经济的侵略吗？大家应该知道俄国一时无此可能。若说是军事的侵略

吗?六十万陆军如何能侵略全世界。若说是理想的侵略吗?这应该是我们所毫不恐惧的了。加入第三国际的有五十几国党人,他们的野心是以全世界被压迫者合方〔力〕反抗全世界压迫者,不是以俄国来侵略全世界。

更有人妄想俄国一经革命,共产自由的天国便当涌出,现在还闹什么新经济政策,未免是变节欺人。其实共产自由的社会,在任何产业文化发达的国家,都不是旦夕所能促成的,何况是产业文化落后的俄罗斯。俄罗斯十月革命的主义及其成功,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过是走向共产党主义的路的第一步,由此第一步,运用此政权以创造无产阶级的经济力,以建筑共产社会物质的基础(因为共产自由的社会,必须是工业的富有的,不应该是农业的俭朴的,如章士钊等所想象之古代共产村落或原始共产社会),这些工作,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环绕窥伺中的苏俄,自然非旦夕所能成。因为俄国革命不能即实现共产社会,便失望而悲观,这未免把共产社会看得不值钱,而对于俄国革命也未免太乐观了。

还有一班妄人以为中国若再革命,必蹈俄国紊乱困苦的覆辙。殊不知俄国目前只是物资不足,不能向共产主义猛进,至于一般政治上的建设,不但比中国,比欧美哪国都好。经济的恐慌是没有的;失业的困苦是没有的;政治的阴谋与暗斗是没有的;国家的财政是有严格的预算决算的;城市乡间的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给的,六年未曾借过一文外债;红军的知识和学生一般,拥戴个人争政权争地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市上虽有警察,我们不容易看见,因为他们从来不肯站在街心指挥市民,然而争斗失窃的事竟不大有。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十二年，如今越闹越糟；俄罗斯革命才六年，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建设？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几十万人的过激党，负了为国家由破坏而建设的大责任同心戮力的干。所以疑谤苏俄的人，每每只是疑谤苏俄的过激党；可是感佩苏俄的人，也应该首先感佩苏俄的过激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章士钊彷佛说只有工业国应该有党，农业国不应该有党；富国可以有党，穷国不可以有党。其实主张无政治的尚有无政府党，何况有政治，有政治便自然有党，无所谓应该不应该，并且必须有好党才有好政治。若云农业国穷国不应该有党，苏俄却正是农业国穷国，他何以有强大的过激党？眼前的事实还闹不清楚，何苦高谈政治误人家国！

十月三十一日于广州

1923年11月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①]

亚东图书馆汇印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无事，却很欢喜的做这篇序。第一，因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文化落后的俄国前此关于这问题也有过剧烈的讨论，现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进了步，稍懂得一点社会科学门径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无常识的讨论了，和我们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不至于讨论什么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电线是不是蜘蛛精这等问题一样。）而却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寿康先天的形式说，及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说）。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敌人方面却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出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这方面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我以为不但不曾得着胜利，而且几乎是卸甲丢盔的大败战，大家的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

①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有上下两册，1923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为此书作序的除陈独秀外，还有胡适。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象是"科学概论讲义"，不容易看出他们和张君劢的争点究竟是什么，张君劢那边离开争点之枝叶更加倍之多，这乃一场辩论的最大遗憾！第二，因为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这两个缘故，我很欢喜的做这篇序。

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和人生观有什么关系，这问题本不用着讨论。可是后来科学的观察分类说明等方法应用到活动的生物，更应用到最活动的人类社会，于是便有人把科学略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类。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这些社会科学，不用说和那些自然科学都还在幼稚时代，然即是幼稚，已经有许多不可否认的成绩，若因为还幼稚便不要他，我们不必这样蠢。自然科学已经说明了自然界许多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科学已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自然界及社会都有他的实际现象：科学家说明得对，他原来是那样；科学家说明得不对，他仍旧是那样；玄学家无论如何胡想乱说，他仍旧是那样；他的实际现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来在那里绕日而行，孟轲以后，渐渐变成了无君的世界；科学的说明能和这死板板的实际一一符合，才是最后的成功。我们所以相信科学（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也就是因为"科学家之最大目的，曰摈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现象化之为客观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穷其因果之相生"（张君劢语），必如此而后可以根据

实际寻求实际，而后可以说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死板板的实际，和玄学家的胡想乱说不同。

人生观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很显明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讨论?哈哈!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之本身，也可以证明人生观和科学的关系之深了。孔德分人类社会为三时代，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象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象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这种社会的实际现象，想无人能够否认。倘不能否认，便不能不承认孔德三时代说是社会科学上一种定律。这个定律便可以说明许多时代、许多社会、许多个人的人生观之所以不同。譬如张君劢是个饱学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尝学问的家族要去求符咒仙方，张君劢立意要延医诊脉服药；他的朋友丁在君方从外国留学回来，说汉医靠不住，坚劝他去请西医，张君劢不但不相信，并说出许多西医不及汉医的证据；两人争持正烈的时候，张君劢的家族说，西医、汉医都靠不住，还是符咒仙方好。他们如此不同的见解，也便是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都是他们所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天外飞来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决不是形而上的玄学可以说明的。

张君劢举出九项人生观，说都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而不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学所支配。今就其九项人生观看起来：第一，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纯粹是由农业经济宗法社会进化

到工业经济军国社会之自然的现象。第二，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于农业宗法社会亲与夫都把子女及妻当作生产工具，当作一种财产，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手工已不适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拿家族当生产工具，于是女权运动自然会兴旺起来。第三，财产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产社会，人弱于兽，势必结群合作，原无财产私有之必要与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单一性的张先生，生在那个社会，他的主观，他的直觉，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财产私有起来，怎奈他所得的果物兽肉无地存储，并没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变卖金钱存在银行，结果恐怕只有放弃他私有财产的人生观）；到了农业社会，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仓库，谷物又比较的易于保存，独立生产的小农，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没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到了工业社会，家庭的手工的独立生产制已不能存立，成千成万的人组织在一个通力合作的机关之内，大家无工做便无饭吃，无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没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已为少数资本家私有了，非将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大家只好卖力给资本家，公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第四，守旧维新之争持，乃因为现社会有了经济的变化，而与此变化不适应的前社会之制度仍旧存在，束缚着这变化的发展，于是在经济上利害不同的阶级，自然会随着变化之激徐，或激或徐的冲突起来。第五，物质精神之异见，少数人因为有他的特殊环境，一般论起来，慢说工厂里体力工人了，就是商务印书馆月薪二三十元的编辑先生，日愁衣食不济，那有如许闲情像张君劢、梁启超高谈什么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第六，社会主义之发生，和公有财产制是一事。第七，人性中本有为我利他两种本能，个人本能发挥的机会，乃由于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

的社会的暗示之不同而异。第八，悲观乐观见解之不同，亦由于个人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而异，试观各国自杀的统计不但自杀的原因都是环境使然，而且和年龄、性别、职业、季节等都有关系。第九，宗教思想之变迁，更是要受时代及社会势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教，依据所传神话，大都是崇拜太阳、火、高山、巨石、毒蛇、猛兽等的自然教；后来到了农业经济宗法社会，族神祖先农神等多神教遂至流行；后来商业发达，随着国家的统一运动，一神教遂至得势；后来工业发达，科学勃兴，无神非宗教之说随之而起；即在同一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产业进化之迟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随之而异，非洲、美洲、南洋蛮族，仍在自然宗教时代，中国、印度，乃信多神，商工业发达之欧美，多奉基督；使中国圣人之徒生于伦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颂耶和华；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国穷乡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与狐狸。以上九项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

梁启超究竟比张君劢高明些，他说："君劢列举'我对非我'之九项，他以为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梁启超取了骑墙态度，一面不赞成张君劢，一面也不赞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见是：

> "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他所谓大部分是指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他所谓一小部分是指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他说："既涉到物界，自然为环

境上——时间空间——种种法则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项，固然不离物界，难道情感方面事项不涉到物界吗？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应，情感如何而起，这都是极普通的心理学。关于情感超科学这种怪论，唐钺已经驳得很明白。但是唐钺驳梁启超说："我们论事实的时候，不能羼入价值问题"。而他自己论到田横事件，解释过于浅薄，并且说出"没有多大价值"的话，如此何能使梁启超心服！其实孝子割股疗亲，程婴、杵臼代人而死，田横、乃木自杀等主动，在社会科学家看起来，无所谓优不优，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无所谓有价值无价值，无所谓不可解，无所谓神秘，不过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应有之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乃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传说及一切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试问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这样举动，有没有这样情感，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意志？

范寿康也是一个骑墙论者，他主张科学是指广义的科学，他主张科学决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他说："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决不是主观所应妄定。"他所谓先天的形式，即指良心命令人类做各人所自认为善的行为。

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一个人生在印度婆罗门家，自然不愿意杀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长家，自然以多杀为无上荣誉；一个女子生在中国阀阅之家，自然以贞节为他的义务，他若生在意大利，会以多获面首夸示其群；西洋人见中国人赤膊对女子则骇然，中国人见西洋人用字纸揩

粪则惊讶；匈奴可汗父死遂妻其母，满族初入中国不知汉人礼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为耻；中国人以厚葬其亲为孝，而蛮族有委亲尸于山野以被鸟兽所噬为荣幸者；欧美妇女每当稠人广众吻其所亲，而以为人妾为奇耻大辱；中国妇人每以得为贵人之妾为荣幸，而当众接吻虽娼妓亦羞为之。由此看来，世界上那里真有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我现在举出两个证据：

第一，他自号存疑的唯心论，这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此所以张君劢说："既已存疑，则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学，不应有丑诋之词。"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说我们武断也好，说我们专制也好，若无证据给我们看，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

第二，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科学与物质文明，固然是十分糊涂，但丁在君把这个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离开事实太远了。欧洲大战分明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得来的。如果离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排科学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造成这样空前的大战，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君劢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真有力量了。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象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十二，十一，十三。

1923年12月20日《科学与人生观》 署名：陈独秀

陈炯明与政局

曹锟贿选以来，他的第一政敌张作霖以前次单独作战为前车之鉴，此次决不肯为天下先；他的第二政敌段祺瑞在浙、沪、山东虽有实力，又怯懦没有发难的〔勇〕气；因此曹锟真正的敌人，只有肯负责冒险举兵北伐的孙中山。孙中山的军队倘进了江西、湖南，四川、奉天、山东、浙江自然会同时并起，那时曹、吴遂不得不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了。曹锟幸而得了一个有力的爪牙陈炯明，出死力将孙中山的军队困在广东，孙中山正要出兵北伐，陈炯明更出死力打得利害起来；若果能将孙中山赶出广东，去了曹锟真正的敌人，使曹、吴武力统一的梦得以开始实现，那时陈炯明对于曹锟真算是“圣主开基第一功”了。但同时我们要想想陈炯明这种举动，在民国史上功罪如何！

前有人以孙、陈两军在东江作持久战，实有利于曹锟，主张弃战言和，移师北伐，孙中山先生极以为然，而陈炯明的条件是中山须离开广东并向广东人谢罪。中山须离开广东，俨然是曹锟的口气；去岁广州之变，由洪兆麟军先发，今年北江之战由沈鸿英、李易标先发，东江之战由杨坤如、熊略先发，是谁应该向广东人谢罪？

陈炯明等口口声声说孙中山如何不好，国民党如何不好；今无论孙中山与国民党如何不满人意，而自以为好过孙中山的陈

炯明，却对于全国共恶的曹锟贿选一言不发，而炮弹专对着反对曹锟的孙中山与国民党打来，试问他何以自解？

尽瘁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我们现在还没有批评他的必要。国民党诚然有不满人意的地方，若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党，自然是中国的幸事；但我们只看见有许多不满意于国民党的党员并且实际上已脱离了国民党，大大的反对孙中山，这班脱离国民党的优秀分子，既然看不起国民党，他们政治上的行动，照情理应该比国民党进步得多；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当中象吴景濂、刘冠三等议员究竟如何，陈炯明、赵恒惕、黄大伟等军人究竟如何，政学会一班人又如何；凡是不满于国民党而脱离的党员，大都变成反动分子，竟然找不出一个比国民党更进步的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国民党并未放弃革命的口号，凡是不革命的分子自来会分裂出来。陈炯明便是这些分子中之一。

1923年11月27日《向导》周报第四十七期　署名：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

社会的旧壳内，幼维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例如在欧洲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

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像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护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

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

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

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萎靡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倒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

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

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二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亡中国者留学生也

日本留学生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亲日卖国，人所共知，不用说了；其实留美学生亲美卖国，留英学生亲英卖国，也都和曹、陆、章一样。英、美同族，因此中国留英学生或留美学生并有互亲英、美的态度。杜威先生曾叹息着对我说："中国的事只有中国人自救，'五四'以来，何以欧美留学生不出来做国民运动的指导者？"他老先生那知道欧美同学会几乎是一个卖国机关，他将来会变成朝鲜的一进会。他们当中不仅是几个总、次长做英、美和军阀的居间人，许多各部老爷，画到打牌的余暇，还要做几篇媚外的文章登在西文杂志上给洋大人看。他们若怪我说话伤众，他们试自问良心，他们多数人(自然不是全体)一向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皇帝与学术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教员会议席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柏林大学有一位教授对中国新去的留学生说："现在凯撒都没有了，你们来到德国学什么？"原来没有

皇帝便没有学术吗?这种思想固然很可笑,但我们且莫笑,我们若仍旧迷信个人有超越民众的力量,岂不是和他们一样可笑!

辜鸿铭太新了

社会上主张和平缓进的人,往往总说主张革命急进的人太新了。其实在辜鸿铭的眼中看来,连主张缓进的人都未免太新了;因为辜鸿铭主张复古向后退,连缓进都要不得。但是复辟之役,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很尽力,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由此看来,张勋真算旧极了,其实他也很新,因为他不但不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他并且用火柴、电灯,打电报,坐轮船、火车、汽车,废了石、矢、弓、箭不用而用洋枪、洋炮,又何尝算的真旧!

基督徒望基督徒成佛

上海基督教联合会致冯玉祥函中,有云:"急流勇退,还我清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成佛虽说是譬词,若直译成西文,欧美基督教徒见了岂不要大吃一惊!即此也可看出文言用典的流弊。

孔圣人又要走运了

从前戊戌政变后,反动政治与尊孔运动一时并起;袁世凯要做皇帝,同时尊孔祀天也闹的很起劲;现在南京的军民两长又接到曹锟通电募捐修理孔庙,拟各捐洋五千元。每逢中国政治反

动一次，孔圣人便走运一次，可见反动势力和孔圣人本是一家眷属。

农村立国主义原来如此！

章行严奉政学会命去到杭州联络卢永祥恭维卢永祥，这本是政客们因为著包奔走权门的常态，无甚希奇；最令人肉麻的是他说："改造农国的朴质勤奋如卢君其人，居于领袖地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议员与娼妓

有人说：一班加入贿选的猪仔议员，固然人格扫地，但其中许多人的确为生计所迫，何尝不可以"不得已"三字恕之。同时又有人说：娼妓固然无人格，但其中许多的确为生计所迫，何尝不可以"不得已"三字恕之。

是猪仔呢还是无政府党人？

一班所谓无政府党人大骂马克思派加入国民党是变节，其实马克思本身及其学说本主张和每个社会的急进派合作，有何变节之可言？可是中国最反动的军阀，现在又以贿选扬名于世界，而鼎鼎大名的无政府党景梅九即景定成，也列名在山西省二十九个猪仔之中，以无政府党而做议员，已经是主义上的变节者；现在又摇身一变而为加入贿选的猪仔，无政府党一到中国，居然花样翻新了！

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二期前五篇署名：独秀；后三篇署名：致中

答 适 之

我对于适之先生这篇序①，固然赞美其能成立一家言，但有不能同意之二点：

（一）这回的争论当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的人生观是否错误？"一个是"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后者的讨论多于前者，适之说是共同的错误，其实是适之个人的错误。何以呢？梁启超、张君劢这班人，当初也未必不曾经过极肤浅的唯物即科学的人生观，只因他们未曾敲过社会科学的门，阅世又稍稍久远，接触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生观，都和科学的原理原则相隔太远，于是他们的第一观念便是"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他们对科学的信仰如此破坏了，第二观念方思维到科学的人生观本身之错误与否。并且梁启超更聪明一点，他骂得科学简直是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人类，而同时却又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争的，正是科学是否万能问题，此问题解决了，科学已否破产便不成问题了。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努力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而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无论你科学的人生观有如何具体的说明，张君劢、梁启超可以回答你：适之先生！我们佩服你科学的人生观也很高明，我们本来不曾承认科学

破产；但是人类社会除了你这样高明的人生观以外，另外还有许多人生观，如先生所说的做官发财的人生观，靠天吃饭的人生观，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其余三天三夜也说不尽的人生观，却都是超科学的，却都是科学所不能支配的，他们的世界大得很哩，科学的万能在那里？适之只重在我们自己主观的说明，而疏忽了社会一般客观的说明，只说明了科学的人生观自身之美满，未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威权，不能证明科学万能，使玄学游魂尚有四出的余地；我则以为，固然在主观上须建设科学的人生观之信仰，而更须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毕竟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

（二）社会是人组织的，历史是社会现象之记录，“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适之说：“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我明明说“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何尝专指历史？）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我依据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讨论人生观，适之便欲强为分别；倘适之依据实验主义的理论来讨论人生观，别人若说：“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适之说的是一种实验主义的哲学”，适之服是不服？或者适之还不承认唯物史观也是一种哲学，想适之不至如此。适之好像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还不大清楚，因此发生了许多误会，兹不得不略加说明。第一，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第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世界上无论如何彻底的唯物论者，断不能不承认有心的

现象即精神现象这种事实（我不知适之所想像之彻底的唯物论是怎样?）；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这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哲学者，是主张如下表：

经济 { 制度
宗教
思想
政治
道德
文化
教育

之一元论，而非如下表：

经济
宗教
思想
政治
道德
文化
教育

之多元论。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焦点。我们何以不承认多元？别的且不说，单就适之先生所举的思想及教育来讨论。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莫如孔、老，他们思想的来因，老是小农社会的产物，孔是宗法封建的结晶，他们的思想即他们社会经济制度的映相，和希腊亚里斯多德拥护农奴制一样，并无多少自由创造。他们思想的效果，中国周末农业品手工业品之交易渐渐

发达起来(观《史记·货殖传》所述及汉朝种种抑制商人的法令可知),当时的社会已远离了部落生活,已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已开始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当时挂的是道家儒家招牌,卖的是法家药料,并且自秦始皇一直到宣统,都是申、韩世界。思想的价值如此。再说教育。我们有何方法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之下,使资本社会的教育制度实现?我们又有何方法在资本社会制度之下,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漫说资本社会制度之下了,就是趋向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非不极力推重教育,列宁屡次很沉痛的说:"在教育不普及的国家中建设共产社会是不可能的事。""要使教育极不普及的俄罗斯很快的变成一个人民极开通的国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以物质的条件之限制,无论列宁如何热诚,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只是一句空话。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工业家不但需学术精巧的技师,并且需手艺熟练的工人,资本阶级为发财计不得不发达教育,家庭农业家庭手工业社会自不需此,所以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一面却盲目的提倡教育,真是痴人说梦。教育本身的地位如此。适之说:"如果独秀真信仰他们的宣传事业可以打倒军阀,云云"我老实告诉适之,如果我们妄想我们的宣传他本身的力量可以打倒军阀,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国际资本主义,我们还配谈什么唯物史观!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适之文说:"他(指独秀)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

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我的解答是：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我们不妄想造一条铁路通月宫，但我们却不妨妄想造一条铁路到新疆；我们不妄想学秦皇、汉武长生不老，但我们却不妨极力卫生以延长相当的寿命与健康的身体。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适之赞成所谓秃头的历史观，除经济组织外，"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心的"原因，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

十二，十二，九

《科学与人生观》 署名：独秀

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

呜呼！联省自治派！可怜他们心目中的靠山，就是赵恒惕和陈炯明。

赵恒惕前年杀黄、庞，今年杀农民，又学吴佩孚以武力干涉水口山工人罢工，派兵占领工人俱乐部，硬说他是无政府党总机关，瞎为无政府党吹大气，这些黑暗罪恶姑且不提。他此次勾引北兵进湖南，联省自治的先生们能说这不是事实吗？马济、沈鸿英等都奉曹、吴的命令深入湖南了，这还是省自治吗？今后赵恒惕当然不敢再向曹、吴说什么自治，而一面又不敢公然向他的部下护宪军宣布取消自治，此时正在进退维谷。我想赵恒惕必然痛恨上了联省自治先生们的当，不然他始终一意附北，何至今日进退两难！

陈炯明此时又何尝不进退两难，但他进退两难的内容，却完全与赵恒惕相反。陈炯明本是一个险猾的野心家，他附北也并无诚意，不过是利用北方经济的援助，打退孙中山，他再挂起自治招牌，做一个不南不北的广东王。可是天不随人愿，他的部下却不能体贴他这样苦心，当东江初发难时，陈炯明与诸将在汕头置酒高会，洪兆麟突举杯对陈说："什么联省自治，这是北方所不愿听的，今后总司令不要唱这种高调了！"陈炯明听了面色青白，终席间不出一言。日前陈军攻克石龙，陈得意之余电报齐燮元，齐

覆电称奉曹大总统令陈某劳苦功高传令嘉奖，陈回电拒奖，而曹、吴大怒。今后陈炯明附北则不得为广东王，不附北则不独北方窥破其奸不肯加以援助，即部下将士亦不用命，这是陈炯明进退两难的情形。

以陈炯明、赵恒惕如此行为如此环境，而联省自治的先生们还要拿他们做靠山，这真是“拿着干鱼放生不知死活”了。

1923年12月12日《向导》周报第四十八期　署名：独秀

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

广东海丰农民因为天灾向地主请要求减租，并不算犯了什么天大的王法，而陈炯明的军队居然将农民一万余户所组织的农会解散了，并捕去该会职员二十五人关在监牢内，至今有些还未释放，这场冤案，若是孙中山的军队早打破了海陆丰，那是不会有的了。

现在湖南衡山农民因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价，也不算犯了什么天大的王法，而大地主兼贩米出口的商人又兼军阀之赵屠户，乘谭军退后，居然调动大军，解散此万余人集合之农会，并杀伤逮捕若干人，这场冤狱，若是谭军不退出衡山，那也是不会有的了。

因此，我们应该彻底觉悟：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例如曹、吴的势力不倒，民主政治不能确定，铁路工会和全国学生总会除广州外何处可以存在？

1923年12月12日《向导》周报第四十八期　署名：独秀

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

中国此时，在恢复国权上，在发达产业上，都急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民统一的国家。联邦固不妨碍统一，但现在有一班提倡联省自治的人，同时又提倡新西南主义，这明明是想拿联省自治的名义，割据西南几省，像这样消极的保守西南，而不积极的进兵北伐，不是破坏统一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国民统一的国家，是新中国主义，什么新西南主义，什么联省自治，都是割据的派头，都是国民革命之障碍。

在交通一时不易充分发达和语言一时不易统一的中国，主张适当的地方自治权，这是无人能够反对的，但中央和地方之军政、财政如何划分权限，地方的立法权、行政权扩大至何程度，这都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宪法上的问题，决不是旧统治阶级（即前清遗留之北洋军阀）之武装还未解除中华民国还未成立时所应决定的问题。

就将来的国家组织而论，适用联邦制的，只有以前的殖民地若蒙古、回部、青海、西藏等；若现在的行省，一旦去了地方军阀之割据的状态，除了扩大实际需要的地方自治权以外，实无改变国家组织之必要。

至于此时有一班人依赖赵恒惕、陈炯明的力量来提倡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理论且不必谈，即在事实上亦未免过于滑

稽；因为赵、陈和杨森、袁祖铭、沈鸿英处于同样的地位，一叛曹、吴便不能存在的。

但是联省自治和新西南主义这等主张，以之抵抗曹、吴的武力统一，固然未免滑稽，然在此反直运动之中，此等主张其效果不但使赵恒惕、陈炯明的借口以阻广东北伐之师，且足以乱国人群起革命之耳目，其帮助曹锟的功劳，实不在王承斌、吴景濂之下。

1923年12月19日《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　署名：独秀

宪法与自治学院

辛亥革命时，有数军官在上海酒家聚谈战事，旁有一劝酒的苏州女郎说："不要战，脑袋要紧。"这句话当时喧传上海各报，以为可以代表江苏人的温和性质。好个性质温和的江苏人，只以"不要战脑袋要紧"之故，隋唐以来千有余年，都是很恭顺的以子女玉帛供给战胜者，自甘雌伏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不与之抗。好个性质温和的江苏人，现在更是全中国顺民的模范。

曹锟贿选，天下多能起兵讨之，独江苏人奔走和平最力；曹锟欲挟宪法以助其统一，天下人多愤不肯承认，独有江苏人张君劢首倡以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之，独有江苏国会议员凌鸿寿等通电赞成之；"不要战脑袋要紧"的民族，他们的见解到底与众不同。

他们这样顺从曹锟，不但脑袋平安，而且有特别的宠遇，请看国立八校经费如此困难的北京政府，居然以七万九千二百元给张君劢办什么江苏自治学院，听说还在国立名义之下，不知道这种自治学院，是否教育部规定的现行学制所有？

他们在吴淞有一个猪仔公学，现在又以拥宪之功来办理自治学院，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年！自治！自治！"不要战脑袋要紧"，我们讲自治，政府自然放心。今后自治学院的东方文化声，精神生活声，反科学的人生观声，当比吴淞的猪声更为响亮，因为这

些声音都是曹锟所爱听的，和"不要战脑袋要紧"的宗旨不相违背。今后这个自治学院不知道要造就几多"不要战脑袋要紧"的顺民来！呜呼宪法！呜呼自治学院！呜呼"不要战脑袋要紧"江苏人！！！

1923年12月19日《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　署名：致中

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事，要算

干涉海关收税权

领事裁判权

军舰自由航行内河

纸币直接流通市面

强迫租借领土

这五项最利害。这五项之中，尤其是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因为其他四项还是局部的或是一时的，不象干涉海关能够使全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

产业落后国，全靠采用保护政策的关税制，对于和本国竞争的工业品重抽进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品和外品有竞争之余地；对于本国工业需要的原料重抽出口税，使本国的工业得着廉价的原料减轻成本；如此本国的工业方有发展的希望。

中国海关收税权，操诸外人之手，税务司是必须用外人的，税则是必须得外人同意不能自由增减的，这种协定关税制的结果是：(一)外国货物得以最低廉的海关税及子口税畅销全国，资本薄弱的本国货物又加以厘金之盘剥，那里还有和外货争竞的余地。(二)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料(如棉花等)，不但不能禁止出口，并且不能自由加抽重税阻其出口，在求过于供的原则之下，

本国工业遂不得不以高价的原料加重成本。在这样压迫的协定关税制之下，中国的工业将如何发展？中国工业的资产阶级应感如何痛苦？

中国工业不发展，不但资产阶级感痛苦，一切劳动平民的力与智都不容易得着发展的机会。全国各阶级人民的力与智不亢进之日，便是军阀生命延长之日；民主政治必然建设在人民的力与智之上，人民的力与智不能取军阀而代之，必然是一军阀仆一军阀起的局面。在这一点，所以我们以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列强比反抗军阀更为重要。

海关主权不收回，固然是全国民的痛苦，直接受痛苦的乃是工业资本家，按常情说，工业资本家对于收回海关运动，当十分热心。

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若起来纠正广东政府只争关余而不根本收回海关税则及用人的主权，我们到十分赞成；他们若是眼见广东政府为关税问题和外国冲突，袖手旁观，甚或表同情于外人，我们便不懂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种什么特别心了。

1923年12月29日《向导》周报第五十期　署名：独秀

广东战争之意义

这两年来广东的战争，一般人都说是孙陈之争，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前年陈炯明袭击中山先生，倘然是在宪法会议中，明白地拿着拥护地方权的旗帜，反抗中山先生严格的集权主张，那便可以说是孙陈集权制与分权制政见不同之战争。但事实却不如此，陈之攻孙，始终未曾发表与孙不同的政见，而且正在孙军北伐时，攻孙的口号是“请孙下野”、“赞成统一”；这明明是应援北洋军阀的统一，这明明是破坏南方革命之进行，如何能说是孙陈政见不同的战争？

去年陈炯明在东江举兵，正是为沈北军打接应；陈、林、洪各军队都受北方曹、吴、齐经济的援助；石龙得胜时，陈炯明电告齐燮元；褚慧僧君想到老隆劝陈炯明发表反曹意见，到汕头被陈拒绝前往；这些事实，便是亲陈者也不能否认。因此我们以为广东和孙军对敌的，不能说是什么粤军陈军，简直是北洋军阀派来的军队，和杨森在四川、赵恒惕在湖南是一样。因此，我们承认曹吴的兵力已打到了广东东江。因此，我们应该说此时广东的战争，不但是北江，便东江也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之战争，决不是广东内部的什么孙陈之争。

1924年1月9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一期　署名：独秀

祝上海丝纱女工协会成功

上海是全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工人在数量上居全国第一位，此多数工人中，女工占一半以上，即近世产业为丝厂、纱厂、香烟厂的女工，全体至少也有十五万人。因为种种障碍，上海许多工厂的男工还没有组织，何况女工。现在居然有一个丝纱女工协会出现，这是上海工界一桩可贺的事。我们希望这个协会能有多数真正工人出来办事；我们更希望这个协会不单是发表一篇思想腐败、文字腐败的宣言，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要而奋斗！

1924年1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二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

国民革命之目的是什么?简单说起来，是以国民主义，对外要求民族的政治经济之独立，对内要求人民政治上的自由。实现这种革命之动力，是各阶级革命的分子之合作；因为这种革命，是全国民的需要与利益；不是那一阶级单独的需要与利益。全世界各国的国民党，都是应此需要而发生而扩大而成功的。中国国民党当然也是同样的性质。此次中国国民党之改组，纯然由于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迫切所促成，这是毫无疑义；若说是因何人何氏所主张所鼓动，乃属皮相之论。

共产党之目的是什么？简单说起来，是以革命的手段，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改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实现这种革命之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及贫农的革命分子，决不是各阶级可以合作的，尤其不是劳资两阶级可以合作的；因为共产革命正是劳资两阶级间的争斗，而以颠复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目的的。

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目的与动力都截然不同如此；而中国共产主义者既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也允许他们加入，这是什么意义！这种意义，在世界的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知道革命的势力不可分；知道国民革命应该各阶级合作；知道列国中能表同情于殖民地的

国民革命者，只有真能主张公理的共产派。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知道必须世界被压迫的劳苦阶级革命（共产革命）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革命（国民革命）联合进行，才能够推翻世界的压迫者；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客观的条件上，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是目前的可能。

这种情形，不但中国这样，土耳其、印度、加哇的共产党无一不是这样；这差不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通则；所以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意义，在有世界知识的人看起来，原来不会发生什么疑问。

此次国民党大会后，社会上有两种误会：（一）是国民党赤化了，（二）是共产派利用国民党做共产主义的运动。

国民党此次发表的政纲，对外六条，对内十六条，条条都是国民主义，没有一条否认财产私有权，没有一条否认一切外债，没有一条否认资本家的选举被选举权，连大地主的所有权都没侵犯，连唐代条田的政策都没有采取，不知道赤化的证据在那里？若说国民党章程采用了委员制是赤化，那么，国内外采用委员制的公私团体多得很，例如最近之上海商界民治委员会，难道都赤化了吗？

至于说共产派之加入国民党，是想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运动，那真是妙想天开了。上面说过，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目的与动力都截然不同，共产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够利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来做阶级争斗的共产运动？共产革命，这一个意义异常严肃，是要靠无产阶级（近代产业工人及农村无产贫农）中革命的分子为动力的，不是随便瞎拉些人可以混充可以乱来的。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当然不免而且应该包容许多大小资产阶级的

分子在内；共产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这班资产阶级，来做共产运动，来革资产阶级他们自己的命？共产派如果这样头脑昏瞶，他们还懂得共产主义是什么？他们还懂得共产革命是什么！

我们希望党内党外的人，对于共产派加入国民党，有一个明瞭正确的认识，因此不得不重说几句：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乃是因为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决不是因为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运动而加入的；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动力，都截然和国民党不同，是断然利用不来的。

1927年10月《中国国民党讲演集》① 署名：陈实庵

① 据本文内容，这次讲演时间，当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不久。

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

中国人民有两个仇敌：第一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列强，第二是北洋军阀，后者比前者真算不得什么。

此时我们中国人对于军阀已认识他是国民的仇敌了，而对于比军阀更是仇敌的列强还没有明确的观念，我国民的感觉是何等迟钝呵！

一般劳苦平民，原始的民族观念是有的，而对于列强近代式的侵略，只感觉其如此，而不洞悉其所以；至于属于知识阶级的士大夫，一部分丑物自以为不是野蛮的义和团，却变成了媚外的奴隶；一部分有良心的自然也痛心外患，但以为这乃是内政不修军阀政治召来的，现在只应专力推倒军阀政治，有了民治政府，外患便自然退减，此时不宜兼攻列强，多树敌人。

有良心的知识者这几句话，表面上似颇有理，其实十分错误。我们第一应该知道：列强不是靠军阀而存在，军阀却是靠列强而存在的，前次英国之助袁世凯，日本之助段祺瑞，此次美国之助曹锟，这都是显然的事实；欧洲中世的诸侯王何以肯低头于市民，因为政府财政不了，非向人民拿钱不可；现在中国的军阀政府恃有洋债可借，不必低头求教于本国的资本阶级，所以不把舆论放在眼中。因此，我们以为不打倒列强的侵略，中国军阀的势力是不会倒的，因为列强是军阀的靠山。我们第二应该知道：

推倒军阀是要人民有充足的力量才行，决不是利用一个军阀打倒一个军阀可以投机成功的，至于民治政府，更不待言必须建设在人民的力量上面；此时在列强势力支配之下的中国，他事且勿论，宰制全中国人经济命脉的协定关税制一日不废除，中国的工业一日不能自由发展，工业不发展，不但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即一切劳动平民的力量又何从壮大起来，以如此力量幼稚的国民，又何能推倒军阀建设民治政府？因此我们以为不打倒列强的侵略，是不能推翻军阀建设民治政府的，因为列强是抑制吾人推翻军阀建设民治政府的力量发展之唯一魔王。

依据以上的事实，吾人欲救济国家之危亡，欲获得政治上的自由，欲发展自己的经济力，反抗帝国主义的列强，都比反抗军阀更为紧要。我们须认清我们的仇敌，比军阀更甚的仇敌，便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列强！

英、美、法、日在华盛顿会议已商定了由各国单独侵略变为共同侵略的所谓四国协定，去年即在中国开始实行了。兹将过去一年（一九二三年）中列强对我连续不断的侵略与暴行条列左方，以告我善忘之国民：

（一）张家口克门案　　美国商人克门及美国驻张家口的领事索克宾，为中国奸商保镖，由张家口驾汽车偷运现洋六万元出境，行至西沙河地方，中国守卡兵士照章要求检查，克门竟向兵士开枪拒绝检查，连放二枪，兵士还击，中克门肩部，回京死于医院。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三条件：（一）张锡元都统向美领事谢罪；（二）张锡元以下的军官革职永不叙用；（三）恤金五万元。结果一、三条都照办，第二条办了一些军官与兵士代替了张锡元。

（二）汉口棉花工人案　　一月十日汉口英商隆茂棉花工人

因工人二三百为组织工会被开除，代表三人被捕，包围英租界捕房，英捕房竟召集大队武装义勇队，向工人开枪袭击，工人王成头部受重伤，受棍伤者二十余人；英人复召集海军陆战队，布满英租界各要隘，向中国街架设大炮机关枪，准备轰毁中国街市，武装汽车满街奔驰示威。英界军警不但不分皂白，随处殴打棉花工人，连中国体面商人亦多遭其毒打。结果还是：捕去棉花工人三十三人，由英领事判决三个领袖监禁四五个月，其余三十人亦监禁一两个月。

（三）金佛郎案　　庚子赔款，据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之协定，明明说："所有应还各款，按照以上所载办法，将和约关平银依照各国金钱之价核定，中国或按伦敦市面银价用银付还，或以金钱期票，或以电汇票，均听各国所愿。……"并无须付生金之规定。同日各国又曾分别选定协定文中三种付款办法之一，通知中国外交部，计法、比、英、美、荷、意六国选定按照各该国之币用电汇法付款，日斯巴尼亚国选定暂时按照伦敦银价至一九〇六年用期票付款，日本选定按照伦敦磅价用电汇票法付款；此项选择付款办法，曾经明文约定，继续有效，至赔款付清之日为止。自一九〇五年订立协定以来，如约实施，从未发生异议。乃法、比等国以纸佛郎价格低落，忽强欲中国照金佛郎价格付款，中国若应此要求，其损失约在七八千万元以上。以英、法、美、比、意、日、荷兰、日本八国共同对我示威，黎曹两政府均有承认之意，只因国会强硬反对，故未决定。

（四）旅大案　　日本继续俄国权利租借旅顺、大连湾，今年期满，理应交还中国；乃日本藉口前次强要中国承认而未经国会通过的二十一条件中有期满续租之要求，不允交还，虽经政府及

人民迭次抗争而无效。

(五)上海乐志华案　　宁波人乐志华，在上海某洋人家当西崽，主人冤他偷洋八百元，骗他到巡捕房，严刑拷打，打死三次，第三次醒后，又将他临空吊起，用纸捻插进他的鼻孔，纸捻一头点起，火烟直冲心肺，急汗与眼泪并出。西探说："你若不肯招，必定打死你，我是老上海，打死个中国人，有什么稀奇！"随后又放下来，乱打重压，压得晕过去，醒转来，又用冷水浇身，如此又死去醒来若干次。后来这种悲惨的冤案，传到宁波人耳中，宁波会馆出来替乐志华在英按察使署提起诉讼。其结果：英按察使及陪审员一面以伤证确凿不得不承认乐志华伤残系出于虹口巡捕房，一面却宣告两个被告的捕房西探即亲手拷打乐志华的加布德和鲍尔庆无罪。

(六)临城案　　津浦火车行至山东临城地方，被土匪劫去华人一百余、洋人二十余，英、美、法、日、意等国公使团立即共同向北京政府严厉的责问。美国在华商会主张停止华盛顿会议所予中国一切利益，监督财政，全国水陆交通要隘派外兵驻防，停止退还庚子赔款；法使提议即时扣留关盐余，续索庚子赔款；葡使要求设立护路军由使团监督；意使主张援庚子例联军入华；英商藉口此案谋占天津旧德国租界，又主张各铁道由外人办理警务；日本报纸则主张要求黎元洪亲赴临城议和；一时列强对中国态度，简直和庚子年一样。外交团正式提出之要求是：(一)每人赔偿八千五百元；(二)特别编制护路警队，管辖于外国军官之下；(三)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津浦路局警务处处长张文通、第四次快车警察长赵德昭均免职，永不任用。其初北京政府的阁议对此通牒还有人说："田、何免职事关中国用人

行政之权，特别路警关系中国主权甚巨。"随后曹锟贿选成功，想求公使团承认，公使团表示以应允临城案要求为交换条件。曹政府遂覆牒承认：（一）关系赔偿，愿照来文所开甲乙丙三项办法；（二）关系惩罚，田中玉、何锋钰均免职，张文通、赵德昭均撤差；（三）关系路警，本国政府自动改良护路计划……聘用外国专门人才以资襄助。

（七）淞沪共管案　　上海领事团会议，根据华盛顿会议开放门户主义，请公使团向中国政府要求将上海公共租界自杨树浦以上至吴淞口，为中、英、美、日、法、比各国共管区域，在此区域内所有港务市政，由各国各派委员组织机关，共同管理。

（八）棉花出口案　　近年棉贵纱贱，国内纺纱业纷纷停工，纱厂商为减轻原料成本维持产业计，呈请政府禁棉出洋，当由北京政府照准施行。乃外交团援据条约所保障之土货购买输出权利，向政府抗议禁止棉花出洋，政府遂取消此项禁令。

（九）查封学生总会案　　上海法租界查封全国学生总会前后共三次，后两次都在去年。去年三月全国学生总会开四届评议会时，适值金佛郎案吃紧，学生会起而反对，此事正触犯了法国人，法领事遂将总会查封了。但这回查封还只是下去一块招牌，事实上机关仍存在；到了双十节，学生会散放传单，反对英人不肯退还威海卫，法捕房遂严厉的查禁学生会不许在租界内存在。

（十）成都英教士逞凶案　　五月十二日成都高师附中学生巫绍柏、陈道炎与华西大学附中学生赛球散后，突有英教士白明道自华西大学奔来，凶殴巫等，巫胸部头部均受重伤，制服扯破。成都学生开会要求华西校长命白教士向巫谢罪，华西校长竟以白教士有神经病拒之。

（十一）日本水兵逞凶案　　五月日本等军舰的水兵在沙市惨杀排货学生案还未了，六月一日又开到长沙，以武力阻止中国学生检查日轮搭客，枪伤市民四十余人。一个小学生偶在日本领事署傍河边游玩，忽来几个日本兵，极力殴辱，将他带到领事署，诬他割断了船上的绳，强迫他认供；赵恒惕派交涉司科长去交涉，也被日本人毒詈一顿，并强迫他在小学生的供词上签字。

（十二）大来案　　宜昌王汝勤军队里有个刘副官，因为酒醉滋事冒犯了美国大来商轮，美国在长江的海军司令飞尔卜竟将刘逮捕监禁起来，要求王汝勤应允将刘立时在江岸枪毙；王不允，彼竟不肯将刘交出，挟至汉口，向萧耀南为同样的要求。同时汉口美国领事也说奉到公使训令，要求将刘副官立刻在领事面前枪毙。此要求虽未照办。刘已判罚四年以上的徒刑，美使仍未能满意。

（十三）美兵逞凶案　　美国兵在天津无故枪杀滦县人张学书，在上海打死人力车夫孙汝卿，在北京打死人力车夫李廷元，都白打死了。

（十四）威海卫案　　本应无条件交还的威海卫，英人勾结汉奸梁如浩，订了一个继续租借并且是永远占领式的草约，其中最丧失国权的是：（一）第一条说："兹由英国政府交还中国政府接收，应划为管理专区并由中英政府特派行政长官管理之。"（二）第二条说："英政府允将刘公岛中国前有官产房屋等，一并交还中国；因此中国允将刘公岛内照单所开之房屋等无价借与英国海军作养病休息之所以十年为期，将来期满后，经双方同意并得以按照原定条件展期续定，俟两政府同意将此项供用终止之时，所有房屋等一并归还中国。"（三）第三条说："刘公岛应

由中英海军各派一人组织一会以备顾问。如中国政府将刘公岛自行开放通商及准外人居留，不作海军根据地时，除本协商意见书所规定外，关于商埠市政应归并爱德华码头之市政管理之。”第十二条说：“在威海卫内，现名爱德华一区由中国维持，准万国通商居住，作为自治区域，内设一董事会。”（四）第四条说：“中政府在刘公岛为英政府备款浚凿加深抛锚处所之一部分，不收价款。”第六七条说：“英国海军每年准在刘公岛登岸操演打靶；英国海军军需品准自由输入存储转运。”第九条说：“英国军舰得由刘公岛抛锚处所，拖靶至海外操练。”照这个草约等于不交还，英国人未免太把中国人当做小儿玩弄了。顾维钧说：“如欲共管案和缓，须先对威海卫案让步以和缓英人之情感。”

（十五）纸烟捐案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所售的纸烟，只一小部分是从英美运来的，其大部分是用中国烟叶雇中国工人在上海、汉口等处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无需进口税，只照条约出一点子口半税，大批运到各省，各省的关卡厘金都不能向他抽税了。此项纸烟行销全中国虽无确数，照杭州总商会的电报，浙江每年销场竟逾千万，以此推算，每年销耗当在二万万元以上。八月间浙江等省政府拟设局征收地方纸烟捐，英美公使向北京政府抗议，北京政府遂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此项地方纸烟捐。

（十六）中东路地亩案　　中东铁路所用地亩，本是旧俄时代用强力所占据，除追令吉黑两省与之订立展地合同明定的数目以外，还强占了二十余垧。俄旧党盘据该路，凡沿路地皮，经华人呈领者，所索租价比俄人要多十倍，且每因勒索不遂，即以命令强迫华人拆屋，去年拆屋风潮竟有十余次之多，被害华人竟至一千四五百户，因此，沿站商民向本国官厅请愿收回此项地亩。

新俄官场对于中国接收管理此项地亩，并不反对，却是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勾串俄旧党首领出来反抗，并且唆使哈尔滨之领事团，将中国官厅接收东铁地亩处之文卷概行查封。

（十七）长江联合舰队案　驻泊长江之英、美、日本各国海军军舰，曾于三月间，联合开会，讨论组织长江联合舰队特别警备方法，议决后，由驻京英、美、日、法公使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意见，以外部反对未有结果。八月间大来案发生，又因川军枪杀及逮捕为吴佩孚运送军火之日本宜阳丸船员，日美两国海军司令乃重提旧议，开会议决组织日、英、美、法联合长江警备舰队，其组织方法，将最近驻泊长江之英舰十一艘、日舰十艘、美舰八艘、法舰六艘全数编入，公举警备司令官一人，统率指挥。同时美国海军部以巨舰不便深入重庆、长沙等内河，特造浅水兵轮六艘。又拟由檀香山调鱼雷艇二只、小舰二只，均加入联合长江舰队。随后又加入意大利军舰二只，由美国舰队司令官代表各国到北京，将上海各司令官之意见陈述于外交团。

（十八）美侨会议案　上海美国商会召集美国驻华各埠之商会，于十月十六日在上海美商会开联合会议，列席代表十一人共代表五区：上海大来（大来行）、来门（美孚行）、开尼帝（茂生行）、蓝尼（慎昌行）、非阿门（怡昌行）、伟黎（美国保险公会）、鲍威尔（密勒评论周报），天津福罗士，北京申门，小吕宋答尼，哈尔滨汉得生。议决案凡十四，其中重要的是：（一）不承认中国征收纸烟捐；（二）要求美政府将华会中所许撤消在中国治外法权案无期延期；（三）对于增加在华海陆军队认为必要，须立即建造浅水兵轮四艘至六艘专为警备之用；（四）深愿美国政府与各国政府协作得由外人管理路警，并对于中国国有铁路应由外人组

织一技师部实行协作;(五)长江巡弋舰队司令官,在中国建功甚多,请求美政府准予联任,俾各国组织长江联合舰队得资熟手;(六)控制中国海关税;(七)干涉中东铁路。

(十九)疏浚苏州河案　苏州河属中国内地,上海商民主张由中国人自力疏浚,而外人勾串中国官厅(上海交涉员及江苏省长)硬要归浚浦局代浚。按浚浦局乃由条约产生之疏浚黄浦机关,以五国驻京公使推出之五顾问为骨干,以五国驻沪领事及驻京公使为后盾,此为既失之主权,若苏州河再归该局代浚,则管理苏州河之主权又将随之而去了。

(二十)排斥华人领港案　本国船用外人领港,本是因为一时人材不足的特例,前清同治七年政府与外人订立引水暂行章程,正由此特例而起,故章程上有"暂行"二字。行行日久,未能改正,以致华船领港被外人占据殆尽,更进而有不许华人领港之事。十一月间,有姚方文君驾领大来海轮由吴淞到浦口,竟有洋人纠众干涉其行使职务,声言"华人不许领港"。因此全国领港公会在上海会所召集全国各口华人领港会议,到有代表八十余人,一致主张"恢复华人领港权"。

(廿一)广东海关税案　广东政府主张广东海关关余应归广东所有,不应为北京政府利用之以打广东,故令饬税务司缴出历年所应缴之关余于广东政府,并拟税务司如不照办,则撤换另行委任。驻京英公使据驻广州总领事及海关税务司之报告,遂请北京外交团调遣六国军舰二十只,进泊珠江,向广东政府加以恫吓,武装英兵且在沙面登岸,并扬言广东政府如果撤换税务司,即派海军陆战队占领海关。各国军舰如下表。

最近香港英官方面,以广州市民示威运动之激昂,恐酿成排

(一)英国

- 摩空、罗便——浅水炮艇——泊沙面前
- 太伦杜拉号、美格诺黑亚、士卡拿——炮舰——泊沙面前
- 白鲁培尔、卑路——炮舰——泊白鹅潭

(二)美国

- 潘班加——炮舰——泊沙面前
- 爱虚维尔——巡洋舰——泊沙面前
- 二二二、二二六、三四二、三四六——驱逐舰——泊白鹅潭

(三)法国

- 玛里髙斯——炮舰——泊沙面前
- 克拉盎勒——炮舰——泊洲头咀

(四)日本

- 神、杉——驱逐舰——泊白鹅潭

(五)葡萄牙

- 巴特里亚——炮舰——泊沙面前
- 马交——炮舰——泊下芳村

(六)意大利　广东——泊芳村

斥英货举动，主张和广东政府妥协，而北京之公使团，尤其是英美公使，则态度依然强硬。

（廿二）汉口田仲香案　　汉口俄租界日商本多洋行厨役华人田仲香，于十二月二十日被该行诬窃表链，先打断田臂，又送日本捕房，用毒刑拷打，用麻绳痛绞，次日因伤致死。日捕房通知洋务公所会审员杨培往验，杨见田伤痕遍体，多数华工往捕房质问，又被武力驱逐，日本领事且派义勇队消防队武装上街示威。于是汉口市民大动公愤，由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召集市民大会，提出条件，要求官厅向日本总领事严重交涉。

除以上所述二十二案以外，更可怕的是商业的经济侵略，每

年进口货价超过出口货价总在三万万两银子左右；赔款还债又复流出巨额现金；如此，中国安得不穷，穷极安得不乱，乱起来安得不穷上加穷？我们中国这样穷而乱又复乱而穷因果循环的困苦，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厚赐，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帝国主义的列强（英、美、法、日）是我们的第一仇敌，比军阀更毒的仇敌！"

1924年2月1日《前锋》第三期　署名：陈独秀

寸　　铁

精神生活东方文化

我们不是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我们不是迷信欧洲文化以为极则，我们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欧洲文化更为幼稚。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二万万人不能由正当手段得着衣食住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有何心肝来高谈什么精神生活！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三万万人不认识我们这倒运的象形字，还有何脸面来高谈什么东方文化！我们若把精神生活当作神圣，把物质生活当作鄙陋，个人贫苦事小，一群贫苦事大；不但贫苦而已，而且因此辜鸿铭一班人，硬说中国人不爱清洁正是重精神轻物质的美德。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思想、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

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不用说这康庄大道也有许多荆棘须我们努力砍伐）走，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更有一位浑沌不过的浑沌先生他在《东西文化到底能够融合吗》那篇论文（见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里说："梁先生不知道中国化是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世界未来之文化即是中国化，而中国化成为世界文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变迁了。""虽然在大都市里与知识阶级里有禁不起西方化的诱惑而投降的，但在大部分的农民，仍旧勤恳地种着田，纯朴而且自然，仍旧无思无虑的过那孔老的生活，一些儿没有变动，只待西方化、印度化来到他们的中国化面前低头。"他又分析东西文化不同之点是：西方人全靠自己的力满足欲求，印度人全靠神的力满足欲求，中国人没有欲求。这位浑沌先生真算名称其实了！他有何证据断定中国人没有欲求？由古之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一直到今之饮食、衣裘、车马、宫室，不是欲求是什么？他怀着西方化来到农村向中国化低头的幻想，他不看见西方化来到中国农村驱遣无数农民去而为匪为兵的事实！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的零落不堪；因此，建筑

在东方文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这位浑沌先生还做着梦说："一些儿没有变动"。我不知道梁漱溟先生也认他是走一条路的同志吗？

国学

曹聚仁先生说："我们的社会，毕竟建筑在东亚大陆上，社会中各个体，毕竟要受旧文化的影响，一切思想决不能离了历史独自存直的。"他这段话我完全赞成，他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古董学问，纯粹是把他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必要，尤其是在社会学与考古学。但是用这样精神去研究他，只可称他为"国故"或"中国学"，而不可称他为"国学"；因为国故与中国学，都只表示历史材料的意思，而"国学"便含有特别一种学问的意思。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

夷场上的农村立国

注意农业和农村运动，在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不但是中国。但章行严所谓农村立国，不是这两个意思，乃是拒绝近代之奢侈的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此事在历史的进化上，不但我们没有自由开倒车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结果

只是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行严高车美食的在爽场上提倡农村立国论，绝不去农村着手丝毫运动，他自己也曾认过错；更奇怪的是他近来忽然登报发起集资十万元办《甲寅》周刊。行严君！以十万元办一周刊，在欧美大工业资本社会原不算什么，连工业后进的日本还不配，何况中国；行严君所理想的农村立国的社会，比现在中国人之生活与文化更简陋的社会，是否有此穷奢极欲之需要可能？行严君之行如此矛盾，简直是神经错乱！

圣人也得崇拜商品

古物固然应该保存，但未必定要把藏经佛像等，由陕西卧龙寺，搬到上海康有为家里，才算是保存吧？天冷了，圣人自然也须穿皮袍，但未必有向陕西官厅索取八十件皮袍的需要吧？康有为何故如此，这是很容易解释的。皮袍八十件，尤其是藏经唐佛，一到上海便是重价的商品，圣人得此，以后便可以只忧道不忧贫了。这位康圣人不但及其老也如此，他壮年在美洲在南洋也是如此。我们似不必专以此菲薄他，这不全是他的罪过；因为圣人也免不了衣食住，"忧道不忧贫"这句话，不过说着好听，其实没有这回事。我们也不是说康圣人这种行为是正当可以取法，不过以为在商品崇拜的社会里，虽圣人也未能免俗，这是毫不足奇的事。因此，我们更相信社会制度可以左右个人的意识，个人的意识不能左右社会制度。因此，我们更希望圣人之徒梁启超、张君劢等，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或宋儒道学足以救济今之世。

1924年2月1日《前锋》第三期署名　独秀

列宁之死[①]

列宁死后，世界新闻杂志都纷纷评论他的为人，我现在所要说的，不是评论他，乃是讨论他的存殁和俄罗斯革命之关系。这一点，在各报评论中，或不视为重要，或语焉不详；其实这种讨论，关系思想界甚大，在这短篇文中虽不能说得很详细，我觉得有略略说一下之必要。

关于这件事的讨论，有两方面之误解：(一)是唯心派之误解；(二)是机械的唯物论之误解。

唯心派素来把历史变动之唯一原动力归到个人意志之伟大，因此将俄罗斯革命事业，无论功罪是非，都当作列宁个人的事业，因此列宁死了，他们便以为俄罗斯革命将随之寿终(即苏俄瓦解之意)。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历史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农工大群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之拥护；他们不明白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他们不明白苏俄之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地位，已有不随列宁之死而动摇的程度。所以这派人的想象，是和事实不符的。

---

① 1924年3月15日出版的上海大学学生办的《孤星》旬报第4期《追悼列宁专号》上亦刊有此文。

然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此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人们的意志是人们物质的生活关系造成的；人们的历史是人们贪欲无厌的意志造成的。这是我们所相信之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之点。列宁生前在革命中的成绩，是我们所知道的；他死后，在新俄建设及世界革命中的损失，也是我们所应该承认的。人造的历史和机械的影戏不同，我们决不可陷于机械的唯物之误解，说列宁之生死存殁和俄罗斯革命事业绝无影响。

1924年2月2日《中国青年》第十六期　署名：独秀

北洋军阀三种新借款

英美帝国主义者，素以放债的方法，一面攫取中国的利权，一面扶助军阀压革命派断绝中国改进的希望。曹锟贿选后，反直派没有何种动作，英美帝国主义者放债的方法又来开始进行了。日来直派进行的借款计有三种：(一)是北方三路借款，(二)是武昌市政借款，(三)是洛阳至汉口长途汽车借款。

北方三路：(一)天津、赤峰间，(二)烟台、潍县间，(三)京汉、津浦间即沧石线。据上海《泰晤士报》说：此三路借款，先由英商汉兰宝公司与中国方面之发起人，共同草订建筑合同，且已得交通部之许可。此项筑路计划，由汉兰宝公司借款一千万金镑，据闻伦敦之中英投资有限公司已担保付出此项借款，三路共长八百英里。据最近消息，沧石合同、烟潍合同都已经曹锟代表签字，赤峰天津线亦由华商签字，一俟中政府批准，即行交款。

武昌市政借款，是萧耀南委派英国陆军中佐麦德格，代表湖北省政府，向英商借款五千万元，建筑武昌商埠，以预计之市政收入一千二百十万六千元(地税五百万，会铺捐一百六十万，车捐十二万，码头捐二十万，营业捐二百万，肥料捐八万，戏馆捐六千元，酒楼捐十万，杂捐十万，不动产登记税一百万，奢侈税一百万，电灯六十万，电话二十四万，公市场六万)为偿还本息之担保。此项借款去年即开始进行，阴历年底成立合同十二条，现已

提交省议会。

洛阳至汉口长途汽车借款，是吴佩孚派军需课长刘子青，向汉口美商借款一千万元，为建筑洛阳、汉口间汽车道路之用，路工完竣，一切收入均归该美商保管。

中国军阀借款筑路开矿，一切所谓实业借款，都不过是个名义，事实上都用做军政费。这次北方三路借款明明是英国人救曹锟之急；军阀们梦也想不到市政问题，所以武昌市政借款，不但市政用不着，连萧耀南恐怕也不能多所染指，大部分还得供给吴大巡阅扰乱川粤的军费；至于长途汽车借款，那更不用说了。

1924年2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电报电话借款之秘密

民国七年四月与日本汇业银行所订电报借款合同，及同年十月与日本中日实业公司所订电话借款合同，五六年以来的秘密（曹汝霖卖国的秘密），此时才发现出来。电报借款合同计十二条，第一条所载借款额是日金二千万元；第二条所载借款期是五年，期满协议续借；第八条所载本息担保品是民国政府全国有线电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电话借款合同计八条，第一条所载借款额是日金一千万元；第三条所载偿还期以三年为限，到期得按原定合同继续转期；第四条所载担保品是：（A）交通部所管理之各电话局及各长途电话现有及将来扩充后全部财产，（B）现在已设立之无线电台：吴淞、武昌、福州、张家口、北京六处及□收入，（C）价值日金五百万之国库证券。第五条还说由交通部于现在雇聘之日本技师及顾问中指定二人，分别助理技术会计等事。

此秘密发现后，国人当然不胜惊异，最奇怪的是卖国贼曹汝霖以还三千万日金之故，不惜断送全国国有之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及电话等极其重要的军事交通机关于外国。不但现有的断送了，并未来的都预先断送了。

在此秘密发现的同时，交通部又正进行沪、宁间长途电话工程（交通部特派员周家义及电政司营业科科长陈锡周，正在勘测

路线，树立电杆），遂引起江苏省县各团体之反对。其实不止沪宁一线，洛郑间长途电话也在进行，天津、汉口又何能免。

我们应该觉悟：这种损失全国交通主权的秘密合同，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反对，决不是江苏一省的事。

我们又应该觉悟：这件事决不是向北政府或地方政府电报抗争所能收效，必须有实力对付方法，江苏人士可以抛弃和平运动、宪法运动的迷信了罢！

1924年2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新疆省之煤油矿

二月十九日上海《大陆报》说："英国工程师铎克莱少佐，前二年中曾在新疆为马可尼公司建筑无线电台，现已回国与英之煤油公司商议开采新疆绝大之油矿。铎氏曾于数日前自京来沪，迭与上海三大煤油公司商议此事，闻三家已电商英、美总公司，派矿冶工程师、地质学家及运输业专家，前往新疆查勘。据铎氏言，就其个人及俄国著名采油家某氏计算，新疆油矿广及数千方英里，且与世界著名之巴库油矿相衔接。矿已在阿克苏至乌鲁木齐之间，中间包涵库车、叶克、库尔勒等地；其间小河、池、沼水面俱有油迹，且随地都有油苗痕迹。"

二十日《大陆报》又说："美国财力最雄势力最厚之矿业资本团之三古根罕公司，及日本最大财团三井会社，现均注意于开发新疆之富源。三井方面早经其驻京代表向中政府试探，欲取得新疆之油矿权。古根罕公司系兄弟六人所合组，每人均为美国经济界有力分子；此兄弟公司向来专开发美国、墨西哥、智利之铜、铅、银矿，近复注意远东，闻已组织工程师及地学家团体，不久即由旧金山来上海，转往新疆实地调查，该公司之急急进行，殆即为铎克莱少佐赶往英伦接洽所促成。"

煤油在现代居最重要的地位，陆上之摩托车，空中之飞行机，都非用煤油不可；又如铁道、海轮，也有以油代煤的趋势；工

业机械及农业工具，将来需要煤油，犹未可计量；因此一国能否在产业上、军事上占最优势，当以能否占有世界上最多量煤油矿而定。

美国煤油出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然犹供不应求，为防患未然计，势不得不与他国为油矿之竞争；其争最烈者：在土耳其，与英国有美索不达米亚境内摩塞尔油区问题之冲突；在波斯，有美孚、新克来两公司之争夺；在俄国租借库页岛油矿，是和日本一大暗斗，新疆油矿中国倘不能自保，又将为英美日三国之争端。

1924年2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卷烟特税问题

军阀官僚们对商民横征暴敛，商民当然应有正当的反抗。此次江浙两省举办卷烟税，他的用途固然免不了黑幕，商人反抗固然有理由；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两件事，

（一）协定关税制已制吾国工商业之死命，然洋货运入内地，华货相离之后，通过厘卡之子口税已失效力，中国官厅还有征收营业税落地税之权。此次江浙征收之卷烟特税，不但是洋货相离之商业税，而且卷烟多在中国制造，洋商从租界制造厂运入内地，不由轮船火车，不但不纳进口关税，并子口半税也即行避去，所以江浙征收此项卷烟税，外人绝无干涉之理由。北京、南京、杭州方面都有对外交涉的事实，这是明明自己承认除海关税协定外，日后国内一切税捐都须与外人协定，岂不将国家收税主权断送干净。无论外商允认百分之二·五或百分之五保护税或附加税，我们不能取消此烟税，即照官厅原案允认百分之二十，我们也断然不能开此内税协定之恶例，所争者在外人干涉内税之性质，不在他们认捐之数目。这一层希望中国商人不可助外商张目。

（二）此次江苏征收卷烟税，乃经商联会建议省议会议决，专充省教育经费；若有方法保证不移作军政费，奢侈品若卷烟税，虽值百抽二十，也不算多，担负的人将来还是消费者，于烟商

并无损失，况且是专用在教育事业，这一层希望卷烟商也要注意。

1924年2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岑春煊派员投北

岑春煊派温宗尧于二月念六日到南京见齐燮元，接洽粤桂军事，二十七日转车赴京洛接洽。当黎元洪被逐之时，政学系大部分是助黎反直的；现在他们的首领（岑春煊）却明白地投附直系了。有一位直系的议员说："现在及近的将来，中国政治上只有两种理想与势力：一是北洋派，一是国民党，凡想做政治运动的人不加入国民党，即应归附北洋派，决没有第三者活动之余地。有些反直派而不肯加入国民党，又有些反对国民党的人而不肯归附北洋派，这班人决没有贯彻其主张之希望。"这几句话说得真是痛快，岑春煊、温宗尧这班人，老老实实投附北洋派，也比以前混在南方护法团体里痛快得多。要中国政治进步，第一步便须北洋派和国民党分成显明的两条战线，把混在中间的游移分子淘汰去或使之态度详明，才有办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政学会首领岑春煊投北，绝没有反对之必要。更进一步对于一切明白投附北洋的人都不必反对，所应反对是：既不附北洋派又不附国民党一班不南不北态度暧昧的人们，如章炳麟、褚辅丞等。

圣道一门的王芝祥夫妇

王士珍、王芝祥等呈府院，请依宪尊经，以正世道；王芝祥妻则呈请崇祀孟母；好个圣道一门的王芝祥夫妇！可是孟母果入孔庙，不怕男女混杂吗？政府果然尊经，王芝祥南北奔走所提倡的同善社，岂不是孔圣人所不语的神怪吗？

外 币 祸

东三省官厅拒绝俄国在中国使用纸币，这件事在国民经济原则上，我们是赞成的。但同时我们要注意日本国在南满发出金票二万万元的事实，同时更要注意英、法、美各国在津、京、沪、汉、粤所发出的无数纸币，即以汇丰一行而论，除前此发行原额二千万元以外，今年又增加一千万元。

拒绝外币是应该的，单单拒绝俄币却是说不通。若说中国人曾受过俄国卢布的损失，那末，大战前北省人迷信俄国卢布，何尝不比南省人现在相信汇丰、汇理票更甚。

兵吗还是匪？

陕西省城内外昼夜抢案迭出，临潼县离省城仅五十里，该县知事亲带巡缉队捕匪，路遇劫掠旅客者追击至县城；不料驻临之镇嵩军马瑞娃部即向县署声明，谓所击非匪，乃是彼营出巡哨，即将巡缉队八人带到营部拷打，欲尽数枪毙，又向县署索洋五千

元；县知事乘夜潜逃到省，结果反是知事撤任，巡缉队八人中枪决一人，余判徒刑，刘镇华督军明知其冤，而倚马为心腹，不得不如此。好个糊涂的临潼县知事，督军就是土匪头，你还剿什么匪！

呜呼宪法运动！

张君劢辈鼓吹由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宪法，汤漪、林长民辈鼓吹修改宪法，他们都设在迷信纸上的宪法有治平中国的力量。他们不懂若是没有一种自身确能遵守宪法的力量来拥护宪法，使宪法得以施行，那全部宪法便等于一张废纸。

1924年2月20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五期　署名：独秀

商界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声

去年外人干涉吾国禁止棉花出口，上海商界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者（使团）终以不平等条约压得他们忍气吞声下去。现在英美两商会，对于外人商标注册，又要求修改商标法，并且要求列国共管，实是欺人太甚；上海总商会对于外人这样无理的要求，极端愤慨，致电北京商标局如下：

北京商标局鉴，报载上海英美两国总商会，为修改中国商标法一事，于上年十一月间，开联席会议，胪列应将现行商标法，予以修正者有十余条之多，而其议决案末节，又谓，总之本会以为中国商标局行政方面，不宜单由中国主持，一切须有列强共同管理。又本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商会在沪开联合会，其电致北京外交团有云；苟中国商标法条件，与马凯条约第七条之精神不一致之时，吾人誓不承认等语。核其要旨，不外两端，一则欲干预商标之立法事宜也，查吾国与各国所订条约，虽多失败，然只有关税须由协定之文，而无法律亦须协定之说，征诸中央商约第七条，所谓牌号注册局者，章程应如何规定，约内并无一语道及；而美约第九条，更有由中国官员查察后，经美国官员缴纳公道规费，并遵守所定公平章程，即由中国官员出示禁止冒用等语。就以上两项约文而论，足征此项商标法，我国有制定之

自由，亦不受如何之束缚，即谓此项法文，关系中外互市利益甚大，亦只能于事前容纳外人一部之建议，而据历来经过情形论之，此项法案，自前清迄今，已修改至六七次之多，外使建议，亦已迭有容纳，对于外商利益，实已兼筹并顾，委曲周至。嗣于去年五月间，此项商标法令文，经合法国会之议决，通行颁布，则外商欲保全其约定之权利，自有一体遵守义务，而乃多方挑剔，强令修改，是非特曲解订定之约文，即且蹂躏我国之主权。且以中外互市利益言之，商标法之影响于华商利益者，自较外人经商在华者为巨，若事事欲得洋商之意，将置华商之利益于何地，以该两商会此次所拟修改条文而论，第四条之继续使用在五年以上，忽议改为十年以上，是此说一经采用，现时援照第四条之使用年限而核准注册者，讵非悉归无效，此华商所万难承认者一也。二则欲以商标行政，由列国共同管理也，查英约所谓由南北洋大臣派归海关管理，系因商部尚未设立，故关于商事行政，暂交由关员管理，而特以南北洋大臣总揽其成，犹之邮政未设专司时，归总税务司赫德兼办，交通未设专部时，铁路事宜，初归海军衙门，继归外务部兼办也，盖海关虽雇用洋员，而严格言之，仍系中国国家之机关，吾国因官制之变迁，而定其管理权之谁属，纯系国内行政，决不受约文之束缚。若谓海关二字一经列入约文，即无变更之自由，则约文所载，尚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字样，此缺废置已久，何以未闻有所异议。无怪日人之论此事者，谓由海关而移归商部，不过一地方官权限之变更，决不能谓为违反条约矣。然此犹得曰误解约文也，至于该两商会所谓商标行

政，须由列强共同管理，是非特望文生义，抑直无中生有，充其意，凡事一经涉及外人，即须由外人共同管理，则除此中外互市，日益密切之际，无一事不可谓与外人有关，即无一事不可由列邦共同管理，国家所余之主权有几，此尤全国人民所万难承认者也。总之，外人条约上之权利，自应尊重，然约定之义务，仅以国家赶紧设立注册局所为限；我国既于上年五月份颁布法令，筹设专局，一再劝告外商实行注册，则约定之义务已尽，其余约外干涉，万难让步忍受，应请转呈，将外商要求各节，严加驳斥，以重主权。上海总商会叩。

这是中国商界反对外人干涉内政之第二声。我们更有进而忠告于总商会的是：此电文中所谓“外人条约上之权利自应尊重”之观念，你们应该抛弃了。自通商以来，外人胁迫我或蒙蔽我立下了许多侵害我国主权的条约，尤其是制我工商业死命的协定关税制，所谓外人条约上之权利，就是中国主权上之损失。这些条约不废除，外人动辄援引他来干涉我国内政，我们中国人便永无抬头之日。若主张须永远尊重外人条约上之权利，即等于主张中国人须永远听受外人之挟持；所以我们希望总商会由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进一步而主张废除各种侵略中国主权的条约！

1924年2月27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意械事件

中国军阀之乱，大部分是由于帝国主义之借款及军械的援助，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英国供给直系三项借款，意大利供给直系大批军械，正是眼前的事！

意械价值：据东交民巷方面消息，确数为四百八十七万余，已付过二百万元；据上海《大陆报》说，值价五百五十万元。军械数目：据京津《泰晤士报》，有来复枪三万枝，子弹四千万发，及大炮弹、炮车、炮架、野战炮等。其已由天津运往北京的：据上海《申报》说，大炮十二尊，炮车炮弹五百五十箱，步枪二千一百廿箱（每箱廿四枝），子弹一万一千八百廿五箱（每箱一千四百粒），野战炮十五尊，机关枪六架，炸弹七十箱，水壶干粮袋二百箱。据《大陆报》说，所有运送检验之事，均由意水兵与曹锟、吴佩孚之委员会同为之，共用货车七十辆，始运送完毕。

直系军阀何以有此巨款买此大宗军械，则恃有英国三项借款或以将来勾结英美所得之卷烟附加税担保借款，都是意中之事。直系既有钱又有械，越发要大显其作战杀人的手段了。如此，我们应该彻底认识：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军阀杀害中国人民，是何等明显的事实！

1924年2月27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之模范的改造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筹备处，兹发出党员登记通告如下："凡在此次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加入本党的为旧党员，旧党员须经过登记，方得为本党党员。从前国民党时代，各地罗致党员，单求其多，不问关于主义了解与否，所以明白分子，都发生'只要化一块钱，不问什么人都是党员。'这种叹声，分子的复杂，单就这种叹声里已经十分认的清楚了。如今可不能这样！(一)须了解赞成接受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的宣言；(二)须绝对服从党律；(三)须知登记后，在物质上到自身底生命，在精神上到个人底自由，不复由个体自由支配。具此三者底觉悟，才是本党同志；因为本党做的是革命事业，其利益全在民众，党员自身，无论革命成功以前及成功以后，不但没有比一般民众的享多余的利益，并且个人为党为国，只有牺牲，没有权利的。明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面以自力要求解放的旧党员，请按手续来登记！"

在这一个短短的通告里，充分表现出他们服从和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这两种精神才能算是一个革命党员，必须多数党员具有这两种精神才能算是一个革命的党。

我们希望浙江的党员都能这样切实做去，我们希望各省的党部都能照浙江同样的办法；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真的新生命，

才不至使全国大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案仅仅是白纸黑字的决议案。

1924年2月27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告合作社同志们

合作社是阶级争斗中一种工具，不是一种免除阶级争斗的工具，这个定义，合作社运动幼稚的我们此时未必相信，然而将来总得相信。近见南京东大附中合作社的宣言，觉得他们或者没有拿合作社运动来免除阶级争斗的妄想与取巧的心理。因此，敢将去年六月第三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所议决的合作社问题译奉这班同志们：

合作社问题

(A)法西斯蒂主义与合作社

1．法西斯蒂主义底直接目的，就是有系统地破坏工人组织，铲除工人运动底一切靠山。在法西斯蒂派发达之地，尤其是他们得到政权之地，他们最粗暴手段就是用来攻击合作社的。

2．为这原故，法西斯蒂主义应为我们视为直接恐骇合作社底一种危险；不单在合作社底发展上，而尤在他的生存条件上。所以合作社中共产党员应该作一种强有力运动，使合作社加入反抗法西斯蒂主义底斗争之场。

3．在法西斯蒂主义方式之下底资本主义进攻底发展明白地指出那一般自命为“纯粹”合作社员以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合作组织底发展有达到工人阶级解放目的底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合作社一变为资产阶级底眼中钉时，他们不客气地马上

把“和平”派社员抱有无限希望底机关搞得粉粹。“国内”战争迫到合作社门前，使他不能再守中立了。相信合作社运动不受阶级斗争底影响，这种幻想是带有危险性的。所有无产阶级运动底失败，直接地便反映到合作社来。在法西斯蒂主义制度底下，换言之，即在压迫工人阶级使之处于卑劣不堪地位底资产阶级武装专政底下，合作社以前所能活动地域已经干枯，再无生产之可能了。

4．仅仅在苏维埃俄罗斯境内，合作社才能照着工作组织计划去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底下，他才能有安全的生存和作用。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两种国家里面，合作社运动发展上之异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5．反抗法西斯蒂主义斗争底经验可以证明那些有多数无产阶级群众为根基底合作组织方能抵抗法西斯蒂派。那些独立的和分散的小组织，在抵抗资产阶级进攻底自卫斗争里头表现出来不仅是经济的低下，而又是政治的无能。

6．联合战线和工农政府两个口号恰好适合于合作运动底需要。为什么要联合战线？因为合作社所得利益所处危险与整个工人阶级同。为什么要工农政府？因为只有劳动群众夺得政权才能避免合作社底破产和给他以充分发展之可能。

7．劳动群众从法西斯蒂运动初期起，便应立定脚跟制止法西斯蒂派势力增长并不使他们夺得政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合作社应作反抗法西斯蒂主义底宣传，以经济力帮助宣传底发展，并令各社员参加组织无产阶级战线以保卫工人团体及压迫反革命倾向。

8．反抗法西斯蒂派斗争底经验又告诉我们，改良派首领

所宣传的无抵抗方法是不能用的。法西斯蒂派得到政权以后，迫害合作社手段只有加增再无减少希望。因此之故，反抗法西斯蒂派底斗争更加要用全力去干，无论如何务必做到救护合作社安全而后止。共产党人应该在合作社中继续工作，纵然合作社为法西斯蒂派所得，也不应将工作中止。一个强烈运动应该举行以阻止劳动者，因合作社为法西斯蒂派所得或为其所捣乱而遽行退出。

(B)关于工会与合作社底共同行动

因为一方面国际资本底进攻，他方面革命精神底增长，迫到安姆斯坦工团国际和合作社国际底首领们也走来赞同联合战线战略了。他们还是恐怖革命，他们打算组织一个首领底联合战线来代替我们的劳动者底联合战线。二月间合作社国际联合与安姆斯坦工团国际在不律塞尔所订的条约便是属于此类。

这一点，我们很值得提起来说，合作社国际联合已经放弃了以前政治中立底原则。他不得不承认现在无产阶级势力联合问题为合作社底生死关头问题。如果工人合作社不愿意投身资本家经济崩裂底漩涡中，如果他也不愿意当商业与财政资本底奴隶，他应该参加工人阶级斗争底政治和经济组织。

安姆斯坦国际与合作社国际在不律塞尔订条约并不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进攻底武器。理由就是这两个国际底同盟不允许有几百万革命工人底赤工国际加入他们的同盟里头。实际上说，这个同盟不过是拥护资产阶级利益而阻止工人组织斗争底团体罢了。他们并未曾真正做到各国工会组织与合作社组织相互间坚实的联络。

那么，共产党底合作社员底任务自然把这个同盟真相向都

会与农村底合作社群众宣布出来，并组织合作社劳动者与工会劳动者底联合战线来抵制这个同盟。在赤工联旗帜底下革命团体，绝对应参加在这战线里头。工会组织与合作社组织，应开一个国际的代表会议。他的行动大纲应具体地规定如下：反对法西斯蒂主义底理论和组织，反对掠夺劳动者，反对减少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反对武装和资本主义国家底挑拨战争，反对工资与工人组织底课税，反对压迫革命党底特殊法律，废止凡尔赛条约，要求赦免在狱的革命党人，从事无产阶级武装，宣传工农政府原理，合作社特别应密切地联络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和乡村底劳动者。

合作社应该参加所有革命无产阶级底行动。我们必须要求工会和合作社底首领出来与佛兰克福会议中因反对战争危险与法西斯蒂主义而产生的国际行动委员会合作。如果首领们不答许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即刻向合作社和工会群众进行联合无产阶级战线，拥护本阶级利益而反抗反叛的首领们。

在明年合作社国际会议中，我们不免要做一番运动攻击那联合于反动派底中立论者，并要求有多数共产党代表参加会议之中。

(C)关于组织问题

共产党合作社员国际势力底组织是必要的。因此，各国共产党所组织的合作社运动机关应开始把合作社底革命群众集中起来，并组织战斗团体同赤色工联、共产党取一致行动，预备必要时底斗争，以拥护合作社革命底利益。

各国合作组织和工会、党之间又应有密切关系和共同行动。

国家合作委员会负有组织机关以指导共产党员在合作社行动底责任。这个组织工作是经共产党合作社员第一次国际会议

所规定的，且得党执行委员会同意，能在第三国际中设合作部。组织规模(国家的)大略如下：

(A)在执行委员会之旁组织一个合作部。这个合作部由下列机关组成：合作委员会(会员为负责的共产党战士)、合作社、党工会部代表、妇女书记部、青年团及赤色救济会。这个委员会定期开会，以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主席并须报告合作社问题于执行委员会之责。这个委员会讨论和报告一切关于共产党员在合作社行动问题。

(B)在党底执行委员会旁又组织一个合作书记部。合作部在可能范围内应出版共产党合作社机关报。此报应供给文章和消息于共产党出版物，联合工会作政治经济行动，与第三国际合作部、共产党议员团、工厂委员会诸团体发生关系等等。合作部底决议经执行委员会通过后，由书记部实行之。书记部又自普通工作：通讯、编辑等等。

各行省各地方共产党合作社员底行动都依同样方法组织。党底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共产党合作社员在真协社中指挥共产党小团体底行动。他方一切合作社中负责的共产党员又组织合作部以党地方委员会委员为主席指挥这一地方共产党员底合作社行动。

在合作社中和在工会行动中，共产党员若与其他革命分子联合时，在这联合内，必须再组织共产党底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底任务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去造成革命环境。第三国际合作部负有审查和规定在合作社中共产党与其余革命分子共通行动底方法，在共产党合作社员第二次国际会议中报告。

1924年2月27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新闻记者与土匪军阀

军阀们觊觎青岛，强提路款以充海军饷，滥提盐款，强截捐税，种烟贩烟，这些举动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申报》记者因此责备他们不计日人之反对，不顾外交上有约束，不问条约之信用，可见日人之反对，在这班新闻记者心中眼中，比在军阀心中眼中更为可怕；可见制中国人死命的什么外交约束什么条约，在这班新闻记者心中眼中，比在军阀心中眼中更应该谨守毋违。这班软骨头的新闻记者们，对于外人比媚外的军阀还要恭顺。他又责备土匪随地掳劫，累及外人；他又责备武官强迫开车，殴击洋员；"外人"、"洋员"在这班记者心中眼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便是该死的奴才。所以临城案起，他们便如丧考妣的乱号，外人在上海打伤乐志华，在汉口逼死田仲青、王希天及许多华工冤死在日本，他们都闭着口一屁不放。

中国幸而还有一班野蛮的土匪和军阀，偶然还无意识的冒犯冒犯"外人"、"洋员"；若都象这班软骨头的新闻记者，外人洋员们在中国更是如在无人之境了！

联省自治的下场

主张联省自治的先生们，向来都以赵恒惕、陈炯明为中坚人物；现在赵已召集全省军官商议附北问题，陈则打算委令部下附北，自己退处海丰，不问政治。呜呼联省自治的下场如此！

陈炯明赵恒惕到底为什么反对孙中山？

陈炯明、赵恒惕反对中山先生，本是标榜一块联省自治的招牌，可是现在国民党大会宣言中，明明容纳了省宪的主张，而北方吴大军阀却非逼着陈、赵取消省宪的主张不可；我们要问问陈炯明、赵恒惕，今后到底为什么要反对中山先生，今后是否要帮助反对省宪的吴佩孚来攻打赞成省宪的国民党？

1924年2月27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六期　署名：独秀

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

二月十日，上海闸北川公路祥经丝厂兼织绸厂，晚间失火，焚毙女工多名，已检出女工尸身六十一具，其余不知下落者还有数十人。该厂工人共计五百余人，除男工五六十人及本地女工三十余人不住厂外，其余由外埠招来之女工四百余人，皆分住厂中底层及二层楼。起火时都已入睡，住底层者多已逃出，住二层楼者，因只有一门三窗，各窗都有铁栅，不能跳出，门口及楼梯均极狭小，人多抢出，反将门口堵住，故多在屋中烧死。救火会闻警驰来，乃因水管不灵，无法拯救，遂至焚毙百余人。

此事件之负责者，一是祥经厂主，二是江苏省长。上海一般丝厂、织绸厂的厂主，都防备工人如盗贼，不但门禁而且窗禁也甚严厉；祥经厂不但建筑多用木材易于延烧，而且每窗都有铁栅，数百人的卧室只有一门，门梯又均极狭小，岂不是将工人们活活地闭在屋中烧死！厂主烧点房屋不打紧，而且他还可以向协隆保险行拿得十一万保险费，工人们的保险费向何处去拿？在这件事，我们应该看出工人保险法及工厂法的必要。

闸北官办的自来水厂，万分腐败，居民拿出自来水捐钱，一月中总有几次一两天无水吃用，这种可恨的情形，凡是住过闸北的人都应该知道。闸北人民因为这种情形，极力争持将水电厂改归商办，而江苏省长始终不允，以至自来水厂至今未能改良，水

力甚弱，祥经厂火起，虽救火会与警察同时驰至，而无水也无法拯救。因为救火这一点，闸北居民更有向江苏省长将水厂争归商办的必要。

1924年3月19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七期　署名：独秀

工党政府下之英国工人罢工运动

在资本进攻的欧洲，首先反攻的要算是英国工人。即最近工党政府成立以来，铁道罢工等解决，而矿工联合会可要求增加工资，矿主允将最低之工资，增加至比一九一四年者高百分之三十，矿工代表未接受，惟允各交还讨论①，三月廿六日，再集大会议决。又伦敦运输工人联合会，近亦要求将伦敦电车雇工一万七千人工之工资，每周增加七先令。

矿工将大会延到二十六日，意欲在此期间督促政府提出最低工资议案，能由法律获得较优之工资；倘此目的不达，则各代表必将二十六日决定，俟四月十七日，目下之合同满期后，在各矿区投票表决全国罢工事。

此事将为英国工党政府至难解决之问题，盖英政府前曾决议在本财政年度终止前尽先讨论公共议案，工资案乃他们所谓私案，在此期间势不能提出；政府若推翻前议提出此案，必受保守、自由两党致命的抨击而倒，若不提出，又必失工界之拥护，工党执政到底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是什么？所谓不革命而得政权的工党政府，原来不过如此这般。

1924年3月19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七期　署名：独秀

---

① 原文为"惟允交各还讨论"。

寸　铁

统　一

土匪式的军阀各霸一方之中国，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需要统一，所以我们并不反对统一，无论是和平统一或是武力统一，我们都不反对；因为统一并不是反对和平，统一也不是绝对不需武力。

但我们必须明白：统一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排斥外国的侵略及国内的军阀以救同胞于水火，拿统一来做达此目的之一个手段，自然非常之好；若是拿统一来达他们什么军阀统一什么北洋正统的目的，结果不但不能救同胞于水火，而且兵祸连结，使同胞更不堪其苦，这种统一，我们如何能赞成！

慎重与上当

北京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英、法、美、日之外交，一向是有求必应，从来不知道慎重，从来也不怕上当。此次中俄谈判的大纲俄国确已放弃了租界，放弃了领事裁判权，放弃了庚子赔款，这是中国外交上从来未有的胜利；而上海《字林西报》说：“中国让步较多，将大为苏俄之利。”我们试问《字林西报》的英国人，我们

也想对英国让步较多大为英国之利，但不知贵大英帝国能够放弃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吗？王买办等阁员对于俄约签字主张慎重，以免上当；他们对于金佛郎案、临城案、威海卫案，都绝对不慎重，不怕上当，对于能够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及赔款的协约，都主张慎重，以免上当，实出人情之外。我恐怕他们越慎重，越要上英、美、法、日等公使的当；因为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眼见中俄会议成功，俄国将实行放弃租界、领事裁判权及庚子赔款，他们心中万分难受，怎能不设法从中造谣离间破坏！

恐吓我们的唯一法宝

近来帝国主义者对我恐吓的唯一法宝，便是华府会议许我的利益。不答应他们的临城案的要求，他们也要取消华府成议；不答应他们金佛郎的要求，他们也要取消华府成议；不答应他们干涉中东路的要求，他们也要取消华府成议。就算华府会议是有厚赐于中国，动辄便要拿回去，这种小儿间赠饼的笑话，都是一些堂堂大帝国的代表！如何好意思说出口？况且所谓华府厚赐，不过取消一笔裁判权及关税会议二事；关于前一项，俄罗斯将要先他们实行；关于后一项，议来议去，无论增加若干，还得是和他们协定，本来是应该行使主权自由增加的关税，现在由他们协商增加些须，他们便看做深恩厚赐，动辄以取消成议的要挟，此话怎讲？

无枪者连拍马也不灵！

吴佩孚想夺得山东省政权，一班无耻的省议员，以为到洛阳去数次推倒现在的熊省长，必然是最美满的投机事业，那知被吴大军阀申斥道"我对鲁政，自有主张，你们不必来捣乱。"

1924年3月19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七期　署名：独秀

中国工人运动之转机

前年一年中，中国工人运动各处都风起云涌起来，自唐山矿工京汉路工罢工相继失败，各处的工人运动便随着一落千丈，去年一年中，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在客观的条件上，中国既然有了许多工人，这种压迫的沉寂的状况理应不能长久如此，今年或者是工人运动转机的时期了。最近有几件事已现出转机的征兆：(一)胶济路罢工的胜利；(二)好几条重要的铁路工会(非公开的)已集议组织了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雏形；(三)上海华界电车工人已设工会筹备处，并开始向公司要求各项条件最要的是承认工会；(四)上海祥经厂失火烧死一百多女工，山东坊子煤矿出水淹死工人七十五名，这两件大惨事，都可以激起工人阶级的觉悟及一般社会的同情。

我们希望全国工友们及帮助工人运动的知识阶级勿轻轻放过这个转机的时期！

1924年3月26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中俄会议之成败

列强对待中国的外交，向来只有两种形式：（一）是列强间自己协定处置关于中国的问题，然后通知中国照办；（一）是直接威吓中国承诺他的要求。独有此次中俄交涉，俄国以平等的原则对待中国，与中国直接交涉，并没有漠视中国的主权先向他国协商关于中国的问题，而且王加谈判①间颇表现平等至让的精神，“归还中东路”、“蒙古撤兵”、“取消租界及领判权”、“退还庚子赔款”，象这种中国外交上空前的美满，就是以前对苏俄十分怀疑的人，也都大致表示满意。

照最近的消息，中俄交涉将结成的美果，恐怕要变成空花。此政府所持的口实，都是一片鬼话，实在的暗礁：（一）是法、日、美的阻挠，（一）是直系军阀利用中俄会议不成，一以防奉天，一以倒孙阁②，顾维钧是前者的代表，陆锦是后者的代表，所以在阁议席上顾、陆二人挑剔王加协议的大纲最力。

我们以为中俄会议不成，也好也不好。好的方面是：蒙古人民免的马上就要受中国军阀的统治及中国兵的奸淫焚掠；在中国兵未去以前，他们可以多得时间充分准备抗斗自卫的武力。不

---

① 王加谈判，即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与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关于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

② 孙宝琦内阁。

好的方面是：此次交涉破裂，俄国不得不转而与日本、法、美等国有所接洽，中东路问题及蒙古问题，若由他们协商有所决定，那时中国国家的资格怎么样？那时顾维钧、陆锦又将如何慎重免得上当？

1924年3月26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飞律宾之独立运动

三月十六日马尼拉电，飞律宾革命老辈及工团学生等，今日整队游行示威，马尼拉市民劝募独立经费，两日间得款二万元。十七日电：富商拉麻氏独捐独立经费二万五千元。十九日电：今日新建飞律宾科仑比亚协会举立石礼，国民党诸领袖演说，公然鼓吹飞岛独立。

飞律宾独立委员团向美国请愿独立，而美国总统柯立芝致函委员团主任说："美国深信伍特总督之能干好意公正诚实，美国在世界关系目下之状态中，须仍负保护飞岛人民之义务。"如此看来，他们这种请愿的办法，除损失自己民族的尊严外，可以说毫无效果。本来民族独立决不是请愿能成的，飞律宾委员团到美国去请愿独立，和印度不合作党到英国去运动独立，都同样的错误，都同样的无结果。马尼拉的工人们学生们：

要想独立，便勿怕革命！

要怕革命，便休想独立！

1924年3月26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利用国民党

共产革命是劳资两阶级间的争斗，国民革命是各阶级合作对于外族及军阀的争斗；可以只有国民党能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决不能利用国民党。

造谣中伤

两党相争，用实力用理论都是可以的，最下流是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无政府党不赞成共产党，尽可在理论上反对；陈炯明等不满意于国民党，尽可在理论上并在实力上反对；然而他们却都不肯抛弃造谣中伤的武器。大凡一个怯懦的个人或民族，对于敌人每每缺乏公开争斗的勇气，他们最得意的手段，是藏在暗中造谣中伤。

武力统一的榜样

以前黎元洪不能令汤芗铭到湖北任省长，还可以说黎元洪不是直系的领袖；现在曹锟、吴佩孚确是直系的领袖，而且在他

们直系的一统江山之下，曹拟添派江西省长，吴拟添派湖北省长，只因蔡、萧两督军①反对不能实行，这就是直系武力统一的榜样！

1924年3月26日《向导》周报第五十八期　署名：独秀

① 江西督军蔡成勋，湖北督军萧耀南。

工界最近之惨剧

最近中国工界发生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一百多女工；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七十五个；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五十三个。

第一件事，工人的家属还正在抗议，一般社会也还有相当的同情援助；第二、第三件事，工人及社会两方面都还没有什么表示，这是什么缘故？

坊子煤矿是日本经营的，其所定抚恤章程，凡是因公致死的，每人应给恤金五百千文(合银三百元以上)；唐山大部分资本及管理权是在英国人手里，那班洋工程师们虐待及薄待中国工人的事，是一向著名的。以前唐山工人因公致死，只抚恤数十元，听说现在还只有百余元，一条人命只与普通的骡马相等！

有一位唐山工业学校校长(资本主义的学者)曾说："社会主义者所说别的话，我们不必理他，惟有他们攻击资本家苛待工人这一层，却成一个问题。即以我所知道的唐山为例，隧道中预防坍落的工程十分重要，而洋工程师以所费远过数百工人恤金之数，不肯设置，彼等如此玩视人命，我们实在看不过去。"洋工程师们计算如此精巧，所以唐山煤矿隧道中，历年以来，屡次发生变故，这次(三月廿五日)的惨剧，也是因为隧道顶层突然坍落，活埋工人五十七人，伤者无数。

全国工人们！全国有同情心的人们！对于工界这三大惨剧不但须注意现在的抚恤，更须注意将来的预防！

1924年3月26日①《向导》周报第五十九期　署名：独秀

① 《向导》周报第59期所标明的出版日期，与第58期相同，都是3月26日。第60期为4月2日，而第61期却为4日16日，据此，第69期应为4月2日，第60期应为4月9日。

评中俄协定

关于此次中俄协定各方面之意见：在北京政府方面，一部分人想用以掀起政潮，一部分人向来是看东交民巷空气来决定外交方针的，他们不满意于王、加所定草案，吹毛求疵，本不足责；在议员方面，一部分曹家嫡系，对协定草案竟有丧权辱国的恶评，这种话匣子的作用，又何足论；在外人方面，帝国主义的列强，眼见他们不愿意的中俄直接谈判与恢复国交行将实现，并且协定中，俄国已放弃了他们所不愿放弃的许多权利，他们在中国的机关报怎得不忌妒毁谤！所不可解的是中国代表舆论的新闻记者们，也每每有不明是非的论调，最奇怪的是上海《新闻报》，竟谓俄代表态度无异于日本逼认廿一条件，这实在错误极了。第一，我们须知道日本廿一条要求，是日本逼我承认，至今不容许我取消；此次中俄协定，是承认或取消都随中政府之便。第二，我们须知道日本廿一条之要求，其内容，一方面是日本绝大的利益，一方面是中国无穷之患；此次中俄协定，的确是双方的利益，《字林西报》还说是中国片面的利益，因为所给予中国东西甚多，俄国并未拿去一件。

协定之内容，果于中国方面有利益或是损害，不可凭空瞎说，看国务院王正廷通电可知。据国务院号电及王正廷之梗电所说，中俄协定中，废弃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之旧约，承中国在外

蒙之主权，抛弃租界租地及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关税规定平等，都已有成议，谁也知道这些都于中国有莫大的利益。

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并未吃醉酒，不可以随便乱说。大家若要乱说，我就问问大家，请你们试问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者，去要求他们同俄国一样，放弃租界租地及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废弃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旧约，关税平等，看他们肯是不肯？

中国的对外交涉，历来备受损失与侮辱，大家都隐忍着莫可如何；独于此次中俄协定，得了无穷的利益，全国朝野丝毫不感觉苏俄扶助被压民族的苦心，反而借不成问题之细故（如曹党所争三点，俄国既已承认中国在蒙古之主权，则废约撤兵均不成问题，移交教堂财产，本不成问题。）横来挑剔簸诱，大放厥词；人家强暴，我们便跪在他的脚下，人家好说话，我们便欺上他的头去，我们当真如日本嘉纳治五郎所讥讽是"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吗？

我们对于中俄协定，也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苏俄承认中国在外蒙之主权，轻轻将外蒙独立的国民政府否认了。或者苏俄也有一种苦心，以为蒙古独立的力量还不充分，与其放任了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取，不如归之中国，中国侵略的力量究竟不及列强。虽然如此，中俄协定若真照草案决定了，中国固然得了许多利益，而中国人中不欲以日本待朝鲜、法国待安南的心理待蒙古者，终不能不为蒙古民族十分危惧。我们不愿为他人奴属，也不愿奴属他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既然不欲他人拿帝国主义来压迫我，我们便不应该拿帝国主义去压迫人，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之定义。

1924年3月26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国故党与复辟党

曹慕管先生曾函讽北大教授们做事易虎头蛇尾（大意如此），他在《民治周刊》时代，也还表示一点革命倾向；但现在可被杨贤江先生“竖起反叛之旗，大贼一声革命”一句话吓得向后倒退。文学革命运动中，颇现出复辟的倾向；文学的复辟如果实现，政治的复辟也会跟着来；因此，我以为杨贤江先生所用复辟二字，硬是预言不是譬词。而且我以为反文学革命的国故党和反政治革命的复辟党，本是一家眷属，决无所谓“与性不合”的话。我绝对不承认杨贤江先生所用复辟二字是譬词，这是陈望道先生解释错了。望道先生你太过客气了！

老马与小犬

杨贤江先生用“复辟”二字批评曹慕管，曹先生勃然大怒，而他致杨贤江的信，却也自比“老马”。俗传有人对客称其子为“小犬”，其子遂推论其父为“老犬”，这虽然是个笑话，在形式逻辑上也容许有这样的推论。可见譬词这一个方法，在文字上在语言上，都容易发生极大的误会。

1924年3月26日《向导》周报第五十九期　署名：独秀

湖南废省宪运动

以前赵恒惕做省宪运动时，引得一般迷信联省自治的先生们兴高采烈；现在赵恒惕仰承洛阳王意旨，暗地里做废省宪运动，不知道迷信联治的先生们感想如何?除章炳麟电湖南省议会外，不知道联治社一班人还有何动作?

湖南省议会为何敢违抗赵恒惕的意旨，反对废止或修改省宪?不用说有多数军官在他们的背后。湖南省宪不是今天才有的，叶德辉为何现在才明目张胆的反对省宪?不用说有赵恒惕、葛应龙在他的背后。

赵恒惕若明白的主张废省宪，马上便要失去湖南军界大部分势力；若明白的主张护省宪，马上便要受北军的压迫；他在进退两难之际，便异想天开，一面召集军事会议来疏通军人，一面制造废省宪的舆论来压迫军人，好达他借口军民人等公意来废省宪的目的。他所想制造的舆论，分新旧两派：旧的即叶德辉等；新的乃是一些做社会运动的青年，所以列宁追悼会赵恒惕也出来赞成。旧的方面他已经达到目的，新的方面恐怕不易利用罢。

赵恒惕何以想到利用青年?他以为青年们向来反对联省自治，此时他却用得着了。他不知道青年们的政治理想是国民革命，对于军阀的联省自治固然反对，对于军阀的统一也同样的不赞成；所以决不会在赵恒惕仰承洛阳王意旨的情况之下反对省

宪。恐怕赵恒惕枉费心机！

1924年4月2日《向导》周报第六十期　署名：独秀

评中俄协定草案

中俄交涉自有了协定草案，其内容之利害得失已明白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在理已不容我们凭空说话了。《字林西报》说，此协定是中国片面的利益，俄国只得着空洞的承认；俄国自觉，不以苏俄以权利付还中国为然，且因此在京、津、沪、汉、哈大肆活动；独中国人中颇有以此次协定为不利于中国者，其是非得失，决非抽象的争论所可解决，仍惟有就协定草案十五条之内容一一讨论之。

草案第一条是说：协定签字后恢复国交。第二条是说：协定签字后开正式会议。第三条是说：正式会议于签字后一月内成立，六个月内商定。第四条是说：在正式会议中，将中国与旧俄所订一切条约作废，别以平等公平之原则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俄政府宣言精神为本，缔结条约协定。其实我国对俄交涉协定，只此一条已足，大本既定，别的都是枝叶问题，都可据此原则而解决；若能得自此条之协定于英、美、法、日等列强，则中国便为完全独立国家已无外侮之可言了。现在的实际情形怎样？第五条是说：俄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俟撤兵条件（期限及彼此安全办法）商定，俄兵尽数撤退？彼既承认外蒙为中国之领土及中国在外蒙之主权又承认撤兵，则中俄间多年悬案之蒙古问题实已根本解决了；即吾人多方疑俄，以彼所于吾

国之利益(如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为毫无价值，独于蒙古问题彼来明言取消俄蒙新约，实为后患堪虞；我以为苏俄果如此其狡，在外交的步骤与策略上，我更当签定此协定，看其将来除战争外有何法否认此协定，而不承认蒙古为中国之领土，而不承认中国蒙古之主权，而不尽数撤兵。今此机已失，北政府破坏协定，即在此点其误国之罪已不浅了。第六条是说：两政府相互不做反对秩序宣传。第七条是说：于正式会议测定国界。第八条是说：将平等的原则议定航行问题。第九条是说：归还中东路主权，并由中国赎回该路。第十条是说：俄国抛弃在中国一切租界租地贸易圈及兵营等特权。第十一条是说：俄国抛弃庚子赔款以充中国教育费。第十二条是说：俄国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第十三条是说：将以平等相互主义协定两国关税税则。第十四条是说：赔偿问题在正式会议解决。第十五条说：协定自签字日起有效。自十条至十五条，完全是苏俄所于中国之利益，我们若想向列强取得此等利益，不知道要用多少气力，现在都可向俄国取得了，并且正可援俄例向列强要求，可惜此协定被北政府轻轻地破坏了。列强不但不肯抛弃租界，而且正在设法扩大租界；不但不肯抛弃兵营，而且正在极力增加驻华舰队；不但不肯抛弃赔款，而且须付生金金币；不但不肯取消治外法权及领判权，而且正在努力扩张此等权；不但不肯和我订立平等的关税税则，而且对于他们恩许的二五加税会议还是故意留难；列强所给我们的这些痛苦，拿来比较比较此次中俄协定，其是非事失，十分明白了。

我的朋友章行严说："此次中俄协定，即中国兵打倒莫斯科所得也不过如此。"

1924年4月12日《民国日报》 署名：实

上海租界三大问题

上海租界近来发生三大问题：(一）是公使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以为交还会审公堂的条件；(二)是工部局在本届纳税西人会提议取缔印刷品之附律；（三)是工部局在纳税西人会提议增加码头捐。

会审公堂初只为华洋间相互诉讼而设，按洋泾浜条约，权限范围，本有明白的规定，自辛亥革命时，领事团借口民国政府尚未得各国承认，攘为己有，遂至完全华人诉讼，也须听领事裁判，视租界为他们的属地，违背约章，侵犯主权又在普通所谓领事裁判权以上；上海领事团所享此种非分之权，本应据约取消，因何理由须以推广租界为交换条件？而且公共租界永不推放，也载在条约；他们向中国索取庚子赔款，不许中国自由增加关税，不许中国禁止棉花出口，都是口口声声责备我们须遵守条约，何以他们对于上海会审公堂之权限及推放公共租界，便不说遵守条约呢？可见帝国主义者责弱小民族遵守条约，也和军阀政府责人民遵守约法及其他法律一样，凡是与他们有利的，他们便抬出来压人，与他们不利的，他们便悍然不顾了。

租界不是英美的属地，住租界内之华人仍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也载在中国与各国所订的条约；所以一八九九年推放租界时，上海道曾以告示一纸附于致葡总领事兼领袖领事之公函中，

晓谕公众，该告示中明说："所有租界内关系华人之一切章程，如未经当地中国官厅认可，不得发生效力。"(此公函曾载一八九九年工部局报告册第二六二页)。工部局自己也知道，外人来中国通商，没有代中国政府及国会来制定法律之权；所以他们将要提出的印刷附律，拟附在洋泾浜章程三十五条，名曰第三十五条甲。我们以为不但三十五条原文，乃取缔马车疾驰，与印刷毫无关联；而且此项洋泾浜章程，从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过，根本上不成为法律，今所谓印刷"附"律，试问"附"在何种法律上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此次印刷附律，即使通过于纳税西人会，并竟得上海领团、北京使团之核准，也只对于西人营印刷业者有效，中国人没有服从之义务；因为上海租界还未割让给外国做他们的属地，他们绝对没有自定法律来责中国人服从的权利。工部局对中国印刷业四团体代表说："如华人对于工部局行政有不满者，尽可移居租界外。"四代表应回道："上海是中国的领地，中国人当然有居住的权利；如外人对于中国人反对印刷附律之举动不满意，尽可移居中国外，不来中国经商"。

码头捐原定照货价抽捐千分之一，现在要改为照关税抽百分之三(照关税现制，当货价千分之一·五)。当此工商业不振之时，照旧额加捐一半，以后还须随着关税增加，固然是商民负担太重；根本问题还是：在中国领土之内，在中国主权之下，外人可任意收捐并加捐，而中国官厅收点纸烟捐，他们反出头抗议，这是何等喧宾夺主的世界！

上海市民对此三问题的反对运动，甚为热烈，加入运动的有二十五个商业团体，我们的同胞已渐渐的醒觉了！

我们忠告上海市民的是："此次三问题，都还是枝叶问题；根

本问题是要取消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无论英、法、日、俄、美、德等何国人，要想在中国经商，必须以服从中国法律，遵守中国税则，不侵犯中国国家司法与收税的主权为条件。”

1924年4月16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一期　署名：独秀

太戈尔与东方文化

太戈尔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见四月十四日《申报》太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

在这一段谈话中，中国新闻社记者倘无误记，我们可以认识太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也不必比较的讨论相杀残破的西方文化和生焚寡妇（如印度）、殉节阉宦（如中国）的东方文化孰为健全；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这些思想文化复活后，社会上将发生什么影响，进步或退步。

（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认这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现在还流行着支配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有无数军

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死，用不着太戈尔来提倡令他复活。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不但禁止男女同学，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禁止男女同乘一辆火车或电车。

（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也是东洋独特的思想。在太戈尔的意中，以为正因东洋有这种高妙的思想，所以胜过西洋不知足而竞争，不能忍而不安的社会。殊不知东方民族正因富于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隶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手啖饭的生活，中国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乐；所以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

（三）轻物质而重心灵，太戈尔也以为是东洋文化的特色。其实中国此时物质文明的程度简直等于零，反之努力提倡心灵思想文化的人，头等名角如唐焕章、江神童，二等名角如梁漱溟、张君劢，其余若同善社社员，灵学会会员已普遍全国；太戈尔若再要加紧提倡，只有废去很少的轮船铁路，大家仍旧乘坐独木舟与一轮车；只有废去几处小规模的机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简。

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啊！

1924年4月18日《中国青年》第二十七期　署名：实庵

导淮问题与政治

导淮和江苏、安徽两省民生问题关系极大，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来赞成，这是不须讨论的；所要讨论的乃是经费问题。

经费约需二千万元左右，所谓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不愿担负，遂仍旧提出借款的妙计。

借款导淮之流弊，不但象十三日北京《晨报》所言（向美国借款三千万元，苏齐①、张謇及北政府各私得一千万元）、十分要不得；即果借美款实行导淮，将置沿淮三省之地于美国势力支配之下，那更是加倍的二十分要不得。华洋义赈会里美国的侦探，想支配导淮事业已经十多年了。他们想垄断导淮的工程，想支配长淮的运输，想利用陇海铁路，想开辟海州商埠，果如此一帆风顺，海州将为第二上海，而中国苏、皖、豫三省腹地遂入大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件事并不是他们的空想，实在有此可能。

所以现在导淮当以不借用美款为第一条件，至于是否苏齐任导淮督办，还不是什么要害问题，因为导淮督办由财阀或巨绅担任和由军阀担任，都是半斤等于八两。

不借美款，又用何款呢？我们主张应以江皖两省每年漕粮拨为偿还本息，向国内银行团借款；不及十年，即可摊还清楚。南漕

---

① 江苏督军齐燮元。

本是东南数省人民不公平的特别负担，拨归导淮经费并以后开发沿淮事业之用，本是情理之常。若说此项办法必至牵动全省财政预算，牵动全省军费，两省军阀政府如何能赞成，这便归到根本上政治改造问题，不单是导淮问题。因此可以证明若不根本改造政治，别的事怎样能够着手进行？江苏的绅士们未尝不想在地方做点事，但总想避免触接到政治改造问题，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将来的成绩都可想见。

1924年4月23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二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

凡是一个大党，内中总难免含有若干派别，简单的分左右两派，复杂的还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这是主义及政策实施时自然的结果。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方在萌芽，此时不但不应各怀意见，且实际的政治运动未认真活动以前，也断然没真的左右派之意见发生，即有意见，也不过是私的感情冲突，决不是公的左右派政见之不同。但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实际运动丰富时，左右派政见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他们不同之点，所争者自然属于具体的政策；此等政策，此时我们还不能够预知，惟那时采用政策之主张所以不同，必然由于两方之出发点有一些不同的根本观念，此不同的观念，乃是左右派之真意义，这是我们可以预知的。

将来国民党左右派之不同的观念，即不同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采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采用妥协方法的是右派；两方的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两方所采用的方法与具体政策，便自然不同了。左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忠诚的要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与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肯出于根本的妥协；右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急于党的胜利，甚至于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

这是将来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照这个意义，左派乃是真的国民党，真的国民主义者；右派乃是抛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

怎样才是国民党的左派或右派，本应该是如此解释；有人以为国民党中相信社会主义的是左派，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是右派，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例如高一涵君前曾表示国民党若采用社会主义，他才肯加入；又如国民党某君曾在广州支部演说国民党应采社会主义，否则便是官僚党；他们这些错误的见解，乃忘记了国民党不是社会党，忘记了国民党的使命和社会党的使命不同。社会党的使命是为阶级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的使命是各阶级合作为国民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固然也可以采用若干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他的使命究竟与社会党不同，所以决不能拿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国民党左右派的标准。而且社会党的右派（即反对革命的改良派），在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其价值远不及国民党的左派，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因此，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肯加入国民党；但他们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因为真懂得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很明白国民党的分子及使命和社会党的分子及使命根本不同，不是可以随便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理论上固然应该属于左派，但事实上将来是否左派，还是个问题。因为所谓国民党的左派，他的真意义乃是"始终采用革命方法，忠诚的彻〔做〕国民主义，不肯妥协。"并不单是唱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高调，便算是左派。口唱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或什么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不去做革命的工作，这种分子在国民党中是

右派不是左派；因为负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他的左右派，应该以革命分子非革命分子为标准，不应该以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标准。

我们希望国民党对于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及一切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都有一个明瞭正确的认识；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命为国民党左派的人们，对于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及左派之使命，也要有一个明瞭正确的认识！

1924年4月23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二期　署名：独秀

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

太戈尔在杭州及上海两次演说虽极简略，却已表示他的根本观念。兹综合其演词，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二个错误的根本观念。

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他在杭州说："现在觉着交通便利，民族很容易接近，这果然是科学的功劳，什么火车啊，轮船啊，但是科学只能使物质方面增加便利，总不能给我们心灵上有许多便利和愉快，反觉着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在上海说："中国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乌乎可。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价之巨，而其真价值乃远过之。……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物质文明，亦未尝无所用；余之所言，盖因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颠倒乖乱，遂造成无限之恼闷。……且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太戈尔也知道科学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脱离社会；他更应该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现代无限之恼闷，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

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社会普遍的享受物质文明才能救济，这乃真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做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象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若并普劝天下无衣无食无住的苦恼平民也都以进求心灵愉快为重，以物质生活的奋斗为轻，这种人不但是"何不食肉糜"的昏君，而且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是同样混账，这种人还配说什么"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中国诚然因物质文明而被创，但太戈尔要知道，创中国的不是中国自己发生的物质文明，乃是欧美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物质文明，这正是中国自己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结果。魔鬼是驱使物质文明的帝国主义者，不是物质文明本身。中国文化诚然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但太戈尔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这种可笑可怕的文化倘不被物质所迫，皇帝仍在坐龙廷，龙廷里还幽闭着许多宫妃与阉宦；男子仍在埋头读八股，女子仍旧裹着足关在绣房里；印刷店仍用雕板或木质活字，不会有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欢迎太戈尔，太戈尔坐小车由杭州到北京，至少要走一个月，太戈尔在路上犯了法，知县大老爷或许赏他数百小板一面大枷。象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

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道可以运兵打战，也可以运粮拯饥，所以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并无罪恶。太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不知道人类个人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社会不能担保各个人物质的生存，各个人遂不得不各自争存并庇及子孙；阶级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垄断物质的精神的生存之权利，被压迫的阶级不得不起而抗争；民族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不但在国内掠夺劳动平民，并须在国外侵略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弱小民族，才能够维护其垄断私有之权。这三种争夺残杀之根原，共总都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之不良，换句话说，就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我们敢说，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所以太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乃由于不明白社会制度之效用并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

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太戈尔在杭州说："人类要用爱来调和，……这些大师是代表相互的爱显现出来的，为人类友爱的模范，并不象欧美人带了枪炮等等而来，是拿了他们文化的精华来供给中国的。……前面所说两个印度大师到中国来，只要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现在我来，也如这两位大师的精神一样，因为中印两民族间，自有一种不可分离的爱。……现世可怕都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所以大声疾呼，想要回复人类精神上的乐土。"对于太戈尔这些话，我敢说："先生之心诚苦，先生之术则疏矣。"人类社会三种争夺残杀的根源，

上面已经说过；现在再单讲民族间的争夺残杀，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发展到必须输入原料输出剩余生产品才能够维护其阶级特权之时，自然形成侵略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自然结果，也就是民族间争夺残杀之唯一原动力。欧美人带枪炮来中国，并不是欧美人特别没有良心，乃是他们资本制度发达的缘故；古代印度人只带文化来中国，并不是他们特别有良心，乃是那时印度没有资本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印度人也并非特别没有良心，可是因为受了英人支配，也会带鸦片来中国，并帮着英人带枪炮来中国。“爱”，自然是人类福音，但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以前，我们不知道太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没有方法的一个空空的志愿，本是无用的废物；孔夫子的仁义叫了几千年，基督的爱也叫了几千年，何以现在仍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此时太戈尔又来叫“爱”，我要问问你这“爱”之叫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使他们自己取消资本帝国主义，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吗？我看等于向老虎说，“你不要吃人罢。”你若是大声疾呼，对被人压迫的阶级被压迫的民族说：我们任他们掠夺任他们侵略，我们不必反抗不必残杀他们，还要爱他们，让他们占据这物质上的乐土，我们只要回复精神上的乐土便得了；这便等于向被老虎吃的人说：“你让他吃罢，你还要爱他，你只要灵魂到天堂便得了。”如此，老虎固然要重谢太戈尔先生，可是苦了被老虎吃的人！这就是太戈尔先生要带来中国赤裸裸的一颗良心吗？

太戈尔这两个错误的观念，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上谈诗说艺；我批评他乃根

据他在杭州、上海两次演说，并不是事前臆度。这两点都应该附告《文学》周刊记者“澄”君。

1924年4月25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实庵

丧权辱国之无线电密约

美国和日本两年来在中国独占无线电台之争，也就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军事上商业上重要的交通机关之争；最狠毒的是他（美国）要占中国重要的交通机关至二十年之久，而建设这机关的经费及其损失还要中国负担，其实中国的军事和商业眼前并不需此。中国无力负担，便要向他负借款的义务；民国十年所订此项借款密约及续约，据日来上海各报所传，说是：电台开办以后，有利益即与中国均分，但中国所得之一半须存美国银行，充作偿还借款之用；倘开办后并无利益，或有亏折，此项借款本利必须于十年还清。电台以外所有交通部一切财源，全数作为偿还之担保。

利益是美国的，损失是中国的，这才真是丧权辱国的外交，反对中俄协定主张派兵收蒙的爱国诸公何以不出来说话？

1924年4月30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三期　署名：独秀

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

去年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今年广州圣三一学校的英国人又说："这是英国人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请，任从你们中国人的自由。"英美人这样反复声明他们在中国办教育的宗旨，昏愦的中国人员应该醒觉了罢！

中国人果然有点醒觉了，效法清华留美之阴谋侵略的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朱经农君怀疑于先，北京学界戒严于后，同时奉天教育界且有收回教育权之实际运动，虽至腐旧《申报》记者亦表同情于收回教育权之主张（见四月二十六日《申报》），他并说："外电并谓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即外人教育权）者，现惟有中国一国，此吾国向所未闻之意义也"。不过我们在《以后一切对华侵略皆将以教育的形式出之》（见本周报二十二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见《前锋》月刊第一期）、《中国教育问题》（见《前锋》第二期）等论文中，都大声疾呼的说过，可惜《申报》记者心史君都未曾注意。

《申报》记者心史君并详论最近土耳其收回教育权及奉天收回教育权两件事，这两件事实是我们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实例，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欧战以前，列强在土耳其设立的学校，中小学、女学和大学

都有，最多的是法国，其次是德国、美国，不用说，这些学校之目的和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一样，都是养成奴隶人才，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大战发生后，土耳其政府否认了以前与各国所定条约，于是法国在土耳其的学校都关门了，美国的和德国的仍旧开着；一九一八年协约战胜后，德国在土耳其的学校，也都破坏了，惟有美国的学校，一直到洛桑会议，尚为土耳其所应许。可是现在土耳其人已明白美国人对他们的教育侵略，和法、德并非两样，所以在收回司法权和关税权之后，最近更收回教育权，凡外人在土耳其所设学校，一律勒令停闭，即美国新在君士坦丁设立之医学校及以六万镑经费开办之女子专门学校，亦在勒令停闭之列；这就是所谓"不受投降条件中最末之一权利"。土耳其人这种独立不羁的气概，实在令有奶便是娘的中国教育家愧死！外人替他办教育便讴歌外人，军阀捐钱给他办教育便讴歌军阀，"有奶便是娘"，还论什么条件！

中国所受列强教育的侵略状况是怎样呢？全国大点的城镇几乎无处没有教会学校。除无数小学普及穷乡僻壤不计外，即在城市之中等以上的学校，据中华教育改进社报告：全国一，三七五校中，外人设立者占一六二校；男女学生二六九，一〇八人中，外人所设学校之学生占二八，五三四人。他们在中国所设大学，几乎无一省没有；他们势力最盛的是南京、上海、广州三处，最可耻的是广州、南京，教会学校以外，即中国自设的大学及高师中，也有许多留美学生或教徒为大美国及教会宣传德意，这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伤心之事。至于外人直接设立的学校，不服中国政府管理权，以耶教经典代替中国的伦理道德功课，更不用说了，所以外电说："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者现惟有中国一国。"

试问讴歌教会学校清华学校及欢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诸君，对此外电所云作何感想？

日本人宣传的本领及工具远不及美国人，所以中国人反对日本的潮流，比反对美国不知要大过几千万倍。日本人现时虽然知道，然而他的手段仍是异常笨拙，他方在模仿美国清华式的运动，马上即被中国人看出破绽，尤其是被讴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看出破绽；同时，他在奉天方面的教育侵略也过于肆无忌惮，引起世界上最麻木的中国人也起来反抗了。

日本在奉天教育侵略的方法，是在南满、安奉两路线各站，迭次添设公学堂（即小学）、添设师范学堂，招收中国学生，推行日本风的学校，以造就日本化的中国人。去年奉天省教育会开常会时，教育厅长谢荫昌曾提一案，凡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省政权所及之地域，对于奉省人民施行师范教育及小学教育。此案通过后，即由厅派调查员调查两路各站之前二项教育，报告结果，一体认为应予收回。日本听得此消息，遂向交涉署、教育厅质问，谢厅长则主张由中国计费偿还，收回自办，日本人仍不服，最近奉天政府决定召集省教育会临时会解决此案。

日本外务省派员质问谢教育厅长时，问他是反对日本办学堂或是反对办学之人，谢答道：

“两者都不赞成，对于用人，日人决聘不到好的中国教师，中国人稍有智识血性者，多不肯为日本用，故公学堂之中国教员，多半为中国不用的腐旧老童生。各公学堂实在办得不好，女缠足，男留辫，学生但知有清国、日本，不知有中华民国；其余功课均无足观。办法更令人不满意，学生听讲时，巡警监视，不准教员讲中国人之爱国话。”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总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奉天之教育的侵略，是何等肆无忌惮！但我们同时应该知道英美教会在中国各省所办的学校，何尝不和日本人在奉天办的公学堂是同样宗旨，"三育"和"圣三一"便是标本，决不可象英美留学生一面怀疑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一面却讴歌英美对华文化事业！

我们希望奉天人，收回教育权更进一步勿以小学师范为限；我们更盼望全国教育界，不但对于日本在华文化事业应该怀疑，对于英美在华教育侵略也应该反对；就是对于教员中美国化的留美学生及教徒也应该廓清。勿让收回教育权不受投降条件之支配的土耳其人专美于前！

1924年4月30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三期　署名：独秀

上海租界工部局能在华界行使职权吗?

奸商卖国贼郑伯昭，为图上海闸北宜乐里房屋加租翻造，被众房客所反对，遂藉洋势，假托英商泰利公司领换道契，于五月一日由泰利洋行大班白兰特，在工部局领取执照，带领印度巡捕二十五人，马队一排，西探十二人，荷枪实弹，督率小工五十余人，到宜乐里，将该里沿马路一带商店，实行动手拆屋。时在早晨七点钟，住在该里各房客均由梦中惊醒，一般妇女小孩搬运什物，如遭大难，哭声震天。当拆屋时，一部分工人涌入各商店内，拆除楼板地板，一部分工人上屋抽瓦，一时砖瓦乱飞，有房客赵子祥及某姓小孩均击伤头部。该里房客联合会及闸北国土维持会均召集紧急会议，以图对付；闸北各公团也都愤慨，开会讨论设法援助。

我们若问：工部何故派人到宜乐里拆屋，他们必说为保护泰利洋行产业。

我们若问：外人开的泰利洋行何以能在中国内地置产，他们必说泰利洋行在宜乐里置有房产，曾得中国官厅准许；因执有道契的缘故，外人在邻近租界之内地(如闸北、浦东等处)置有产业者很多。

如此，我们便要问：闸北宜乐里房捐门牌向归中国工巡局办

理，明明不在租界之内，即泰利洋行翻造该里房屋亦曾向中国工巡局请领执照，此次泰利洋行何不仍在工巡局控告，或请英领向中国交涉署交涉，而控之租界工部局；工部局又遵何条约有何权力能派武装巡捕到完全华界拆毁房屋？他们敢说："租界工部局照条约能在中国任何内地行使职权"吗？

我们敢告维护国土反对推放租界的全上海市民，此次工部局拆毁宜乐里房屋，决不是单纯的宜乐里房客被压迫问题，乃是工部局越界行使职权侵犯中国国土国权问题啊！

1924年5月7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四期　署名：独秀

欢迎广州上海两学生会

中国爱国的青年学生，自"五四"、"六三"后，几乎一蹶不振，各地学生会大半有名无实；尤其是学生之重镇上海、广州学生会，连名也没有了！

好了，现在否极泰来，不但北京、武昌学生会渐渐活动起来，而且广州学生会及全国中最有力的上海学生会，都已恢复他们的组织了！

三月九日复活的广州学生联合会，在改组宣言里，已显现他们的彻底觉悟。我们更忠告全广州的学生，今后将地方观念、宗教观念荡涤净尽，坚固的团结整个广州学生会，永远勿从安那其的谬见，自由退出而分裂而自杀！

"六三"运动的青年英雄——上海学生，亦于"五四"纪念日，将可敬的学生联合会重整旗鼓，出席者三十余校代表，会中职员都已选出了。我们更忠告全上海学生：(一)今后之活动应全体动员，各个都能尽职，勿但责难少数领袖；(二)应视全国学生为一体，勿存南北之见；(三)勿以宗教之故分裂上海学生团体。

我们更有忠告于上海、广州学生会的是：全国学生总会是学生界必需的组织，是学生界作战的重要工具，是敌人——列强与军阀——所疾视的，是学生界所应拥护的。学生总会应发见以前的错误，努力与上海学生群众携手合作；上海学生亦应捐弃细

敌而谋全国学生的大团结！

爱国的青年们！我们应该只看见敌人们——列强与军阀——压迫我们侮辱我们是何等凶猛，我们不应该单看见弟兄们的小过，大家亲密的团结起来吧！

1924年5月7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四期　署名：独秀

工界厄运重重

自"二七"后，全国工界(只有广州除外)都在军阀及中外资本家猛烈的进攻之中，最近流血的惨痛又将复现了！

第一件事就是本月十三日汉口工人杨德甫、周天元、黄惠、萧晋德、许白豪、吴玉山、钱生财、罗海丞、黄子章等被捕，目下尚在稽查处审讯中；他们大半是京汉失业工人，落在正面的敌人直系军阀手里，自然是有凶无吉！

第二件事就是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公司向官厅请兵弹压，前由湘潭县署派兵拘去工人仇六生；近又请长沙县署派荷枪兵士十余人到炭塘子取消工会，强制工人上工，工人向之理论，兵士即放枪示威，并拘去工人及旁观者四人，公司且有贿请县知事枪毙此四人之说。此矿运工工资，向来按照斤两计算，裕甡锰矿矿公司在官厅立案，以二十四两为一斤，已经出乎情理之外，乃该公司复违反成案，竟私以三十六两为一斤，工人等终日拚命搬运犹不得一饱，迫不得已乃为要求减秤而罢工，要求不着还要被捕流血，世间竟有此不平之事！

第三件事是开滦煤矿矿井，前曾压毙工人五十余名，事后只挖出尸身十七具，所有被难家属境况极其惨窘，乃矿局抚恤只给有亲无尸者二百二十元，有亲有尸者一百十元，此数只等于购买一骡马之价，虽工人家属备极哀求亦无效。

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那一样不是工人血汗所赐，而军阀资本家竟这样毒杀虐待工人，一般社会倘竟不为工人表示同情，那真是工人无负于社会，而社会有负于工人了！大家还要明白：中国社会若始终是这样冷酷，必不单是工人阶级之不幸！

1924年5月21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六期 署名：独秀

汉口之党狱

直系军阀吴佩孚之走狗萧耀南，近又在汉口逮捕多人，外间传为压迫工人过激运动，其实是破坏国民党运动；因为杨德甫等九人虽是工人，也都是国民党党员，并且是汉口党部之重要职员，同时被捕的律师国民党党员刘芬（即刘伯垂）和工会向无关系，况且自"二七"以来，汉口工会运动异常沉寂，那里还有什么过激运动。

国民党是创中华民国的政党，中华民国的招牌一天未下，国民党当然在任何中华民国领土内有公开的活动之权利。创造中华民国的党不能在中华民国公开，已经是奇了；不但不能公开，还要因为是国民党而被捕，岂非奇之又奇？

最近改组后的国民党和党魁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独立奋斗的精神与决心，已渐渐得着全国民众的同情。卖国媚外的直系军阀见了眼红，遂一面在香港、北京制造传播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一面在汉口大捕其国民党党部人员；他们这样倒行逆施，爱国的民众应该对他们更加一层深的憎恶，因为得罪国民党人其罪小，摧残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其罪大。摧残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实际上便是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

1924年5月21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六期　署名：独秀

世界的反动政象之转机

一年以来世界的反动政治之表现，最显著的便是意大利之穆索里尼内阁、法兰西之普恩赉内阁及日本之清浦内阁。但就近日新选举之结果看来，这种反动的政象已略有转机了。

意大利之选举，国民党从一百零六席降至三十九席，社会民主党从一百二十二席降至四十八席，独有共产党从十三席增至十七席。其结果穆索里尼一年余“清一色的意大利议会”之努力完全失败。

法兰西之选举，左翼诸党共得二百九十六席，内计急进社会党一二七人，社会党一〇一人，共和党三九人，共产党二九人；右翼诸党即政府党共得二百七十四席，内计稳健共和党一三七人，左共和党九二人，独立急进党三四人，保守党一一人。政府党既失败，普恩赉势必出于辞职。

日本选举之结果，宪政会得一五三席，政友会得一〇一席，革新俱乐部得二八席，以上反对政府之三党共得二八二席；政友本党即政府党只得一一〇席，此外商业同志会一二席，中立派五七席，政府党在国会所占议席勉强只及三分之一，清浦内阁已无留恋之余地。

此中更可注意的，属于第三国际之共产党，不但在法国获得胜利，而且在备受意大利政府压迫摧残之下，尚能够得工人之拥

护增加议席。

1924年5月21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黎元洪又缩头了

黎元洪南来投机不成，已厚着脸由日本回到天津了。他自己说一生为人利用；其实有机可投时，他便由大都督而大元帅而大总统，无机可投便将头缩进去，谁能利用他？

1924年5月21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六期　署名：独秀

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

意大利巴尔达里尼教授对中国青年说："余虽主张和平，然为弱小民族计，则自卫之战，亦认为不得已，余亦不反对君等之主张。"巴氏这样主张和平，还算比太戈尔说得有分寸。我的朋友说："巴氏和平运动是积极的向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反抗，太戈尔那比得他；太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象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所以在北京的英美人尤其是宰制中国的舒尔曼、安格联都很欢迎他，第二次诺贝尔赏金——和平运动的赏金，太戈尔诗圣或者可如愿以偿"！

可怜想吃天鹅肉的中国人！

美国人以庚子赔款充中国学生留美学费及在中国办清华学校，一方面可以造成许多亲美的奴才，一方面名为退还，其实这笔钱仍旧用在美国，并且博得无知的中国人歌功颂德，这是何等巧计！可怜上海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道路建设协会都想吃点天鹅肉，这是何等痴想！

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

一班卖国贼合伙凑拢的所谓北京政府，竟接受日本公使的照会，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五七"、"五九"开会纪念国耻。湖北的军阀近又禁止在全国运动会散放排日的传单，且逮捕散传单的人。这班军阀们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是什么？

1924年5月28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七期　署名：独秀

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

太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算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卖阶级的工党政府

全世界的阶级对抗与阶级战争，已普遍而且需要得万分，却只有英国工党政府的殖民部大臣汤姆斯，还闭着眼睛向各殖民地代表演说："请各消除阶级战争，勿发阶级议论。"听你如何消除阶级战争，听你如何不发阶级议论，而资产阶级的政党——保守党及自由党，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势力瓦解以前，除非工党政府绝对抛弃工人阶级的利益事事惟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图，他们终于不能容忍工党久握政权，这是很明显的事。汤姆斯在世界社会党人中，是一个卖阶级的老手，他这种论调，也正是想买资产阶级之欢心，以苟全他们的所谓工党政府这块招牌，只恐怕英国的工人阶级终不能这样可欺罢！

1924年5月28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七期　署名：实庵

答张君劢及梁任公

张君劢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对于适之及余之意见加以驳诘，关于适之方面，自有本人负责答复，不劳我为代庖；关于我的方面，先讨论重要的三点，次则略论其他。

第一点，张君劢说："马氏自名其主义曰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别于翁文挚之乌托邦的理想，且推定生计上之进化，遵正反合之惟物史观之原则，故资本主义之崩坏为不可逃之数。然自今日观之，以欧洲而言，资本主义之成熟，英远在俄上，顾劳农革命，何以不起于英而起于俄乎？以俄与德较，则德资本主义之成熟又在俄上，何以德之革命成绩，反居俄后乎？"怀这样疑问的人，世界上很多，不止中国张君劢一人，都是因为不明白社会科学之方法论的缘故。因果律虽是一切科学共通的原则，而各种科学之方法论却各不相同，不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即自然科学中数学和化学、动植物学都各不相同。社会上有相类的因之现象，必将有相类的果之现象；惟其果之现象之特定的时空及现象中之个体现象，则另有其因果关系，而非社会科学范围以内之事，这本是社会科学重要方法之一。譬如，一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发达起来，其社会中劳动运动必将因之发生，此一社会科学之公例，在各国简直没有例外；而其劳动运动将发生于何日何地以及运动中之领袖将为何人，此事只有请问六壬卜算大家，社会

科学无此神通。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料资本主义必由发达而崩坏，崩坏后继之者必为社会主义，此乃就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一般趋向而言；至于资本主义之崩坏与夫社会主义之现实，果在何国开始及完成，又另有其特殊的因果关系；固然，在特殊的地域内，倘有特殊的社会现象之因，亦可推见其特殊的社会现象之果（其特定的时空及个人关系，仍非社会科学之事。）然究竟和马克思所指人类历史的进化由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之一般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件事。俄国劳农革命何以先于英、德，将来英、德劳农革命后，其社会主义实现之日程，必速于今日之俄，这是因为他们资本主义发展之进程各有特殊的原因（例如俄国资本不及英、德，而集中速度则过之。），和马克思所指全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过程，是两件事。法兰西资本主义之成熟，自始至今都远不及英国，而巴黎共产团之暴动，还远在俄国劳农革命之前，马克思亲见之，原不待张君劢先生今天来驳难了。人类社会因果关系非常复杂，所以社会现象也非常复杂，因此，社会科学，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决不像张君劢先生所称引的那样简单，并且一定还不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样简单。

第二点，张君劢说："且即以俄论，私有财产之废不及二年，而已许私人买卖私人土地所有权，且大揖让外国银行与外国资本家，不知此等翻云覆雨之局，又遵科学的社会主义全书中何种公例乎？"有这种疑问的人，世界上也不只张君劢先生一人，这是因为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实质与意义的缘故。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不是玄学家，自始便未尝妄想一革命便能够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不过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指示将大企

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罢了，在现在的新经济政策之下仍是这样，并未翻云覆雨。小企业初因资产阶级的怠工自己放弃，不得不由国家经营，今因他们愿意继续营业而租给他们，也无所谓翻云覆雨。战争时军需万急，不得不禁止买卖强制征发，战后停止征发，生产力又未到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时期，自然没有禁止私人买卖的必要，这也无所谓翻云覆雨。俄国劳农革命家果曾妄想一革命便马上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便马上能够完全废绝私有财产，果如张君劢所言现在允许私人买卖是翻云覆雨，因为前此已废止私有财产已不许私人买卖，如此，试问苏俄宪法第六十五条第二三项，剥夺坐食以资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贩之选举权被选举权，岂不是赘文？在新经济政策之下，这两种人仍然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实无所谓翻云覆雨。说他翻云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实质的缘故。革命的内外战争中，势不得不采用军事共产政策（其实只是"禁止买卖强制征发"，无所谓共产。）非此无以应军事之急需，且非此无以覆敌对阶级之基础；战争停止，破坏事业告了一段落，无产阶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实行废绝私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何况半亚洲式的俄罗斯；所以此时苏俄采用的经济政策，在社会革命之经济改造的过程上，正足以证明客观上的必然性，也正足以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理想不同。说他是翻云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之意义的缘故。

第三点，张君劢说："我之清华讲演中所举九项，谓非科学所能解决，而断其起于人类之自由意志，……独秀复胪举社会学家言以相难，谓此九端之因果尽为科学家所能解释，而归结于物质

为社会变动之大因。夫大家族也，小家族也，……在一事既已过去，科学家汇集各种事实，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事之可能，何待赘言？顾我所以举此者，非曰社会学家之说明是否可能也，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何自而来也。甲以为然，乙以为否，甲曰以为是者，乙曰又以为非；其变迁之速如此，而推求所以致此者，则曰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之，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也。夫不究九端之动因，而但言科学的解释，则社会学家之关于九端之说明之文，连篇累牍，我虽浅学，岂并此而不知？夫科学之大本曰因果公例，有同因则生同果之谓也，吾人据此公例，得以推定物理上天文上种种现象，虽历久而不爽毫厘；若夫人事，但能关于已过者，于事后为之解释，此种过去之解释，能视为与物理公例有同等价值乎？殆不然矣！故独秀虽能举尽社会家言以难吾九端之列举，然吾之根本主张，仍是一丝一毫不能动摇也！何也？小家族后之家庭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公有财产后之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张先生这一篇说话，说坏点，直是遁词；说好点，他的观念，他的论点，他的文义，他使用术语，都大欠明瞭。张先生果始终承认他所说的"夫大家族也，小家族也，……在一事既已过去，科学家汇集各种事实，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其事之可能，何待赘言？"这段话不错，我们已经用不着论辩。汇集各种事实而推求其由来，而为之说明，此非科学之方法而何？此方法倘有应用于说明及推求社会现象所由来之可能，则社会现象亦必为因果律所支配，尚何待赘言，社会科学亦得成为科学，又何待赘言？社会现象若不为因果律所支配，虽事后亦无法推求其现象所由来；若既为因果律所支配，则可据今果以推求前因，亦可据今因以推求后果；惟张先生如欲超越吾人犹

未及闻见之今因，凭空推算千百年后之果，虽历久而不爽毫厘，此事大类神秘的《推背图》、《烧饼歌》，不独人事的社会科学所不许，亦物质的自然科学所难能。例如天文学无论如何进步，亦不能于气压之动象未现以前，预示数十百年或数年内某地某时风雨寒热之定象，虽历久而不爽毫厘。资本制度发达，宗法制度破坏，其结果小家族制度自然发生；共产制度实现，私产制度破坏，其结果家族制度将简之又简而至于无；生产力大发展，分工制度大发展，生产方法及生产工具都日趋于集合而不可分离，其结果财产制度亦必日趋公有；此等都可据今因以推求后果，过此以往，欲求知千年万年后的社会制度如何，只待富于神秘性的玄学大家重造新推背图，社会科学家惟有甘拜下风！前所辩论之九项中，一部分明明是推求社会现象变迁之动因及人类态度随此变迁而变迁之动因，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皆是；一部分明明是推求人类之人生观所以不同的动因，如第五、第七、第八皆是。乃张先生一则曰"不究九端之动因"，再则曰"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我真不懂他所谓"动因"，在术语上到底是何意义？而且张先生所指九项，究竟是说社会现象还是说个人态度，其观念及论点实在太不明了。在他"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何自而来也，甲以为然，乙以为否，甲日以为是者，乙日又以为非。"这几句话看起来，明明是指个人态度即个人的主观，不是指社会现象，他对于我解释的社会现象之动因，似乎已经承认，他所以说："此事之可能何待赘言"，又说："社会学家关于九端之说明之文，连篇累牍，我虽浅学，岂并此而不知？"（张先生倘不抛弃玄学家以个人自由意志为社会变迁之根本动因的谬见，无论他如何博学，对于我关于九端

之说明，其实未曾知，且恐终身亦未必知；然而他竟自欺的说，“岂并此而不知？”他若再将我说明九端之文细心看一下，他必然自悔发言轻率。他倘不自悔发言轻率，便真是知道我关于九端说明之可能，也便真是知道社会变动及人生观变动之唯物的说明之可能了。）然而同时又说：“独秀虽尽举社会家言以难吾九端之列举，然吾之根本主张，仍是一丝一毫不能动摇也，何也？小家族后之家庭制度如何，谁知之乎？公有财产后之制度如何，谁知之乎？”似此，他又是指社会现象而非指个人态度，其论点不明如此！吾再简单的正告张先生：社会现象变迁之动因及大多数个人对此变迁之态度即社会心理，推求其最初原因都是物质的，而为因果律所支配，因此，社会科学家才有加以物质的因果的说明之可能（幼稚的社会科学家所说明的因果是否和社会现象之实际因果一一符合，这是另一问题。），至于个人对于各项问题之态度之变迁，其异时而态度不同者（即甲日以为是，乙日又以为非），则仍是明显的社会心理或隐伏的社会实质变迁之结果；其同时而态度不同者（即甲以为然，乙以为否。），则因社会之新旧变迁终属相续而相错，没有截然的突变，于是个人不同的历史和环境遂造成个人不同的态度，即不同的人生观；这些个人态度即人生观之变迁与异同，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是个人自由意志之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个人意志之活动，诚然是事实，而非绝对自由，因为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律并心理现象的因果律支配，而非支配因果律者。

以上三点之外，还有数事须请教于张先生：

（1）讨论真理，当以符合实际与否为标准，不当以其说新旧为标准；张先生说我生当今日而犹守马氏之言若圣经

贤传，然而张先生自己却连篇累牍的称引穆勒约翰与詹姆士（我生平论著绝不似张先生动辄称引古人）；不知穆勒约翰以后唯物派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詹姆士以后测验的心理学均大有进步，何以张先生犹守穆勒约翰、詹姆士之言若圣经贤传？

（2）张先生说："生当今日，而犹守马氏之言若圣经贤传如陈独秀者，岂为求真哉？亦曰政治之手段耳！墨司哥之训令耳！"吾当正告张先生：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墨司哥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若张先生鼓吹玄学反对马克思学说，是否求真，是否政治手段，是否直接的受研究系之训令间接的受北洋政府之训令，像这类逾越讨论道理之轨道以外的话，我在此处不屑多说！

（3）张先生所谓生当今日不应犹守马氏之言的理由，乃是"谚不云乎，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张先生（不但张先生，自来唯心论者）在社会动象中，只看见思想演成事实这后一段过程，而忘记了造成思想背景的事实这前一段过程，这本是各派唯心论之共同的中心的错误。他们只看见社会上一种新制度改革之前，都有一种新思想为之前驱，因此便短视的断定思想为事实之母；他们不看见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他所以发生的背景，决非无因而生。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些事实底儿孙，如何倒果为因，说思想是事实之母？笛卡儿说："我思，因

此，我存在。"我说："我存在，因此，我能思。"我并且说："我不存在时，因此，我不能思；而宇宙间一切物仍存在。"敢告一切唯心论者，倘不能论破我这辩证的方式，别的千言万语都是支遁之词。

（4）张先生在此序文中，分"物质科学"、"个人心理"及"社会生活"为三类，在此三者中，只承认物质科学是真正科学；并力言社会生活之超科学较个人心理为尤甚，其论点视前文明晰，不犯笼统混淆之弊，这或者是他的思想更成熟之故。但张先生要知道：这是因为个人心理现象比物质现象复杂，社会现象比心理现象更复杂，所以我们人类对于这些现象因果之认识便有比较的精粗迟速之不同，并不是宇宙间诸现象中，一部分是有规律秩序的，一部分是乱杂无章毫没有规律秩序的。宇宙万象之有规律秩序是一件事，我们人类的知识已否认识这规律秩序又是一件事，不能拿我们主观上犹未能完全认识某一部分之规律秩序，遂断定客观上某一部本来没有规律秩序。现在不必谈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单就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来说，斯密亚丹以来，果如张先生所谓"绝无一条真正公例"吗？此时物质科学之公例视社会科学之公例多而且正确，也不过是比较之词，其实物质科学之公例仍不敷应用于一切物质现象而包括无遗及其已成的公例又时复动摇，这都是彰明的事实，张先生岂能因此更主张物质现象也不为因果律所支配，并对于物质科学也要否认吗？我想生在今日的张君劢必不至如此。但是在五百年前，物质科学即张君劢今日所承认之真正科学，那时他的公例又有几条呢？那时人们否认物质科学，否认物质现象为因

果律所支配，比现在的人们否认社会科学，否认社会现象为因果律所支配，岂不更为凶猛？

（5）张先生说："所以以人生观与科学对举者，谓科学有一定之公例者也，人生观则可以人类意志左右其间，而且在创造之中者也。"张先生又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却是他又说："事实如此，……十九世纪以来，欲进人事于科学之迷梦，今可以觉醒矣。"张先生这段文章未免太逞笔锋，忘其所以了！原来张先生所说以人类意志左右其间而且在创造的人生观，不受科学因果律所支配的人生观，仍然要跟着事实走！原来事实仍然是思想之母！原来思想仍然没有超越事实的可能，超越事实的想头乃是迷梦！原来张先生也重视事实，竟不相信人类思想意志可以自由创造！

* * *

梁任公在非"唯"文中（见二十期《教育与人生》，对于我们也有两个误会，这两个误会原来是各国学者对于马克思派普遍的误会，在欧洲在日本都有不约而同的误会，梁任公误会我们，也和他们完全是一样的轮调。

第一个误会是他说我们是"机械的人生观"。这大概是因为他不甚注意近代唯物论有二派的缘故：一派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一派是历史的唯物论；机械的人生观属于前一派，而后一派无此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为人是物质造成的，历史是人造成的，如何说他是机械的人生观？我曾有《列宁之死》一短文载在第十六期《中国青年》，也是说到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兹摘录于下：

唯心派素来把历史变动之唯一原动力归到个人意志之

伟大，因此将俄罗斯革命事业，无论功罪是非，都当作列宁个人的事业；因此，列宁死了，他们便以为俄罗斯革命将随之寿终（即苏俄瓦解之意）。他们不明白俄罗斯革命有历史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俄罗斯有农工大群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为之拥护；他们不明白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他们不明白苏俄之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地位，已有不随列宁之死而动摇的程度；所以这派人的想像，是和事实不符的。

然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许多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人们的意志，是人们物质生活关系造成的；人们的历史，是人们贪欲无厌的意志造成的；这便是我们所相信之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之点。列宁生前在革命中的成绩，是我们所知道的；他死后，在新俄建设及世界革命中的损失，也是我们所应该承认的。人造的历史和机械的影戏不同，我们决不可陷于机械的唯物论之误解，说列宁之生死存殁都和俄罗斯革命事业绝无影响。

梁任公第二个误会是他说："唯物史观的人们啊！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啊！若使你们所说是真理，那么我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遗传的八字'，'环境的流年'，早已经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这个误会也是因为他把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看做一样。张君劢先生也说："假如其言，社会进化为生计条件所支配，而无假于人力之推助，则

马克思之宣传与颠沛流离，岂不等于庸人自扰？”胡适之先生也曾以同样的理论质问我；最有趣是张君劢也以同样的理论质问适之。历史的唯物论不否认个人之努力及其和宿命论不同，本是唯物史观中一部分重要的理论，Boudin 的马克思学说之体系附录二中论此颇详，怀疑者觅此一读便自明瞭。兹再录我答适之的话以答梁任公与张君劢：

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我们不妄想造一条铁路通月宫，但我们却不妨努力造一条铁路到新疆；我们不妄想学秦皇、汉武长生不老，但我们却不妨努力卫生以延长相当的寿命与健康的身体。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

此外，对于梁先生非“唯”的意见，我也要附说几句：

原来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及人生观，向分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两派（我不承认二元论能够成立），唯物唯心是沿用翻译佛典之名词，在西文里原没有什么“唯”字；但物质论者是说世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亦为物质所生；精神论者是说世间一切都是精神，物质亦为精神所生；二者结论虽正相反对，其均为一元论则同，一元便与“唯”无别。

互相联系的森罗万象，本来是一气呵成的整个世界，其根本或云都是物质，或云都是精神，却不能说是分途并进各别为一世界如二元论者之所想像。因此，二元论之归结，恒为客观的唯心论，即使他本不欲“唯”，而事实上令他终不得不“唯”；犹之唯心

论者终必采纳宗教神灵之说，因为在有人类意识以前，单纯的物质世界久已存在，若不抬出神来，精神一元论的招牌便须自己取下。

二元论终不能成立也如此，无论物质或精神，世界终属一元，一元就是“唯”，不是哲学者为分门户，主观的故欲其“唯”，乃是探讨万象穷源尽委，客观的说明此现象时不得不“唯”。梁先生所信分明是二元论，二元论本无可“唯”；自己无可“唯”便责骂他人“唯”，自己主张二元便责骂他人主张一元（“唯”就是一元，唯物论就是物质一元论），便下哀的美敦书来宣战，这是何等“学术界专制帝王的口吻”！

客观的说明宇宙现象之“唯”，和李斯、董仲舒对于人为的学说定一尊绝异端迥不相类，乃梁先生竟并为一谈，这是何等浮光掠影的望文生义！浮光掠影的望文生义而不能深入骨髓解析其内容，或者正是梁先生一生治学之受病处；梁先生果真欲在学术界指导青年，须先于自己受病处深加猛省！我知道梁先生不是饰非文过的懦夫，故敢进直言。

五月二十五日

1924年8月4日《新青年》（季刊）①第三期　署名：陈独秀

---

① 《新青年》（季刊）是继《新青年》月刊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主编。名为季刊，实际从一九二二年六月创刊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休刊，前后仅出四期。

杨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

据近日上海各报电传，五月十三日在汉口被捕之国民党党员工人杨德甫、周天元、罗海澄、黄志章、许白昊五人及律师刘芬，确于五月二十六日由汉口解赴洛阳，二十七晨，由吴佩孚亲自审问数语，即将杨等五个工人绑出枪毙，惟刘芬因湖北省议会电保，尚在押候讯。

他们被捕被杀的罪名，据《申报》五月二十九日汉口通信说："军署系先得沪探密电，谓杨受粤孙密令，纠集党徒回鄂，图结工人起事，故军署饰令稽查处逮捕，而工党之狱遂起。"又据萧耀南所给湖北教育厅密令说"案准府军事处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派遣党徒，分往内地。"

原来杨德甫等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湖北实行共产主义而被杀，世界奇案冤案，莫奇过于此冤过于此了！

（第一），孙中山并未在他政权所及之地鼓吹共产主义，何以能够派人到湖北实行共产主义？（第二），杨等五人加入了国民党和在汉口党部担任职员，这都是事实；然周、罗、黄、许四人并未到过广东见过中山，杨德甫去年虽见过中山，新近个人由上海回汉口，那里有什么受密令纠集党徒之事；而且中山先生即有密令图鄂，怎会给关系很浅的党员杨德甫！（第三），爽直的工人们，他们加入了国民党，向人直言不讳，杨德甫素好大言，又不择交，声

称受命来鄂，因此召祸，这都是意中的事；然而说他是过激党回鄂想行共产主义，则未免太冤了，因为杨德甫、周天元在上海在湖北都曾极力反对过激党反对共产主义。

极力反对过激党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竟以过激共产运动之罪名而被杀，世界上奇案冤案岂有过于此者！

可是军阀官僚们所视为过激之内容和我们大两样，例如马联甲所谓教育已经过激，平民教育更是过激，则全国教育界都是过激党，何况工人杨德甫！更何况革命老祖孙中山！

军阀官僚们眼中心中的孙中山国民党，始终抱定三民主义努力革命，实在"过"于"激"烈，实在是北洋旧势力唯一的敌人；国民党改组后，他们更忍无可忍，所以一面增加兵力压迫川、湘、闽、粤，一面在北京、汉口大捕党人。

营私无法乱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们，他们这种行为本不足责，我们所希望的是有良心有判断力的国民，能在这些具体的事实上分出是非向背，然后国事才有可为。

1924年6月4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问题

停顿日久之中俄协定，忽于五月三十一日正式签字，其中有无特因，我们不必推敲，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今后蒙古问题。

在中俄国交上论起来，俄国撤退驻蒙兵，承认蒙古是中国之领土，都是应该的；但在数年来努力建设的外蒙自治政府而论，便有问题了。第一不幸是中国犹在极横暴不法的军阀统治之下，决不会有丝毫尊重蒙民自治的观念，他们如果实行派兵收蒙，所派的兵无论是直方或是奉方，都一定要重演参战军焚杀淫掠故事，可怜素受中国军队凌虐的库伦市民，才平安了数年，现在又要重逢浩劫，这是何等不幸！第二不幸是蒙古民族中还有与平民对抗的旧势力王公喇嘛等特权阶级存在，这些守旧的特权阶级，本来愤恨新得政权的平民新党，本来天天在那里做中国军阀扶助他们复辟的梦，现在他们的梦却真有实现的希望，这件事不但是蒙古现代政治进化史上一大关键，并且是蒙古现代文化史上一大关键。

在中俄协定签字之后，蒙古民族中新起的平民阶级，如何能够继续支持他们数年来新的政治新的文化之建设，而不为王公喇嘛等和中国军阀相勾结的旧势力所倾覆，中国及俄国有理想的平民，对于这件事似乎都不能对岸观火！

1924年6月4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外人对于商标之无理要求

据本月二日《申报》北京电：荷使新照会，对商标要求，(一)商标公报应用英文；(二)商标局应聘外人为顾问；(三)反对第十条更换代理人之规定；(四)反对六个月期限。农商部决采纳前两条，驳覆后两条。

此消息若确，北京的农商部真是昏瞶极了！他所驳覆的后两条，第三条不过防杜流弊，第四条更无关重要，到是第一二条关系重大，他反而采纳了。商标公报用英文，不但于一般华商不便，而且中国还不是英国的属地，为什么政府所刊发的公报定要用英文？无论公私何种机关，若自动的聘用外人办事，本是很寻常的事，若以外交的拘束必须聘用外人，便于国家用人行政的主权有碍。在此互市时代，无论何项行政机关，绝对没有关系外人事务的很少；因有外人事务的关系，便须聘用外人，中国还成何国家！

海关必须聘用外人，税务处、盐务署、稽核所都必须聘用外人，铁路也必须聘用外人，司法方面更加有会审公堂和使领裁判，现在商标局又须聘用外人，从此扩充起来，将来因有外人设立的学校之故，教育部也须聘用外人，外交部更是不用说，再扩充到海陆军部及各省军民长官署，那时候中国更加体面了！

1924年6月4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

陈嘉庚出资兴学，一时颇博得社会称赞，其实他完全是个市侩，不知教育为何物，不但把学生当奴隶，连职教员也都是他的雇用人，精卫、杜威先生都曾说这校将来必糟；后来他又雇了一位孔教国学大家（其实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华侨）林文庆当校长（陈嘉庚向来自称校主），自然更大糟而特糟。

虽然如此糟，而学生从无动静，我们时常叹惜这些青年真真麻醉死了；岂知不然，今日竟能醒觉起来，驱逐校长林文庆。

起事之远因，不用说是这位校长林大孔教徒闹的笑话太多，其近因，乃五月廿六日林文庆挟嫌辞退未满约期之主任数人，学生抗争无效，风潮遂起。三十日全体学生罢课，电新加坡陈嘉庚撤换校长，三十一日在教育会招待各界，宣布林文庆罪状。林文庆请求军警捕拿学生，学生推代表向海军及警厅说明罢课原因，请勿干涉。林计不售，又于本月一日使建筑部主任陈延廷、教员林幽率土木工人及流氓四百余人，围打学生，学生会主席罗士清，纠察主任林作桢，预科代表雷荣模，均受重伤，海军到场弹压始止。地检厅将殴伤学生之陈延廷、林幽拘收县监，各界多主调停，惟陈嘉庚覆电仍信任林校长，则实无调停之余地，将来该校能否扫除林毒，能否有改善希望，全视学生们能否奋斗到底。

林文庆不但盲目的拥护旧思想，而且在南洋谄媚外人压制

同胞，这种人当校长，不单是厦大学生的不幸，实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

1924年6月4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以伪乱真

贼人也大呼捉贼，因此竟逃过追贼者之眼而遁去。日本人想冒充中国货，于是在劣货上大书“毋忘国耻”四字。有一班穿长衫的人，想混进工人队里去利用工人，于是也大呼逐出穿长衫的，工人事由工人自己干。以伪乱真，天下事真是无独而有偶！

诗人却不爱谈诗

太戈尔初到中国，人家都称他是诗圣或诗哲，他自己最后演说也说：“各国之有名哲学家、政治家、社会家，均到过中国演讲，供献甚多，余乃区区之诗人，如何能应诸君之要求？”太戈尔果以诗人身份来中国谈诗，我们虽不会做诗，也决不反对欢迎一个诗人，尤其不反对欢迎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诗人。所以吴稚晖先生说得好：太先生你做诗罢，管不了人家的家国，你莫谈天下事！可是太戈尔在中国始终未谈过一次诗。

太戈尔与金钱主义

我们不佩服太戈尔，明明白白是因为他反对科学与物质文明，此事任何人都应该知道。然太戈尔却妙想天开的说："今有人反对余，或系恐惧余反对一般金钱主义之人。"难道科学与物质文明就是金钱主义吗？太戈尔在北京未久竟染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异己！难怪北京有人说他，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而且太戈尔他自己如果反对金钱主义，便应将他所受物质文明社会的造孽钱——诺贝尔赏金，散给无衣无食的印度人。

1924年6月4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实庵

大同主义与弱小民族

大同主义，世界和平，废战，博爱，人类的努力本应该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们能够开步向此路走，能够除去横梗此路之障碍物，乃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倘无此等方法，只空喊这几个名词，在强大民族口中喊出，虽未必有益而却无损；在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则是何等昏聩无耻的话！是何等可怕的麻醉药、催眠剂！

亚洲民族联合与亚洲平民联合

日本人因为美国通过了限制移民案，转过头来鼓吹什么亚

洲民族大联合，还要组织什么亚洲联合会。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们最得意的压迫中国、印度人之日英同盟，你们忘记了没有？你们在中国关于廿一条强占旅大以及在汉口、长沙等暴行，你们有了觉悟没有？你们惨无人道的对待朝鲜人，你们觉悟了没有？我今正告日本人：我们的主张是"日本、中国军阀政府及一切特权阶级除外之被压迫的亚洲平民大联合，不是整个的亚洲民族大联合"。

1924年6月4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　署名：独秀

德国对华赔款问题

此时中外喧传的德发债票问题，其实不单是德发债票问题，我们应注意到全部德国对华赔款问题。

德国对华赔款，原来是二万三千三百万元，中国允以战前所欠德国债票作抵一部分。计中国所欠德债，计五厘借款，四厘半借款，津浦借款及续借款，湖广路借款，善后借款，六项共计二千八百五十四万镑，略与对华赔款相等。惟此项债票，已于欧战前后多半转入他国商民之手，曾由中国宣布作废，可抵赔款者，面额只有一千零三十九万八千七百九十五镑，其余德国应另付中国的现款，当在一万万元以上；再除去扣付战前所欠德商借款及战时没收德产，亦不过五千七百万元，其余五千万元何以竟无着落？

至于收回抵作赔款之一千余万镑债票，除去用作偿还战时德侨在华损失臣五千万元，净余债票面额约尚有四五千万元；此理应销毁之四五千万元债票，为什么必须折成一千五百万元交德华银行经理？将来这二三千万元的损失归何人担负？

北京政府对于这一切都不顾，一心只顾德发债票案速签定好提用前存伦敦拟付德债之款。此案并不交所谓国会通过，已于本月六日在德使馆秘密换文；换文之后，北京军阀们便可取回伦敦存款九百万元，全数用作军费。

对德战争中，中国人民尤其是赴法的华工，受了不少损失，所得赔款名为二万万元以上的巨额，东折西扣，一无所有，实际上只收回伦敦存款九百万元，供给军阀挥霍，北京军阀官僚们营私误国的黑幕重重，即此德国赔款一端，已令国民不能容忍。

1924年6月11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九期　署名：独秀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

由无政府主义到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或者有人说是退了一步，然在实际进行上，实在是进了一步。所以有些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反抗黑暗势力之联合战线上，应该是我们最亲近的好友；在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之联合战线上，更是我们最得力的同盟军；因为工团主义者了解阶级利益调和之不可能，不似伪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派采纳劳资妥协政策。

惟工团主义尤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之根本理论，我们非是不肯赞成，真是不忍赞成。他们的根本理论有二：

只做经济争斗，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及政治组织。

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反对一切政党。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尤其是今日经济组织复杂的社会，想把经济、政治两下绝对的分开，已经不容易，每个经济争斗剧烈起来，都会变成政治争斗；因为工人们经济争斗的对方，资产阶级及资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所以要占有政权，正为拥护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制度，不服此等制度的人便是叛徒，便要受他们政权所表现的法律之制裁。工人应该是社会之支配者，如何放弃政治不问；如何不要政权管理政治；如何将社会上最重要的机关——政治组织让给资产阶级永远专有，使他们永远支配社会支配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永远在他们政权支配之下只做

经济争斗！

既然要问政治管理政治，便不能不要政党，这更是很明白的事。况且同一工人阶级里的各分子，他们的阶级意识及革命之决心不能一致，这便是不能拿整个独立自治的工人团体来代替工人政党之唯一的理由。

以上是理论，以下再就事实说。

大战后，欧洲资产阶级濒于破产，一时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俄国工人都卷入革命的漩涡，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即支配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战慄危惧，他们自救的方法是：(一)用武力、宣传、封锁等破坏俄罗斯工人革命事业；(二)组织欺骗工人的国际劳工局，吹出几个改良政策来和缓工人阶级的革命风潮；(三)造谣诬蔑革命的工人政党——国际共产党，说他们利用工人支配工人，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指导者；(四)在各种工会中实行分裂政策，排斥革命分子尤其是共产派的工人，使工人大的团结分裂为几派。这四个方法同时并行，一九一七年以来的工人革命怒潮居然遏住了；各资本帝国主义的黑暗势力，遂因此得以保持并且复兴起来。这次黑暗势力之保持与复兴，以背叛阶级的第二国际及亚姆斯德丹之黄色职工国际为最有力的工具。他们帮着各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去实行上述四个方法；去帮着宣传劳农俄罗斯的罪恶；去出力讴歌国际劳工局；去造谣诬蔑共产国际，更是他们最得意的技能；去实行驱逐共产派分裂工会，乃是亚姆斯德丹派公开的政策。这班背叛阶级的改良派如此这般的做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足怪，最奇怪的是无政府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于是时大鼓吹其“反对一切政治”，“反对一切政党”，“反对一切国家与政府”，“反对共产党在工会中活动”；大鼓吹其

什么"独立主义"，就是主张纯粹的职工联合会向共产党宣告独立，换句话说，就是工会和共产党不发生关系。照他们的主张，总括起来，是要使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脱离关系，是要使工会和政党脱离关系。他们虽说是反对改良派，而实际上这种行动，却是和改良派取了同样的步调；因此，实际上也和改良派一样帮助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遏住了工人革命的怒潮，让黑暗势力得以安然保持与复兴。工人脱离了政治运动并且脱离了革命的政党，又在高呼独立自治之下，在高呼不要支配不要首领之下，分裂又分裂，自己消灭自己集中的战斗力，那里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能。无政府派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欧洲引导工人向这样错误的道路上走，实在是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所快意的事，而是我们所痛心的事！

再讲到中国，小农及手工业的社会，本来对于政治及政党不甚关心，这是中国进步迟缓的现象，决不可说是好现象，军阀政治正是根据这个现象而发生而续价①存在的。主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此时一定很受人欢迎；然而这种主张越受欢迎，越是中国人的灾难。无政府派在中国鼓吹不问政治不要政党，也和太戈尔在中国反对科学反对物质文明一样，都是拿催眠药给瞌睡虫吃。

况且军阀政府最不愿人民干政，尤其不许工人干政，更不许工人和政党发生关系。最近萧耀南通令汉口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在工人中宣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到正合军阀的口胃，因为他们怕的是工人要问政治加入政党。军阀们不但不要工人干政和加入政党，并且设法

① 原文如此。

截断工人阶级和知识者的关系，例如：今年日本政府允许工人"五一"游行，但以非工人的社会党不加入为条件；中国的军阀官僚们屡次向铁路工人劝戒"勿为学生政党利用"。这是什么意义呢？原来知识这件东西，是人类社会进化之发酵母，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因为失去了经济的权利，便也失去了知识的权利；所以无论何国劳动运动之初期，都少不了知识者之奔走鼓吹和扶助，我们敢说这是没有例外的。军阀们有意或无意窥破这个关键，所以极力破坏工人和知识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但在工人中宣传"勿为人利用"的口号，并且在每次工潮中特别注意和严惩参加运动的知识者，例如：上海因邮差罢工而监禁李启汉，长沙因纱厂工潮而杀黄庞，汉口因铁路罢工而枪毙施洋，这便是他们知道而且实行消灭工人革命之发酵母。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鼓吹工人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并且鼓吹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工人的事由工人自己干，反对一切知识者参加扶助；这简直和军阀是一样声口，这简直是阻止工人参加革命运动，这简直是帮着军阀宣传，这简直是无形中延长黑暗势力的生命。

在工人心理幼稚的中国，不但对于政治组织（政党）和政治争斗不敢出头做，有许多便是对于经济组织（工会）和经济争斗还有点怕。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劳动运动的人，不事急进，不作高论，暂时专力工会运动和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以养成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的力量，这样的方法，我们是不能反对的；若从根本上主张工人永远不问政治不要政党，说好点，这种主张是幼稚的左倾；说坏点，便是避去革命的行动，免得和现政治冲突。

中国工人所受军阀政治的苦痛，别的且不说，黄庞的血，"二

七”京汉工人的血还未干，洛阳工人血又在我们眼面前流着，我们怎忍心不去革命，怎忍心不去和现政治冲突！

有人说工人即得政权也不能解决劳动问题，并引俄国劳农革命为证。我们固然不能造谣瞒说俄国劳动者已经一步登天了，而且因全社会生产力向来幼稚之故，俄国工人物质的生活当然不及英美的工人贵族(一部分技术工)，比起其余任何国工人却只好不坏；至于实行八时制及其他教育、游艺等精神上的愉快与夫政治上的自由，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若依据资本帝国主义的英日路透、东方等通信社反俄的宣传，便真相信俄国工人还在失业困苦之中，那便是太无常识了。

以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肯相信劳农革命的俄罗斯，而却肯相信资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这是万分不应该的事呵！

我们以极诚恳的情绪来劝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志们，你们的言论行动都应该加意考虑，万勿只顾攻击我们客观上正帮助了黑暗势力而自己还不觉察！你们口头上攻击我们，说我们革命不彻底，你们应该要比我们更彻底些更高明些，然而事实上你们在欧洲取了和改良派同样的步调，在中国更老实和一向反对革命的研究系合作起来，你们果何以自解？

1924年6月11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国民革命与反革命的财阀

国民革命，自然带着资产阶级的革命之性质；在此时代中，自然需要资产阶级有点力量，更需要资产阶级有些革命分子。但若现在香港、广州的商人，若现在京、沪间的银行家，只都是反革命的财阀，不能算是资产阶级。因为香港、广州商人心目中所崇拜的只有香港、北京两政府；京、沪间的银行家更是勾结军阀官僚，专做剥国病民的财政投机事业；他们种种反革命的行为，不但是国民革命的障碍，而且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达的障碍，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附属品，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

1924年6月11日《向导》周报第六十九期　署名：独秀

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

自本月十五日起至今日止，上海各丝厂女工罢工已有十天了，罢工的丝厂已由两家扩大到十四家了，罢工的人数已增加到一万多了；在近来，不但是上海劳动界一大事件，并且是全中国劳动界一大事件。

此次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厂主一面公同议决每日工资至多四角二分，比去年减少三分；一面还要增加做工时间。工人方面以为既要增加时间，就不说加薪，至少也要恢复去年四角五分的工资；厂主方面坚执不允，遂至酝酿罢工风潮。其初十二日，天宝路天昌丝厂工人即有发动之意，经厂主报告警署，派队弹压乃已。至十五日，胡家木桥云成丝厂工人首先罢工，经警捕劝谕无效，狄思威路同丰永丝厂工人亦继起。十六日加入罢工者，又有梧州路之裕经、统益、元丰、长源、福华，七浦路之永泰及天宝路之天昌等七个丝厂的工人。随后加入者又有分水庙之物华厂，斐伦路之瑞纶厂等数家工人。警区在同丰永厂附近捕去女工九人，后释放七人。为首之曾胡氏及黄陆氏尚押在警厅；而罢工风潮不但不因此静止，尚有日见扩大之势。

现在女工们的口号是：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的姊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

我们平心讨论此次罢工女工之要求，是否正当：第一，在工资方面说，上海各丝厂女工工资最底额每日一角，最高额每日四角，其余二角、三角、三角半不等；向例新茧上市时，每日工资多的加到四角五分，少的也有一角五分，此外每星期每人赏工半个，每月赏工四个，现在都一律取消了。厂主减薪的理由，是说去年丝价每百斤售银一千七八百两，所以工资加到四角半；今年丝价每百斤只有九百两，所以只定四角二分。这个理由实在似是而非。丝茧总公所开会时，王拗卿君说："现在新茧三担才烘干茧一担，干茧七担才制丝一担，成本需千元。"成本一千元，卖价九百两，还是赚钱。所以《新闻报》记者羲农君说得好："丝市不振，固系实情，生活增高，亦为事实，欲求两全，殊无善法；惟工人方面关于生活问题，丝厂方面仅属于利益之厚薄。"第二，在工作时间方面说，厂主们要想更多赚钱，只有设法和外丝竞争市场，若要穷苦的女工多做点工，拿他们的血汗，来弥补你们的损失，漫说丧良心而且也有限呵！况且照部颁工厂通则及省长通令，每日工作不得过九小时；而上海各丝厂都是自晨五时起，到晚六时止；其间除去午膳一小时，实际做工也还有十二小时，现在又要延长时间到晚七时止；上海物价日见其高，女工们所得工资已经不够生活，凭空又要延长做工时间，他们怎能不聚众反抗！

因此，我们承认此次女工罢工所要求的都很正当；我们希望一般社会，尤其是主张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的国民党，对于这些穷苦无告女工们，公开的出来加以援助。

1924年6月18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一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

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中，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对此最重大的意义，实有了解的必要。可是现在尤其是将来实际动作时，都会竟不了解而陷于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必得详细解释一下。

第一，就国民党的主义上讲：此时任何政党党纲，都论列到社会的经济政策，可是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前造端时即注意到民生问题，这是受了德、法两国劳动运动的影响，而后进的中国国民党遂有此特色——和民族、民权并列的民生主义。什么是民生主义？简单说，就是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生"计问题，不是说解决全民生计问题；因为全民中富有的部分，当然不劳国民党锦上添花为他们来主张民生主义，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乃为着劳动平民雪中送炭，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的生计，国民政府之经济政策及农工立法，尚在将来，眼前急需的经济组织（工会、农会）及日常生活之改善，乃解决劳动平民生计之最小限度，国民党对于此类最小限度的劳动运动若不实行援助，则民生主义的理论及保护农工利益之党纲条文，便都是不兑现的支票。各种主义的党派，对于劳动运动之性质与内容及劳资间的关系，虽不同途，而于最小限度之经济组织及日常生活改善，则殊无二致。若并此最小限度而否认之，则已无劳动运动之可言，这是军

阀阶级的主张，提倡民生主义的国民党当然不能如此。若恐怕参加此等最小限度之实际运动有赤化的嫌疑，这便和军阀官僚们把一切工会运动及罢工都当做社会主义或过激运动是同样的无常识了！

第二，就国民党的组织分子上讲：有人以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若出力援助劳动阶级，岂不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合作的同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错，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正为他是合作的党，便不能只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应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应该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必如此，才有各阶级合作之可能。国民党若恐怕援助劳动阶级，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资产阶级之同情；但是不援助劳动阶级，不怕违背劳动阶级的利益，失了劳动阶级之同情吗？国民党若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利益，若只珍重资产阶级之同情，那便是一个单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不是什么各阶级合作的党了。要他合作，却不顾及他的利益，现代的劳动阶级未必还是这样可以愚弄的罢！国民党既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应该的；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有拥护之道，就是应该站在民族及民权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站在"反民生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详言之即是：破坏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一是外人制我工商业死命的协定关税和外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第二是军阀官僚之战争及厘金等苛税阻碍工商业。因此，国民党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惟有厉行民族主义反抗掠夺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者，和厉行民权主义反抗紊乱中国政治及财政的官僚军阀；若不努力于此等奋斗，转向穷苦的劳动平民，要他们多做点工少拿点钱，以弥补资产阶级被外人及军阀

官僚所掠夺的利益，此种"杀穷人起家"的办法，不但不合天理人情，而且在此半殖民地状况的中国，即尽杀穷人也不能起家，因为劳动平民无论如何牺牲，比起资产阶级所受外人之掠夺及军阀之损害，不过九牛之一毛。因此，我敢说：国民党若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简直没有理由；何况他是各阶级合作的党，不是单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更不是和绅士们相依为命的陈炯明。我曾在《国民党与资产阶级》一文中，说明国民党的革命是于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益的，劝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国民党，因此有班朋友们指责我，说我轻蔑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其实我在那篇文中并未如此说，因为我始终希望中国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此时他的组织分子上也实际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这班朋友们不愿意人轻蔑国民党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很对的；可是若同时恐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倒现出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来，这却不对了。我们现在所用"各阶级合作"这个名词，应该要知道这名词有两个重要的解释：(一)是各阶级合作，不是各阶级合并，因为阶级是不能合并的；(二)是国民革命之政治的合作，不是劳资妥协之经济的合作，因劳资两阶级在经济上没有能够合作之共同点。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若不将这两个合作之意义解释清楚，在实际工作上必发生无穷的纠纷与困难。

第三，就国民党革命的战斗力上讲：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在埃及、印度、爪哇、飞律宾等国民革命运动中，劳资两阶级对于革命的态

度，更是眼前的明证。中国又何独不然！由工人农民群众，而商联会与学生会，而总商会与教育会，这三层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总商会所代表的，又应该分资本家和财阀两派，中国此时财阀的力量更大过资本家，若新旧交通系，若京、沪银行业者，若香港、广州的富商，都属于财阀派；他们是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军阀官僚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们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国民党，固然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而也应该看清财阀、资本家、小有产者（学生、小商、小农、小工业家等）、工人农民这四个阶级当中，那个阶级能够供给他更多的革命战斗力。国民党若是看轻了工人农民；若是恐怕参加劳动运动得罪了财阀和资本家；若是觉得财阀和资本家不但比起劳动者是绅士，而且比小有产者更有力量；若是相信财阀和资本家能帮助国民党成功，一味交欢他们，因此便不敢和劳动阶级接近；如此，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力必然要衰弱下去，革命的色彩也必然要淡薄下去。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党，不用说，他的党纲，他的行动，都应该努力于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对内对外的战斗；但同时，万不可忘了更有革命战斗力的是更向下层的阶级，尤其是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更万不可牺牲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来维持资产阶级之利益；因为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运动，中国之国民之解放运动，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总观察上，在估量国民革命运动全战斗力上，都知道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不应该为任何次重大的意义而牺牲他。

1924年6月18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一期　署名：独秀

智利领判权与中国主权

帝国主义的列强蔑视中国的主权，要算最近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是最露骨的表示了。

据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说："本埠智利领事是否有权过问本国人民之诉讼事件，北京来讯，外交团未与臂助云云。兹据上海消息，领事团已议定，将有关智利国人民之事交由智利领事署办理，不以中政府所称该国无治外法权为意。"又二十四日《文汇报》说："本埠领事团议定智利国应享治外法权，闻已通知会审公堂。"

领事裁判权本是列强加于弱小民族最大的侮辱，此时我国民正在要取消他；况且列强所视为神圣的华府会议也曾议决取消；况且德国、俄国都已先后实行取消；况且中智条约并未许他有领判权；而上海领事团居然硬出头代替中国政府允许智利国应享此权，这是何等露骨的否认中国犹有主权！

中国政府所应许交还的俄使馆，北京使团硬不许交还；中国政府未应许的智利领判权，上海领团硬要他享有此权；照此下去，中国的外交，到底还是中国政府作主，还是外国使领团作主呢？

外交部给江苏特派交涉员的训令说得好："查中智条约，既无领事裁判权之规定，此次智利派驻上海领事，本部发给证书

时，亦经郑重声明，且此事系中智两国问题，第三者更无代为决定之权利。”

向来不说理的北京公使团尚知理曲不与臂助，而上海领事团公然一意孤行，简直是目中无人！向来媚外的北京外交部尚知据理力争，而爱国的上海市民何以没有严重的表示？

1924年7月2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　署名：独秀

内国银行又供给军阀一百万元

上海《申报》六月廿八日北京电①："外交界息，内国银行日内可望垫百万，由德款上扣除，此百万为粤事用。"这一个很简短的电报，可以说明中国财阀在政治上的关系。

我们第一要知道财阀和资本家之不同点。资本家是运用资本力图货币与商品之辗转相生；其结果社会之生产力因以增加。财阀是勾结外国与军阀，或为卖国的媒介而分润，或为政治的投资而获利；其结果卖尽本国生产的需用品（如原料、矿山、铁路等），吸收国内生产的资本供给军阀用在不生产而且是妨害生产事业的地盘战争。

因此，我们屡次指明财阀和资本家不是一物，屡次指明财阀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仇敌，是附属外国及军阀的反革命派，若新旧交通系京沪银行业者及香港、广州商人皆是。

我们若把这班财阀当做资产阶级，那便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是什么。国民革命党若把这班财阀当朋友，那便完全不知道国民革命之对象是什么。

这班财阀们如何结托香港政府，如何以商团拥护商人罢市向革命政府抗税，如何反对广东政府取用关余，现在又供给曹政

① 廿八日系廿九日之误。

府一百万元，大家应该明白他们和列强及军阀是有何等固结不解的关系。

1924年7月2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　署名：独秀

法西斯党与中国

意大利法西斯党穷凶不法，世界上那一国不知道！中国北洋军阀穷凶不法的苦，人民已经受够了，不图混账的美国人用尽方法，又要把穷凶不法的法西斯党介绍到中国来；他们去年在《大陆》报上大鼓吹其意大利法西斯党有代表在上海，劝中国商人去请教；现在又有一个私贩军火的美国人什么凯南中尉，竟将美国的法西斯党引到中国来了。日前上海破获的三K党机关，虽没有法西斯的名称，实际上他们在美国利用憎恶黑人底群众心理，做出种种穷凶不法的事，和意大利法西斯是同派的恶徒。

他们别高兴，他们同派的法西斯在意大利就快失败了。自众院议员社会党麦台梯氏被法西斯党谋害以来，全欧洲舆论都很激昂，各国社会党在日内瓦召集大会，直斥法西斯党是凶犯是强盗。牵涉此案而被捕的法西斯党重要人物甚多，地位仅次于穆索里尼的领袖罗锡氏，亦因被控自向警局投案。参院议长狄士尼在院痛诋杀人自利之目的，首相穆索里尼亦表示异常愤懑与惶恐。据六月廿七日罗马电：意国全境本日一律停工十分钟以纪念麦台梯氏，各公共事业亦皆停顿二分钟。又廿八日罗马电：在野党考虑议员麦台梯氏被害案后，今日开会通过不信任现政府之决议案，要求另立迅速废除法西斯党军队及严厉取缔各种不法行为之政府。

日暮途穷的法西斯党，他的穷凶不法，已暴露于全世界；美国对我们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我们已领教够了，现在他们觉得教会学校青年会、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工具还不够用，又要把穷凶不法的美国法西斯党即三K党引到中国来（六月二十五日淞沪警厅破获的三K党机关，明明是美国人主持的），试问他们对中国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

1924年7月2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　署名：独秀

美国侵略中国之又一形式——三K党

穷凶不法的三K党，就是美国的法西斯党；但是他标明纯美国主义，不独肆行惨杀黑人，即非美国土生的白人，亦在排斥之列；照常情此党之发展，只限于美国以内，断没有走到美国以外，提倡纯美国主义，排斥一切非美国人的道理。

可是近来上海竟发见了什么中国三K党，纯美国主义的三K党上，忽然加上中国二字，奇一；什么中国三K党，标榜的是狭义爱国主义，而党名却用外国文字，党务则由外国人主持，奇二。

六月二十五日淞沪警厅在横浜路破获他们的机关，拿着的七个党员当中，有两个是美国籍，他们指着室中所挂美国国旗对警察说："我们是美国公民。"警察进屋时，他们正在和一个美国人名叫凯南(Kearny)的谈话；同时，附近的美国人立即通知美国领事。事后，凯南公然自己具名投函《字林西报》说："余为该党之顾问，……三K党……认目下一部分华人及一部分外人所宣传之排外说为错误，于中国有害，故该党对于此说，力辟其谬。……该党一切党员均负有阻止排外宣传之义务。"

依据上列事实，当然可以明白所谓中国三K党完全是美国人的阴谋；《字林西报》说得好："其目的究竟是为美国呢，还是为中国，非有若干中国人出而为该党发言，此疑问终难解释。"

我们并可以明白这党是一个为害中国尤其有害于上海治安的团体，因为三K党在美国多穷凶不法的行为和他们在上海的顾问是一个私贩军火的人物。

美国三K党本是极端排外的，而据凯南说中国三K党乃是一个阻止中国人排外的机关，这岂不矛盾得很？所谓中国三K党也曾标榜狭义爱国主义，然而以抱狭义爱国主义的人，入外国籍，受外人支配，托庇在外国国旗势力之下求生活；这不算，还要帮助外人阻止中国人排外，这岂不更矛盾得很？

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名为中国三K党，仍旧是美国三K党，仍旧是排外，他们在中国也是外人，所以阻止中国人排外；诚然是狭义爱国主义，惟所爱的是美国不是中国，并且还要中国人也爱美国；这是美国对中国总的经济侵略之下在教育侵略新闻侵略外之另一形式。

1924年7月2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二期　署名：独秀

孙宝琦去职与金佛郎案

孙宝琦在辛亥革命时，始而伪独立，继而取消独立，其为患得患失的鄙夫已可想见。明知曹锟窃政为正义所不容，又明知曹锟左右多金任必不能容他人久据内阁，而竟不惜附逆以过短命总理的瘾，孙宝琦之为人更可想见。

孙宝琦之为人固糟，然尚有两件事还不算糟到极点：一是他在私的行为上尚不至象顾维钧和李彦青结拜弟兄；一是他在公的政策上尚不肯附和王克敏承认金佛郎案。

半年的孙阁，自上台到下台，都始终事事与王克敏相持，最重要的是金佛郎案。他二人半年来明争暗斗之结果，卒以曹袒王而孙去职，王之得意可想，王之政策将要如意实行也可想。

王克敏对于金佛郎案之政策，厄于孙阁不能实行，这是全国皆知的事；今孙去而继任者无论为顾维钧为颜惠庆或王毓芝，都必能和王克敏合力同心谋曹家的利益。承认金佛郎案，自然国家的损失，即于曹政府也未必有多大利益，关税会议未必因承认此案而能实现；然而曹政府，尤其是王克敏个人，终想尽力设法承认此案，以便在外人方面财政上有所活动。

在这一点，国人对于孙去王胜的局面，应该有相当的注意。

1924年7月9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三期　署名：独秀

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

意大利人几乎是公开的在天津发卖军械，最近马联甲又在那里购去大批手枪子弹等；上海方面，法国邮船安乾尔号私带军火案才判决，本月四日又发现了美国船拖儿开脱号密运大批军火来沪，已经海关查出大木箱六十二只，内藏手枪来复枪一百九十九支，旋轮手枪四百〇一支，机关枪八尊，子弹十三万五千粒；同时，日轮白山丸船员亦在虹口马路上被巡捕搜出手枪五支，子弹三百五十粒。

帝国主义的列强，动辄以华府会议镇压我们，现在他们对于所议决的禁止军火来华案怎么样？

他们一面输入多量机器制造品，摧毁了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使多数农民工人失业而流为兵匪；他们又一面输入多量军火，使中国的兵匪得着武器更加横行。中国兵匪的势力，完全是列强制造出来的，于是他们又可以借口兵匪扰害外人，向中国政府讹索敲诈，这都是英、美、法、日、意各大强国各文明国对待我们中国的行为。

他们在中国制造了兵匪，还要责备中国政府不能维持治安，还要向中国政府敲索赔偿；可是土匪们已经光顾到列强支配的租界，近来上海租界几乎每天都有抢案发生，不知列强对于租界治安将责备何人维持，其损失将向何人要求赔偿？

若是美国人果然能在上海组织一个强有力的三K党，一面召集中国土匪，一面密运美国军器，那时上海租界上的治安，还要比现在好看十倍哩！

1924年7月9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三期　署名：独秀

寸铁

沈恩孚梁启超眼中的平民

沈恩孚说："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所以叫做平民。"他这样解释平民，自然可笑。梁启超把全国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食其力的农、工、商，叫做有业平民；一部分是抢骗他人血汗的官吏、兵官、议员，叫做无业游民。他这样解释平民，固然好过沈老先生，不过官吏、兵官、议员……外，被内外资本主义挤迫而失业的，何尝不是平民？反而商之中，居奇致富的大腹贾，有时势倾王侯，那算得是平民？

梁启超勿忘今日之言！

梁启超发愤说："做官的，带兵的，当议员，……种种阔人，以及他们的附属品什么太太、奶奶、少爷、小姐，他们自以为高贵，也许有人认错他们是高贵。其实这班人有最下贱不过的。因为他们都靠人养活——笼着手不做事，只会张着嘴吃饭，……笼着手吃饭的人，吃的不是饭，是别人家血和汗。别人家的血汗怎么会吃得着？不外两种把戏：一是骗，二是抢。骗是光棍行为，抢是强盗行为。……唉真倒霉，中华民国的生命，全部掌管在这班最下

贱的人手里！'一品大百姓'往那里去了？哈哈，都睡觉哩，不管事。"哼！梁启超现在说得太过高兴了！他现在这样发愤，即或是一时憎恶军阀政治之真情；但是日后自食其力的劳动百姓们，如果真能起来从张嘴吃别人血汗的光棍、强盗手里夺得掌管中华民国之权，那时，梁启超倘尚生存在世，必然因为太伤了高贵人的体面，又要出来大呼"贱民专制"。他如不服，请以今日之言留证将来！

假革命党

中山先生说："升官发财，畏难苟安，这是假革命党。普通国民以为这就是革命人才，所以革命的名誉，被他们弄坏了，我们一定要排斥这种假革命党。"凡属中国国民党员，每日至少要自问一次是不是中山先生所指摘的假革命党！

1924年7月9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三期　署名：独秀

收 回 教 育 权

教育改进社今年在南京年会中所通过的各议案，算是收回教育权案有点历史的价值。

无数在外国教会学校诱惑锢蔽之下的中国青年，受了土耳其封闭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刺激，“收回教育权”的呼声，首由广州学生喊将出来，不期而应者几遍全中国，教育改进社的右派分子，竟为全国青年的呼声所迫，容纳了左派分子之主张，通过了此案。将来实行至何程度，现在虽不可知，而最小限度(一)总可以使外人感觉中国人心犹未死尽，无形的文化侵略究竟不象有形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那样便当；(二)总可以使在外人势力之下麻醉久了的青年明白教育权应该收回，是中国教育界所公认，并不是什么过激派的主张。

然而恐怕也只有这两个最小限度的效果，因为他们的议决案中，并没有明白坚决的办法；他们的办法是：(一)凡外人借学校实行侵略，经调查确实，应由政府勒令停办；(二)施行甲、乙两种注册；(三)于相当时期接收外人所设学校。

这种明白实行侵略的事实，尚待调查，岂不是笑话！注册是取缔不是收回。相当时期，是不是无期？

他们堂堂的收回教育权案何以这样二百五？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一)是因为教育改进社完全在研究系操纵之下，他们如何

能赞成这样急进的主张！初提此案时，研究名人范源濂犹极力称赞教会学校之成绩，经陈启天等纷起驳斥，才将会场空气转换过来。(二)是因为教育改进社社员中，有许多耶教徒或教会学校出身，他们都加入讨论，议决案怎能不二百五？

我们认真讨论起来，与其主张“收回教育权”，不如主张“破坏外人在华教育权”；因为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目下二百五的中国政府和中国教育界，都不会有收回的决心；至于破坏的责任，便不须依赖政府与教育界，只要在教会学校受奴隶教育的二十万男女青年有这样的觉悟与决心。

1924年7月16日《向导》周报第七十四期　署名：独秀

上海防盗问题

上海近来无论华界租界，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抢案发生，这自然是上海市民的大害，各路商界联合会群起讨论防盗方法，自然也是应该的。

他们防盗的方法是怎样呢？南京、福建两商联会提出办法六条：

（一）严查私贩军火及私藏军器；

（二）增加站岗及巡逻巡捕并改良交替换班方法；

（三）装置盗警特别电话；

（四）加严检查旅馆；

（五）取缔界内游民；

（六）设备盗警武装汽车。

百老汇路商联会的意见是：

（一）禁止诲盗诲淫影片；

（二）各捕房门首装置报告信箱；

（三）规定一律营业时间。

山东路商联会主张：

（一）清查户口；

（二）检查旅馆；

（三）救济失业游民。

其他各路商联会所提出之办法，大致都和上列各办法大同小异。

工部局及各西报恢复笞刑的办法，固然可笑；即各商联会所提出的，也都不是根本办法。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海何以多盗的原因。到是工部局总巡强森君的话还有一半对，他说："研究盗匪所以猖獗之故，其原因有二：(一)为上海附近退伍兵士众多，群以上海为生财之地，工部局无法阻其入境；(一)为枪械来源不绝，且多数为外国轮船私运，……有盗有械，因之盗案迭生，诚为遗憾。"

何以说他的话只有一半对呢？因为他所说的第二个原因，有械是由外国私运，这是对的；他所说第一个原因，有盗是由于上海附近退伍兵士众多，这是不对的。其实有械固然是外国之赐，有盗也完全是外国之赐。他们把持中国的海关，不许增加进口税，使中国本国工业不能发达，于是他们输入多量廉价制品，毁坏了中国的农业手工工业的经济，驱逐无数农民、工人失业而流为兵匪，这就是中国兵多匪多之唯一原因，岂非是外国之赐？内地已为兵匪搜刮殆尽，而由失业加入兵匪者还日在增多，那有不光顾到租界的道理！

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中国制造了兵匪，又为兵匪运来了枪械，"有匪有械，因之盗案迭生"，帝国主义者"诚为遗憾"！

各商联会所提办法，无一见及盗因，多仅属治标之策，必无济于事。盗匪并不怕枪毙，何况笞刑！盗匪增加自有经济的原因，岂是海淫海盗的影片所能诲成？何谓游民？如何取缔？告密信箱更有挟嫌指诬之弊。盗匪多自外来，不限于上海的失业游民，将怎样普遍的救济？

所以根本弭盗之策，只有止住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本国的实业得以发展，失业游民得以减少，然后才有治标的防盗政策之可言。

不然，群盗满国，上海岂能独免？

1924年7月16日《向导》周报第七十四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假革命党与反革命党

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两个意义相类的名词，所以反抗国外帝国主义之压迫是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工作，反对国内军阀政府，只算是这工作中之一种，因为军阀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之傀儡。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不肯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便不算是国民主义的革命党，便是假革命党；阻止别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更是反革命党。

精神生活与金钱

章行严、太戈尔、张君劢，他们极力提倡精神生活反对物质文明的高论，我们都领教过。然而第一个章先生竟发起招集十万元办周刊，并且投身交易所事业；第二个太先生在香港为他自己办的学校大募捐款；第三个君劢先生因为他的自治学院经费取销了大肆咆哮。难道所谓精神生活还得要依靠金钱养活着吗？

1924年7月16日《向导》周报第七十四期　署名：独秀

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

在空气恶浊沉闷的北京，居然有了一个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盟①，虽然这个运动之分子当中可惜夹杂了一些议员，总比什么头发运动、马蜂运动有点意义。

但我们必得警告他们的是；他们宣言第三点说：“我们这个大联盟，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外，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所谓任何事务，“反对曹锟政府”是否也包含在内？他们应该明白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然相互勾结，他俩是不能分家的，若主张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军阀，和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乃是同样的错误。

而且，在北京只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不反对军阀政府，在特定事件上，军阀政府尤其是他的外交当局有时还要利用一下；犹之在上海租界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者，在特定事件上，帝国主义者有时也要利用一下。

这一层，我们希望加入联盟的诸君十分注意，勿令任何好名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会变相，尤其是在官僚窟的北京！

1924年7月23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五期　署名：独秀

① 1924年7月13日，北京议员及京内外各团体在中央公园召开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会议，到会有五十余团体代表及各界人士二百三十余人，推选胡鄂公等为执行委员。20日，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发表通电：“扑灭帝国主义之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本联盟除反帝国主义之工作外，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予闻。”

新银团与中国

银团为中国之隐患和使团为中国之显患，是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略中国一个政策之两方面，前者是经济方面，后者是政治方面，这两方面有时也会有私的冲突，而根本上我们没有方法说他是两件东西。

银团内部也随着列强自身政治经济之变化而变化，由英、美、俄、德、法、日六国银团，而英、俄、德、法、日五国银团，而英、美、法、日四国银团，这个大战后改组的四国新银团，实权上只是英美的银行团。

去年八月新银团在巴黎集会，英、法、美、日代表都到会，发表宣言，宣言中有重要二点：(一)本团愿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深合华会公约；(二)本团苟为中国承募国债，必须该款用于适当用途，且可到期归还，因欲达此目的，自须有若干之监督办法。第一点，明明和华会对中国由瓜分政策到共管政策由单独侵略到共同侵略，是一鼻孔出气；第二点，明明说到共管之实际。

现在，新银团又正在伦敦开会。此次开会乃由英国提议，提议的主旨有二：(一)因该银团到明年十月已满五年期限，意欲讨论可否继续下去；(二)因从前新银团内部规约过于束缚，意欲改订规约，以便各国自由投资。其结果，据路透电：议决合同满期当再延长五年，是英国提议的第一个问题业已解决，第二个问

题如何解决尚未宣布。惟闻英美银团的意见，拟变政治投资而为铁路投资；同时中国大军阀吴佩孚也主张急设到库伦、新疆两条铁路；此事如果实现，一方面列强益扩张其纵横支配中国之权力，一方面中国军阀不但挪用路款，而且增加其构乱杀人的速度。

在中国现状之下，列强对华铁路投资即是间接的政治投资，这是列强和军阀勾结为患中之一大计划。

1924年7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七十六期　署名：独秀

帝国主义者援助
军阀之又一证据

对华禁输军械之约，本是由美国提出于华府会议，而经列强议决的，现在他们因为要援助北洋军阀，不惜自毁前约，将大批军械运到中国。

意大利售大批军械于曹锟之后，接着就是首倡禁械的美国售大批军械于吴佩孚，此事虽经美使馆否认，而事实昭彰，怎容他抵赖。

发见并扣留此大批军械的乃是天津海关。此项运械并有陆军部所发一二四九号护照，护照时日是民国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盖有大总统印及陆军部印，填发护照之负责人，除陆军总长陆锦外，复有吴佩孚之署名盖章，照上所载军械数目：步枪一万枝，小枪一千五百枝，机关枪二百五十枝，步枪子弹一千万粒，小枪子弹二十万粒。海关所以扣留的原因，以实数只有步枪五千八百枝，子弹五百六十四万，小枪二百五十枝，子弹二十万，和护照所载不符，故不放行，现在运存关栈，经运之美国人次洛耳夫，已电告洛阳，并得复谓即派员来津交涉。

同时，日本亚尔太丸由德国汉堡运军火三百五十箱至天津，此项军火有北京政府护照，也是吴佩孚所购。

同时，我们又应该知道未来内阁颜惠庆向来的政策，是以整顿财政名义，借新债五万万整理旧债，且曾得新银团之同意，即以新银团和财政整理会为一买一卖的包办机关。在此五万万大借款内，吴佩孚可分得一万六千万元为统一费，因此他对颜阁甚表同情。

野心勃勃的吴佩孚，既得到大批军械，又得着大宗借款，有款有械，自然要向西南、东南、东北、西北四方八面横挑战祸；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是中国祸乱之源泉。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要援助军阀？这是他们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惯用的政策：扶植旧势力，抑制新势力，俾永远在他们支配之下。况且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正在猛烈的进行，他们如何不加紧援助北洋军阀！

因此，我们更应该明白：历来军阀（自袁世凯至吴佩孚）都是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而生存而恣意为恶，革命党若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者，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观念。

1924年7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七十六期　署名：独秀

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

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美国、南洋取缔华工，已经是人类不平的事了；然而这些取缔都还是在他们国境内行之，现在他们却更来到中国国境内取缔中国人，这是一件何等喧宾夺主的事！

沙面新警律为中国人所最不能受的是：从八月一日起，沙面华仆出入，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粘主人照片，每晚九时后，华人非携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凡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等，均可自由出入，独取缔中国人在中国国境内行路的自由，这明明是加于全中国民族不可忍受的侮辱！

沙面全体华工罢工抵制，这种为全民族受辱而消极的和平的运动，没有人能够加以丝毫非难的。现在因为沙面英领事坚持不肯让步，罢工风潮将扩大到香港，且有抵制港币之说。外国货币在中国境内直接使用，本来也是一件怪事，因此抵制不用，也是很正当的。

象这些事，都是广东革命政府应该出头做的，现在却让民众抢先做了！

现在外人方面对于此事的言论，大有责备广东政府在暗中鼓动的意思。这种荒谬的言论，固然是外人太轻视中国人的人格，也是广东政府自己态度不对所招惹的。象这种为民族争人格争自由的运动，凡是中国人都应该鼓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国

民革命的广东政府更应该为此事堂堂正正的出头率领民众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岂止应该鼓动。不料广东政府竟站在调人地位，而且声明和此次运动无关；此种声明，不啻说广东政府不是为民族主义运动而设的，所以才惹起外人的猜疑与责难。

“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革命的国民党是为此而组织，革命的广东政府是为此而设立，凡属此类运动，每个民族主义者都应该站在民众前面，不应该跟在民众后面，更万分不应该站在中立调人地位。若恐怕因此触怒列强，那便万事干休！

1924年7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七十六期　署名：独秀

再论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

意大利售给曹锟的军械价值五百五十万元，现在美国售给吴佩孚的军械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日轮又由汉堡运到天津军火三百五十大箱，此外齐燮元、马联甲都在天津购得若干意械，这都是帝国主义者供给北洋军阀杀戮中国人民的。

七月廿四日上海《字林西报》说："昨日法国邮船盎高尔号进口后，未及半小时，关员即在船中抄出自动手枪五十枝，子弹五千粒，近来法邮各轮屡有违禁物品查出，此次已属第六次，前如肯博特号、布尔介号、安德来朋号、安博司号、安乾尔号等五轮，相继被关员查获军火。"此外上海租界发见日人私藏军火的事，几乎每星期都有。这都是帝国主义者供给盗匪杀戮中国人民的。

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责备中国不能自保治安，不能保护在华外人生命财产之安全，他们却忘记了这是他们自己以商业侵略逼得中国人穷无资了和以军火供给军阀盗匪之结果。

我们敢说：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不停止，中国决无治安之可言，尤其于治安有直接影响的是私运军火。

他们供给军阀盗匪无数军火杀了无数中国人，他们向来不以为异；可是有一班盗匪竟拿这军火来光顾租界，杀人杀到洋大人身边，住在租界的任何人都难免波及，因此洋大人才恐慌起

来，《中法新汇报》说："不幸吾沪秘密贩运军火者，继续不断，外洋来船时有大宗杀人器具运入，虽关员屡有所获，而破案者殆不及十分之一。吾人苟欲杜绝此项不名誉之营业，必须于贩运之人不问国籍之谁何，尽人处以死刑，夹带之船舶，在若干数目以上，不问其主人之为华人为外人，概予没收，以后犯法者庶知所畏惧而不敢为。……匪徒之行劫杀人者，治以死刑，而于彼私运军火以导其为恶者，反释而弗治，吾人自问良心，宁得谓之平允？"工部局总巡强森氏报告董事会说："埠内违法贩运军火之徒日多，所贩数目又不在少，皆有证据可引，外人营此犯禁事业若是其众者，全因处罚太轻所致，毫无疑虑，如某领事公堂最大罚则不过监禁三月，又如某领事公堂最大罚则谨能监禁二十九天，日前更有一私售军火与华人案，破获之后，因其为本国人故，即行释放，处罚之轻若此，无怪乎外人贪利犯禁者之众也。外人私贩军火之罚则，非至确可收禁阻之效，恐匪风未必能戢，而街中流弹横飞，危及行人之事，亦未必遂能中止。"

他们只看见盗匪得了军火，在租界中流弹横飞，危及行人事；他们不看见军阀们得了大批军火，在全国中流弹横飞，危及人民之事。他们只主张处罚在上海贩运军火之外人，他们并未想到如何处罚在天津贩运大批军火之外人，及其政府。如此，"自问良心，宁得谓之平允？"

《字林西报》说："不幸目下有关系之各当道，并无一致行动之征象，而捕房所处地位，尤因各领事态度之大异，办理极为棘手，是故目前于防杜军火，直可谓之毫无办法；长此不改，窃恐私运之风永不能稍戢，……"像这样"私运之风永不能稍戢"，像这

样"毫无办法"，外国领事老爷们只有把租界之司法权、行政权交还中国人自己治理罢！

1924年8月6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七期　署名：独秀

日本在华侵略之新计划

南满铁路会社，不但为日本开发满蒙之总机关，亦即其侵略中国之重镇。加藤内阁成立，首先更换南满铁路总裁，以图扩张南满铁路会社之营业范围，使日本在满洲之经济尽量发展，然后再向北满及内外蒙与美国商业竞争。新任南满铁路总裁安广伴一郎氏，对于开发满蒙，素抱急进主义，赴任后，即拟定营业发展之新计划；并以上海为中国商业中心，又与日本、满洲均关系密切，亦特别派出多员调查，以为实行新计划之准备。闻所定新计划重要的是：

（一）推广抚顺（即千金寨）煤矿之产量，由现在每年最多额五百五十万吨，将来增至七百五十万吨。

（二）收并大连轮船会社，并以一百八十万元新造五千吨以上之快轮数只，专供大连、上海间之直航，以利运输。

（三）调查抚顺煤在上海方面之销路，拟以后每年在上海出售抚顺煤五十万吨至一百万吨。

（四）修改上海满铁会社之码头，增设上海仓库，并在吴淞新筑码头及仓库。

（五）将满铁窑业试验场所制玻璃商品，运供上海市场。

（六）将由上海运转大连之棉线、棉布、药料、毛织物、麻袋、面粉等，设法直接输入满洲。

（七）利用上海之标金交易，均衡满洲之银价，借以操纵满蒙金融。

照日本这个发展满铁会社营业范围之新计划，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于废除廿一条按俄旧约交还已过租借期之旅大及南满铁路，做梦也未曾想及。

1924年8月6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七期 署名：独秀

加哇的民族运动

欧战后，民族革命运动弥漫了东方，最成功的是埃及与土耳其，其次是蒙古、印度、阿富汗与飞律宾，最无用的是安南、朝鲜、波斯与中国。此外还有一个民族运动最彻底并且很有力量而大家不大注意的是荷属加哇。他的运动历史甚长（参看《前锋》月刊第三期），兹录《申报》通信一段，也可见其最近运动之一班：

华人张木本、许春园、陈金顺、侯永茂，及土人So kindar Soegiri等所组织之种族互助会，其目的在改进华人及土人经济势力之失败，与法律上之不平等，已于七月一日上午九时在三宝垅回教堂开会，到会者约二千余人，土人居多，华人约二百左右，警察厅长各番官Tohar Patih及警察多人，来会监视，各报记者亦莅止，由Soek ndar主席，对来宾致谢词，并宣布开会宗旨，次华人侯永茂、印度《星》报记者Soengago、土人Darsono相继演说，华人林万魏等讨论请政府修改法律，后主席宣布议决案，及要求取消法律第一百五十六条，至十一时散会。

警察厅对于该会甚为注意，先期曾传问发起该会之华人张木本及陈金顺等，关于该会之情形。及开会时，土人Darsono演说，痛诋政府，为番官禁止。其他诸人所演说，均甚重要，兹特详录如下，主席宣布开会宗旨略谓：此会之目的，在打破人类不平等之待遇，并谓本会董事华人某君，今日本拟出席，因有要事离

埠，故不能到会，但曾函告本会声明，对于今日此会，华人应与土人联络云云。华人侯永茂演说："吾华人南来，为时最早，不辞劳苦，惨淡经营，此地商埠，始有今日之兴盛，华人之功不小，乃政府种种待遇，颇不平等，与日人比较，判若霄壤。譬如日人犯法，归高等法庭办理，而华人与土人，则归地方检察厅，是明证也。故今日此会，华人与土人，宜同心协力，以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吾甚希望华人与土人为种族之互助，努力猛进，冀达目的，并打破资本帝国主义，更望华人方面，能成立一党云云。"印度《星》报记者演说："由今日起华人与土人实行联络，应以此日为大纪念日，永纪不忘，嗣后求二种族人之权利。至于地方当局，对待华人与土人不平等之处，如法律第一百五十六条，在荷属印度，凡有人煽动及造作谣言及侮辱等，科以四年之监禁，观法律所定如此，而当局所办理，常较此尤重，在当局自身，已先触犯法律矣。以前所成立之会，大多无能力破除此种不平等之待遇，如恩德会颇难使人满意，因其所提出之要求条件，极其细微，不关重要，欧洲战争之起，其原因为扩充商业，而饮弹以终者均为工人，所有特别阶级均无恙，倘东西各国工人，能联络一气，则大战可以不发生。现时华人之在此土者，其经济势力，愈趋愈下，已有反商为工之势，故目下之要图，为能与土人联络，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而合谋经济上之发展耳。"Darsono演说："法律上之不平等，吾以过去之事实证明之，如华人与土人被监禁，在狱中日常之饭食，尚不及富家饲狗用之食料，此系本人于一千九百十八年因荷人共产党事，所亲……"言至此，番官Tohar Patin禁止拉氏演说，拉氏谓此系事实，吾所亲尝此滋味者。番官谓所言含有抵制荷人之意味，不许再说。此时会场秩序稍乱，旋即恢复，拉氏再

继续演说："共产党对于欧人，非完全不满意者，欧人之为共产党而牺牲者，为数甚多，所不满意者，仅一部分之人而已。一千九百十九年龟突土人与华人之冲突，仅经济上细微之嫌怨耳。"华人张木本演讲："今日此会，华人与土人实有联络之必要，此次三宝垅某某二社团之同种自杀，吾人所极不满意者也。"土人Marco演说："一千四百十四年华人发显(译音)，为南来爪哇之第一人，其所抱宗旨，均与土人无忤。及一千五百年荷人Houtman抵巴达维亚，于是向土王请给地一方，时至今日，全爪哇均为荷人掌握，主人翁之土人，与最先来之华人，反居于后。故今日之会，华人与土人应一致联络者也。

1924年8月6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七期　署名：独秀

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

牺牲无数劳动平民之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此时已届十周年，战败国战胜国都忙着开会纪念，大概都没有丝毫悔祸的意思，并且都还有准备第二次大战的决心。

在这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中，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因供给军需品，中立国的资产阶级因供给生活品都发了大财，被牺牲的只有各交战国的劳动平民及被蹂躏的弱小民族。这种状况在过去大战争中已经明白指示我们看过，在未来的大战争恐怕更要加甚；因此，我们不得不努力反对国内军阀主义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他们都是国际大战之源泉。

有人以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虽然造了许多罪恶，而其结果却倒了俄德两个专制皇帝，于人类社会进化未必无意义，若世界大战再来一次，或者又可以消灭几个强者；其实，这乃是机会主义者的谬见，这种谬见和希望军阀间相互战争而自己自然消灭是同样的妄想。我们要倾覆帝政，我们要倾覆特权阶级之统治，都应该实行横的国内阶级战争，不应赞成纵的国际战争；因为国际战争，乃是资本特权阶级利用劳动平民对别国资本特权阶级的战争，换句话说乃是各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权阶级各以爱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者假借爱国主义，欺骗劳动平民来拥护自国的帝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被压迫的

弱小民族以爱国主义号召全民族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不应该反对的。）关于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所谓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工具；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民族主义乃是弱小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意义，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态度是如此。欺骗自国的劳动平民，盲目的拿着机关枪向别国的劳动平民放；其结果，无论战胜国战败国，都只有劳动平民同样的伤亡、失业无法救济，即战胜国的资本特权阶级即小受伤痕也不难恢复，并且还是拿劳动平民的血来恢复。至于国内战争，乃是劳动平民对资本特权阶级的战争，乃是劳动平民有目的的拿着机关枪向特权阶级放，其结果，至少也不是劳动平民单独的损失。

帝政及特权阶级都只有国内战争可以倾覆他，俄、德也是如此；决不是国际战争可以倾覆他，英、法、意、比就是如此。国际战争，只有国际的劳动平民白受无报酬无目的的大牺牲，为胜利国的资本特权阶级增加利益，此外别无意义。在此时代，我们不愿反对一切战争，我们只主张以国内战争代替国际战争。而且至凶极残的国际大战争，只有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者的独立战争之胜利才可以止住，此外决非空言及其他方法可以止住，这第二次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之必然的到来。

大战中，不但各交战国的劳动平民大受屠杀，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也几乎都无辜而被蹂躏；邻近欧洲的不用说了，即僻在远东的中国亦大受其影响。在这欧战十周年的纪念中，我们中国纪念的是：

日本迫我的二十一条件；

因参战而增加的外债：日金一万四千万元，美金五百五十万元；

参战华工死伤数千人；

因参战而起政潮，解散国会，复辟，南北分裂，督军割据。

不幸第二次大战若在远东发生，则中国所受的蹂躏更将百千万倍于此。我们求免之道：只有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势力并自己努力排除国际帝国主义，使他们不至因为争夺中国这块商场而战，战时受彼蹂躏，战后受彼胜利者之独断的处分。

1924年8月13日《向导》周报第七十八期　署名：独秀

美国人又以军火供给北洋军阀

一月前上海海关曾在美国夹板船塔尔布脱号Talbot搜出机关枪八枝，子弹及手枪共计七十二箱，船主鲍勒生Boressen并与私运有关系。由美国运到天津供给吴佩孚的军火价值三百廿八万元，也是近来的事。

最近又发见美国人私运大批军火在厦门起岸的事。据本月十二日上海《泰晤士报》说："美国海军当局得有报告，谓近有大批军火在厦门上岸，现在一中国军官处，计机关枪一千枝，大批子弹及手枪若干。……美海军当局对于是否将设法取回在厦门登陆之军火一节，不肯发表意见。"

运军火往厦门，和运军火到天津同样是帮助北洋军阀攻打南方革命军，这是美国既定的政策，此外美国海军当局还有什么意见发表？此种政策，在曹锟贿选美公使首先欢迎时可以看出，在海关事件列强派军舰到广州示威时美国格外热心可以看出，凡中国人尤其是南方革命党人，现在总应该认识美国是不是我们的"好友"了罢！

北洋军阀尤其是吴佩孚，既得了美国的大批军火，若再以铁路借款及庚子赔款筑路的名义攫得大宗军饷，那么，他为统一而战争而屠杀的大惨祸就在目前。人民方面应该起来下全力阻止这残民乱国的军阀向帝国主义者取得一钱一弹；因为帝国主义

者给军阀的每个钱每个弹，都是用来杀戮人民的！

1924年8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九期　署名：独秀

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

帝国主义者、军阀、绅士、奸商，他们本来是气味相投的一串货色，在广东商人中尤其容易看得出，陈炯明便是这一串货色的串子。陈炯明自称须与绅士相依为命，他如何将中山先生外交政策向香港政府告密，香港政府又如何帮助陈炯明在香港、汕头间的交通及陈派以香港为攻击广州的策源地；省港商人尤其是二陈（陈廉伯、陈席儒）向来如何倾向北政府，如何拥护陈炯明，如何罢市反抗革命政府，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这很容易看出香港政府、北方政府、陈炯明、省港商人是一串的货色。

据《民国日报》十一日广州电：粤海关查获由外轮私运入口枪枝一万杆，子弹三百万发。据《申报》十一日香港电：商团向外商南利洋行购枪弹，……政府派员查验，共七九步枪四千八百五十枝，弹二百十五万发，驳壳枪四千三百三十一支，弹二百零六万发，手枪六百六十支，弹十六万五千发，价值百余万。据《新闻报》十三日香港电：商团总部会议，闻决定不交还该械，即全城罢市；旋派出团军二千余赴帅府请愿。据《新闻报》十四日香港电：花县商团于十三日武装抵省者七百余名……三水、佛山及南鹤十四埠等商团，均备武装来省。据《民国日报》十四日广州电：陈廉伯假商团名义私运军火，现已发现证据多件。十五日电：陈廉伯已全家逃往香港。商团军都已有武装，现在又购大批军火做什

么?广州商人屡称困苦罢市抗捐，现在何来巨款大买军火？动辄以罢市反抗革命政府，是不是革命之敌?商团本以御盗，现在纷纷武装到省是御谁?

我们于广东政府对待商团的优柔政策，老早就表示警告，现在这种反革命的商团军势力日见澎涨，竟至抗违政府命令，自设联防总部，竟至私运大批军火，我们敢说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州！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

1924年8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九期　署名:独秀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

中国实业家不赞助国民革命运动，真是自灭的蠢物！

中国人何以这样一年穷似一年？总原因是，每年进口货价超过出口货价约在四万万元左右，即去年最少亦尚超过近三万万元。如此巨额的外溢年复一年，中国安得不穷！

今年怎么样？即以日本而言，其地震以后，需要巨量之输入品，因此，本年上半年入超竟达六万万元之巨额，照常情论，当此日本入超巨大之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年中国对日贸易至少可望出入平均，乃事实竟大谬不然！自新年起至七月底，中国对日输出值日金九〇、五七四、〇〇〇元，由日输入则值日金二〇〇、三〇一、〇〇〇元，出入相抵，入超已达一万万元以上，以此推之，今年中国对外贸易之损失，即日本一国亦有二万万元。

日本在灾后入超激增的时候，何以独能对于中国竟至如此巨大的出超？因日本灾后积极奖励国内生产，扩张国外贸易，尤注意于中国及南洋，不惜由国库支出一万二千万元，补助商人扩充此方面商业之用，此为增加输出的政策，他方又利用关税政策减少输入，即增加奢侈品新税率是也，所谓奢侈品竟多至十七类六百四十七种，即日常需用之陶器及麻织品（中国夏布即属此类，每年输入日本、朝鲜值五六百万元）亦列入，税率增至百分之百，而且对英、法等十余国准展期三月，独于中国则限期

实行，什么奢侈品新税率，简直就是禁止中国货输入日本、朝鲜罢了！

不用说，此新税率实行后，中国对日贸易之入超，更将有可惊的增加。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除输入货物以外，更有输入资本的毒计：东三省投资每年在日金二万万元以上，黄豆之输出，纺织业、矿业、森林，无一不为日商所垄断；上海纱厂，日商居三分之一以上，最近明治制糖会社，以日金三千七百四十五万元，在上海设立明华糖厂，并强求中国免税，以与香港糖竞争（中国所用只香港糖、日本糖二种），而独占中国糖市。日本在美国被排以后，势必移用其资力来中国经营，从此日本在中国之制造业将日见扩张，其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原料，为害比输入货物更甚。

因此，我们应该觉悟：对待日本如此激进的侵略，决不是消极的排货所能抵御，排货手段，已由本年对日贸易入超的数目字证明破产，我们不应再依赖此手段了，我们宜采用积极的革命手段：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及禁止外人在中国设立制造厂。除此，中国人别无生路。

中国实业家不赞助国民革命运动，真是自灭的蠢物！

1924年8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九期　署名：独秀

关税协定之外卖国政府又与外商协定纸烟税

北京政府的烟酒事务署，近应英美烟公司之请求，电召各省派员到京，协议增加纸烟百分之五地方营业税，以撤消各省现办之纸烟特税为交换条件。

吾国国民生计，吾国工商业，已受海关协定税制压迫得不堪了；现在北京的卖国政府，因为急于筹款养兵杀人，因为急于和地方政府争收入，遂不惜将纸烟之地方营业税也要和外人协定；此例一开，各项地方营业税皆可援例协定，从此中国全部收税主权将完全丧失！

纸烟是一种不卫生的奢侈品，各国对于纸烟税都极严重，日本竟至值百抽二百。现在中国各省纸烟特税也不过值百抽二十，若与外人协定值百加五，连原有二五捐只有七五，不但目前减少收入，而且将来永不能自由增加，这是何等损失！

再进一步说，即外人应允照日本值百抽二百，吾人亦不能承认，因为征收地方营业税吾国有自由规定之主权，绝对不应与外人协定也。

前清承认关税协定，犹可说是初通商不明白外情，铸此大错，现在协定税制之害谁不知道，北政府岂不是有意卖国？

即此一端，军阀政府之卖国及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都明明白

白摆在我们眼前。

1924年8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七十九期　署名：独秀

江浙战争[1]

我们不是非战论者，当然不绝对的反对一切战争，只注意这战争对于大多数平民有何意义。譬如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在各国资本阶级间相互争雄上固然有意义，而对于各交战国大多数平民，除单纯的牺牲外别无意义。国内军阀间的战争，在他们争夺领土上固然有意义，而对于两方领土内大多数平民，也是除单纯的牺牲外别无意义。惟有大多数平民对于军阀或资本特权阶级的国内战争，则对于大多数平民，无论是如何牺牲，都绝对有意义。

有人以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国家或可由相互战争而倾覆，中国军阀间也或可由相互战争而灭亡，这是一个痴人说梦。帝国主义者或军阀间的战争，其结果仍有一个胜利的方面支配着世界，例如：欧战后仍是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意的世界，直皖、奉直战争后，仍是直系军阀的江山，他们那会因互战而全倒。要他们全倒，只有大多数平民起来对他们的革命战争，俄罗斯就是

---

① 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卢永祥由松沪护军使升任浙江督军后，原职由部下何丰林继任。江苏督军齐燮元（属直系）不满。1924年8月25日，孙传芳由闽进攻浙边，9月初江浙军队在沪宁路安亭附近接触，战争爆发。孙中山发表讨伐曹、吴宣言，声援卢永祥，张作霖也响应卢永祥。卢战败，10月13日通电下野，江浙战争结束，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即爆发。

一个榜样。

正在酝酿的江浙战争，早迟总难免发作，在浙方虽然竖起反直的旗帜，而至少须与广东革命政府协同动作，才有多少意义，不然仍是一个纯粹的军阀间地盘战争。

此次战争如果起来，我们将取何态度呢？第一、我们应该努力使此次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不叫他成为两方地盘战争；第二，我们应该努力在此次战争中增加平民的力量与利益。不但帮忙一方面做留声机器（如南京商会）是下流，就是消极的哀求和平也不是办法。

1924年8月27日《向导》周报第八十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革命党怎好希望敌人优容！

越受敌人的疾视，越是革命党的荣誉；越受敌人的优容，越是革命党的耻辱；这本是国民党和进步党根本不同的地方。想减轻敌人（列强与军阀）的疾视与压迫而排除急进分子，这是革命党领袖们应该注意的危机！

国民党与中国革命

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

革命党和农民第一次见面

中山先生在广东农民联欢会演说："革命党为民族、民权两个主义，奋斗了十三年，民生主义十三年总没理过。……今日开这个农民联欢大会，这是革命党和农民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从今日起，要实行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若是不能实行，民

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国民党改组后，几个老党员竟有“亡党”之痛，照中山先生这般演说，不但党未曾亡，并且三民主义的党如今才第一次完全叫人看见。

“亡　党”

主张民族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民族运动表同情；主张民权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民权运动表同情；主张民生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劳工贫农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工人农民运动表同情；因为表同情是局外人底态度，主张一种主义的党，不应该这样滑稽的不负责任。无论是什么主义的党，若党员们都取局外人不负责任的态度，那党也就去亡不远了！若再等而下之，做民族运动恐怕有伤列强感情，做民权运动又恐怕妨碍一部分军阀之友谊，做工人农民运动更恐怕开罪资本家与地主，连局外人底同情态度都不敢表示，那才真是“亡党”呵！

1924年8月27日《向导》周报第八十期　署名：独秀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

（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即或义和团当中及纵容义和团之贵族夹有思想上政治上争执的动机或其他更卑劣的动机，而群众之附和义和团，则由于外力尤其是教会压迫的反应，可以说毫无疑义。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质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

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1924年9月3日《向导》周报第八十一期　署名：独秀

我们的回答

我们因为有促进中国国民党的必要，而以个人的资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似乎于国民党革命的倾向只有进无退，然而正因此惹起了党中一部分党员之误会，攻击；他们不但是口里攻击，还用白纸黑字写出，我们遂不得不简单回答几句，以免社会上有人在误会上又加以误会。我们在此处仅仅是答复他们的攻击，至于他们自己的言行，是否真算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他们党中是否有更反动的反革命的言行，则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以内，所以不必提及。

我们在答复之先，须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根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指责国民党任何党员，开除国民党任何党员，这都是正当应有之事；乃并不依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具体的指责国民党党员某某个人，而竟抽象的笼统攻击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并且因此攻击到在国民党之外的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根本错误。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若主张不肯脱离共产党的人便不许加入国民党，则虽另再召集一次国民党

全国大会，取消前次大会准许共产党党员跨党的决议便得，何苦以有用的光阴与经费，发行许多印刷品，不是攻击帝国主义与军阀而是攻击我们！

以上是提出他们对待我们的根本错误，以下是分别回答他们的攻击。

一切道路传说、报纸记载及个人的谈话与书信且不涉及，现在只取《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这三种印刷品为他们负责的言论。

他们共同的唯一口号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他们所谓破坏国民党的证据、铁证，都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七号团刊所载《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中，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使全中国革命份子集中于国民党"，"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各种工作中我们同志应努力工作"，"使其（指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这类文句，如果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议决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分》的导言上说："国民党主张凡赞成革命的都应一律欢迎入党；共产派则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以成就他们的势力"。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他们已否忘记了国民党宣言上"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

以决胜”这句话？他又说：“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主张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共产派则主张劳资斗争，惟恐国民党对劳工运动有调和的倾向。”劳资斗争是社会进化上一种不可免的革命现象，主张劳资调和是一种和缓革命的政策，无人能够相信不革命的调和政策可以平均地权，可以限制资本，世界上那有这样好说话的大地主与资本家？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后再运用政权以实现三民主义；共产派则处处宣传，叫已觉悟革命的份子往田间去。”国民党固然应该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试问这武力要建筑在什么基础上面？若建筑在已有的军队上面，退一百步说，即令能用他取得政权，也断然没有能够运用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试看现在的广州政府实际上能管理军政财政吗？广州一切政治有一件能根据国民党的主义或政策吗？若要建筑在“国民革命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的原则上面，“往田间去”这个口号，当然不违背国民党的大会宣言。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共产派则主张民族自决，首先就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国民党大会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

题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据此宣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却实不是单单自求解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且郑重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做那导言的人，如果真是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确有细心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若是自己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那导言最终又说：“总括他的意义，可以看出以下四个要点：

（1）一面说赞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一面又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

（2）其中措辞，未免有些污辱纯粹国民党党员的人格；

（3）他们集合许多人们，成立一个共产党，但对于政党道德未免太不讲究；

（4）他们破坏国民党的步骤，第一多拉无产阶级入党，以建筑他们将来的基础，第二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份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三即或革命成功，纯粹国民党员已无能为力了。”

关于第一点，所谓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不知所指何事？若是指反对帝国主义使国民党伤了列强的感情，以后不能安住租界不能亡命外国，则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回答，且亦不必回答，因为国民党大会宣言上早已回答了，国民党孙总理最近又代我们回答道：“中国欲免为印度、埃及之续，必国民合力铲除为革命成功大障碍之帝国主义。”若是指我们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是破坏国民党的左军；我们不相信任何派军阀真能为国民革命的左军，退一百步说，即全说是左军，也只是一时军事的联合，决不

是主义上政见上的妥协。若说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即是全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那么朱执信便是第一个会使国民党岌岌不可终日的人。

关于第二点，我们更不知其何所指。

关于第三点，是他们明白反对共产国际的支部在中国存在，此层前面已经说过。

关于第四点，第一步骤所谓多拉无产阶级入党，若指拉入共产党，此事和国民党无关；若指拉入国民党是破坏国民党，此事我们可以认错，并且在此处可以切实声明以后不拉无产阶级入国民党，免得有破坏国民党的嫌疑。然而这一来，国民党成了什么阶级的党？所谓第二步骤，我们简直不能理解，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既然不过是国民党的左派，为什么必须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才能成立？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此时疾视共产党的，应该只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国民党还不必如此。第三步骤所谓革命成功，自是指国民革命；既然是纯粹国民党员，他们唯一的工作与目的，自然正是国民革命成功，此外，还有何事是他们应该为力的呢？

《民权旬刊》及《护党特刊》中，其漫骂及和上项导言之意见相同者，兹不论及，所论及的只是他们特殊的意见。

《旬刊》上说："吾闻闻共产党员之宣言矣，'国民党者共产党之过程也'。"国民党是何种性质，共产党是何种性质，我们不相信真有这种无知的共产党员说出"国民党是共产党之过程"这样

昏话！他说："吾又尝见共产党之行动矣，有所宣传必以共产为言论，有所进作，无必以共产为张本。"共产党的宣传进作，自应不离共产，这都是共产党的事，与他党无涉。他又比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上有三种不同之点，其比论的错误此处不必论，不同之点并不只此三种此处也不必论，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之不同，此何待论；此处所讨论非两党主义主张不同问题，乃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否破坏国民党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此次大家所纷纷争论的，还丝毫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不同的冲突，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主张不同而冲突，此义不明，决不能了解此次争论的真相。

《护党特刊》第一号上，主张"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不然便麻烦极了。在这些议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未曾研究过各国革命前后的历史，无论是俄是法，当时革命的何止一党；各国的革命党，恒有左、右、中央政见不同，本党和青年组织各别，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若怕麻烦，那便是旧式会党简单的头脑，二十世纪进步的革命党决不是这样。他们说："在一个党里，怎么好谈两种的主义！"我们说：诚然，在国民党里，当然只能谈三民主义。他们说："我们只信服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其他主义，我们不必去做。"我们说：诚然，诚然，我们只希望国民党员不但信服而且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主义，国民党党员当然没有必须去做的理由。他们说："他们要谈他们的主义，不妨在党外去谈。"我们说：诚然，诚然，诚然，只要不是疯癫，决不会有人在甲党内谈乙党的主义。他们说："没有大元帅的命令，怎么好停止军事行动，何况是阻止他。"我们说：

国民党应否集全力于军事行动，乃党中重要的政策问题；若要“以党治国”，不是要“以大元帅个人治国”，则大元帅的命令便应随党的政策而决定，党的政策不应随大元帅的命令而决定。他们说：“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为什么缘故不要妥协。”我们说：民国元年和袁世凯妥协的结果如何？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观念，确想把本党逐渐变为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说：不能把中国国民党属于中国共产党，也和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国民党是一样。他们说：苏俄常常运动帝国主义者通商或承认，也曾向中国宣布白党的罪恶，并要请中国驱逐旧俄的使领，拿这种种举动比较总理的吊电或对外宣言，谁是谁非？”我们说：国家的通商外交行动，和依赖外力解决国内问题绝对不同。苏俄只要求中国不承认驻中国的旧俄使领，取缔中国境内的白党，而未尝请求中国干涉在俄国境内的事；苏俄只于革命成功旧党势力灭亡之后，向一切外国办理国家的外交及通商，而未尝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想借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倾覆旧俄政府。试问中国革命政府统一中国时，不和外国通商吗？不要外国承认吗？仍要各国承认前政府的使领吗？宣布旧政府的罪恶，宣布帝国主义者援助旧政府之罪恶，都是应该的，至于希望帝国主义者否认旧政府而表同情于我们的革命政府，那便万分不应该了，因为国内的事应由自力解决之，无论是非善恶，都不能容帝国主义者左右于其间！况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意义上，国外的帝国主义者，比国内军阀政府是我们更大的仇敌。他们说：“本党联络段芝泉、张雨亭和卢子嘉们，与容纳他们的精神毫没有一致。”我们以为这几句话是再侮辱国民党不过的了，我们不愿回答，我们要求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加以评判！他们说：“本党的民生主义，

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他们别有怀抱，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大喊奋斗！奋斗！我们实在不忍！"我们说：既然要谈民生主义，当然以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重要标准。宣言明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他们竟指斥主张劳动者奋斗是别有怀抱，不知道他们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不幸的事实，也是历史上必然的事实，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正是要消弭阶级；但是，若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意思；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过那非人的生活而不必起来奋斗的意思。"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句话，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如何才能够达到改良之目的，乃是一个问题，由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或是由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我们以为劳资两方面的利益绝对冲突，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希望大地主或是资本家一旦大发善心，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劳动者让步，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权交给民党。民党不革命，如何能得着政权！劳动者不奋斗，如何能改良非人的生活？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够改良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主张劳动者奋斗，却明说：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试问这样的主张改良，是不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而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这未免太忍了吧！他们说："本党主张与苏俄联络，……因为他们凭空造谣，中间才停顿了一

会。……他们矫称接了密令，拿本党的名义做了一次苏俄的留声机。"我们说：为什么要联络苏俄，自然建立在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同情上面，既然言此，为苏俄说几句公道话，也是中国革命党正正堂堂的应有态度，用不着以做留声机自贬。至于什么"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什么"矫称接了密令"这些怪话，希望他们以后不可这样凭空造谣！他们说："他们（指青年团）对于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为什么不受本党的指挥，而受共产党的指挥呢？"我们说：青年团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青年团体，不是国民党所组织的，这个决议案又是在青年团议决的，不是在国民党议决的，自应说受共产党指挥，如何能说受国民党指挥呢！这类团体组织系统及管辖权限，他们也应该弄清楚！他们说："这'不必要的冲突'的话，便含有必要的冲突的意思在话外。"我们说：诚然，若有人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和军阀妥协，主张不为农夫工人利益奋斗，以及其他主张有背宣言的反革命言论行动，我们都应该与之冲突，这正是国民革命进行上、国民党进步上必要的冲突。

他们攻击我们的总口号虽然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而归纳他们所举的证据，明眼人当知道实际争点完全和他所呼号的口号不符，乃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我们的主张不同：

我们的主张

（1）为农夫工人奋斗而拥护其利益

（2）建设革命力量于农民工人等一切民众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尊重蒙古民族自决权

（4）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对国内军阀并重

（5）不与任何军阀妥协

（6）反帝国主义的苏俄是中国好友

他们的主张

（1）反对为工人农民争利益的奋斗

（2）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反对蒙古民族自决

（4）反对北政府，同时可以对帝国主义妥协

（5）与一派军阀妥协

（6）和北政府订立中俄协定的苏俄是国民党仇敌

以上实际的争点，没有一件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之争，更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实在是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左派代表的是民众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

他们解决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他们的本怀。

他们为什么希望他们退出，这很容易明白，现在世界上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莫不极力排除革命的共产派，恐怕共产派搅乱他们妥协和平的好梦。我们明白昔告天下：凡是一个真革命党都不会想到取消别个革命党；凡是一个真革命党人，都没有自己退出一个革命党的权利；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份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份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除非是反革命非革命份子或违背党纲的人！

此外我们还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声明一下，即是他们借所谓京汉路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张德惠的话来攻击我们。京汉路不

享被曹、吴摧残以来，不但总工会的职员入狱的入狱，走散的走散，即各站分会的组织都早不存在了，张德惠竟自称代理总工会委员长，不知他们何所依据？张德惠是长辛店一个工人，他攻击我们，乃是他侵吞京汉恤金数五百元受我们责问的反响；他攻击我們之点，前后都有事实证明，我们在此不必空言与辩。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各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造谣诬蔑各国的共产党无所不至，中国的军阀官僚也正在用这个方法离间工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不要这样！

1924年9月17日《向导》周报第八十三期　署名：独秀

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

“西南自主”乃中国过去内战史上一名词，此名词，乃民国六七年间，由西南数省新兴的小军阀以“暂时自主”的名义，脱离北方大军阀之管辖而产生。先后加入此运动者为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延闿，四川督军熊克武，贵州督军刘显世，和西南数省人民都无关系。随后由“西南自主”一变而为“联省自治”的口号，主其事者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这几个军阀，及附属他们的政客，和人民也没有关系；陈炯明且公然解释他主张联省自治是在以小军阀推倒大军阀。

自“西南自主”到“联省自治”，其性质其内容，都纯粹是南北军阀间冲突的问题，丝毫不是人民与军阀间冲突的问题象“五四”运动与“二七”事件。这种南北军阀间的冲突，和北方军阀自身的冲突（如直皖、直奉战争）南方军阀自身的冲突（如川滇黔战争、粤桂战争）等军阀间的混战，加于人民之灾害，对于国家之戕贼，都是一样；其结果不能产生新的希望，也是一样。

孙中山先生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粘附在利用南北军阀冲突的机会上面，然而民国七年一月炮击观音山，被陆荣廷派逼迫而离粤，这是利用政策第一次失败；民国十二年八月被陈炯明军队逼迫而离粤，这是利用政策第二次失败；最近被滇军逼迫而屈

服于反革命的商团，这是利用政策第三次失败；陆荣廷、陈炯明、范石生、廖行超等这班军阀，他们本来不要革命，他们和北方军阀之冲突，纯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都可在相当的条件之下而投降的，孙中山定要拉他们上革命的路，他们如何不倒戈相向！

我们看透了所谓西南团结其力量乃建立在西南将领上面，这便是新兴的南方军阀之团结，他们顶争气也不过与北方军阀争夺地盘到底，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团结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我们于去年北京政变时，曾指斥“西南团结”是和南方军阀有关系的政客们投机运动，不是革命的方法；我并且面告中山先生“西南团结”不是革命的方法，因为西南将领不但没有一个能走革命的路，而且多是反革命的人物。中山先生回答我的话是：“我的西南运动是自下而上，是要去掉那班将领。”

现在又来了！自但懋辛、石青阳奔走滇黔以后，“西南团结”的呼声，充满了国民党的机关报。据九月二十三日《民国日报》的广州通信，所谓西南大团结之大人物如下：

（一）陈炯明

（二）唐继尧

（三）熊克武、刘成勋、杨森

（四）刘显世、唐继虞

（五）沈鸿英、林俊庭

我们看了这张人名表，好象看了“四杰村”、“八蜡庙”一类的戏报，中山先生能运用这班脚色的势力来做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革命吗？这样西南团结至多只能再闹出一个象民国七年五月七总裁军政府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中

山先生若能事事俯首听命于他们的主张像此次对待商团一样，或者能得着主席、总裁的荣位；若主张民权主义讨伐一切军阀到底，他们便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至于什么离奇古怪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什么离奇古怪的拥护工人农民利益的民生主义，中山先生早晨要实行，他们晚上便请他下野。

我们实不愿看见一个革命的领袖为投机的军人政客所玩弄！

我们大声疾呼：中国国民党若不放弃国民革命的口号，便不应再走“西南团结”这条旧路！

1924年9月24日《向导》周报第八十四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都有就理论上事实上仔细研究并发表意见的必要，慎勿固执"主张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便是破坏国民党"的偏见，硬闭起眼睛不理！

反对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的人，他们所持最有力的理论是：革命党须有军事行动，也须有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 这种理论，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形式的逻辑，至于国民党本身状况及其在中国所遭遇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画符念咒又恐怕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我们有何方法能得着和军阀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说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论，想用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打倒他，不待军事专家，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第二，广州政府现有的军队内容又是怎样？完全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我敢说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并且也还没有相当数量质量的革命党人能在这些军队中宣传活动，能左右这些军队的群众；建立在这些军队力量上的军事行动，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军阀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掳掠搜刮，

连陈炯明、赵恒惕也不曾打倒，而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所谓军事行动（北伐包含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因滇军勾结商团而妥协是国民党的耻辱，然而因为要做军事行动，便不得不容忍这班反动的军队；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反动的西南将领不可与之革命，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实力，便不得不和他们联和；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段系、奉张都是革命党所应讨伐的军阀，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声势，便不得不称他们为友军；这些耻辱的行动，这些错误的政策，都是军事行动所必然产生的，因为此时的国民党除了采用这些政策，本来没有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之可能。然而采用这些政策来做军事行动，不但这些军事行动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为滇军、西南将领、段系、奉张自身便都是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样的军事行动，且可使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宣传完全无效。

应否放弃广州政府，和应否停止军事行动，是两件事不可分开的一个问题，因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

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既没有革命的军队，又没有强大的革命党；因此，在名义上在极少数政府首领的愿望上，是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

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这反革命的军队、官僚与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因此，政府中极少数首领仅仅是有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权能支配所属的军力、财政用在革命的意义上；并没有实权能制止革命政府所万不应做万不忍做的事：开赌，拉夫；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警察、商团压迫工人农民；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官吏和帝国主义者的爪牙商团勾结妥协；这些都是广州政府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若仍要保持广州政府，对内，不但上述各种可痛的状况必然继续下去，而且反革命的军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实现；对外，永远不能抛弃和西南将领及北方一部分军阀妥协的政策。如此，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将使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在全国民众中丧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国民党的力量与注意，事实上必然集中到关于保持这块领土的一切应付，没有余力可以计及全国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即在领土内，亦以军警官吏之横暴，取消了党的宣传效力。本以为有一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而结果实得其反。

总而言之：在原则上，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一个革命党做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并且极热忱的希望中国国民党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实际情形上，我们一方面观察得国民党的内容，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们观察得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力量及国内军阀的力量，

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他们，那更是此路不通！

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神圣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

因此，我们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走这条新路；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分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不断的为这些大民众之自身利益而奋斗，使这些大民众都认识国民党的确是为民众利益而革命的党，的确和军阀派及其他官僚的政党不同；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真实力量。

这样本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变动，反动的右派，在他们自身的利害上当然要反对这种变动；即畏难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赞成这变动之勇气与决心，然而这个变动确是中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革命的领袖们若是看清了这个需要的事实，便应该拿出革命的责任心克服他们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头脑，都被军阀战争及局部政情之琐屑应付的具体问题占领了，没有考虑全国革命所需要的事实之余地，诚然是国民党的不幸；然而我们相信终有大家回过头来考虑这个事实之一日，如此，我们只好改日再谈。

1924年10月1日《向导》周报第八十五期　署名：独秀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此处所称中国国民党，乃包括自同盟会一直到现在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何以如此，根本上自然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原因；而专就革命党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也是失败之原因。

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这种感情的煽动，自然也是革命运动之重要工具；然而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那有不失败之理！当时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是对外收回权利（矿山、铁路等），是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革命党人忽略了这种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而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当时的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满清虐政之直觉，以为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因此清室一退位，革命党便失了革命运动的机能，不但首先叛党之章炳麟、刘师培公然宣言只知排满不知共和，大部分革命党人都减少了革命的热忱，即革命的领袖们也真无法解释一般民众"反对清室退位后继续战

争"的谬误心理，因为当时只有排满的呼声占领了全社会。而且在这单调的呼声中，竟将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即反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掩住了，使帝国主义者安然以巨款援助袁世凯解散革命的势力。当时党人的理论，未尝不是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然而这种转弯的想象，不如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号召民众，当时直接鼓动民众革命情绪的只是推倒满清，所以"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后来袁世凯死，护国运动便应中止；徐世昌逃，孙中山便应下野，都是同样的逻辑。这个逻辑诚然合理，确是不错，只是错在"排满"、"讨袁"、"讨徐"、"护国"、"护法"——直到现在的"讨曹"、"讨吴"、"反直"、"北伐"等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有了这等口号，自然结果到那样合理的逻辑。可是中国革命运动，正是被这合理的逻辑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葬送了！

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革命自然应有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贸然做军事行动，且专力于军事行动，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没有民众的宣传，则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并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及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没有党的训练，当然无法由党的主义、党的政策来支配战时的军事行动及战后的政治建设不违背革命的意义。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自始即失之过早，辛亥革命也因此而早熟而失败了；至于民众宣传方面，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排满的鼓动，兵事起后，连这一小部分的鼓动都停止了，唯一的机关报——《民报》，竟未曾在民党占领的地方继续出版过一次；党人自办的宣

传革命的《民立报》，兵事起后，撰述权竟委诸反同盟会的章士钊之手；军事行动普遍了南方十二省、北方二省，竟无一个正式的宣传机关（《民权报》是天仇个人的关系）。因为官厅禁止出版么？当然不是。因为党中无力供给出版经费么？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党中只看见军事行动在革命上有价值，办报不过是无聊文人混饭吃的把戏，一万张报内也寻不出一兵一弹来，有何用处？从前在《民报》上《民立报》上做宣传工作的党员，兵事起后，都去做了大官，做了伟人，那还肯低头小就来充当什么新闻记者！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这一点，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社会的基础之原因。

即于党的训练方面：当时的右派（首领是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附和官僚派"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说，固属荒谬；而左派首领孙中山、胡汉民、陈其美等又何尝想起召集一个全国党的会议。兵事起后，站在政府方面，开过多少军事、财政会议；而未曾站在党的方面，开过一次会议，决定党的政治主张，来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团结党员，使之一致行动。既然没有了党的政治主张与纪律训练，党员的个人行动及背党行为自然要层出不穷；第一个背叛者便是章炳麟，公然通电毁谤党魁，力主政府北迁，推举袁世凯，非袁无人能统治中国；第二个背叛者便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多数党员，不遵党魁命令，议决政府北迁；第三个背叛者便是刘揆一，为了想做袁世凯政府的工商总长，宣布脱党；自此以后，相继叛党者，若孙毓筠，若胡瑛等，不计其数，几乎可以说是同盟会之袁党化。革命党这种失败，比较军事上政治上任何失败都重大，而且可耻。然而当时党中并不曾把这种可耻的失败看得象军事上政治上失败那样要紧。只专力军事行动而不注意

党的训练，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即现在的国民党仍然不曾抛弃这种旧观念。

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国民党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迹，其原因乃由于地方的经济组织影响到两派政策之不同：左派首领孙中山等，生长在广东海岸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领黄兴等，生长在湖南内地农业社会里，所以抱定了简单的排满理想。这两派革命的宣传，自始也就不同：广东派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民报》上便有一些关于民权、民生的理论；而湖南派的陈天华、杨笃生等，却只有激烈的很流行的排满小册子——《猛回头》、《新湖南》。自从清室退位，右派的理想已实现，遂渐渐表示妥协的倾向；第一步妥协是黄兴在南京政府即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步妥协是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并政府北迁；第三步妥协是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筹商国是，协定什么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美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第四步妥协是解散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步妥协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袁派阁员都临时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内阁。经过这些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这些妥协的责任，大部分固应归之右派，而左派诸领袖，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也是一个问题。直到民

国二年，国民党完全失败，孙中山才公然指责党员不服从他的主张，才断然和黄兴派分裂，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运动。

在这继续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政策，是否因袭旧的政策——采用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等，——仍然是一个问题；左派自身是否也有妥协的错误——郑重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履行条约义务等——这又是一个问题。

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24年10月8日《向导》周报第八十六期　署名：独秀

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

一个党的左右派分化，不但是应有的现象，而且或者是进步的现象。不过近来国民党中所谓右派的反动行为，说他是右派实在还是太恭维了，实在只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走狗；因为如果是国民党的右派，不过是比左派和平些，大体上仍要抱定国民主义，更不能违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更万万不能做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依照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不使享有民权，何况认为党员！

现在这班所谓右派的反革命的行为是怎样？在此次上海国民大会的暴行上，更是充分的暴露出来了。

据上海大学学生通电说："当我们同学洪野鹤、何秉彝、王秋心、王环心、刘一清、黄仁，在会场之下为赞成反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演说而鼓掌之时，台上主席喻育之（国民党党员）便喝令禁止，加以'扰乱会场'之罪名，台下大队流氓，闻声响应，一呼百诺，蜂拥而前，向洪、何、王、刘、王、黄诸同学施以惨酷之打击，同时，并以'这是齐燮元的奸细'之口号诬害我洪、何、王诸同学。……当时恰有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代表郭君寿华登台演说：'我们应当推翻一切军阀一切帝国主义……'话犹未了，该会会计童理璋（国民党党员）即上前将郭君拦阻，扯下演台，……不意童理璋、喻育之辈，狼毒豺狠，猛将黄仁、郭伯和、郭寿华三君一推，竟

自高逾七尺之台，跌至台下硬石上面，一时怆痛之声，惨不忍闻。黄仁君跌伤腰部，呕吐交作，一时昏迷不省人事(次日已死于医院)；郭君伯和跌伤头、胸、足三部，血流不止，多时不能行动；郭君寿华挨打之后，又复加以跌伤肩背等处，时台下流氓，又加以殴打。”

安福部雇流氓包围国会，吴景濂雇流氓打学生的方法，现在挂名革命党籍的人，也居然效法起来，而且被打死打伤的都是些同党的党员，这情形是何等严重！

他们在卢、何势力之下，诬爱国学生为齐燮元的奸细；同样，在吴佩孚、齐燮元等势力之下的走狗，又何尝不可以卢永祥、何丰林的奸细诬爱国学生而加以残杀；这种为一派军阀捧场作伥的卑劣手段，不意挂名革命党籍的人也公然行之，这情形又何等严重！

前此上海执行部坐视右派数十暴徒殴打邵力子而不与以惩罚，纪律废弛，识者早已忧之。我们固然不应该因几个党中下流分子的行动，归罪全党；我们现在只十分注意党中负责任的最高党部，对于此次杀伤十几个青年学生的巨案如何处置；并同时注意各级党部的公正党员，对于党中几个反动分子取如何态度，然后才可以判断党的价值。

1924年10月15日《向导》周报第八十七期　署名：独秀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近来英美人士极口称赞这位基督将军的军队如何优良，青年政治家基督教徒王正廷等如何为冯玉祥奔走联络，这都是新工具登场的广告。

这次英美更换新工具，乃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势力均衡(英美不能完全打倒日本在华势力，日本对英美亦然)和中国军阀势力均衡(直不能完全平奉，奉亦不能完全平直)之故；他们的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即政变中所传天津会议)，并由此会议产生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各派军阀(或加入一二财阀?)首领合作之委员制的政府。

我们百口断定这种结局，不但决不能解决中国的纠纷，而且必然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随后他们当中又必然互相争斗起来，加中国人民以空前的屠杀与践踏。

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呵！自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中国的经济权政治权都渐渐落在帝国主义的列强手里，我们如何能妄想任何军阀的政治行动不受列强的操纵?我们如何妄想他们给我们

吃的任何东西不是毒药而是滋养品？

在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中国人民呵！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凯死了，我们希望段祺瑞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们又希望吴佩孚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结果又失望了；现在曹、吴又倒了，我们若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而且不但失望，譬如毒疮，不施以剧烈的外科手术，弥缝一次，溃烂必更甚一次。

我们与其年年坐着失望，任他溃烂，不如奋起以自力创造和平安定的局面；我们所要的和平安定的局面，决不是什么“排满”“讨袁”、“讨徐”、“讨段”、“反直”、“讨曹吴”、“讨冯玉祥”可以得着，只有扫荡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可以得着！

1924年10月29日《向导》周报第八十九期　署名：独秀

肃清内部

中国国民党，在党内，在广东境内，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

民国二年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决心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此次国民党于无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动分子，他们随后形成了一个政学会。民国十年中山先生和买办唐绍仪决裂，此次国民党又于无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动分子，他们随后形成了一个民国十一年的益友社。虽然经过这两次无形淘汰，而并未曾经过一次正式的洗党，因此留在党中的反动分子仍不等数，他们的反动性，由全国大会宣言发表后，党中革命的空气日益浓厚起来，逼得他们反革命的言论行动也日益鲜明起来；其事实略见国民党全体执行委员会提出，常务委员会通过之整顿纪律案如下：

"《民国日报》记者说中国人并不愿侵犯外国已得之权利并拒绝登载废约运动的通电；顺德县长兼国民党分部长周之贞，以擅立农会罪名拘捕农民领袖；广宁县长兼国民党分部长李某，煽动土豪所组织的民团摧残农民协会；兵工厂长兼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马超俊，不惩办凶殴工人的护厂队长，反而破坏工人组织俱乐部；粤汉铁路局长许崇灏压制要求发给欠薪之工人；公安局长兼广州市党部委员吴铁城，派警察禁止圣心学校学生反抗帝国主义之罢课，左袒

枪击酒业工会之商团，为助工头压迫人力车夫；市长兼市党部组织部长孙科，命警备队恶打请愿免捐之轿夫并不准轿夫入党；代理省长兼市党部监察委员陈树人，竟执行法国领事命令，派员查办圣心罢课学生，并在洋教师前大声呼喝立拿劝阻教员上课者；中央监察委员张继，曾公然说反对帝国主义为本党之错误。"

此外若统率商团军反抗政府的陈廉伯、陈恭受；若为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出头摧残工人的李援、邝公耀；若利用流氓杀伤十余学生的童理璋、喻育之等；若在沙面罢工事件中，在商团反叛事件中，许多力谋和帝国主义者及商团合作的军人政客；他们不但挂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并且自称是热心护党的党员。

其实这班党员留在党内，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倘真欲护党，只有肃清内部之一法。

说到广东境内的政治军事问题，目前也非注全力于肃清内部不可。反革命的商团虽然打退了，而广州政府所受反革命势力牵制的危机并未曾稍减；第一是心腹之患的范、廖等军；第二是各县绅士大地主所统率的乡民团；第三是久据东江的陈、洪、林、叶各军；广东境内这三种反革命的势力，随时都可以单独的或结合起来向北勾引直系，向南勾引英国帝国主义者，最客气也是"请孙下野"。因此，我们总以为国民党目前重要的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境内的反动势力。自己内部一蹋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

1924年10月29日《向导》周报第八十九期　署名：独秀

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

自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直到现在，在中国也和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有许多人把他看做洪水猛兽。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误解呢？一般的总原因，是观察力薄弱的人们误信了各帝国主义者的通信社、新闻纸之造谣诬蔑及反革命的白党（旧俄之贵族、大地主、军人、官僚、社会革命党、少数党、无政府党等）之奔走呼号；其次乃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加旧俄皇室以重创，此事大伤了宗法社会里人们的感情；再其次则是新俄宪法，剥夺了以资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贩之参政权。在第一个原因，本来毫不足怪，因为新俄一面自已放弃了旧俄的帝国主义，一面拒绝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之侵入，帝国主义者自然要造谣诬蔑他，可是我们被帝国主义者欺压得不成话说的中国人，也竟然误信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新俄，未免认不清敌与友了。旧俄贵族失了特权，大地主失了土地，军人、官僚失了权位，社会革命党、少数党、无政府党失了和资产阶级苟合的可能，他们奔走呼号也是应有的事，可是特权阶级以外的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却没有同情于他们的必要。在第二个原因，象张勋、辜鸿铭、康有为这等复辟保皇的人们，自然应该太息痛恨俄之布尔什维克党人悖伦灭理，而稍有进步思想的人，却应该承认俄人取法于法人处置路

易者处置尼哥拉士，断绝后患，善于中国人之处置清室。只有第三个原因，自有史以来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之特色，这个特色自然为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所不喜；然而在资产阶级幼稚的中国，大一点的资本家与地主在国民中真是少数又少数，小资产阶级若手工工业家、小商人、自耕农，都被英、美、日、法等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商业挤得濒于破产，生活艰难，也应该行向革命才是生路。

再由积极方面，说到十月革命的俄罗斯之真情实况，因革命而得救的，第一是占国民十分之八的农民得着了土地，其次是工人得着了政治上教育上的优越权利，再其次是科学者、技术家得着了最优的待遇，就是小工业家、小商人亦因受国家企业之雇佣，免了被大资本企业压迫的忧危，吃亏的只有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等最少数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真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的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更有一个重要的主义是：在国内保障全俄人民经济生活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而独立，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一个有力的暗示。

中国的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比俄罗斯更是少数，其余最大多数的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所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欺压，比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民所受的更是厉害多少倍；因此，我们以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应该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而不应该误信谣言把他看做洪水猛兽！即令他对于帝国主义者、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是洪水猛兽，而俄罗斯最大多数人民却已由他而得救了！

1924年11月7日《向导》周报第九十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的政治态度

国民党的分子本来复杂，遇了现在这样复杂的政局，各派分子对于政治的态度，自然不会一致。兹假设其不同点而略评其得失。

此时中国的一切政治局面，都是各帝国主义者及各派军阀暗斗明争循环起伏的局面，只有革命的大民众之长期的暴动，打破此循环仍旧的局面，别开一新局面，是唯一出路。放弃政权与军事行动，从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对于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不放过每个争斗；这是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所应取之上策，因为中国只有此策可救。

或以为此策迂缓而难行，就现有的政权与军事势力，对各派帝国主义与军阀，采用一时攻守缓急不同的策略，或利用军阀中的反抗派推倒最反动的军阀，以进展革命的势力，或参加军阀会议，发表己党的政治主张，暴露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阴谋于全国民众；此种行动，虽不能根本打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循环起伏的旧局面，而却是革命的行动，可以算是中策。

若是绝口不提反对帝国主义，绝口不提打倒一切军阀，对于与己党有关系的军阀战胜他派军阀，便视为革命之胜利，以为他们的胜利可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无须革命，不惜牺牲己党的党纲政纲逢迎军阀，怂恿己党党魁无条件的与军阀合作，与帝国

主义妥协，以冀在政权上分得若干余沥；这种下流的政治态度，不待言不能救中国，并要葬送国民党的生命！

在广东之政治态度也是如此，毅然抛弃政权，从民间去，乃是上策，因为右派与军阀利用政权压迫工人、农民，剥削小商人，不抛弃政权，民间大不欢迎；或以事实上无法即时抛弃政权，则即利用此政权，肃清境内种种反动势力若商团、乡团、善堂不法的军队等，停止种种弊政若开赌、杂捐、拉夫等，这也不失为中策；至于日与各种反动势力妥协牵就，以保此背革命而行的政权，实是下策！

国民党将来在历史上的荣誉至何程度，当以其政治态度采用此三策至何程度而定。

1924年11月12日《向导》周报第九十一期　署名：独秀

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

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

我们为什么并且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这是因为国民会议比较的形式严重些,决非三数月甚至半年所能正式开会,在此半年中,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暗斗明攻所加于中国之损失与危机,无法遏制;所以我们不但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并且看清此会议单是议政机关还不够,应该同时是执政机关,主张即以此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政府之职权,以期中国政权即由摄政内阁奉还于人民。今不幸段祺瑞怀抱"北洋正统"的旧观念,竟不待预备会议之召集,硬以军人拥戴,入京自为执政,自己颁布临时政府制,以延军阀政府将坠之生命。国民党领袖们及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即令能容忍段祺瑞这种专断的事实,亦应严厉的督责他马上召集预备会议,马上将摄政内阁给他的政权奉还人民——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

毫无法律根据的临时执政政府延长一日,即为中国加增灾难一日。

在外交上说起来,往事且不提,军阀政治的根性是必然要丧权误国的,何况段祺瑞在战争中所受外力的援助及最近对外的

表示，他的执政政府延长期中，所谓战争中损害赔偿，所谓金佛案[①]，所谓无线电台合同，所谓保障外人已得权利，甚至于所谓参战借款转期案，都会为了执政之承认和东交民巷公平交易。

在内政上说起来，如果是革命的苛迭达，吾人自然没有理由绳之以法，至于反动的苛迭达，每酿成政治上极大的扰乱，吾人应许拘泥成法(指民国临时约法)等犹彼善于此。段氏对外态度之妥协，对内破坏摄政内阁差强人意之设施——修改优待条件及监视清帝，压迫反曹之国民军，恢复安福系、交通系之政权，没有一件事能够表示丝毫革命态度，所谓"彻底改革"，所谓"更始为宜"，只是毁法以便私图之饰词。这种非革命的毁法，不但无与于政治的革新，且足以使反对派假护法(指民国约法)以争政之机会，造成将来的乱源。

欲救此对外对内之危机，只有一途：速开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现在的临时执政奉还政权于人民，即以此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国民政府的职权，国民会议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团就是此临时政府处理各部行政的首长。

1924年12月3日《向导》周报第九十三期　署名：独秀

---

① 即金佛郎案。1922年，法国政府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名义上为中法两国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作诱饵，要中国政府变更偿付庚子赔款的办法，以硬金(即金佛郎，这时法国佛郎纸币贬值，实际上并无金佛郎货币)计算，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消息传出，全国反对。法又邀同意、西、比三国向中国要求以金佛郎计算。1925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接受了法国的要求，改为照美金计算。

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运命

“真金不怕火来烧”，所以孙中山先生此次入京虽然是一个“险途”，在革命党的态度上自不应避免不去，至于他是否真金，此次一烧便能明白。

无论孙中山先生还没有什么实在的力量，然而在中国政局上，却常常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感觉不安，拒绝他呢，还是拉拢他？

此次中山由广东而上海而日本而天津，到处都有民众的欢迎。在这些欢迎声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民众革命的情绪正在发展；他方面因此更使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由惊恐而各逞其拒绝或拉拢之技能。英美帝国主义者自然是到处拒绝他，而日本及段祺瑞为支配全中国计，是想拒绝与拉拢互用，使中山在投降式的条件之下和他们合作，我们所谓“险途”即此。

民众为什么欢迎中山先生，不用说是因为他屡次宣言主张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段祺瑞、张作霖为什么拉拢孙中山，只要不是痴子，便不会说他们拉拢孙中山和民众欢迎孙中山是一样的意思。这两种意思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还是接受民众欢迎的意思，还是接受军阀拉拢的意思，这是中山先生脱离或陷入此“险途”之唯一标识。

换句话说，在民众方面，正在帝国主义利害意见不一致及军阀分裂动摇的时机中，力图发展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中央在地方都要求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政治；在军阀（段祺瑞）方面，正在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恢复其势力，并且想邀英、美、法各帝国主义之同情集中其势力，复兴其军人狄克推多的政治。前者是终得胜利之坦途，后者是残灯复明之迷梦。这两条道路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若走前一条路，便应始终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即退让一万步，亦不应因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压迫或拉拢，而放弃其最近宣言中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国民会议两个最重要的主张，这乃是国民党与国民合作；若走后一条路，便是中山抛弃其主张，自食其宣言，实现所谓“孙段合作”。

或以为在孙段合作的情形之下，也可以实现中山的主张。这种想头未免太滑稽了！段祺瑞以前的政治罪恶，如亲日卖国，滥借外债以蓄私党，妄开兵祸以除异己等，都姑且不论，请看他现在的行为：

一、以安福派垄断政权如李思浩为财政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吴炳湘为北京警察总监，姚震为法制院院长，姚国桢为烟酒督办，曾毓隽为税务督办，丁士源为公债局总裁，王揖唐为安徽省长。

二、任安徽姜案正凶刑事通缉未取消之倪道烺（督军团首领倪嗣冲之侄）为凤阳关监督。

三、反对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纵清废帝出逃外国使馆。

四、起用全国公认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为参政。

五、宣言“外崇国信”，即是明白答覆列强保障外人既得权

利之要求，亦即是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

上列诸事已充分说明段祺瑞纵庇群小卖国乱政的行为，丝毫未改。他正在拿“外崇国信”这份厚礼乞怜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援助，以恢复并巩固其安福群盗之旧日江山，他将要受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指使，压迫各阶级民族解放的运动，并且已经阻止孙中山在京津之演说及欢迎，他对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尚且骂李石曾少年胡闹，他对于废除洋大人之不平等条约更说是乱党过激的主张，希望他修改不平等条约，只有修改廿一条为廿二条，希望他召集国民会议，除非是军阀官僚的国民会议来选择他为正式执政。

军阀们牺牲民族的利益，以结帝国主义的欢心，以保其权位，这本是常态；国民党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奋斗计，揭破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阴谋与罪恶，这也是常态；军阀失其常态，便不是军阀，国民党失其常态，亦不成其为国民党。国民党与国民合作是坦途，国民党与军阀合作是陷阱，中山先生将何去何从呢？“不怕火烧才是真金！”

1924年12月10日《向导》周报第九十四期　署名：独秀

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中国政局

年来中国政局之变动，都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动力，不是由于人民的动力，民主政治决非没有人民的动力而可以实现的。

英、美帝国主义者之工具——曹、吴等直系军阀倒后，中国人民得了表现其力量的机会，并且已经有了开始表现其力量的事实，例如各省由人民团体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最近上海促成会成立大会之宣言，已看清中国政局有两个可能的倾向：一是人民取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一是军阀恢复其势力，武力专政，继续卖国乱政，引起战祸。他们这种见解是很对的。

我们并且要告诉全国民众：此时政界之领袖代表第一个倾向的是孙中山，他背后是各省要求民主政治的民众，他们的目的是：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外国势力之宰制；

（二）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利益，脱离军阀政治之蹂躏。

代表第二倾向的是段祺瑞，他背后是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的目的是：

（一）保护外人条约之权利与特权；

（二）承认金佛郎案；

（三）承认无线电台合同；

（四）由外力援助军阀统治中国人民，排除中国革命势力，使中国永远在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宰制之下。

这两个倾向是很明显的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呵！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呵！全国要求国民会议与民主政治的民众呵！其速速集中你们的力量，决死反抗第二个倾向，为第一个倾向奋斗！

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间的新勾结已就成熟，倘不由人民的动力破此新勾结，则今后的中国仍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世界，所谓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都没有丝毫希望呵！

1924年12月17日《向导》周报第九十五期　署名：独秀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当时所谓士大夫（即智识阶级与官僚），受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康有为入北京上书变法救亡并设保国会，而翁派势力大张，翁、康互相利用，结托清帝，遂造成戊戌变法的局面。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在这四个运动中，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不象什么西南"护国"、"护法"都是南北军人间的互斗。不但没有民众参加，而且

没有丝毫民族对外的意义。

“戊戌变法”运动，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种方法，其目的乃是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其动机乃由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而起。这次运动的优点有二：(一)当时所谓变法维新，较前此老维新派李鸿章等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鸿章等退为当时之守旧派。(二)当时之变法维新运动，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变化，即学术思想上也生了大变化；所谓思想上的变化虽然不出孔教范围，而因为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遂使孔教教义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张之洞、叶德辉等之护教派。张之洞著《劝学篇》，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均以明伦卫道之正统自居，斥康、梁为异端邪说；这种辩论，使远在此前汉学派今古文之争扩大到政治上学术思想上普遍的冲突。

这次变法运动的弱点亦有二：(一)变法维新的内容，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因此，遂引起后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二)变法维新的方略，未曾在社会上坚筑改革派民众组织的基础，专恃以清帝的威权行之，当时的改革派不但没有抓住社会势力，并没有看清包围清帝之亲贵——统治阶级对他们作战的力量，因此他们遂至为袁世凯所卖，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妥协性，使他们忽略了民众的组织，使他们忽略了革命的准备，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一次给我们的教训！

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反动，日甚一日，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国，尤其是北方穷苦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之生活困难与失业增加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外

货输入)成为正比例;同时,清廷一方面对内厉行反动政策,一方面图结外人之欢心和缓其责难,保护外人及教堂之严令,纷如雪片的颁布到各县各镇乡;因此,遂酿成"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

思想简单的北方农民及失业的游民无产阶级,凭了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中日战争割地赔款,洋货充斥物价飞涨,教堂教徒势力熏天,政府因仿办洋学堂、洋船、洋枪炮等增加租税——这些多年的直觉,遂由白莲教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变而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恰当此时清廷反动的政局日趋极端,无论如何媚外,终不免外人借口要挟的责难,至外国容纳亡命的改革派,尤为清廷愤恨,及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延及直隶、东三省,端、庄、毓贤、刚毅辈遂思利用之以铲除外人干涉,以偿其尽量反动之大欲。

义和团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义和团真正缺点是:(一)只是冲动的暴动之一群,而没有相当的组织,致一败而遂瓦解;(二)与反动派合作而为其利用,致失社会上进步分子的同情。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二次给我们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之失败,在国民运动上遗下两个极大的影响,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恶与昏庸,戊戌以来社会上所谓维新党,

分化为立宪与革命二派，这是好的影响；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协性的知识阶级，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传，以排外为野蛮为耻辱，损坏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精神，这是恶的影响。这个恶影响为害于国民运动至大，远及于辛亥革命一直到现在。

自义和团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宪与革命之辩论，纷起于侨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识阶级；同时，内地之商业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权利收回"运动亦轰然特起，最著者，若对俄之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若对美之粤汉铁路收回运动；若对英之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沪杭甬路拒绝借款运动，苏、直、鲁、津铁路废约运动；若对法之滇矿收回运动，拒绝沪、绍航权运动；若对比之收回京汉路管理权运动；吉林、河南、四川都组织了保路会，成了大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遍于全国，明明是对于帝国主义者依辛丑条约向中国经济进攻之反抗。当时的革命党，应看清廷乃是当时革命运动之唯一动力。

当时立宪与革命两派之争，前者是希望清廷的宪政来改造中国，后者是主张以革命的势力来改造中国，立宪论实在是当时一部分妥协的知识阶级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结果，也未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这并不是革命主张之错误，乃革命方法之错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

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三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

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加[对]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情态，并且还有一部分领袖有求助于更险毒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倾向；此倾向，发展到华盛顿会议时，更恶化了全社会。(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均因在“以武力和北方争地盘”的旧政策内，或更周旋于分赃的南北和平会议，并未看清中国革命之真关键——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国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势力，他们对于学生运动取了旁观态度，甚至有一二领袖还加以怀疑或非难；在北方的青年领袖们根本上没有革命性，不但临事脱逃，并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号“读书求学不问政治”。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懦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四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

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争斗或民族争斗，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自海员罢工至镇压商团反革命（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罢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三月五日），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

在此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英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由海员罢工胜利起，至京汉路工“二七”惨剧止，这一年中，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攻时期。由香港、广东而上海而长沙而萍乡而武汉，沿京汉、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关，罢工与工会运动，震动全国，使军阀、官僚、资本家侧目而视。

工会运动中，比较有力的是铁路工人，京汉、京绥、正太、粤

汉、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组织，京汉尤比较的完备，而军阀官僚对之也尤为嫉视。

当中国工会运动最高潮中（民国十一年西历一九二二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镇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远东被压迫的民族进攻了；同时，新兴的直系军阀正抱了武力统一的野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之非难，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工之惨剧乃起。

“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七”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同时向工人阶级进攻，各省(广东、湖南除外)工会或解散或改为秘密的小组，全国工潮一时遂低落下去。

广东虽无多产业工人，而一般劳动群众因为处在五六年来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统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会结社之自由，较之有强固组织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之大都市产业工人，反能发挥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国工潮低落之时，广东劳动群众不但能固守阵地，最近还能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得到了胜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实际上只是取缔华人，这本是对于中国全民族的耻辱；然而罢工抗议者只是被雇的工人与警察，商人毫无表示，而国民党右派党员，反有和英捕房勾结欺骗工人妥协者，幸而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并力持不妥协态度，香港海员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者终至让步。

广东商团乡团，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最近各县商乡团且联合在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指挥之下，阴谋推翻孙中山政府。他们曾勾结国民党右派军人以罢市要挟政府发还了私运的枪弹；他们自己说后面有英人援助；他们自己说奉了曹、吴的命令；他们居然以武力拦阻国庆日游行庆祝的市民，杀伤了工人、学生数十人；罢了市不算，还号召各属商乡团集中广州，对政府及工人取攻势；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联合各校学生及陆军学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和商团对抗；孙中山因民众之奋起，遂毅然排弃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以武力击散商团军，没收其枪械。

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四期　署名：陈独秀

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

民选官吏，在理论上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在事实上亦为中国时势之急要。他省且勿论，眼前最急需民选省长的：若江苏、若浙江、若安徽、若江西、若湖北、若直隶皆是。

江苏省长现为卖省附齐的韩国钧，彼纵无耻恋位，亦必为苏人所不容；浙江省长现为卖省迎孙的夏超，浙江人如不自动的去孙与夏，将无以拒卢永祥南下之师；安徽省长现为安福首领王揖唐，安徽若容其久任省长，将使安徽人重复统治在公益维持会之下；江西现尚无省长；湖北之萧戕省媚吴，举国共仰，此贼不去，鄂人之耻；直隶已成曹国，曹今倒，万无再听曹之爪牙扬以德真除省长之理；中国政局倘不能即时进入较清明的政局或最反动混乱局面，上列各省省长都必然不能久居其位，他们虽然能指使一班走狗拥戴，若东南大学教授之拥韩，若湖北招牌公团之拥萧，决与大多数民意无涉。

惟省政府地位变动后，继任之争夺必然要起纠纷，欲解决此纠纷惟有省长民选，并且民选机关，应不由现有的省议会，而由各市各县的人民团体，自动的组织和国民会议同性质的省民会议。

我们固然知道各省现有的小军阀又盘据省政府的官僚，他们都会以权力、金钱制造省民会议或压迫省民会议以取得政权；

然而各省的革命份子及爱省的民众，决不可因此便放弃其地方的政治争斗，目前只有此争斗是北方的政治争斗之发足点。

我们要求民选省长，须认清性质只是民选省长，万不可牵扯到什么“联省自治”，或什么“某省人治某省”这些昏乱方法。“联省自治”是一班小军阀巩固其现有地位的口号，和民主政治的民选官吏权、地方自治权都风马牛不相及。“某省人治某省”，也和省民的权利无关，那省人没有军阀官僚，请看苏人治苏的韩国钧、鄂人治鄂的萧耀南、湘人治湘的赵恒惕就是榜样。

我们要将民主政治实现于地方政府，我们要得着民选官吏权，只有号召省民会议实现民选省长是正确的发足点。

1924年12月24日《向导》周报第九十六期　署名：独秀

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

资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本地商人中造成一种买办阶级，不但为他们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并且为他们和本地政府间买卖铁路、矿山等利权之中间人。这些买办阶级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为了他们主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不惜破坏本国的国民运动，卖掉自己的国家。他们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发了财，有了货栈，有了大的百货公司，有了银行，甚至于有了矿山、轮船、铁道公司，在本地商人中俨然是商人贵族。

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商业畸形的发展，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比国内任何商业、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都大，除了帝国主义者，他便是中国经济之王，岂但是商人贵族！

此时多数中国国民都要求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来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政府都想制造一个官僚政客的国民会议，来愚弄中国人民。商人阶级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怎样呢？中等商家、小商人和商人贵族（即买办阶级），他们的经济基础不同，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就两样：中小商人和工人、农民、学生同样的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剥削压迫；因此遂同情于工、农、学生对于国民会议之要求而参加其运动；商人、贵族寄生于两种方法之上，一是辅助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一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因此他们决不协同工农阶级为

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反是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军阀谋更进一步的勾结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只电求段祺瑞许他们自己加入国民会议，而不肯协同民众做要求民众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运动；他们只协同教育界、贵族和英探何东爵士合作，而不愿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小商人及工人、农民、学生等下层阶级群众合作；这就是说明他们不是为了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众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乃是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便是帝国主义者和商人贵族共同的利益——输入外资发展实业。外资势力下之实业发展，即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之发展，中国的实业即国民经济之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工业等——将随外资势力之发展尽入外国帝国主义者掌握之中，而中国民族永远是他们经济的奴隶。真正有助于中国自己的实业发展，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为国定关税是必要的；然而买办银行等商人贵族却不赞成收回海关，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海关在外人手中，内债本息的担保才靠的住，存在他们手里的债票才不至跌价。

总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商人贵族本是因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发生而繁荣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即是他们的利益，他们宁可牺牲国家主权与国民利益，而决不肯侵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特权与利益，他们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可以和军阀妥协的，他们所不愿与妥协的，只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众。因此，在将来的国民会议中，这班商人贵族是站在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利益方面，还是站在国民的利益方面，我们由他们的阶级性即他们的经济基础上可以推知的。

1924年12月31日《向导》周报第九十七期　署名：独秀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

大家意见不同，甚至于利害不同，据理争辩或据事攻击都是可以的，造谣中伤是不可以的。但是世界上往往有一种人为了一种政治的作用或自觉的不自觉的由于阶级的利害关系，急于要攻击他们的敌人，而一时又寻不着敌人错处，于是遂不得不出于造谣中伤之一法。

现在有一班人对于我们大肆其造谣中伤的手段，也是出于上述的心理。攻击我们底人们，若能指出我们实在的错误，我们是应该感谢的；或者是指出疑似的错误，我们也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答复他们。可是他们现在所攻击我们的纯粹是造谣中伤，而且出乎情理之外的造谣中伤，令我们不得不对于他们造谣中伤之原因与心理加以解释。

他们的谣言有重要两点：

（一）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这个谣言远在二三年前，造谣言的人，本是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辈和几个所谓无政府派，王、谌二君虽然不承认曾造此谣言，而无政府派的宋仙却有一封致郑州工人的信可以作证。我前年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时，华探杨某曾于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谣言，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同时，他们并在《四民日报》（复辟党和无政府党合办的报）

上，大造其谣言，说我假借工人名义向俄罗斯骗钱。最近又有国民党右派分子马素，在上海南方大学演说，也公然攻击我们，大意是说我们为了俄国的金钱才相信主义。我们现在的答辩是：第一，我们是第三国际的支部，向来未和苏俄发生直接关系；第二，第三国际本部自己的用费全靠五六十国的支部供给，断不能够有巨款津贴到很小的中国支部；第三，无论是苏俄或是第三国际，主持的人不但不是瞎子、聋子、痴子，其综竅名实，并非糊涂的官僚之类，而且常有代表在中国，中国党人决没有事前借名骗钱，事后脱卸责任的可能；第四，我们在国内国外所代募的京汉工人抚恤款均交由救济委员会支配，比由该会付原捐款人以收条，所有收支详数，该会不久必有一个负责的报告；第五，我们若不是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若是为金钱所驱使，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弄钱的道路很多，并不须十分不要脸的去骗，舍此不图，而却要假借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所压迫所厌恶的主义去骗素称纪律严肃的第三国际或苏俄的钱，未免南辕北辙了；第六，或谓苏俄为外交上的鼓吹收买我们，大家须知道苏俄若取以金钱帮助外交的政策，只需贿买外交当局及大的新闻已足，收买我们无权无位的党人有何用处，并且苏俄对华外交，是遵守列宁“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与不取”的政策，他们拿种种权利与特权换一个空洞的承认，实用不着我们为了帮助鼓吹，至于我们主张蒙古民族独立自治，乃是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不是为了俄国，西藏、青海等处的小民族若有独立自治的要求，我们也一样与以同情。

（二）说我们勾结吴佩孚陷害工人。从前章炳麟说黄花岗之役，是黄兴勾结张鸣岐，受了数十万贿金，送革命党人至广东，以便一网打尽。天下事无独有偶，现在又有人自由造谣说曹、吴惨

杀京汉工人，在汉口逮捕工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陷害的。我们的答辩是：第一，试问我们为什么要陷害工人？第二，京汉惨杀案中我们的施洋同志也在其内，汉口被捕人中我们的刘芬、许白豪同志也在其内，而且株连到北京同志张国焘数人，岂有我们自己陷害自己之理？第三，我们反对吴佩孚，远在直奉战争后，到了京汉工人"二七"惨剧及汉口党案发生，我们攻击曹锟、吴佩孚，比中国任何人都厉害，别的不说，单在本报上就可以随便寻出这类材料，试问有没有这样勾结吴佩孚的可能？第四，现在保定狱中的京汉工人都出来了，请问当日罢工情形，是由于工人因开会受压迫而动了公愤，或是由于我们煽动陷害？若说我们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和援助罢工的工人是陷害工人，我们便没有答辩的必要了。

这两个谣言若是真的，我们便应该枪毙，岂但是区区名誉问题！因为他们所造谣言这样不近情理，我们向来以为没有和他们辩论的必要，可是现在有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上海一两家反动派的日报，利用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谣言，来做帝国主义者在华报纸攻击我们底应声虫，因此我们不得不答辩一下。

各资本帝国主义者，无论欧洲、美洲或在亚洲，本来都是利用许多工具，造出许多谣言，中伤他们的敌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中国的政策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在中国，他们不但要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并且还要造谣攻击国民主义者，因为国民主义者在中国有了势力，也是他们的不利，国内一班反动分子，遂于有意或无意中做了他们的工具。造谣中伤我们底人们，即或自己不肯承认是有意做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意的做了帝国主义者之工具了，因为他们造谣攻击我们，帝国主义者是要举起双手赞成的。

并且造谣中伤我们的人们，还有几种特别心理：(一)他们以为攻击共产党，必能博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资本家各方面的同情，于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大有利益；至少也可以免得过激嫌疑遇着压迫，他们在天津欢迎孙中山时散传单攻击我们，虽然一时疑被外国巡捕误会捉去，随即讯明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人而释放了，这便是一个证明。(二)他们以为骗钱在中国社会是最足以动人猜疑的事，陷害工人是工人阶级所痛恨的事，这两种谣言一传布，我们在工人中在一般民众中便不能活动了。(三)他们以为我们伏在各种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任他们如何自由造谣中伤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象他们时常公开的拿延请大律师向资本帝国主义的法庭控告来威吓攻击他们底人。

至于他们所以要造谣中伤我们之各别原因，我们也要指明出来。马素这等人，全身都装满了大美国的空气，一回到中国来，眼见孙中山及国民党居然冒了赤化嫌疑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他自然要气得发昏，自然要借着中伤我们的谣言来骂着出出怨气。反革命的无政府派，他们无论在欧美或中国，都是帮着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等反对共产主义者，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即是公开的向黑暗势力告密，张德惠造谣攻击我们，是因为他侵吞京汉工人抚恤费数百元受我们责问之反响。郭寄生、王光辉是要欢迎官僚的国际劳工局代表亨利老爷的，他们造谣中伤我们，更是他们的义务。

最近看见郭寄生、王光辉在上海报上登给我们的启事，没有资本家给我们钱登告白打官司，现在我们只好顺便这里答复几句：他们启事中所指何事，我们不大明白，实在无从答复；惟他们劝我们洗心，我们以为我们若自问没有和杀害黄庞的赵恒惕、实

步程妥协及为南洋烟草公司利用这等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实，便心安理得，另外用不着洗心！

1925年1月7日《向导》周报第九十八期　署名：独秀

列宁与中国

——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

有许多中国人及其他各国许多人，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以为这个布尔什维克首领列宁，不知是什么一个极恶穷凶的怪物。其实这完全是幻想。列宁的外表，象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象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贮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他不但同情于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指导全世界的阶级争斗，他并且同情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指导全世界的民族争斗。释迦佛说：要普度此世界众生于他世界；列宁说：要为此世界人类中被压迫者脱离被压迫地位于此世界而奋斗。我们若要指证释迦佛所说他世界在何处及超度了多少众生到那里，便未免太滑稽了；而由列宁奋斗所解放之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已经分明在此世界中令我们看见了，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工人、农民之解放及苏联境内小民族之解放与夫近在远东民族革命运动之勃兴。

欧洲人对于远在亚洲东方的中国，或视为不可知的秘密国，或视为一大群未开化民族所聚居的地方，一任其传教师、外交官、远征的军队与商人明欺暗算，而漠然无动于衷。独有同情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列宁，他对于远在数万里外的中国近代重大事

变及在这些事变中所受欧洲各国的欺凌，无不注意到，无不严峻的批难到，他并不宽恕他本国（俄罗斯）政府欺凌中国人之罪恶。

自从义和团事件起，列宁即表示深厚的同情于中国人，攻击他本国政府非常严厉，当时他曾在《火星报》上说："俄罗斯与中国战争（即指义和团战争）已告结束，为这次战争调动了许多军队……对于那班暴动的中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武装的中国人，加以剿灭、弹击，无量数的妇女儿童，都被惨杀，其苦何堪！至若农村居民商店之被蹂躏抢劫的状况，更是不用说了。……今日欧洲资本家贪欲的利爪又伸入中国了，且现在力求满足私欲的俄罗斯亦转入这个漩涡之中，并已割据中国的旅顺口，由俄兵保护，在满洲公然建筑铁路；同时欧洲各国政府，相继而起，大家都热心来做抢劫中国的事，冲动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观念，由是将中国的土地，或占据或租借，事实上就等于欧洲各国政府（俄罗斯居其首位）已开始瓜分中国；可是他们瓜分中国不是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而是和暗中偷窃人家坟墓中的死人一样。假若被偷的死人稍有反抗的表示，他们就如猛兽一般，烧毁其村庄，驱逐于海洋，或将赤手空拳的居民和其妻子，枪杀刀杀，毫不加以姑息……如现在报纸（指俄国报纸）又鼓吹兴兵反对中国，加上中国人是'野蛮黄种'、'仇视文明'的罪名。……那班无耻的新闻记者，屈服于政府及金钱目的之前，故意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鼓励民众轻视中国。"

列宁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也表示满腔同情，当时他曾在《真理报》上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得到自由了，对于政治生活已经有觉悟了。可以说，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经由沉睡转到光明、活动、奋斗的路上了。此事对于文明的欧洲是不发生关

系的，甚至法国至今还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欧洲这种冷淡的态度，用甚么可以去解释呢？原来在西方各处都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统治，这资产阶级四分之三已经腐朽，对于任何一个野心家，只要争得反对工人之严厉方法及一个卢布有五个戈比的利息，都愿把自己所有的文化卖去。这个资产阶级把中国只不过看成一块肥肉，这肥肉自从被俄国亲热的拥抱一下之后，现在也许要被日本、英国、法国等撕碎了罢！"

列宁对于列强扶助袁世凯造成中国的反动政局，也曾在《真理报》上攻击过："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掠夺中国，帮助德谟克拉西之仇人，中国自由之仇人。……中国的新外债（是指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反抗中国德谟克拉西的，因为欧洲帮助袁世凯，他原来是预备实行军事专政的一个人。欧洲为甚么帮助他？就是因为可以分点利润。中国借了二万五千万卢布的债……假使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债呢？那时先进的欧洲就要大声疾呼甚么'文明'、'秩序'及'祖国'了！那时就要装着大炮，与野心家黑暗势力的好友袁世凯联合去压迫这'落后亚洲'的共和国了！"

在列宁这些说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人物，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本国的反动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压迫中国民众破坏中国德谟克拉西运动是何等严酷；同时，又应该看出中国民众之好友，只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无产阶级，那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都是中国反动军阀之好友，也就是中国民众之敌人。

现在全世界人类对垒的形式是：

（甲）压迫者——各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军阀

（乙）被压迫者——各压迫国之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国之民众

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呵！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

1925年1月21日《向导》周报第九十九期　署名：独秀

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

我们反对善后会议，并不是因为这个名称和预备会议不同，乃是因为他是军阀官僚包办的会议，没有人民的代表出席说话，——这个反对的理由是不错的，然而仅说是反对军阀官僚包办的善后会议，还觉的太简单了。我们不但反对善后会议在形式上是军阀官僚的会议，我们必须在实质上反对段祺瑞所要的这种军阀官僚会议所包含之危险性。

段祺瑞所要的善后会议，至少也有下列三个危险：(一)段氏赶速在国民会议之前，利用他的善后会议团结军阀势力，以抵抗国民；他所要的善后会议如果成功，军阀在中央及地方的势力必完全恢复，他们压迫国民运动，必然日见露骨。(二)段氏要利用善后会议，结合直系等失意的军阀，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和他派军阀——奉军及冯、孙、胡等——对抗；此种新的结合和新的对抗，是军阀间将来大战争之种子，亦即帝国主义者借口内战干涉中国内政之种子。(三)段氏要利用他的善后会议产生正式政府，选举他为正式执政或总统，此种正式政府如果实现，势必为国内战争之导火线，因其非新的代表民意机关所产生，又没有旧的法律(约法)根据，纯粹由军民长官拥戴，岂非明白给别派军阀以兵争政的榜样？

段氏所要的这种善后会议，即军阀官僚包办的会议，人民是

应该始终反对的；并且这善后会议将近实现了，要免除其危险性，人民站在会议外消极的反对还是不够，更应该有力的向段政府要求修改善后会议条例，要求选举代表参加此会议，在会内积极的反对，反对此会议有权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反对此会议有权选举正式政府，反对此会议议决一切有利于军阀的议案，尤其要揭破各派军阀间分赃或暗斗的黑幕。

人民参加此会议，要取下列的态度：

（一）为反对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而参加，不是为赞助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而参加；

（二）应该要求由各省人民团体集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多数代表（当超过各省军民长官代表人数以上）参加，变更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为人民所要的善后会议，不可仅由半官僚的法团派少数代表参加，成为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之装饰品；

（三）各省人民团体，不但应该为其参加此会议之代表准备有力的后援，并且应该严厉的督促其代表在此会议中确能为人民利益奋斗，而不与军阀官僚妥协。

全国人民呵！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将近实现了，这会议所含的危险性谁也知道，全靠人民在此会议内会议外的奋斗力增多一分，这会议对于国家人民的危险性才能够减少一分，此外别无他法。

应该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国民党领袖们呵！你们固然应该站在人民方面，反对段祺瑞所要的善后会议；你们也应该要求段祺瑞修改善后会议条例，许人民代表列席；你们自己有列席善后会议资格的，更应该出席。你们应该利用出席善后会议的机会发表自己的政纲，应该利用出席善后会议机会揭破帝国主义的列强

及军阀派损害中国国家生命及人民利益之事实，揭破军阀间列强间暗斗或分赃的黑幕。如果段祺瑞竟不许有人民的代表出席善后会议，你们更应该出席此会议，免得军阀官僚包办此会议；你们不应该很高洁的不参加军阀官僚的会议，站在外面消极的反对，你们应该积极的参加此会议，在会议内反对军阀官僚，揭破他们的黑幕。“真金不怕火来烧”，为了拯救国家的生命，为了拥护人民的利益，就跳到火坑粪坑里都是应该的，你们若以为民党参加军阀官僚会议是一件羞辱的事，那么中山北上便根本错了。一个革命党总应该积极的奋斗，不应该消极的洁身自爱，洁身自爱之里面包含着避免和军阀派争斗的懦弱心理啊！

1925年1月28日《向导》周报第一百期　署名：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

半封建半资本制度的中国，他的社会势力，三种并存：第一是军阀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武装与政权；第二是资产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经济权及组织宣传机关；第三是工人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军阀不待说是被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中包含着"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种分子，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在全人类阶级根性上看起来，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在中国社会现状上看起来，中国工人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中虽然有少数领袖分子被官僚资本家利用，做了"工贼"，而决不至因此减少了工人阶级之革命性，因为工人群众的思想与行动终究是革命的，不是妥协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这件事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已经由种种事实证明了。例如民国十一年香港的罢工海员，受英国帝国主义者种种压迫，终以不妥协的奋斗得到胜利。又如民国十二年"二七"惨剧，分明是因京汉铁路工人不妥协的奋斗而失败了。又如民国十三年广州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因为是工人群众不妥协的奋斗和防止广州政府妥协的政策，才得着胜利。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人民发展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非革命是不能使他们屈服的；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助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

这一不妥协的工人阶级，不仅在决战的心理上是不妥协的革命者，并且在客观上也富有能够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沿江沿海之运输权在他们的手里，国内军阀的兵队及军用品运输权也在他们的手里，大的工商都市大的矿区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也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起来革命，足以使全社会震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他们起来参加才足以制敌人的死命；中国国民革命之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其走狗，所以严厉的压迫并造谣中伤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就是这个缘故。

1925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一期　署名：独秀

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

段祺瑞拿数十万元民脂民膏，召集一个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来替他捧场面，可算是中国军阀之最后豪举了！这个会议只能为段祺瑞捧捧场面，更进一步，段祺瑞可以借此结合几个失意的小军阀，巩固他的地位，再进一步，他便要借此会议为卖国机关，至于说借此会议可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本来是欺人之谈。大家如果不相信，现在善后会议已开幕十多天了，请看他在这十多天内经过的事实是怎样：

（一）国民党对段执政邀请省议会议长、教育会、农会、商会会长为专门委员认为未容纳孙中山之主张，发表宣言不加入善后会议。

（二）上海总商会电段执政：善后会议各省代表均应列席，非到有三分二以上人数，不能开会。

（三）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电段执政：善后会议须有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人民团体之代表占出席代表三分二以上，方有讨论国事之权，望延期以待人民代表到京始开议。

（四）段执政据善后会议意见书通电各省：会期内各方军事行动完全停止，如有争执，应提善后会议解决。然而广

东、广西同时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河南胡憨两军之争，川、滇、湘、黔各军进攻湖北的酝酿，都并未因段电而停止。

(五)西南各省代表到上海者数十人，均认善后会议无解决国是之可能拟不北上，先谋西南团结，由唐少川、章太炎从中主持一切。

(六)《民国日报》七日北京电：金佛案与无线电台案，均决提交善后会议。

在(一)(二)(三)项事实，可以看出舆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在(四)(五)两项事实，已表示善后会议完全破产，实更证明以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之绝对的不可能；有人以为人民代表会议的议决案没有实施的希望，现在请问代表实力派的善后会议议决案又能够在何处实施？在第(六)项事实看来，执政政府将要做出曹锟政府所不敢做的罪恶。

我们反对善后会议，是否神经过敏，是否有意捣乱，善后会议自身的成绩会替我们说明。希望凡是非安心为段大军阀捧场的人，只需每日留意善后会议经过的事实，便自然懂得他的价值。不但善后会议如此，即是国民会议，人民若不能努力争得多数真正人民代表有出席权，听段政府钦定一个限制真正人民代表的组织法，则将来的价值，也必然不比善后会议高得几何！

1925年2月14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二期　署名：独秀

一封给章行严的信

行严先生：

顷见上海报载：北京司法部训令京外各机关，凡查获宣传共产党员，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如有政党为护符者，亦一律依法办理，仰即严秘检查等语。

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①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这道训令词中有三点最不可解：第一，共产党本是代表工人阶级及贫农利益的政党，何以说他以政党为护符？第二，法律只能制裁刑律条文上的犯罪行为，岂有一宣传某种学说某派党义即构成罪名之理？第三，司法部并非立法机关，何能以一纸部令决定宣传共产党为内乱罪？

这道训令若出自军事机关或腐败官僚之手，我们毫不以为怪，乃出自应该尊重法律的司法部，并且是精通法理富有世界知识的行严先生所长的司法部，这便要令人骇怪了！

人们以为今日托足权门的章行严，已非昔日讲学论政的章行严，他已无违背军阀意旨之可能，我们和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但我仍不敢这样轻蔑行严先生，兹谨向先生有所陈述。

共产党本质，并非凶恶不法象三K党等秘密结社之类。其在

①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组织执政府，章士钊出任司法总长。

英国、法国、德国，都是公开的政党，都有集会、出版、讲演及竞争选举之自由，先生都亲眼见过；先生若不过于轻鄙本国人，若不能绝对否认中国也有工农阶级之存在，便不能说中国不应有共产党。至于农业国不应有政党之说，无论是非，先生在论坛上尽可有此主张，而未便利用官权停止政党，更不能独禁共产党。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存在了五年，其根本职任是拥护工人贫农的利益，其目前的政治主张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治，建设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其言为天下人之所欲言，其行为天下人之所当行，别无阴谋异行有损害于国家人民而足以构成内乱罪者。与其说中国共产党有内乱罪，不如说不依法律不由民意以武力夺政扰民窃号自娱实犯内乱罪之武人已遍中国。若说共产党所根本主张的政制和中华民国现行的政制不同，因此得比附到内乱罪，这种话若出于别人之口，已失刑法只以裁制行为之原则，况出于极力赞助段执政以“革命”行为破坏中华民国现行根本法（民国约法）的行严先生之口，更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若行严先生及其他权门宠儿，向人民板起成则为王的面孔，以为权力在手，即是法律与正义之化身，只许他以法律正义绳人，不许人以法律正义绳他，这种不可一世的逼人气焰，在袁世凯时代，在第一次安福执政时代，在曹党得意时代，行严先生都亲身领教过，现在宁肯蹈此覆辙？

上海《申报》北京电，更指司法部此项训令与反对善后会议有针锋处，此电更有伤先生的名誉了！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先生即欲依附权门，以私人名义为善后会议辩论已足，似不必滥用官权，以“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防止异己者之口。反

对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乃天下之公言，非共产党人之私意，国民党已公然宣言反对善后会议且不论，即如先生同一政学系之好友李印泉①，又如先生所兄事之太炎，都公然反对善后会议，并反对段祺瑞自称执政，先生亦将指印泉、太炎为共产党人，"依刑律内乱罪从严办理"么？吾料段氏逆取不能顺守，武力专政之演进，势必日甚一日，天下健者不只一段氏，更不只一行严先生，先生竟能以"宣传共产党员"六字，诬尽天下人而杜塞其口么？先生竟想象军阀官僚的势力能够长治久安的统一中国么？中国在他们统一之下能够得着进行么？

我记得先生是一个深知政本的人，是一个反对好同恶异的人，我还记得先生是曾说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并且俄德共产党人曾传说旅欧中国人中有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章行严先生，所以我还不象一般人那样轻蔑先生，希望先生对于我以上的陈述有一个公开的答复。先生的答覆登在京、沪任何报上我们都可以看见。

1925年2月14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二期　署名：独秀

---

① 李印泉即李根源(1879—1965)，云南腾冲人。

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

安福政府所拟的国民会议条例草案，我们已经拜读过了。据这个草案，安福政府愚弄国民的心事已和盘托出，其最重要而又最显明的有两点：（一）以议宪限制国民会议的职权，（二）以教育、性别、宗教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民主国主权在民，国民会议应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问题，他的权限，应该比国会更要扩大。现在的国民会议条例开口即规定"国民代表会议以议决中华民国宪法及关于宪法施行之附则为其职权"，连以前国会享有的宪法起草权都剥夺了，至如关于国家生命的政治、外交、军政、财政问题，更一概不许过问。安福党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国民代表只能前来恭听政府钦定的宪法，举手通过，通过了钦定宪法便滚蛋！这个条例将来经段祺瑞批准公布时，此点若不修改他便是对于国民谋叛！

至于组织方面，这个条例草案之愚弄国民，也足令国民十分明白他们的心事。他们明明以"普通选举制"欺骗国民，而该草案竟以"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廿五岁以上"，"于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不能解说并写作者"，"当兵役巡警者"，限制国民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又以"僧道及其他宗教师停止被选举权"。女子不是国民么？工人农民是全国人的衣食父母，其数量又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大半不能解说并写作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现

在一概被摈在国民以外。兵役、巡警、僧道及其他宗教师都是国民一份子，有何理由可以剥夺其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世界上何处有这样以性别、教育、职业、宗教限制选举的普通选举制？

此外，京兆只四人，各省区每道只三人，大学区、商业区、实业区均只一人至二人，人数已经比国会议员犹少；又加以教育的限制，又加以实业区乃包含从业人、工人、股东或合伙出资人都在内，则不啻明白规定，凡是工人都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照这样选举的结果，则诚如吴稚晖先生所说："选区每区三人，安福系、国民党各半，青海、蒙、藏以曹汝霖之类充数，大学区让了国民党研究系，商业区则有虞和德与天津、北京商会出马，实业区则周学熙、张謇等各代表三万人，这叫做国民会议，使二者蒙福，这叫做臭不可当，国民会议的名词又算永远抛入毛厕。"

军阀派本来不会有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的念头，要想真正国民会议实现，只有国民自己努力，逼得军阀政府非召集不可才行。

国民呵！国民会议条例就快公布了，你们还是要有一个真正的国民会议呢，还是任军阀政府召集一个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

国民起来罢！政治上没有两种利害相反的势力可以并存，军阀派站在统治地位，那里会有真正的国民会议出现？国民会议我们是应该要的，不过在国民会议运动中，至迟在此运动失败时，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觉悟：怎样才能够达到真正国民会议之目的。

1925年2月21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三期　署名：独秀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

最近法国《晨报》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苏联在亚洲势力膨胀，否则莫思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

前天的《大陆报》也说："中国现在步步趋向赤俄的怀抱里去了。比如此次外人纱厂大罢工风潮，在要求增加工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

这两段议论，一方面是表示帝国主义者自供其横暴，一方面是说明苏联的赤化运动是被压迫民族之福音。

苏联援助亚洲之土耳其与阿富汗的民族运动，这是事实；土耳其与阿富汗民族都因此得了相当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发展，大不利于英、法、日、美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更是事实；可是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恐怕苏联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于他们不利，便要联合压迫中国，这是何等横暴！明白的中国人呵！帝国主义者自己已经公然说出要联合压迫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这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在相反的方面，援助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之苏联，他不是我们的朋友是什么？因此，为了我们的民族自由，我们应该欢迎苏联，欢迎赤化呵！

上海四万纱厂工人，因为不堪日本资本家虐待而同盟罢工，

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四万工人共通的要求是：

（一）不准打人

（二）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

（三）发还储蓄金

（四）加工资十分之

（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七）释放被捕工人

不过如此而已。而《大陆报》竟说“在要求加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请问以上七项要求中，那一项是赤化？或者他以为自（二）至（七）都是普通的劳动条件及罢工要求，唯有第一项“不准打人”，含有民族自由运动的主义，这便是赤化。

如果民族自由运动是赤化，如果不准打人也是赤化，那么欧美各国都早已赤化了，怎禁得我们中国人不想望赤化呢？

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我们知道了。他们是说：你们中国人已是亡国奴，必须你们自己否认民族自由，必须你们受日本人的打一声不响，才免得赤化嫌疑。

如此我们应该认识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了！

1925年2月21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三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

我们主张国民党可以加入善后会议，是应该为了和国民合作来反对军阀而加入，非是为了和军阀合作来反对国民而加入。然而据本月十七日上海《新闻报》的北京通信："孙科曾对党员言，谓奉总理之命，望同志尊重孙、段、张合作之前言，出席善后会议，以竟全功云云。"这样的加入善后会议，我们实不敢赞同。

共产和普选果足以亡国么？

前几天国民党中反动分子居然发起了一个什么"反共产救亡会"，同时，日本的国粹党（即法西斯派）也发出一个"亡国普选法案反对宣言"，由此说来，不但共产足以亡国，连普选也足以亡国，不但俄国要亡，连英国早就该亡了！

你们早已背叛了民党呵！

大捧袁世凯的章炳麟，为袁世凯当侦探的冯自由，为莫荣新造火药打粤军的马君武，这班人本来早已背叛民党而去了，现在

乘着中山病危，忽然发表宣言脱离国民党，要恢复旧有的同盟会，署名这宣言的人虽然都是同盟会会员，却遗漏了四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孙毓筠，一个是胡瑛①，一个是刘揆一，一个是陈炯明，——若再加入这四位老同志，那更是脚色齐备了！

只要脸厚什么事都好干！

北京城里，有个什么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本月九日宴请国民党要人，这班国民党要人当中，居然有刘揆一、冯自由这两位。冯自由曾因做袁世凯侦探，和吴稚晖在上海会审公堂打过一场官事，刘揆一曾因热心做袁世凯的农商总长，不惜登报脱离民党，这两位听了"国民党要人"这个称呼，未免要面红耳赤罢！并且该促成会出席作陪者为该会执行委员万兆芝老爷，这件事也令人难解。这位万老爷在曹锟时代那种得意的状态，北京人都忘了吗？他现在为什么也要加入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他用何界名义加入的呢？

1925年2月21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三期　署名：实庵

① 胡瑛（1884—1933）字经武，湖南桃源人。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胡瑛于1915年8月同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湖南湘潭人，同盟会会员。1912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并申明脱离同盟会。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后，另组"相友会"，不与国民党合作。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

此时中国国民对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侵略，虽然还没有有力的反抗，然而大多数人民甚至于一部分小军阀，由身受列强经济的政治的压迫之实际经验，已渐渐觉悟到自己民族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并且渐渐由觉悟而不平而发生了国民运动。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最近的中国国民运动，表面上虽然还是轻蔑的态度，而心中实已感觉不安了。

人民对于国内军阀，更是反对的声浪遍于全国，军阀们虽然以为有枪在手，人民无如我何，而对于国民运动的声浪终觉危险，至少也要恐怕敌派军阀利用这种声浪不利于已；因此，军阀对于国民的呼号，表面上虽然还是倨傲态度，而心中实已感觉不安了。

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其工具（军阀）既已对于中国的国民运动感觉不安，他们对付的策略是怎样呢？

国民党发布了国民运动的政纲，帝国主义者及直、奉、皖三派军阀都高声大叫"赤化"、"过激化"。

国民党在汉口组织党部，直系军阀便以"过激"、"共产"名义逮捕刘芬诸人。

孙中山宣言及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都通电主张废除不平等

条约，东交民巷及京、津、沪、港各西文报都说是“过激”思潮。

摄政内阁取消了清室优待条件，又表示不平等条约应该修改，帝国主义者便轰传北京“赤化”了。

中国人民欢迎苏联放弃在华权利，帝国主义者便宣传中国人民倾向“赤俄”了。

广东沙面因取缔华人入境苛例而罢工，英法人说是布尔什维克运动。

上海日本纱厂中国工人受厂主虐待而罢工，西文报说是有“赤化”意味。

奉天军事会议，因京、津舆论反对段政府，遂有人主张令驻京、津军队捕拿共产党。

段祺瑞亲在内阁议席上提议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和查禁过激派。

段政府的司法部因为有人反对善后会议，遂通令取缔共产运动。

以上便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对付中国国民运动的总策略。

他们知道公然直接压迫国民运动不是巧妙的策略；他们知道“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最足以吓倒中国人；他们并且知道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尽力的分子是工人和急进的知识阶级，而这班人又最容易被人指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因为他们不是财主或官僚；因此，凡是中国一个国民运动发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便拿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这些符咒来镇压住。他所要镇压的实际上是国

民运动，而表面上却以镇压"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名义出之，这是何等巧妙的策略！他们拿这个策略来镇压中国国民运动，一方面可以妨碍急进分子的活动，一方面可以恐吓和平分子使之离开急进派，使国民运动的势力分裂。这个巧妙的策略，无知的军阀派还未必想得出，不用说帝国主义者可以教给他们。帝国主义者为了要避开公然直接压迫中国国民运动，不但将这个巧妙的策略教给军阀做他们的工具，并要教给买办阶级做他们的工具。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买办阶级，又要各自雇佣一班国民党右派及工贼或冒充工会运动者做工具，拿"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符咒，来破坏国民运动及工人运动。

真正国民运动者呵！你们要认清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右派、工贼、冒充工会运动者——的策略，不要畏避他们符咒，中他们的奸计呀！

1925年3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五期　署名：独秀

寸铁

崇信外国

庚子赔款据约无用金的明文，付法赔款仍用纸佛郎并于国信无伤，现在段执政打算承认金佛郎案，真是“崇信外国”，不是“外崇国信”！

陈炯明与辛亥革命俱乐部

我前几天说章炳麟等恢复同盟会，尚缺少陈炯明、孙毓筠、刘揆一、胡瑛这一班老同志，现在见了章炳麟、唐绍仪、马君武、居正、白逾桓、刘白等发起辛亥同志俱乐部，才知道不但不缺少陈炯明，并且他还是这个组织的后台老板。不过陈炯明的代表刘白能垫出开办费二千元，孙、刘、胡等现时却无此力量了。

1925年3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五期　署名：实庵

悼孙中山先生！

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孙中山先生，一旦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中国的民众应如何悲痛呵！

全中国的民众呵！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因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

我们更应该知道，革命的领袖中山先生虽然死了，革命的国民党是不会死的，我们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更有力量。我们警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且勿因中山先生之死而存幸灾乐祸的心理！

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的心情虽然万分悲痛，我们的意志却不丝毫沮丧，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因中山先生之死，加速的集合到中山先生创造的国民党，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事业。

我们相信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先生之死更加团结一致，更加遵守中山先生之遗嘱共同奋力前进，今后的国民党必仍然为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所统一，必仍然为整个的党，彼军阀官僚辈所预料的"中山死国民党必分裂"，直是妄想。

即或有一部分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在中山先生死后脱离国民

党，这只算是国民党内淘汰了一部分反革命的党员，决不是党的分裂，因为这班分子的行为，久已违背了孙中山主义，久已不能算是国民党党员了。而且这种淘汰党员的现象，在国民党中不乏先例，如袁世凯时代，章炳麟、刘揆一、刘师培、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都背党而依附袁世凯，难道这也是国民党分裂吗？又如李根源等脱离国民党而另组什么政学会，吴景濂等脱离国民党而另组什么民宪党与益友社，这些反革命的分子脱离出去后，革命的国民党不仍然是整个的统一的吗？他们脱离出去，不但无损于国民党之统一，而且这班反革命的分子脱离一次，国民党的数量质量均进步一次，在社会上的声望便增高一次。

现在也是如此。安福党人姚震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终不免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国民党有为之士，当孙氏在世时，因从孙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现政府任命之官职，若欲就官职，则为背孙氏之命，因此遂与现政府发生疏隔，今后此种障碍已除，而可进于圆滑之关系矣。"这班稳健派倘以为障碍已除，急与安福政府握手提携进于圆滑之关系，而与革命的国民党脱离，在官僚看来，这就是国民党分裂，其实这正是国民党之进化，不是分裂。

真正的国民党全体党员，必然仍旧遵从中山先生之意思命令，仍旧遵从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遗言及临终遗嘱，一致团结进行。

中山先生死了，而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及政治主张，仍旧活着在他创造的国民党中并未曾死；必须全体国民党党员都变成了姚震所谓稳健派，那时中国便没有了革命的国民党，那时中山

先生才真是死了！但是全中国之大，只要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不能斩尽杀绝中国的革命党，四万万人中只要有一人继续中山先生之志而奋斗，中山先生都未曾死！

1925年3月14日《向导》周报第一〇六期　署名：独秀

寸铁

“反……救亡会”

国民党中一班反动分子发起了一个什么“反共产救亡会”，同时，安福、政学、研究诸分子也要联合发起一个什么“反国民党救亡会”，“救亡”居然成了攻击异己的无上利器，今后“反……救亡会”当层出不穷也！

护党呢还是叛党？

反动的国民党右派口称护党，实际上已经叛党了。他们如果不服我这句说话，试问他们于自己党的组织以外，公然另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会，公然另立章程，公然推举一向反对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唐绍仪为理事，更公然推举一向反对国民党反对孙中山近且约同陈炯明兵进攻广东的唐继尧为理事，这样究竟是护党还是叛党？

1925年3月14日《向导》周报第一〇六期　署名：实庵

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

中山先生之死，不但是中国一大事，并且是世界上一大事，各方面对其死后之态度，却值得我们的注意与批评。

（一）帝国主义者之态度。伦敦《泰晤士报》称为光明之失败；巴黎各晚报，均称美孙之爱国，惟惜其晚年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日本的报纸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中山先生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而段祺瑞硬召集善后会议，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则宣言"外崇国信"，英国帝国主义者称为光明之失败，是表示他们快慰的心理！我们不愿把布尔色维克这名词加在中山先生身上，乃是因为孙中山主义和布尔色维克主义显然不同，并非以为中山先生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是罪恶，也不以为不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减少了中山先生在历史上的价值，而法国帝国主义者却是因为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及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便说他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中伤中国民族运动的宣传，他以前宣传"黄祸"是同样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指教他的工具段祺瑞，和国民党之稳健派提携，统一中国，这是中山先生死后国民党中之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所应注意的。

（二）安福军阀之态度。中山先生死的那天，姚震对日本东

方通信社记者说："孙氏现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现在善后会议，国民党系中除汪兆铭等三人外，皆有列席之状态。按国民党有为之士，当孙氏在世之时，因从孙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现政府任命之官职，若欲就官职，则为背孙氏之命，因此之故，遂与现政府发生疏隔；然自今以后，余知此种障碍已除，而可进于圆滑之关系矣。惟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与现政府之至大方针究不相容，故将来欲望接近，实为一至难之事。"中山先生死后的第五日，段催杨庶堪[①]就职，姚震对杨说："中山已死可不受拘束。"在中山先生未死前三日，段祺瑞也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在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想利用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来分裂国民党，正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鼻孔出气。他们所谓共产各说之邪道，大约连反对优待清室，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都包含在内；他们所谓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大约连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徐季龙都包含在内。他们知道只有这班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不能和他们相容，共产派到应该多谢他们有知人之明，所难堪者只是他们所称的稳健派，平日高声反对共产派，以护党自称，现在揭开黑幕，当真以中山先生活在世上是他们与安福派握手提携的障碍吗？好了！

---

① 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四川巴县人。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孙中山逝世后，应段祺瑞邀请，一度任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

此时障碍已除了！可不受拘束了！

（三）研究系之态度。在全世界哀悼称美声中，独研究系机关新闻——《时事新报》，对中山先生加以毁谤与诬蔑。他以为中山先生现在是形骸之死，精神久已死了，他说中山先生之精神，一死于孙、黄分裂，再死于孙、陈分裂。其实正得其反，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正因一再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和反动的陈炯明分裂而格外显示出来。譬如梁任公和反动的康有为分裂，算是任公的精神早已死了吗？至于诬蔑中山先生"恃墨斯哥共产宣传费以维持生活"，这种态度，不单是《时事新报》之耻辱，简直是全新闻界之耻辱！中山先生受过墨斯哥共产宣传费的证据在那里？中山先生宣传共产的证据又在那里？中山先生在过去是中华民国之创造者，在现在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领袖，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称赞他援助他，并不是因为他或希望他宣传共产，乃是因为他努力做那象研究系一类人所不愿做而为中国人所急需的民族自由争斗。研究系的先生们，常以受墨斯哥共产宣传费诋毁共产党人，今又以此诬及国民党领袖，墨斯哥共产宣传费真多，已遍赠中国人，惟未赠及研究系。《时事新报》又说："革命时代有血气有思想之孙文也，知爱国知保种之孙文也，可惜此孙文自二次革命后已死去矣"。他们现在始如此说，其实他们忘了当年《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他们诬毁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至何程度！

1925年3月21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七期　署名：独秀

统一与分立

关于联省自治这个问题，我们曾讨论过多次，现在文武联治派又在那里活动起来，兹再总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如下。

（一）中国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各省的大小军阀分裂了，已去完全分立不远了；因此对外的政治要求，对内的经济要求，都急需一个民族的民主的统一国家。

（二）联邦与分立不同，仍无妨于国家之统一，然亦非语言相同的本部所需要，至少也非今日所需要。

（三）强大军阀所主张的武力统一，是兼并不是统一；弱小军阀所主张的联省自治，是割据是分立不是联邦。

（四）我们反对吴佩孚、张作霖的武力统一与段祺瑞的阴谋统一；同时，也反对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的联省自治。

（五）统一政府若属于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必赞成统一反对分立，如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自来只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统一政府，借口尊重中国统一，阻挠广东革命政府管理关税、盐政，统一政府若不利于帝国主义者，他们必阴助反动派的分立运动，如法国煽动德国莱因分立，英国援助波斯南部分立。

（六）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所援助的统一，何〔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者所教唆的分立。

（七）我们对于西藏及蒙古，分立或联邦都赞成，因为他们和本部都是语言、风俗绝对不同的民族。

（八）我们承认中国本部各省区目前急需有一个由民众的革命力量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政府，大军阀的统一运动和小军阀的联治运动，乃是整卖中国或零卖中国于帝国主义者的运动。

（九）我们不相信军阀的统一或联治可以停止内乱，如直皖、奉直及直与反直之战争，湖南援鄂，云南攻川、攻桂之战争；可以停止内乱的只有由民众的革命力量所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政府。

（十）我们承认广东政府或其他倾向民主的革命政府，他们之脱离北京政府，只是妨碍军阀的伪统一；决不是破坏国家的统一；因为他们的根本政策，是国家的不是地方的，不但不赞成各省分立的苟安政策，并且不赞成南北分立的苟且政策，他们是要依全国民众的革命力量，造成民族的民主的统一国家。只有这样才是真统一。反之军阀的伪统一和联省自治的运动，结果都要延长内乱破坏统一。

1925年4月5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反段与降段

反帝国主义与不反对帝国主义，帮助农工运动与压迫农工运动，联俄与仇俄，这三件事本是国民党左右派重要争点；现在应该加上一个反段与降段了。

好个不使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劳工！

一个什么劳动反共产同盟会，竟有呈请上海县公署备案的趣事，呈文上公然说出“顾全资本利息”、“不使劳动界反抗资本家”、“钧署予以相当提携坚劳工信仰之心”，“遇有宣传出版及印刷品预先呈案察核而后发表”、“请暂予存案备查以观后效”等话。他们与其说是反共产同盟会，不如老实改名资本家官僚的走狗同盟会！

1925年4月5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九期　署名：实庵

亡国的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的工部局向纳税外人年会所提议的印刷律案,① 又已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搁置了,反对印刷律的中国人,断不因此案已搁置而遂停止反对的运动。第一我们要知道:工部局已数次提出此案,今年搁置了,明年必然又要提出,他们是非达目的不止的;第二我们更要知道:我们所要反对的,乃是工部局及纳税外人年会根本上都没有订定此律之权,不是此律好歹的问题,也不是洋泾浜章程何条何项能附此律与否的问题。

外人来到中国做买卖,照理应该受中国的法律管理,中国人到他们国里也是这样。然而事实上竟不是这样,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硬要他们国里人来到中国仍旧由他们的领事照他们的法律管理,不受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官厅管理,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把这权规定在条约上,这就是所谓不平等条约。

他们来到中国,不受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官厅管理还不算,现在反拿他们的领事他们的法律来管理中国人,象这样反客为主的事,岂但不平而已么!

---

① 1924年3月16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为箝制言论自由,拟定印刷律,凡印刷任何报纸、小册、传单、招贴、新闻消息、事项评论,概须事前向工部局注册填写姓名、地址。上海各界表示反对。

他们外国人不受中国的法律及官厅管理，还说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他们自从民国以来居然霸占上海会审公堂裁判中国人，这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何种权呢？他们现在又要自定一种印刷律来钳制中国人言论出版的自由，这又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何种权呢？

上海的资产阶级，近来对于租界的外国政府及本国军阀政府，都有不满的表示；然而他们的表示未免过于软弱无用了，因为他们只是在外人及军阀统治之下要求改良，不想根本推翻外人及军阀的统治权，这原是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根性。中国的平民应该有进一步的运动。

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的宣言上说得好："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我们平民应该主张：上海的中国人不受外国的工部局管理，不受会审公堂的外国领事裁判，取消租界代以民选的上海市政府，以完成"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而事实上现在却是外国人的上海，外国的工部局管理着上海的行政，外国的领事管理着上海的司法，纳税外人会议管理着上海的立法，上海公共租界，便是英、美、日本共管中国之模型。

上海分明是一个亡国的上海了，我们不应该因印刷附律案搁置而遂停止反对的运动，我们正应该把反对印刷附律运动，当做"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运动之开始！

1925年4月19日《向导》周报第一一一期　署名：独秀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

列宁主义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瞭确定了，周密了，也扩大了。其更明瞭确定周密扩大之点，最重要的便是资本制度与共产制度间之无产阶级独裁制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这两个理论。后者尤于中国目前的民族革命有关，我们应该略知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和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完全不同。

列宁的意见

（一）全世界一切有色无色人种的。

（二）行动上帮助民族解放运动。

（三）由被压迫者革命而分立，而自建国家。

（四）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问题。

（五）联合被压迫的民族运动和被压迫的阶级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自由分立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协作而统一的。

改良派的意见

（一）欧美白人种的。

（二）口头上的民族平等。

（三）由压迫者恩赐民族自治——在宗主国统治下的自治。

（四）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之各国内的局部问题。

（五）利用民族联合或排斥异族的名义巩固帝国主义。

（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统一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分离而竞争的。

据上表看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及被压迫的国家（即半殖民地），他们的民族运动，只有依照列宁这样伟大的周到的意见而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才能够得着真正自由，这是一件最明白无疑的事。改良派所谓民族问题，乃是宗主国应该采用何项政策欺骗殖民地的民族，使之永久服事宗主国而不思反叛，以维持各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永久对于殖民地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剥削。他们所谓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本是正相反背的一件事。改良派不但不赞成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并且公然宣传：落后的民族，只有在宗主国统治之下，才有和平的幸福与进步。照他们的意见，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殖民地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剥削，都是不可少的高厚天恩。所以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不表同情，而且公然承认各帝国主义的国家有统治其殖民地的权利，公然以帝国主义的国家所剥削殖民地之余沥，歆动国内一部分工人贵族，使之维持构成本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大来源——剥削殖民地，使之拥护祖国之胜利，反对本国的殖民地之民族运动及工人运动，因此更进而使之拥护本国资产阶级之政权，这是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不可宽恕的最大罪恶，这就是第三国际党指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之真实事证，这也就是革命派的第三国际党和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根本不同之一重要点。

第二国际党所谓国际，乃以欧美白人种为限，其余有色人种，都是天赋给他们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资格，不在国际之列。第三国际党所谓国际，不但绝对没有人种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乃是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之统治与剥削，跻全人类于真正平等自由之地位，这就是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时也是国际的民族运动；第三国际党这个理想，这个运动，就是伟大的列宁主义之结晶。

欧战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饱受了威尔逊所谓"民族自决"、"人种平等"的欺骗，中国人也在内，在华盛顿会议，太平洋被压迫的民族又受了哈定一次欺骗，中国人也在内；我们因为这些欺骗的教训，应该明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国际党的势力统治下的世界，决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是必须依照第三国际党所指示，亦即列宁主义所指示，联合世界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共同打破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锁链。

现在的中国民族运动，是不是以推翻帝国主义为对象呢？大部分是的，然却有三个危险的倾向：

第一是大商买办阶级　他们现在虽未曾公然反对民族运动，然而他们始终和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将来即进化到工业资产阶级，也是卖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一向在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发展他们的经济力之关系，尽有在美国人"中美提携和平进步"或日本人"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可能；他们这种勾结帝国主义所发展的工业，将用"输入外资"的名义卖尽

国民经济的命脉及国家主权。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一个大患。

第二是不脱封建思想的知识阶级　　如国民党一部分右派分子及青年党等，他们口中也说赞成民族运动；但是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观念，完全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对象，是笼统的外族，不是帝国主义者。自资本帝国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一个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两方面。在此世界经济成了整个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便不能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主义；在此世界革命运动成了整个的时代，也已经没有一个孤立无援的民族，便不会有一个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运动。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所以此时我们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闭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为若不将资本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统治被剥削者的锁链全部毁坏，他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任何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会得着自由。因此，我们应该懂得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而不以资本帝国主义为对象的民族运动，乃是资本主义前的民族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封建时代闭关的民族运动。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即资本主义前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的帝国主义和被他剥削的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懂得现代的民族运动特性和封建时代的民族运动不同，他们认不清弱小民族之敌人是谁，

更认不清弱小民族的友人是谁；因此，他们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们竟放过了民族运动之敌人，且会和民族运动的敌人妥协，而受敌人的教唆仇视民族运动之友人，如德意志民族党，一面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妥协承认道威斯计划，一面极力仇视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便是一个显例。中国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知识阶级也是如此。他们当中，或极力主张民族运动（如青年党），或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如国民党右派）；然而他们都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竟不看见剥削压迫中国民族无所不至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竟不觉得他们自己及自己的民族践踏在帝国主义者的脚下，反而攻击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且竟附和官僚的研究系，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者，加以“亲俄”“卖国”的罪名，实际上做了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二个大患。

第三是工贼　　在中国的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参加的力量，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与大商买办阶级——感觉得有利用工贼来破坏工人阶级团结力的必要。这班工贼有些是工人贵族，有些是冒充工会运动者即招牌工会之职员；他们不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军阀官僚，他们不反对买办阶级，他们的唯一目的是破坏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买办阶级要利用他们就正在这一点。帝国主义者用以阻碍中国民族奋起的第一个工具是军阀、官僚，第二个工具是买办阶级，这班工贼便是第三个工具。这班工贼不但勾结军阀、官僚及买办阶级（交通系）是公开的，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也是公开的，他们已和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第二国际党公开的发生关系。第二国际党为什么要和

他们发生关系呢？不用说是为了要利用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中重要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团结力，破坏第三国际党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在中国发展。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三个大患。

中国的民族运动，此时虽然有日渐发展的趋势；但是上述的三种力量若同时也日渐发展起来，至少也会减少中国民族运动成功的速度，和第二国际党的思想行动减少世界革命成功的速度一样。因此，我们敢说：在中国民族运动的现代，我们实有了解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的必要。孙中山先生，他是了解这种必要的一个人，他临终时致苏联遗书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

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

1925年4月22日《新青年》(季刊)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寸　　铁

卖　　国

我们主张蒙古、西藏人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一班有帝国主义臭的人便将卖国二字加在我们身上；现在青岛日本纱厂中国工人罢了工，日本的劳动总同盟居然汇款五千元，接济这些罢工的中国工人，有帝国主义臭的人又应该大喊日本工人卖国了！还有一班日本共产党人极力援助朝鲜独立运动，在有帝国主义臭的人们看来，这班日本共产党人更是双料十足的卖国贼了！

过激主义与被压迫者

路透电说：巴黎中国国民党人士，近于追悼孙文时，发激烈演说，宣传过激主义，欧洲报纸多谓华人好过激主义。华人何以好过激主义，他们应该有个解答。我们的解答是：过激主义本是结合一切被压迫者反抗一切压迫者，可怜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军阀层层压迫的华人，怎禁得不好过激主义？

卖国贼与国民党右派

段祺瑞所派临时参政院参政三十人中，我们应该注意三个人：一个是"五四"运动的对象卖国贼陆宗舆，其余两个是国民党右派彭养光、凌毅。

赤化与软化

何香凝女士，在国民党上海女党员大会演说，最后述及中山先生临终时恐同志们被敌人软化情形，语时悲切，几至下泪。可是国民党此时在事实上不赤化即软化，没有中立的余地；除非学某君躲到湖州，打个把电报向右派讨讨好，或者算是中立。然而软化的人们终要将赤化头衔加在某君头上！

1925年5月10日《向导》周报第一一四期　署名：实庵

"反唐"与国民革命

商团事件以来，广州将要发生第二次有价值的革命战争，乃是意中之事。

这战争便是反唐战争。反唐战争何以算得是革命战争而且是有价值的革命战争？这是因为反唐战争表面上虽不过反对唐继尧，而实质上乃是破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阴谋，并且是破灭国民党右派勾结唐继尧破坏革命政府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力助他的傀儡张作霖与段祺瑞占住了中国的中央政治机关，然而北方有个国民军，南方有个国民党的广东政府，他必须去了这两个障碍物，才能达到支配全中国的目的。日本对付国民军的政策，自然不外居中调停段、张间冲突，使之合力向国民军节节进攻；他对付广东政府的政策，却不是帮助陈炯明、林虎——因陈、林是直系——而是利用唐继尧及国民党右派向广东政府进攻。

云南地瘠民贫，唐继尧拥有多兵不能向川、黔发展，忽得日本意外之后援，自然不惜抛弃其联治假面，遣兵进窥桂、粤。

国民党右派已和左派有不能两立之势，他们一面北依段、张，摧残左派分子在北方之活动，一面南联唐继尧，以图覆灭左派在南方的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

杨希闵、刘震寰（都是国民党右派军人）在香港和唐继尧代

表、段政府代表及其他国民党右派重要分子共谋倾覆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的目的如果进行，一方面是国民党右派完全取得左派在南方的根据地，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挟住段、张，一手挟住唐继尧，来支配中国，来由日本统一中国南北。

帝国主义者对于半殖民地，本立在间接的统治地位，所以必须采用当地一种势力（军阀或地主买办阶级）做工具。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采用的工具，北方便是段、张，南方便是唐继尧，国民党右派又是这两个工具的工具。所以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反唐和反段、张有同样的重要，都是摆在全中国革命分子面前的紧要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把广东将要发生的反唐战争——反对唐继尧及其羽党杨希闵、刘震寰的战争，当作革命战争，无论成败，都是商团事件后第二次有价值的战争。因为商团事件是镇压买办地主阶级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反唐战争是镇压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革命。

唐继尧电粤港商会，以反共产为号召，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军阀段祺瑞、张作霖、陈炯明等，买办阶级陈廉伯等，国民党右派冯自由、马素等，都异口同声的反共产，反赤化。所以“凡是反共产反赤化的人必然勾结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已经成了一个公式。

1925年5月24日《向导》周报第一一六期　署名：独秀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

前年临城事件，土匪掳去念几个外国商人，外国人对中国政府闹得天翻地覆，惩凶、赔款、罢免地方长官以谢罪外，还要要求直接管理中国铁路；现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大马路行凶，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连日枪杀中国学生、工人、商人及其他市民数十名，伤者数百，中国人将向外国政府要求什么呢？

被土匪掳去的外国商人即令是无罪的，而要求工作的工人，游行演讲的学生，过路观看的行人，都是没有武装的市民，有何罪状应该枪毙呢？

即令上海是英美领土，行政官厅公然下命令，向无罪状无武装的市民开枪轰击，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犯罪行为；况且租界毕竟还是中国领土，外人来此通商，根据何项条约，有何权利，可以任意开枪杀伤中国市民？大约英、美、日本等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是上帝赐给英、美、法、日等国剥削与践踏的，如有不受剥削与践踏者，便违背了神意，便是过激党，便犯了罪，便应该枪毙。或者他们以为此次大马路的屠杀，也和在欧洲屠杀犹太人在美洲屠杀黑人一样，即令在人类的法律观点上说不过去，而在道德上是合神意的；因为除了神意以外，他们找不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可是不懂得这样扶强抑弱的神意的中国人，我们亲眼看见同胞的热血染遍了大英大马路，我们已经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

此次上海大马路的屠杀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是：

（一）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剥削与践踏是一致的，英国固然是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而附和日本人的什么大亚细亚主义，鼓吹什么美国是中国人之好友等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奸细。

（二）一切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剥削践踏，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决不是什么过激派所捏造的海外奇谈；商人、学生、工人一切市民大群众实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践踏：把持海关，在中国遍设工厂，不许禁止棉花出口，不许中国增收纸烟捐，封禁全国学生总会，以军火给军阀战争，动辄拘捕惩罚中国新闻记者，越界筑路①，提出印刷律，增加码头捐②，枪杀请求工作的工人，拘捕爱国演讲的学生，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一步加紧一步，逼着中国人不得不起来反抗，决不是由于什么过激派的煽动。此次上海学生与商人之奋起，都明明白白是自动的参加民族运动，若说是由于过激派之煽动，那便未免过于诬蔑学生、商人，并且过

① 1925年2月间，上海领事团向各国驻华公使团“提议租界边境应展放，至距现有边境约当来复枪弹最远之路程”。公使团电复，“谓此项建议案，已审查完毕，认为合宜”。于是工部局在北新泾、徐家汇、虹桥等地强占民田，掘坟毁茔，拆除民房，强行筑路。仅在沪西开辟之新马路达十余条。

② 1925年4月间，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举行大会。工部局再次提出增加码头捐等提案。按洋泾浜土地章程第九款规定，码头捐按货价抽收千分之一。而拟定的新码头捐规定“捐数不得逾该货关税百分之三”。按值百抽五的百分之三计算，为千分之一点五，较原来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于恭维过激派了。

（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之剥削践踏，和德、俄、奥等非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和平通商，这些事实已证明"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是同一意义的两个名词。此次大屠杀更使我们的确认清了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的敌人。

（四）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因欧战损失过巨，须长期的加紧剥削弱小民族以弥补，中国即是他们所要剥削者重要部分之一，他们向中国剥削日益加紧，他们恐怕中国人民觉悟反抗的心理亦日益加甚；年来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勃兴，帝国主义者张皇失措，一面利用中国军阀政府抑制人民，一面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不敢团结起来反抗他们，不敢做自由运动。可是他们这种恐吓手段，在此次大屠杀中，完全失了效力；因为不管过激不过激，赤化不赤化，帝国主义者枪杀了数十无罪的中国人是真的。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被"过激"、"赤化"等名词吓散了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我们应有决心：如果使我们能达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过激赤化也无妨；如果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剥削被践踏的境遇，什么文化秩序、博爱亲善、和平人道，都是废话！

（五）在此次屠杀中的我们认清了中国的工人与学生，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我们并可以知道各国的工人、学生必能对此次中国民族被外国强盗——帝国主义者屠杀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是应该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不应该立脚反动的国家主义上，笼统的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

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痛苦中所得的教训，很可以使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向正确的路线上发展。

上海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势力集中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民族自由运动，亦应以上海为中心；不过同时我们也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使这个运动的中心——上海的学生、工人、商人更坚决的前进，尤其要监察大商阶级中途和帝国主义者妥协！

我们最终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本领事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

（四）收回全国租界

（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

我们要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争斗，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

1925年6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一七期　署名：独秀

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

凡是一个较大的工潮，在社会上在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人和厂主争斗问题，至于中国工人和日本厂主间的争斗，其意义尤其复杂。

此次上海及青岛日本的纱厂和中国工人的冲突，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一个很简单的劳资争斗，我们应该推求这次争斗之经济的政治的背景，明白了这些背景，才懂得此次工潮意义之复杂与重大。

此次工潮之经济的背景是日本纱业向中国纱业及中国工人进攻。世界纱业状况本在衰落时期，比英、美资本幼稚的日本照情理不能进展；然而日本资本家，一面正因纱业状况不佳，极力要维持资本的利益，渡过这衰落时期；一面却又想此时期扩大他的企业，独占中国之纱业；因此遂不得不向在他们纱厂的中国工人加倍榨取（如增进工作能率，改用女工、养成工等）与压迫（如打骂、罚金等），以达其保守而且进攻两个目的。日本人欲平安无事的施行其榨取与压迫，工人不至反抗，则首先须破坏工人的团体——工会。中国工人受不了这样的加倍榨取与压迫，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政治的背景，在全部局势说起来，整个的国际帝国主义，正在向整个的中国民族运动进攻，压迫中国工人是他们整个的进

攻之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进攻也最严厉。这种最重要，中国人现在还不大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是认识的；所以日本某报曾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次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咸认此风一盛，则各国在华工业，将受绝大影响。"单就日本说起来，直系倒后，日本挟有段、张这两个鹰犬的势力支配中国政治，制服中国人民，因此日本对于中国民族运动之进攻，比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更加紧出力，中国人对于他的种种加紧进攻，自然也特别感觉，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各方面对于此次工潮的态度是怎样呢？英美帝国主义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有冲突，而压迫中国民族运动他们是一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帮着日本工厂拘捕中国工人，拘捕同情于工人的学生，枪杀同情于工人的学生与市民，他们来到中国通商，他们居然在中国的地方——上海，有在法律以外任意枪杀中国人的特权。在此次上海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一切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民族是一致的，从前单独仇视日本，是错误的。

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他当然有替日本镇压中国人排日运动的义务，上海警察署曾对工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本不应摧残同胞，但怎奈日本领事压迫及长官命令何！……"山东张宗昌所统的奉军，更是听日本人命令，解散了纱厂工会，杀伤了工人数十名，驱逐工人领袖数十名出境，还囚送工人领袖六人到济南要枪毙。在此次青岛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国内军阀的确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张作霖的军队即是替日本屠杀青岛工人的刽子手！

全国的报纸，除青岛《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顾正红被杀时，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回想临城劫车时，全国报纸那样如丧考妣的号叫责骂，真令人认识中国新闻界的人格了！

只有可尊敬的学生，为了工人，为了同学，前仆后起的以热血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在中国民族运动中，那些社会成分是最急进的最勇敢的先锋。

1925年6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一七期　署名：独秀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

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之屠杀，曲在英捕横暴而不由于学生、市民之暴动，已由本月十一日会审公堂第三次研讯被捕者所宣布的判词完全证明了。

此次屠杀之最近直接原因，乃由于上海的学生、市民对于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而抗议，为租界英捕所屠杀。

同时，日本派遣军舰在青岛强迫中国军警，使其屠杀中国工人八名，伤者十余。

上海、青岛同时的大屠杀，激起全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国民公愤，罢工、罢市、罢课、集会示威，遍于全国。在这全国国民公愤中虽然有和平急进之分，而愤恨外人戳辱同胞，并且忆起历来的不平待遇，却已成了全国共同的心理，虽军阀、银行家亦为此心理所征服。

苏俄政府及人民对于此次屠杀事件及中国国民奋起，极表同情。代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第三国际已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国工人及中国民族运动。英国的工人及自由主义的学者已起来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抗议此次上海屠杀事件。

英、日、法、美、意的海军在上海登岸驻扎，占领学校，搜查行人。英、日、法、美、意的公使团始终坚持上海西捕开枪杀人是应该的。

汉口英领事召各国海军登陆，英国义勇队枪杀中国工人、市民八人，伤四十余。

段政府下令各省保护外侨。萧耀南、赵恒惕均令军警严阻学生游行演讲，并宣布戒严，以"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威吓市民。

依据上列各项事实，便可看出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了。

英捕英兵在上海、汉口杀人，不过是此次争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凶暴现象，此种现象之真正根由乃由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醒觉与反抗之示威。因此我们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仅以惩凶赔偿了事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示威，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第二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缩小战线对英、日或专对英国是错误的；因为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或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争斗之起因。第三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法律解决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第四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看做一个地方的问题，上海人只管上海，青岛人只管青岛，汉口人只管汉口，妄想住在各个租界的中国人得着一点市民权利便可永弭未来的冲突，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即此次屠杀也不但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种根本问题，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问题，

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第五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依靠现政府交涉解决是错误的；因为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能得着相当的解决，现在对于各处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并不向外人严重交涉，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刑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只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现在上海的外交当局蔡、曾、许那一个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些错误，便应该懂得此次争斗的性质，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决不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分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争斗；换言之，此次争斗应该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争斗的方法，不可依赖法律，亦不可依赖现政府，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

因此，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新政府第一个宣告，即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个宣告，即是那一国承认废约的宣告，并派代表来华商订相互平等的新约，便许那一国通商，否则请他们将一切商品运到别国去贩卖。

我们这个提议，是立脚在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之意义上面，不是立脚在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国人民不存成见，予以公正的考虑与讨论!

1925年6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一一八期　署名：独秀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

上海交涉破裂①是我们的失败么？当然不是的。反之，上海交涉不破裂，或竟至帝国主义者对于总商会十三条要求一一允许了，国人以为目的已达，停止一切运动，那才真是我们的失败。

主张上海开市是总商会的罪恶么？也不是的。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不在主张开市，而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

上海交涉移京是局部的变化，大资产阶级及其附庸（高等华人）之妥协更是当然的事，这都不是我们的失败，只有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不能继续团结前进才是我们的失败。

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尚继续工作，六月廿五、卅两日，全国都还有盛大的示威行动，香港、沙面运动之进行比上海更加猛烈，这些事实都可以证明工人、学生、中小商人都并未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失望。

在敌人方面，法、美帝国主义者虽取和缓态度，而英、日仍然

---

① 1925年6月16日，由北京公使团组织的英、美、法、日、意、比六国委员会同段祺瑞政府交涉员蔡廷干等在沪就“五卅案”举行谈判。18日，六国委员会以收回会审公堂等条款与“五卅”无关，不予讨论，谈判即破裂。

联合向我进攻，尤其是英国还在广州继续屠杀。英、日帝国主义者直接屠杀我们还不称心，更寻得一个有力的工具！大胆无耻的胡匪张作霖替他们做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张作霖的军队在奉天在天津在山东在上海到处压迫民众爱国运动，汇丰大借款喧传于伦敦，张学良在上海与英总领事之密谈，这些事实都是说明英、日帝国主义者需要张作霖替他们在此次风潮中做什么及张作霖已经替他们做了些什么。自从段祺瑞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更使英国感觉着利用他以前不愿利用的张作霖之必要；同时张作霖的政敌冯玉祥却明白的表示站在爱国的民众方面，张作霖更要倒行逆施了。这乃是此次反帝运动最近发展的新局面。

我们民众对于此新局面如何应付呢？

第一，要扩大工商学兵农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动机关，执行各地排货、罢工、废约、反抗媚外的军阀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实际运动。

第二，急须在北京或上海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以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

第三，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

第四，扩张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军于全中国，以扑灭张作霖、萧耀南等媚外残民的军阀势力。

第五，坚持继续排货及罢工运动，非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已。

1925年7月2日《向导》周报第一二〇期　署名：独秀

广州战争之意义

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争，社会上有三种误解：第一个误解说是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之战争；第二个误解说是胡汉民和杨希闵争夺地盘之战争；第三个误解说是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由此三个误解遂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在广州的共产党人诚然反对杨刘，并且努力援助国民党政府讨平杨刘；但他们反对杨刘并非因为杨刘不是共产党或不相信共产主义，乃是因为杨刘勾结香港政府及反革命的唐继尧、陈廉伯、马素等背叛国民党政府。广州政府完全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是共产党政府，并且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立政府，——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并未曾直接负政治上的责任。大家明白了这种事实，便不会有第一个误解。

据我们所知道的，开战之前几天，胡汉民、汪精卫都还没有讨伐杨刘的决心，坚决主战的是谭延闿与廖仲恺，因此我们便可以明白第二个误解也非事实了。

至于第三个误解之非事实，更属明显；因为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应该知道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一不是什么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二不是什么胡杨争地盘，三不是什么粤军排斥客军，乃是国民党政府讨伐通敌的叛将——杨希闵、刘震寰等。

唐继尧借重日本势力，谋攫两广，杨刘均为唐军内应，这是杨刘之罪一；在香港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及其走狗陈廉伯、马素，谋倒广州国民党政府，这是杨刘之罪二；杨刘有这二罪——国民党政府乃加以讨伐。因此，此次讨伐战争之意义，可以说：一方面是直接驱除反革命的军阀盘据广东，一方面是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英、日势力侵入广东。

国民党政府若从一致对外的瞽说，不用兵对内讨平杨刘，则现在广州市民仍在杨刘的反动势力压迫之下，日受香港政府命令箝制人民爱国运动；不独香港工人无广州后援不能罢工，而且枪杀广州游行示威的市民，并不须英人亲自动手杨刘的军队即可效劳。此次广州政府所没收英国帮助杨刘的大批枪弹，即是杨刘将以阻止广州市民爱国运动的利器。并且若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那能够象现在让香港沙面罢工工人及爱国学生在广州存在与活动，更那有什么青年军人参加运动的事？杨刘军事势力了结，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所以广州讨平杨刘之对内战争，在此次五卅运动上即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简直是胡说！

不错，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

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事实上"一致对外"乃是一个幻想，听你"一致对外"这口号叫得如何高如何响，尽有人不但不愿一致对外，并且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杨希闵、张作霖之所为；我们若是对于这类人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有意或无意放过在内的敌人。在内的敌人和在外的敌人倒是一致的，在此次争斗中，我们若不能否认有在内的敌人，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

1925年7月16日《向导》周报第一二一期　署名：独秀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

英国是帝国主义之王，此次中国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买弄中国人心。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国人一致行动，并且对中国民族运动表示相当的同情；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英美间遂现了裂痕，加之在华商业竞争，美国一部分舆论表示对华和缓态度，并主张有条件的取消领事裁判权；即至五卅事变造因之日本，亦以单独调解的声浪恫吓英国——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此孤立的状态中。

外交手腕最敏捷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一面捏造"报告未到"、"华人排外"、"列强一致"等话搪塞国会之质问，一面力与法、美、日本谈判，以英、日续盟威吓美国，乃成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新局面。英、法利害冲突过甚，不易调协：无条件的与英国一致，固法人所不愿；为拉拢法国一致对华，而在东欧或小亚细亚向法人让步，也非英人所乐为。这就是华盛顿会议所产生的四国协同对华政策现在不易实现的缘故。

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局成，在政府外交上或增加多少困难，而在国民运动上却有很好的影响，因为"单独对英"及"美国人是中国好友"这两个口号，都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自相分

裂。现在英、美、日本联合在一起，懦弱的资产阶级撇开日、美之心理虽然仍旧存在着，而事实上日、美却不许他们撇开，所谓“单独对英”明明白白成了一种幻想的单相思。在这样情势之下，至少也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之分裂不至过分的发展。

此时英国的政策是：（一）联合日、美一致对华以免孤立；（二）主张司法调查，延宕时间，以待中国国民疲惫，再图有利的结果；（三）勾结中国反动的军阀，扑灭中国国民运动；（四）以关税会议①诱惑中国军阀政府，准备在此会议，由要求清理外债进而共管财政，向中国进攻。日本仍旧采用他的传统政策，即是追随英国，取一致行动，获得在华和英国不甚冲突的利益。美国虽不全然赞成英国的政策，然而为维持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之威严及实施门户洞开政策，他是终须与列强取一致行动的。

这时的国内军阀又是怎样呢？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的军阀，也就是第一反动的军阀；他的对内政策是急须打破国民军，以免妨碍他的势力在中部自由发展，他的对外政策是公然压迫在他的势力下（从奉天到上海）的国民运动，结欢英、日以取得援助。国民军和奉张更在相反的地位，他们在张家口在河南都同情于国民运动；惟其因反奉而联络直系若一过相当程度，不但立刻失去社会地位，并将失去政治地位。直系尚有举足轻重之力，无论其联奉或联国民军都以直系重兴为目的，此时他们联奉之计划

① 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曾规定实行值百抽二点五的附加税。1925年8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照会参加该会议的各国，要求召开关税会议。12月26日，英、美、法、日、意、比、荷、葡、挪威、西班牙、丹麦和中国，共十三国在北京举行关税会议。由于军阀混战，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会议毫无结果，连各国已经同意的二五附加税也未得到。

已归失败，同时，张宗昌与杭州间，开封与武昌间，已有不断的联络。直系和奉张本是反动相等的军阀，只因他们在政治上失了优势，压迫国民运动还不敢象奉军那样横行无忌。段派虽无实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举动在政治上亦颇有意义；他的反动性也不减于奉、直，此时因与奉张利害冲突，其实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别开生面，向国民运动及国民军表示敷衍态度。

依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运动中眼前的死敌，在外的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在内的是奉天军阀，他们又正勾结一气。此外如美国的经济侵略及和平愚弄和直系重兴这两个危险，国民运动中若采用过当的利用政策，都会为了眼前争斗造下未来的祸根！

1925年8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二四期　署名：独秀

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

驻在上海小沙渡的奉军兵士对工人说："大帅派咱们南来时，说是到上海打洋人，早知道是叫咱们打本国人，咱们真不应该来。"这几句话把奉天军阀对于上海民众运动的态度形容尽致了。张作霖父子为什么要骗兵士说是到上海打洋人？这是不但派兵到上海占地盘和垄断私运鸦片报效不便说出，在民气激昂之初期，也不便明说来替外国人压服本国人，所以只得顺口说是到上海打洋人！

奉军进驻上海到底打了洋人没有？不用说是没有。其实上海市民并不曾主张他们来打洋人，不过张学良、邢士廉[1]对英、日人那样亲密恭顺，对本国人这样的压迫凌辱，相形之下，未免难堪。说他们对本国人压迫凌辱，奉军未必承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保护爱国运动，不过为地方治安计须制止越轨行动罢了。可是邢士廉一到上海便宣布戒严，爱国的民众集会一概禁止，连提倡国货的游行都不许；工商学联合会派人上街演讲，马上便遭封闭；海员工会及洋务工会也同时因惩治破坏罢工者而遭封闭；接

---

① 五卅运动爆发后，邢士廉率奉军约6000名，于6月13日至29日之间，先后到达上海。6月22日，江苏省长郑谦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士廉为淞沪戒严总司令。10月中旬，奉军被迫撤出上海。

着电车工会也遭压迫；小沙渡是罢工最初发动地，奉军特别驻军该处监视，连少数工人集会都不许；禁止学生会检查英、日货——这就是奉军在上海保护爱国运动的事实。京戏《逍遥津》中曹操拔剑威吓献帝，杀死伏后及二皇子，犹口口声声自称“忠良”、“忠心保国”，奉军保护爱国运动，又何以异是？

奉军这样的保护爱国运动，连他们的士兵也看穿了，所以说“叫咱们打本国人。”

奉军这样举动，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关系。上海是奉军初到之客地，和直隶、山东是他们已占据的地盘不同，所以他们在上海的举动，至少也要顾及上流社会的意见。

上海的资产阶级，还不像汉口、天津的商会那样反动向军阀告密，也还没有勾结所谓工团联合会的那班工贼来破坏工人团体；可是他们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自始总商会对于罢市即甚犹豫，罢市后，又不肯和民众集中的团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合作，随后又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十七条件外，别自提出十三条，这些举动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的民众势力发现显然的分裂。开市时，总商会也取了独断的态度，和工商学联合会不能一致；开市后，总商会是并没有履行“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的宣言。当总商会提出十三条件时，加入总商会的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登报声明一致拥护总商会所提条件，意在抑制工商学联合会之急进的主张，可是总商会的十三条件也未得结果，这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并不出来拥护，却想压迫工人总复工，好让大老板们照旧安稳发财。商联会虽然比总商会高明一点，而自从奉军戒严以后，对于急进的工学界，现出恐怖而厌恶的态度，甚至于动辄要退出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这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民众势力有了第二次分裂。民众势力有了这两次分裂，敌人焉有不乘机加紧进攻的道理？

上海商界富厚，为全国之冠，而他们对于罢工工人救济费，只经收外埠捐款，而本埠总商会及商总联会自己却都一毛不拔，并且不努力设法去募捐，只忙着求日厂单独解决，以减少救济费，这种苟且不负责任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看轻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像是一种滑稽剧了。

五卅事变初起之时，帝国主义者着实吃了一惊，假使民众势力不分裂，全上海工、商、学界一致团结努力前进，假使军阀不摧残爱国运动，民众有集会、演讲、游行示威之自由，则影响到全国运动之发展和北京交涉之进行，必和今天沉滞的状况不同，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呵！

1925年8月18日《向导》周报第一二五期　署名：独秀

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

（一）

上海工人两个半月的罢工运动，香港、沙面两个月的总同盟罢工，其他如南京、青岛、河南、北京各局部的罢工，在此次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运动中，已表示极伟大的力量。经过这一时期，对于以后的发展途径，我们应当有个明确的答案，以为民众争斗之指针；并应该有详密的策略，以决定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反抗国内军阀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及压迫，而力争解放中国之革命的道路。

（二）

对于这些问题要有正确的答案，便必须：（一）能正确的应用无产阶级两月以来联合城市劳动者及小商人而争斗的经验；（二）能正确的明瞭敌人方面——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利用之。

自从上海工人总罢工以来，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起来奋斗，始则在上海，随后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大致以改造租界制度，取消领事裁判

权，收回会审公堂，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改良工人待遇，惩治凶手，赔偿死伤损失为共同的政纲。上海之外，首先有力的响应的便是沙面和香港宣布总同盟罢工，接着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全中国南北各地。这两个月全国民众运动奋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见工人阶级所得的胜利——群众的工会组织，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铁路一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得着这样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因此，除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和寄生的小资产阶级如工头、工贼等之外，全国一般民众，都对于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表示同情，并予以物质的援助。

（三）

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得着这种胜利，是因为自己勇敢的反帝国主义争斗，并且和其他被压迫的民众联合。

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中，不但要拥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都要明瞭他们的利益，考察他们情形，竭力引导他们到反帝国主义的争斗里去，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不使他们中途退却，这争斗才能继续下去。

工人罢工运动所得的胜利还不止此，他在现时中国的情状里，一天一天的集中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并且使政府及军人中还没有象张作霖那样完全站到帝国主义那边去的，也不得不自相联合起来，应付帝国主义之压迫。同时，工人群众力争民族自由运动，更使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暴露他们那反对国民而做帝国主

义走狗的真面目：如邢士廉之于上海，张宗昌之于山东，李景林之于天津。

（四）

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力设法扑灭上海、香港的罢工，他们知道这两处罢工停止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大打击。他们也知道中国排货运动是他们的大损失，所以竭力运用下列政策，使中国民族运动根本摇动。一、他们以炮舰威吓广州——香港沙面罢工的策源地；二、传播谣言，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隔离；三、勾结奉系军阀，压迫上海、青岛、天津的罢工运动和上海禁止学生检查英、日货，这是他们最毒的政策。美国帝国主义者要想利用反英、日的运动，而发展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因为怕中国民众过于开展，他的政策客观上仍旧是帮助英、日，形式上维持帝国主义者在华联合战线。惟我们也应当知道英、日与美国内部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他对于中国解放之形式上的问题比其他帝国主义者容易让步。

（五）

上海、香港罢工都已在两个月以上，以中国地域之辽阔，交通之阻隔，政治之分裂，中部、北部各省的工人没有能及时响应，汉口、青岛、天津的罢工，都被军阀高压政策所破坏。这种情形，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工人和一般民众主观上的愤激不平，还在一天一天的增长，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罢工运动，在客观上

一时不能为有力的发展。北部、中部的罢工既然一时不能发展，上海、香港的罢工，便有孤立难以久持的危险，特别是上海罢工群众受政治上经济上双层压迫，比香港罢工群众所遭的环境尤坏。

在上海有一部分先进工人，他们看见落后的罢工工人，因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开始恐慌，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是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想借此泄愤，或拿他来代替现时困难的争斗。现在是群众的政治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

（六）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便可以答复今后的发展途径是怎样及今后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的策略是怎样。

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织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他对外让步，使他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

上海、香港的罢工，从全国性质的民族争斗，变成经济的争斗和地方的性质的民族争斗之后，工人阶级的奋斗却进了一个新的途径：不但对外争斗，而且对内争斗；不但和资本帝国主义

争斗，而且和反动的军阀争斗；不但为民族争斗，而且为民权争斗。本来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不能和力争民权自由的争斗分开；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中（如五卅事变初起对上海官厅及北京政府对人民之让步）；而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如段政府之交涉成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如奉系军阀摧残天津、山东、上海的民族运动）。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争斗中的民权运动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国内军阀中，第一个公然做英、日帝国主义者走狗的，第一个以武力破坏民族运动的，第一个蹂躏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的，就是奉天军阀。打倒奉天军阀乃是去掉国内反帝国主义争斗之最大障碍，乃是我们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所必取的途径。

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其他阶级的群众，如果还存着用和平方法可以达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心想，我们也不反对他们去尝试一下，尝试失败了，他们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所以今后我们的总口号应该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

1925年8月23日《向导》周报第一二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罢工与法律

当五卅事变发生，上海工人对于要求条件，提出"承认工人罢工自由"时，有些人以为工人要罢工便罢工，为什么要求有罢工自由？现在北京警厅已经正式布告答复这个疑问了。布告上说："按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其聚众为强暴胁迫或将为者，依骚扰罪第一百六十七条之例处断。同律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以文书、图画、演说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依上例处断云云。"原来工人没有罢工之自由，罢工在法律上是犯罪行为，工人安得不要求这个法律上的自由。

孙宗昉三出风头

上海有一位孙宗昉先生，我们看见他的大名第一次在报上大出风头，是代表"上海反共产男女同盟会"到上海县署呈请立案和赴京请愿；第二次在报上出风头，是用中华工会会长名义，勾结顾雪樵向日本人冒领顾正红的恤款一万元，事败，害了顾雪樵坐监牢；最近第三次在报上又大出风头，是骗取丝厂女工入会

费，被众女工向警厅告发，警厅已将中华工会发封，并限令获案之同伙三日内交出该会长到案。

1925年8月23日《向导》周报第一二六期　署名：实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简单的和你谈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时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

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知造因了。我们究竟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

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

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钞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组织

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公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

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织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的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

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

阶级之形成，是以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根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都比现在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P.和C.Y.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象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P.和C.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

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P.非C.Y.的国民党员得着失却训练的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P.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改组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P.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C.P.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P.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

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 * *

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

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么？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甚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卅日

1925年9月11日、18日《向导》周报第一二九、一三〇期　署名：独秀

《向导》[1] 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本报自民国十一年九月创刊以来，到现在刚刚三个周年。这三年中，中国政治经过了不少的变动，本报的革命政策之主张如何应付这些政治的变动，现在需要一个有系统的历史的叙述，以贡读者。

本报创刊正当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一方面反动的奉天军阀虽然失败了，另一方面直系军阀有代兴之势，尤其是曹党阴谋夺政，黎元洪的政府又昏庸无力支持；因此，我们在本报未刊行以前，在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中，即已喊出"继续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三个口号，所以本报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张都根据在这三个口号之上：发刊宣言上，(一)指出须推倒为国内和平与统一障碍的军阀之理由，(二) 指出须反抗为中国自由与独立障碍的国际帝国主义之理由；进行的方法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更具体些是主张集合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同时根据这个革命的政策之理论，反对当时一切非革命的理论，如"法统说"、"制宪说"、"武力统一说"、"联省自治说"、"整理财政澄清选举说" 等。在此时我们总的政治口号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① 原标题为"本报"。

的。第一、"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在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这口号一方面是继续着辛亥革命的观念而来，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军阀无论皖、奉或直，无一不是武力专政的魔王，让他们统治中国，民主政治是丝毫没有希望的；随后，我们以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第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次年（民国十二年）"二七"京汉屠杀事件，这半年间，直系军阀的反动日甚一日，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各省直系军人及其附属品——政客之横暴，惹起各地进步分子，不

断的反抗，至"二七"京汉屠杀案发生，直系军阀之反动已达最高度，正式与民众宣战。此时本报的主张是：统一国民运动的势力，打倒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这在统一的国民运动中，(一)须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以绝军阀后援；(二)武装平民；(三)须主张民主统一，反对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四)须集合各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一切战略；(五)须各派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要有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六)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知识阶级、工商阶级都应竭力赞助工人阶级的组织及运动，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在这一反对直系军阀时期，本报为鼓动积极的民族革命运动，遂不得不反对当时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和孙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携和平统一之主张。

从"二七"屠杀到去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年半间，是直系军阀全盛时代，中间经过黎元洪出走和曹锟贿选两次变故，中央政局现出向所未有的腐败与紊乱，各帝国主义者乘此局面，自临城案起，四方八面的向中国进攻；同时，中俄协定适在此时期成立，苏俄自动的放弃了种种特权，相形之下，愈加使中国民众看出帝国主义者对华政策之残暴无理，此为现在"五卅"运动的重大动因之一。黎元洪出走离"二七"屠杀只四个月，工人阶级尚未能恢复集中其势力，出来向直系军阀作战，拥黎的政学会，想联合安福、交通等系成为反曹同盟，他们公同的政策是运动国会议员南下，然而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政学会想国会南下拥黎，安福、交通意在拥段再出，同床异梦，他们的反曹同盟计划自然有始无终。当时上海总商会也表示反对直系，尤其是反对曹锟，其所组织的民治委员会，因与民众隔离及内部冲突，

随即无形消灭。此时我们反对那已经投降直系军阀背叛国民的国会议员们，有南下解决国事的权能，更不信政学、安福等政蠹拥黎拥段能得民众的同情。我们乃向国民党提议，要他在上海号召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的国民会议，来取决国事。我们知道国民会议这个运动即令一时不能实现，亦须继续不断的宣传，于武装暴动外，给民众一个撇开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自已出来解决国事的一条和平道路，实际上是集中民众势力行向革命的道路。黎元洪出走后四个月，曹锟于双十节贿选登台，登台后立即承认临城案全部要求，以为各国公使觐见的交换条件，帝国主义者知道曹锟的贿选为中国舆论所不容，非假外力不能自存，于是乘机敲诈，无所不至。此时民众深恶曹锟与曹锟损害于民众利益的，还不在贿选之道德的法律的问题，乃是媚外卖国的实际问题。此时本报的主张，于"打倒国贼曹锟"之外，还要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承认苏俄；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扩大国民党。

其结果，乃发生国民党改组及反帝国主义同盟、废约同盟、反基督教同盟等组织和宣传运动。这两件事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开始之显著的表现，惹引了帝国主义者十分注意。适于此时，因广州政府向税务司索取关余事，帝国主义者大派军船到广州示威，广州的工人阶级及革命学生异常愤激，主张收回海关。而各地资产阶级因关余和内债基金有关，反同情于把持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者。本报当时即向资产阶级指出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五件具体事实：（一）把持海关；（二）领事裁判；（三）驻扎海陆军；（四）外币直接使用；（五）强迫租借

领土。五项之中，尤以把持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工业发展的死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应该加入工人、学生的收回海关运动。

去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中国政治上发生了一大变化，即是：(一)民权民族运动之勃兴（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几遍全国，每个促成会都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的要求）；（二）工人阶级之再起；(三)倾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之发现。直军失败，不过是这些变化之导火线，不是真正原因，其原因已潜伏在直系全盛之时，即是：(一)列强进攻和中俄协定，给民众以剧烈的刺激；(二)胶济路罢工胜利，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组织，上海电车工人要求成立工会，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在直系全盛之后半期，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在民族运动刚要开始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渐恢复其反攻的力量；(三)国民党改组和反帝、废约、收回教育权之宣传，引起北方一部分军阀之民族的感情。这些原因，适逢直系失败，一派强大军阀势力统一而高压的局面一破，社会上各种潜伏的意志，遂乘时表现出来，而形成各种运动。本报应付此次政变的策略是：一方面告诉民众，不可妄想此次战争中，依赖任何一派胜利的军阀可以解救中国；一方面指明各省督军的和平会议有使军阀势力分而复合之危险；——只有召集全国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同时，国民党也主张由北京政府召集九种团体的国民会议。可是安福的段政府，并不但段政府，任何军阀政府，没有真正的人民武装，那会让真正国民的会议出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都起来了，民众的意志既然不能由国民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遂郁积半年，一发而为“五卅”运动之怒潮。

我们这一次号召国民会议所得的效果，和黎元洪出走时大

不相同，全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都有群众的组织和要求的内容，在各种要求中，大半都首列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有开始的基础了。然而盲目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几乎日日向中国进攻（见本报《外患日志》）。尤其是在上海：自工部局私刑打伤乐志华案起，接连着美国轮船船主枪杀中国水手十六人；领事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工部局自由越界筑路；工部局提议增加码头捐取缔印刷律及交易所注册；工部局派武装巡捕，为英商越界拆毁宜乐里房屋，驱逐房客，击伤二人，并拘捕房客联合会代表；领事团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美国人在华界组织三K党；工部局副捕头踢死工人叶乾章；哈尔滨路捕房西捕无故击伤某店伙；西人无故殴伤天寿里黄姓佣妇张月英；工部局搜查上海大学，逮捕《民国日报》记者，焚毁书籍；工部局因登载日本纱厂工人泣告书，控告《民国日报》、《商报》、《中华新报》，处以罚金之罪；日本纱厂无故枪杀工人顾正洪——积这些怨愤，"五卅"事变因此遂在上海发生。在这个运动的开始，有一部分英、美留学生，有意的或无意的说：大马路血案是西捕杀了人的法律问题，不必牵扯到对外的政治问题，本报乃大声疾呼，告诉民众，此次反抗屠杀案，乃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法律问题；并向民众解释屠杀案所给与我们的教训：（一）不分英、美与日、法，一切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一致的；（二）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事实，不是共产党人捏造的；（三）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等国，和非帝国主义的俄、德、奥等国之不同；（四）懂得了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可被"过激"、"赤化"这些头衔吓退；认清了只有工人、学生是此次运动中的勇士，各国的工人、学生都对于中国人表示同情，因此，我

们的运动应该反抗践踏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者，不是拿国家主义来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本报当即主张：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国民革命政府。随后全国民族运动的怒潮，因资产阶级之妥协和奉系军阀之高压，大受打击而陷于停顿状态；本报鉴于现状，遂主张改变此种民族争斗的新途径是：(一)改变上海、香港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二)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三)开始国内战争，合全国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天军阀。

我们相信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之更大的发展，须在打倒奉天军阀及中国工农阶级的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由之后。

1925年9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二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

北京国民党俱乐部①开会，议决通电粤、桂将领，一致讨伐广东共产政府，并联合同志发行反共产出版物。最好这些反共产的出版物，都请戴季陶去主持，因为戴季陶近来的思想都和该俱乐部前月卅一日发出的通电根本相同。

奉军在北京之治外法权

奉军驻京机关，因北京《民报》误载张作霖逝世消息，既将该报发封了，并直接逮捕该报经理陈友仁，押送天津奉军之法课，听说还要解到奉天去。北京自有司法及负地方责任的军警机关，奉军何以能够撇开这些机关，自己封报馆捕记者，捕人后还要解出北京？即令奉军在北京享有治外法权，可以自行拿人治

---

① 1925年3月8日，一部分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大会，其主要成员有冯自由、张继、邹泰祺等人。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各省，否认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本党毫无关系"。5月25日，通告全体党员，"有列名北京俱乐部者，速声明否认"，否则"应即严惩"。

罪，也不必由北京解到天津或奉天！这种举动，未免使段政府的面子太难堪了！但这乃是军阀的惯例，从前曹军逮捕长辛店工人，也是不解北京而送到保定府；不过长辛店毕竟还不在北京城内！

1925年9月11日《向导》周报第一二九期　署名：实

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

现在的中国关税问题，已经不是一简单问题；不但在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是第一重要关键，中国人民应该力争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间及军阀间，都会因此次中国关税问题，惹起极大冲突。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付五卅怒潮的政策，一眼看定中国军阀政府只要有钱便肯卖国，故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便提议和五卅事件毫不相关的关税会议，以饵中国军阀政府，使之抑制中国人民的民族运动，他这政策现在果然收效了。关税会议如果真能平息五卅怒潮，关税会议如果只能有二五加税的结果，则英国所得已多，所损失的进口加税，以他的精制品，比日本的粗制品所损失的犹少。

然而帝国主义的日本，为什么也赞成关税会议呢？日本有大宗粗制的日用品输入中国，因增加进口固小有损失，但是他能在关税会议攫取中国总税务司的地位，则所得甚大，保证西原借款的利益，犹在其次。对华贸易额，日本已驾英国而上，居于第一位，在法律上已有取得中国总税务司之口实；在政治上又有安福政府的暗助，他看出奉张会竟至袒英，遂乘国民党与国民军有单独对英的主张，设法接近他们，利用他们，尤其要利用冯军，以威吓奉张，因此或者能遂其野心。不过总税务司一致用日本人，使

是支配中国财政的特权从英国手里，转移到日本手里，这件事英国帝国主义者又何能忍？

美国帝国主义者，又何以赞成关税会议呢？美国对华贸易额本不甚巨，受中国进口加税的影响尚小，却正可因缘关税会议，发挥其华盛顿会议之最得意的主张——门户洞开，机会均等。关于总税务司问题，美国必助英而抗日。

法国帝国主义者，对华贸易更不及美国，所以也赞成中国关税会议，藉此保证其金佛郎案所得利益。英、法两个帝国主义者冲突甚烈，关于中国总税务司问题，法国会左袒日本。

以上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在中国关税会议中的利害冲突。

在国内军阀方面，无耻的奉张，对于各地五卅运动，始终是用高压政策，把参加五卅运动的主要团体看做眼中钉，时刻想拔去而后快心；可是到了由五卅运动所唤醒帝国主义者久已忘了的关税会议，他却当仁不让，想垄断未来的二五加税，使梁士诒组阁，做他的外府。安福政府，对于日本想攫取中国总税务司，固然是一桩好买卖，就是二五加税，他们不到山穷水尽，也未必肯睁着眼让奉张拿去，段、张间也许为此问题，由暗斗而至明争。恐怕民众运动拆散了他们二五加税的好梦而取高压政策，这是段、张同样的心事。以前段政府因为藉外交以固位的政策，对于民众运动，取敷衍态度，现在不但修改不平等条约已抛到九霄云外，而且深恐爱国人民坚持关税自主，触怒了外人，破坏他快到手的财喜，——二五加税，因此拿出本来面目，公然禁止罢工，干涉集会结社，查禁共产党，封闭报馆，封闭上海的一切工会并拿办其领袖，以取悦于外人了！攫得二五加税者非张即段，当然于冯无与，所以冯主张关税自主，不主张在现制之下要求加税；可

是他近来颇接近日本，将来关于总税务司问题，他是否能够贯彻关税自主的主张而不祖，还是一个疑问。

以上是军阀们对于关税会议的利害冲突。

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五卅以来参加民族运动的民众，对于此次关税会议，应取如何态度呢？会议是定要开的了，我们不必根本反对这个会议，我们要在这个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的海关，应归中国国家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之下要求加税。在现制之下要求加税，即使不以废厘为条件，进口加二·五，每年不过二千万元左右，而加至一二·五，也不过七千万元左右，以岁收二千万元或七千万元，出卖国家主权及国民经济发展之命脉，军阀政府固优为之，人民决不甘如此！

我们所谓关税自主，具体说起来，乃指税则自主与管理自主二事。税则能自主，然后进口税何项应加重（如奢侈品），何项应减少（如机器及教育用品），出口税何项免税（如丝、茶及工业制品），何项应重税或竟至禁止出口（如谷物及棉花等工业原料），才能够照实际需要，随时自由增减，以保护本国工商业之发展，这就叫做保护关税政策。管理能自主，然后税务司不论任用本国人或外国人，一切用人行政支配税款，才能由中国自由处置。现在中国的海关，税则不自主，无论进口或出口，都须得外人同意，不但不能自由加税，并自由减税或免税也不能；管理不自主，全国税务司等高级职员千余人中，竟至无一华人，总税务司则须任用对华贸易最优越国之人，大权外移，驯至中国政府不能够支配税务司，税务司倒可以支配中国政府；不但海关税收不存中国银行，并且拒绝中国钞票。这样不自主的海关，在名义上虽然是

中国海关，实际上，简直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管理中国财政，保护外国工商业和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总机关。

因此，海关自主与否，的确是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第一重要关键，倘舍此不图，只想在不自主的现行关税制之下增加关税，则保护关税政策不行，国民经济便无自由发展之望。即所加之税，无论加至若干，也是用整理外债及政费名义，归到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手中，于中国国民毫无利益可言；不但无利益，而且进口税一加，物价因之高涨，常言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增税额，仍要辗转归消费者中国国民担负。五卅以来，中国国民流了多量热血，倘若连一部分经济解放的关税自主都不得着，结果反要国民拿出血汗来增加帝国主义者军阀的收入，如此，五卅运动，不算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成了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增加收入的运动了，试问我们怎能甘心！

现在关税会议快开了，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奋起力争关税自主，反对在现行关税制度之下要求加税，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一切人民团体，都应该立即表示一致的态度；对于在此次关税会议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加以罢工排货的长期抵制；对于只图加税不力争关税自主的中国政府，立即请他下野。

中国如果真有爱国的军人，他能拿起枪来讨伐卖国军阀，则这种战争，才不是军阀间的地盘战争，才比什么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国（国民军）奉战争都有价值，因为他是爱国与卖国之战争，不是为了一派军阀的个人私利。

我们也要忠告全国商会，你们须要坚持现在的态度，并须联合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力争关税自主到底，不可因为容你们在内

债方面分得点赃便中途妥协；更不可持单独对英的谬论，附和安福政府为日本人争得总税务司地位！

我们说要废除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说要调查司法；我们说要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又说要调查什么？除不平等条约外，帝国主义者直无丝毫理由可以拒绝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若以担保外债及庚子赔款为词，也是无理取闹，即令我们不否认外债及庚子赔款，关税自主仍与外债及赔款之担保无伤，因为用做担保的只是海关收入，并不是海关主权——税则制定权及管理权。

裁撤厘金，固然是全国人民急迫的要求，但绝对不可拿做关税自主及加税的条件；因为关税应该自主，厘税本来自主，裁厘应该是自动的，关税自主及加税应该无条件的。

我们所要求的关税自主，不但是无条件的，尤其应该马上实行，不加限期，有条件有限期的关税自主，便是帝国主义者一个骗局。在限期未到以前，他们当然不须实行，不妨仅以口惠和缓中国人民的空气，即将来限期到时，他们又可藉口中国未曾履行某项条件，搁置前议，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会议之执行延宕至今，便是一个榜样，这也是关税自主运动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要点！

1925年9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三一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康有为与奉系军阀

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复辟犯，不但是既往，现在还是继续活动。他于本月六日由青岛到济南，公然下榻督办署，公然到东鲁中学讲演，马上还要到奉天去，这尚成何世界！奉天军阀一面压迫爱国工人学生，一面欢迎复辟犯，这又是何种世界！上海人只知道攻击江亢虎，未免有点欺弱吧！

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

戊戌前后的康有为，未尝不是一个新奇的怪物，随后那样开倒车。爱国学社的章士钊，何尝不反对康有为；即《甲寅》月刊时代的章士钊，又何尝不是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民权报》时代的戴季陶，何尝不大骂章士钊；《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更是大谈其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我盼望他将来不至跟着章士钊开倒车！

段执政的《甲寅》

自《甲寅》周报出版，许多人责备章士钊过于开倒车，胡适之竟说“老章又反叛了”，滑稽的吴老头儿更至登报报告“友丧”。其实大家都错怪了章士钊，因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并不是章士钊的机关报，只看该报登载许多肉麻的话恭维段执政便知道。又有人说：《甲寅》周报记者孤桐，不是章士钊吗？这我更为章士钊辩护了，办理《甲寅》周报的股款，都被章士钊送到交易所了，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那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呈请戒严司令部，出示禁止罢工，“以维实业而保穷‘民主’计”。这些仁爱的资本家，想必是受了戴季陶的感化，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

1925年9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三一期　署名：实

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

现在的广州政府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现在的北京政府是继续前清以来的军阀官僚政府（即袁世凯亦称北京是一大臭虫窟）。这种历史的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北京政府及其所统辖的各省虽然挂着一块民国招牌，实际上，一切制度、人物、思想、习惯，仍然是光宣时代的故物，一切民国成立的基本条件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仍然丝毫没有，连双十国庆的集会游行都被禁止，这是什么民国？这还有什么双十纪念之可言？

反之，革命的广州政府究竟是怎样呢？我们批评广州政府，应该把他分为两个时期：在讨伐杨、刘以前为一时期，讨伐杨、刘以后为一时期。在前一时期，广州政府建设在西南小军阀及买办阶级的势力之上，因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闹得一塌糊涂，实在不成个民国的形像；然而政府领袖们确是有革命意志的，他们眼见政府不能实行党义确是痛心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在广州政府之下是有相当自由的，所以我们自始即不能不承认广州政府比起北京政府来确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在后一时期，即讨伐杨、刘后的广州政府，乃建设在革命的民众与革命的军队之上，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了。这革命政府中可敬的领袖们，一秉中山先生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对内毅然决然的废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这些秕政，毅然决然的谋军政财政之统

一，更毅然决然的驱逐那些寄生于秕政阻挠军财统一的军事领袖，而毫不顾忌；对外则领导革命的民众，不计成败利钝的与香港政府作战，成了此次五卅运动中为民族利益最后力斗之孤军。如何拥护此为革命而力斗的孤军，使他不至为英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所破灭，这是今年双十纪念运动中全国革命的民众所应第一注意的事，因为双十节所纪念的是革命的势力之胜利，不是反革命的势力之胜利。

广州政府现称国民政府，我们可以承认他确能名副其实，他此时虽然未曾统一全国，而他的工作，都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国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这班国民政府的领袖，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们这种英勇奋斗，才真能把中山先生生平不妥协的革命主义完全表现出来了。只有这班英勇奋斗的领袖们才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若口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还徘徊依违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那便是中山主义的叛徒；中山主义的信徒与叛徒，只有在实际的革命争斗中才能够分别出来，别的著书立说都是欺人之谈。

民国六七年，京沪间的官僚甚至于国民党党员，对于中山先生有一个很流行的批评道："孙中山是一个有革命癖的人，无论到何时他总要革命，恐怕他的儿子孙科做了总统，他还是要革命咧。"他们以为这几句话是讥诮孙中山的，殊不知这几句话却真能将中山先生可尊敬的全人格表现出来了。中山先生是世界上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一个人，只要赞成他革命，虽巨恶如徐树铮、梁士诒，他也肯与之周旋，若不忠于革命，虽多年共患难的同志如黄兴、陈炯明，他也不惜与之决裂，若孙科为总统而不忠于

民国，他当然起来革命。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从来不以爱憎亲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东方民族中，他的确是杰出的人物，在国内一切主义不同的革命派都钦佩中山先生，也就在这一点。现在广州政府的领袖们，只计是非不顾利害的英勇奋斗，无论成败，中山有知，必定是含笑称赏的。十二年四月间，余正在大元帅府和中山先生谈话时，有人匆匆来报，大元帅府会计主任，为刘镇寰索饷不遂掳去，中山先生大怒，立召蒋介石参谋长，即谓须严惩此辈不法军人，宁可失败而离开广东，也不可不和他们一斗，言时声色俱厉，其实当时所谓孙大元帅蒋参谋长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终于隐忍过去。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为党建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现在和广州国民政府为敌的内外恶势力是些什么呢？国内恶势力出头来破坏国民政府的，为主的自然是陈炯明、林虎、洪兆麟、叶举、魏邦平、邓本殷这班括广东地皮还没有括够的小军阀。这班小军阀的势力，曾为革命的党军所击破，为什么现在又能结合起来向国民政府进攻？一是因为许崇智妥协姑息政策所留下的祸根；二是因为他们新近得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各方面的援助。香港政府公开的送三百万子弹到汕头；港商资助陈炯明百多万现金，内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

出来的；段政府帮助陈军三十万元，又派遣海筹、永绩两舰助战；福建派张毅的军队到潮州助战也是公开的；江西和湖南也正在准备援助陈军向粤进攻。陈炯明等除了得到上述各方面的实力帮助以外，还有国民党中反动派的声援：谢持、石青阳等勾结熊克武，密谋在广州响应陈军；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的和陈炯明、杨希闵合作，该俱乐部所挥霍的就是段祺瑞所给杨希闵的招待费三万元，他们更打算广东外交代表团到京时，开会欢迎林森、邹鲁等代表，劝其通电联陈反蒋；廖案一大批罪犯，更是奔走上海、香港间密谋勾结广州残余的反动军队，候在党军出征东江时，起来叛变。陈炯明等小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及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他们攻击国民政府之共同口号就是"反共产"，和以前唐继尧勾结杨、刘在广州谋叛的口号一样；其实广州国民政府里，可以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党员，更未曾并且未打算采行一点共产政策（反动派军队所衔恨的国民政府政策，如军政财政统一及废除苛捐杂税禁止拉夫赌博等，难道都是共产政策吗？）。他们所谓共产，便是指革命，"反共产便是反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罪状，真是不打自供了。国民党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头上自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对于真能为中山主义在广州奋斗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诽，并且公然致函蒋介石阻其急进，又请张静江函劝蒋介石离开广东；他们这种举动，实际上也算帮了陈炯明的忙，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不赞成陈炯明与反动派。

国外的恶势力，不用说主要的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抑制中国民族运动与抑制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以期长久保持他们的在华特权，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尤其是英国的香港政府对于广东的政策。广东迫近香港，恰好近几年来

广东的政权又落在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人手中，真所谓“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因此香港政府不断的利用陈炯明，利用商团，利用杨、刘，阴谋破坏广州政府。可是他的阴谋都着着失败了，尤其是杨刘失败后，英人失了一切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工具，同时香港沙面大罢工的工人得以广州为根据地，又以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得以坚持，使香港英人眼见每天损失四百万元，而不能使用在上海利用奉军压迫罢工的方法，英人正在无可如何，适逢粤军中的反动派领袖，反抗国民政府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开赌，统一军政，统一财政等政策，香港英人遂乘机利用之以成刺廖案；幸而国民政府有肃清内奸的决心，不姑息的逮捕诸反动领袖，解散诸反动军队，是时香港英人老羞成怒，遂至鼓吹直接以武力攻取广东，美其名曰为中国谋统一，究因国际形势不容英人能够这样横行，其计又不得逞，于是决心再以实力援助陈炯明、魏邦平、邓本殷等，以成现在东南两路来攻广州国民政府的局面；全国的反动派——北洋军阀，香港大商买办阶级，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小军阀，国民党的反动派，遂在此局面之下，形成了中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一齐拿着“反共产”、“反苏俄”的旗帜，向广州国民政府进攻，为英国帝国主义效劳！据本月八日路透社香港电说：“港督今日在立法议会提出预算时演说，谓渠信广东有智识之人，必不能再容外方及他省营利之徒施行暴政，大约本年底来年初可望恢复秩序。……今在本地募债，未必成功，而此时请助于伦敦市场，据所接英国消息观之，亦属不利，盖投资者以为香港状况不佳，非有极优之条件，必多迟疑也。故非俟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已遭失败，不宜募债云云。”在这小小一段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一）他所谓过激派（英人眼中的过激派，

一切爱国运动者都包含在内，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等，更不用说了。)破坏香港之企图，所加于香港英人经济的打击，实在万分明显，所以他不得不运用阴谋，利用中国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推倒广东革命的势力；(二)他明白供认他曾经教唆广东有智识之人(当然是陈炯明)排斥外省人，排斥客军；(三)他已经很有把握的计算他所利用各方面的势力，在本年底来年初可以占领广州；(四)香港的经济状况，已无法得到伦敦的救助，只有俟反共产反苏俄的广东有智识之人占领广州，使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遭了失败，才有救星；(五)革命派及反革命派在广东之成败，关系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之利害，是非常明显的了。

这样在内外之恶势力四面八方的进攻之下，广州国民政府也会失败，如果失败了，失败的不只是广州国民政府，实在是全中国民族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命脉。成功的是谁？不用说是陈炯明及国民党的反动派，尤其是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这就是全中国革命的民众在今年双十纪念中所以不应忽视这一件大事的原故，更不可把这件大事看做广东的局部问题！

又有人以为广州国民政府联俄拒英，不免以狼易虎，失了民族运动的意义。象这种错误的观念，实是中国民族运动一大危机。第一我们应该明白：所谓民族运动，其意义是要求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不受他民族之政治的压迫与经济的剥削，决不是一民族的闭关主义，并且在这一民族运动中，要得到他民族同情的援助，才格外容易成功。第二我们应该明白：此时世界上各民族能够以实力援中国民族运动的，还只有苏俄，若印度、若土耳其、若朝鲜、若加哇等被压迫的民族及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还只有精神的援助。第三我们应该明白：在理论上，援助被压迫的民

族，是苏俄立国之信条，他若不以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便是言行不符；在事实上，苏俄也刚从西欧经济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现时也还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四面进攻中，他正需要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如印度、加哇等）及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德国、土耳其等）结成联合战线，抵抗帝国主义之进攻，他援助中国，即是援助他自己，不但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应避讳苏俄的援助，并且到了民族革命成功，还应该更进一步和苏俄缔结同盟，共同防御帝国主义之进攻。第四我们应该明白：在实际事例上，苏俄实行其立国信条，援助了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援助了波斯的民族运动，援助了阿富汗的民族运动，都是无条件的同情援助，他对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不曾有过压迫和剥削的事实发生；即对于中国的中俄协定，苏俄自动的放弃了那帝国主义者经过五卅大流血还不肯放弃的许多权利，他所得的是什么？苏俄实是援助了广州国民政府，而都是无条件的，也丝毫没有什么压迫或剥削的事实发生过，若说聘用苏俄军官改造海陆军便是授权于外人，那便是把苏俄看做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不能够接受他军事的援助了。“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欧洲帝国主义者造出来离间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和苏俄联结的方法，现在中国有些反革命分子，也跟着学舌，真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帝国主义者好比是些强盗，苏俄好比是和我们守望相助的邻人，若把邻人也看做强盗，拒绝他们的援助，这正是强盗们暗中称快的事。象陈炯明等及国民党的反动派，更是要竖起大旗来帮强盗攻打邻人，所以他们竟会把“联俄”算做广州国民政府的一桩罪状。

1925年10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三三期　署名：独秀

反奉运动与法统问题

我们为什么反奉？这是因为奉系已成为国内最有势力的军阀，他对内可以造成一派军阀势力统一中国的局面，使军阀政治格外演进，他对外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有力的最信托的工具，使民族运动格外遇着摧残；所以我们反奉之目的是在对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对内的到政治的自由，这本来非常简单而明瞭。

一个简单明瞭的反奉问题，现在却含着一些复杂性质，这是因为反奉运动中潜伏了直系复兴的危险。

不用说，直系是一派反动的军阀，他不但以前是反动的，现在仍旧是反动的，他的反动性并不减于奉系，然而他现在支配政局的力量却非奉系可比，他在反奉运动中的力量，比起民众及国民党国民军来，他只是百分之几。在这全国反奉运动中，虽只百分之几的力量，我们自然也应该一律欢迎，若在反奉运动中攻反奉之直，客观上便是助奉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告诉直系，人民虽不念旧，而现在只是为对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对内的到政治的自由而反奉，决不能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反奉。所以章太炎还知道说："吴佩孚出山讨奉，目的须纯在国家，方可得国民同情，若涉报复或争地盘，则不可预知。"

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举兵反奉，当然是直系真实的心理，由这种心理而表现出来的政策，就是所谓维持法统。在吴佩孚、

孙传芳通电中虽然未曾涉及法统问题，章太炎致岳维峻电中虽然明言此时不议及此问题，而事实上直系终须用法统这个假面，做他们复仇复兴之工具。他们所谓法统有二解：军人派所谓法统是指曹锟的宪法，政客派所谓法统是指民国约法。维持前一个法统，便是所谓护宪，也便是拥护曹锟；民众对于贿选的余怒犹未全息，直系若拿出护宪拥曹的旗帜，直是为奉方宣传，直是自杀政策，直系中稍稍有点头脑的人当不出此。维持后一个法统，便是拥护约法，即是讨段；段祺瑞、章士钊诡称革命破坏约法，自然是可笑的很；但是约法本身的好歹且不论，此时民众迫切的要求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对外的民族自由，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对内的政治自由，决不是什么一纸空文的约法可以使民众满足的。况且缘约法法统而发生的问题，便是恢复旧国会，这种千夫所指的旧国会，即令没有选举吴佩孚为大总统的预定计划，即令除去贿选分子，也不能得国民之信任了。现在救济这个法律之穷的出路，惟有倒奉后，在事实上占据北京政府者，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家根本问题：所谓国家根本问题，正是现在民众迫切要求的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对内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因为这才是中华民国真实存在之基础，写在纸上的宪法还在其次。

什么法统问题，决非民众的迫切需要，不过是直系拿来做面具，来遮掩他们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举兵反奉的隐衷罢了。

所以为反奉而战，虽直系我们也可以不因既往而阻挠他们现在的行动；他们若终于为法统而战（实际上是为直系正统而战），民众反奉胜利之后，继以反直，这也是意中的事。

1925年10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三四期　署名：独秀

寸铁

戴季陶之道不孤矣

张作霖的爪牙张宗昌在国庆日演说："我中华立国四千年来，莫不以道德为根基，山东系圣贤桑梓之地，尤为注重，而近年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二字，几致沦亡，其弊端约有五项；（中略）三则我国学生，自沾染新文化后，日趋日下，近来各校添设讲经，实所以挽已倒之狂澜；四则近日之工潮，若赤俄传来之共产等语，贻害人民，良非浅鲜，非严加取缔不可。……"赵恒惕的走狗荆嗣佑在长沙报上发表组织国民党的谈话说："我们有一重要的话，要普告国民大众，就是我们要以中国的人力，中国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志，正人伦，明天道。我所谓中国方法，就是指王道而言，王道之纲要有三：一曰黎民不饥不寒养生送死无憾；二曰谨庠序之教；三曰申之以孝悌之义。"想用旧的道德文化救国之戴季陶，想把中山先生从被人轻侮的革命党方面拉到被人尊敬的圣贤方面来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之戴季陶，他听了张、荆二位的议论，定会眉开眼笑的说一声"吾道不孤矣"！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近年来每一运动发生，反动派便说是共产党主持的，以至段祺瑞、张作霖都发严令光顾到中国共产党，李景林、张宗昌告诫人民勿信共产党的告示，更是贴遍了直隶、山东全省的城镇乡，为共产党登了一个大规模的广告，并且一般痛恨李景林、张宗昌苛税的乡民，反疑心共产党或者不错。浙军一到上海①便首先注意共产党，吴佩孚一到汉口便对路透社记者说"彼殊反对共产党与过激党，若辈皆害国之徒，渠拟以坚决手段对付之。"我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何等力量能够使军阀们这样惊心动魄！

又是一个共产军！

杨宇霆在天津对东方社记者说："万一不幸而有国民军一致对抗奉军之事，是则共产军与反共产之战争，正期待日本以下列国之同情与援助云云。"说国民党的军队是共产军，已经是离奇了，现在又说国民军是共产军，岂非奇之又奇？树起反共产的旗帜以求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这是全中国南北大小军阀一致的策略呵！

1925年10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三四期　署名：实

① 1925年10月15日，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率部讨伐奉军，浙奉战争爆发。16日，浙军占上海和宜兴一带。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受了帝国主义侵略八十余年的中国，为什么欧战后渐渐才有了有意识的民族运动?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一方面中国的工业乘欧洲大战机会一时有了相当的发展；一方面大战后帝国主义者因弥补战中的损失，加紧向中国等经济落后的民族剥削进攻，促起了反抗。(二)在主观上，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

苏俄十月革命之内容是：(一)城市工人打倒资产阶级而得了自由；(二)乡村农民打倒地主阶级而得了自由；(三)俄国境内的小民族打倒俄皇及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得了自由；(四)全俄人民脱离西欧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得了自由。前二者是阶级运动，后二者是民族运动，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开端。这两种革命运动，在苏俄同时并行，不但没有妨害，而且正因为工农阶级奋起得了政权，对外拒绝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合作，对内取消前俄帝国主义的政策，即强迫民族同化于大俄罗斯的政策，因此民族运动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否则若照当时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政策，至今全俄人民仍旧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协约国羁绊之下，俄国境内诸小民族仍旧屈服在资本主义的大俄罗斯政府权威之下，这是毫无疑义的。

工农解放民族解放这种双管齐下的苏俄十月革命，他自身的成功并影响到世界革命，后者更胜过前者。盖自十月革命后，多年不能解决的俄国境内诸小民族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俄更进而援助近东、远东诸弱小民族与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等），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这些事实已足证明苏俄十月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上比在工农解放运动上更为成功。

按道理讲起来，现在全世界凡是被压迫的阶级以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援助之下，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大家才有出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没有例外，也应该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可是还有许多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人们，竟不是这样想法。在一班深受了英美帝国主义教育毒的博士们，不但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根本大患，并且不承认世界上真有什么帝国主义，仿佛是共产党人捏造的名词；因此，中国也自然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这班人我们不必去论他。又有一班人很明白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并且明白非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无由解放；可是他们以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只好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不必联络苏俄，因为联俄有三个危险：（一）是联俄中国便要实行共产了；（二）是联俄中国便要被俄国侵略甚至于被俄国占领了；（三）是联俄则帝国主义者更要严厉的对付中国了。他们因为怀疑联俄有这三个危险，遂至甘心退出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独立地位，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之所愿，而是中国之不幸啊！他们所怀疑的三个危险，现在略为解释如下。

第一，苏俄许多主要人物固然是共产主义者，苏俄实际政治固然也有若干小小部分采行了共产主义的政策；然而决没有不问青红皂白，随意推行于任何国家的道理，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决不能不待其国内自然发生而可以从外国宣传出来的。至于苏俄援助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这和共产运动更完全是没有连带关系的两件事。苏俄所援助的波斯与阿富汗，都还是专制君主的国家，难道也是共产运动吗？苏俄又曾援助蒙古，难道游牧的外蒙也能实行共产制度吗？苏俄确实援助广州政府，然而除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陈炯明等造谣以外，广东可曾采行一点共产制度呢？

第二、旧俄罗斯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苏俄若要侵略中国，自然是继续旧俄政策，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作同样的行动，取同样的态度，他为什么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对中国，都放弃了旧俄所得一切特权，使一切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怖呢？苏俄如果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便自然要站在帝国主义者那一边，决没有站在被压迫的民族这一边做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运动的道理。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乃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离间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结合，如果苏俄真是赤色帝国主义，我们便不必怕赤化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必恐怖我们赤化了。在经济上说起来，苏俄方在刻意消灭资本主义，那里还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可能，因为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说起来，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乃苏俄立国之方针，"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予不取"，乃列宁之遗训，他们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等，都不曾违背此遗训，岂有单要侵略中国之理。

第三、中国自来不曾联俄，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不算不严厉了，反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正因其民族运动得着苏俄援助而发展，帝国主义者遂有所顾忌而让步；即以中国近事而论，帝国主义者虽然大叫五卅运动是赤化，然而他们正因为中国有了赤化的五卅运动，终不得不于关税会议有相当的让步，尤其是他们对于联俄赤化的广东，五个月以上的总同盟罢工，几乎使香港变为荒岛，广东政府竟不许经过香港军商船进口，日船违令进口，政府军枪杀日本船员二名，日领只得一面向政府道歉，一面请求抚恤死者每人二千元，英、日帝国主义者竟未能以一枪一弹害广东。这是因为：(一)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甚烈，已没有向我们联合进攻之可能；(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之民族革命，都有乘机奋起之势，帝国主义者已没有以武力消灭此革命大潮之可能；(三)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内，随时都有阶级革命爆发之可能，帝国主义者若以武力压迫苏俄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必为工人阶级所反对，尤其是运输工人足以制其军事运输之死命。并此诸因，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严厉的以武力对付中国政策已不适用，他们今后的政策乃是：(一)以金钱军器收买中国军阀，替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二)教唆中国的反革命派，大喊其赤色帝国主义和反共产，以破坏中、俄联合；(三) 以小恩小惠收买中国商人及英、美博士们，使他们协同军阀官僚阻挠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之发展。我们敌人不但在国外并且在国内，他们都根本不要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并不是因为联俄，帝国主义者才要严厉对付中国。

我们若明白上述三个联俄的危险都非事实，同时便自然明白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必要；并且同时

便自然明白所谓“反苏俄”是破坏国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所谓“反共产”是破坏国内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因为国外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苏俄，国内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共产党。

1925年11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三五期　署名：独秀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

在全国的工人、学生流血奋斗正热烈中，而全国商人竟一致反对排货，天津、汉口、青岛的商会竟反对工人、学生之爱国运动，向军阀告密。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竟丝毫不肯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时报》竟为工部局删改上海市民大会的电报，新、申两报竟为工部局登载"诚言"。资产阶级的学者名流，即所谓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竟宣言要"友谊的磋商"与"双方谅解"，竟公然说：此次惨剧发生的责任究竟谁属，现犹不

能断定，中外当局应先从事调查，真相明白然后始可言解决，现在之罢工、罢市、罢课的紧张局面，首先应设法使之和缓（宣言大意如此）。

上海是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五卅事变恰恰发生在上海；因此，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说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他的态度可分为四个时期略略述之：（甲）罢市之初为第一时期；（乙）从罢市到开市为第二时期；（丙）从开市到总工会被封为第三时期；（丁）从总工会被封到现在为第四时期。

五卅运动一开始，上海资产阶级即带反动倾向，其表现之事实是：一、经学生、工人群众胁迫而哀求，总商会始肯宣布罢市；二、当时一般群众的呼声是反对外国人惨杀同胞，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而商会在全市商店门窗所揭罢市要求，只是取消码头捐；三、罢市后总工会、学生会提议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以为全市运动指挥总机关，各马路商联总会赞成加入合作，而总商会则坚不肯加入；四、自六月一日罢市起至十日五卅委员会成立止，这十天当中，总商会都站在调人地位。在此时期中，上海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鄙弃民众的心理，已充分表现出来了。

在这时期中，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最反动事实，即是不顾民众的要求单独向帝国主义者提出条件问题。因为商联总会之牵制，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已为民众所不满，而总商会则更蔑视民众的意见，迎合军阀政府委员的意旨，别自单独提出十三条，这十三条中，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取消领事裁判权"这十二、十三两条完全撤销了，第六条优待工人当中，他们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

工之自由”这一句也去掉了。他们这样的妥协，颇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嘉奖，当时《大陆报》说：“总商会的人是老成持重的，他们都是上海的大商家、大银行家，有体面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决不急进的”。他们的十三条并未为六国委员团所容纳，上海谈判决裂，总商会不但不坚决的作更进一步的示威反抗，反而并不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协商而单独议决开市。

开市之宣言，本来说还要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然而实际事实上是怎样呢？开市后，所谓抵制英、日货，不但是一句空话，而且因为学生会严厉的检查英、日货，和总商会及商联总会起了不断的纠纷与冲突，尤其是总商会以检查五卅以前存货之名为推销英、日货开方便之门，和学生冲突甚烈。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总商会和商联总会始终只是经收全国各处捐款，他们自己原来是一毛不拔的，开市后他们一致鼓吹单独对英，尤其是总商会更是勾串奉军戒严司令及交涉员压迫总工会令日厂罢工工人几等于无条件的上工；日厂上了工，工部局停止供给各厂电力，总商会不努力抵抗工部局，而又勾串军阀官僚压迫总工会令工部局电气处工人上工；总商会又主张码头工人上工两星期，专为中国商人运出存储英、日堆栈的货物，议定在此项存货物价三千余万元中提捐百分之一，约三十余万元，作为五万余码头工人一个月的救济费，此办法由总商会议定，此业务由总商会管理，其结果三千余万元的货物如期运尽，而缴纳的捐款只有三万余元，总商会简直不负责任，码头工人因此遂即不能继续罢工了。大部分罢工工人既已上工，总商会遂进而勾串奉军戒严司令部封闭总工会。总工会既已被封，所有英厂罢工工人，遂被迫而陆续上工了；至此，资产阶级所谓抵制英、日货，所谓援助停业工

人，所谓单独对英，都成了公然的骗局！在此第三时期中，资产阶级已经是不掩饰的反动起来了。

奉军司令部的人说：封闭总工会是事前得了总商会同意的。奚和德对工人代表会的人说：你们代表会就是总工会的变相，断然不能存在，你们若能承认李征五去主持，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公开的存在。霍守华对人说：总工会不应该和总商会冲突，老实说，总工会被封的时候，总商会若肯出来说几句话，司令部是不能不顾忌的。照上述之种种说话，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感激上海总商会的盛意了！总商会不但要和总工会过不去，近来并且指挥他的武装队（保卫团）和他的爪牙（警察厅长江政卿）帮同军阀摧残所有的工会及工人学校，查禁学生或工人的集会。在此第四期中，资产阶级的反动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商人的商联总会，以前和总商会是对抗的，比总商会是急进的，现在事事依附总商会，不敢自作主张了。他们跟着总商会反对学生、工人，跟着总商会不参加一切民众运动，禀承总商会的意旨，公然宣告没有恢复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必要。最可笑的是：学生会邀请商联总会共同发起各团体代表大会，主张关税自主，他们竟会说出"关税已经自主不须开会"的梦话来！

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态度既是如此，那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要靠那些阶级的力量才能成功呢？在民族运动中，是否应该反对阶级争斗呢？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戴季陶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有一个忠实的解答。

1925年11月21日《向导》周报第一三六期　署名：独秀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

我们要明白国民党中的左右派是什么，这不但是国民党之重要问题，并且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重要问题。我们若是把国民党看做整个的而无左右派的分别，便无由判定国民党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了；我们若是懂得国民党中有左右派之区别，左派是革命的，右派不是革命的，然后拥护国民党的人才不至受人指摘，非难国民党的人才不至一概抹杀。

有些人不相信国民党有什么左右派之分别，可是在事实上，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另自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同时，左派的思想亦因之明瞭而正确了。

有人以为共产党是国民党左派，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行动上，固然站在左派的政策上面；然而共产党是共产党，国民党是国民党，国民党自有他自己的左派，如何能以共产党做国民党的左派呢？国民党左派的思

想与政策，无论如何左倾如何急进，终究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就现有的事实而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程潜、于右任、徐谦、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丁惟汾、王励斋等一班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党员。

国民党的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些什么呢？在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前后，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左派，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右派；现在的左右派，都不是这样简单的分别了。以前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信仰三民主义的右派，已公然反革命，而实际上脱离了国民党了；现在新的右派，虽然口头上也说主张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高高的挂起信仰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自重，可是实际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理想与策略，他们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之方法，都完全与左派不同。

在理想上：左派之反对帝国主义，乃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之本身为压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扰乱人类和平的怪物，右派之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乃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同时他们并企图中国民族也发展到帝国主义；左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民主政治，右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仁爱的保育政治，即古代所谓仁政现代所谓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懂得要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右派则反对联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阶级之阶级利益的争斗而失其同情，所以右派虽然口里也说要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口里也说要国民革命，然而实际上只能口里说说，而反对帝国主义与

军阀的国民革命之实际工作，一步也不能动手去做。他们口中所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说的"国民革命"，都和不能兑现的支票一般。他们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争斗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饭睡觉，至多只能闲暇无事时做几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颂圣文。他们虽然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可是不曾为革命流一滴血，不曾为革命坐一次牢监，并且不曾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举行过一次示威运动散过一次传单；他们不但自己不去做这些革命工作，并且还极力向广东、上海、北京正在革命战线上拚命的左派加以不断的攻击，袖着手不革命的，还算是右派的好分子。

右派所谓"真正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的信徒"，也只是一块骗人的招牌，他们并不曾想过如何才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他们极力排斥国外最反对帝国主义的苏俄，极力排斥国内最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党，极力排斥反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人、农民之阶级争斗，试问他们还有什么方法实行民族主义？他们轻视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之阶级的利益，试问他们所要实行的是什么一种民权主义？他们反对阶级争斗，试问在资产阶级争斗之下，有何方法可得保证农工平民之民权？倘若不让工农阶级由阶级争斗而形成他们的势力，足以挟制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节制资本与大产业国有，足以挟制地主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平均地权，试问国民革命政府另有何种力量可以实行民生主义？不实行的三民主义，岂不是骗人的招牌？左派知道三民主义不是一个宗教，单单信仰主义是不够的，单单信仰主义，只是一个主义者，一个信徒，不是革命家；左派知道单单宣传三民主义，而不能指陈其实行政策，也便是胡适之所讥诮的"名词运

动”；左派为了要实行三民主义，便不得不采用“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不反对阶级争斗”这些实际需要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中现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在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

左派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信仰三民主义，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其右派。

1925年12月3日《向导》周报第一三七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中国军阀之左右派

十一月卅日东方社电："张作霖现已开始运动，将以李景林、张宗昌为干部，与旧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相提携，结成联盟；此项运动之主要目的，即为对抗冯玉祥、岳维峻、郭松龄左倾派（即过激派）军阀起见，组织右倾派之大同团体，以期于全国政治上出现一大纵断线。"在我们看起来，冯、岳、郭的政治态度实在都过于和缓，而至于油滑，说他们是过激派，直是冤枉苦了。至于说他们是现在中国军阀中的左倾派（各种社会或集团，都有左右倾分化之可能，这里所谓左倾，并不是什么过激赤化的意义），把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等奉系，吴佩孚、孙传芳等直系，都列在中国军阀的右派，这却是很正确的事实。这些右派军阀之间的冲突非常厉害，如果他们真能组织大同团体，乃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付中国政局的如意算盘之成功啊！

工贼替安福派说话

北京市民直接惩罚安福诸孽，国人称快，独有著名的工贼张德惠，假托长辛店工人名义，替安福派说话；他说："民众表示首

宜遵守纪律，否则有意破坏群众运动之真精神，若有放火及其他无意识动作，决非真正民意。"照他这样说，所谓真正民意，所谓守纪律有意识的群众运动，不知是怎样？想必是以规规矩矩的开会、游街、请愿为限。那么，历史上一切民众的暴乱武装革命，都一概可以不守纪律、无意识、非真正民意等话抹杀之了。如果是这样，不但此次北京市民运动非民意，即以前五四运动赵家楼之火，也是学生的罪恶了，这样的话，正是安福老爷们所愿听的呵！

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

国民政府解散了一些反动军队，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许多人说他赤化了；冯玉祥锐意练兵，预备和奉张打仗，主张救国、关税自主、平民政治，又有人说他赤化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主张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理金融、便交通、尽地利六事，也有人说他赤化了。原来赤化不过如此！然而据本月六日上海各报所载东南通信社消息，国民党右派却正打算在上海设立执行委员会"预防赤化"咧。

以赤化为仇敌的奉天商会

郭松龄仅仅说了一声"优遇劳工"，张作霖便通电攻击他赤化，奉天全省商会联合会也跟着通电说："查改革劳动待遇，即俄国赤化之倡言。……世界各国皆视之如洪水猛兽……就我商民，皆当同心仰戴张上将军保境安民之盛德，以赤化为仇敌。"原

来赤化反赤化就是如此，不知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对于仰戴张上将军盛德的奉天商会此电作何感想？

1925年12月10日《向导》周报第一三八期　署名：实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

一个党内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较之词，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一个党里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则以前的左派会比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脱离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倾分子，也会形成新的右派。

中国国民党早已有过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历史，我们已常常说过。自去年正月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中山先生死后，党内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正式另立组织：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谋在北方发展势力；后者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谋在西南发展势力；这两个俱乐部对于段政府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国民政府，则是一致的。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因为一个党中的左右派，虽然有政策的左右倾及行动缓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国民党，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离开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来破坏国民政府，已明明不但离开而是背叛了国民革命，已经事实上

脱离了国民党，还算得什么国民党右派呢？右派毕竟还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之国民党啊！

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那国民党中有没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在具体事实所表现的就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极力和反动的总商会结合起来，反对工人及学生，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国民党党员，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党，并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反对国民政府。一个党，总不免有比较右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可是现在国民革命的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这都凡是忠于中国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们加以不客气的警告。这一新右派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他们虽然竭力自别于代表官僚买办的反动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实他们当中仍然包含着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如谢持、居正、周颂西、孙镜亚等）。

季陶先生对我说：他们并不反对阶级争斗，只是在国民党的立场不便鼓吹阶级争斗；然而事实上近几天的《民国日报》上反

对阶级争斗之论调都非常之高。

他们暂为顾全中山先生遗嘱计，尚未公然反对苏俄，然而他们在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上，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以维持苏俄”；又说“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所谓任何属性，不用说所谓“赤色帝国主义”也包含在内。

他们反对共产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说共产党只要民族主义，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唾弃而且加以攻击；其实共产党不但努力民权运动（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之要求），并且他的民生运动（工农解放）比任何党派的政纲都彻底。他们说共产党是反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实不幸此时各处国民革命的工作几乎是共产派在包办。他们说共产党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其实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各种机关报各种印刷品，宣传他们的主义与政策，从来不曾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在事实上又何能够在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都不曾作此惊人之谈！他们口里虽说不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其实他们公然著书通电（例如最近广东孙文主义学会的通电及孙镜亚告国民党同志书等），捏造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无稽之谈，诬蔑得共产党人简直阴贼险狠不成人境；最近为广大问题，不但说共产党早已开除的陈公博是共产党人，并且硬指顾梦渔先生也是共产党人，借以证明共产党夺取广大的阴谋。他们口中虽说承认共产党和他们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党（孙镜亚都说是：“貌为同舟，实类敌国”呵！），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其实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无论民族运动民权运动民生运动，他们都表示不和共产党合作，并且他们自己也不独作；他们虽然宣言反

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会，他们竟不肯参加，在北京的反段国民大会，他们虽然参加了，而他们的首领邹鲁，都硬逼鹿钟麟下令压迫国民大会，说这次国民大会是赤化运动。

自讨伐杨、刘以来，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致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仿佛汪精卫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见他们致各级党部电，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国日报》论文，孙镜亚致汪精卫书等）。他们不但这样攻击汪精卫，并且在西山开会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不许他任国民政府职务；他们这样的举动，简直是有意动摇国民政府，为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桢、熊克武等复仇。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对共产派，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

他们说共产党惯以反革命反动等罪名加诸异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实，他们应自问和冯自由、邓家彦、马素相去几何？即客气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说是反动的倾向罢！

他们这反动倾向的根本，是不识中国的国民革命乃整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们口中虽然不赞成国家主义，其实他们的根本思想和国家主义者一样，同是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因此，他们遂至对外反对苏俄，对内反对阶级争斗反对主张阶级争斗的共产党；因为左派联合苏俄及共产党，他们遂至反对左派；因为国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们遂致反对国民政府；他们的反对倾向就是这样相因而至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至于反动派，则在于联合战线外了，因为他们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站在敌人那边了。此时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也非常严重，这倾向若继续发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毕竟是一家眷属，则所谓“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

1925年12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一三九期　署名：独秀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

（一）赤是什么？　（二）各国反赤的是谁？　（三）中国反赤的是谁？　（四）他们在中国所反的赤是什么？　（五）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　（六）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

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突起所谓反赤运动，其意义与影响如何，凡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的人，都应该加意研究这一问题。

这问题劈头所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赤。此时所谓赤化、所谓反赤这些名词，在社会上很流行，几乎演剧上广告上都要用做材料以惹人注意；可是究竟什么是赤，大半还不甚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无意识的随声附和，或有意识的拿做攻击敌人之武器罢了。赤之名起于苏俄十月革命，以赤色为旗帜，创立赤卫军以保障俄罗斯无产阶级及农民对于资产阶级、地主及西欧帝国主义争斗之胜利，赤之内容如此，其后世人称十月革命为赤色革命称苏俄为赤俄以此。

其次，我们要知道的，各国中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各国中主张反赤的，只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与政党这班少数人，不但工农大群众是表同情于赤俄的，即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英国的萧伯讷、罗素等，他们的根本思想虽不是赤的（他们若在中国，孙传芳当然要觉得赤得应该杀头，罗素屡屡

发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言论，指斥英国，中国的国家主义派也当然要加上他一个新式卖国贼的头衔。），然而绝对不主张反赤，并且有时感觉得帝国主义的国家之过分横暴，宁表同情于赤俄。

再其次，我们便须检查中国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此时中国主张反赤的有两种人：一是军阀中之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魏邦平等；一是知识者及政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派、中和党及老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张作霖和日本之关系，是人人所知道的；在五卅运动中，从奉天到上海，奉系军阀整个的替英、日帝国主义者扑灭中国的爱国运动，这也是人人所知道的；李景林、张宗昌在直隶、山东当官胡子，吴佩孚讨贼通电中很骂得痛切；吴佩孚至今还要拥护曹锟的宪法，他此次联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作合，英国助他一万五千枝快枪，如果不被孙传芳中途夺去，马上便会到手，最近还派代表到日本勾结俄国白党土匪谢米诺夫，招集俄白党五万人南下攻打国民军；受上海领事团面谕暗杀刘华的孙传芳，他的反动程度也不让吴佩孚；陈炯明、魏邦平受香港政府的庇护帮助而扰乱广东，乃是很明显的事实；国家主义派的首领自称师承墨索里尼，他们《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独立报》，有明显的关系，把他们列在反动派当不冤枉；研究系中为许多人头脑并不甚反动，然而他们的行动，从前清到现在，却都站在反动派方面，最近仍然力助吴佩孚，他们的大将马不停蹄奔走奉天、杭州、南京、长沙、衡州，为吴佩孚效力；亲日卖国的安福派，不用我们再说了；还在秘密酝酿中的中和党，他的创始者是尤烈（致公堂即三合会的首领）和徐绍桢父子，孙传芳攻南京时，他们曾想召集一些失

职军人与帮匪组织中华救国军，做奉军袭取上海之内应，嗣即随着张宗昌战败而失败了，这个党，和老民党的反动派陈炯明派及什么反赤大联盟，几乎是一个东西，若再加上国家主义派，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这个党的反动性，较之研究系、安福派，还要后来居上；章太炎始终是个反革命的东西，辛亥革命时，指斥孙、黄为小丑，首先通电主张统治中国非袁项城不可的就是他；冯自由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稽勋局长投降袁世凯当侦探，因此曾在上海会审公堂控告吴稚晖先生；马素曾为杨希闵、刘震寰乞援于香港政府攻打广东，近又上书吴佩孚请讨冯玉祥。原来中国主张反赤的就是这班先生们，并且这班先生们的背后，大半都有帝国主义者发踪指使，所以稳健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右派大部分还未加入他们这个运动。

再其次，我们便要研究他们所反的赤是些什么人是些什么事。他们所反的赤如下：

苏俄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

冯玉祥及国民军

郭松龄

贾内阁①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

我们把这些分子列在一个表上，可谓不伦不类极滑稽之至

① 1925年12月30日，段祺瑞组织所谓责任内阁，吸收了一些国民党人，但他们不受段的拉拢，也不敢就职。内阁总理由陆军总长贾德耀代任，故称贾内阁。

了，然而他们都一概被指为赤化，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这些分子当中实有一共同点，即他们或是有反帝国主义之决心，或是他们现时的举动在客观上是于帝国主义者不利的，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一概加以赤化之名。

赤俄的内政，似乎用不着别国人反对，中国人反对赤俄，当然是反对赤俄对于中国之关系；一、在中俄外交关系上说起来，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把持海关，驻扎海陆军，据有租界及租借地，施行领事裁判权，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反对赤俄之必要?蒙古问题中俄协定已明白规定了，我们自己无暇把中蒙的关系弄好，难道承认赤俄有将蒙古交给中国之权利吗?中东路诚然还在中俄共管的状态中，诚然我们不应该主张永远用这样办法，可是现在要责赤俄把中东路管理权完全归还中国，我们有何方法可以保证该路不至由张作霖转入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之手?二、在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上说起来，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诚然是事实；但现在所援助的决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民族革命。一年前法国《晨报》即极力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膨涨，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这便是赤俄援助中国革命之正确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支部，向来不曾和苏俄发生过直接关系，他和苏俄的共产党同属于共产国际，他们根本的政治理想固然是同的，但是因为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之不同，而革命之步骤便也不同，所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纲与行动，乃是要完成中国民族革命的要求，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到底。

中国国民党，在过去的历史上，在现在的政纲上，都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党，这是人人所知道的。国民党的右派不用说了，即他的左派，在理想上在行动上，都只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实无所谓赤。左派执政的广东国民政府，他所努力而有点成绩的只是两件事：一是对外援助民众抵抗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之压迫，一是对内解散了许多不法军队，统一了全广东的军政财政，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禁止了赌，给了人民一点生命、财产、集会、结社之自由，这都是赤化吗？

说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了，那更是冤枉。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第一军，的确是很有纪律的军队，全中国现有的军队，算是冯玉祥及蒋介石所统率的军队最有纪律不扰害人民，若说这两种军队是赤化军，我们敢代表全国人民欢迎这赤化军，并哀求全国军队都变成这样的赤化军。冯玉祥根本的政治理想，只是封建时代的旧套"勤俭爱民"四个大字，他治军甚严，对于部下任何级军官，决不容许他们违反他这个政治理想；他并且要把他的理想推行到全国，无论何派，凡是违反或超过他这个政治理想的，他都很难与之合作，与其说他主张赤化，不如说他主张冯玉祥化。然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什么加冯玉祥以赤化之名呢？正是因为他和反冯玉祥化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张作霖、吴佩孚作对，及他多少接受了孙中山反帝国主义的主张这两个缘故。

郭松龄倒戈时的通电，不过主张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整顿金融，兴办矿山，便利交通这几件事，并且还主张严防激党，照道理实在说不上什么赤化；然而张作霖、杨宇霆及奉天商会竟异口同声指责郭松龄赤化了。可是郭军倒戈攻奉，几乎使日本帝国

主义者失去有力的工具，这便是郭松龄应得之罪。

说贾内阁是赤化内阁，那更是可怜了。贾内阁开罪于帝国主义者的，只是通过讨吴令这一件事；贾阁阁员有赤化嫌疑的，只是王正廷、易培基二人，王氏本是一个耶教徒而兼新官僚，只因为他经手成立了中俄协定的草案，又主张不平等条约应该修改，便犯了滔天大罪——赤化。易氏不过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教育家，只因为他反对亲日卖国的段祺瑞，也犯了赤化的罪。

至于说虞和德也赤化了，那益发滑稽之至。上海的工贼曾散发传单说虞和德是共产党党员，现在穆藕初也指责虞和德赤化了；可是虞氏虽未赤氏，他却主张关税自主，又主张设立海关公库，并且胆敢批评上海纱厂待遇工人不好，开罪安格联[①]、穆藕初一班人，也算是咎由自取。

综观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中国所反的赤，其人除苏俄及共产党外，实无所谓赤，其事除实际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或有参加民族运动的嫌疑外，亦无所谓赤。不过帝国主义的走狗可以说联合被压迫民族以反对帝国主义，本是赤俄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即是赤化运动。如果是这样，赤化运动就是民族运动，反赤运动也就是反民族运动了。

---

① 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1869—1932)英国人。1888年起在中国海关任职。1911年10月，继赫德出任总税务司。1918年，又从北洋政府处取得对全国常关税的保管权，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大权。1927年1月，在中国人民要求关税自主的浪潮中，因坚持不平等条约反对征收二·五附加税，被免职。

再其次，我们应该知道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我们既然认识反赤运动就是反民族运动，我们便已经知道为什么反赤运动是当然随着中国民族运动高潮而发生的了。据上面所述法国《晨报》的说话，帝国主义在一年前已经决定了以反赤运动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的计划。五卅运动起，帝国主义者知道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炮舰政策所可扑灭的了，势必动用宣传力量；可是宣传的方法又不便直接反对中国民族运动，于是乃用反赤口号来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从伦敦到上海，从北京使团到各地的东西各报，一致宣传五卅运动是赤俄煽动的，是中国赤党主持的；可是他们东西文的宣传品，不能使中国民众普遍的了解，于是他们乃雇用一些中国人，在上海印发《诚言》报，每期数十万份，广布于市民，一面为帝国主义的工部局辩护，一面攻击赤俄与中国共产党；可是那时中国民族运动潮犹在高涨中，并且民众都知道《诚言》报是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直接发出的，不但不发生效力，而且代印《诚言》的商务印书馆和转载《诚言》的新、申两报，都受了民众的惩罚，于是帝国主义改变其对中国民族运动的政策，一面以退让的态度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之妥协，一面向各方面收买中国人，使他们自己出来做反赤宣传。帝国主义者这两个政策，给中国民族运动很大的打击，其效力竟在炮舰政策以上。五卅运动因为资产阶级妥协及反赤宣传这两个打击，运动的高潮遂渐渐低落下去；帝国主义者遂乘此高潮低落的时候，转向中国民族运动开始反攻。其反攻的策略，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的计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嗾使他们的走狗奉、直两系军阀，以反赤的口号封闭全国的爱国机关，禁止全国的爱国运动；第二是嗾使他们的走狗扩大反赤宣传之范围，

由攻击苏俄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扩大到攻击国民军冯玉祥、郭松龄以至贾内阁、虞会长等，凡稍有一点参加民族运动嫌疑的人，都加以赤化之名；第三步是帝国主义者亲自公开的向中国进攻，在北方以武力援助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吴佩孚、靳云鹗，向有赤化嫌疑的郭松龄及冯玉祥等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则命令英籍税务司借故封锁广东海口，在上海则逮捕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首领刘华交孙传芳枪杀了，并且在租界内禁止中国商民使用"五卅"这个名词；第四步是由反赤的宣传，更进一步到反赤的组织，将由这些组织，来根本肃清所谓赤化势力即一切参加中国民族运动的势力。他们这项组织，计有两种，一是国际的，一是中国的。国际的组织，据三月十三日的《时事新报》译载上海《字林西报》说："本埠各国人士，组织一护宪会，以抵制过激主义，十二日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在夏令配克影戏院开第一次英语大会，演说者有霍华德、琼斯裴德等，同时并在日本人俱乐部开日语大会，在法国总会开法语大会。按护宪会系一国际团体，其总部设于上海，于中国各大都会均设分会，四月间将在上海开全中国大会，香港、广州、汕头、天津、汉口等处，均将派代表出席。其目的在使公众咸知过激主义之危险，计加入此会者已有十五国，上海总委员会之组织，系每国各推代表二人，内分十股云。"各国帝国主义者若说过激主义于他们自身有危险，那诚然是事实；他们若说恐怕过激于中国人有危险，忙着出来做反赤的组织宣传活动，那便未免爱护中国人太过了，我们哀求他们少欺压点中国就算是深仁厚泽了，到不必这样过分的爱护中国人！各国帝国主义者特于三月十二日开第一次护宪大会，和他们所指为赤化的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对峙，这也是他们很有意义的示威运动。中国

的组织，就是所谓反赤大联盟；这个大联盟的总机关在上海法租界铭德里一号，他的领袖，据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章太炎、尤烈、徐绍桢、魏邦平、冯自由、居正这班人，除魏邦平外都是所谓老民党，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苏俄、中国共产党、南方的国民政府、北方的冯玉祥及国民军。此外还有一个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在反赤大联盟之前，在中国可算是反赤团体之前辈；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完全和反赤大联盟一样，他们以为危害中国国家的只有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国民军，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张、吴等反动军阀，自五卅运动以来，他们对于每次反英、反日、反奉、反吴的民众运动，一概不肯参加，只孤独的在他们的机关报《醒狮》上，大声疾呼的向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进攻，为帝国主义者出了不少的气。好了，他们现在却不孤独了，他们有了姊妹团体反赤大联盟了，他们的《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中国报》及《独立报》，也算是姊妹报。

他们这些反赤的组织和宣传经费是从何处来的呢？二月廿日的上海《字林西报》伦敦通信告诉我们说："已由英伦国家银行汇英金六十万镑到上海汇丰银行，作为反对中国民族运动及苏俄宣传之费用。"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特殊而且不法的权利已有开始动摇的征象，如果真能由此区区英金六十万镑，扑灭了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所谓赤化运动即中国民族运动，使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利益与威权，得以重新巩固起来，岂不是本小而利大么！？

最后，我们应该研究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了。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已经分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

反民族运动的反赤运动两大联合战线的营垒了，孰胜孰败，乃是中国盛衰存亡紧急关头！反赤运动实际上就是反民族运动，然而他们表面上不但不说反对民族运动，并且还要说赤化是以亡国，反赤正是救国。可是他们所反的赤，依据他们反赤之对象，当然不是指赤俄的社会革命运动，并且事实上中国也还没有这个运动，正不必无的放矢；他们所指的赤，只是指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因为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赤俄喊出来的。五卅运动初起时，上海总商会的领袖对上海总工会的代表说："外间已经喧传你们赤化了，你们的宣传品上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呀！"国家主义派也向来不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因为这是赤党的口号。仅此两件事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在中国所谓赤化乃指反帝国主义运动，所谓反赤就是反对这个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不是赤，我们不须研究，所须研究的乃是反帝国主义在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有何意义。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中国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帝国主义工具——国内军阀的扰乱，不打倒帝国主义，试问中国民族如何能够得着自由？现在国民党右派中有人说："我们民族主义者所谓打倒帝国主义，乃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而言，至于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乃是赤党世界革命的主张，和我们是不同的。"这种见解非常糊涂。在理论上，现代立国于世界，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离开国际关系闭关自守之可能；在事实上，俄罗斯与土耳其，都已经打倒了帝国主义在他们国内的势力，然而各帝国主义的国家仍然包围着俄罗斯与土耳其，想乘机夺去他们的自由，所以被压迫的民族，非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完全倾覆，是不可停止反帝国主义运动而高枕

无忧的。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如果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化，这种赤化，在民族自由运动上是最有意义的；如此，反赤运动不是破坏民族运动是什么？如此，究竟是赤化运动足以亡国呢，还是反赤运动足以亡国？这都是理论问题，再就事实上说起来：究竟是反赤的军阀政客可以救中国呢，还是他们所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可以救中国？现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的奉、直军阀结成了联合战线想来宰制中国，他们若能得到胜利，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将是怎样？我们环顾国外，能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的，除赤俄外还有谁？我们环顾国内，能实力为民族自由奋斗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这一联合战线的，除了被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之外还有谁？若依反赤运动扑灭了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的势力，胜利的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又是谁？他们的胜利，不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失败又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得着一个结论：中国反赤运动和中国民族运动之消长，是要成反比例的，这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者所不可忽视的一重要问题。

1926年3月17日《向导》周报第一四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

国民党右派常常说：我们并不象反动派根本反对共产党，我们只是反对他们的分子留在国民党内。可是在事实上，南京和湖北的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开会时，右派党员却大声疾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逮捕共产党人，警察从中调解，他们还责问警察说："我们替你们捉共产党，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动手！"请问所谓纯粹的国民党党员，所谓孙文主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如此！

1926年3月27日《向导》周报第一四七期　署名：实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此次反奉战争之失败，其根本原因固然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力助奉、直军阀，而中国革命势力不统一也是一个很大原因。中国的反动军队如奉张如直吴如李景林如张宗昌，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指导强迫之下统一起来，向国民军进攻；而在反奉方面，国民军与广州国民政府至少在军事方面未能联合作战，国民军内部，一、二、三军又未能切实合作，甚至于长江方面反吴的军事势力也未能联合一致，如此反奉战争安得不失败。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的军阀——还很强大，今后所有中国的革命势力非统一起来，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各部分都很难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广州的事变恰恰和这个"革命势力统一政策"相反！

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之应用。他们宣传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他们：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

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在此时中国政治、军事的环境，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我们的政策是统一，右派的政策是分裂，他们在广东想分裂革命势力，同时在北京在上海想分裂学生会。右派说共产党有倒蒋阴谋，然而事实上，两星期前上海右派最高党部某领袖，即预言广州将有大的政变，试问这是谁的阴谋？这阴谋若继续发展下去，广东的革命势力，必然由分裂而全部倾覆，胜利的只有香港帝国主义者（此时香港及上海的英文各报对广州现在的事变已经表示异常高兴），右派所得恐怕很少，甚至一点也得不着，试想当年进步党是如何拼命为袁世凯反对国民党，袁世凯胜利后，进步党所得着的是些什么？

我们鉴于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及南方广州事变，凡是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一齐高声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谋！

1926年4月3日《向导》周报第一四八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中国历史所需要的国民党，乃是适合于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国民族革命要求之整个的革命党，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党不合这个需要，即革命的国民党中夹杂一派游移的右倾分子，亦是中国革命进行之极大的障碍。

中国国民党之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他的政纲，他的行动，都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党时，遂丧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开始厌弃革命，遂反映到国民党中，发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们的声势非常之大，几乎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左派失掉领袖的地位。这时国民党的总理，名义上虽然是孙中山，实际上乃是右派领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见这班右派，在组织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口号，在政纲上已抛弃三民主义的要求，便发愤不过问党务，几乎不把国民党当作他自己的党。袁世凯得势，革命完全失败，中山先生乃决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组中华革命党；及袁氏死，广州南方政府再成立，复称中国国民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这期间的全党党员，在形式上都服从中山先生而听其指挥。其后因欧战中中国工业发展及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国民族运动潮流不但高涨起来，而且新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力军，使中国民族运动增加了新的意义，不但反对国内军阀，而且反对

外国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为帝国主义作走狗的奸商买办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主张要贯彻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这一民族运动的新趋势遂反映到国民党中，使国民党分为彻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两派。这次右派声势之大，较过去宋教仁所领导的右派有过之无不及，其与左派之冲突决裂也更剧烈，其所表现之阶级的背景也更明显。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个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后，冯自由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后，戴季陶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前一个右派，他们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借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这班人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不应称为国民党右派，因为国民党无论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后一个右派，即新右派，他们不但要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们以为左派联俄联共政策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而要加以修正，这是他们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这是他们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们这种中间的态度，有时是革命的，有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了革命。他们这种态度与思想，如果在一切实际行动上果然坚守得住，也还有一半令人可敬；可

是在事实上，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数人一种理想，还未能形成独立的一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组织上在行动上，并未能坚守他们的态度与思想和前一个右派即反革命派分开，虽然他们的领袖屡次表示不赞成左派同时也不赞成反革命派。现在我们可以略举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开的几件事实：第一、在组织上，他们的领袖季陶、孙科、伍朝枢虽然加入了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山东、江西、广州、徐州的右派党员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虽然和左派在一个组织；而西山会议及由此会议产生的上海中央总部，以至现在他们所召集的第二次大会，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庆、安庆、芜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苏、浙江两省，他们都联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离的组织。在行动上，这一新右派之发端，谁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论来号召的，照常情应该奉戴季陶为指导者，然而一开幕他们即勾结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绑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狈南归，不敢出席西山会议，并至今不愿参加他们的工作，只这一件事，已经充分说明戴季陶等少数人所理想的新右派并未形成事实，大部分还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当中冒名作祟，所以现在这一新右派的领袖，不但戴季陶匿在湖州潜园叹气，即叶楚伧、邵元仲也不得不取了消极态度；有全国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是他们由戴季陶理论的暗示而发生，实际上他们并不研究孙文主义，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都被反革命派占据了当做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左派之工具；居正参加上海的反赤大联合，覃振派人联络赵恒惕谋倒长沙的左派党部，南京及武汉的右派党员们，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狂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捕拿共产党，象这些行动，更是出乎右派领袖们屡次所宣布的态度与思想之外，完全

是反革命。

因此，我们所以敢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将来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变成左派一部分老实回到反革命派，此时虽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现状，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们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无论和左派在同一个组织与否，都是中国民族革命之障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是他的阶级性，不独中国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中国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国民党，以富有这个阶级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1926年4月3日《向导》周报第一四八期　署名：独秀

广州事变之研究

三月廿日广州事变之真相，我们现在虽然还未能详知其巨细颠末，而大致已经明白了；此事关系中国革命运动影响颇大，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研究之方法，不应该从拿自己的主观做出发点，而是应该综合各项消息，依据事实证明那些消息是可靠的，那些消息显然是谣言，然后所得的结论方近于正确。

（一）关于广州事变之最可靠的消息

A　蒋介石之呈文

“为呈报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惟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

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B　国民政府之布告

“此次政府据报，以海军局代理局长欧阳琳，无故离职，舰队骤无统率，致中山舰发生不守纪律举动，政府为防患未然起见，特先将各嫌疑人拿办，现已处置妥当，一切如常，特此布告，俾各界明了真相，幸勿误听谣传，自贻纷扰。”

C　国民政府饯送俄人时蒋介石代表邓演达之演词

“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苏俄本属最好同志，今日诸位归国，某等敬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汪蒋两位先生，今后本党本政府之联俄亲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视前益加亲善及进步。”

D　国民党宣言

“依据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之策略奋斗，尤尊重第二次代表大会议决案，对共产党加入本党份子，丝毫不存歧视，对离间破坏者决严厉对待。”

E　依文诺夫思基[①]等对本报(《向导》)记者之谈话

“广州二十日事变，黄埔军队于短时间包围罢工会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五十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

---

① 依文诺夫思基(访华时化名布勃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于1926年2月间率高级使团访华，团员有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等十余人。当“三二〇事变”发生之时，布勃诺夫使团恰在广州访问，并立即撤退苏联顾问多名。3月底，依文诺夫思斯回国途经上海时，向陈独秀谈了三二〇事变的情况。

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他军中确有些反共份子，且云他并未发出包围俄人住宅及罢工会之命令。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的举动仍未停止，随时都会有事故发生，这真是中国革命之不幸。"

（二）各种显然不实的谣言

依据上述可靠消息，沪报所传"共产派反汪蒋。""拘俄人多名。""共产派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改建工农政府。""李之龙以组织工人政府相号召。""汪已被软禁。""蒋拘获罢工领袖及黄埔军官学校俄教练员数人，闻蒋决计悉逐广州俄人及共产党，汪精卫已离广州。""李之龙已枪决。""在罢工会搜获俄人接济共派大批枪械。"这些显然不实的谣言，似乎不必再加辩正了。依文诺夫思基等十余人乃俄国共产党派来中国调查政治及经济现状的，并非粤政府顾问，在粤适逢事变，他们于二十四日离粤回国，决没有各报所传什么被粤政府押解出境的事。蒋介石君上军事委员会的呈文，明明说："事前未及报告"，可见上海《新闻报》所载"蒋介石……乃往见汪精卫，告以共产党之计划与举动，决用严厉手段处分共派，汪甚惊讶，颇主郑重，蒋不允，汪喟然，蒋曰，今日下午二时在造币厂开会，今时已至，请公偕往，汪本抱恙，至是不能不同去，少候谭组安、朱培德、吴铁城……古湘芹等均到，蒋即报告共派异动事实，及处分共派办法，谓征求各位同意，各人面面相觑，不敢发言，良久，谭组安始期期言曰，政府及公待共派已仁至义尽，而共派竟有此项异动，介公如此对待，诚不为过，但

亲俄政策为先总理所决定，恐如此对待，有碍中俄邦交，故某以为宜分两层办理，最好不要牵涉俄人，蒋大声曰，此次若不如此处分，恐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各军，广东地盘，已非国民党所能有矣。众见蒋主持坚决，亦遂不持异议，故此会议结果，完全照蒋提议通过，蒋回后即发命令严密进行。"这一段通信完全是谣言了。《申报》通信说国民政府欢送依文诺夫思基等，赴席者有中央党部代表林祖涵、甘乃光等……及政治部主任陈公博，而同时又说甘乃光、陈公博（甘、陈都非共派）被捕，其显自矛盾如此。各报多载海军局长斯米诺夫被捕或说他同陈公博、谭平山逃匿香港，其实斯米诺夫早已离职归国，斯米诺夫离粤，由欧阳琳代理局长，此事各报早有记载。谭平山也早因事往北京，陈公博更不用说现还在国民政府任职。这类显然不实的谣言，竟充满了近十天的上海各报，使人不能不佩服国民党右派对于宣传工作之努力，只可惜用在这等地方。

（三）事变之主动者究竟是谁？

因此，我们所得关于广州事变之消息，可以说一大部分是谣言，一小部分是事实。制造这些事实和谣言的是谁？我们敢说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

《申报》通信说："此次之事件，系为民党中之右派反赤运动。"

又说："'据外间传说，谓二十日之反赤举动，系左派侦知共产党曾接俄人大批军械，此项军械，曾由俄舰运至崖门，由中山舰接载，运至省城东堤东园内之罢工委员会储藏，当日搜查东园时，计搜出俄械步枪一万三千杆，子弹卅万发（《申报》记者原按：此系谣言确否未知），另由列宁舰载来俄官员六人，系担任发难

时之指挥。'孙文主义学会份子既发见共产派之秘密，因预为戒备，嗣又查知共产派分子计划，其大本营在东园罢工委员会内，……约期发难，推倒现国民政府，而建设劳工政府。……迨俄械已得手，李则定于二十日派中山舰攻黄埔，讵事前为孙文主义学会中人侦知，遂于二十早先派兵来广州……"

《时事新报》通信说："据最可靠消息，政变系孙文主义学会主动，拘捕党代表，包围罢工会，皆该会军人所为。"

《民国日报》通信说："中山舰事件：悉由孙文主义学会同志豫为戒备，学会同志查知反动派计划……"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致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同志书云："诸君学养有素，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生，于短时间戡平叛党祸国之分子。"

《商报》通信说："据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报告，共产党攫取政权之内容，乃和盘托出，蒋氏以形势急迫，……立即召集会议，决定策略……"

又说："蒋受孙文主义学会派包围，被胁迫而下逮捕共党之令。"

东方通信社香港电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将介石部下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美国联合通信社说："蒋介石藉伍朝枢等诸名人助力，在广州变制成功。"

依以上所述，此次事变，无论是功是罪，都不能不归于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了。

（四）事变之中心问题

此次事变之中心问题，当然是因为中山舰开赴黄埔惹起了

蒋介石之疑惧。

使李之龙调舰到黄埔的人又是谁呢？右派说这是共产派倒蒋倒国民政府的阴谋；然而共产派一向很推重蒋介石，“巩固国民政府”，他们在国民军失败后更提高这一口号，现在决无理由忽然倒行逆施起来。

李之龙方被共产党处以留党察看的处分，中山舰案初起，共产党颇疑心是李之龙受反动派运动所为，今竟指为共产党倒蒋阴谋，岂非世间不可思议之事！

李之龙既定计倒蒋，当不须有蒋令而行，蒋亦当然无此命令，此命令必为诱李调舰者所伪造无疑。且李之龙果已调舰倒蒋，何以还有暇在家高卧，这又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中山舰调动是此次事变之中心问题，此事如查得水落石出，或是共派的阴谋，或是他们倾陷共派的阴谋，也是彻底解决此事变之中心问题。

（五）结论

凡是中国人，都有拥护广州现在国民政府之义务，此次广州事变客观上实有使国民政府倾覆之可能；因此，事变之主动者，无论出于共派倒蒋之阴谋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阴谋，都应该受国民及国民政府严重的惩治，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应加以偏袒；这是我们的结论。

1926年4月3日《向导》周报第一四八期　署名：致中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

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的民族运动中，究竟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我们必须有明瞭正确的解释，方能认清我们的真正敌人，不至为敌所欺。譬如捕贼，必须首先要认清谁是贼，方不至为贼人也喊捉贼之呼声所欺，误认助我捉贼的邻人也是贼，甚至于怀疑到自家人，真正的贼反乘此逃脱了。

误解帝国主义而最可笑的，莫如以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有帝王的国家。其实现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若英吉利若日本，固然是都有帝王，若法兰西若美国，则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其次则以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侵略别国的强大国家。这个见解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现时帝国主义的国家若荷兰，若比利时，并不强大。侵略别国固然是帝国主义的特性，可是古代罗马及西汉时代的中国，虽然都是侵略别国的国家，然而这种开疆辟土之封建的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不同。又有人以为帝国主义乃由国家主义扩大而成，可称之为"大国家主义"。这个见解，在帝国主义发展之形式上是对的，却未能明瞭正确的指出帝国主义的性质。

现代所谓帝国主义乃指资本帝国主义，其存在须有下列二个特性：（一）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二）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国内资本主义必

然发展到财政资本主义向国外掠夺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依据帝国主义这两个特性，我们便可以判断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抵制苏俄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政策，遂效贼人也大喊捉贼的故智，造出"赤色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以图离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苏俄间的联合。其实"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苏俄之所以赤，乃因为十月革命是工农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革命，一切资本帝国主义者正因此而仇视他；如果他现在也变成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那还何赤之有?如果他仍旧是赤的，那便绝对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而正是帝国主义之仇敌了。

* * *

一般人对于军阀解释之错误，更是普遍的。错误之主要原因，是军人和军阀不分，把一切担任军职的军人都当做军阀；因此，遂说张作霖、吴佩孚是军阀，冯玉祥、蒋介石也是军阀。我们反对的是军阀不是任何军人，尤其不应该反对敌视军阀的军人。我们反对军阀，同时又反对敌视军阀的军人，并且反对一切军人，连拿起武器反对军阀的自己也在内，如果是这样，非做到赤手空拳来反对军阀无办法，这岂不是一场笑话!因此，我们要打倒军阀，首先要认识军阀是什么，不可把一切军人都当做军阀，一律反对。军阀的特性有二：(一)凡军阀必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已占住了中国最重要的财政机关交通机关，中国的军阀必尽力勾结帝国主义者，保护其在中国利益，始能得其援助，始能使其拥护军阀的政权，并且军阀不能独在国内找出尽量扩充军备之饷械的供给，也不得不仰求于帝国主

义者，同时帝国主义者侵略半殖民地，亦不得不利用旧统治阶级做工具；（二）凡军阀必然摧残民众的自由，这是因为军阀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如苛捐杂税），非摧残民众的自由，便不能维持其统治权，同时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和被压迫国内民众的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如把持海关、工业品竞争、利用贱价劳动等），军阀非摧残民众自由，不能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这两个军阀的特性，乃是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不但现在的军阀如此，清室若存在至今，也必然是如此。王恒君在《军阀问题之研究》一文中（见三月三日的上海《商报》），把军阀的性质看做与周代诸侯、唐代藩镇相同，这是非常错误，这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和古代封建诸侯的特性不同之故。他因为不懂得现代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遂至以据土、练兵、自由行动这三件事为军阀的特性，凡行此三者都是军阀，因此遂产出蒋介石、孙中山都是军阀这种荒谬的结论。一切民主主义革命者社会主义革命者，无一不须据土、练兵、自由行动，若以此三者为军阀特性，则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革命者无一不是军阀，我们不解王君何以竟有此种妙想！

又如蒋介石辞去一切军职之虞电，也是不懂得半殖民地军阀的特性是什么，遂至请求开除一切军职以免步军阀之后尘，这和一般见解军人和军阀不分是同样的错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自然绝不可有军阀，但不可无担任军职之军人，蒋君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若以身任军职便是军阀，若以此生不受军职便不是军阀；那么，此时国民党中有许多身任军职的人，国民政府中更有许多人担任军职，则国民党岂不

是一个军阀党，国民政府岂不是一个军阀政府？若国民党中军人党员，国民政府中担任军职的军人，都效法蒋君因不甘为军阀而辞去军职，并守此生不复受军职之信誓，试问广东将变成何种局面，国民党又将有何人担任革命的军事工作？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是要居很重要地位。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民众没有武装，如何能够得着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民众除武装自己以外，所有国内的军事势力，凡是不曾勾结帝国主义及摧残民众自由的部分，都应该计算在民族革命的力量之内，并且要将民众的力量影响他们，使他们实际参加革命运动，而不可笼统的看做军阀加以破坏。凡是这种军事势力和军阀的军事势力冲突之时，民众应该起来积极的援助前者，破坏后者，断不可把他们的战争当做军阀间自己的冲突，而袖着手站在旁观地位。这种军事政策在我们半殖民地革命运动中，非常重要，是每个实际政治家，每个真正革命者，都不应该忽视的。

*　　　　*　　　　*

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人，对于认清为害于半殖民地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特性是什么，当然是必要的。认清了他们的特性，然后再联合国外非帝国主义的国家与国内非军阀的军事势力，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作战，这才是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唯一的出路。若不认清他们的特性，误以为凡外国都是帝国主义者，凡军人都是军阀，遂至说苏俄和英、美、法、日同是帝国主义者，蒋介石、冯玉祥（依据军阀的两个特性，不但蒋介石绝对不是军阀，即冯玉祥目前也还不能说是军阀）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是军阀，一概加以反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若照这样不分是非皂白

的糊涂乱打一阵，其结果只有打着自己，而打不倒敌人，这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乐意的事，我们这种错误观念一天不改正，中国革命是一天没有希望的呵！

1926年4月13日《向导》周报第一四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

中国的绅士们相信所谓司法调查，仿佛是一种迷信。五卅事件，他们本主张用司法调查来解决，可是调查过了仍然没有解决。到了北京血案发生，他们仍旧摆出绅士的态度，仿佛以为血案之是非真相未明（或者他们还不知道是段祺瑞杀了学生或是学生杀了段祺瑞），仍旧主张司法调查，似乎案情调查清楚，是非大明，他们自有办法；可是现在已经司法调查明白了。据京师地方检察厅致陆军部的信上说："计共验死尸四十三具，生伤四十五名，函称负伤而未受验者七十三人。……内左四区巡长王文绍供称，……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保安队副分队长郎葆贤供称，学生都拿着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卫队放了两次枪，大约放了有一千多子弹，……开枪时刻均在群众奔逃之际，……距国务院大门颇远，……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照这样看起来，段执政的皇皇命令所谓"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都

明明是捏造谣言，反而段执政的卫队犯了杀人的罪是实，我们要问问绅士们，你们现在怎样说？又怎样办？

你们代表谁？

凡是一个称为代表的，必以有他所代表的人为条件，不然便是冒充代表，或是自称代表。国民党右派在各地还没有什么党部之组织，现在居然在上海召集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东指一个姓张的代表江苏，西指一个姓王的代表四川，南指一个姓李的代表广东，北指一个姓赵的代表直隶，这班未曾经过党员选举的代表，请问是代表谁？

一个不行动的党

北京血案发生，全国震怒，上海学生会派人到所谓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那里，请他们参加市民反段大会，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宣传，不去行动，我们不象共产党瞎闹。"象这样一个不行动的党，似乎用不着别人再去批评他了！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往往抬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的金字招牌来反对阶级争斗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全民"是怎样解释。若说是抽象的指为全民利益而革命，建设全民利益的政治，则和我们民族解放国民革命之意义相类。若说是具体的

指由全民出来革命，由全民管理政治；那么，我们便要问：卖国贼、军阀、官僚及一切作奸犯科的人，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内？若除开这一大批人，还算得什么全民？

反赤苛政

中国军阀中宣传反赤最力的莫如李景林、张宗昌，而搜括人民最惨的也莫如他两人，这明明是告诉人民：可见反赤原来如此，可见赤不是如此。

《独立报》对谁独立？

上海的《独立报》，满纸都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却不曾反对过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盛称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辈是爱国者。

他们所谓独立，想必不是拥护中国民族利益对外独立的意思，而是拥护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利益，对中国人民宣告独立！

1926年4月13日《向导》周报第一四九期　署名：实

国民军与北方政局

国民军(专指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一军，下同)关系北方政局之重大，这是人人所感觉得到的。国民军在军事上之成败及其政治主张之良否，关系北方政局甚至于关系全中国政治之隆污都很重大，这也应该是懂得实际政治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中国最固定的军阀只有奉、直、皖三系，其他都还未完全形成军阀。国民军乃是由直系军阀中蜕化出来的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在今日以前也还未曾形成军阀。何以称他是较进步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比奉、直、皖及其他北方任何军队都有训练，有纪律，不扰害人民；无论李景林如何宣传国民军共产赤化，而天津市民都亲身感受得奉军或国民军孰为可怕。何以称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相当的尊重人民之自由，和奉、直、皖等军阀对待人民之态度显然不同。何以说国民军未曾形成军阀?这是因为他不象奉、直、皖各系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象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

在奉、直、皖三系军阀循环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利用这班军阀做工具，无忌惮的剥削中国民众，压迫中国民众，现今在军阀中居然蜕化出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而不接近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使军阀势力之自身显露出最后崩溃的征兆，使帝国

主义者发生恐怖的心理，国民军这种在客观上的破坏作用，在中国政治进化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可是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也只能认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不能认为民众的军事势力。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不但在实力上还很幼稚，在政治观念上更是幼稚模糊而且动摇，若没有民众的鞭策与援助迫之左倾，时时都有向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甚至退回老家之可能。

反奉战争之初起，国民军即感觉自己一派之实力不足以敌奉、直二派，广州国民政府之势力尚未即能达到北方，于是遂采取了向右联段政策，置北京市民驱逐段祺瑞建设人民政府之要求而不顾；及郭松龄败亡，□日奉、吴联合成，四方反赤声起，差不多是全世界反动势力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更感孤危，遂致冯玉祥下野，更向右一步，采取了联吴政策，改造贾内阁，容纳吴派颜惠庆、卢信等入阁；及至天津撤兵，奉、直军仍向北京进攻，逼得国民军一直向右，采取了逐段释曹迎吴的政策（此次国民军逐段，虽然在客观上是民众所赞成的；而在国民军的主观上，是为曹、吴的要求而逐段，不是为民众的要求而逐段，所以他此次逐段是右倾政策不是左倾）。释曹已经不妥，何况更公然布告大称其“总统曹公”！幸而吴佩孚拒绝与国民军合作，国民军不得不退出北京，否则他如果更进一步拥护贿选的总统复位，拥护贿选的议员复职，那末，不但不是接近民众的，而且是背叛民众的，他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寿终正寝了！因为全国民众对于贿选的总统与贿选的议员，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国民军孤立无援的受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军阀之联合进攻，他退出天津，又退出北京，这都不算失败，他因为避免失

败，采取日益右倾的政策，丧失民众的同情，这才真是失败！

国民军退回了南口以北，其经济上虽然很难支持，在实力上仍大部分保存着，他若不再向右完全投降吴佩孚，在北方仍旧是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未来的隐患。在北京方面，段祺瑞毫无实力，当然不能在"军党政治"时代保持政权，此时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只是奉、直两党。奉党在北京已占绝对优势，这不但表现奉、直两党的势力失了均衡，同时就是在他们背后英、日两帝国主义的势力失了均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奉党这种破坏均势的得意举动，便是带来第四次奉、直冲突之种子；可是在国民军未完全消灭或未与奉、直某一方切实合作以前，帝国主义者是要努力使奉、直两党在北京暂时合作的。日本虽然使其工具在北京占优势，而亦不敢完全排除直党，英国虽未能使其工具拿到北京，他也有方法使奉党不得不和直党暂时合作，所以国民军一退出北京，上海《字林报》北京电即说："有数国公使均以为张、吴若非如旧结合，俾产生新政府，能履行义务订立约章，则不与承认。"

张、吴结合之新政府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统问题。法统有两个：一是宪法，一是约法。吴佩孚若坚持拥护宪法，不得不因而拥护制宪的贿选国会和布宪的贿选总统，则必为其第二次失败之张本。拥护约法吗？在法律的根据上，已无法解决由约法相因而至的国会问题。若认贿选议员为无罪，则有何理由废弃他们所议决公布的宪法？若认贿选议员为有罪，则大多数除名，国会如何能开会？若召集新国会，则除躬自违法外，试问由何人依据何法解散旧国会？现时全国民众所要的是能代表各阶级各职业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不是代表军阀官僚的国会；在事实

上，也只有召集国民会议一法，才可救国会问题的法律之穷。可是国民会议之实现，只有广州国民政府或国民军得了胜利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国民军如果将来能够恢复在北方的势力，他对于此问题，是向左站在民众方面，宁可与军阀决裂，而不能不坚持自己独立的政策，主张国民会议呢；还是仍旧向右站在附属军阀的地位，主张护法？这是全国民众将来对于国民军之最后试题。

1926年4月23日《向导》周报第一五〇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右派大会[1]

一个党内发生左右倾的争论或派别，这本是各国政党中恒有之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中国国民党本早已有了左右倾的事实，而许多老党员抵死不肯承认，以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故意造出这个名词以图离间国民党的，至少也是由于共产党之神经过敏；及至现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组织，仍然要说："他们（指共产党）一方面尽量的宣传左右派别，使国民党分子自相歧视（此之所谓左右是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只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真是一件怪事！

至于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什么，右派之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或者他们以为这都是我们的推论或误会，不足为据；现在右派的上海大会，已将他们的理论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大会宣言上公表出来，我们把他们的宣言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通过的孙总理提出之宣言，对照一读，便能够明白：所谓左右派，真是我们"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还是他们（右派）的主张，和孙总理生前亲身领导的国民党所决定的主张实有不同。明白了这些，便知道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事实存在，并不

① 1926年4月1日，谢持、邹鲁、沈定一等在上海召集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13日选举谢、邹、沈为常务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特发通告揭露，"伪大会不特在纪律上为背叛本党，即在集会手续上亦甚欺骗党员，亵渎总理蒙蔽国人。"

是由于共产党故意造谣或神经过敏；而且可以知道年来国民党内的纠纷，不尽是因为右派排斥共产派，而实有左右派因主张不同而冲突的事实存在。

孙总理所决定的联合苏俄及容纳共产分子这两大革命政策，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到第二次全国大会，都未曾变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会议，即以变更联俄联共这两大政策为目的；由西山会议而产生的此次上海大会，也是同样的目的。此次大会宣言上关于联俄之主张，表面上虽然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于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同时，实际上历数苏俄对中国侵占领土，把持中东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赔款等罪，和张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对于苏俄之宣传论调，完全一致，事实如果是这样，其结论安得不"一反联俄政策"？且在事实上，他们的重要分子如孙镜亚、何世桢，竟在反赤大联合之化身所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文书主任、宣传主任之职，如此而还非一反联俄政策，什么才是一反联俄政策？他们根本不了解苏俄，遂因而不瞭解以苏俄共产党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主义的党派结合，即戴季陶所谓横断国际；国际联盟是各资本主义的国家结合，即戴季陶所谓纵断国际；他两个的性质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和第三国际对抗的是第二国际不是国际联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说："国际联盟与第三国际，此世人所视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在吾人视之，则确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视此两个国际，则便无所短长，盖皆基于战胜民族之组织也。"他们称第三国际与国际联盟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们视此两个国际无所短长，都是战胜民族之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知道第三

国际是一个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组织，更不是一个什么战胜民族之组织，战胜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国的共产党固然在第三国际，战败民族中之奥、匈、土等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被压迫民族中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鲜、中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他们更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遵守列宁"扶助被压迫阶级"、"扶助被压迫民族"这两大革命遗教而奋斗的，在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完全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的压迫弱小民族之总机关。在事实上，第三国际所号召的"不侵犯中国(Hands off china)"，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苏俄已成了很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中国历年来在外交上对于国际联盟的呼吁，得着过什么应声？他们(国民党右派)不知道这些有所短长的事实，因此不能瞭解孙总理联俄联共的政策之真实意义，因以在实际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态度，他们口头上说绝不一一反联俄政策，不过藉此掩饰他们显然违反孙总理的政策之痕迹罢了。他们对于共产党之态度也是这样。此次宣言上，一面说："吾人当认为友军两不相连"，"或有分则相求之可能"；一面：中国共产党"中饱五卅惨案捐款至四十七万之多"，"甚至起反动于本党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他们所指责的这两件事如果是事实，则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更加于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诛之，国民党为什么还当认为友军，还有什么和他相求？民国元二年间，国民、进步两党，在报上相互造谣攻击，已经不是正当的态度，况且在一个党正式负责的宣言上，任意造谣诬蔑他所自认的友军，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于广州事变，其中心问题之中山舰调动阴谋，现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谁起反动于国民党之政治策源地——广州？他们的宣言

上，又说共产党“广设济难会为猎资及宣传其主义之工具”。按“济难会”本是不分党派的社会团体，其经费出入照例是公开的，任何党派都不应据为宣传其主义之机关；照右派宣言上那样说法，是不是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告密，破坏这一个救济政治牺牲者的社会团体？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之三民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根本政纲，并且这宣言是孙总理向大会提出的，当然不能说是汪精卫所伪造，更不能说是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当时右派的首领冯自由，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反对孙总理。可是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的内容，显然和第一次大会宣言相抵触，其要点如下：

（一）在民族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第二方面，……辛亥以后……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视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而此次右派的大会宣言则说：“而民族间之生存竞争，至今犹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其一为战胜民族，其一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他们（右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他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又指国民党之民

族主义是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说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和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族主义之第一方面显然不同。土耳其对于协约国是战败者，对于希腊是战胜者，他究竟是战败民族呢，还是战胜民族？右派的民族主义者若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战胜民族，若丢开主义而以战胜战败定反对或同情之标准，则反对英、法、日、美，同时也要反对苏俄，或者也要反对土耳其，甚至中华民国若对帝国主义者战胜了，也应在反对之列；更进而应用到国内问题，固应反对战胜的奉、直军阀而同情于战败的国民军，同时也应反对战胜的国民政府而同情于战败的陈、林、刘、杨了。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帝国主义者则可，若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战胜民族则似乎不可。丢开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固甚希望蒙古将来能为中华民国联邦之一，然亦必须军阀政府推翻全国的国民政府成立，始有资格始有余暇和蒙古民族商谈此一问题；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将"叛国"、"僭窃"等徽号加诸蒙古政府，视蒙古民族的独立宣言与宪法如无物，这是明明违反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之宣言。

（二）在民权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民国之民权，……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群言之，则凡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极力号召全民政治，显然与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权主义相违。

（三）在民生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的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竟轻轻的将这两个口号去掉了，"平均地权"是中国国民党最初期同盟会时代的党纲，宋教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新党纲上，轻轻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不幸的平均地权这一口号，现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抛弃了！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己而奋斗也。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忽说："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至于无所困苦，俾农人于团结组织之中，不致发生阶级斗争之惨祸。"又说："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雇主，而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社会，盖此种担负，实社会消费者所共任，此社会上大多数之经济利益所以常相调和也。"两相对照起来，前者是主张为农夫、工人之解放反对特殊阶级而奋斗，实质上是不反对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希望地主觉悟以免除农人之困苦，希望雇主施恩使工人得较美生活，实质上是主张阶级调和，是反对阶级斗争，且明言"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季陶先生闻此言否？）

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不同，是右派大会宣言的主张和孙总理所领导的左派主张不同，而不是和共产党主张不同。）有了这些不能否认的事实，所谓国民党左右派，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了罢！如果右派能够仍旧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

言，而取消他们的此次大会宣言；如果能够取消他们自己的各级党部，而回到广州中央党部统辖之下；我们就甘心承认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之罪。

可是事实上我们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竭诚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因为右派中有些较右的分子，已经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黄大伟、邓家彦、徐绍桢、童理璋等所组织的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合作；这个国民外交协会，和陈炯明派章太炎、黄大伟、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张作霖所资助之反赤大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团体。蒙他们不弃认我们为友军，现在敢以友军资格，希望他们和我们在相同的口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上合作；并敢以友军资格，奉劝他们勿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宁可使我们受神经过敏之咎，不可使我们不幸而言中！

1926年4月23日《向导》周报第一五〇期　署名：独秀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中国之有劳动运动，其历史还很短，中国的工业犹未发展，工人的数量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还很小；可是中国劳动运动的特色，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和革命的，这是因为中国自身是半殖民地，他的幼稚工业没有别的殖民地供他剥削，以养成劳工贵族，以造成改良运动。并且中国的产业大部分在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军阀管辖之下（如轮船、铁路、纱厂、香烟厂、矿山等），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之对象，大部分便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同时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就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对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就成了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之共同的政纲，而且这两个运动也只有共同力求实现这政纲，才有出路。

第一次和第二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其主要的是反对军阀之“二七运动”；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主要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之“五卅运动”。这两个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后者却有伟大的成绩与影响。

在五卅运动前，已经有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军发生，铁路总工会成立，胶济路罢工，上海及青岛纱厂罢工，这些事实；第二次劳动大会开会时，已到了中国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爆发的焦点，大会一闭幕，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便发生了。

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真能使帝国主义在华权利发生根本动摇的，也只有这些罢工。

五卅运动虽然因为英、日帝国主义利用奉军的高压而失败了，然而他在民族运动上在劳动运动上的成绩与影响，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香港的大罢工，在香港及广州的工会统一运动上收了很大效果，此次罢工固然有赖于国民政府之胜利始克实现，同时这次罢工也巩固了国民政府，使国民政府在对外抵抗香港政府势力上，在对内镇压反动势力上，都得着有力的援助。

上海的大罢工，唤醒了全国的民族觉悟，尤其在上海本地，资产阶级至今犹继续他们和平的民族平等运动，如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收回会审公堂，工部局增加华董，公园开放，修改洋泾浜章程等。在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上，五卅以前只有很少数散漫组织或空招牌的工会；五卅以后虽然未能继续维持当时二十万罢工工人大群众的组织，而全上海三十六万余产业工人中，已经有约四分之一的工人有了群众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纱厂工会（五万余人）、印刷工会（五千余人）、海员工会（二千余人）、码头工会（二千余人），都在他们的总机关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进行工作。五卅政治罢工失败，又接之以经济罢工，当时几乎全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济的罢工，即五卅运动中未举行政治罢工的，此时也举行了经济罢工。即在最近数月，此次经济罢工犹未停止，略如左表：

（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

产业	次数	参加人数	罢工期时间
纱厂	一四	一二八〇〇	五五·七二五〇
邮务		六〇〇	（未罢成）
金银业	一	四〇〇	二四〇〇〇
商务印书馆	一	四〇〇	四〇〇
麻袋	一	一五〇〇	四五〇〇
袜厂	一	七〇〇	
共计	一八	一六·四〇〇	五八六·一五〇

"有了组织便要罢工"，这是上海工人的特性，这因为上海的物价不断的增高，而工资不增，便等于不断的减少工资；尤其是码头工人，他们的工资并且比去年平均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困苦不堪的五万苦力，是眼前上海劳动运动一个最紧急的问题。

除了香港、上海，从青岛到济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现在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沿京奉路即唐山与天津，是北方唯一的工业区，在国民军失败之前，天津已有五万纱厂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并有了他们的公开的天津总工会；唐山除原有路工外，六万矿工亦已开始组织。国民军退后，天津、唐山都入了奉军的范围，工会绝对不能公开，在发展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北京本是一个没有烟囱的地方，然而五卅运动后，也居然有了数千工人组织起来的北京总工会，并且热烈的参加政治争斗，在群众的示威运动中，几乎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学生地位。现在奉军入京，他不免也要受点挫折。

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本居全国工人运动中首要地位；可是"二七"的伤痕犹未全愈，十余万路工，有组织的尚不及三分之一，现在京奉、胶济二路及津浦路之大部分，又都在奉军高压之下，京汉路工又与旧敌吴佩孚重逢，眼前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有很严重的障碍。

汉口本是中国工业中心之一，在"二七"前，工会运动本甚发达，其后因"二七"以来的政治压迫，农民因灾失业、劳力过剩及工贼活动这三个原因，所以在五卅运动中，汉口工人未能和上海、香港工人携手并进；即五卅后，工会运动仍然没有若何发展。

湖南的矿工运动虽然有两处新的发展，而两处旧的组织——水口山与安源却都破坏了（安源虽在江西省境内，而在工人运动的历史关系上，则属于湖南）；一万多人的安源矿工组织，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假手于中国公司所破坏，并且公司为日本资本压迫而濒于破产，在山工作的工人已减少一半以上。长沙的城市工人，大部分都有了组织，且能够参加地方的政治争斗。

依过去一年的经验，尤其是五卅运动中的经验，我们对于中国的劳动运动，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一）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

（二）中国的劳动运动之胜败，和中国民族运动之胜败，是

在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

（三）在民族运动得到相当胜利的地方，不但工会，即革命的组织亦能相当的存在；反之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之下，任何工人的组织都不能存在，虽改良派的工会亦不能发生。

（四）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势力，断难长期巩固其统一政权，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随时随地都有冲破军阀势力之可能。

（五）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并且要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1926年5月1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唐生智也赤了吗?

吴佩孚讨冯，分明是报复倒戈之仇，然而他不说是复仇，说是讨赤。现在吴佩孚又利用叶开鑫向湖南扩张地盘，也说是讨赤。并指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从前陈炯明派屡次说广州政府将于某月某日宣布共产，现在叶开鑫又说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何中国赤之多而共产又到处能够这样任便宣布!

讨赤大元帅

从前还有些人不知道"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见各报京电:"某方推曹锟为讨赤大元帅，张作霖、吴佩孚副之"，才知道所谓"赤"就是不利于曹锟、张作霖、吴佩孚，而为他们所要讨的一件东西。

反赤的滋味

奉军一入天津，天津商人便因强兑军用票罢市，奉军一入北京，北京又因军用票问题，逼得商铺歇业，市面萧条，国民军在京

津时从来无此现象，此时京津的商民应该饱尝了反赤的滋味！

这是以党治国吗？

广州国民党党政府之下的公安局，居然派员检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等，这是以党治国呢，还是以警察治党？

1926年5月1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　署名：实

最近政局之观察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唯一重要的政象就是奉、吴发生暗潮。此暗潮之特点，就是护法、护宪之争执及助长此争执之关系奉、吴两方实际利害的内阁问题。奉张知道护宪必复颜阁必复旧国会，颜属吴派，旧国会大部分贿选议员都不啻是曹、吴家之养卒，这些都于奉不利，他又知道曹宪与贿选国会大不理于众口，乐得在此方面与吴一争。吴亦知道他在北方之军事实力远不及奉张，非从政治上进攻，非藉护宪以恢复颜阁与旧国会，无由分得北京若干政权，因为北京的精华——京师警察厅及崇文门税关，都已落于奉派之手。内阁问题，此时尚非阁员分配之争，而是内阁总理属于直派或奉派之争，此争仍将取决于护法或护宪。若护宪，当然要恢复直派之颜阁，奉张所争则在财、交两部；若护法，则奉张及其背后之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必不甘心放弃政府领袖地位之权利，此时直吴及其背后之主人——英国帝国主义者，为顾维钧所预定之外交坐位，亦决不至为他人所夺。

在北方军事上，直吴远逊于奉张，然直吴多政客奔走人材，即在民间的政治空气上，奉张更不及直吴，且国民军尚近在京北，随时有联直之可能，此亦迫得奉张不得不对直吴让步之隐情。因此，直、奉军阀及其背后英、日帝国主义者实际利害之冲突虽终不能免，然以政治的环境，又不利于即时决裂，于是他们不

得不别谋暂时弥缝之一策，以和缓其急冲。

其策为何，即继续军事行动，分讨南北二赤，使奉、吴势力得分途发展，不至两力汇集于北方，随时皆可发生冲突。此策见之实行者，就是直鲁联军向南口进发及吴佩孚进攻湖南。吴之进攻湖南，不用说其目的地乃是广州，此策实行将来的效果又是怎样呢？

奉、吴若真能分向南北发展，虽不能完全免除他们在北方之冲突，当能和缓其目前冲突之危机。奉军若得阎锡山之助，国民军又不能于最短时间消灭阎军，则诚难以一军敌热河、南口、大同三面之进攻；国民军消灭，奉张对直吴态度当更强硬，同时若直吴向南亦得相当发展，则奉、直关系，自必重入危机。吴佩孚向南图粤，在地利上当然没有一直由湖南进兵广州之可能，势必由湖南、江西、福建及广东内部（陈炯明、魏邦平之余孽）四面包围，再加以香港方面之封锁及示威，才能收效。不过唐生智若不降吴，湖南方面即能牵制吴佩孚一大部分兵力；江西方面，方本仁虽然尚未表示反吴，而其遗留在江西之旧部如唐、蒋、二杨，实不易为吴佩孚驱为攻湘攻粤之用；闽周本只能自保，非至吴军进入广东，彼未必肯出兵；孙传芳时虑吴佩孚勾结苏、皖、浙各军将领向之倒戈，其自身地位且日在危险状态中，更不会为吴攻粤；袁、杨都意在据川，那能为吴远征；河南之红枪会及豫军已开始豫人治豫运动，且为吴佩孚之后患；以这样的环境，只要广州国民政府对于内外各方面的政策应付得宜，则吴佩孚向南发展之希望本是很少。吴佩孚若不能向南发展，势必至一面忍气联奉以自固，一面勾结夏超、陈仪、陈调元、王普等推倒孙传芳，收苏、浙、皖三省于自己势力之下，以统一长江，以备与奉张一战。广州

国民政府在此期间若有充分准备，甚至国民军尚能在北方保存若干实力，奉、直战争再开时，中国政局又必有一次新的大变动。

1926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　署名：独秀

我们要认清敌与友

在中国国家的利益上观察中俄协定，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是于中国有利的。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允许我们收回租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在租界增加几个华董都很不容易实现，要和纳税外人有平等参政权，那就更难了；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把所有的租界租借地都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放弃领事裁判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不能收回比领判权更不法的会审公堂；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经把领事裁判权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把持中国的海关，以协定税制制我工商业之死命，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五卅惨案和全国商会关税自主之要求，其结果关税会议，仍旧是在协定制下增加二五，自主不过是一句空话；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协定关税制而改用相互平等的原则了。英、美、法、日等国，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欺压中国，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驻兵京、津、沽等处，东交民巷简直是国中之国；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已实行退出辛丑条约国，不在中国境内驻兵，连保卫北京大使馆的兵都没有。

苏俄并不象德、奥是欧战中之战败国，他对中国放弃了各帝国主义不肯放弃的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等处驻兵这些侵犯中国国权压服中国之工具，除了他以平等的友谊对待中国

外，试问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各帝国主义者看见苏俄悍然退出辛丑条约国，对中国放弃了这些权利，使他们相形见绌，还恐怕因此引起中国人对他们发生怨愤；如此，他们恨苏俄，攻击苏俄，本是情理之常。若中国人也因此恨苏俄，攻击苏俄，那便出乎情理之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真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所讥诮的"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吗？

杜洛斯基曾在五卅被害之工人与学生追悼大会上说："中国的房子属于中国人，要进去须先敲门，主人有权利放朋友进去而驱逐他所认为敌人的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者帮助张作霖打败了郭松龄，又帮他夺取了大沽口与天津，英国帝国主义者帮助吴佩孚打败了河南①；于是吴佩孚、张作霖遂带了英日的势力到了北京，于是张作霖、吴佩孚遂出来要求苏俄撤回办理中俄协定之加大使。这便是张作霖、吴佩孚放进他们的朋友英、日帝国主义者，驱逐他们的敌人苏俄。他们认英、日为朋友，所以要亲英派的颜惠庆、顾维钧出来组织政府担任外交；他们认苏俄为敌人，所以连办理中俄协定的王正廷都算是赤化党，而加以排斥。这原来是中国军阀的意见，他们这种意见，当然不能够代表中国的主人——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也是认保有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英、日帝国主义者为朋友而要放他们进来，也是认放弃这些权利的苏俄为敌人而

① 奉直夹击国民军。1926年1月中旬，吴佩孚部由鄂出师入豫，攻打国民军岳维峻部，3月2日占领郑州，岳部败退。

要驱逐他出去吗?当然不是这样,不但张作霖、吴佩孚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即一般反赤的政客、流氓也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固然有一部分人对于赤化不无怀疑,而对于帝国主义者保有租界、租借地(如旅顺、大连、威海卫等)、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却是一致愤恨;对于苏俄放弃这些权利的中俄协定,断不至因为赤化之故而加以拒绝。此时中国民众尤其是上海民众所奔走运动的,是租界华董、收回会审公堂、反对越界筑路捕人、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修改洋泾浜章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运动之对象,都是反赤的英、美、法、日等国,而不是赤俄,因为中国民众所要收回的这些权利,赤俄都已经根本放弃了。中国民众正在向反赤的帝国主义者要求收回这些权利;同时,张作霖、吴佩孚便主张驱逐办理中俄协定放弃这些权利的赤俄大使;不但中国的军阀的意见和民众不同,并且是针锋相对。

不过中国民众现时的态度还是不够,因为民众对于张作霖、吴佩孚的反俄政策若不加以纠正,足以破坏中俄协定,足以使各国的民众怀疑中国人对于外国放弃在华权利是欢迎还是反对,足以使别国不敢效法苏俄退出辛丑条约的关系,以为一退出辛丑条约,不能驻兵北京保卫使馆,便要受中国人的侮辱。

中国的主人即大多数民众,应该更进一步明白表示其意见和军阀不同,应该简单明瞭的告诉一切外国人:凡是来敲我们门的,无论强弱赤白,只要声明放弃租界、租借地、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等处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认为朋友请进来,否则一概认为敌人请出去。如此才能够一洗"只服强权不服

公理的民族"之耻辱！我们不从头脑中把这个耻辱洗净，别的一切国耻是不会洗去的啊！

1926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章炳麟与镇威孚威

反赤军的残暴，不独京津市民受不了，不独王士珍通电说："妇孺逃徙十室九空"，即吴佩孚亦通电说："近日连接各方电告京畿附近发生官兵奸抢诸案"，张作霖也自觉不及"赤贼"秩序井然；独有一章炳麟致颜惠庆电说："方今居庸逋寇犹未肃清，粤中赤化直搏湘楚，……居庸之寇则请镇威主之，衡岭之寇则请孚威主之，待南北二赤次第荡定，然后徐议他事"，大约章炳麟觉得京津市民所受反赤军的灾难还不痛快，再要镇威光顾张家口一下，孚威光顾湖南一下，并且一直光顾到广州，才算称心！

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我们对于赤化有所怀疑吗？我们应该赞成反赤吗？现在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说：赤俄已经把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驻兵中国及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倒是反赤的英、美、日、法等，不肯放弃这些不法的特权；称为赤化的国民党党军，无论在省城在东江都秋毫无犯，倒是反赤的陈炯明军在闽粤边焚杀不堪；称为赤化的冯玉祥军，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秩序井然，一尘

不染”，倒是反赤的奉直鲁联军“颇有奸淫抢劫之事”；这些事实就是指示我们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奉军胜利之教训

你们常说：奉、直和国民军战争是军阀的战争，谁胜谁败都和人民无关。可是国民军开到北京、天津，退出北京、天津，从未惊扰人民，奉联军一到天津、北京，军用票便吓破了商民的胆，一直闹到“妇孺逃徙十室九空”，他们的胜败，果和人民无关吗？你们又主张学生只应读书求学，不应与闻政治，可是现在奉军一入京，各校都停课了，教员大部分逃走了，女学生更惊骇的几乎连逃走都来不及，政治如此，请问如何读书求学？此次奉军胜利之教训，能否稍稍改变你们的旧观念呢？

1926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　署名：实

南方形势与国民党

吴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夺取完全政权，遂转而向南方发展。他向南发展之步骤，第一步是以实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湖南，把湖南放在他的势力支配之下；第二步便是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军队围攻两广。他的目的是否可以完全达到呢？

他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一半，恐怕终久只能一半，因为唐生智的军队并未受损失，何况还有两广的援助，并且郴永地势易守而难攻，吴佩孚欲得全湖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第二步办法正在开始进行，他叫袁祖铭把四川让给杨森，一面杨森得到四川便可出兵攻粤，一面袁祖铭回黔联唐，便可联合滇、黔军队攻粤，他这种如意算盘，至少一半是幻想；河南方面，只有寇英杰原有的三旅现已扩充为三师可以作战，但须留守河南，其余收编的豫毅等军都毫无战斗力，并且豫军尚有勾结红枪会反吴的趋势；江西方面，方本仁旧部和鄂军对抗的暗潮，还未完全消灭；福建因与孙传芳的关系，能否出兵攻粤，也尚成问题；此时吴佩孚真可用作攻粤的，只有湖北全省军队及河南、湖南、江西一部分军队，云南唐继尧也有乘机攻粤之可能，其中最热心作战的，要算马济之对广西，陈林旧部谢文炳、刘志陆之对广东。不过吴佩孚以八省兵力攻取两广的计划虽然有点幻想，而指挥湖北、湖

南、河南、江西这四省兵力并且利用唐继尧向粤围攻，这是可能的，因此南方的形势，此时十分严重！

国民政府所在的两广，不但是南方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全国的革命民众应该出其全力，拥护这根据地。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适于此时在广州召集全体会议，在此次会议之重大的职任，即是为国民政府决定各种方略，以抗此次吴佩孚之进攻。因为此次吴佩孚向粤进攻，是有大的计划，我们不可过于轻敌。他此次进攻之胜败，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生死关头，所以在此次国民党之中央全体委员会议中，这是唯一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之方略，不但是要两广迅速出兵援湘，并且对邻省若江西若福建，都要有适当的策略，并且对北方的国民军，河南、湖北、四川以及山东、江苏间的军事政治变化，都应充分注意，尤其要果决迅速的肃清广东内部反动的右派势力，使他们不至乘广东出兵后发生阴谋。因为由三月二十日事变，我们不能不承认广东内部尚有反动的右派势力之存在。

反动的右派，在广东因环境的关系，貌为拥护国民政府，貌为和北京、上海的右派不合作；实际上，他们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在军队中禁止阅看汪精卫、蒋介石的演说词，他们在党军始终要团结自已一致的势力。

反动的右派现在在上海及其他各处宣传说：此次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共同的是要重新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问题。我们敢说这完全是谣言。修正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政策，是右派自西山会议到上海大会一贯的主张，广州中央的中央委员最大多数是革命左倾的分子，那会和西山会议以来被国民政府命令称

为"叛徒"的右派走到一条路上去？

况且，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正在和吴佩孚势力进攻决斗之生死关头，惟有加紧结合全国革命的势力，以当大敌，凡是一个中山主义的革命党员，岂有反而对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革命政策怀疑而要重新讨论之理！

1926年5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三期　署名：独秀

宪法与贿选

反对贿选案，始终是全国普遍的舆论。中国社会的公是公非只有这一点了，我们万分不应该连这一点都要把他毁去，毁去这个，比毁去任何法律，损失都大！

舆论反对贿选，当然对于一买一卖的贿选总统和贿选国会议员，同样反对。舆论既然反对贿选的国会议员，他们是猪仔，怎能够承认猪仔们有代表人民制定宪法之权。

舆论现在反对护宪，其理由很简单明白，就是：根本反对贿选，根本反对贿选的猪仔议员所制定的宪法；并不是因为宪法的内容好或不好，也不单是因为宪法为曹锟所宣布说他是曹宪，更不是为张作霖或黎元洪而反对护宪，至于不是受了赤党的煽动，那更不用说了。

舆论反对护宪，固然是因为贿选之故；直系护宪，也正是想使贿选议员所制定的宪法有效，依宪法贿选的总统也有效，贿选的总统虽辞职，贿选总统任命的颜阁仍然有效，如此则贿选一案遂无形宣告无罪了。直系这种想头，直是本末倒置，他们若无充足理由宣告没有贿选这件事或认贿选为无罪，则无论如何依法定程序而选举的总统，无论如何依法定程序而制定的宪法，都是国民所不能承认的呵！最近吴佩孚致电张作霖申述护宪的五个理由，便是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

该电所举第一个理由是宪法根据约法而产生，故护约即当护宪。他忘记了当时宪法产生情形，除了根据约法而外，还有贿选一段事实；他更忘记了制定约法者是革命政府的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者是贿选议员的宪法会议。

他第二个理由是说："宪法经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议录事实俱在，众目昭彰，……大总统并无宣布宪法之权，强谓宪法为曹宪，与事实不合，于法理尤谬。"不错，十三年宪法是经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的，可惜这班宪法会议议员所犯贿选的罪，也是"事实俱在众目昭彰"！从前袁世凯想做皇帝不成，仍想保全总统地位，遂宣传说：谋复帝制的是袁世凯个人，不是袁总统，不可并为一谈；现在直系想保全他们的贿选总统不成，仍想保全他们的贿选议员所制定之宪法，遂宣传说：贿选是贿选，宪法是宪法，不可并为一谈，殊不知袁世凯总统即当时谋叛民国的袁世凯，他如何能够继续为民国之元首；制定宪法的国会议员即当时贿选总统的国会议员，他们如何能够代表人民制定国家根本大法！

该电所举第三个理由是说："约法上只有临时大总统，而宪法上之大总统选举法，系民国二年十月四日所宣布，袁世凯由约法上临时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适用此法，黎、冯、曹选出，亦均由此法，实无约宪之分。"他忘记了袁、黎、冯、曹虽同是依据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所选出，而却有贿选与非贿选之分；他又忘记了二年之总统选举法和十三年全部宪法之制定者，亦有贿选议员与非贿选议员之分。

该电所举第四个理由是说："黎、曹去位系政治问题，非法律问题，皆不复位，故不违法，现只宜恢复段氏所毁之法，确系为

法而非为人。”一般舆论固然反对段氏，并且有一部分人反对段氏毁法，不过反对段氏毁法的人，除直系及其贿选议员外，大都是指约法而不是指宪法，因为宪法乃贿宪议员所制定，段氏毁之，舆论不但不反对，并且称快。现在直系要恢复段氏所毁之宪法，为人固丑，为法又何尝不丑！

他所举第五个理由是说：“大总统已缺位，自应依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宣布大总统选举法之第五条，即今宪法之第七十六条，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第一、我们不能承认民国十三年之贿选宪法和民国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有何等效力；第二、我们不能因为贿选宪法一部分含有民国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遂承认其全部有效；第三、我们不能承认贿选总统有效，无论他是依据贿选宪法或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所产生的，同时也不能承认贿选总统所任命的国务总理摄政资格，无论是依据贿选宪法之第七十六，或是依据二年大总统选举法之第五条。

总之：直系军人及政客，若不顾忌舆论而惟武力是逞，那就罢了；若向人民高谈法律，人民便坚决的回答道：我们根本主张贿选的国会议员所制宪所举总统及贿选总统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一切无效！至于宪法会议及大总统选举会之出席法定人数足不足，还是第二问。

1926年5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三期　署名：独秀

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

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解放运动也应该是整个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解放运动，都是整个的世界解放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影响，决不是国家主义者所想像各国关起门来独力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他们忘记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之第念六年，已经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是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而已经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事实上的证据又是怎样呢？去年的五卅运动，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和欧美及日本的解放运动无关了；然而事实先生告诉我们：欧、美、日本各国的工人及其政党，都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五卅运动，曾予以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援助。五卅运动所反抗的对象，为首的是英、日两国，而英、日两国的工人竟援助中国人的五卅运动，在

国家主义者的理论，未免要责备英、日两国工人太不爱国了。

现在英国的大罢工，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是英国的阶级解放运动，似乎也和中国无关，更和中国知识阶级无关；然而中国的国民党及学生会都奋起援助。上海学联会致英国工党电说："贵国此次总罢工，予资本主义以莫大打击，本会谨以十二万分之诚意，表示无限同情。敝国今日正处于各资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而尤以贵国所加于我者为剧，苦痛之余，切盼贵国各工友一致奋起，到底不懈，与吾东方弱小民族共同携手，而人类真正和平亦得早以实现。"此电中"苦痛之余"四字，是表示被压迫的中国学生之泪已和被压迫的英国工人之泪汇合在一处了！

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全国学生说："英国工潮奋发，全世界工人均起而予以同情及实力援助；吾等被压迫国家之中国人，亦未便漠视，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内之工人运动，影响于东方民族运动者甚大，尤其是英国工人，例如去年五卅运动，各国对中国民族表示同情的，只有工党；其后英国拟以武力侵犯广东，也因为运输工人反对而止。今后英国运输工人若不为英政府任对华出兵之运输工作，英人将永无输送军队欺压中国之可能，吾等为自己的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起而努力，与此时英国罢工的矿工及一切运输工人以声援。"远离英国数万里之中国学生，若没有自己民族要求之冲动，若不认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工人运动之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帝国主义，他们为什么要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

国民党右派的理论，一向只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未曾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然而现在对英国工党领袖迈朗氏也说："如外国之被压迫阶级如英国工党，善意的帮

助中国，自当乐受。”这句话的意义，是事实逼迫着他们不能不认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的而不是国家的了。

国家主义者或者又要说：照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即中国对外国之独立运动，应该是国家的，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独力来干，用不着联合什么世界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成反帝国主义之整个的世界革命，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国家主义的运动，用不着赤化的理论与策略。

不错，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诚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并且目前在中国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也只是这一理论与策略的运动，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决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不过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全世界的实际状况和中国的实际状况，我们若真心要做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来共同革命呢？还是应该采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关起门来独力革命？

若采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去年各国工人援助中国的五卅运动，今年中国工人、学生援助英国的大罢工，都是多事了！

1926年5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三期　署名：独秀

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的态度

自吴佩孚通电护法讨赤到国民军退出北京，这四个月间是英日、吴张合作支配北方向中国民众进攻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吴、张势力进了北京，因为互争政权，吴、张间及其背后之英、日间便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日益发展，到现在已由暗斗而进于明争。他们的暗斗明争，表面上虽然是护宪与反护宪，实际上乃是内阁与总统之争。

依据宪法恢复颜阁①，已为张作霖所不悦；此次阁员分配，除奉派一个半员外（内郑陆张②），几乎是清一色的直系内阁，此为奉张所不能容忍，因此有电京反对颜氏摄政之说；张学良、张宗昌遂于十二日相继出京，石老娘胡同办公处完全结束。内阁问题即或能以易人及重新分配而消弭争端，恢复国会选举总统之争即代之而起。贿选国会议员，直系占大多数，事前直方对于总统选举问题若无对奉屈服之协定，奉方岂甘心屈服于直方承认国会之恢复？张作霖即碍于前此协定而不便公然反对颜阁与国

① 段祺瑞下台以后，吴佩孚要恢复贿选总统曹锟当政时期所颁布的"宪法"，以便由1924年9月曹所任命的国务总理颜惠庆再出组阁。1926年5月12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

② 内郑——内务总长郑谦，陆张——陆军总长张景惠。

会，其消极抵制亦足使颜阁及国会均不能实际存在，如此酝酿日久，又加安福派之活动，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终必破裂。

此联合战线破裂时，民众对之应取何态度呢？民众对英日、吴张，始终是一致反对，同时也注意他们的联合战线之破裂，是有利于民众的一个事实；民众因不必援助何方，即对于拥护贿选国会之直吴，比对奉张更加反对，对于盘据中国腹地为害中国更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之英、吴，比对日、张更加反对。

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对于吴、张冲突，将取何种行动呢？不用说国民政府对吴、张两派军阀是一致反对的；又是其北伐的军事行动，一开始便与直吴接触，不倒吴莫由讨张，况且眼前进攻湖南同时又正在准备援助马济进攻广西的，是直吴不是奉张："先讨吴后讨张"，这是国民政府不易的军略。国民军若联直攻奉，则所得的除热河外将一无所有，所失的是为直吴利用，助其恢复全国唾弃的贿选国会，断送国民军的政治生命，因此国民军也只有和国民政府取一致的态度，采同样的军略，才能得民众的同情，才能由山西一直向南发展和国民政府北伐讨吴的军事势力相连接。

以上只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反军阀战争的目前一部分军事工作，这一部分工作如果成功，其意义就是为中国革命的军事势力立下一个比现在稳固的基础，可是全国的民众，尤其是受奉系军阀蹂躏最甚的直隶、山东、奉天民众，应同时奋起反抗当地的军阀，引导所有倾向革命的军事势力，使此次战争成为普遍全国的反军阀战争，一直到摧毁一切军阀的政权，建立革命的人民政府。

1926年5月22日《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　署名：独秀

孙传芳最近的主张

孙传芳平日的态度，仿佛是注重实行，不屑多说空话，即是不肯发表主张；可是最近他却也发表主张了，且正式的发表主张了，他所发表的主张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三件：（一）是江日两通电；（二）是五日在总商会关于淞沪商埠市政之演说；（三）是六日在交涉署招待外宾之演说。

江日两个通电，一是主张颜惠庆摄阁，一是声明保境息民政策。孙氏向来表示护法而不护宪法，现在江电说："依曹公通电恢复十三年十月之颜惠庆摄政内阁"，则分明是拥护宪法了。孙氏主张何以有此变化？不用说是反对奉天和迎合吴佩孚两个动机凑合而成的。因为反对奉天，遂不惜牺牲自己的主张而附和吴佩孚，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孙氏向抱江、浙、皖、赣、闽五省门罗主义，现在保境息民的江电又说："窃愿划境以自安；数月以来，迭电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皆本息事宁人之旨，为保境息民之故，……如贪婪窃发，扶我藩篱，嚣我农桑，扰我商贾，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这电为何方面而发，对山东奉军，对吴佩孚，对广州国民政府，或兼对上述各方面，我们都不必深究这些；我们所要质问孙传芳的是：唐生智并未曾犯江西，而江西竟出兵攻湖南，这是否划境自安，是否息事宁人，是否保境安民？或者有人特别原谅孙传芳，以

为他在名义上虽是五省联军总司令，而事实上无权过问江西之事；如果是这样，将来国民政府北伐军开到江西的时候，则孙氏便应该免开尊口，说什么“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这一派的官话了！又孙氏在总商会演说也说：“前日广东代表至鄙人处接洽，鄙人告以南征北伐均属无益，鄙人敢担保五省以内，决不愿举兵南侵。”可是事实上江西确已举兵帮助吴佩孚南征了，孙氏的担保怎么样？并且孙氏又能够担保，福建不受吴佩孚命令举兵攻粤吗？在实际上孙氏既然不能支配五省，便不应轻于开口，说什么担保五省以内怎样怎样像煞有介事的话。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

* * *

孙传芳对于上海市政的主张，我们可以在他的演说中指出几个要点。他说：“现在上海设一个机关，把地方的行政集中在一处。”又说：“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当局的人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实力，换而言之，按现在的情形，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又说：“对于地方人士的首领，我们不能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能不使他们知道商埠督办公署的内容，所以设一个参议会，代表各区的人民。”又说：“暂时以淞沪警察厅所管辖的区域，加上浦东淞沪警察厅第三区第一分区与第四分区中间原属上海县管辖的地方，为淞沪商埠的区域。”又说：“模范市的市民，是要预备将来做一等国的国民的，不是容易当的，是要出钱买来的。单就南市闸北两处讲，一百万块钱一年，是万不能够用的。……所以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以后，原来有市政的地方，旧税要积极的整顿，旧税以外，还要筹办捐税，原来没有市政的地方，得照闸北、南市的办法，一律纳税。”这就是他对于上海市政之具体的主张，

其余若筑路卫生，改良市政，收回租界的预备，以至所谓"真正的自治邦""理想的大上海"，我们只好看做菩萨庙的签，灵验与否，不须留意。在这些具体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几个要点是：(一)淞沪商埠的区域，是北至吴淞，南至龙华，东包浦东，西画沪西，除了中间的租界，都在他管辖之下；(二)交涉署道尹署警厅虽仍属省行政而非商埠公署之直辖机关，但同时两署厅的长官都兼任商埠公署处长，事实上已将所有地方的行政权都集中在商埠公署，已渐渐形成一个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了；(三)在这半独立的上海政府之下，据他说：闸北、浦东、吴淞、沪西四区的市政，暂时官办民督，南市一区则民办官督，总而言之，都"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四)所谓参议会，只是地方人士首领对于商埠公署顾问的机关；(五)就是要整顿旧税，筹办新税。

就这几个要点看来，如果他真心欢迎人民批评，我们便不妨批评一下。我们现在的批评，并不是故意拿高调来反对孙传芳或丁文江，乃是批评他的主张是否如他所说："实际上是参酌目前的政局，上海的情形，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第一，他把大上海的根基，不建筑在市民的权力上面，而建筑在当局者政治上的实力上面，主张非官办不可；殊不知参酌目前的政局，所谓政治上的实力，能保三五年甚至三五个月不发生变动吗？市民的权力，现在固然还很弱，而他的寿命却比官厅政治上的实力长得多；想拿这种短命的实力来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这根基实在太不牢固了！第二，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岁入，其主要税收，在一九二三年已超过五百万两（内计：地税一五〇五〇〇〇两，市政捐三一四二〇〇〇两，码头捐四二七〇〇〇两）；上海市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五区，比公共租界，地面至少

要大四倍，人口至少要多一倍半，而岁入只有其十分之一；其所以如此，乃因为上海租界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输出原料输入制品之最大市场，亦即他们掠夺四万万中国人之中心枢纽。所以上海租界有如此物力，直接上虽是租界居民所负担，其实间接上乃是帝国主义者掠去全中国四万万人血汗之余沥所造成；这种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关系若不改变，照现在上海的情形，而想在租界以外的上海市，诛求和租界同样的税收，办理和租界同样的市政，并由此法而收回租界，这岂非和封神榜、西游记是同等的幻想！第三，即让一万步，承认他是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可是他一面要整顿旧税筹备新税，一面只主张非官办不可，而不肯赏给纳税人一点参政权，这种最可实行的办法，将来实行起来，不无小小困难罢！最近纸烟捐的风潮，就是一例。在这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之下，不说普选的市民议会了，就是现有之少数绅士的市议会，他也似乎不屑齿及，他所要的参议会，只有地方人士首领能够参加；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纳税出捐的人，小商人工人占最大多数，那地方人士首领是些什么人，又能够代表什么人的意见呢？我们并不否认市民纳税义务，可是，“不得参政权不纳税”，不能说这是赤化过激的口号罢！并且现在租界上的外国政府连纳税华人的参政权都不肯承认；同时，本国的上海市政府也是这样对待市民，大约中外官厅的贵人们，都一致觉得中国人是“只应纳税不能参政”的贱民！

*　　　*　　　*

孙氏在交涉署招待外宾所说的话，有一部分是我们所懂得的，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够懂得的。他说：“我更可以老实的对诸君说，我们中国人（他忘记了刘华也是中国人！）自然不能忘

记租界是中国的领土。"他说："推广租界，始终不能得到中国人的同意，我并且敢说，将来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的同意。"他说："外国人保护是要保护的，但是一切的市税，到今不曾担任分文，这种情形，是公道的吗？是可以长久的吗？"这些说话，我们都懂得。我们所不懂得的，是他说："凡有条约上外国人的权利，我们在条约没有废除以前，当然要尊重的。"这便是段祺瑞"外崇国信"的主张！他说："以友谊的态度来交涉，希望在最短期时间以内，想法子把多年的悬案，逐一来解决了。诸君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们设商埠督办公署，不但不是来反对外国人的，而且是要尽量的同外国人合作。……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了以后，也要尽力来想法子，用坦白的手段，友谊的态度，来同诸君切实的磋商。"孙氏大概忘了中国官厅以友谊的（或者还是奴谊的）态度对外交涉，已经八十余年，并非梁启超、丁文江等在五卅运动中之新发明；并且外国人都早已知道以友谊的态度尽量的与外人合作来对付中国人民，本是中国官之特长，似乎不用孙氏再向外国人郑重声明了。况且外人也一向是以友谊的态度与中国合作，例如他们替我们掌管海关、盐税，替我们驻兵京、津、沽、沪、汉，替我们司法裁判，尤其是上海的会审公堂，是中外官厅模范的友谊合作！他说："近许多年来，租界里面的人口，逐日的增加，于是外国人方面有扩充租界的提议，由外国人方面看起来，这种要求，原可以说有相当的理由的。……公共租界的当局，却用越界筑路的办法，来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了。"他竟这样承认外人扩充租界和越界筑路是为了解决人满问题，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野心，这和戴季陶承认帝国主义是"人口的增加，使各国人民感觉土地缺乏，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扩张领土不可"的见地，

是一样了。关于此问题之复杂的理论，此地不必多说，现在且举出几个事实问题，答覆他们的见地：近代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人口日渐减少，俄皇治下之西伯利亚一向地旷人稀，为什么他们也要扩充领土？上海法租界居民并不多，法新租界是因何理由扩充的？公共租界居民之密并无过于香港；静安寺路、戈登路、爱文义路中外居民住宅尚多系平房，并不像伦敦、纽约有无数层楼大厦，况且华界近年已有不少外人的住宅与工厂，当真有越界筑路和扩充租界以解决人满问题之必要吗？他们在上海把持会审公堂，难道也是因为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吗？总之，你们若说帝国主义的势力太强大，无论他们如何不说道理，此时我们都反抗不了，这话到算老实爽快；若强词曲说的附和他们，从没有道理之中说出道理来，这就大可不必！

1926年5月22日《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

有人见马素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竟说出："赤祸蔓延，国脉不绝如缕，反赤军声罪致讨，不期年而歼除国贼，清绥北都，斯固忠勇善战所致，然亦人心归往，正气犹存。"这样肉麻的话，觉得他真是民党之败类。我以为所有民党分子，非革命即反革命，很少有中立之余地；他们当中所有的反赤分子（内分反俄反共及反对联俄联共两派），即令他现在还骂马素是反革命，可是迟早是要和马素走上一条道路的，马素可算是这班败类中之先知先觉。谓余不信，请看将来！

1926年5月22日《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　署名：实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

有许多人，尤其是国家主义派，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不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爱他的祖国——中国，为他的祖国——中国奋斗的，他是极力劝中国同胞要恢复民族主义来救国的，他是极力指责现在提倡世界大同主义未免过早的；然而因此便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那就未免对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之研究过于浅薄了。

孙中山先生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这一问题，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尤其是关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有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国民党中及国民运动中左右派之根本争点，应该有一个明白确定的解答。

要解答这一问题，第一须分析历史上各时代民族运动的特性，第二须检查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

因各时代的经济关系日渐复杂，民族运动在历史上乃有三个时代不同的特性：(一)宗法社会时代之封建贵族的民族运动；(二)军国社会时代之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三)帝国主义时代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

宗法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前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富于血统及宗教的色彩，实际上乃是由于民族的封建贵族争夺疆土，因为宗法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是农业的，如日耳曼人对于蒙古民族西侵之反抗，中国汉人对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之反抗，回民对于十字军之战争，回、準等族对于汉人之争斗，皆属此类。

军国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前半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运动，此期运动已渐渐脱离前时代血统及宗教的色彩，而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因为这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农业，已需要商业的发展更进的工业的发展，已非宗法社会制度血统宗教等所能支配，并且在经济的需要上，已有了血统不同或宗教不同之民族所合成的国家；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正需要一个军国制度的国家机关，即超越民族血统及宗教信仰之上的国家权力，以供其资本主义发展之用。这种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亦即民族的国家主义运动，由日耳曼、意大利渐渐蔓延到全欧洲，民族运动渐渐成了国家主义的工具；由日耳曼、意大利之成功，渐渐由自卫的国家主义变成侵略的国家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这些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即国家主义者，对外则利用“民族统一”的口号，扩张本国的领土与主权（如俄国之大斯拉夫主义，德国之大日耳曼主义，日本之大亚细亚主义等），对内则利用“民族同化”的口号，征服境内的少数民族（如俄国之大俄罗斯主义，土耳其之大土耳其主义，中国之大中华主义，外蒙之大蒙古主义等），复利用“民族生存”及“保卫祖国”等口号，欺骗国内的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牺牲。在这时代，不但民族运动是国家

主义之工具，并且国家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之工具。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现代资本主义末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纪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压迫国家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联合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不象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单纯的资产阶级运动。因为资本帝国主义有国际性，反抗他们之民族运动也不得不含有国际性，和前时代民族运动之对象及作战策略遂至不同，这也是此时代民族运动和前时代民族运动特性不同之一。若埃及之独立运动，若土耳其之国民革命，若印度之不合作运动及农民暴动，若加哇工农之反抗荷兰，若菲律宾之独立要求，若摩洛哥及叙利亚之反抗法国，若里夫民族之反抗西班牙与法兰西，若波斯、亚喇伯及阿富汗之反英运动，若高丽、安南之独立运动，若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紧接着苏俄十月革命兴盛起来的，都有无产阶级的力量参加运动，使这些运动渐渐减少了前时代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新的色彩——反资本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的色彩。国家主义派说这些运动都是国家主义的运动，这显然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这是因为他们不曾懂得此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和前时代完全不同。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纯资产阶级的，没有国际性的，造成资本帝国主义的；此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反资本帝国主义的。

我们既已看清了历史上民族运动之三时代各有不同的特性，更进而检查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是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便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了。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上说：

“但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们要把他来分别清楚，有甚么方法呢?最适当的方法，是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甚么力造成的。简单的分别，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所以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分别。

“但自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预〕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

“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拚命一战。

“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故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第二方面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但是天不从人愿，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万万五千万人，去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列强所以诋毁列宁的

原因，是因为他说世界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的先知先觉，为他们自己求安全；但是现在人类都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们欺骗，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情况。"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甚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

在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理论之几个要点：第一、他把民族和国家分得很清楚，他又一向是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根本不同。第二、他观察未来的国际战争，是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对二万万五千万横暴者的战争，是超越种族和国家之多数弱小民族反对少数民族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山先生这种代表"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显是国际的，决不是国家的。第三、他明白中国是帝国主义之殖民地，他并且力说这殖民地之我们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自己不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中山先生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明明是属于现代殖民地国际民族运动之特性；而不是属于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之特性。我们明白了这些要点，便不能诬中山先生是

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不能说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十八世纪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产物，是资本帝国主义之前身及其工具，若在现代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时代提倡国家主义，不□有时代的错误，并且有药不对症使病加剧的危险。第一、我们要懂得国家是什么。清朝皇帝常说："我国家二百年深仁厚泽"，如此清室就是国家；袁世凯曾印布一个小册子叫做"国贼孙黄"，如此反对袁世凯就是反对国家；段祺瑞、吴佩孚都自以为"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是救国政策，如此北洋派就是国家；最近奉军亦称反奉的民众有害于国家，如此奉天军阀就是国家；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打破那些朕的国家，取得了那些国家的统治权，便造成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国家。这都是他们的僭窃吗？不是的。国家这一个抽象名词，本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则所谓国家主义也就是"统治阶级主义"。第二、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是什么？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推翻封建阶级夺得统治权后，都已变成反动的势力，所谓国家主义，正是这班反动势力（尤其是法西斯派）用做对外扩张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对内压迫平民或欺骗平民为资产阶级牺牲之工具，即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具。第三、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若应用在殖民地是怎样？殖民地不会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便不会有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他的民族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参加合作才会成功；殖民地民族运动之对象不仅是近邻某一民族；因此，若应用纯资产阶

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在殖民地做民族运动，则对内失去无产阶级参加的力量，对外失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国家，我们决不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我们自然急于要救中国爱中国，然而我们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无产阶级本来无祖国，然而他们在救祖国的实际工作上，比任何阶级都出力：在普法战争之巴黎围城中，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投降了，只有无产阶级尚力奋其最后决死战；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要仍旧和协约国妥协的，只有无产阶级急起没收了欧美各帝国主义在俄权利，使俄国脱离了外国的羁绊而完全独立；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致接受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奴隶德国之道威斯计划，只有德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始终反对；这些法国、俄国、德国为祖国奋斗的无产阶级，都不曾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然而他们决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一生爱他的祖国，一生为他的祖国奋斗，然而他也决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是前时代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口号，这一口号，已属过去的而且是反动的了；在现代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殖民地民族运动中，他已经是分散此运动在内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障碍物，凡是一个忠于民族革命运动的人，都应该起来埋葬这一过去的反动的障碍物——国家主义！

1926年5月25日《新青年》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

法国赫里欧氏有言：“目下一般专务私利之投机者，已造成一种资本的巴士的狱，朘削法国政治界之心脏，而政府与之狼狈为奸，报界亦复同一腐败，一般报纸尚自称崇信共和主义，但实则已为资本家之奴隶。”

现在我倒可以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已在中国造成一种“民族的巴士的狱”，朘削中国人之心脏，而中国军阀与之狼狈为奸，教育界、商界中所谓高等华人亦复同一腐败，一般高等华人尚自以为崇信民族主义，但实则已为帝国主义者之奴隶。

五卅运动，就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开幕，就是要打破八十年来这“民族的巴士的狱”。

从前代表法王威权的巴士的狱，摧折了无数革命志士无罪平民，“打破巴士的狱”为法国革命之开幕，至今传为美谈，垂为纪念。现在资本帝国主义在西方造成之无形的资本巴士的狱，朘削了无数平民膏血，并牢笼了报界学者一辈精神的奴隶，为之歌功颂德；在东方造成之无形的民族巴士的狱，朘削了全中国人的无量膏血，并禁锢了高等华人的民族精神不能发展或不敢发展。

我们现在如果真心纪念五卅运动，便应该继续此一运动，而完成其工作——彻底打破这民族的巴士的狱，把中国民族从这

狱中解放出来！

我们要打破此狱，不用说首先要毁灭此狱之墙壁——资本侵略制度，驱除为资本帝国主义者看守此狱之狱卒——军阀官僚；一般鼓吹反赤的失意政客及所谓老民党，也在狱卒的伙伴助手之列。尤其重要的是打破狱中人之精神上的镣锁，使之愿意牺牲一切，死里逃生的打出此狱。

最不幸的是狱中人尤其是狱中的所谓高等华人，因精神上的长期镣锁，已麻木其感觉性，自以为身在狱外，并且习于狱中生活，已与狱吏（帝国主义者）、狱卒（军阀官僚）取了友谊的合作态度，反指斥主张打破此狱之人是捣乱，是唱高调，是多事，是惹祸，是破坏和平秩序，是别有用心，是过激赤化。取这样态度的高等华人，乃是打破此民族的巴士的狱之重要阻碍物。

在此次上海各界筹备五卅纪念的联席会议席上，教育界代表有人主张学生不加入此次运动，更不主张各界共同发表宣言，这分明是表示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他们没有什么需要。商界某首领忽然说到什么"军阀帮助帝国主义而共产党也帮助赤色帝国主义的苏俄"这类话，似乎这两方面都应该反对，可惜他们一向只勇于反对共产党与赤俄，而怯于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他们甚至于因为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威吓，怕犯了纪念五卅运动的嫌疑，主张把五卅烈士墓奠基礼改在二十九日举行。更可惜他们竟忘记了扣用火车妨害商业者，是军阀而不是共产党；以苛税杂捐强用军用票等形式没收商民财产者，也是反赤的军阀而不是赤的共产党；把持中国海关抑制中国工商业发展者，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赤俄；他们向之哀求交还会审公堂及租界增加华董而不得者，也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赤俄，他们更忘记了应该全中国

人永世惨痛不忘的五卅事件，在日本纱厂，在南京路上，在宁波会馆前，流中国人血的，也是帝国主义者而不是赤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也主张中国民族独立，可是他们都以为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只应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干，不应接受外力即赤俄的援助，甚至于马素拿外国帝国主义的钱办的《独立报》也这样说；他们尤其反对赤俄以军械接济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大概他们觉得中国人所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践踏并不甚厉害，尽可从容以自力解放，不需急急求助于邻人；他们更或以为只有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应该有武装，该死的中国人民，理应赤手空拳的让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恣意屠杀，不但民众不应该寻求武装来反抗，即接近民众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军，也应该由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来铲除、赤俄不应该接济军械使他们存在，以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患。国民党右派口中虽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同时却用反对赤俄与共产党以相消；并且大登其广告直指什么什么人是共产党员，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军阀告密。报界宁开罪于民众，而不开罪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封锁民众运动的消息，乃是常事。

这班人的思想主张，其阻碍民族的巴士的狱之打破，也不在所谓高等华人之下，也因为帝国主义者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镣锁、禁锢了他们的自由思想，使他们不甚感觉狱中痛苦，不急于求解放，不需要邻人之助，甚至于不认识邻人与仇敌。

所以我们如果要纪念五卅运动，如果要继续五卅运动，必须打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精神上的镣锁，一致起来打破八十年来这“民族的巴士的狱”，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才算完成了五卅运动的工作！如此，则将来中国的“五卅运动”，方能和法国的

"打破巴士的狱"成为同样光荣而严肃的纪念——被压迫者及抗压迫者之胜利的纪念!

1926年5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全中国人都过激了吗？

吴佩孚向《密勒评论》主笔鲍威尔说："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而汪精卫、蒋介石等承之，北方则有蔡元培、林长民等。"《泰晤士报》说："鲍威尔尝闻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间，吴佩孚曾力助京汉路工会，今吴言如此，颇以为异。"如此，在鲍威尔眼中，吴佩孚也不免有点过激嫌疑！

到底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提议限制过激派在国民党中工作，并禁止国民党加入过激党，然而吴佩孚却说蒋介石相信过激主义。吴佩孚分明对鲍威尔说："现在主旨，在与过激主义抗争，过激主义既完全灭除，则中国可安；……当立意与之为难，将过激党一齐杀却，或驱之出国。"然而鲍威尔却觉得吴佩孚也有点过激嫌疑。到底我们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亚细亚民族大会与谢米诺夫

一向侵略朝鲜、中国等亚细亚各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近年复号召什么“大亚细亚主义”，以图遂其吞并亚细亚各国之野心。将于本年八月在日本长崎召集的什么“亚细亚民族大会”，正是这个野心之开始表现。现据五月二十一日上海各报载：“俄国帝制派谢米诺夫日前化名由长崎来沪，……因谋完成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完结，来劝中国人入会云云。”所谓亚细亚民族大会，又添上一个谢米诺夫的色彩，那是更加好看了！在日本未取消廿一条件未交还旅大及南满铁路以前，且看十年来大叫“毋忘国耻”的中国人，有何颜面去参加仇人所召集的亚细亚民族大会！

1926年5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五期　署名：实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都以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做，不应该接受外力即苏俄的援助；他们的理论仿佛是一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若夹杂了外力，便失了独立性，所谓独立便名不称实了。

他们这种形式的逻辑，这种关门革命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更高调些，他们的独立运动更彻底些；可是实际上，若是用他们这样独立的方法，想达到独立之目的，真算是缘木求鱼！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他们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照他们的方法，关起门来做中国一民族的独立运动，拒绝全世界的同情援助，使中国一民族完全站在孤立无助的地位，此诚为我们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之所喜，而陷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于更孤危更险阻的困境中。

法国《巴黎晨报》曾说："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膨涨，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可见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计划有国际的联合，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有国际的援助；又可见帝国主义者早已虑到外力援助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对于他们的危险，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正是专门拚命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接受莫斯科的

援助。这真巧极了，帝国主义者应该如何感谢他们（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

他们以为接受外力援助有损独立精神，他们忘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接受了不少的法国援助；他们更忘记了现代国际帝国主义所造成之整个的世界革命状况，和前代各国各自革命状况更大不相同。

现代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国际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各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阶级解放运动，都是这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之第二十六年，已经是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在此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任何属性的革命运动——阶级的或民族的，都不是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所想象之一国家一民族关起门来独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现在再说事实。俄国十月革命总算是最成功的了，然而革命的军事终了后仍然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仍然要受帝国主义不断的威吓。英国屡欲用兵力压迫苏俄，都因为英国工人反对及各殖民地革命运动之兴起而作罢；最近洛

迦诺会议中进攻苏俄之密谋方定，而英国大罢工突起，势不得不暂时停顿。土耳其民族革命之成功，不用说是因为有苏俄很大的援助。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总算成功了，基玛尔居然趾高气扬的杀戮共产党了，并且想离开苏俄了；殊不知英法两帝国主义还未倒，他们仍旧向土耳其夹攻，尤其是最近英国抢夺莫塞尔，于是基玛尔再回向苏俄。中国及波斯在俄皇时代所失各种权利，若不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如何能够收回？去年中国五卅运动初起，英、法、德、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政府，一致宣传中国五卅运动是义和团一类的排外运动，嗣因英、法、德、美、俄、日本的工人及其政党纷起援助，才不便这样宣传。中国的五卅运动，因为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同情援助，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提出他们久已忘记了的关税会议来敷衍中国人；并且英国帝国主义者因为恐怕中国五卅运动引起印度人的觉悟，也拿出一点小小让步和缓印度资产阶级的感情。现今弥漫全世界之民族独立运动，如欧洲之墨西托尼亚、皮沙拉比亚、布哥维那、西里西亚、克洛西亚等，如亚洲之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爪哇、中国、印度、高丽等，如非洲之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等，莫不有苏俄之后援。最近摩洛哥中悲壮震动全球的里夫民族之失败，《巴黎晨报》说："阿白杜尔克林之降，可使俄、德不复抱法国必败于摩洛哥之梦想，法国虽死一百七十万人，然终能一再表示其自卫之能力，阿白杜尔克林固可依恃法国之恩慈，但宽恕非忘却前事之解，阿氏与布尔希维克及日耳曼之接洽，法人不能忘也。"小小的里夫民族，为数不及一百万，军队只六万五千，前曾击破西班牙十万大兵，继又和法国苦战一年有余，今虽不幸失败，其所加于法国之损失如此之大，此固由于摩

洛哥人勇敢善战，而俄、德、法各国共产党人援助之力亦不小，《巴黎晨报》只说法国不能忘阿氏与俄、德之接洽，却不肯说出阿氏更与他自己国中“不爱国”的法国共产党接洽也。

依据这些事实，现代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各部分相互关系之密切，已非常明显。

现在，我们再研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和世界革命之关系是怎样。

中国是英、美、法、日、意、比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的市场，而不是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个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而不仅仅是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个对象是国内军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用做掠夺中国利益压制中国民众之工具。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是由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解除军阀的武装，一直到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胜利，才能够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中国现有的直、奉两系军阀，只要有一系存在，都是民众的大敌，都是束缚民族解放运动之万钧锁链；国内军阀比起英、美、法、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却只是九牛之一毛，何况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那更是大莫与京。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高等华人之友谊的磋商和资产阶级之和平要求，等于痴人说梦；即令有困苦的革命争斗，这种争斗，若不得到苏俄及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力的援助，使这争斗能成为长期的一直到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完成整个的世界革命，也是不会完全成功的。

那么，或者有人以为反正中国的民族解放，非到世界革命实

现不会成功，待到世界革命实现了，国际帝国主义覆灭了，中国问题也自然解决了，现在中国民族便无须努力做这不必要的革命争斗。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不但在主观上，世界革命是世界各民族中革命民众之共同义务，任何革命民众，都不能取这种机会主义的可耻态度；并且在客观上，被压迫国家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二者汇合起来，才能根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才能成就整个的世界革命，譬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我们若坐待世界革命机会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争斗，使帝国主义者得集其全力以镇压其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我们所坐待之机会，或至永远不会到来。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不应如国家主义者所主张，关起门来独立革命；也不应如机会主义者主张我们自己不必努力，只坐待世界革命之到来。在实际的历史现象上，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高潮，也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在相互影响中平流并进。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共同征服的国家，自然不能幻想马上就会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的胜利之可能；但我们在这世界革命高潮中之可能的责任，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斗，不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不断的和帝国主义者争夺中国现有的武装——尚未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队，甚至于已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直、奉两系军队——不断的扩张民众的武装，如民团、商团、红枪会、农民自卫团、工人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学生军等；经过这样的长期努力与争斗，才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才有联合别的被压迫国家如苏俄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可能。帝国主义

在中国之势力摇动一分，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潮即高涨一分；中国民众的武装及接近民众的武装扩张一分，军阀的势力即削弱一分，亦即中国民众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期接近一分；如此长期争斗之结果，再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才能够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够实现世界革命，才能够使中国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

在政治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征服的国家，在经济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的市场，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背景及其必然的途径，可称为一切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关系之模范的说明。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固然不合实际；有些国民党左派，自以为赞成世界革命表示特别急进，其实这并不算什么特别急进。中国民族革命，只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赞成世界革命的人无有不赞成中国民族革命，尽力中国民族革命的人也应该尽力世界革命；尽力世界革命即是尽力中国民族革命，这两件事是很难分开的，因为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的民族革命者，不但要尽力世界革命，并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之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一种形势。懂得了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动，才适合实际，才不至于落后或空想。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了，世界各部分的革命运动，因为相

互影响之关系日渐密切，已成为整个的不能分开了，凡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头脑中若没有一个世界革命形势之具体的图画，并且时常检查这图画中有无错误而加以改正，则口中虽说赞成世界革命，实际上仍旧是关门革命。

一九二六·五·三〇

1926年7月25日《新青年》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

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意义，一面是纪念去年今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众之大屠杀，一面是纪念去年今日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者大屠杀及其历来侵略高压政策之反抗运动。他们的大屠杀，我们固然应该纪念以志不忘；我们的反抗运动，我们更应该纪念！尤其应该有纪念运动，应该以五卅运动的精神，以五卅运动的方法，继续此伟大的反抗运动，一直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这才算完成了五卅纪念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但要纪念敌人的屠杀，并且要纪念我们的反抗；不但要纪念我们的反抗，并且要继续我们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纪念，并且要有五卅纪念运动。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

今年五卅纪念中，是不是有运动？毕竟有了一点运动。全国的运动是怎样，现在还未能详细知道，且说一说上海的五卅纪念运动。

上海是五卅运动发难地，若只有纪念而无运动，那更是可耻了，幸而还有了一点小小运动，勉强可以遮羞！五月二十九日之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参加的有工、学、商一千余团体，代表有五

千余人，散会后整队游行，沿街高呼口号，分发传单。卅日工、学、商一致罢工、罢课、罢市。上午参加市民纪念大会的，有一千余团体，计五六万人，为近数月来未有之盛会，散会后亦分队游行，沿路高呼口号，分发传单。下午参加大马路一带演讲队的工人、学生约三千余人，商店伙友们多自动的出来参加，一时群众占领了大马路，阻止电车开行，毁坏了好些电车。这一点为上海市民遮羞的小小运动，总算照我们预期的做到了。

在这一小小运动中，我们的感想是：(一)一班大学教授及商会领袖们，他们向帝国主义者所哀求的，一点也没有赏脸，因此在五卅周年纪念若一点不表示，则未免难堪，而一有表示，又恐怕上过激派的大当，一见工、学界要参加五卅纪念运动，他们便异常惊慌，恍如大祸临头，所以硬要把烈士公墓奠基礼改在二十九日举行。其实，我们固然不肯完全采用尾巴主义，跟着和平的民众后面跑，同时我们也不肯一意孤行，吓破了大教授和大老板们贵重的胆，未免罪过，我们在事前的计划，曾如吴稚晖先生所言尉的尽善，丝毫不肯冒昧；至于一切无意义的破坏，更理不应有，所谓到处放火，自然是侦探造谣。现在廿九、卅的运动，业已如商总联会会长邬志豪所言"平安度过"，在一般和平的新闻记者与商界领袖们，如庆更生，大出意外，固然要大大称赞此次运动"有精神又有秩序"，而在一班热烈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却要骂"过激派太不过激！"(二)大学教授和商界领袖，都主张不参加群众示威运动，教职员、学生只在各校内开会纪念，做"静默"、茹素、敲哀钟这类把戏，商界则只商总联会全体议董在宁波会馆开追悼会，各店伙友在店"默思"，不准出门；他们采取了这样分离群众的办法，这样滑稽的消极纪念——"静默"与"默思"，因此市

民大会中学生比工人少，商人比学生更少，使有超过十万群众可能的市民纪念大会，变成了五六万人的大会。（三）商界领袖们，忘记了去年今日发令屠杀我们同胞的仇人是谁，竟仰面向工部局请领执照，以便佩带起来，向群众劝导！（四）学生固然不能都听从教授的主张，即商人群众也很热烈的出来参加群众的示威及演讲，并不一概听从他们领袖的命令，闭门默思。（五）国民党右派竟不参加公共体育场之群众的市民纪念大会，而和一些招牌工会及反动派，另在斜桥徽宁会馆开追悼会，孙文主义学会竟和新社会民主党、反赤联合会，混在一起！（六）总商会不但不参加运动，并且他们的领袖，竟在此时亲到五卅运动所反对的主要仇敌日本去参观，大开其宴会，大讲其亲善！（七）一向只敢反对苏俄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素以"外抗强权"自命，在此次全上海市民对强权表示反抗运动中，他们到那里去了？

我为什么要细说这些感想，因为要指出各阶级民众的弱点，希望大家痛改以前的观念与态度，无论过激派、和平派都是自家人，不是仇敌，我们的仇敌乃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我们要认清仇敌与自家人，为反对仇敌，自家人应该合作，万万不可与仇敌合作来反对自家人；更希望大家今后一致起来巩固我们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和方法一致向帝国主义持久作战，以期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我们中国人才有生路！

六月一日

1926年6月3日《向导》周报第一五六期　署名：独秀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我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

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猜；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

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象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子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

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

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做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象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橹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

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之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

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

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六月四日

1926年6月9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七期　署名：独秀

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

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我们或者可以说农民暴动是中国历史之骨干。远者如陈涉辈辍耕而叹，如赤眉、黄巾、黄巢等役，如闯献之乱，都是官逼农变；近者如洪杨、义和团及红枪会这三件事，更是很明显的农民暴动。

无论士大夫怎样诅咒农民暴动，而由陈涉一直到红枪会这二千年一贯的农民暴动历史，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任何民族中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有顽旧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过于破坏而不免于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士大夫固然有理由诅咒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然而没有理由诅咒他们对于统治阶级之反抗暴动。因为中国最大部分生产者是农民，同时却是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压迫农民的不但是统治阶级（从前的朝廷现在的军阀）及其官吏，士大夫表面上好象是站在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而实际上是接近城市政权，附属于统治阶级，也要压迫农民的；所以分利的统治阶级之暴政一到了某种程度，生产的被统治阶级即起而反抗暴动，即农民对于政府官吏及士大夫之反抗暴动。这本是中国历史的惯例。

现在的红枪会运动，就是这历史的惯例之一。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红枪会，已普遍了河南、山东全省和直隶之南部、安徽、江

苏、江西之北部，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都是他的姊妹团体。河南、山东的军阀，把他们当做土匪，整千整万一连几数十个村庄的屠杀，然而他们实是武装自卫的农民，而不是土匪。他们的大多数不但不是土匪，而且仇视土匪，因此土匪时常勾引官兵来屠杀他们。

红枪会的政纲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税杂捐，反抗土匪。他们的思想顽旧迷信，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的反抗暴动之性质，也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当中也许杂有少数土匪，而大部分是农民，且许多是小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首领也有腐化为军阀利用之可能，而群众是要反抗军阀苛税到底的。

《新闻报》五月二十五日开封通信说："豫东杞县、通许一带之红枪会，自经李鸿翥用大炮轰击后，村庄被焚者已百里内无人烟，人民死者数以万计。……通许知事至乡间，合集绅民劝导，绅民质问知事曰，'不教我们信红枪会极易，只要先教地方不见土匪，不再派苛税，不再派恶军队骚扰，完粮纳税一律收用纸洋。'知事语塞，狼狈而遁；会众中之妇孺争以瓦砾追击知事之轿。知事回报后，寇（英杰）知不可以理喻，遂电李速剿，而大祸作矣。"

人民要求地方不见土匪、不派苛税、军队不骚扰、官厅收用自己所发行的纸币，便是不可以理喻，便应该用大炮轰击，便应该焚杀得百里内无人烟，我们要问诅咒农民暴动的士大夫，这是什么理由？

士大夫或者以为农民暴动扩大起来，会造成洪杨时代恐怖的局面。他们这个远虑是有理由的。洪杨时代农民革命的一段

历史，被士大夫宣传得十分恐怖；可是实际上究竟怎样呢？此事且不暇博征，姑举最近一点材料，作为参考。

本月六日上海美国侨民团到松江瞻拜华尔将军之墓（美人华尔于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率长胜军助清军与洪杨军战死于松江），福开森演说中有言："是时居华之美名士前同文馆总教授丁韪良博士，曾再上书于美检事长库兴，力言承认南京革军政府之必要。英牧师杨格非、莫维廉、艾约瑟等，皆以革军功成，将为中国莫大之利；杨格非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中有云，'彼较之皇党，实有数百年之进步。'……驻沪英麦领事，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上英首相报告书中，亦谓革军领区内，'人民皆安居乐业'，而皇党辖境，则'贼盗横行'。……当时革军所宣传之宗旨，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一日大陆记录中记其简要如左：

（一）治理中国者应为中国人，非满人；

（二）专制政府之闭关政策，应即废除，俾中国亦为国际中之一份子；

（三）应采用外国之美术品及制造品；

（四）应与外国定友善之国交，中国物产亦应与外国交易，以辟富源；

（五）采用外国工商业上之新发明。"

依据这些材料，洪杨之太平军，未必象当时倾向皇党的士大夫所宣传的那样令人恐怖。况且现在离洪杨时代又有六十余年，中国农民已不无多少之进步，现在比那时又有了革命的政党与军队，倘与农民力量结合起来，当然可以减少前代农民暴动中顽旧迷信、野蛮破坏的成分。

总之，在北洋军阀统治蹂躏下之北方十余省农民，想他们不

反抗和暴动，这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任其自然暴动好呢，还是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好，这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士大夫盲目诅咒农民暴动，是一件无效的事。

1926年6月16日《向导》周报第一五八期　署名：独秀

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民国十五年之政治史，只是皖、奉、直三个军阀党循环胜败起伏之历史。现在皖党倒了，或者是永远倒了，即令再起，也不过是奉党的附庸，决不能够恢复从前一个独立的军阀党之势力了。此时乃是奉、直两军阀党对峙的局面，前者的靠山是日本，后者的奥援是英国。

奉党首领张作霖，虽然承日本意旨想控制北京政局；然而内因旧派吴俊升之迫令联吴，外因国民党尚存在，遂不得不与吴佩孚表示合作。直党首领吴佩孚，虽然想依据奉、直宿约，独揽关内政权，恢复十三年奉、直战前局面，再进而以武力统一中国；然而内因靳云鹗、田维勤、孙传芳之新结合，外因国民军尚存在，又加以英国之劝告，也不得不暂时求助于奉张。在这种利害冲突，实际不能合作而又不能不表示合作的状态中，亦即不能合作又不能决裂的状态中，遂形成了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护宪问题，颜阁问题，总统问题，阁员分配问题，直隶地盘问题，将来二五关税及大借款分配问题，不但现在的天津代表会议没有解决，即将来任何会议，都不能解决，只有奉、直再战才能够解决。然而奉、直两方都有内外种种牵制，一时却没有因无法解决而再战之可能！因此，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或有相当时期的继续，以至于相持日久，一方面因内部的或外部的变化而自

溃，他方面得着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形成一个较明瞭的新局面。

在现时对峙的混沌政局中，两方虽有种种利害不同的冲突，而都有两个共得目的：一是消灭国民军，一是获得二五关税及大借款以救济财政的恐慌。后者较前者尤为急迫，然二五关税及大借款，都必须内阁成立才有办法，而内阁问题，又必须护宪问题与阁员分配问题有了解决才能成立，因此这一目的，一时还不易达到。消灭国民军更非易事，国民一军，至少还有八万乃至十万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有持久坚守之可能；奉军利在国、直互斗，而自己不愿多牺牲实力，吴俊升虽愿牺牲而无多实力，吴佩孚更愿牺牲而实力也有限，靳田军和孙传芳之新结合虽失败，一变而积极的为吴牺牲，当然是个问题，李景林、王怀庆收编之二三万国民二军，时时都有反戈之可能，张宗昌当然要自保山东，不暇他求，魏益三至今还徘徊观望于国民一军与吴佩孚之间，阎锡山兵虽多而无战斗力，在这样状态之下，吴佩孚将用何种力量可以消灭国民军？

再由相反的方面观察，在北直隶一隅之地，聚集这多饷源无着的饥军，人人都须自寻出路，时时都可发生异动；在河南全部，充满了红枪会及豫军独立的运动；在湖南，粤桂军北伐日有发展；这三方面有一显著的成功，即令国民军不冲出，都足陷吴佩孚于更困难的境遇，倘四方面同时发展，吴佩孚只有退走天津。

吴佩孚失败了，现时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才能解决，否则他自身决不能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由奉张控制北京政局是不可能的，因为奉张一时不便和直吴开战；至于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由奉、直两党组织联立政府，使军阀政权得到一

个稳定而巩固时期，以便做他们宰制中国更有力的工具，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吴、张实际不能合作。

吴佩孚如果失败了，恐怕也和段祺瑞一样是最后的失败；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力助奉张，或更用段，以与国民军及国民政府对抗，英国或与日本合作，或另寻出路。此时国民军及国民政府对奉党军阀及帝国主义之争斗，必更加复杂而剧烈，或至另外形成一种争斗形式，都不可知。所可知者，一方面，此时民众运动必然得着较大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军阀党又淘汰了一个，只剩下一个奉张，这是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于中国人民有利的，所以人民应该努力促成此种变化。

可是现时一般商人及新闻记者，还未看见这种变化之可能性及其有利于人民，反而希望吴、张诚意合作，好形成一个苟安的局面。可惜他们至今还不懂得军阀间永远没有诚意合作之可能，希望军阀间的和平，完全是梦想，即现时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已经是非常之苟安的苟安局面，而且不能持久，再进一步的苟安更是不可能的。可惜他们更不懂得军阀间果然诚意合作，则军阀政权较今日更为集中巩固，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也较今日更加规模扩大，他们借款卖国助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人民也必然较今日更加肆无忌惮。只有军阀间因自相冲突而崩溃，或由人民及接近人民的军队之努力使军阀崩溃，人民才有生路；只有军阀崩溃，在接近人民的军事势力统治之下，强用军票，官绑票，毁坏交通，妨害商业，勒派公债，卖国借款，苛税，扰民等等，象此时反赤军所加于商民的苦痛，才能够免除，号为南北二赤的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下的现状就是一个榜样。无论在反赤军阀对峙的混沌政局之下或反赤军阀诚意合作的政局之下，商民这些苦

痛，都是必然不可免的事；所以商民希望军阀诚意合作巩固他们的政权；便等于希望埋葬自己的坟墓更加挖深，希望杀自己的刀更加磨快！

1926年6月23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九期　署名：独秀

革命的上海

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革命运动之客观的条件，他在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观上的革命思想与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与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资本势力，已经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数十年，尤其是上层阶级，如买办、洋货商、工部局海关职员、基督教青年会，以至于英美留学生出身之大学教授及教会大学之学生等，他们的民族观念，差不多被外国金钱势力毁灭完了；即至下层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势力和买办地位的心理，不过他们比上层阶级的人们和外人较少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原始排外观念，有时还能够在外人过分的欺压中表现出来。上海纯粹是个商场，从前除教会的奴隶教育外，很少本国的学校自己的文化（所谓自己的文化，是指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美术、文学的教育而言，不是指什么东方文化与国粹），这乃是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之第二原因。

欧战中，中国工商业得了一点发展的机会，于是上海在买办和洋货商以外，新生了一些纱业家、丝业家、航业家及国货商，和外国资本有了一些小小冲突；同时，德国、俄国的革命，使全中国人的心理起了一个大变化，上海市民自然也非例外，一时革新的潮流弥漫了全中国，革新的青年集中了上海，更集中到文化运动

与平民运动。因此，上海市民，在客观上在主观上，都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自"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上海市民遂由洋奴化，渐渐行向革命化了。

现时上海市民之革命化的现象是怎样呢？二十多万产业工人不但站起来要求生活改善和阶级的组织(工会)，并且大规模的参加政治争斗。有很大数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业职工，也渐渐起来做经济的罢工，组织职工会，加入国民党，且不满意于国民党中的右派，他们参加五卅周年纪念运动，其热烈并不在产业工人和学生之下。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的，虽然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从中消极的怠工或积极的捣乱，终以学生群众倾向革命，他们尚无法破坏学生的战斗总机关——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小商人因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苛税杂捐及大商企业这三种压迫，也渐渐倾向革命：如不满意于总商会的妥协态度，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牺牲关会与五卅案交涉借款卖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以烟捐向英美烟公司抵借巨款，反对卷烟税，反对军阀破坏闸北自治，反对宅地税，反对省政府停止土布免税，反对阏库增设烟酒令卡，反对省政府增加米捐，反对房捐带征保卫团经费等，都充满了愤慨不平的呼声。至于反对中外官厅护庇烟土，反对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价，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运动。最近浦东塘桥乡，竟因巡警征收门牌费，惹起了数千人的暴动。

以上各阶级的民众，即是上海市最大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脱离洋奴化，而有了政治的觉悟了。

大商阶级是怎样呢？他们的大部分还留在买办阶级的领域，代表他们的是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上海教育界贵族的江苏省教育会，是上海市两个反动势力的总机关。大商阶级

中，近来虽然有了少数反对派倾向，如虞和德、霍守华等，然而他们当中的不同，只是多数派乃纯粹买办阶级性，无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少数派稍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色彩，须有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他们对于工人运动也有不同的态度，多数派绝对仇视工人运动，少数派想拿一点改良政策利用工人，以爱国名义为他们对帝国主义要求利益而牺牲，并且主张工人不必有自己的组织。此次总商会选举，多数派得了完全胜利，他们今后和帝国主义者比虞和德时代更要亲密的合作。

大商阶级，在上海民众中虽是少数，而实力却颇雄厚，可以做帝国主义及军阀有力的工具，因为他们掌握着财政金融机关和舆论机关，并且有武装队（保卫团）。因此，在上海市民的民族运动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凡是一个革命家，固然不应因抱悲观而至于看不清革命的环境，然亦不应过于乐观而至忽视革命环境中每个危险，更不应由乐观而至于夸大自欺，陷于超过实际可能之推测。大商阶级之妥协，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民众出卖民族利益，这是革命的上海之最大暗礁，在民族运动之长期争斗中，此暗礁时时都会发生危险。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之中心，亦即一切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中心，同时更是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精华所萃聚，亦即英国帝国主义者势力范围之根据地；从前太平革命势力一达上海，英国即举全力与之决死斗，今后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争斗，在上海也

须比任何地方有更长期的争斗。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失败，乃是他们在中国之最后失败；中国民族在上海的胜利，也是我们对帝国主义之最后胜利。在这困难的长期争斗中，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有更多更大发展之机会，可是我们也并非幻想能够马上一举而获得最后胜利，不妨得寸思尺的逐渐获得胜利，逐渐革命化，逐渐摇动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之基础；惟必力避大商阶级之危险的暗礁，即"中外合作"之幻想，方不至由现在革命的上海，行向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孙传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上海"，因为洋奴化的上海越大越糟。

1926年6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六〇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

上海《新闻报》二十二日长沙电："国民党部已启封，二十一日又升旗，覃振随赵回湘，右派国民党部亦重整旗鼓。"这一短电使我们有两个感想：一是国民党中真有右派这一个事实，已是社会所公认的了；二是右派国民党竟和吴佩孚的爪牙赵恒惕合作了！

刘芦隐与张君劢

据大华通讯社消息："上海工业委员会，鉴于迩来上海工潮，起伏无常，特函邀热心工业人士张君劢……刘芦隐……等，订于本月二十五日假座福州路中央西菜社讨论消弭工潮方法。"这或者是右派国民党和其多年敌党研究系，共同进攻工人的联合战线之初幕。这些民党和研究系的老爷们，他们讨论消弭工潮时大吃其西菜，他们忘记了工人连饭也没得吃啊！

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

国民政府讨伐陈炯明，得了东江农民不少的帮助，农民在战

争中牺牲了五百多人；现在国民党右派却在中央委员会议席上攻击农会是土匪，陈炯明闻之当大称快！

美术家再往何处遁？

中国自古就有一班人，一方面不肯同流合污，一方面又不肯奋斗，于是逃禅或隐遁是他们的出路。现在生活艰难，连逃禅隐遁都非易事，于是这班人便想逃遁于科学、美术，以为如此一遁，强权当无如我何了。不料强权仍找着了他们！上海县知事禁止美术专门学校不良科学（人体模特儿），孙传芳斥刘海粟校长："不顾清议罔识礼教"。且看大美术家刘海粟再往何处遁？

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

从前听说曾琦、左舜生自比曾左，我以为是别人轻薄他们的话，他们何至如此下流！不料曾琦现在竟用曾国藩家书给学生做国文教科书；他又说："予则深信罗泽南、江忠源之遗风，必犹有存而未泯者，湘士多才，幸共勉之！"（见《醒狮》第八七号）。他们真是这样崇拜背叛民族的满清奴才，他们便有勾结现在的戈登、华尔破灭中国民族革命之可能，他们还谈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政纲

反赤派首领章炳麟尝电请吴、张讨平南北二赤，北赤是冯玉

样，南赤就是蒋介石。现在反赤派的小卒李璜卿（李是醒狮派，该派曾加入反赤大联合，曾琦在反赤大联合开会时，发言之多，不亚于章炳麟），却来劝南赤蒋介石"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见《醒狮》八七号），可见他们的计划是：用南赤铲除共产党人，再用军阀铲除南北二赤，把中国所有革命势力铲除净尽，好让英、日、吴、张长治久安的宰割中国。这就是他们国家主义的政纲！

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

我们以为中国民族运动绝对拒绝外力援助，是个错误；然而想靠外力直接出头替我们打战，那更是个错误。因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可是醒狮派一面反对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一面又说：苏俄"海军无实力，航空不见佳，陆军不可靠，我们要想靠苏俄去打英、美、法、意、日五大强国，真是梦想！"如果苏俄有实力，我们便可以靠他替我们去打战么？他们真是两个错误同时并犯了！张溥泉责备苏俄不肯出兵由蒙古攻打北京是无诚意援助中国革命，这和醒狮派是同样的错误。

1926年6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六〇期　署名：实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

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澎涨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定下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

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1926年7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　署名：独秀

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

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除了经济的政治的侵略之外，还有一种侮辱的强暴行为，也使中国人十分不能忍受。别地方的事，从前的事，且都不论，那最大暴行五卅惨案如“五卅凶手供状”中美国人所自述者也都不论，现在只就最近在上海所发生的几件事看来，件件都足使每个中国人发指眦裂，只要他不是毫无心肝的洋奴！

第一件事，是六月廿三日上午四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炉子间夜班工人阎宝章，因工作疲乏出而饮茶，事为西监工斯考毕(Scabie)撞见，当即在背后怒掌其颊，并痛击其背，该工人惊惶之余，且避且退，旋及梯畔，适被追及，复又拳足交加，卒至重跌于高及四丈余之梯下栅格中（即储煤之坑），斯氏见其已不能伸动，乃令华工搀之以出，用自来水激射历四小时之久，始稍苏醒。当时有日班工人徐懋元、沈兰东、王阿刚三名目击出而作证，以鸣不平。讵知厂长非特不归咎于斯考毕氏，反谓该工人等之言俱属诬枉，且撤责该班头目孙恒足谓其不能管理工人，当场一并开除。按斯考毕平日对待工人稍有不合即施毒殴，被殴者莫不负伤垂毙，如阎宝章前已被殴过一次卧床十三日，即可证明。第以势力薄弱之工人从不与较，忍柰让者兼让，而彼之残酷手段，屡施无忌。近更益逞其凶暴野蛮之行为，竟置工人之性命于不

颇，以致演成此次之惨剧。全厂工人因此大愤，群起向厂方提出下列之要求：

（一）开除凶手斯考毕；

（二）抚恤被伤者医药费；

（三）恢复四证人工作；

（四）以后不准英人毒打工人；

（五）以后不准借故开除工人。

全上海各报无一家敢登载此事，连关于此事的广告都一律拒载。上海总工会拟于二十七日，在该会会所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此事，帝国主义者便命令中国官厅将总工会封闭了！此事不但表示帝国主义者之暴行，而中国官厅仰承外人意旨漠视民命，及中国新闻界之怯懦畏事，均足令外国人笑，令中国人愤！

第二件事，是荷属南洋巴达维亚华侨温庆贤，于去年回国，近由上海会审公廨于六月二十一日，从南京将其提到上海，并且荷兰总领事还要引渡归彼审理。查温庆贤生长中国，父母均是中国人，虽在巴达维亚经商多年，而并未入荷籍，去年回国系用中国护照，回国后也未曾在荷兰领署注册，即现在上海荷领因受巴达维亚荷官之托，使会审公廨出票移提，票内亦注明系拘捕中国人民温庆贤，因被告若非中国人，便不属公廨管辖。因此，此案当然归公廨审问，断无引渡于荷官之理。荷属华侨受荷官虐待，真是苦不尽言，现在更进一步，来到中国领土之内拘捕中国人了！横暴的荷领事，竟要在中国境内拘捕中国人！糊涂的公廨中国会审官，竟不向荷领抗议引渡审理中国人民！

第三件事，是熊希龄之被捕。湖南华昌矿务公司董事熊希龄，曾经辞去一切董事名义，并登报声明过；公司闭歇后，尚欠美

国工程师怀德薪金若干，现在熊氏来到上海，公廨中美国会审官派克思，竟据怀德之请求发出拘票，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将熊氏在赴拒毒会欢迎会途中拘至公廨，要求熊氏交出保证金三十万两。熊氏被迫登车时，当由丁文江告西探，今日拒毒会开会欢迎，有事可待会后商量；该西探坚称立须逮捕，丁文江等遂陪熊氏同往公廨，直至晚九时，始由江海关监督以一万两保证金保出。公廨受理此案及出票拘捕手续，不用说理由都不充足，分明是美国会审官滥用职权，有意为他们的工程师来侮辱中国绅士一下。绅士尚如此被侮辱，中国平民又当如何？丁文江是华界最高行政长官，对此案不立刻依据职权向美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竟取“友谊的磋商”之故智，忘了自己的身分，陪熊氏同到公廨，形同被捕，以取侮辱。被此侮辱的不是丁文江个人，而是淞沪商埠总办呵！

第四件事，是沪商协会于本月一日，在岭南楼菜馆开筹备会议，正将开会时，西捕蜂拥而入，一面喊问你们在此做什么？有多少广东人？一面大挥拳棍打人，将会打散了。各报纪载此事，只说“派捕禁止”，而不敢说被捕打散。租界禁止华人集会已经是横暴了，正经商人集会竟被西捕打散，这乃是第一次！并闻捕房此次加于沪商协会之暴行，乃由于新改选的总商会中人所嗾使，因为他们疑心协会是粤商霍守华主动，所以西捕问有多少广东人。

在此小小四件事中，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是如何横暴侮辱，中国代表买办阶级的总商会是如何卖国自残同类，官僚是如何昏瞆误国，新闻界是如何畏怯不能代表舆论，都一一充分的表现出来了！

1926年7月14日　《向导》周报第一六二期　署名：独秀

答张人杰符矫黄世见冥飞（北伐问题）*

张人杰符矫黄世见冥飞诸先生：

诸先生对于鄙人前作《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有所辩难，以抱病久未奉答，歉仄之至。诸先生意见大致略同，所以现在一并奉答；病后体弱，恕不能详。在答复诸先生赐教之先，谨将鄙人前文要旨略重述一下。第一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第二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的当局。警告民众的是：不可专门依赖国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众应该自己努力做推倒军阀统治的运动，至少也要摇动当地军阀的统治地位；各地民众若不自起奋斗，专门坐待北伐军之到来，便是极大的错误。警告国民政府的又有二义：一是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了，因为他是神圣事业，遂不惜牺牲民众利益，民众若自愿为北伐而牺牲利益，那是可以的，若政府当局拿神圣北伐的大帽子来压住民众，硬要牺牲他们利益，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实的意义了（至于北伐名义不妥当如本报读者于枫冷先生所云，还不是重要问题）；二是不可主观的把此次北伐看得太夸张太奢望了，现时民众的组织势力上，在国民党指挥政治、军事之党的权威上，在国

---

* 标题为编者所加。

民政府所属军事的内容及实力上，这些客观的状况看起来，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或第四次北伐，不看清客观上的实际情形，专凭主观妄自夸大，或希望速成徼幸图功，这决不是意志坚强的革命党人所应取的态度，而且会偾事。这些实际情形，这些革命北伐的意义，在革命的责任上，我们不得不公开的普遍的告诉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派的同志，免致误入迷途，决非对于一二人"函电相规"可以济事的（象诸先生都不了解，竟来函辨难，恐怕除诸先生之外，不甚了解的还有多人，即此更足证明非公开的普遍的讨论不可了），更不是什么"翘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因为民众的力量还未充实，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本身又还有许多缺点，使国民革命一时不能急切成功，正是我们痛心的事，不应该是我们快心的事！

你们说："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议，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我前文曾说过："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此等军事行动之先，应该以充分的民众宣传与组织为先著，现在你们仍旧以出师北伐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你们这种军事行动万能的老观念仍然丝毫未改，怎不令人失望！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当然主张要打倒军阀；但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你们说："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於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你们当知：现在所有的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训练，是不是同等的，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要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你们又当知：民众只认识事实，当看北伐军的实施政策为向背，任何人空口说好话都是无用的；并且我们固然应该引导民众赞助北伐军，然而一概蒙蔽民众欺骗民众，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应如此。

你们说："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诏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既然出兵，自必要筹款；然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并且你们自己公然说："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又说："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既然是事实，又何以说是远道传闻呢？总之，你们的责任是在力求与贼不同，并不是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力拒任何忠告！

你们说："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在一般意义上，不但现在的国民政府和现在的出师北伐是革命的，就是以前杨、刘讨伐沈鸿英讨伐商团，在客观上都是革命的；

有许多人以为此次北伐的内容虽然有些缺点，而北伐军所占的地方，总比吴佩孚要好些，这个事实，除了帝国主义及军阀，无人能够否认。然而我们以为这样观察批评国民政府及其北伐军，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轻蔑；因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北伐期中限制人民自由的什么条例几乎颁布出来了，什么"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什么"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竟成了政府党人口中革命的理论，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

你们不相信"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军全部意义"，又不相信"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这两层上文已经答过，兹不重赘。

我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泛论北伐这一名词之本身的定义；我又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它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这是特论北伐军这一行动必须合乎北伐的定义；这并无所谓冲突处，难道这样浅显的文义你们都看不懂吗？

你们又不相信"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之说，广东之五华、中山、花县，广西之东兰、平南、怀集等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人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

你们要问北伐时期成熟的标准吗？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何况国民政府的北伐是有一定领土的政府正式出兵？

你们以为我说讨伐军阀还不是直接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是我没有把帝国主义与军阀关系弄清楚；我们知识浅陋，一向不曾把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只知道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懂得军阀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承教至为感谢！

你们既然承认北伐将领有打避疫针的必要，却又提议用别种方法。用别种什么方法呢？或者是讳疾忌医，不肯打针，还是去烧香打醮罢！

你们不以我说："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的话为然，而主张"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既然如此，便不必责我"乃据远道传闻"了！

你们断定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不能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又感觉得"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如此诚然是危险呀，大家坐等着候北伐军打来罢！

你们对于我这个答复，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尚望再赐教言，我们是不拒绝异议的。　　　　　　　独秀　九月十三日

1926年9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一期

附：原　信

独秀先生惠鉴：

顷读第一百六十一期《向导》中尊著《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篇，窃愿致其腕诚，以助足下将来提笔论事之参考。深悉足下识见卓远，言必有因，一文之出，影响甚大，若人杰知而不言，或足下置而不听，皆非忠于党国之道，故不辞烦渎，唯亮察是幸。

国民政府此次出师，为实现总理主张之第一步，今日国中，外而为帝国主义者之爪牙，内而逞其武力，使人民无法生存，国家无由建设者，无一非军阀为之首恶。故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惟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义，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夫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阅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认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切望足下之一注意于北伐前途合作意义者也。最后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此种臆断，出诸敌方，则为当然，出诸足下，实为意外！

以上所言，全出至诚，足下明达，当不悻悻。总之，北伐之失败，乃一切革命者之失败，一切革命者在此革命急迫期间中，能合作则存，不能合作则亡，相扶助则存，相猜忌则亡，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势也。足下领袖群彦，动关众听，惟望以后明办事理，

郑重立言，此间如确有不善处，不妨函电相绳，资为药石。若翘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则甚非所望也。忠切之言，诸希亮察。借祝努力！

弟张人杰顿首　八月十三日

独秀先生：

我读了你在《向导》一百六十一期上《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一篇大作，我心里很不自在！因为我对你的大作中发生了许多的疑问，这许多的疑问，在我脑海里悬了有三四礼拜之久，还是莫明其妙，所以才写信问你。想你不以为讨厌。

先生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照这句话说来，可见先生承认：北伐是革命势力实行打倒军阀的意义。这种革命势力，谁都要说，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中国国民革命，是各阶级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求他们的民族、政治、经济独立的一种革命。况在这种革命过程中，免不了要消除军阀这种障碍，要消除这种障碍，非有一种军事行动不可（即孙总理所说的军政时期）。而先生为什么要说："……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然则中国的民族革命的国民革命的政府出师北伐，是代表少数人利益而奋斗的吗？先生说："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而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请问先生唯一无二的方法是什么？先生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先生在大作起始不是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

动”这层意想与那层意思，岂不是冲突了吗？然则还是一个人的军事行动吗？先生说：“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經使农民怀疑。”这怀疑之点，请先生告知我。

以上这几点疑问，我希望先生来函教责！

符琇鞠躬　　八月四日于黄埔

独秀先生：

我向来很欢喜看《向导》，更喜欢读先生的论文，因为先生是一个中国《新青年》的领袖，尤其是提倡革命的一个健将，鼓吹革命潮流的角色，所以一般幼稚的革命青年，都承认先生是我们的良师，是我们的指南针，愿意服从先生的指挥，甘心领受先生的教训，以达到中国革命成功，世界革命成功的目的。

在一百六十一期的《向导》上，读了一篇先生的《论国民政府北伐》之后，我突然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想！翻来复去，读了又读，到底不能使我明瞭先生的用意，最初我以为是反动分子冒先生的名，来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像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后来我想都不是的，继而我又向善意方面想先生恐北伐失败，摇动革命根据地，而反对北伐吗？何以不在北伐军未动员以前反对，而现在才发表这篇论文？先生恐怕农、工、平民，因筹备军饷而怀疑国民政府，或甚至……而进的忠告吗？我想这是国民政府乐于接受的；但就革命观点上，两党联合战线上，严重的北伐时期上看，先生何以不直接忠告，而偏偏要在北伐紧急，后方需要绝对的安宁时公开的忠告呢？先生想变北伐为防御战争，以巩固革命

根据地吗？先生何以不直接与北伐当局者商量，而要公开肆口攻击国民政府的政治状况上、实力上……如何的不配北伐，他的领袖们如何如何，对人民又如何如何呢？所以我始终想不到先生这篇文章的用意？

另外还有几个疑点提出，均望先生指教！免得幼稚的革命的我起怀疑，因为革命的人，对任何事都要站在革命观点上去看，不是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更不是别人说“好”，就喊“好”，说“歹”，就叫“歹”的。如果有这种脑子简单的人在革命路上，是站不牢的，很容易做人家的傀儡；不然他就是一个投机主义，想升官发财，双方讨好的蝙蝠派。我说这种话，并非故意出口伤人，好出风头；实在是我眼光中所得来的。究竟这个眼光对不对，要请先生赐教！

现在将我对先生《论国民政府北伐》中的疑点，写在下面：

（一）“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这一段含有国民政府北伐，并非因求北方民众解放而北伐，不是革命的军事行动，像军阀扩张地盘的北伐。先生你的论文，恐怕大错而特错了，简直没有认清国民政府北伐的意义，太冤枉北伐前线为民众而牺牲的将士们，太忽视在水深火热的北方民众的呼声了。先生！照你的眼光看起来，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北伐？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整个的国民政府的实力上，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战斗力和革命意识上要如何的北伐时期才算成熟？有什么标准？革命的经验与历史告诉我们，革命运动的力量，常常是不完备的，换句话说，即力量完备后才发生的革命运动，在历史上还没有看见过，只看见革命运动一起，民众向应，然后革命的力量，

才渐渐的增大。先生这样空空洞洞的说革命下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鄙意不敢苟同，你说"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是不错的，国民政府既然站在危险的地位，如果不向外发展，那末连广东小部分，也要被人夺去了，国民政府比方是一堆火，四面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是水，倘若火不蔓延、燃烧，势所必然的要被水扑灭了，先生是不是呢？

（二）"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一点，先生好象还没有把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关系弄清楚，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好象是帝国主义者用以杀我们的刀一样，我们现在努力消灭他杀我们的刀，还不算同他直接武装冲突吗？那末就好象说"杀人者非我也兵也"，一样的可笑！

（三）"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这一段原是先生的诚意，用一种打避疫针的预防法，激励与警告北伐将领，仅防瘟疫的传染，做一个纯粹革命的运动者。然而先生好像不应该在北伐期中发展这种容易使人误会的言论，并且容易给那反动派造谣惑众的机会。如果先生是好意，何以不用别种方法，勉励将士们呢？

（四）"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又"国民政府北伐之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重捐"，又"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这一层意思很好，不过先生你要明白革命是牺牲少数人而谋多数被压迫民众利益的；当革命向外发展的时候，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并不是长此下去的

一种横征暴敛，不然何以使火坑里的同胞脱离此境呢？譬如有人淹在水中，如果不舍身去救，怎么捞得起呢？并且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不得已而出此的。国民政府是为民众谋利益的，难道它还不愿意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吗？先生已是唯物论者，何不设身处地的替国民政府想一想，而去学闭户读书的先生们，坐在书桌上唱高调，说风凉话，以骗民众欢心的惯技呢？

（五）"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又"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成国民革命。"这一种的策略是很对的，不过既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如何可以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不但党部不能公开，而且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假使北伐军不作他们的先锋，革命工作怎么能发达？所以就依先生的说法，此次北伐亦是民众急需的，何以先生说："现在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

以上五点，我终有些怀疑，更不明先生的用意何在。或者我思想不广，眼光不远，所以请先生赐教，祝你努力！

黄埔军校学生黄世见上

记者先生：

我是《向导》的一个爱读者，只要我在报上看见《向导》的出版要目，我就飞也似的跑去买一本；回来坐在书室里细读。不但细读，并且还和朋友们在一块共同讨论。有时也妄胆的下一两句

批评！因为我认定《向导》是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独一无二的刊物，所以我们这些需要革命的青年，对它是当万分注意的！

在贵周刊一百六十一期上有独秀先生《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浅见的我看了之后，以为是深中肯綮的，可是我的朋友（他是国民党员）大不以我意为然！他说独秀此文含有挑拨性质，是来分散革命势力的。据他的理由是：

一、国民政府北伐，纯粹是要达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完成国民革命，在此一举！而独秀仅说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太小看了北伐的意义，而且蔑视我们国民党！二、独秀说国民政府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连唐生智也不如；这是等于向北方军阀告国民党监视下的国民政府的密，与陈炯明之反革命没有什么差异。三、从这篇文章里，看出共产党的领袖——独秀——好像认定蒋介石为一个变相的军阀，国民党的革命指导者，不过是些饭桶！

除此以外，他还说："共产党是倚赖国民党才得发展的，独秀不满意国民党，实是自杀政策。"又说："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不能单独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事实，若北伐成功，自然可以减轻他们的赋税。现在独秀如此的藐视北伐，简直是不愿意民众得到解放，尚谈什么革命！"

他的这些理论，我是很不满意的，而为了学识薄浅又不在党的原故，所以没法判断他的错否，只好写出来，请贵周刊记者，为我解释一下。此祝撰安！

冥飞九月五日于广州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民国十五年，几乎年年有战争；大家厌恶战争，希望和平，这是当然的事。可是战争决不是仅仅由厌恶而可去的，和平也决不是仅仅由希望而可来的；必须经过几次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来去掉那无主义无社会目的之战争的源泉，然后战争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则终于混战而已。

现在的战争，是不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呢？我们可以坚决的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自从吴佩孚出兵讨赤护宪到国民政府北伐，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不但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有主义有社会目的，就是奉、直军方面在客观上也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社会目的，和以前个人的一党一系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确是不同。

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说是赤与反赤之战争，但更科学些即更实际些观察起来，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不但两方直接战争者其性质如此，即关系两方之社会势力，亦显然分成两大营寨如下表：

半封建派（反赤的）：	民主派（赤的）：
奉直军阀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
官僚	国民军
洋行买办	农民

大学教授	工人
地主土豪	学生
交通系	有政治觉悟的工商业家
安福系	中小商人
研究系	共产党
联治派	共产主义青年团
国家主义派	语丝派创造派等文学家
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党	
老民党	
各种宗教徒	

这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只有研究系一派人，还常常装出中立的态度，最近他们的张君劢，于吴淞政治大学开学日演说："目下时局，不论谁胜谁败，吾人殊无过问之必要。"其实，他们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凯、段祺瑞、曹吴那边，拚命和民主派作对；吴佩孚、齐燮元之盛时，他们却大过问而特过问，张君劢曾亲身出力拥护曹宪，丁文江也做了孙家的官，他们的大将蒋方震，从去年为吴、孙奔走，一直到现在不曾停蹄。他们的机关报说："吴之力不足自救，东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灭当前之大敌，虽有强援焉，而不可以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败，……"（见九月二十日《时事新报》时论）；曰"吾"曰"不幸"，这分明是站在吴、孙那边说话。他们的机关报又说："我并不相信，什么国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见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这篇论文起首却说："现在国民革命正举行之时，我们若是发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话，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

鬼蜮。"这几句自相矛盾的话，分明是痛骂他们自己。）

国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意义，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他们既不相信有什么国民革命，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那么他们主张怎样呢？难道他们主张向前社会革命，当然不会，当然他们是主张向后仍旧由帝国主义扶助中国的半封建势力统治中国。因此，我们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内，总不至于不符事实罢！

现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这两派势力的战争，所以能够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而不是无主义的个人的或一党一系的目的之战争。因为此次战争若仍旧是奉、直军阀的胜利，不用说中国仍旧脱不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之统治；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们总可以大大的发展走上这条道路的运动。一切半封建势力，都是中国民族走上这条道路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不搬开，中国永世不会有进步，所以我们坚决的毫不游移的现在要为这个目的而争斗，即一切民主派为实现民主政治对于半封建势力之争斗；这个争斗也就是此次八个月以来国民军、国民政府对奉、直战争之社会目的。

这个争斗在中国是一定需要的，本来不成问题，虽研究系的人也不便公然否认；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争斗中，有没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和向右不及民主主义的倾向。

在前一问题，大半是不懂得共产党革命理论与政策的人之怀疑，或是有意造谣。最近研究系的机关报（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说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

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研究系这班人，一向是替帝国主义军阀信口造谣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现在眼见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气昏了，更要失神的无端狂吠了！列宁党应该信奉列宁主义，主张彻底的民族自治，反对强大民族压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宁主义要素之一，中国共产党若希图中国归苏俄统治，这简直是卖国党，而不是什么列宁党了。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懂得历史各时代之革命的理论与政策的；他们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发展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

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只由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相差甚大。

在后一问题，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会成分，民主化的程度虽不齐一，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战线上和半封建势力争斗的。我们为稳固充实民主战线起见，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义旗下和军阀血战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要求他们更高度的民主主义化：第一，他们应该在思想上抛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类论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都是封建时代圣君贤相的所谓仁政，真正民主主义者，应该走到人民中去，引导人民自己奋斗，不应该高居人民之上、来爱他们保他们救他们！第二，他们应该在行动上抛弃封建时代军事专政的万恶制度。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务须使该地方政治尽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实上，贪官污吏是中国政治之致命伤，只有政治民主化可望救济，军事专政正是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惩治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而不应放任贪官污吏及驻军勾结劣绅、地主、土豪蹂躏农民；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广大民众，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只有他们自身这样更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肃清民主派内部的封建余毒，才能稳固充实民主的战线，才能保证民主派的胜利。

研究系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对民主政治，实际是反对的。他们否认国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认国民会议可以召集，否认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学生会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认干净了，不看见他们于这些消极的否认之外，有什么积极的主张。他们积极的主张，不用说就是照旧由半封建的军阀统治中

国，更好是由有两次战功、八省地盘的直系统治中国，最好是袁世凯复活来统治中国，好用他们来组织所谓“第一流内阁”。我们现在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不但要用枪炮和半封建的军阀争斗，还要用笔舌和反民主主义的研究系这类政客争斗！

1926年9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丑哉和平运动！

和平是人人所希望的，真正的和平运动更是不应该反对的；可是奉直联军急攻国民军之时，吴佩孚对湘、粤大张挞伐之时，都无人出来运动和平，独当北伐军急攻武汉之时，南北巨绅都应时而出，主张和平，仿佛和平运动也算是北洋军阀一种武器，危急时也用得着。孙传芳只想保境安民时，上海和平运动之声大起，孙传芳想进兵攻取湘、鄂时，上海和平运动便沈寂，现在孙传芳军事失利，上海和平声浪又高起来了。月薪千元之孙传芳的高等顾问蒋伯器出来号召和平，几扎蹩脚绅商跟着他跑腿，这种和平运动，岂不丑哉！张一麐君老矣，何苦也出来跟着献丑！？

1926年9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历来是把中国人当做未开化的蛮族看待，动辄开炮轰击，以快其意，以遂其欲求，以为无论有理无理先打死他们几个再说，他们最怕的是大炮，大炮打死了他们，我们便有了理了，他们的酋长也就屈服了。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这样的态度，简直与对待非洲和南洋各处未开化的蛮人生番一样，对待半开化民族都不至如此。

自鸦片战争到万县屠杀，英国这种炮舰政策，便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代表态度。

万县屠杀之起因，是由于最近英轮在川江一连任意撞沉了中国官船七只，淹死的军官、兵士前后共计七十七人，杨森派兵一队向英轮交涉，反被英轮缴械，杨森遂将英轮二只扣留。英国帝国主义者是怎样办法呢？他是不曾和杨森交涉，而马上采用炮舰政策，开炮轰击万县城。其结果怎样呢？英国人自己的机关报《字林报》说："维勤号专击华军之炮及沿江兵士，考克却菲号则以大炮轰城。……第一弹即将其司令部完全击毁，闻共发弹三十九枚，或云五十六枚，全城起火，……城中火光烛天，终夜不熄。……万县民兵共死五千，……该城大部分已破坏。"这是何等无理由的大屠杀！

即依据帝国主义者所视为神圣不许侵犯的不平等条约，试

问何约何条，载明英国兵舰在非宣战时亦得有任意开炮轰击中国军民之特权呢？英国人这样横暴不法的炮舰政策，不是对待蛮族生番的态度是什么？

路透社九月二十八日伦敦电："保守党洛克问在华英国兵力足以充分保护英人利益否？首相答称，刻已在途之接应兵力，计飞机、运送舰一艘及驱逐舰九艘，连同现已在华之兵力，可视为舰队力充足。"以此可见英国人对华炮舰政策，现在仍是有进无已。

同时，英国人在上海号召的什么"自由保障会"，在各报上大登其启事说："本会专事联合各国人民反对第三国际之学理及共产政策之宣传，增进各国各阶级之合作心，维护原有良好之教化思想言论之自由。"他们正在宣传这些德意，万县大屠杀，却好把他们这些德意证实了；考克却菲号准对着万县市民所发的大炮炮弹五十六枚，才真是自由之保障哩！难道杨森及万县市民也和第三国际学理共产政策有什么关系么？

英国帝国主义者既然始终以炮舰政策对待我们"未开化"的中国人，我们未开化的人，只有自己尽可能的力量，用"未开化"的手段回答他们，切勿希望什么政府交涉可以解决这样的血腥问题；因为无论北京政府或四川政府，都是在英国奴才、直隶军阀势力支配之下啊！

1926年10月10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三、四期合刊　署名：独秀

我们现在怎样争斗？

醉梦他自己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吴佩孚，已由武汉而败退到郑州，只落得奉张击掌称快和孙传芳乘机出头。现时在吴佩孚名义之下的部队，虽号称尚有十万，然不独战斗力薄弱，而且各自欲觅得地盘，不能为吴佩孚反攻武汉而战了。其中由国民二军由靖国军改编的部分，还要乘机倒吴，吴佩孚的势力是要根本消灭的了。

继起的孙传芳是否能以成功，全看他在鄂、赣边界和北伐军战争之胜败和奉军是否乘机南下夺取苏、皖。

奉军尤其是张宗昌军，急欲以援吴名义扩张地盘，以安插其有功将领；然为吴佩孚、孙传芳阳求援助阴拒其派兵南下所阻，现时只得且用全力经营直、鲁及热、察二特区，将来再观变而动。

孙传芳若在鄂、赣得到胜利，则奉据北方，孙占长江，国民政府仅保有南方，直系军阀势力倒了一个吴佩孚，又起来一个孙传芳，中国政治将更陷入混沌局面。孙传芳军若在鄂、赣失败，则直系势力全灭（靳云鹗在河南，四面受敌，非依奉必依国，即表面上勉强存在，亦不能自成一派独立的军阀势力），奉鲁军迟早必南窥苏、皖，这时便会形成国、奉南北对峙的局面。

如果到了国、奉南北对峙的局面，中国的政局，将由混沌而转入活泼，或者由军事争斗暂时转入政治争斗；然而是否真能如

陶孟和先生所希望“由战争到政治”呢？当然还不能。要真能由战争到政治，至少必待奉军退出关外。因为军阀势力未消灭，在民主派统一政权代替军阀的军事专政以前，国内战争是不会停止的。

因此，我们要真能由战争到政治，要真能得到和平，便应该懂得现在及最近的将来要怎样争斗了，怎样为到政治到和平而争斗：

第一步是要消灭孙传芳势力；

第二步是要消灭奉张势力。

这两个军阀势力是目前中国半封建势力之代表，消灭了他们，才能够停止内战，才能够使战争到政治，才能够得到和平，才能够走上民主政治的路，才能够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全国革命的民众及接近民众的军队，应该一致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广东、湖南、湖北这些省分的民众，应该努力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权，努力助北伐军击破孙传芳侵入湖北、江西的军队。东南各省民众，应该尽可能的力量驱走孙传芳的驻防军，为实现地方自治政府而争斗，至少农民、商民不应该再以纳税出捐形式帮助孙传芳做扩张地盘的军饷了；知识界、言论界不应该再以中立态度助长孙传芳的野心，更应该起来揭破奉、直军阀以讨赤来欺骗人民的假面具。尤其是东三省的民众，应该尽可能的力量阻止奉军南下援助吴佩孚与孙传芳，更进而在军事上在财政上，摇动奉系军阀统治的基础，一直到武装响应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讨奉战争。西北各省民众，应该与国民军合作，肃清吴佩孚在陕、甘的残余势力，更进而援助国民军向奉军反攻。

国民政府眼前的紧急争斗，自然是击退孙传芳之进攻，非此不能保持此次北伐已得的胜利。同时，对孙传芳战争一有结束，国民政府对于所统治的省分尤其是广东，即须尽可能的力图民主政治之建设，力助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尽力来肃清境内的半封建势力，如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工贼等，如此才能充实南方民主派的实力，继续北伐，完成民主革命的争斗。

国民军欲图向奉军反攻，必先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以巩固其在陕、甘的政权。特别是对于西北各省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碍其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的民主革命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

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是民主主义胜利呢，还是半封建的军阀胜利，这要看我们是怎样争斗和争斗的努力至何程度了。现在确是中国历史之一重大时期！

1926年10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

章炳麟劝孙传芳讨蒋的支电，不但高叫“迫切陈词，为国呼吁，为民请命。”并且责备孙传芳不应“宴安江左，偷引岁时”。其实这道将近一千字的电报，乃是孙传芳特别拿出一千块大龙洋，叫章炳麟如此这般的。这岂不是他俩在那里唱演双簧吗？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章炳麟今夏在苏州什么平旦学社讲学说：“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诚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章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我想听了他这段话的人，不浑身肉麻，便误以为是他自己痛责自己。以一个同盟会会员，首先向张之洞乞怜求援，乞怜不成，又派何震（刘申叔之妻）到端方处运动投降，首先通电说统治中国非项城不可，称孙、黄为小丑，章炳麟的气节安在？王莽比袁世凯总算略识诗书，而且扬雄在王莽朝，也并未曾象章炳麟荣任筹边

使大摆勋章那样出丑；韩愈固然上书宰相不忘利禄，然而当时的宰相，也还不象现在的什么镇威孚威这样作恶，韩愈更未曾象章炳麟为区区一千元替孙传芳摇旗呐喊，且称孙传芳为神武这样的"廉耻丧失"！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

现在治英国的是保守党，治意大利的是法西斯党，治美国的是共和党，凡非以君治国的国家，都是以党治国，本来一点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说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先生的新发明，或以此非难他，都算缺乏常识。现在的中国，既非以君治国，又非以党治国，乃是以军治国；中山先生以为这样不好，所以主张也要和别国一样以党治国，换句话说，就是以政党政治来代替军事专政。我们以为凡是反对军事专政的人，便应该赞成以党治国；同时，主张以党治国的人，也不应该仍旧留恋军事专政！

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在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运不齐

章炳麟辛辛苦苦为孙传芳做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蒋电报，只到手一千块钱；同时，康有为到山东、天津、奉天走了一趟，“南返程仪万金五千不等。”（见《时事新报》九月念九日北京电）章炳麟得毋羡煞妒煞！

1926年10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五期　署名：实

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

在辛亥革命军发难之日，民党军队第二次占领辛亥革命发难地的武昌，同时在江西方面，也有击败孙传芳之可能，不久国民政府北伐军事或者能有一小结束。刚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和各省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这会议是有重要意义的。

以前有许多人看广东不过是一些乱党或者是一些赤化党在那里胡闹，好在远在化外的大岭以南，无关大局；现在却不然了，不但吴佩孚的势力被他打碎了，孙传芳若从九江败退，则福建、四川、云南都绝了北向之路，如此则国民政府已占有半个中国，他的战后设施，全中国人甚至于全世界人都不得不改变以前的态度加以注意了。

据我们所得的消息，此次国民党会议的重要议程是：(一)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地点；(二)召集国民会议；(三)省政府之组织，省民县民会议，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四)省政府与省党部之关系；(五)新的政纲。

此次国民党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来讨论，已经可以证明国民党有异常的进步。国民党前此两次全国大会，虽然议决了一些政治原则，此次的议程更具体化了。此次会议将如何决定这些具体问题，这是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

的人们，都急欲知道的。

我们一向是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此时期中的希望更为迫切，因为现在是全国人开始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时期。

此次国民党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五)议题"新的政纲"，因为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政纲还抽象一点，其性质似乎是党纲，现在应该根据前定的政纲，更具体的规定出来对于各方面目前的实施政策。例如，根据民族平等及经济发展的原则，决定关税政策和对那几国的外交态度，对于国内战争及和平与夫对于其他军队之态度，对于财政应如何将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那些急需而且可能的办法决定实施，如何完成粤汉铁路及建筑海港以发展工商业，确定教育经费及优待小学教员的具体办法，这些都是此次新的政纲中所必须注意的。关于民众利益之保障，尤其是此次新的政纲之生命，第二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商民运动决议案中之具体办法各条，都应该尽量采入此新政纲；并且关于工人最低工资之利益，应该更具体的指明由政府和工会合组一委员会于一定期限内制定，关于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应该更具体的指明由国民政府通令所属各省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农民政治的丙项，应改为解散压迫农民之"军队及民团"，经济的甲项，应改为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超过若干以上；关于商民应增加二项：一是以海陆军保护水陆商业、交通及禁止各铁路因军事阻碍商业运输，一是修正商会法，使各业真正商人无限期的都能参加商会组织，而不为少数洋行买办所把持。此次新政纲更应该珍重声明：国民政府的基础是建筑在民众势力之上，而非建筑在军事势力之上；因为这是中国由半

封建的军事专政到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唯一标识。

（二）（三）两议题，算是新的政纲问题；召集国民会议之地点与时间，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最重要的是计划如何即刻在各地发展国民会议的民众运动，免得将来成一空洞会议；其次便是决定国民会议之目的，应该是民众尽量发表怎样减轻十五年来的痛苦，怎样改正关税制度，怎样解除筹还外债，以解除全民族的枷锁；至于全国政治组织和宪法问题，还不是军阀未完全倾覆以前第一次国民会议所急需讨论的议题，所可决定的只是国民会议本身代替国会制度的问题；以省民会议代替省议会，县民会议代替县议会，也应该有同样的决定。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应该根据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政纲对内政策第一条，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军政财政，都应该划分权限，不可采用割据的联省自治，也不可采用无限制的中央集权制。

全国人都开始重视国民党、国民政府了，此次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应该产生一个适合目前中国初步改造所需要的政纲，而且马上就能够实施这一新政纲，使全国各阶级的民众都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究竟是什么！

1926年10月19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讨赤特捐

上海《新闻报》十月九日济南电："讨赤特捐已开征，丁银一两征四元二角，漕米一石征八元。"可怜被苛捐杂税逼得难以活命的山东人民，尤其是农民，现在又加上这种特捐，他们不得不感谢反赤运动了！

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些什么人？

中华民国果然由辛亥革命而成立了吗？实质上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自孙中山辞总统职一直到现在，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既然还没有中华民国，那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议决什么中华民国国旗的什么国会，自从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一直到贿选，只是北洋军阀的御用机关，那里是什么中华民国国会？因此盲目的拥护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而忘记了中华民国，已经是买椟还珠；而高叫拥护国旗的人们，又是一班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怎不令人齿冷！

丁文江与爱国行动

以丁文江博士统治之理想的大上海，竟因为讨论万县惨案逮捕各团体代表、封闭学生总会，还行文来法租界拿人！丁博士的代表詹科长对学生会代表说："此次被捕代表，实系纯粹爱国行动，惟值兹地方多事之秋，自当特别从轻办理。"然而警察厅厅长却对商人表示对被捕各代表，他本愿意轻办，只以丁总办主张严办，故一时未便释放。哈哈！好一个鼎鼎大名的丁博士，对外人则主张"友谊的磋商"，对爱国行动则主张"严办"！"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呜呼博士做官！

傅筱庵的和平运动

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一面拿招商局轮船替孙传芳运兵，一面拿上海总商会名义通电主张和平，像他这样的和平运动还有什么意义？然而有一个重要意义：总商会发一次主张和平电，便是声明孙传芳打了一次败战。

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

对于万县惨案，有些军阀都表示愤恨，独有所谓国家主义者置之不闻不问。上海学生会邀请国家主义者大首领曾琦，参加各团体讨论万县惨案会议，曾琦回答道："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因此，上海四川同乡会大不满意，宣布削除曾琦的四川

省籍，大概这位曾琦先生是主张国家主义而反对乡土主义吧！

那里有中华民国？

张一麐说现在国民党革命北伐是革民国之命，试问现在是不是民国？本来自袁世凯以来，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已被北洋军阀负之而趋，现在国民党起兵讨伐这班北洋军阀，所以袁世凯的幕客张一麐便大呼是革民国之命，所以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也站起来大呼拥护北洋派的国旗。孙传芳复孙洪伊的信也说："民国既已告成，已无再谈革命之理。"那里有民国？北洋军阀就是民国，孙传芳也是北洋军阀之一，他当然要反革命，我想张一麐还可以帮孙传芳解释说：你们革我北洋派之命，就是革民国之命。

1926年10月19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六期　署名：实

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

"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只要不是希望吴佩孚、张作霖长久统治中国的人，都应该表同情于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至少可以使张作霖不能够专力对付南方的北伐军。

研究系一派人，他们虽然现在还不曾公然逢迎张作霖，他们传统的思想，总以为中国应该永远归北洋派统治，由袁而段而徐而曹、吴，他们都继续拥戴，曹、吴败了，他们便来拥戴孙传芳，孙传芳若再失败，不知他们将于北洋派中拥出谁来？或者也只得去就合张作霖。冯玉祥虽然也是北洋派中分裂出来的，可是他忽然亲近了孙中山，并且亲近了苏俄，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当然要咒骂冯玉祥。

不懂得军阀定义的人们（如国家主义派），竟把冯玉祥、蒋介石看做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样是军阀，象这样放意混乱是非，真是暗中帮助了张作霖、吴佩孚。

军阀们大贼冯玉祥倒戈是破坏道德信义；有些无聊的小新闻记者，也附和军阀，以倒戈团团长、倒戈学校校长嘲笑冯玉祥。其实，民国倒戈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吴佩孚向段祺瑞倒戈，冯玉祥算不得是倒戈团团长或倒戈学校校长；并且这几次倒戈只是破坏了封建社会的道德信义，在民主政治之过程上都有很大的意义。胡适之说："冯玉祥之对曹、吴倒戈，放开眼

界通观前后二十年全部历史，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此见实不同凡俗。

京津一带商民对冯军是怎样感想呢？有一部分接近奉、直军阀的商人说：冯军是有纪律不扰害人民，只可惜要共产公妻不好。一般商民并未看见共产公妻的事实，他们只看见赤军不曾扰民而反赤军却是烧杀淫掳这些事实，遂不禁发生希望赤军再来的心理。本年七月四日上海《申报》所载北京归客谈，有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人民对于赤军与反赤之感想，兹照录于下：

"试从西直门至清华学校，吾人常往来之路，举目四顾，只见有兵，不见一老百姓，自校入城，在西四牌楼以西，尚无开门之店铺，其在前门一带，则十家内至少有七家停市闭门。初时瑞蚨祥等，恃与八太爷多为乡亲，开门敷衍，数日而后，亦停市矣。凡绸缎店、金银店、粮食店，以及出售贵重品日用品者，莫不首先停市。一日余往前门买夏布，店夥答称对不住，铁路不通，来货没有，请改日光顾。余初信之，余妻住京久，恃与熟识，明日往买，则慨然出售，诘之，则称实不相瞒，八太爷手持军用票，决不敢请教也。八太爷程度日高，往往另串一人入店，选货既毕，则八太爷昂然直入，非纳军用票不可；有时串得一大家装束之妇女入店，必以为与八太爷无关系矣，选货既毕，而八太爷忽入，诈为护兵，口称：太太，货选好没有，强纳军用票于柜，挟此大家妇女，携货以去。又有一次，确是一大家妇女，选货既毕，出现金，将交柜，八太爷直入，谓此间无须现金，吾代汝纳军用票足矣，即取该妇手中现金，昂然遂去，如此行径，店铺非不欲营业，实觉少做一笔生意，少蚀一笔本钱。

军用票有数量之限制乎？曰无有也。苟有限制，商会等机关尚可为之设法，今则无底之橐，谁肯填之？初时尚有电车、电话、电灯等公共机关可以使用，今则肯收者日少，尤可恨者，崇文门税关，明为搭用，实则提高税率，使等于军用票短折之数，如军用票对折，则税率提高一倍，诘以何以与天津税单定额不同，则称吾那里管得。过天津，则租界以外商民之苦痛，一如北京，更强向屋户或铺户，加征房捐三个月，不足更加收房租两个月，其系自有之屋，则为之估价，令人痛恨上海何丰林之作俑于前，遂成军阀搜括民财之惯例也。纳房租房捐于官，却不许还搭军用票，某商人语余，简直是要我们性命。京、津老百姓，莫不想念国民第一军之纪律，虽在退兵时，从未强索一钱，掠取一物，以为其领袖人物如何，又当别论，若其兵士，真当起爱民不扰民数字，甚至谓如此好兵，若竟不能生活，未免无天道矣。”

现在有纪律的好兵又起来了，京、津老百姓当然要欢迎；可是研究系一班人听见冯玉祥回来，并且回来还是要反抗张、吴而革命，他们便大叫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到底是有纪律的好兵乱华，还是反赤的奉、直军乱华，老百姓只看事实，不会把白党（奉直军阀、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的宣传看得比事实更为可靠吧！山东的农民本来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更还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可是张宗昌反对共产党的告示贴遍了山东全省各乡村，农民见了窃窃私议道：张宗昌这样深恨共产党，想是共产党反对张宗昌，看来这个党或许不错，现在研究系大声疾呼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老百姓也许因此更觉得冯玉祥和苏俄都不错，因为老百姓目前切身感觉得乱华的人正是

张、吴，不是别人。

奉、直两系军阀之为害中国，无人能够否认；不用武力而可以打倒他们，非童昏当不至作此奇想。将用武力打倒奉、直军阀之国民政府及国民军，是否也和军阀一样呢？不独工人、农民、学生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即一般稍稍进步的商人，现在也知道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比奉、直军阀好，暗中盼望他们得到胜利；连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白党的肚子里，又何尝不晓得国民政府和国民军好过奉、直军阀，不过在他们的利害和感情上，不愿意这样说罢了。

现在不独国民政府的势力达到了长江，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陕、甘、绥、晋渐渐归入国民军掌握，由包头到广州新的革命势力和由满洲里到福州旧的军阀势力，已成对抗之局，人民对此对抗之局应该有个选择了，似乎很难中立。站在军阀那边的人们，称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为乱党为赤化党为赤贼，只好听他们自便；若是有人满肚皮不愿意站在军阀那边，同时又满肚皮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怀疑，试问他们有什么别的出路？不但站在军阀那边的白党若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显然是反革命，那对军阀与革命间取了中立态度的人，实际上减少了革命的力量，也算是帮助了军阀。所以现在人民单是消极的不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还是不够，应该起来帮助他们的军队进攻。因为在事实上已证明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确是中国推翻军阀的尖兵。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民所得自由，比在奉、直军阀统治下的人民如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消说得。冯军的纪律比奉、直军如何，不但京、津老百姓知道，即张作霖也知道，并且他自己

也承认过；冯玉祥此次回国，在他固有的治军谨严治己勤俭外，更鲜明了他的政治态度，确定了他的革命方针，在他的回国宣言上（宣言附录于后），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了国人。我敢说他这个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这个宣言所产生结果，将来必非常之大。我还敢说：今日的冯玉祥，我们不能当做从前的冯玉祥看待了！

我们肯定了"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在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固然应该说明这个意义，我们更应该对冯君及全体国民军表示几件具体的希望：

第一，国民一军"有纪律不扰民"的荣誉，应该极力保存勿失，并须将他荣誉普及到二三五军去，尤其是二军更需要。

第二，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对内整理，对外作战，万不可妄想各自树立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尤其不利于作战，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便是前车。

第三，国民军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势力，乃是一种政治势力，他的势力应该很深固的建设在民众势力之上，尤其是农民。应该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国民军所到的地方，都应该帮助农民（佃农与自耕农）反抗地主过分的剥削，反抗土豪、劣绅、讼棍的鱼肉，剿办扰害农民的土匪，严惩贪官污吏更不待言；应该唤起农民对国民军的同情心，由农民自动的供给国民军以食粮，不应该以赋税的形式强迫农民增加负担；应该尽力帮助农民的组织、教育与武装；应该使农民群众成为国民军的后备军。同时国民军也就是保卫农民利益的军队。

第四，国民军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使奉张不敢轻于尝试。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尤其

重要，不仅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能够打战，更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懂得为什么打战。总司令一个人决定要革命是不够的，必须在下层的政治训练工作上充分努力，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认识自己是一个革命党，都有为民族自由而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自由与生命之决心。

第五，对于蒙、回少数民族，应该尊重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我们不可一面反抗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一面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者。

第六，尽可能的（只要不损失主权，虽借用外债亦可）完成陇海路，在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1926年11月4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到底是谁没收人民财产？

在前清末年，山东全省岁入为一千一百二十余万两，民国八年度预算，只有一千万两有奇，张宗昌初到山东时，全省岁入为一千五百余万元，和民国八年差不多；张宗昌到山东不久，便增加到五千余万元，人民负担陡然加了两倍半。现在又要就丁漕两项征收什么"讨赤特捐"，总额一千六百十四万七千元，本年十月一日开始，至十二月廿八日截数，限各县于此三个月内缴齐，并须一律现洋，不知道山东农民怎样能够活命？同时饱受兵灾的直隶，也正在摊派善后公债一千万元。然而张宗昌、褚玉璞却天天在那里大叫反赤，大叫广东赤党没收人民财产！

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

张继曾问蒋介石：此次是国民党北伐还是共产党北伐？我们现在却要问：此次是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为什么发此奇问？因为段祺瑞针对孙中山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发的"外崇国信"这一口号，现在刘文岛也公然在北伐军中叫出来了！段祺瑞一叫"外崇国信"，把活的孙中山气死过去；刘文岛又

叫“外崇国信”，或者可以把死的孙中山气活转来。现在可是要请问张人杰君：是否我们“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

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

招商局江永轮船，为孙传芳由南京运子弹到九江，突然炸裂，船身完全炸毁。该局董事会因此开会讨论，他们都以为现留九江供作孙传芳军运之轮，还有八艘，每艘代价平均在三四十万元，关系重大，决再电请放还，至江永轮之被毁损失在廿万元以上，届时亦须要求赔偿云。我要问问招商局董事们：你们向谁要求赔偿？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私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招商局董事会，是否应该严惩这样私卖招商局的总办？

此路不通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者陈启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一面主张要收回各国在华一切权利，而一面却反对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不知道他们打算怎样收回？真是“此路不通”！

国家主义者与研究系

国家主义者一向不赞成国民党，并且很轻鄙国民党，曾讥诮共产党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可是他们现在却附和研究系，向创造中华民国之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攻击，又在研究系的机关报上大做其文章，想必他们以为研究系比国民党要高明些。这真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1926年11月4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　署名：实

十月革命与东方

我们要懂得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可忘记了当时的世界情况。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战中，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两方面都只以保卫祖国相号召，独有帝国主义的美国威尔逊举起“打倒德意志军国主义”、“民族自决”这两个旗帜出来号召，颇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自由派和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派，都对威尔逊怀了多少幻想。这时只有无产阶级的首领俄国列宁，他看破了威尔逊的虚伪与无能，他坚决的主张非发起各国国内革命不能打倒军国主义，非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民族自决。其结果威尔逊的巴黎和会，打倒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德意志，救出了英、法、意、比等许多军国主义的国家，民族自决更成了一句废话；列宁的十月革命，却实实在在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伦斯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了芬兰、波兰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之民族自决——独立或自治。这种历史的事实，曾经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列宁和威尔逊之不同，列宁的见解正确而伟大和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都已经不是还有讨论余地的理想了。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有整整的九年，在这九年中，苏俄仍旧是继续列宁的十月革命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

欧美资本帝国主义者，知道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对于他们的危险，始而武力对付，继而用经济封锁政策，这两样都不曾收效，现在遂改用吊膀子政策，甜言蜜语劝苏俄"回到西方"。

"回到西方"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抛弃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回向欧美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妥协合作。苏俄内部，近来有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也主张回到西方，他们以为东方民族中，如中国人并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以苏俄援助他们革命为多事，有野心，在另一方面，苏俄却以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结怨于列强，为苏俄自身利益计，应该改变以前政策，停止援助东方民族运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妥协，以便从这些国家中得到苏俄经济发展之物质的援助。苏俄中大多数左派分子却不赞成右派这种意见，以为是违背了列宁的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

当真中国人都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吗？苏俄中右派分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中国的革命派不用说，就是一般商人，近来也都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并且已经起来做反抗帝国主义之行动，如反抗棉花出口，反抗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纸烟捐和商标，主张关税自主，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主张废止领判权，主张收回会审公堂与租界等，已成了全国商人普遍的运动，而却未曾有一次真正商人反对苏俄，因为在他们的经济生活发展上，天天都感觉到帝国主义者当面的压迫，而不曾感觉受苏俄压迫的事实，真正商人不同流氓政客，因此他们不能无病而呻。中国人中反对苏俄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不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商人、工人、农民，而是一小部分军阀和无职业的流氓政客如下表：

（一）军阀；

（二）军阀的走狗（如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复辟派、国家主义派及民党右派冯自由、章炳麟、徐绍桢、黄大伟等）；

（三）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洋行买办、耶教徒及民党右派马素、童理璋等）。

这三种反革命派确是不感觉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大叫苏俄援助中国民族革命有野心。然而他们却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与军阀非中国之患，中国大患只是苏俄所援助的国民革命；他们希望力量还弱的国民革命军得不着国内国外任何援助，好让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奉、直军快快打平。他们都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他们反对苏俄援助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军，这也是当然的事。

还有一班人，他们都非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也并不反对苏俄，而他们以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来革命，不一定要依赖苏俄的援助。革命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要依赖外援，这个意见并不错，并且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这样做，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若因有苏俄援助可以增加我们革命发展之速度，似乎也没有理由应该拒绝，更无理由因此而反对苏俄。

反对苏俄的人，硬说苏俄援助中国革命是有他的野心，而非善意的援助。说这样话的人，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试问苏俄因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军曾经得到些什么没有？苏俄援助中国，若是由于他的野心而不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面，他尽可继续旧俄政策，援助奉天或直系以达到他的

野心，又何必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呢？国民革命的势力得胜，能容忍任何国家的侵略野心吗？奉张对俄大使说："奉、俄近邻，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而帮助很远的广东？"吴佩孚对俄领事说："我为中俄协定很尽力，我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你们应该来帮助我，派些顾问到国民军那里有什么用？"奉、直军阀并不是不要苏俄帮助，正因为得不着苏俄的帮助才反赤。苏俄为什么不帮助奉、直军阀而帮助国民革命军，这便可以充分证明苏俄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援助中国，而非由于侵略野心。

苏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关系东方被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常重大，可是欧美的资本帝国主义者力劝苏俄回到西方，恰好中国的反革命派也拒绝他来到东方，东方的革命派应该起来怎样对付这个问题呢？

1926年11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研究系官运不亨通

研究系的前身保皇党，刚刚跪求满清做点立宪运动，却被民党的辛亥革命打翻了；刚刚拍上了袁世凯，组织了什么第一流内阁，却又被北洋派嫡系赶走了；刚刚拍上了段祺瑞，攫得财政、司法几个总长地位，又被民党的护法运动打掉了；刚刚拍上了曹、吴，又被冯玉祥反戈拆散了；最近刚刚拍上了孙传芳，又被北伐军打来，不独蒋方震的江西督办落了空，就是丁文江的淞沪总办也有点靠不住。可怜的研究系，怎么这样官运不亨通！

研究系是只白虎

研究系保清朝，清朝亡；帮袁世凯，袁世凯灭；帮段祺瑞，段祺瑞失败；帮曹吴，曹吴倒霉；帮孙传芳，孙传芳卸甲丢盔。有人说他是只白虎，谁沾染他，谁就晦气。

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

国家主义派，不敢反对国民党，只好说共产党假冒国民党；

可是他们所攻击的青天白日旗，总不是共产党假冒的吧？国家主义派说："自蒋介石北伐以来，全国言论界大都为他一时的胜利所惑，莫敢为斩钉削铁的批评，独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抱定信念，认清真理，尽量的揭发蒋介石亲俄的自误误国（帝国主义及军阀当多谢国家主义者！）及其所以不能成功的理由，现在事实渐渐证明国家主义者言论是真理，不是客气，是千真万确，不是神经过敏了。"不错，孙传芳又已经到了南京，国家主义者所谓北伐军不能成功，总算千真万确了！国家主义者大喊其他们是国民党的友人，共产党是国民党的致命敌人；只可惜他们不应该攻击他们友人的青天白日党旗！

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

国家主义者自夸道："国人对于国家主义的信用，也一天增加一天了。"又道："国家主义潜伏在国人心田中的势力，已到了奔腾澎湃莫之能御的时候。"不错，国家主义的信用和势力已经了不得，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极阔的首领，不是最近前国务总理大人靳云鹗大鼓吹其国家主义吗？或者张雨帅、吴玉帅也会加入国家主义派，因为他们都是反赤的同志。

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

孙传芳举兵讨赤之初，置人民和平的呼吁于不闻，到了赣战不利，才串出蒋尊簋、张一麐等出来奔走和平，做他的免战盾牌。现在孙传芳由九江败退到南京，不但怕北伐军东下，并且怕奉、

鲁军南下，更用得着和平做盾牌了。于是什么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乃应运而生。该联合会表面上是说三省人民自治，实际是重在三省军事当局停止战争，由人民代表和粤、奉、鲁接洽和平，这本是孙传芳所求之不得的。这种仍旧拥戴三省军事当局的自治运动，与其说是三省自治运动，不如说是为孙传芳保江山的运动！这班人民代表若当真去广州为孙传芳接洽和平，国民政府或者要问问他们：三省人民自治诚然很好，但是你们所拥戴的三省军事当局是谁？

1926年11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八期　署名：实

革命与武力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军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的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的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是怎样呢？一方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地主、士绅等，要维持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阶级利益的军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军人应该站在前一阶级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买办掌着中国城市政权，做他们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结乡村的士绅、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贱价原料；军阀利用买办（商会领袖及银行家）在城市剥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绅在乡村剥削农民，以供给他们的军饷；因此，可以说军阀、买办、地主、士绅，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

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有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吴稚晖先生所以有"有军必阀"之叹。我们或者可以承认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较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军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军事独裁局面之军事首领，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绝一切闻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机以小人之爱捧此军事首领，只需蒙蔽此首领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贪赃枉法，无所忌惮，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领不止。在这样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腾的局面之下，还说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军事独裁，其结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们还记得辛亥革命时，有"军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军字写作"軍"，许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结果怎样呢？我们又记得国民党在广东驱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话，却有了"军人革命论"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军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观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观

念，都足以促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如果想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险，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贪官污吏化，便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我们反对以军治党，并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过问党事，也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说每个军人党员乃至军事首领，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从违，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见不敢和军事首领的意见不同，使军事首领即党之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都只知有军事首领而不知有党，则这样的一个党，便等于聋了的耳朵，瞎子的眼镜，则所谓党的威权，党的决定，党的制裁，党的命令，都由"强奸党意"而来，等于无物。这样没有党的制裁之军事势力，要想免于军事独裁的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

1926年11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

什么苏民自治协进会，通电要求苏孙本保境安民之初衷，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涡。我们对于这班号召自治的糊涂虫，有三个疑问：第一，向苏孙要求他保境安民，这是什么自治？第二，孙传芳拿苏省的钱，派苏省的兵，和北伐军打得不亦乐乎，何以到现在才想起来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涡？第三，孙传芳去了，张宗昌就要来，你们热心自治的先生们，是否再来电求苏张保境安民呢？

丁文江竟比军警还要反动

前此主张严办为万县案运动的青年的，是丁文江；现在戒严司令部枪毙陶鑫元（即陶静轩）的，也是丁文江，最近向法捕房要求逮捕钮永建的，又是丁文江；甚至于严春阳示意工会，快快将关在法界捕房的海员保出，否则丁文江要求引渡去，必然枪毙。好一个博士做官的丁文江，好一个试验大上海自治的丁文江，他的反动行为竟在军警之上！

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队及其五色旗

国家主义派近来在各处尤其在日本，大反对其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大拥护其五色旗，说五色旗是国旗。可是他们(武昌的国家主义派)曾派人到岳州的吴大帅的军队宣传，恭维他们是爱国的军队，并且说"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他们的机关报说："鄂人对于北方军阀大兴其去后之思，而对党军反有愿与汝偕亡之意。"他们称三民主义为"残民主义"，他们称国民政府为"所谓国民政府"，他们公然大叫"反对擅改国旗的国民党"(以上均见最近《醒狮》周报第一一一期)！国家主义派这样的恭维北洋军阀，这样的反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难怪他们要拚命拥护北洋军阀的五色旗而反对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

国家主义派拿"满地红表示赤化"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之一。哈哈！照他们这样见解，那么，五色旗的第一条便是红色，它不也有赤化嫌疑吗?并且马路工程上大插其小红旗；各国的国旗商旗上，很少没有红色；许多纸烟火柴盒子，都是满地红；婚姻喜事，更是大用红纸帖子，大穿其红色衣裙；难道都是表示赤化吗?若这样杜绝赤化，连药书上的红花、橘红和词典上的赤胆、赤心、红梅、红日都应在删去之例了！如此看来，所谓国家主义派，竟是一班无知识的小孩子。

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

国家主义者说："主张用青天白日旗者，不问可知为共产党人。"又说："共产党人欲实现其一党专制之目的，绝不顾民意之赞同与否，擅自用彼一党制定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说："使共产党人而有理性，自当服从多数爱国青年主张，放弃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谬见，而同立于五色国旗之下。"我们的回答是：国家主义者若尚有丝毫理性，总不应该闭着眼睛否认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制定的这一个事实（即曾琦自己也说："同盟会初成立时，孙中山主用青天白日旗。"），而硬把这面旗擅自送给共产党；更不应该诬称多数爱国青年都反对青天白日旗；似乎也不应该劝我们和他们同立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之下！

1926年11月25日《向导》周报一七九期　署名：实

孙传芳败后之东南

孙传芳败后，东南三省最重要的现象使我们注意的，乃是上海市以至苏、浙、皖三省的自治运动。

此种自治运动，首先发生于上海市，远在齐卢战争以后，由上海市自治运动，扩大到环太湖区域。闸北自治运动和孙传芳争持最烈，其初发动于闸北自治公所几个董事，渐渐扩大到环上海市所有大小城镇的绅商团体；然而一时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终于被孙传芳用租界帝国主义的援助和丁文江博士大上海的欺骗政策压服下去，上海市终于被孙传芳统治了（丁文江不过是个工具）。孙传芳在江西战争不利，上海市自治运动又重新起来，十月二十三夜的暴动，虽然被孙传芳的铁血政策镇压下去，而暴动中所喊出的"市政归诸市民"这一口号，却并未曾镇压下去，反而日渐流行高涨起来，除傅筱庵等买办分子外，工人、学生、商人都集合在此口号之下。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孙传芳溃退到南京，上海商总联会发表宣言，主张拒绝奉鲁南下，划上海为特别市，市政归诸市民，永不驻兵，全市工、商、学各团体群起响应；并由上海自治运动，扩大到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在上海产生了一个苏、浙、皖三省联合会。

这个联合会产生之初，其中有些反动的官僚分子，企图利用这个三省联合会，以自治的名义拒绝北伐军及奉鲁军入境，实际

上是为孙传芳保全三省地盘，以便他们得以参加政权；嗣因会中急进分子反对，乃改变参加政治之表示为管理政治、军事之表示；迨十七日孙传芳北遁，张宗昌实行动员南下，三省联合会乃表示其脱离孙传芳拒绝鲁军南下之主张。孙传芳、张宗昌严拿反对直鲁联军南下的董康，江苏绅士乃表示宁欢迎赤化而不欢迎绿化（因奉张、鲁张均出身绿林）；张宗昌准备带军用票一千万元南下，苏、皖商民闻之失色相告。现在苏、浙、皖三省的自治运动，已渐渐和奉、直军阀在东南之统治权短兵相接了。

奉系军阀之内部，奉与鲁有竞争，奉之中新派（张学良、杨宇霆）与旧派（吴俊升、王永江）又有竞争，又加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力阻其向南发展，国民军之再起，晋阎之中立，更足以使奉张的军事计划，对西北更急于对南方；并且对南向河南则先与吴佩孚战，向苏、皖则先与孙传芳残部战，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于彼不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奉鲁军南下讨赤，乃由于英帝国主义者之怂恿与张宗昌之野心（张宗昌想做直、鲁、豫、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奉张在实际利害关系上未必如此。在这样情形之下，孙传芳也许有回到南京之可能（本报付印时，孙传芳回到南京了）。孙传芳如果回到南京，至少必让津浦南段于鲁张以结后援，固然不能完成其保全三省地盘之初梦，然他还有二万（孟昭月旅、冯绍闵旅、李宝章旅、王雅之团及卢香亭、彭德铨残部）可用之兵，以之继续对北伐军作战固不足，以之镇守江苏则有余，浙、皖二陈战斗力并未损失，孙如能占住南京，彼等势必联孙以自保，北伐军如不取浙、皖，则孙传芳尚有赫然自称苏、浙、皖三省联军总司令之余地。因此，三省自治运动，目前尚未至如何拒绝直鲁联军，而是如何对付这个僵尸的孙总司令及其走狗

丁文江、陈陶遗等。去了孙传芳，还要拒绝奉鲁军，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若不于开会通电之外，有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牺牲，此次自治运动之成败正自难言。

然而东南三省，尤其是上海市的自治运动，无论其目前能否成功，无论其急进或是缓进，必有一个长期的争斗，只要有争斗，他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是我们不应轻轻看过的一件事。

依我们现在的经验，中国民主运动，有三种形式的可能：一是革命的军事行动，由辛亥革命到此次北伐，属于此种形式；二是资产阶级的自治运动，此次上海及东南三省自治运动，即属此种形式；三是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这三种形式不同的运动，都有一共同性质，即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或者有神经过敏的人，以为农民暴动是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的错误。现时中国还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农业，因此佃农、地主间的土地关系，和地主对于佃农剥削方法，还是半封建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即工银制度；农民运动的成分主要的是佃农与自耕农等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所以现时中国农民在乡村推翻地主乡绅政权的自治运动，和商人在城市推翻军阀官僚政权的自治运动，同样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同样是资产阶级推翻半封建势力的运动，决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虽然城市自治运动中有工人参加，乡村自治运动中有雇农参加。

此次上海及东南三省的自治运动，很明显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他比湘、鄂、闽、赣的军事行动，革命性要少些，而民

主性或者还要多些；因为他是由人民自己起来要求脱离军事统治而自治，比北伐军更有社会基础。东南各省尤其是上海市，是中国产业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从这些地方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一件事！中国的资产阶级犹甚幼稚，致军阀死命之金融权尚操在买办官僚之手而不在资产阶级之手，因此他们的民主运动，往往归于畏怯退缩。上海的运动，因有工人群众参加，比别处要急进一点。三省联合会中，夹杂着许多官僚政客，这是东南自治运动的一个内伤，因为他们很容易和军阀妥协；尤其是研究系、江苏省教育会和张君劢、张一麐、张孝若这班直系党羽，到了孙传芳当真不能在东南三省存在的时候，必然也要伸出尖头，戴上自治民主等面具，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偷点什么去，尤其要藉此反对国民党。因此，东南自治运动要真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不但须彻底力抗军阀，并且须谨防内部的扒手——反民主的官僚政客、买办教棍等直系党羽！

1926年12月5日《向导》周报第一八〇期　署名：独秀

各国承认国民政府问题

国民政府与经纪政府

赤的政府与反赤政府

人民选择那一个?

自国民政府势力发展到长江以后,帝国主义的各国,遂不得不改变其以前武力的高压政策而为外交的和缓政策,以前是讨论如何用武力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是讨论在何时将怎样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即国民政府,他们的舆论固然有人大声疾呼的主张承认国民政府,即他们的外交当局也不能不把向来不置一顾的南方政府承认问题当做重要的问题来详加考虑了。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我们并不拒绝和任何国家通商往来,代表人民权力与利益的国民政府取得政权以后,当然还需要取得国际地位;因此,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任何国家能够承认国民政府,我们都一律欢迎,当然没有拒绝帝国主义的国家之承认这种蠢思想。并且,我们是革命党,便应该爽直的说老实话:我们的敌人,虽然昨天还把刀放在我们的颈脖上,他们如果今天放下刀来,拿笑脸或苦笑的脸同我们说和,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就是报以不是致中国死命的让步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

不过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断然不可忘记

了几个必要的原则：

（一）我们要决心由争斗得到各国承认，不可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承认。

（二）我们要懂得各国承认只是获得政权的结果，万不可想靠各国承认来做获得政权的原因。

（三）我们固然希望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地位，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获得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和封建军阀政府同样的国际地位。

（四）我们要懂得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

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决不会由让步得到让步，我们让步了，已经没有争斗了，敌人还为什么要让步？各国为什么要考虑承认仍旧是赤色的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是因为民众反英运动普遍了南方，国民政府的力量又到了长江。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承认的决心呢？是因为北伐军还未到北京。这是"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一个注释。英国有好几个报都一致主张只有承认国民政府才能够和缓中英间的关系恶化，这是"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又一注释。若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各国承认，不但毁坏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命，并且在事实上是一个幻想，因为帝国主义者不相信国民政府将来能够比张作霖更听话。

有些革命性薄弱的党人，还抱着谬误的传统思想，以为各国一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北方的军阀政府便自然倒了，所以不妨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以取得他们的承认，以取得中国的统一政权。这种不靠自己争斗而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取得政权的下流思想，在事实上固然是一个幻想，即令不是幻想，能够由他们这样的下流思想而成为事实，则南方革命政府所获得的国际

地位，和北方军阀政府的国际地位还有什么不同？曹锟以应允临城案要求换得他的贿选政府之承认，段祺瑞以宣言“外崇国信”（即遵守不平等条约之意）换得他的执政政府之承认，革命的国民政府又何能走这条路！因为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便不能收回税权、法权及撤退驻华海陆军，我们决不能拿这个致我们死命的让步，即出卖国家的让步，去换得国民政府之承认。幸而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并未预备走这条路，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即决定对外方针，以不放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损失国家独立平等地位为和蓝浦生谈判的原则（大意如此，惜议决案原文不在手边，未能具录。）；蒋总司令对外宣言及和西报记者谈话，也是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坚持收回税权、法权，将继续革命的争斗，以期获得中国之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申报》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电：“英方要人消息，……将关税附加二·五，所有原来本税仍交存外国银行，缴付中央，此二·五附税作为各省政费，俾南北两方无偏枯，此事闻由蓝浦生吐露于陈友仁之前；陈谓南方立脚点重在主权，不重利益，苟自定关税，即收入不到二·五，亦所欣慰。蓝氏以南方口号与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无论如何似不能相容，故在汉未能得谈判结果。现在陈友仁正与佐分别（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谈判中，预料南方决不肯抛弃关税、法权、废约等口号，故与日谈判亦必无结果等语。”

依据以上的事实，国民政府虽然被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称为赤色的政府，然而他的确是一个爱国政府，因为他不肯出卖国家换得各国承认。

我们再看反赤政府的对外态度是怎样呢？东方社十二月二

十八日北京电："张作霖拟令安国军吴外交处长向外交团表示下列各项意见：(一) 组织巩固之政府；(二)外交取渐进主义；(三)遵守(不平等) 条约规定之效力……；(四) 承认对外债务；(五)反对赤化；(六) 禁止反帝国主义运动及罢工宣传；(七) 知赤化为全世界之公敌，请列国援助对赤之安国军。"张作霖这种对外露骨的表示，本是自从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一直到曹锟、段祺瑞这一系卖国贼卖国求援的传统政策，与其说他是军阀政府、安国政府或反赤政府，不如说他是"经纪政府"，他的任务是出买国家于帝国主义者之经纪。

把两个政府比较一下，人民选择那一个？承认赤的国民政府呢，还是承认反赤的经纪政府？国民政府虽然是赤的，然而他不肯因为要取得各国承认而抛弃收回关税、法权和废约等口号而卖国；经纪政府虽然是反赤的，然而他公然请求列国援助他的安国军，他遂不惜公然向东交民巷摇尾乞怜的包办保护不平等条约，包办禁止人民反帝国主义运动，这分明是卖国，绝对不是安国。人民选择那一个政府呢？

英、日两帝国主义者此时对中国的政策、乃是日本人所谓"两刀政策"，即是一面和缓南方政府，一面援助北方军阀。他们这种两刀政策中所包含的南北分裂意义，我们当然要反对。可是他们这种和缓南方政府的政策，已因南方政府不肯抛弃关税、法权、废约等口号而无结果；同时北方经纪政府高高挂起承揽包庇不平等条约和包办禁止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老招牌，正和蓝浦生所谓"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的货色相投合；如此一来，帝国主义者也许要抛弃其两刀政策，仍旧采用一刀政策，仍旧极力援助北方的经纪政府向国民政府进攻。他们这种一刀政策也许成

功，也许和以前援助柯尔恰克，援助但尼金，援助乌兰格尔，援助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同样的失败。

国民政府若因帝国主义者援助北方的经纪政府之进攻而失败，人民应该懂得这并不是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之错误；人民应该感激国民政府是因为不肯学经纪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人民利益以换得各国之承认与援助而失败。

不平等条约不废除，关税不能自主，法权不收回，各国驻华海陆军不撤退，中国还成个什么国家，一切政治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那里会有一点希望?!爱国的国民政府，正因为不忍拿这些足致中国死命的让步而失去各国之承认与援助，中国人民便应该起来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如果失败，全国统一在经纪政府之下，这不仅仅是什么国民政府自身的失败或国民党的失败，乃是中国全民族的失败！在军事上，在财政上，国民政府都正在很困难的境地，爱国的国民政府既不忍负人民，人民便不应该负国民政府呵！

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并不是空口说白话，急须与以军事的财政的援助。军事的援助应该：(一)青年们喊出"到革命军中去"的口号；(二) 城市及乡村人民都尽可能武装起来，铲除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以绝革命军后顾之忧；(三)有组织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群众发起大规模的"革命兵士慰劳捐"，募集大宗的金钱与用品，分配给革命的兵士，以助军需而壮士气。财政的援助应该：(一)在克服张作霖打倒经纪政府的战争中，我们不要拿地方利益来摇动国民政府中央的财政计划，我们要尽可能的为供给军事需要而牺牲(政府方面尤其是军事当局，当然不应说这样违反民主主义的横话。)；(二)关于赋税之负担，不应该

拿对待军阀政府的旧观念对待国民政府，即是只宜积极的监察用途，反对政府滥费，反对贪官污吏之中饱，而不宜消极的根本反对增加负担，尤其在克服反革命的战争中，更不能不忍痛增加负担。只广东一省人民已为北伐负担了五千万元，然而吴佩孚的兵队若到了广东，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当然和十室十空的河南一样；张宗昌一到江苏，便要人民负担一千万元的军用票，每月由孙传芳付他的六十万元还在外；所以为革命战争而增加负担，乃是一般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所必须忍受的痛苦。

人民如果认识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经纪政府有所不同，即应起而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拥兵五十余万的柯尔恰克，拥兵百万的但尼金，都曾得到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的援助，然而苏俄政府终以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而战胜，张作霖的力量还远不及柯尔恰克与但尼金，国民政府若能努力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当然可以打倒张作霖及其经纪政府，到那时，各国承认不承认，便不成什么问题。我所以说"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可是国民政府要想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也不是空口说白话可以办到的，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必须使人民知道不是为政府或个人挥霍而增加人民负担，然后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承认与援助。

1927年1月11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二期　署名：独秀

谁杀了谁?

英国兵在中国杀人已成了家常便饭！前年在上海杀人，在广州杀人，去年在万县杀人，今年才开始又在汉口杀人，在九江杀人了！并且他们杀人，不是由于群众的暴动与误杀，乃是由他们国家的巡捕头司令官故意下令开放枪炮轰杀的！即依据他们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平等条约，不知何约载有“即非两国开战时英国的军警长官有任意下令开放枪炮轰杀中国市民的权利”这样的条文？

汉口的英租界“一三”事变，九江英租界“一六”事变，都分明是英国兵杀了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杀了英国兵，英国兵在九江杀中国人的时候，英国兵舰还从旁发炮示威，这是何等横暴的事变，然而伦敦的英国报纸竟称赞英国水兵能够忍耐，上海、天津的英国报纸竟大叫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了危险，英国政府竟大派其炮舰来中国示威，英国驻华参赞竟到汉口拟向国民政府要求英国人生命财产的保障，反了反了，这竟和寻常刑事冤案一样：杀人凶犯无罪而尸主反来有罪了，真是反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需造一句谣言，上海的《时事新报》向来是不赞助国民政府与民众暴动的，现在只要看十一日该报的汉口通信和九江通信，便知道此次事变的真相了。兹照录该报通信于下：

“汉口事件”之原原本本

汉口英国水兵以刺刀刺杀华人多名一案，略情已见本报，现已成中英间之轩然大波，兹再纪其详情于下：

▲肇祸之真相　十六年一月一日二日三日，为武汉各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之期，党部及中央政治学校宣传员，为使各界明瞭庆祝意义，特组织演讲队到各重要地方演讲。前日（三日）下午三时，有宣传数人在一码头江汉关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场演讲，听众颇多，宣传队派有专人照顾，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当局认此为挑衅机会，急调大批武装水兵登岸，挖掘战壕，架机关枪十余架，俨然向赤手空拳之听讲民众，取作战之形势。听讲民众，训练有素，不为所动，英兵乃蜂拥上前，实行驱逐。群众知其有意挑衅，乃向华界退却，英兵复大队冲入华界，将刺刀向人群中乱戳，当将海员工会会员某腹部洞穿，立时毙命，又有码头工会会员李大生腹被刺，大肠随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市民方汉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险，其余商工各界听众被刺刀枪托杀伤打伤手足及面部者，总计在三十人以上。群众睹此惨状，异常愤激，无不愿以赤手空拳与英水兵决一死战，其时幸经国民政府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李国暄、宛希俨，汉口市公安局长张笃伦等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力劝民众暂忍一时之气，免受更大牺牲，群众深为谅解，渐次散去，一幕惨剧，始告终局云。

▲公安局之报告　为呈报事，昨日下午二时，据职局警察第六署长戴维夏电话报称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一码头中

英交界地方演讲，民众聚集静听，秩序井然，乃英人无故调多数水兵登陆，密排武器示威，并干涉演讲，听讲民众，置之不理，讵英兵胆敢以刺刀杀伤数人，徒手民众，因无力抵抗，请派警保护等语。局长比即派督察长饶仁华率领保安队驰往救护，并由电话通知武汉卫戍司令部及前敌总指挥部，速派队前往，协同维护。旋据第六署署长戴维夏呈报，英兵以刺刀刺伤民众祝香山、方汉山、李大生等，并呈缴英兵马枪一枝，上冠刺刀，血迹甚多，随带同王庚书及受伤人祝香山到局；询据王庚书供称，适才经过该地一见英兵持枪刺伤数人，经众将枪夺下等语；复据保安队队长段海山侦缉队队长李清澄报称，英兵又刺伤张义贵、明宿生等前来；局长并亲履该地与英人交涉，撤退英兵，令勿开枪激变，并劝导民众，静候政府处理，幸双方允可，局长以事关外交，即亲赴南洋公司联席会议，报告经过情形；去后，接据督察长饶仁华报称，局长离开该地后，英兵又刺伤一人，不知姓名各等情；据此查此次英兵无故登陆，刺杀民众，幸未酿成巨变，嗣经局长交涉妥后，复以刺刀伤人，实属野蛮已极，除将枪刀存局待缴外，理合将英兵肇事情形，及已查明之受伤民众姓名，结单呈祈鉴核，恳向英领严重交涉，以重国权，而张公道。谨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

▲各界紧急会议　　惨案发生之后，武汉各界民众，悲愤异常，当晚即各分途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付，汉口特别市党部为集中各方意见，更于前晚发出十万火急通告，召集武汉农、工、商、学各团体代表，于昨午十一时在汉口总商会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于是各界代表到者极力踊跃，计有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全省商联会，汉口武昌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全省总工

会，全省农民协会，全省学联会，全省妇女协会，汉口学联会，汉口妇女协会等二百余团体，代表五百余人，十一时三十分开会，由市党部代表李国暄主席，秦君侠记录。兹将其议决之重要事项，条列如下：（一）向政府之具体要求，代表大会一致议决，对于此次惨案，决要求政府向英领事提出八个条件，限英领事于七十二小时以内答复。一、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英政府须负赔偿此次同胞死伤之损失。三、英政府须立将肇祸凶手交中央政府依法惩办。四、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五、英政府须向国民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之绝对自由。七、英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八、英租界须由中政府派军警管理。以上八条件，如英领事在七十二小时内无圆满答复，则请政府正式通知英领事，以后如再有何种不幸之事发生，应由英国政府完全负责，同时代表大会为求避免以后再有此类惨案发生，更须要求政府自动办理下列各项：（一）立即收回英国租界。（二）立即收回海关。（三）立即取消英轮在中国之内地航行权。（四）立即撤销英人在华领事裁判权。（五）如英领事对于国民政府所提之条件不能接受时，民众决自动封锁英租界，实行对英总罢工。（六）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由总商会通告，严禁买卖英货。（七）五日下午二时在济生三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讨论对英办法。（八）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惨案真相。（九）组织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当推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总工会，全省商联会，汉口总商会，武昌总商会，省农协会，省学联会，省妇女协会，汉商协会，汉阳商会各团联合会，律师公会，新闻界联合会，农工商学联合会等十五团体代表为委员，并即推此十五团体

代表，立刻将联席会向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口头向政府陈述，以备采纳，旋即散会。

▲当局之办法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自接得各方关于此次惨案之报告后，异常愤激，当于前晚发出紧急公告，宣示民众，原文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闻英水兵行凶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杀，数人被伤，政府同人，不胜愤激，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当可决定方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惨剧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于一月四日下午七时在新市场正式宣布，特此公告。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昨日下午七时，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等复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于此次惨案之态度和办法，大致略谓，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昨晚开会时，对于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之八项条件，决定全部接收，且有先已由外交部分别进行者，故此次之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同时昨晚会议中决定令卫戍司令部派精良军队入驻英界，维持秩序，保护安全，此项命令，已于昨晚实行，最后并勉励民众整齐步骤，维持秩序，共争最后之胜利云云。

新市场大会散后，政府委员又召集各团体代表在南洋大楼开联席会，徐谦主席，由外交部秘书吴之椿，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先后报告交涉经过及派兵驻防英界情形，大致可分二点：(一)外交部对于此案，前晚即已提出口头抗议，限其立刻撤退水兵及义

勇队，英领旋于今晨答复，完全照办，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界。(二)昨日政府已派军队三连入英界，驻英巡捕房后堆栈内，今日决再加派一连前往，营长一人，党代表(陈群)一人，驻英捕房办公。所有在英界之中国兵士，均受党代表之指挥，党代表则受外交部之指挥云。(一月五日)"

"九江工人与英兵冲突记

枪伤工人一名

外舰发炮示威

国闻社九江通信云：记者本日由南昌赴九江，至九江已钟鸣四下，街市商店，完全关闭，行人往来，如怒潮汹涌，兵士皆荷枪实弹，巡逻綦严。记者睹此情况，甚为惊讶，及过租界，见栅栏门已封锁，门外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心知系与租界发生交涉。在旅馆安顿行李后，特出外访询，得悉在一小时前，有一工人，为外人用手枪击伤，工人群起救护，遂与外兵冲突，外舰从旁发炮示威，共发二响，因未实弹，尚未演成若何惨剧。驻浔军警，闻风一齐出队弹压，商民亦大动公愤，相与罢市，以谋应付。九江军政当局，除向外领提出抗议外，并电南昌国民军总司令部，严重交涉。(一月六日)

七日九江续信云：九江工人，被外兵击伤，兹经确实调查受伤工人，为伍宜山，已送医院医治，因当时情形混乱究竟此外有无死伤，尚无从明晰。"

又十一日上海《商报》载国闻社汉口通信云：查一三案之受伤者之姓名籍贯伤情如下："李大生，鄂城人，年三十二岁，现充

吉田洋行打包工，腹伤甚重，因肠出，已经天主堂剖诊；明宿庭，住济生堂后，肠出，入医院，苦力；祝香山，孝感人，住三新街，头伤；张义贵，黄冈人，住三新街，头伤；方汉三，黄陂人，年十岁，头伤。

此次汉口九江事变中，被英国兵杀伤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明明白白的有：

海员某

李大生

方汉山（即方汉三）

张义贵

明宿生（即明宿庭）

祝香山

不知姓名一人

伍宜山

等八人，而英人被杀伤的是谁？究竟是谁杀了谁？究竟是谁人的生命受了危险？中国人因杀了两个外国教师而失去胶州湾、青岛，现在英国人因杀伤了八个中国市民而退还本应该退还的汉口、九江英租界，丝毫不足为奇。若是中国人在汉口、九江杀伤了八个英国人，试问英国是怎样的态度？或者英国人要说：你们中国人是贱种，杀伤几个不算什么。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英国在此次事变前后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在事变前，驻北京英代办的提案，表面上似乎是采取和缓政策，其实是一面以二五附加税根本拒绝中国收回海关，一面以二五附加税的百分之八十供给张、孙两军阀对南战争。我们复不能忘记

在一三惨杀案一周前的"团风事件",即是英国亚细亚商轮"福光号"在团风地方故意撞沉华轮"神电号",淹死四百多人;此案交涉尚无结果,又故意在武汉市民庆祝国民政府迁移的盛典中,施行屠杀,这就是英国承认国民政府之表示。

"一三"惨案以后英国的态度是:(一)运动法、美、日本各帝国主义者一致对待中国;(二)大调军舰到汉口示威(见前文摘录《大陆报》所载消息);(三)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布告,禁止一切含有政治性质之集会游行讲演。

帝国主义者一向把租界当做他们的领土,是不轻易放弃的。他们在租界内剥夺中国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戕害中国人的生命,一向任意行之;租界一天不收回,驻华海陆军一天不撤退,中国人被屠杀的事是不能免的。

上海五卅惨案,不是上海人一部分的事;广州沙基惨杀案,不是广东人一部分的事;万县惨案,不是四川人一部分的事,现在的汉口、九江惨杀案,也不是汉口人九江人一部分的事;从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全民族的暴行与侮辱,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对英反抗,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男女老幼一律不为英人服役做工,非到收回英租界,永远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收回海关不止!

1927年1月1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三期　署名:独秀

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

今天（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是列宁逝世之第三周年，在这第三周年纪念中，令我们回想到“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这句话是列宁所作一篇短文的题目，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中看起来，非常有意义；列宁自己也曾说：“在这题目的几个字里却含有苦的真理”。

列宁在这篇短文里说：“在文明的先进的欧洲，有极发展的技术，有极丰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宪法；现在却到了一种历史的时期，使资产阶级因惧怕那渐渐增长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不得不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停滞不前进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停滞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以保存那动摇不定的雇佣奴隶制度。在先进的欧洲，是拥护一切落后的东西的资产阶级在那里横行。……也许还可以举一个比较显著的例来证明欧洲资产阶级之腐败，如为了财政的分割及资本家利益的关系，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亚洲各处现在都发生了德谟克拉西运动，并且日见扩大，日见巩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与人民携手去反抗黑暗势力。”

列宁的意思是说欧洲本来是先进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在以前反抗封建贵族做德谟克拉西运动的时候也是革命的，可是现

在他们因为对内要压迫无产阶级之兴起，对外要剥削殖民地，便不惜联合国内外封建的黑暗势力而反革命，而落后了；亚洲本来是落后的，可是现在他们居然能够起来做德谟克拉西运动，而反抗封建的黑暗势力，而革命，而先进了。

列宁这篇短文，做在去今十四年，即一九一三年五月，正是民国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四月二千五百万镑英金大借款成立之后，列宁此文中所称"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正是指英、俄、德、法、日五个帝国主义的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压迫国民党这件事。

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眼见法西斯的组织遍于欧洲各国，而且在好几个国家取得了政权，眼见欧洲各国的人在中国收买或暗示一切反动分子做反赤运动，眼见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力助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黑暗势力向国民政府国民军进攻，眼见英国兵在上海、在广州、在万县、在汉口、在九江继续不断的屠杀中国市民；同时也眼见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及革命的军队均百折不回的向黑暗势力反抗，全国中德谟克拉西运动的高潮，比之十四年前，更是扩大而巩固，列宁不但更要自信"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是对的，而且要喊出"黑暗的欧洲与革命的中国"了。

"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中国！"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必然这样欢呼。可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在革命的中国，是否也会走到一种历史的时期，使革命势力中一班有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意识者，一方面因惧怕工农阶级及其政党的势力渐渐增长，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势力投机分子和平空气所诱惑，遂至回头和国内外黑暗、反动、右倾、一切不前进的势

力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工农群众进攻，在赤的营垒内响应外面的反赤运动，以回复到不革命的中国，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国？

这一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回答，因为两方面都有可能。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已经显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势：（一）武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合，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当然说不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政府），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二）武力与反革命的大商、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结合，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在经济上输入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第一个趋势将以完成革命的中国，第二个趋势将以造成反革命的中国。依照国民政府的现状及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前进，则可实现前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若把右派的势力与友谊看得比党纲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还宝重，若把工农势力看得比右派势力更可虑，若不能断然制止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上海大会一贯到底的右派思想与政策在党内日渐得势，这些党内的右派势力，会和党外的一切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联结起来，危害革命之前进，而实现后者。

冯自由、马素、彭养光等所领导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自始即反对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三个革命政策，安福政府称他们为稳健派，打算牢笼他们以消灭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幸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很一致的坚决的和这班右派决裂，才保存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虽然中山先生逝世了。从西山会议到上海大会，这些右派在组织上虽然不和同志俱乐部是一事，在思想上却接受了他们的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三个政策。左

派领袖们对于西山会议、上海大会的右派行动虽然不赞成，虽然说他们是反革命的，至少也说他们是不革命的，虽然尤其反对他们单另组织是叛党；然而一部分人却已渐渐接受了西山会议、上海大会的思想和政策：以为不联俄也可以革命；以为反共反赤不是反国民党；以为西山会议分子究竟比共派还是真国民党，究竟是一家人，宁可联合他们以反共；限制工农运动的呼声也渐渐到处都听见；因此我们可以说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上海大会这些右派分子在组织的运动上虽然失败了，在思想和政策的运动上却是胜利了。国民党左派或者还未曾感觉着这样，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却已经感觉着了：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国民党稳健派得势，于我们并无什么危险。"奉系军阀和安福系都说："国民党倘能排除赤的分子，孙文主义可以容纳。"又说："与俄断绝关系，鲍罗庭以下均须放逐，蒋介石倘能接受此警告，当与其妥协提携，商讨对内对外政策。"又说："对党军只反对俄化，此外可商。"上海的买办阶级说："国民党虽讨厌，然可作为反对共产党之用。"国民党领袖们将如何选择？接受国内外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的提议呢，还是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

我想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不忍忘记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当时段祺瑞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姚震也对东方社记者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

当时日本的报纸也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现在，国民党很危险的试验时期又到了！所谓稳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以来，稳健派这个佳名，即是反对革命者之称），即是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之右倾分子，是否占多数于国民党，是否不受敌人软化而与之握手提携？这不独是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所关，并且中国革命前途是否会因此中遭顿挫！

或者有人说，我们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我们仍然要革命：我们反俄，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反共，同时也反对黑暗反动势力；我们反工农运动，同时也反对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及万恶的资本家。这本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的老调，我们听惯了这一片欺人的鬼话，谁也不能相信。即令他们不是欺人的话而真是这样想，也是一个大笑话，试问有没有不分敌军友军一概用机关枪扫射这样滑稽的革命战术？并且在事实上，反俄即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共即是帮助了黑暗反动势力；反工农运动即是帮助了官僚、买办、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

中国社会，现在只有两种对抗的大势力：一方面是革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资产阶级乃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并且他们的力量和政治觉悟都还太弱，只能拉他们倾向革命，不能算在革命的势力之内（即最发展的上海资产阶级，一遇孙传芳的压迫，马上通告各界，声明"其向抱宗旨，除关于商业切身利害外，其他各个言论概不预闻"，并且大登其"不与闻政治"的广告。有人询问蒋梦麟先生：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挺身参加革命争取政权？梦麟先生说：

"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太弱，任何势力能够统一中国不妨害他们的发展，他们都赞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是君主立宪。"梦麟先生这几句话，描写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深刻）。在这样状况之下，国民党右派若反对工农运动，其结果势必走到官僚、买办、地主、劣绅那边去；若当真对两边一齐反对，他自己便悬在空中，有何出路？

负有中国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所留给中国一个至可宝贵的遗产。中山先生临终致苏俄遗书说："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我们希望每个国民党同志，都要谨守中山先生的遗训，继续中山先生未竟之业，造成革命的中国，先进的中国；切勿效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结合一切黑暗反动势力，使中国仍旧是不革命的中国，落后的中国！

在今天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纪念中，自然令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逝世第二周年也快到了；也自然令我们回想到列宁和中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之遗言。

1977年1月21日《向导》周报》第一八四期　署名：独秀

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进攻政策

自前年“五卅”事变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他们自己屡屡单独的屠杀中国人，越屠杀越引起中国人的民族运动，他们便感觉着自己单独的屠杀中国人还不够，并且不便，于是极力鼓吹各国一致对华政策。不过屡次事变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单独屠杀中国人这些太明白的事实，不能够引起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一致的愤怒。并且各帝国主义者不愿意专为英国效劳而引起中国民族感情对他们自己的损失，于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到了万县屠杀事起，英海军的举动过于横暴了，帝国主义的英国内部在野党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并且想利用这个机会攻倒敌党内阁，于是陷于孤立地位的英国帝国主义内最反动的保守党内阁，复陷于孤立地位。“一·三”汉口屠杀事件发生，孤立的保守党内阁异常恐慌，乃采取很巧妙的策略：一面退让，使国民政府为他们暂时看守租界；一面到处大声呼号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在华各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想藉此造成第二次庚子（一九〇〇年）联军对华的局面，以挽救其孤立地位。

可是，帝国主义的英国反动的保守党政府，这种巧妙的政策，并未十分成功。因为被屠杀的只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或其他国的人，杀人的仍旧是单独的英国，中国人的愤怒也仍旧集中在对英，美、法、日本虽然共同遣派海军防卫各帝国主义在华的

最后根据地——上海，而一般举动尚是慎重观望的态度，只是各国自保其在华权利，而不肯为英国特别效劳。尤其是日本，为了二五附加税问题，且和英国公然反目。

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极力鼓吹的各国一致对华政策仍然未能十分成功，其最近政策乃是：一面用硬的方法，大派海陆军来中国示威，又以二五附加税助张作霖、孙传芳向南进攻；一面用软的方法，诱惑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向他软化，以阻挠急进派的革命运动。

路透社十八日北京电很高兴的说："奉队兵众械利，……奉军自称，如实行进攻，一月内可复汉口。"

上海《新闻报》十九日伦敦电："英政府派遣海陆战兵一千名，乘舰名徐伦特，于一星期内开往中国。"

路透社十八日伦敦电："英公司船基芳斯号与基杜南号两艘，泊于桑浦顿已有数月，现从事布置，以便早日运兵往中国，闻基杜南号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开行，基芳斯号二十九日出发。"

路透社十八日玛尔太电："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将由波益尔少将统带驶往上海。"

路透社十八日伦敦电："英国查桑濮莱茅及朴资茅之水兵一千人，已奉训令准备开往远东，大约一星期内可出发。十九日由玛尔太出发赴华之巡视，为佛罗比摄号、德里号、丹尼号、龙号四艘，其任务亦在保护英人在长江之权利。"

路透社十九日玛尔太电："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今晨开往上海，港内英舰均向欢送，舰中兵士欢呼不已。"

路透社二十日玛尔太电："医院船梅恩号，二十日左右偕炮船阿菲斯号、莱台葆特号赴华，将由驱逐舰华特勤号、华尔夫林

导护送。”

路透社二十日伦敦电：“英船梅根狄克号现泊于利物浦，从事布置，以便改作装运水兵前往中国之运兵船。”

以上是英帝国主义者硬的进攻。

上海《字林报》说：“国民党内有温和派与极端派，是公开的事。极端派甚慊温和派掌握政府大权。……国民党中究将何派占胜利，关系于外人对于国民政府之态度，实在不小。”

英国某报说：“英人在汉口采行温和政策，此事固丧失可发生恨畏之威严，但也在国民党稳健分子中增进英人之声望。”

伦敦《每日电闻报》说：“显明之真相，为南政府已放出非其力量所能制之魔鬼，但可欣幸者，英政府现似已看透此中事矣。”

《晨邮报》说：“国民党受莫斯科之操纵，……英国在列强中最无侵略中国土地之野心，俄国现驱粤人反抗英国，实欲置中国于其势力管辖之下。”

伦敦《泰晤士报》说：“英政府在汉口所取极和婉之态度，当可使粤政府表示其是否果真代表中国人士之思想，抑或别有他种势力为主动。”又说：“目下仍切望中国国家主义之代表能善用其智慧，乘机表示其政才，其选择全在彼等之手。”

路透社二十日汉口电说：“消息灵通各界既信陈友仁亦知排外风潮所酿成之局面，殊形危险，但无力与急进国民党为抗。陈虽屡图以外交手腕修正条约，而若辈则欲用激烈手段。”

以上是英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

我们怎样抵御他的进攻呢？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并未打算现在即与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更不主张加害于任何外国的或个人私人机关（商店、工厂、教堂、医院、学校等），我们所反

抗的，只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制度及行为与其陆海军警察对于我们民众或个人之暴行。但今后无论何时，无论是何国陆海军或英国新派来之水兵，如果以枪炮屠杀吾人，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政府军队固不容袖手旁观，即徒手的民众亦不辞与之血肉相搏，以力争吾人之生存与自由。至于帝国主义的工具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等势力，乃是国民革命初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完全解除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的武装，也就是解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雇佣的间接武装。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比硬的进攻更加厉害。可是国民党中最稳健最温和的分子如冯自由、马素、马君武等，早已被排除在国民党之外，已成为安国政府中的人物，现时国民党中即有比较稳健温和的分子，亦不出卖祖国于帝国主义者，至少亦不忍受中山先生素所愤恨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之软化，即令有少数分子如此，亦必不为党员群众所姑容。软化国民党中稳健温和分子之企图，香港政府对广东曾屡试屡败，我们希望国民党的领袖们和国民党党员群众，现时仍须十分警戒，庶几使英国帝国主义者最近软的进攻仍归失败！

1927年1月2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五期　署名：独秀

谁践踏了谁？

——斥麦克唐纳

自汉口"一三"屠杀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反而大做其中国人加害于英人及各国人的生命财产之宣传，怎奈是英国水兵杀伤中国人的事实太明显了，美、法、日本各帝国主义的政府虽然取了共同防卫的态度，尚未完全接受英国的提议，象一九〇〇年一样对中国共同宣战；至于他们的舆论：美国的波拉，英国的孟却斯特派，都仍旧相当的表同情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英国的自由党，亦尚未积极的做反中国的宣传，惟有工人阶级的叛徒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首领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尔，竟露出他的真面目，和保守党取了一致的态度。据路透社十五日伦敦电，工党机关报《前进报》载前相麦克唐纳尔论汉口案一文，略谓：

"此次外交家与水兵均能自制，得免偾事，令人极深钦佩。夫租界为前中国政府许吾人管理，我民托庇于条约所予之安全，乔寓其地，当局若悄然退出，实无理可原。吾人当结一约，谈判之际，宜取保安之寻常戒备。余意往事应加清理，盖时代已不同也。惟清理若听暴众为之，既无益于中国，亦无益于吾人；果尔，则冲突必难幸免，而吾人不能任咎。国民政府任令群众聚集汉口英租界之边界，难辞厥

责、显而易见。余固主张租界应归中政府管理，惟群众激昂，是否即为此故？如为此故，曷为法、日租界皆安然无事？况英人退出租界后，界内墙上所贴之标语，非表示中国国民主义，直为仇英而已。吾人其被许和平清理乎？抑此践踏独施于吾人？余用和平二字，窃余望广州外交总长能善用之也云云。”

世界的大工贼麦克唐纳尔，他居然对屠杀中国市民的英国水兵表示极深钦佩！他居然拥护帝国主义者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管理租界！他居然咀咒中国为民族自由而奋斗的民众为暴众！他居然斥责国民政府任令中国民众在中国地方集会之自由！他以为群众激昂只是仇英，而不是为了租界问题，不然何以日、法租界都安然无事；他装着好象不知道“一三”事件杀伤中国人的只有英国水兵而没有日、法等国人这个事实！他和全英国资产阶级的论调一样，以为租界可归中政府管理，但须用和平方法，这完全是欺骗手段。民国以来的外交那一时那一事不和平，而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在巴黎和会，在华盛顿会议，在国际联盟，北京政府代表那一次不是和平的提议与哀求，中国得到了什么？五卅运动前，各帝国主义者，对于他们自己在华盛顿会议中关于中国关税问题之(二)(三)两条决定(即是：“于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四个月以内，在上海组织改订委员会，决定实行照现行进口税率实行值百抽五，征收附税百分之二·五及奢侈品百分之五。”)，忘记了没有？五卅后在北京召集的关税会议，是十分和平的，有了丝毫结果没有？前年在上海在广州屠杀中国人的凶手是英国人，去年在万县屠杀中国人的凶手也是英国人，此次“一三”汉口事变以来，也并没有一个英国人被杀伤，而中国人被

英国水兵杀伤的、前几天我们知道有：

海员某

李大生

方汉山（即方汉三）

张义贵

明宿生（明宿廷）

祝香山

不知姓名者一人

伍宜山

等八人；现在我们又知道还有：

夏兴发

韩奇生

萧中有

李海山

叶泽昆

许士希

朱太平

等七人；并且十一日晚，又有英舰两只，开足马力，并驾上驶，在武穴浪沉货船数百只，溺毙商民无算。这样看来，到底是谁践踏了谁？

大工贼麦克唐纳尔，一面口头上说他也主张租界应归中政府管理，可是要和平清理，即是主张被压迫的民族不应该对压迫者起反抗；一面却坚决的拥护帝国主义者的条约租界等权利，为拥护这些权利，他却很不和平的主张冲突；这分明是欺骗政策！

这班工人阶级的叛徒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首领，在欧洲一向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现在他们又用同样的欺骗政策，帮助资本帝国主义者欺骗东方被压迫的民族。改良主义者在欧洲对工人说：你们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资产阶级协作，可以达到你们生活改良之目的；其结果，和缓了工人的革命运动，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权，被欺骗的工人阶级所得到的，不是生活改良，而只是加时减资饥寒与失业。同时，改良主义者对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也是说：你们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统治者协作，他们可以帮助你们得到知识、幸福与自由；其结果，和缓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巩固了资本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权，被欺骗的东方民族所得到的，不是知识、幸福与自由，而只是无产、穷困、侮辱与屠杀。

这班巧于欺骗的改良主义者，常常巧于利用各种不同的口号与理论，以达他们唯一目的——拥护反革命与反对革命。当欧战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府争夺殖民地时，改良主义者便帮着资产阶级大喊其“保卫祖国”、“为民族利益而战”等口号，把国际主义抛在九霄云外；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发生时，例如五卅运动时，中国人要求各国人士援助，德国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却回答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不能赞助你们的民族运动。”

欺骗工人阶级的麦克唐纳尔，他就是这班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用和平这一口号欺骗工人阶级和欺骗东方民族，这本是他们出力报效资产阶级同一作用之二方面。当一九二四年麦克唐纳尔及其党徒掌握英国政权之时，他们的殖民大臣汤姆斯（亦第二国际派首领之一）曾向各殖民地代表演说：“请各销

除阶级战争，勿发阶级议论。"同时，他们拒绝埃及和印度民族解放的要求，他们任令香港政府公然帮助商团背叛广州政府，任令英公使公然训令英领事致哀的美敦书于广州政府，声称如果政府攻击商团时，英军舰就要炮击广州；他们对待工人阶级和东方民族的政策，和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保守党内阁没有两样。

现在，麦克唐纳尔对于汉口"一三"屠杀事件的态度，仍旧和保守党没有两样，这本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之本色。因此，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党人，都应该懂得反对阶级争斗、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是什么东西了；应该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级争斗与民族争斗、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了；应该懂得民族革命的好友是革命的第三国际而不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了！

1927年1月2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张宗昌的三不知

山东直隶人都说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他自己的兵有多少；二不知他自己的钱有多少；三不知他自己的小老婆有多少。我以为张宗昌未必这样糊涂，张宗昌的三不知应该是：一不知他的兵只能威逼老百姓而不能打战；二不知他的钱多用在嫖赌而不用在军饷之危险；三不知道他的小老婆那几十个是买来的，那几十个是抢来的。

放屁狗的《甲寅》

章士钊拿黄兴的钱办的《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段祺瑞的钱办的《甲寅》，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张宗昌的钱办的《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张宗昌在天津赌赢了二十万元，本拟照例赏给侑酒的妓女，薛大可伸手接去，说是拿去和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甲寅》有这样多的经费，所以能够送人看不卖钱。拿张宗昌赏妓女的钱办《甲寅》，这《甲寅》要比放屁狗还下流！可是，薛、章二人拿这笔赏钱全部

用在《甲寅》上面还算好，倘若拿若干给他们的夫人用了，那便如何对得起他们的夫人！？然而张宗昌或者很高兴这样！

优伶也赤化了吗？

上海《新闻报》二十日天津电："沪伶刘汉臣、高三奎自京拘押来津，昨晨枪决，罪状系宣传赤化。"优伶也赤化了吗？赤化势力真是无处不到了！恐怕未必罢？或者是因为优伶们着了红衣，涂了红脸罢！

妙哉圣道会！

以前看见报上载有什么圣道会为奉军报捷通电，我以为是一向反对冯军的天主教所做的；最近才知道这个圣道会乃是奉军所设的宣传机关，并且还知道张作霖有函聘章太炎张天师到天津主持圣道会这件事。妙哉圣道会，若再加上白喇嘛，便是三教同归，毛椎盂钵掌心雷一齐活动起来，真个是不可言妙而妙不可言哩！

1927年1月2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五期　署名：实

革命与民众

邓演达君说："此时只是军事的胜利，尚未达到政治的胜利。"孙科君说："从前的军队不能够与民众结合，不能够为民众的武力，所以会失败。……革命的势力就是民众，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看来，须要使农工及其他各界的民众完全了解革命的意义，然后国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这些真是革命领袖的说话！

怎样才是政治的胜利？必须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起而拥护此胜利，帮助革命党革命军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拥护此革命政权，这才是革命党之政治的胜利，并不是单靠军事的胜利，赶走敌人，占住政治机关，革命党做了官，便算政治的胜利。

怎样才能够使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不是什么空口宣传主义可以收效的。民众所认识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问题，离开他们的切身问题，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们相信；反之不兑现支票式的宣传，会使他们发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给他们以切身的利益，他们才真能了解革命于他们有利益，他们才真能自动的为拥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拥护革命，不是为革命而拥护革命，更不是为革命党而拥护革命。

革命党是革命的民众之最急进的先锋，有时自不得不指导

民众，革命的民众也自然有受革命党指导的必要，也自然有为革命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们革命党侈然自大的向民众说：尔等民众须受本党的指挥，由本党管理，尔等民众须为我们的革命牺牲你们的利益，则民众将不明白我们想干什么。拿这样的态度对待民众，如何能够得到民众！

至于有一班人，终日坐在书斋里，永远不肯屈尊到民众中去而与民众为伍，不懂得民众的疾苦是些什么，反而大喊“工会是流氓”、“农会里有土匪”、“我们党人是坐轿的农民是抬轿的”这类怪话。这样的大人先生们如果想得到民众，更是等于想坐火车到日本去。

就是能够屈尊接近民众的人们，若是用得着时便极力拉拢民众，用不着时便说一声再会；或者是以为对民众的态度在朝时应和在野的不同；这种人虽然能欺骗民众于一时，到了他们的真面目显露于民众之前，自然要失去民众，并且永远失去民众，因为民众只能够被欺骗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义者，对于实际所许可的固然不肯轻让一步，同时对于实际所不许可的也不愿意乱进一步，民众若有时超过实际可能的幻想，领导民众的革命党便应该努力向民众解释，领导他们从幻想的迷途与危险阵地到能够实际争斗的战场，民众所需要的是这样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能争善战的先锋，而不是跟着民众后面乱跑的尾巴主义者。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分在野在朝，对民众应该取这样真诚的态度，并不是在野时便可以故意向左一点，任意发生些不负责任的支票以取悦民众；一旦在朝便向右转，另摆出一副面孔，以前发出的支票一概不兑现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党应该始终以民众的真实利

益为前提，万分不应该以自己在朝在野为前提，致前后易其态度，或者是一个党分在朝在野两样态度，一个党前后两样态度或同时两样态度，无非都是欺骗民众，欺骗民众者终于不能得到民众。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须行点什么仁政，况在现今民主主义时代，想得到民众，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须屈尊到民众中去（不可坐在书斋里骂工会是流氓、农民是土匪）；第二须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不可疑惧民众运动的高潮会危害他的政权）；第三须始终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态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现成的武力；可是现成的武力若不与民众结合，不得到民众的拥护，也不能够成功一种革命的武力，并且这种离开民众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会成就革命，即或勉强一时获得军事的胜利，也终于不能保此胜利。所以，"武力与民众结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给我们不可磨灭的革命铁律！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国民军的军队实力强过北伐军，然而前者因为是单独的军事行动在北方失败了，后者因有南方广大的民众运动为声援，帝国主义者至今不敢轻于直接压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国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军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国的革命给了工人农民的政权，给了工人农民的土地与自由，因此得了工农广大的民众之拥护与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不但得了军事的胜利，而且达到了政治的胜利，因此才能够保住了革命的胜利以至于今。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农民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会有什么作用，即当时全国上等绅商所奔走呼号的权利收回

（铁路、矿山等），革命党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权利以免多自树敌"的理论之下忽视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权"，右派党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说他发疯了；因此，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看清了孤军独战的革命党没有一点民众的后援，他们才敢于乘虚进攻，一面拿金钱官位软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党中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一面以"和平"、"统一"等口号束缚了革命党一切活动，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根本取消革命党的组织，其结果革命军队和国民党一概被袁世凯解散了，辛亥革命的军事胜利成了南柯一梦！

现在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是怎样？北伐军确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教训而获得胜利了。可是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九江、南昌的军事胜利以后，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渐渐有了一点危险倾向。

我们还未曾听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压迫民众的举动，除了广东；我们并且知道革命政府现在还做了些帮助民众运动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时，反工农运动之声，到处都可以听到，尤其是在一些军事当局中和财政当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说，因为反工农运动本是他们的三大政纲之一。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便有人大喊"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并且有人以为现在的工人、农民是强者，资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说什么工农是压迫阶级，资本家、地主是被压迫阶级。这好象外国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中国人动了外国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蛮；又好象满洲皇帝屠杀过无数汉人和革命党，革命党人杀几个满洲人或者是取消几条优待清室条件，便有人大喊暴民专制；都同样是

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我们的兵士也要学步了，我们也要代兵士说话了；有人说：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更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民众这样做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使我们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在广东，民团、劣绅和县长、驻防军勾结起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近来更加厉害（参看一八三期本报广州通讯）；在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员会之判决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规定，实质上即是绝对禁止罢工；甚至于农工商学联合会也阴受阻碍，连汉案对英示威大会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军可敬，革命党可杀”“工人运动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这类怪话都放出来了！

同时，在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方面，“可与国民党中的稳健分子温和派合作”的空气，也放出来了！

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

欲援救此断送革命之右倾的危险，欲保持革命的胜利，欲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只有继续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铁律：“武力与民众结合”。

1927年1月31日《向导》周报第一八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无耻的九省联合会

反对孙传芳的三省联合会①，被孙传芳压迫而无形停顿，孙传芳所雇用的什么九省联合会伸出头来了！三省联合会虽然还未曾集中三省民众的势力，而他们的目的是三省自治，反对孙传芳，反对奉鲁军南下，这的确能够代表三省民众，并且主持三省联合会的人，大半是三省的正经绅商学者。现在九省联合会的目的是"促讨赤首领迅速出兵，收复被寇各省，……速电张宗昌、张学良二将军，速予出兵救国，一面仍由孙总司令由长江进兵反攻，……并向孙总司令请愿，克复衢州后，即乘胜向赣前进，一面责令叶开鑫部直进九江，……又致书张作霖，毋取杨宇霆主张，以大义为前提。"他们所谓九省代表大半是一向不见经传的人物，惟有两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是江苏代表韩国钧，一个是两粤代表梁绍文。韩是一个腐败老官僚，梁是孙文主义学会一青年（我们希望不是这个梁绍文）。其余各省代表虽然不甚知名，

① 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新苏公会和全皖公会联合组成。三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为：蔡元培、褚辅成；杨千里、黄炎培；李次山、许世英等。1926年11月14日召开成立大会，通电主张：三省为民治区域；一切军政应由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处理。

大家也须牢牢的记下他们的姓名，好防备北伐军一到上海，他们也会钻进国民党，象熊有介事的以纯粹国民党员资格，号召反共。现在右派中这种分子很多！

稳健之孙文主义！

电通社廿七日东京电："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又要抄袭段祺瑞软化国民党稳健派的老调了！孙文主义是不是稳健的呢？大叫"真正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的人们，现在必须在行动上答复这个问题！

1927年1月31日《向导》周报第一八六期　署名：实

“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

“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和军阀血战之第一幕。四年前的今日，中国铁路工人的赤血洒遍了沿京汉路二千余里；血战四年后的今日，在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领袖施洋、林祥谦等流血地——汉口，才有了公开的盛大的纪念会。这些艰难困苦在我们工人阶级血战史上，都有重大意义，我们不可忽视了！

京汉工友同志们！我们今年的“二七”纪念会，固然是快慰的纪念，更应该是苦痛的纪念。不但纪念过去的苦痛，并且要纪念现在的苦痛。四年前的今日，沿京汉路的工友，都在流血、被捕、失业、恐怖的惨败中，并且这种惨败的空气笼罩了全国各路的工友们，这种惨败苦痛的历史，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三年前的今日，正是惨杀工人的罪魁曹锟、吴佩孚得意之时，铁路工人更为他们所疾视，更受着严重的压迫。二年前的今日，虽当国民军胜利之后，在郑州召集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而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当时尚在吴、萧统治之下，京汉全路工会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去年今日，正当奉、直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之时，亦是吴佩孚势力复兴之时，同时也是各路工人起来再和奉、直军阀决斗之时，奉、直军战胜国民军，各路工人又回复到严重的压迫之下，京汉工人被吴佩孚第二次屠杀。今年今日，又是怎样呢？京汉南段、粤汉北段的工友固然得着一点自由，尤其是施、

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已赶走吴佩孚，工会已得着组织及集会的自由，已能够开大会纪念四年前我们的死者，固然是我们很快慰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吴佩孚仍旧在郑州屠杀工友，其余各路都全部归到奉张、鲁张、苏孙这些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工友们处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的严重压迫中，又加以交通系种种阴谋破坏，连秘密的工会都不易存在了。可以说铁路工友们现在的苦痛，比过去的苦痛更加沉重了！

铁路工友们！你们占住了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机关，各派军阀军事运输的生命操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在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中有无上威力；可是，军阀们也正因此对于你们的压迫，一刻也不能放松。你们对于军阀的战斗，是最有价值的战斗，而也是最艰苦的战斗。

你们的战斗机关——工会，是不能希望在军阀统治之下可以公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秘密组织，目前非常必要；因为若无任何组织，便无法集中你们的战斗力，便只有任军阀践踏，你们能忍受吗？

最能够破坏你们秘密组织的，还不是军阀，而是交通系的局长员司。没有局长员司的告密与画策，军阀还不能够知道工人的内容；没有局长员司的勾引与护庇，工贼也不敢公然横行；因此，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始终是你们最切近的死敌！

反革命的交通系局长员司，他们不但在反动势力之下帮助军阀压迫你们；并且在革命势力之下，即如在国民军、国民政府之下他们也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想出各种阴谋，挑拨工人与政府间的感情冲突，无论是工人打击了政府，或是政府打击了工人，都是他们得意的事。

铁路工友们！你们对于最切近的死敌——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必须和对军阀同样的战斗，因为他们是军阀们最有力而且是最阴险狠毒的帮手。在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之下，你们更须要求参加铁路管理权，不但要肃清交通系，并且要肃清败坏路政的一切贪官污吏，这是我们铁路工人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全国各路的工友同志们！此时你们最切要的口号是：（一）发起秘密组织；（二）破坏军阀的战斗力；（三）肃清交通系。

1927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七期　署名：独秀

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

“民众革命潮高涨起来，便用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来和缓一下；民众运动一低落，口惠马上变成假支票。”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惯用的政策。

欧战后，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者发了一些不平之声，华盛顿会议遂在关税、法权上给了中国一点小小的口惠；然而华盛顿会议刚闭幕，他们便一概忘了。到了五卅运动，帝国主义者才把华盛顿会议所允许的小小口惠想起来了，才重新把这小小的口惠来和缓中国的民气；迨民气被奉、直军阀镇压下去，所谓关税会议，所谓法权调查，都丝毫没有结果。现在又来了：汉口“一三”事变以来，在全中国反英运动高潮中，英国帝国主义者又提出准备交还租界、准备交还海关、准备撤废治外法权等口惠，以和缓中国的民气了。我们敢说现在的民气，若仍旧为北方讨赤的军阀和南方取缔过激运动（东方社五日汉口电已有此消息，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亦大书特书：“党政府严禁反英。”）的稳健派共同镇压下去，英国准备给我们的这些口惠，又必然终于是些口惠。英国人现在大叫中国国民党中稳健派和急进派不一致；又大叫和平的合法要求我们可以商量，若用暴力则我们不能屈服，这正是暗示稳健派出来为他们镇压反英的民气。只要反英的民气有人为他们镇压下去，和平的合法要求他们便易于对付了。

英外长张伯伦于一月二十九日在伯敏汉演说："英国对华方针，自去岁关会开幕以前，即以改变当时英国惟一之愿望，……并已准备抛弃其特权……吾人早经感觉有修约之必要，并希望中国统一政府早日成立，俾能开始修约交涉。……中国对于修约要求之原因有三端：(一)因外人领事裁判权；(二)关税束缚；(三)租界制度。英国对于上举三端，均愿予以变更。……但上述提议，不能使其立生效力，因中国尚在内乱之中。……吾人准备援助陈友仁及任何派之政治家，以政治家妥协之态度，解决一切悬案。"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张伯伦了：我们早已知道你们英国帝国主义者，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时刻准备抛弃特权，时刻准备修约，只可惜八十年来中国始终不曾有统一政府，年长日久，使你们的惟一愿望不觉忘了，只增加了好几次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特权，更增加了辛丑条约，直到今日中国国民运动高涨起来，才将你们心中多年准备而又忘了的惟一愿望提醒了。可是此时中国尚在内乱之中，还没有统一政府，你们多年准备的好东西，仍然是不便拿出来；你们也知道仍然不便拿出来，所以要派海陆大军护送到中国。你们并且知道你们准备的这些好东西会号召出来许多妥协的政治家和妥协的在野名流，一有了这些妥协的政治家与在野名流，你们准备送来的好东西，又不得不从半路上在印度洋乘原船送回伦敦，只好候梁启超所谓"片面的革命行动"高涨时再准备送来。那时候，在野名流梁启超所预备的"我们愿意用国际惯例上正当手续和双方最友谊最谅解的精神作平和的修改"这一桌欢迎酒席，只落得贵客不赏脸而大为扫兴！

梁启超所谓"聪明的英国人"，当然懂得这个；可是愚蠢的梁

启超，至死也不会懂得这个，他实在不愿意懂得这个。

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英国每次口中说：准备要送中国的一些好东西，都是因为中国有了“片面的革命行动”，都不是因为有了正当的手续和友谊的精神；采用正当手续和友谊精神的和平谈判而停止革命行动，反而只有使帝国主义者收回去他们口中所说准备要送我们的东西，去年北京的关税会议就是一例。

我们并不拒绝谈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动或减少革命行动，而希望友谊的和平谈判得点什么，便是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其结果必一无所得！国民政府必须懂得这个！必须懂得抑制民众革命行动而以和平面孔取悦于外人，本是北京军阀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诀，我们十分不忍看见真有“党政府严禁反英”！

上海《时事新报》公弼先生历数香港罢工封锁、党军控制长江流域、排英口号几遍域内、南方联俄、共产主义博得若干国人之同情、打倒帝国主义最鲜明之旗帜，都是英国变更外交政策之由来；这是他懂得梁启超所不曾懂得的。

在赤的运动起来给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以前，中国的外交是怎样？北京政府以前敢涉想废约吗？可是现在居然能够宣告废止此约了。关税会议得着了什么？可是现在居然独断的征收二五附税了。以前他们不是视收回租界运动为过激吗？可是现在也居然提议收回租界了。他们以前不是把安格联当太上老祖看待吗？可是现在也居然下令免他的职了。这不是受了赤的运动之赐是什么？不有赤，他们焉有今日，然而他们不思报德，仍然要勾结帝国主义来讨赤，他们真是“食毛践土没有天良”！

什么是赤的运动之目标，我们敢公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

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具体的说，即是：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自主权，取消庚子赔款及不正当的外债，取消外人之铁路、盐务、邮政管理权，没收外资的银行、矿山、铁路、航业、工厂及外人所购土地，归中国国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与侵略。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建设独立的经济势力与文化。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

谁不否认他是中国民族一分子，谁就应该拿出十分“赤忱”，加入这个赤的运动！

1927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七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

有人主张民众结合军事势力来革命，国家主义者则反对和一切军事势力结合；有人主张民众起来直接行动，国家主义者则又斥为“群众之盲动”、“与中国以莫大之危险而已”；既不要军事势力，又反对群众运动，那么，国家主义者外抗强权的办法是怎样呢？好！现在他们说出办法来了！他们在《对英问题国人应有之态度》一文里说：“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再一面督促政府整顿国防，……三年，五年，与英作一破斧沉舟之战。”我们对外容忍已经八十多年，今后三年、五年、十年，政府还未整顿国防，我们只好再继续容忍下去，只要我们能够容忍，什么天大的事都没有了。好极了！这就是国家主义者外抗强权的办法！

究竟是谁无祖国？

马克斯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有三个意义：一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保护工人的祖国；二是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应该不分国界的联合起来；三是说各国工人不应该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为本国政府侵略别国，为本国资本家格外多做点牛马；并不是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什么无祖国，讲什么打破国界的大同主

义。我们也曾说："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甚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这也就是不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大同讲无祖国的意思。实际上，五卅运动中，最为祖国牺牲的乃是无祖国的工人，而不是你们有祖国爱祖国的国家主义者，你们以为这是矛盾吗？以为这是自己打自己巴掌吗？如果是矛盾，恰恰和你们的矛盾相反。你们号召工人为本国资本家多做牛马时，你们赞成军阀政府侵略蒙古民族时，都大喊祖国；而在五卅奋斗中，你们便把祖国忘了；这就是你们的矛盾。究竟谁个矛盾是合理的，谁个矛盾是反动的呢？

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

国家主义者大骂我们妄倡无祖国，大骂我们不要国家，骂得雄纠纠的满腔热血几乎要喷将出来，像煞是个爱国的勇敢青年。不料当着英国对华出兵，祖国危急之时，这班满腔热血的勇敢青年，却不敢挺身为祖国奋斗，反而缩进龟头，主张"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龟头既已缩进，一面还自夸是"用头颅和鲜血去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我祖国的爱国青年"！还自夸是"愿为祖国捐躯的国家主义者"！这班下作货，不但过去不曾为祖国流一滴血捐一只躯，即将来也不会有这回事。算了罢！龟头缩进去得了，天怪冷的，不用再说令人肉麻的话了！

怎见得我们不要国家？

绝对不要国家，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而不是

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对于国家的态度是：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用做控制被统治阶级之工具，前代封建贵族用他控制奴隶及农民，现代资产阶级用他控制无产阶级，将来无产阶级也要用他控制资产阶级，必须一切阶级消灭，国家这个制度才能够消灭。现在，我们正要建设民主的国家，更进而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国家主义骂我们不要国家，骂我们打破国界未免是无的放矢罢！我们奉劝国家主义者，于争夺教员位置及向官厅告密之余暇，略略读书，免得做文章时，笑话百出，令人齿冷；免得当教员时误人子弟，……！

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

分明是英国水兵在汉口杀伤了十五个中国人，而英国报纸反称赞英国水兵能够忍耐，麦克唐纳尔也钦佩英国水兵能自制，最奇怪，有个中国人(?)梁启超，他也说："我们不能不佩服英人之忍耐镇静。"大概他们都感觉得被杀伤的中国人太少，英人若不自制、忍耐、镇静，还应该多杀些。横暴的中国人，竟逼得忠厚可怜的英人这样忍耐！仅仅只杀伤了十五个中国人，这样忍耐镇静的英国人，真值得梁启超佩服！

好高明的稳健派！

有些稳健派的国民党员以为："此时外面的对英交涉和对奉战争还不算什么迫切重大的事，内部的民众过激和共派活动，到是我们的切身之患，非压服下去不可。"我想别的急进党员可以

回答他们说："诚然！不但你们这样想，就是张作霖同志、孙传芳同志、章炳麟同志、蓝浦生同志、张伯伦同志，也是这样想，并且正要我们这样办！"好高明的稳健派！

北洋军阀"安"的成绩！

袁世凯为要做皇帝而办筹"安"会；段祺瑞为要把持政权而办"安"福俱乐部；现在张作霖为要做大总统除组织"安"国军外，还办了一个什么"安"国协会；说也奇怪，北洋军阀无论什么举动都不离一个"安"字！据安国协会成立通电，还要发刊"安"国日报，"以提倡士、农、工、商四'安'主义……借宣传之力……为安国(军)之前驱。"其实奉军在北方各省所做"安"的成绩很多，似乎不必再借宣传之力了！

1927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七期　署名：实

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

国家主义者说："共产党……以为……帝国主义之国家有其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可以牵制其本国政府之行动，……此种思想又何殊于梦呓。……英工党领袖、前相麦克唐纳尔在工党机关报《前进报》论汉口案一文。……共产党人读此言论，不知能醒其迷梦否？"

毫无世界知识的中国国家主义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现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已经到了什么状况，他们更不知道麦克唐纳尔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居何地位，一见麦氏反动的言论，他们便大喊其各国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是共产党的梦呓。果然是梦呓么？请看下列事实。

电通社五日东京电：日本之劳动农民党发表对华声明书，将努力于国民政府之承认。

路透社六日伦敦电：英海军大臣白里志曼演说：工党在事不干己之中国内战中，择仇英之领袖而拥护之。

路透社六日伦敦电：英国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发起，在爱尔白特厅开要求对华和平之大会，到者甚众。

世界新闻社加拿大电：加拿大劳动党主席杜慕伞亚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声明：关于中国问题，加拿大劳动者愿与脱离被英国等榨取之中国为友，排斥英国之对华出兵，英国虽有劝

诱加拿大出兵之形迹，而加拿大劳动党极力反对出兵云。

本社六日北京电，据伦敦报告，柯克(Cook，英国矿工会书记)提议成立“勿侵犯中国会”，并开会讨论援助中国问题。又奥斯露消息，工人大会在该地举行，一致通过挪威工人与中国民族独立斗争休戚相关。又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生活》提议工人应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并在各城市成立“勿侵犯中国会”。

世界新闻社墨尔邦电：澳洲海员工会驻维多利亚分会已决定通告各会员，对于凡载兵或运军火至中国之船，一律罢工，不予驾驶。

国闻社七日汉口电：英工党复陈友仁电，极反对英舰来华。

电通社七日北京电：据伦敦电告，苏格兰独立工党机关报《前进》唤起群众反对英国在华政策。又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发起几次大会，决议对英国之武力干涉中国提出严重抗议。

路透社七日汉口电：陈友仁续接英国工党反对英国集兵中国之来电两通，一系伦敦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所发者，重行声明其已详于前电之态度，一系纽西伦惠灵吞工党发来者，赞同英国工党之地位。

电通社九日北京电：伦敦消息，上周内英伦工人举行百数十次大会，提出“和平对待中国”之口号，兰斯勃利(工党重要首领之一)在伦敦工人大会上宣称：“中国向英国无从让步，乃当然事；反之，中国则应向英国要求补赎其历年在华所作之罪案。”

路透社九日伦敦电：工党修正致英皇之答词，明日将由特莱夫良在下院提出，该修正文惋惜政府应付中国形势之迟缓，

并指陈派兵远东之失望，谓不仅增在华各处英人之危险，且妨碍以爽直承认中国国家独立为根据与中国人民谋取平等与永久友好的谅解之进行，请下院促成立即之变计，而召回已在途开赴中国之军队。

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共产党所认为“帝国主义之国家有其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可以牵制其本国政府之行动”，这件事并非梦呓；反而可以证明国家主义者认为各国工人都应爱其祖国，不能希望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这才是梦呓。

国家主义者见了上述的这些事实，或者要大骂加拿大工人、澳洲工人、纽西伦工人、苏格兰工人、英伦工人、英国工党，尤其是英国共产党不爱祖国！可是他们如果也要爱祖国，便不能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了，中国国家主义者到底希望他们怎样？

英国若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象中国这样，我们知道英国工人必不能躲在“工人无祖国”的名义之下，一任外国帝国主义宰制而不起来反抗，必不能象中国国家主义者那样提倡容忍。正因为英国也是一个侵略别人之帝国主义的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要不分国界的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英国工人遂不能站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帮助本国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因要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自然而然的要同情于任何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形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在此世界革命运动中，一边是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边是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因此形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当然不能和本国的及世界的无产阶级合作）之

间相互的同情与援助；因此形成了每个国家的各种革命都是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无论何国工人，如果他们不同情于被压迫的民族运动，便是不愿意参加打破帝国主义的世界；无论何国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不同情于工人运动，如果他们反对阶级争斗，便是不愿意成就打破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我这些话是对还在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人们说的，不是对国家主义者说的。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已经分明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那边，已经公然在上海法庭拿出孙传芳密令他们在小沙渡屠杀工人的公文，他们已经是反革命者，我们用不着对反革命者谈什么革命的理论！

1927年2月16日《向导》周报第一八八期　署名：独秀

张作霖宣言之解剖

张作霖最近也发表了一篇什么宣言，这个宣言中举出了他的政纲，如：

保持国家主权；

恢复秩序；

传播教育；

劳资合作；

扩张交通；

改良司法；

中央地方分权；

整理财政；

裁减冗员限制军额；

巩固内外债。

这十件事。在这十件事以外，他还举出了两个总的政纲：一是发展民治，一是剿灭过激主义。

世界各国反革命者到了濒于破灭之时，或者他的势力不敌革命势力之时，往往发出一些空洞而好听的政治口号，藉以蒙蔽人心，挽救其颓势，和帝国主义者装出让步的态度，欺骗殖民地以和缓其民族革命运动，是同样的政策。现在张作霖的宣言就是这样。

张作霖这个宣言是谁替他做的，我们不必问。这个宣言，张作霖本人曾否躺在鸦片床上略略看过，我们也可以不问。我们只知道，张作霖究竟是个什么人和他的政治罪恶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中国人民人人都明白的，就是帝国主义者也未尝不清楚。

张作霖如何保持国家之主权，不但在过去他忠心服事日本可以证明，现在正当英国出兵威胁国民政府对汉口案谈判之时，张作霖也帮着出兵由河南向正在力争国家主权的国民政府进攻，这更显然可以证明张作霖保持国家主权之热忱。张作霖所谓恢复秩序，不用说是镇压革命运动。他的传播教育，恐怕越传播北京各国立学校越停闭的爽快。他所谓劳资合作，第一要紧是中国境内的外国各工厂各企业的中国工人不要罢工。他所谓扩张交通，想必就是指多扣火车轮船运兵。他所谓改良司法，想必就是指以军令在北京逮捕枪毙邵飘萍、林白水、刘汉臣、高三奎，在上海逮捕谢复生、王汉良这类事。他所谓中央地方分权，不用说是预备在北京失败了再回到奉天做关外王。他所谓整理财政，免不了要推行奉票与军用票。他所谓裁减冗员限制军额，不用说是裁减奉系以外人员，限制奉系以外的军额。他所谓巩固内外债，内债不过是外债的陪衬罢了。

还亏他厚着脸说出"发展民治"这句话！不然！张作霖不但主张发展民治，他并且在此次宣言里说："自民国肇始以后，国家主权已操诸国民之手！"袁世凯不曾大叫"主权在民"，于是代国民行使主权的元首所赏所罚都是民权民意，于是革命党乃成了侵犯国家主权违反民意之叛徒。国民到今天才知道，自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六年，国家主权原来都操诸国民之手；自袁世凯到张作霖，都是这样继续发展民治！

张作霖此次宣言，人人都知道这是些废话；然而其中也有两句真心话，就是：巩固外债和剿灭过激主义。

张作霖宣言里说："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剿灭过激主义，舍过激党外，皆有商量之余地。"

张作霖这句话，未免过于恭维过激党而令其他党派太难堪了！照他这句话，中国只有过激党是彻底的革命党，只有过激党和张作霖没有妥协商量之余地。事实未必如此，革命的国民党，除少数稳健分子外，那会和张作霖妥协商量！不但国民党，即其他一切党派以至于不大与闻政治的商人，对于张作霖所最热中的最高问题，都有妥协商量之余地吗？舍过激党外，对张作霖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热中的中国南北统治和中日互惠协定这两个问题，都有妥协商量之余地吗？

在张作霖方面，也并非舍过激党外不仇抗任何党派，就算北冯南蒋都是过激党，吴佩孚总不是过激党罢，为什么也要派重兵夺取河南，吴军已有两旅被奉军缴械，为什么吴佩孚屡次电阻奉军入豫，也竟无商量之余地呢？或者将来张作霖也会说吴佩孚、靳云鹗等有过激嫌疑，伶人刘汉臣、高三奎尚以赤化被杀，何况吴佩孚、靳云鹗！一切异己者，都不妨以过激党头衔加之！

等于废话的张作霖这篇宣言，他的宣言之目的，将丝毫不能达到。他所可恃的还是武力，若只望以政治宣传取胜，算是错打了主意，因为工人早已认识他，不必再要宣言。若只望拿宣言勾结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声势，这也是枉然的事；因为谁和他勾结，谁就变成了反革命而失败。

1927年2月16日《向导》周报第一八八期　署名：独秀

我们目前的奋斗

我们要懂得目前的奋斗是什么，必须先懂得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一方面中国的革命运动日渐高涨起来，工人经济的政治的罢工普遍了各大城市；农民经济的政治的争斗，由珠江流域一直达到了黄河流域(河南、直隶、山东)；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军快要占住扬子江上下游全流域；全国思想界逐渐革命化了，至少也挂起了不反对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者增派一万人以上的兵力来向中国革命运动示威，意大利、美国都是英国的帮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付中国革命运动，比他国更是巧妙，他在表面不与英国合作，以和缓中国人对日之历史的恶感，而实际上则企图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协定以抵消关税自主，在政治上一手拿住奉天军阀，一手拿住国民党的右派即他们所谓稳健分子(日本帝国主义者拉拢右派的方法有二种，一是派一班浪人在上海和西山会议派的老民党，合办一个《江南晚报》，鼓吹反赤；一是派佐分利等一班官僚奔走广东、江西，勾结右倾的军事领袖，使之离开苏俄，排除急进分子的左派及共派，压迫工农运动。)，使他们俩见面可结婚，实现南北妥协，以根本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直系军阀可算是已经完全破灭，其余残余部分不归奉即归国民政府，决不能独立存在了；剩下的奉、鲁军，正在河

南、江苏向革命势力作困兽之斗。奉系军阀也感觉得自己危险，于是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之下，一面出兵讨赤，一面由杨宇霆、梁士诒、赵欣伯等放出可以和南方妥协的空气，向国民党右派吊膀子，企图软化右派，使右派帮他们讨赤，以达其对南各个击破之计。

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中国渐次高涨的革命势力，已经到了和帝国主义军阀决死战的时期。在这决死战的时期中，不独反革命分子急得张牙舞爪的乱跳，如西山会议派及其他老民党帮着帝国主义及军阀大喊反赤；即自称革命而实际上不能始终忠于革命的分子，受了反革命之诱惑，也渐渐暴露他们的真面目，想和反革命妥协。并且将来革命越向前发展，反革命势力越感觉得自身临危，越发要拿出反对急进派的口号勾结国民党右派以及资产阶级知识阶级所有的右倾分子，向革命派进攻，以自救其灭亡。

所以中国革命者目前的奋斗，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不但要歼灭军阀，并且要严厉的打击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一切右倾势力，必须打击得他们没有力量能够扶起垂危的反革命势力。

"一三"汉口事件，正因为在汉口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能够合力坚持，帝国主义勾结妥协分子为己助之阴谋未得着实现的机会，所以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上海的革命运动将来又是怎样呢？孙传芳的势力，可以说是完了；鲁军自徐州到上海，战线长至一千余里，不但上海不易制胜，并且徐州、南京、苏州、常州，都有受攻的可能，这几处有一处被攻破，鲁军便全体瓦解。最后和中国革命民众作对的，还是帝

国主义，尤其是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对付中国革命民众，不但用武力直接压迫，并且还要勾结国民党的右派、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妥协分子及一切反动的绅士，向革命民众进攻，逼迫民众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是很可能的事。

上海的运动要得到胜利，也须和汉口一样，革命的领袖与革命的民众，始终合力坚持，不但不可受右派的离间与恐吓，而且还要合力打击右派，不妥协的和帝国主义决死战！数十万里夫民族尚能力抗法西斯帝国主义大军至一年之久，岂有二百余万上海市民反不能力抗英、日两帝国主义之理！只有决死战能得着胜利，妥协就是失败。从今天起，反抗鲁军拉夫，拒绝鲁军军用票，停纳一切捐税，总同盟罢工罢市，夺取武装，响应国民革命的北伐军，一直到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工商学兵等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这便是我们目前的奋斗！

奋斗胜利的保障，只有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合力坚持，而不为右倾分子的妥协政策所动摇所恐吓！

1927年3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九〇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

革命运动中不可没有革命党，这是稍有常识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因为革命党人是革命的群众中革命意志最坚决的分子，革命党就是这些坚决分子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的集合体；革命运动中，若没有革命意志坚决的党（一个或数个）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则革命运动是不容易获得最后胜利的。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地位，是人人都能够认识的。自兴中会一直到现在，三十余年来的中国革命历史，都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为主要动力，虽然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党内纠纷，不少变节的领袖，离开了党，违背了革命，而另图结合与活动，而革命分子仍然在新陈代谢的现象之下，团结了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领导革命，发展革命。

此次所谓国民党党内的纠纷，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党内的纠纷，在各国任何大的革命党中都不能避免。非革命原则上的个人感情利害之纠纷，我们固然应该反对，应该极力避免；而由革命原则上发生的意见纠纷，不但不能避免，且不应避免，有时还是万分需要。我们反对非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同时也反对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内和平；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内妥协和平之断送革命，和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外妥协和平是一样，我们都应该

不妥协的加以反对。一个党没有革命行动，党内永远不会有什么纠纷，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几乎和党的发展有同等意义。罗拔斯比为什么反对罗兰夫人，多数派为什么反对少数派，孙中山派为什么反对黄兴派与联治派，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什么连伟大领袖杜洛斯基和季诺维埃夫也要反对？这都是因为站在革命原则上，不能够避免党内纠纷，不能够顾及党内和平，其结果党及革命都由纠纷争斗而发展了。所以此时国民党党内纠纷，在落后分子的眼光看来，是恐怖的是悲观的；在革命分子的眼光看来，是应有的是乐观的，是进步的现象。

最近我们见到国民党的一种印刷品，题名《党务宣传要点》，①颇足表现党内纠纷在革命原则上的意义，兹录原文于下：

“党的意志是大多数党员的意志。要使党尽其作用，第一，须使这意志随时自由的表现出来；第二，更要拥护党的机关，依照党的意志，能去切实的无障碍的执行。尤其在现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决斗，党内党外危机四伏的时候，更要防止特殊势力阻碍党的意志的表现与执行。所有党员，更须严重监督，遏抑一切黑暗的党外或党内的违反全党利益的企图，须使个人的意志与活动，完全屈伏于党的意志与活动之下。如此，党的权威，才能树立起来，一切权力，才能归党掌握。所以

（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个标语。表现党的意志与执行党的意志的最高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决不可有

①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于1927年1月15日第9次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全文发表于2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

第二个最高指导机关。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有第二个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权力相等以至于权力冲突的机关，那便是党的莫大的危险，所以

（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现在最迫切的要求。党的指导机关不能统一，势必造成多头的政治与派别的对峙，而一切反动势力，必将乘间而起，利用党内的矛盾，勾结操纵；同时，一部份党员的活动，必完全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封建思想在党员头脑中潜滋暗长，不即加以纠正，必定演成个人独裁，以亲戚故旧同乡同学等等的关系结党营私的弊害。所以党员离开了党的正式指导机关作个人的政治活动，便可以有反革命的倾向。惟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使党内每个人都要绝对服从由本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是

（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复次，欲使党的工作，进行顺利，更须使为全党所信任的领袖们，一齐出来领导。自从去年春天，直到现在，海内外各级党部，同声一致的要求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可是汪同志仍是没有回来。我们不能不追问汪同志之不能销假复职，是否因有使其不能销假复职的障碍。如果有这种障碍存在，我们全体党员便不能不大家起来消除这种障碍，以贯彻几个月以来全体党员

（四）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的要求。我们更要知道，几个月以来，军事虽然发展，党务政治，反形退步，旧有的新生的问题，千端百绪，只因党的最高机关，权威不振，所以都没有系统的根本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求

(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这是目前不容稍缓的。我们同时要要求中央的全体委员，根据革命的利益，充分的行使代表大会所赋与的职权，不受任何特殊势力的拘束。我们更要求中央全体委员，对于党内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份子，以及相与勾结的官僚市侩，彻底肃清，防止他们乘机作恶危害本党，我们要用

(六)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份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

这一宣传要点里所说：“遏抑一切黑暗的党外或党内的违反全党利益的企图。”“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据这些说话，当然已经表现党内的纠纷是有革命原则上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感情利害冲突。可是这些说话还嫌不够，至少也觉得含混了一点，未曾明显的具体的指出目前革命原则上的要点。目前革命原则上的要点：一是党内所谓稳健分子，亦即接受了西山会议理论的分子，有和党外的黑暗势力——奉天军阀及帝国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妥协的倾向；二是反工农运动的事实日渐增长，而一般投机分子甚至于反革命分子却如潮涌入，在国民党内组织他们的小团体，占据地盘，并且有计划的向革命分子或明或暗的进攻。这两件事，只要有一件继续发展而不加以纠正，都足以断送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断送中国的革命运动。国民党是中国革命运动之主要动力，断送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便是中国革命运动之重大的打击。孙中山先生若避免党内的纠纷，若以妥协的态度保全党内的和平，而不坚决的反对黄兴派，反对联治派，

反对冯自由派，左派领袖们若不坚决的反对勾结段祺瑞的同志俱乐部派和西山会议派，试问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今天是怎样，中国的革命运动今天又是怎样？

所以为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计，为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计，国民党内革命分子站在革命原则上和右派冲突，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该取非革命的和事老态度，责以避免党内纠纷，在事实上帮助国民党内反革命的势力之继长增高！

1927年3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九〇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

从前有人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谢持气的了不得，以为这是侮辱国民党。可是现在西山会议派的张继，竟在此次上海总罢工中去访问虞和德，商量合作，而以杀工人杀共产党为合作条件，虞和德大不赞成，张继算是白撞了一头包，可见这班右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

党　皇　帝

从前因为共产分子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右派大呼"亡党"。现在国民党北伐胜利了，右派又大呼"党皇帝"，讥诮党皇帝满街走，斥责党政府太专制（见张继做的《江南晚报》发刊词）。试问党既然亡了，如何还有专制的党皇帝呢？

西山会议派打倒了吗？

国民党《党务宣传要点》上说："我们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其实西山会议派

何尝打倒，他们不但在国民党外伙同日本人在上海办一个《江南晚报》大骂党皇帝；在国民党内，从前号称左派分子，现在居然接受了西山会议的理论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的人要有多少？

投机商人——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左右

二月二十六日东方社汉口电："此间国民党要人排斥张静江之声甚高；其理由，因张为蒋介石之左近，诸事多为把持故也。"二十七日电通社汉口电："汉口民党干部之间，一般反对张静江之声浪，渐高唱入云；其理由，以张在蒋介石左右，多有专制行为也。"张静江以假古董和投机商人，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人们本来莫测高深；不过已经是一位堂堂的全党主席，民党干部为何又说他是蒋介石的左右呢？

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

三月一日上海《商报》十六日北京通信称奉系红人赵欣伯（著名的亲日派）关于南北妥协谈话如下："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政见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只须南方放弃共产主义，北方未尝不可与之合作。即在蒋中正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辨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察其语意，似亦愿与北方合作。"中国何处有了共产运动，真是活见鬼！除共产主义而外，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除共产主义而外，张

作霖真能赞同孙中山的国民党主义吗?这又都是活见鬼!蒋介石是一个有革命历史的人,他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他那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为军阀所软化而不继续革命?如果蒋介石肯软化,也只是他自杀,无所谓与北方合作!

1927年3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九〇期　署名:实

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

中国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已经整整二个周年了，我们横览时局，复回忆中山先生的生平，因此我们现在的悲伤，沉痛的悲伤，比中山先生逝世时尤甚，不但是悲伤，而且是悲愤！

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纪念中，已经令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逝世之第二周年，联想到中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之遗言与政策和中国革命之前途。

不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如“五卅”运动和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可是现在去国民革命之完成，前途还甚辽远，革命运动正需急转直下向前发展，以完成中山先生未竟之业；而有些革命意志薄弱的稳健派，自命为不左不右的革命领袖，竟因恐惧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及遗嘱遗言，而停止革命。这岂不是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中最堪悲愤的一件事?!

国民革命军事发展及胜利之最大原因，基于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国民革命之主力——黄埔军，是怎样产生的呢?若没苏俄之援助与共派努力扶

助，焉有今日！在东江南路战争中，在北伐战争中，共派军人力战伤亡者几人，孙文主义学会军人力战伤亡者几人，军事当局应该知道；共派号召民众援助国民政府援助国民革命军之宣传与工作，当局也应该知道。国民革命军自从削平陈、林、刘、杨以至湘、鄂、赣、浙诸战争无一处不因有工农民众之援助而获得胜利，几乎每个国民革命军将领都懂得这个，并且有些军事领袖公开的说：此次北伐全靠农民之帮助才得到胜利；即帝国主义者也懂得这个，日本《报知新闻》《论币原外相之对华方针》，谓："以受多数民众之援助而论，武昌实优于北京，此际不应故意非难南方，以伤武昌政府之感情。"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奉、直军阀，他们都懂得这个，都懂得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这样强盛，这样胜利，乃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要破坏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以自救其危亡，只有勾结南方的所谓稳健派，劝他们离开苏俄，劝他们驱逐共产党，劝他们抑制工农阶级，以此为南北妥协合作的条件。好聪明的帝国主义与军阀，他们知道南方的稳健派若接受他们的条件，实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南方的革命势力便离散了，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之地位便重新巩固了。南方的稳健派已经在事实上表示接受这样的条件。那里是什么南北妥协合作，简直是向黑暗势力投降，这样还算什么革命领袖，还算什么中山先生的信徒！

现在不左不右的稳健派，所持反俄理由是：苏俄是强国决不能以平等待我；并且诬蔑中山先生当时联俄不过是暂时利用。他们所持反共理由是：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他们反工农运动理由是：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工人、农民变成压迫资本家、

地主的阶级了。他们不但拿这些绝对不合事实的理由来掩饰他们违背中山先生革命政策之罪，他们当中还有人更坦白的说：中山先生的政策本来不能用。中山先生逝世才两年，便有人暗中取消他的政策或更明白的说他的政策不能用，这怎不令人悲愤?!

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实现国民会议，也是中山先生遗嘱之要点；可是自从中山先生逝世一直到现在，虽然每逢开会必读遗嘱，而遗嘱中之要点却无人记在心中，慢说是实力奉行了，这样的读遗嘱，和牧师诵经祈祷宗教仪式何异?以“绝对保护外人”代替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黄郛、龚德柏等再得势，便会进一步宣传“外崇国信”!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同国民会议是一件事，现在居然有人以为鼓吹国民会议并主张根据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组织法成立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是共产党造反，是侵犯了省党部、县党部的职权，是违背了中山先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的方略。他们忘记了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是中山先生的主张；他们又忘记了中山先生并未曾以为国民会议侵犯中央党部的职权；他们更忘记了中山先生军政、训政的主张是方法不是目的。若拘执方法为目的，则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作何解释?

“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这是中山先生临终最沉痛的最后遗言，应该每个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都不会忘记！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奉天军阀想勾引稳健派使之软化的呼声非常之高，被勾引的人不但没有一字声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且称南北两方时有信使往还，并且具体指出李石

曾是被派为与奉方接洽的代表，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奉天军阀不正是此时革命北伐的对象吗？倘若这班稳健分子终于被奉天军阀软化了，中山有知，能毋痛哭！

全中国革命的民众们！全国民党忠于革命的同志们！中国的革命是终于要循着进化的历史向前发展的，全国民众革命的高潮，也必不会因少数人妥协软化而中止而低落的，少数人妥协软化，只是他们自己随着黄兴派、政学会、联治派、西山会议派的覆辙而落伍，真正革命分子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历史更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凡是革命分子，都应该坚决的继续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遗嘱与遗言，撇开一切妥协软化分子而勇猛前进。必须是这样，才有脸面来纪念中山先生，才真是纪念中山先生，否则中山先生也未必愿意人们假意纪念他！

1927年3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　署名：独秀

答符琇(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1]

我们不是反对北伐，而是指出北伐的真正意义，即是说北伐要建设在民众的势力上面，北伐的军事行动中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我们也不是反对军事行动，而是说军事行动要和民众运动结合并进，单纯的军事行动，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你以为军事行动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吗？如果你这样想，便是你的终身疑问，恕不能再为解答了！

独秀　三月二日

1927年3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1926年10月26日，符琇给陈独秀信，说："处在四面楚歌之国民政府实甚危险，若不出师北伐自卫，……恐他人南伐于国民政府之园墙下矣！""因此，对于先生所说'军事行动……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总不免有点疑问。"（同期《向导》）

答王纯礼（革命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党）①

一个革命党要承认事实，创造事实，不可掩蔽事实，事实是不肯被人掩蔽的。你只须细细考察：现在是“以党治军”，还是“以军治党”？现在是“力助工人农民”，还是“力助商人压迫工人，力助地主、民团摧残农民”？你亲身在广东，应该看得清楚这些事实。你如果是一个革命分子，便应努力去掉这些反革命的事实，不应掩蔽这些事实。讳疾忌医，那才真是“有碍革命”哩！

独秀　三月二日

1927年3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寸　铁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我的老友张溥泉，当初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活泼少年，加入革命同盟会后，改名张继。参议院议长时代的张继，也还是一个热忱的革命者。再游欧洲回来的张继，还力倡民族革命，并且同情工人运动，他亲自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为中产阶级革命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张继，才开始开倒车；然而还主张联俄革命，并责备苏俄为什么不派遣红军来助中国革命。西山会议后的张继，便正式反动起来了；一直到最近，竟赞成杀工人，竟伙同邹鲁等办《江南晚报》反俄反共。三月五日上海各报载：国民党右派中坚张溥泉，因时局关系于昨日离沪。他自己也登报自称中国无他立足之地，从此出国远游，不问政治；听说是因为和邹鲁、居正又有了冲突。他半生历史变化若此，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当年的革命精神又那里去了？

个人的军事独裁之榜样！

云南军界讨唐继尧的通电说："生杀任免，惟凭喜怒，用人行政，漫无是非，省务会议，虚有其名，傥论忠言，无由上达，令出

独裁，势同专制，主权在民，纯饰虚声，当今之世，首领顺应民众，以谋公共幸福，其道必昌，首领操纵民众，以图少数便利，其道必亡。"其实个人独裁的军人都是如此，岂止唐继尧一人！

我即党与朕即国家

凡是一个民主主义党的领袖或民主主义政府的领袖，对民众发表意见，照例都称我们，决不称我，这是表示非个人专政的意思。若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①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

日本人诬蔑中国革命领袖一至于此！

三月七日《顺天时报》说："蒋介石……现已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正积极，已倩人提出条件，惟其内容现尚不能宣布。"蒋介石自称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诬蔑他倩人向北方军阀提出条件携手反赤，如此吴、张、孙、蒋成了一家，还革什么命！

1927年3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　署名：实

---

① 指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演讲。

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

我们对于蒋介石总司令三月七日在南昌总部之演讲，有佩服的地方，也有怀疑的地方。

佩服的地方是：他毅然承认"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从此政权统一，民众不至感觉于武汉国民政府之外还另有一国民政府而莫名其妙，军阀亦无法利用革命政权不统一而企图操纵；从此党权统一，所有国民党党员不至于感觉得有武昌、南昌两个中央党部而无所适从了。这两件事，都于国民革命之进行，非常有益。

怀疑的地方是：他此次讲演，虽然对于放弃联俄政策和南北妥协这两个流言有所声辩，可惜他声辩的内容反证明了这些流言至少一半是事实。

"凡是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和他们联合"，这只是我们一般的外交原则；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却根本不是这样。中山先生联俄政策之根本精神有二：（一）是要效法俄国式的革命，这句话中山先生不但在公开的演讲中说过，给蒋介石私人的信中也说过；（二）是相信"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府，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俄国革命以后，

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么思想呢?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土耳其在欧战之前，最贫最弱……各国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几乎不能自存，后来俄国出来，打不平，助他赶走希腊，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到了现在，土耳其虽然不能成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是已经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这是靠甚么力量呢?是全靠俄国人的帮助。由此推论出来，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的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见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山先生毫无疑义的肯定了俄国已经不是有侵略各国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并且肯定了俄国能够抑强扶助，弱者自强起来也全靠俄国人的帮助。实际上中国革命军得到俄国人的实力帮助，决非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所能有之事，这件事蒋介石应该比国民党任何军事领袖都知道清楚。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是建筑在上列两个根本精神上面，是以革命同志的精神而联俄，是以革命民族联合的精神而联俄，决不单是建筑在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上面。

可是蒋介石现在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不仅日本，无论那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末，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象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这些说话，若出诸普通商民之口，不但不算说错，而且很公道；国民党军事领袖说出这样的话，在革命政策的立场看来，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

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因为他这些说话之根本态度是把苏俄看做其他强大国家一样，不曾肯定的把他看做是革命同志，不曾坚决的把他看做是革命民族。

西山会议派之反对联俄，人所共知；然而他们也不是明言放弃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也是说："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又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诸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亦绝非盲目的以苏俄之言动皆善，而违反联俄政策之本义。"（均见西山会议派上海大会宣言）蒋介石的说话，与他们的见解何异？他们同样不认识苏俄是革命同志是革命民族，把他和别的强大国家一样看待，今天说："只要联俄以平等待我，我们对总理联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更动的。"明天便会附会一二不平等待我之口实而更动了！所以东方社十六日九江电称蒋介石最近在南昌演说，曾明言"俄国如以不平等对付吾人，则我等自有对之之道也。"报载蒋之演讲词中虽未明见此语而奔走撮合南北妥协之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能够察知其弦外之音。

蒋说："我们联合苏俄，并不是联合苏俄一个代表，我们是联合苏俄全体的人民。"可是张作霖逼走加拉罕，又何尝不是说只是反对加拉罕个人而不是反对苏俄全体的人民。

所谓"全体人民"只是一个抽象名词，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人们往往欺负他不能够具体的站出来说话，可以任意利用他。国家主义派主张全民革命，便等于不革命。英帝国主义派兵到中国，也是说合乎中国全体人民的愿望。苏俄全体人民不能通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革命，除了政府的代表或党的代表，更有何种形式可以表现实际的联合呢？

如果苏俄代表真有压迫国民党领袖或侮辱国民党的行动，不但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起来反对（何以最近党中央全体会议并未曾提及此事，只有蒋一个人感觉着？）即中国共产党亦应该向代表严重警告，甚至于请求苏俄另换代表。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主张汪精卫复职，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在国民党的宴席上劝告勿抑制工农运动，便以为是压迫国民党领袖和侮辱国民党，则压迫国民党领袖侮辱国民党者还有百数十万国民党党员和广大的民众，不只是苏俄代表。

北方的张总司令方宣称因苏俄代表辅助国民党而逮捕其家属，南方的蒋总司令则宣称苏俄代表侮辱国民党而欲加以驱逐，所持理由虽不同，而反对苏俄之事实则同，此或即佐分利所谓"发见南北妥协点"，赵欣伯所谓"南北政策相同"之一！

复次，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自正月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各报一致喧传，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东方社与电通社，几乎每日都有此类消息，东京、北京的日本报纸更是言之凿凿，难道蒋总司令都一向不曾知道，何以对于自身关系之事截至本月十二中山先生纪念日告黄埔学校同志书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纸之宣传都无一字声辩？一则曰："在武汉的党员还要造出这种谣言"，再则曰："他们在武汉的却天天制造谣言"，其于告黄埔同志书中亦说是"造谣煽惑"、"后方捣乱"，并谓："若中正坚持革命不肯放弃一日，则中伤者之作用亦将一日不止。"又谓："彼挑拨是非之徒，意在破坏国民革命军。"其实，如果是谣言，如果是中伤，则造谣煽惑、中伤捣乱以图破坏国民革命者，不是在武汉的党员，而正是蒋介石现方表示亲近的奔走牯岭、南昌、北京鼓吹南北妥协之日本政党及东京、北京的日本

通信社及报馆。最近日本人的《上海日报》非常得意的大字登载十七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解雇鲍罗庭。"不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馆声辩，而只痛骂自己的同志，这是绝对无益的事。

奉、鲁军不是整个的，几等于奉直军不是整个的，这是人所尽知，鲁军即尽失其地盘，亦非奉张所深惜。北伐军东下击破鲁军，自是革命势力更进一步之发展，尤为东南人民所欢迎；然而执此以为"东报"喧传对奉妥协、南北携手对赤之反证，则殊嫌未足。

有人以为李宝章、毕庶澄等时有与南军谈判之事，靳云鹗、陈调元显已归附南方，所谓南北妥协，不过如此。此言亦太滑稽了。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吾人自可尽量容纳；而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提出政治上的让步条件如东报所传者，向北方军阀首恶谋妥协，这是与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为同样的革命胜利之荣誉吗？

奉天军阀在人心上，在军纪上，在财政上，已到了旦夕溃败的运命，不但北方革命的民众，即一般商民甚至于官僚，都发出"盼望赤军速至"的呼声；而赤军领袖若忽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诱惑，与垂危的奉天军阀谋妥协，以延其残喘，使肃清军阀的大业功败垂成，这岂非革命史上一大错误，并且是一大污点！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盲目的掩饰此时没有南北妥协的运动，而是诚恳的要求国民革命军的领袖蒋介石总司令，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造谣煽惑、挑拨是非、中伤捣乱以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1927年3月18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二期　署名：独秀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1]

——告两党同志书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前〔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已的友党，主张打倒我的〔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党〔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

---

① 本篇通常称为《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全文以《民国日报》所载为准。〔〕内的字皆见于其它版本。
据郑超麟回忆：本《宣言》由陈独秀起草，汪精卫过目后，两人签署。

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商协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

十六年四月四日

1927年4月5日《民国日报》

寸　铁

谁敢再想做中国之爹亚士？

英国史学家魏尔斯(H.G.Wells)的近作《一个新中国震动全世界》一文中说："关于目下中国时局，其最可注目之点，即此时局显然非任何一个人物所造成者，申言之，在最近十二个月内进行甚速之中国之巩固与再造，并非在若干如爹亚士或墨索里尼式之枭雄指导之下而进行者。"又说："欧洲列强……耗费金钱及威望，以助中国之某盗魁或某将军，冀其作中国之爹亚士，使中国安全以供欧洲资本家之投资。"现在某将军某盗魁都倒霉了，帝国主义者还只认识个人吗？他们还想雇用何人作中国之爹亚士呢？在这震动全世界的新中国中，还有何人仍敢以枭雄主居，继续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为帝国主义来作中国之爹亚士呢？

英国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了吗？

路透社廿一日伦敦电："各报皆评论上海之陷落，每日电闻谓今一切多恃蒋介石之态度与彼所能操之势力。"以前英国帝国主义者视广东赤军首领蒋介石若洪水猛兽，现在为什么说要多

侍他的态度与势力呢？

稳健派原来如此！

路透社三月二十三日伦敦电："《孟却斯德导报》论上海之前途谓……目前时机尤为相宜，因蒋介石所统率之稳健派，或准备协定，视汉口办法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条件也。"我们现在明白了，所谓稳健派原来就是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意！

1927年4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　署名：实

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1]

沈滨祈
朱近赤先生：

你两位来信所提出的问题虽然不同，而根本是一个问题，即是中国国民革命之归趋，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及其前途。所以我们对于你两位的来信一并奉答。

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又不同，所以革命时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脱离买办性质，决不能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决没有由他们之手实现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可能，若由他们代替军阀统治国家，仍旧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之统治。只有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上的说话，已经在根本上答复了你两位所提出的问题。以下再就来信所举的具体事件，略略申说几句。

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在经济上的性质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构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之国家的构造如何而定。譬如在封建军阀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仅只是官僚营业，而且更便于官僚卖国，外资独占，而更易消灭本国的工业；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过是私人资本更集中高度发展之一种形式；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以上是答复沈先生的话。

朱先生的说话，有许多我们不能懂得。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当然不能解决全民的痛苦，因为全民中之军阀、官僚、买

办、劣绅、土豪的痛苦，各被压迫剥削阶级似乎没有为他们来解决之必要。先生主张要解决"全民"的痛苦吗？赶快去求上帝，或者是学佛罢！你断定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必压迫农工群众，我们以为不一定如此，必须国民党完全变成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工贼的集团才会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是方法不是目的，共产党之目的是废除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将崩溃的现代，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犹未垄断全产业界资产阶级势力犹未强固的中国，如果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独裁的革命国家，如果能够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那便自然没有一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如果照先生的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这正是国民党极右派的主张，他们正是恐怕国民革命之前途，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势力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他们因此宁愿意让资产阶级结合买办、官僚、土豪、劣绅、流氓等，以造成帝国主义能够仍旧统治中国的政治环境；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离开了共产党，才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色彩，才没有赤化的嫌疑，才是"真正"国民革命。凡是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来真正做国民革命"的人，必然和他们（国民党极右派）走一条路，他将来必然背叛国民革命，因为他已经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所急须要做的事——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

独秀

1927年4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亲爱的同志！

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

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

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

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妨害不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停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

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士兵、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

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因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

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取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

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

民政府之敌作战！

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促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

六月四日

1927年6月8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七期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

我们现在用不着拿许多很坏的话来攻击蒋介石，因为他自己有许多行为已经足够说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并且他的罪状已经国民党、国民政府逐条宣布，更不需我们来重说。

我们也许可以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在去年三月二十之前，东征陈林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

在讨伐陈林和讨伐刘杨战争中，蒋介石很尊信共产党人，因

为他们能苦战奋斗；即去年三月二十以后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讲，还时常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时常肯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共产党人当然很感谢他；可惜他不是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只说他也是革命的，共产党应和他合作，共产党听了总觉得很奇怪。蒋介石时时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记了国民党，这是共产党终和他发生冲突之一个很重要原因。共产党承认国共两党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须合作(不但国民革命中破坏工作可以合作，即国民革命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产党立在革命工作的观点上，对于国民党中任何革命领袖，无论新旧都愿竭诚与之合作，决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帮助那一个领袖打倒那一个领袖；即使那一个领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陈炯明、杨希闵、蒋介石，共产党也只是立在革命的观点上，帮助国民党去打倒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么拥孙倒陈，拥蒋倒杨，拥汪倒蒋。蒋介石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始终只知道他个人而不知道有党，始终要求共产党以助蒋拒汪为合作条件，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以哀的美敦式的态度，要求共产党停止迎汪复职运动，我们答以在革命进展的观点上，在国民党团结的观点上，共产党只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拥汪倒蒋，却没有理由可以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以及国民党党员群众的心理，而反对迎汪复职。这样合理的答复，当然使蒋介石失望，使蒋介石感觉得共产党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象孙文主义学会那样，于是在他的二月二十一南昌演讲中，便喊出"纠正共产党"、"制裁共产党"等口号了。蒋介石所举要纠正及制裁共产党之理，是因为共产党党员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可是他

在此次演讲之前，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时，没有一字提出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而只说不满意我们附和迎汪复职运动，或者在他的见解，迎汪复职就是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

去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极力声辩不是对付共产党，他对黄埔学生演说，痛陈领袖争权之事，分明是指汪精卫；最近张静江致汪精卫书，却说："岂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长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产党行断然之手段……以为共产党之阴险，或有击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卫别号），将失败时介自负之，季仍可自收其残局，各有其分义，弟亦何言，弟到之时，介兄仍欲彻底解决，断此亡党之毒腕，以慰总理之灵。"这样看起来，好象蒋、张之言大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三月二十之变，反共排汪，本是二者并行。排汪之经过事实，精卫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详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排汪必欲其去职离粤，并且自从三月二十，一直到汪回，蒋、张无时无事不与主张迎汪复职者为敌，试问这可是何种分义？蒋介石之反共，导源于戴季陶的小册子，这不仅是表面上简单的戴、蒋等个人思想问题，乃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之反映。关于中国革命之前途，有两种理论与政策：一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一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无产阶级的理论政策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势力、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等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独裁制，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达到全民族政治的经济的完全解放。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官僚、地主、豪绅甚至一部分反动军阀结合起来，建立保护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军事独裁制，以

压迫工农运动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及些小让步，在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众的一切革命运动，发展并稳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中国革命之前途，只有这两条路，找不出第三条路，也许戴季陶、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找出第三条路，不过事实上他们所走的分明还是第二条路，并未曾发明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条路，而又不愿显然自承走第二条路之名，其实第三条路不通行，还只有走第二条路。戴季陶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右派，其结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条路；蒋介石、张静江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西山会议派，其结果他们和西山会议派走上了一条路；现在又有人以为可以一面反共、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蒋，其结果也必然和蒋介石走上一条路；这都是因为他们想找第三条路，其实本来不会有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即第二条路之别名。自从戴季陶发行他的小册子，中间经过三月二十，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都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者国民党右派首领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等，在寻找第三条路的口实之下，为实行走他们的第二条路而工作。

第二条路即资产阶级的路，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要抑制工农运动不许他们强盛起来，更不用说是过火，只有时有利益于资产阶级的工农运动（如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示威与庆祝、追悼等），他们或者可以恩准，否则便是受了共产党煽惑操纵，只好用四月十二的办法。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不愿意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和他们的理论与政策不一致的时候（帮助他们对付他们的政敌之时，当然要暂时利用一下），所

以戴季陶自始至终都主张共产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最近《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中又说："我在总理死后很辛苦地坚持着非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则救国的责任决负不起。"诚然，他们很辛苦地屠杀了共产党之后，很得意地向全国国民宣告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这想必就是戴季陶先生发挥他们资产阶级的"仁爱性"。如果共产党也这样宣告独立，不知资产阶级的学者要怎样大声疾呼的咒骂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残暴无仁爱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说：四月十二之事确如白崇禧、陈群所说只是"工人互轰"（六月三日陈群在所谓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还这样说），随后搜捕抢劫之共产党，或者那是许克祥所谓"暴徒分子"，而非真共产党，至于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更是仁爱之至。可是吴稚晖曾大呼"杀尽共产党"，李石曾说四月十二事变是革命，并且是最后的革命，从此再用不着革命了；诚然，共产党杀尽了，无产阶级压服下去了，资产阶级已经革了无产阶级的命，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纯粹国民党，从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携手统治中国，还有什么革命！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联俄政策自然不大适用；蒋介石、吴稚晖、戴季陶都一致采用西山会议的意见，联俄原以平等待我为条件，言外之意就是苏俄现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联俄政策当然要抛弃。吴稚晖说："有人说俄国已铲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铲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最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戴季陶说："俄国既然说是同情于中国的革命，援助国民政府，而两年当中，既没有和国民政府定过相互的平等条约，也没有和国民政府

交换过正式的代表，……俄国既没有正式承认我们的国民政府，我们就无从承认俄国对我们的革命有正确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苏俄和国民党关系，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时无殊，何以现在忽然发现了没有正式承认和没有定过条约交换代表，联俄显生问题？其实这都是鬼话。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几句话才真是他们抛弃联俄政策之隐衷！

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不得不将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放弃了。他们分明走的是第二条路，还厚颜说是第三条路，自以为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们的所谓革命作何解释？

汪精卫先生曾说："要革命的向左边来——"现在蒋党的人说："要革命的向右边来——"这句话虽然滑稽，可是也证明了他们已认识没有中间的第三条路！

向右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北伐总司令一就职，国民政府便无形取消了，这是革命的吗？

派李石曾向张作霖、杨宇霆谋南北妥协，这是革命的吗？

四月十二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收买青红帮打毁沿江各省的党部及工会、农会，屠杀工农群众，这是革命的吗？

搜捕枪杀各军政治工作人员，这是革命的吗？

正当北伐军在河南和奉军血战之时，勾结于学忠、张联升、

刘湘、杨森、夏斗寅乘虚袭击武汉国民政府，这是革命的吗？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汉诱胁国民政府的领袖潜赴南京，这是革命的吗？

如果这些行为是革命的，那么，只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与政策是这样。如果这样也算是革命，难怪张勋复辟、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也自称是革命！

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体；因为这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他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这是全国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领袖都应该认识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所以一切不容于革命势力的许多反动派如国家主义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对国民党，现在都跑到蒋介石旗帜之下，帮着他摇旗呐喊，向革命势力进攻。至于一些反动的大小军阀，自然有与蒋介石结合之可能，刘湘、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夏斗寅、许克祥等，不用说了；蒋介石、阎锡山、杨宇霆的三角同盟，不久也会实现。

安徽的蒋党，竟揭出"拥护新军阀"的标语，重庆的蒋党，竟挂出"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假革命的蒋介石之名义以保存其反革命的实力，而且还要强奸三民主义一下，这是革命运动中最可耻的危险！

蒋介石已成了全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我们所要敬告国民政府之领袖及军事长官的是：应为革命

而讨蒋，不应为讨蒋而讨蒋；换句话说，即是不但讨蒋介石个人，而是要讨伐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若讨蒋者在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上，在对民众态度上，一切仍蒋之旧，即令讨蒋胜利，亦与革命无涉，而且不足以服蒋之心！

六月十一日

1927年6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九八期　署名：独秀

湖南政变与讨蒋

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所谓幼稚行动在任何国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妇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复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然而说他们只是为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而发，则显非事实。在长沙事变以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已有纠正农民运动幼稚行动的命令，他们若真是只想纠正农民的幼稚行动，由省政府、省党部切实执行中央命令，已十分够用，为什么须用屠杀政策呢？他们说长沙二十一日事变是由于工农纠察队包围军队夺枪而起，这种笑话，和蒋介石在屠杀上海工人之前说工人纠察队将围攻龙华，是同样的把戏。过去的屠杀已遍于湖南全省，截至今天（六月十九日）的消息，新省政府的军事厅长仍在分派军队到各县大举清乡，想必也是因为各县的工农纠察队都在那里包围军队夺枪！这是欺谁？

我们再看二十一日事变以来，许克祥的所言所行，是否只是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

（一）二十二日下午省政府召集所谓各团体联席会议时，教育厅长董维键、建设厅长邓寿荃尚列席，次日即被逐出走，邓厅长的家产且被查抄了。

（二）省党部人员被逐一空。

（三）市商民协会代表左学谦在所谓各团体联席会议上说："昨晚事变，因解散工人讲习所，波及商民协会，以致职员会物损失，会所亦被毁坏。"左学谦家宅亦于二十四日被封。

（四）省农民协会曾负责派员为政府采办军米四十万石，而办米之款九万元，竟被所谓救党委员会的军队抢去。

（五）许克祥在街上贴出"拥护湖南省政府"、"拥护国民政府"的标语，但是省政府的委员赶跑了，并且抄家了，国民政府的委员走到岳州竟被拒绝而回，并且许克祥竟电令岳州驻军要逮捕枪毙国民政府的委员。

（六）五月二十四日，在长沙戒严司令部，成立中国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推定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等五人为主席；当即发出命令如下：以后拿办暴徒分子，非经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命令，各部队不得擅行，此令！主席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

（七）国民党党校被军队捣毁一空。

试问上列这些事实，和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何涉？许克祥等不得政府或中央党部命令，而擅自在戒严司令部组织什么救党办公处，独揽军权、政权、党权，这和蒋介石的行为何异？

夏斗寅在湖北叛变，是受了蒋介石的指使，蒋介石已经亲自

向外国新闻记者直言不讳，似乎不需要别人再为他辩护。许克祥等在长沙叛变，分明是和夏斗寅相呼应，分明是蒋介石袭击武汉国民政府之整个的计划之一，至少也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政纲（反武汉中央，反俄，反共，反工农），谋袭国民政府，扰乱北伐后方之整个的计划之一，纠正农民幼稚行动，不过是一个口实。

蒋介石的外交官，对于英捕房监视上海苏俄使馆不肯向英人抗议，蒋介石且在上海大捕苏俄同志；许克祥等亦在长沙搜查苏俄使馆。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广州搜杀共产党人；许克祥等亦在长沙、常德等处搜杀所谓暴徒分子——即共产党人。蒋介石一面屠杀工人，一面说仍然要保护真正工农；许克祥等也是一面屠杀工人农民，一面在街上贴出"拥护真正农工"的标语。他们和蒋介石有什么两样？

不仅许克祥等在长沙是如此，再看常德的五月二十四日事变是怎样？在二十四日事变之前，常德的党部及民众团体，正在忙着开欢迎熊震旅长大会，开军民联欢大会，正在忙着采办军米；恰当此时，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消息传到常德，蒋介石委任熊震为师长的密电一到，熊军顿时翻脸，于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派兵搜索工会、农会及党部徽章，下午到工会、农会、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捉人，遇见穿中山服的或有徽章的即逮捕枪毙，约在二百人以上，被捕者数百人，特别法庭所拘押之土豪劣绅一律释放，即用彼等为搜捕革命分子之侦探；并且鸣锣叫人报告谁是共产党人，一时被私仇诬陷而逮捕而枪杀的人，非常之多。二十五日又挨户检查，见有勇敢活泼青年，即指为共产党人而捕去枪杀之，如此又杀害了数十人。二十五以后，又从城里杀到乡下去，乡下土豪劣绅所把持的关防局，遂乘机帮着熊震捉人。

此外岳州、平江、浏阳、宝庆及湘南，都在铲除暴徒名义之下，解散民众团体，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之事，成了普遍的现象。此次屠杀之惨，我们可以举出一例，即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被杀之事。杨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捕，在学坪斩头，随将其头抛掷数十下，再用麻绳系电杆上示众，将杨尸倒悬于演说台上，以刀剖解，以铁丝作钩，取出腹内脏腑，灌火油于腹中，用火燃之，旁观有不平者，即以赤化论。至于捕获工农活人剥皮置沙上，旋转呼号而死者，也不只一次。试问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曾否有这样野蛮残酷的行动？

政府派周斓赴长沙以后，湖南的屠杀停止了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现有二事为证：

（一）是六月十日长沙的《南岳日报》载：

"昨日长沙市全市党员，在教育会坪开欢迎周副军长大会……周副军长由第三分校，偕仇亦山……到会，……当众发表决议案十六条(一)公推周副军长为湖南救党委员会委员。

(二)请周副军长实力参加救党运动。……(八)请周副军长奖励马日铲除暴徒的武装同志。……"

（二）是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六月十四日有派兵清乡电如下：

"湘省暴徒啸聚各县，亟应肃清，以根本解决，分配兵力如下：

1．许克祥酌抽二十三团军队，以一部分赴湘潭、湘乡、宁乡清乡，以一部分留省警戒。

2．周荣光督率警卫团担任省城内外警戒，并保护省内上下厘卡，城厢各机关。

3．李仲仁团抽调一部分前往醴陵、衡山清乡，一部留

省协同各军警戒。

4. 每营派兵分赴长沙县所属各乡镇清乡。

5. 熊震师向桃源方面警戒，并酌抽军队担任常德、沅江、安乡县清乡之责。

6. 王锡筹师担任宝庆、新化、祁阳清乡，并担任向武冈方面警戒之责。

7. 周盘、周希武、张岳(团长)协同向鄂西警戒，并应酌抽军队担任岳阳、临湘、华容清乡之责。

8. 陈汉章旅对于湘、黔军方面警戒，并抽军队担任辰溪、溆浦、安化清乡之责。

9. 戴斗垣司令于向津、澧方面警戒外，并抽军队担任石川、慈利、大庸、永定清乡之责。

10. 俞团担任衡阳、常宁、耒阳、资兴、郴县清乡之责。

11. 王德光团对于金州方面警戒外，并酌抽军队担任零陵、东安、祁阳、道县、宁远清乡之责。

12. 罗定(司令)担任攸县、茶陵、安仁、酃县清乡之责。

13. 浏阳、平江、湘阴三县之事宜，另商陈嘉佑军长酌派军队前往办理。

14. 湘南、湘西边境各县，俟由前方抽调军队回湘再行举办。

15. 此次清乡，限令到后十日内一律肃清。"

政府未有明令申斥许克祥等所组织的救党委员会是反叛行为及严令解散，他们当然可以请周澜加入；政府也未曾严令申斥二十一日事变是反革命，他们也自然可以请周副军长奖励。这都是顺逆是非不明所致。现在军事厅还嫌过去的屠杀不足，分派大

批军队到各县清乡，肃清所谓暴徒，以图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解决？不用说是“杀尽真正革命党人——国民党及共产党”和“根本消灭工农运动”，以免后患！在这种政策之下，许克祥等的首功，当然是应该奖励的。共产党是否能够杀尽？工农运动是否能够根本消灭？恐怕都是疑问吧？蒋介石并不能够办到这两件事，甚至更有力量的莫索里尼也未能办到。他人更休想！

湖南政变中所表现的事实，分明不是什么纠正工农的幼稚行动，分明不是什么救党运动（岂有离开最高党部，并且要枪决中央委员的救党运动？），而分明是和蒋介石、夏斗寅一气的反俄、反共、反工农、反武汉中央这四大政策的运动。

此时，武汉方面讨蒋运动的空气似乎很浓厚，倘若没有决心解决湖南问题，铲除这些豪绅代表的小蒋介石，那么我们恐怕南京的大蒋介石尚未铲除，武汉治下的许多小蒋介石——豪绅恶霸以及许克祥等叛徒，倒可以将国民政府推翻了！而且蒋介石可以说：你们讨我，但是你们境内也和我这里一样，你们并不能得到东南民众的拥护，你们所仗的，也不过是军队，来和我争地盘罢了。

六月二十日

1927年6月22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九期　署名：独秀

在土地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

这个问题甚复杂，牵涉甚大，全部的问题，现在在革命的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方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已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际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我的意思，方法与原则是可以相符的，可以使到各方都满意的。我个人对土地问题的意见如下：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如何实现原则呢？实行原则，应由中央与各省详细规定，因实行的方法不能用现在这种会议得到结果，即有结果，亦不过是武断的，故必定要有一种原则规定出来——

我个人对土地问题的意见：

（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

（二）公布佃农保护法。

---

[1]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成立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任委员。土地委员会为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至5月6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各省区农运负责人以及一些军事将领。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土地归谁？和关于保护中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据土地委员会议记录，陈独秀出席了4月26日举行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并作了发言。

（三）无土地之革命兵士，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

（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

以上是原则。

（五）政治委员会，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之实现。

（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土地改良法案。

（七）各省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

以上为进行方法。

1927年6月《中国农民》第二卷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

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从蒋介石到阎锡山，将来或至到张作霖、杨宇霆)，他们现时所奔走呼号的救党清党运动，和国民党改组时冯自由、刘成禺等所号召的护党运动，是同样的把戏。他们所号召的口实是反共产，从冯自由、刘成禺到杨希闵、刘震寰，从杨、刘到蒋介石、李济琛，从蒋、李到阎锡山、许克祥，都是同样的口吻，即将来从阎锡山、许克祥到……，从……到……也必然是一脉相传没有两样。这并非是偶然的事，乃因为代表封建军阀及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势不能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长久合作，以致身被南赤北赤等不洁之名，而不为帝国主义者所谅解所宽宥。

张继说："我们国民党若反对帝国主义，则失败时将无地逃避。"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就是国民党新旧右派始终反共之共同心理。他们都以为国民党之所以为帝国主义所疾视，乃因改组后加入共产分子之故，非排共无以救党，排共与救党、清党、护党，乃同实而异名。他们不懂得"为帝国主义所疾视"正是国民党之荣誉，而不是羞辱。他们所谓护党、清党、救党之目的，不是想把国民党从不革命救护到革命，而分明是要减少国民党的革命性，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汪精卫先生过上

海时，曾面问蒋介石是否要把国民党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蒋竟直认不讳。

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怎样？改组以来的国民党是怎样？有了进步没有？这应该是人所共知，不待多说了。改组以来的国民党，因为有了共产党分子加入捣乱阴谋破坏，又加以苏俄帮着“送牢饭”（蒋介石语，即令人吃不饱之意）；然而其结果，国民党党员在全国各省都大大的增加了，党在民众中名望价值也日高一日了，军事上更有了突飞的开展，所损失的只是去掉了陈、林、杨、刘这些势力，得罪了帝国主义或者更是美中不足！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只担心得罪帝国主义，遂把国民党改组以来的进步看做一文不值。他们反共救党之真正心理，正因为恐怕身被赤名，得罪了帝国主义无以生存，只有急急排共，把国民党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以表示“守身如玉”仍是“安分良党”，庶几可以稍温帝国主义之心而息其怒。试问以此救党，把党救到什么去处？

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其实，国民党现时之真正危机，不是右派所谓共产党之阴谋破坏，而反是右派之自身。国民党某领袖说的好：“此时国民党有蒋记、阎记之分，将来或者还有张（作霖）记……记……记，汪、谭无兵，所以没有汪记、谭记的国民党。”谁有兵权，谁就在他的地盘之内，以清党、救党名义，造成他自己御用的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无数小军党；国民党真正危机在此，所谓亡党之痛或即在

此，而不在共产党分子留在国民党之内。蒋介石到底还是一个老国民党，有些投机混入国民党军队里的新鲜漂亮人物如阎锡山辈，他们停止站在北洋军阀那边打击国民党才有几天，有些经过共产党人设法展转长期的劝告才肯接近国民党的；有些虽然勉强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共产党人再三劝告，才有点看中了国民党的；这班新鲜漂亮人物，终不能新鲜漂亮到底，现在都回过头来加入反赤运动，都伸起大姆指头自称是纯粹国民党员，自称是真正三民主义信徒，在清党救党名义之下，大声疾呼的排除共产党分子留在国民党之内。他们的面孔转变得这样快，他们这班大呼清党救党的"国民党忠实党员"，倘若半夜里想起来几天以前打击国民党之事，岂不要浑身流出愧汗！然而他们毫不惭愧。他们毫不惭愧之理由是：他们以前打击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革命的党，是反对袁世凯，反对曹锟、吴佩孚的乱党；他们现在大呼清党救党，正是要清除国民党中之革命分子，不但要清除共产党分子，并且对于纯粹国民党员之稍稍左倾分子，也要以暴徒罪名清除之，以图根本消灭国民党之革命性；他们以前对国民党之态度与口号是铲除乱党，现在的态度与口号是铲除暴徒，他们对待国民党是始终一致的，面孔虽前后不同，内容实无变更，所以毫不惭愧。不但他们如此，即段祺瑞、张作霖都曾屡次表示可与国民党的妥协派温和分子携手合作，都无非是企图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以消灭其革命性。自袁世凯以来，他们站在国民党外边打击国民党，不但于国民党无伤，而且因于驱迫国中所有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使国民党的力量一天伟大似一天；他们现在跑进国民党，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以根本消灭其革命性，使革命的国民党变成他们新军阀御用的工具，这才是对国民

党之真正打击，这才是国民党之致命伤，这才是国民党之真正的清党危机！

所以欲救国民党之危机，决不是清除党内革命的分子，而是要清除党内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不然将名存而实亡。国民党在现时严重的危机当中，和民国二年受袁世凯打击的无路可走相等的危机当中，以汪精卫先生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左派的武装同志，应该有一大觉悟，下一大决心，首先自身团结起来，再和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拿出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毫不顾惜的清除党内一切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以救出真正革命分子的国民党正统之生命。只有清除党内一切投机分子，只有革命的左派团结起来巩固正统的国民党，只有消灭全国某记某记个人御用的国民党，国民党才有出路；若放弃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接受蒋介石的主张，不但失了左派的立场，且不是国民党的出路！"联蒋反共"固然是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寿终正寝，所谓"反蒋反共"及所谓"反蒋分共"(分共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分离之意)，亦属欺人自欺的鬼话，反共或分共，都是和蒋介石走上一条道路，尚何须反蒋？

也许有人以为联蒋固然是走到投降资产阶级的道路，反蒋则只有走到附属无产阶级的道路，国民党左派仍然是没有出路。其实不然。中国的国民革命，在社会的客观上条件上，固然不会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不是无产阶级单独的革命，而必然是工农中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革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各阶级联合的国民党在中国存在了数十年以至于今日，这是在中国这样社会的客观条件上自然产生的，国民党左派在现在及将来的生命仍然是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而生存而发展，这是毫

无疑义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不是投降资产阶级，也不是投降无产阶级，而只是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实现反帝国主义（民族）、反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民权）、反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民生）之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克服蒋介石为中心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这不但是左派国民党眼前的出路，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眼前的出路。

七月一日

1927年7月8日《向导》周报第二〇〇期　署名：独秀